格致·格尔尼卡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什么也别说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著　熊依旆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格致·格尔尼卡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什么也别说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著　熊依旆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 · 格尔尼卡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什么也别说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 帕特里克 · 拉登 · 基夫 著　熊依旆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著；熊依旆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7

（格致·格尔尼卡）

ISBN 978-7-5432-3243-3

I.①什… II.①帕…②熊… III.①北爱尔兰问题研究 IV.①K8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3360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封面装帧 菜瓜布合作社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by Patrick Radden Keefe

Copyright © 2019 by Doubled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21

by Truth & Wisdom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21-0409

格致·格尔尼卡

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著

熊依旆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字数　363，000

版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3243-3/K·213

定价　82.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珍藏室
第一部 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
  一 绑架
  二 艾伯特家的女儿
  三 撤离
  四 地下军队
  五 圣犹大之路公寓
  六 敢死队
  七 小个子准将
  八 裂杯子酒吧
  九 孤儿
  十 弗雷德们
第二部 人类的牺牲
  十一 封锁英格兰！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十三 玩具推销员
  十四 终极武器
  十五 俘虏
  十六 发条娃娃
  十七 有为剧团
  十八 血色信封
  十九 蓝丝带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二十 秘密档案
  二十一 在边缘
  二十二 叛徒
  二十三 沼泽女王
  二十四 交织的谎言
  二十五 最后一把枪
  二十六 神秘无线电
  二十七 波士顿录音带
  二十八 意外死亡
  二十九 这是过去
  三十 未知
附录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序言　珍藏室

2013年7月

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是一幢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坐落在树木繁茂的波士顿学院校园。其石筑的尖顶和彩色玻璃使之看上去酷似一座教堂。为了给因爱尔兰土豆饥荒而逃难至此的穷苦移民子弟提供教育，耶稣会的会士们创立了这所学府。[1]随着波士顿学院在后续一个半世纪中逐渐发展兴盛，它一直与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伯恩斯图书馆坐拥25万册藏书和约1600万份手稿，论及爱尔兰政治与文化历史文物，其广泛而全面的收藏堪称全美之最。多年前，一名图书管理员企图将1480年印刷的出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篇短文卖给苏富比拍卖行，[2]结果被捕入狱。图书馆热衷于购买贵重古物的名声日渐高涨，以致一位继任校长曾不得不亲自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3]当时有一名爱尔兰盗墓者试图向他出售一些偷来的墓碑，上面刻有古代拉丁十字架，以及复杂精细的环形图案和碑文。

伯恩斯图书馆里最为稀有贵重的物品，保存在一个名为“珍藏室”的特殊密闭空间内。那是一个防范严密之地[4]，配备有精准的空调装置和最先进的灭火系统。室内由监控摄像机监控，且只能在一个电子板上输入密码并转动一把特殊的钥匙后才能进入。离开时需要对这把钥匙进行登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指定人员才能享此特权。

2013年的一个夏日[5]，两名侦探跨入了伯恩斯图书馆。他们并非波士顿侦探。事实上，他们效力于贝尔法斯特的北爱尔兰警察局重案部，刚刚乘飞机抵达美国。他们从彩色的玻璃窗下穿过，向珍藏室走去。

两名侦探此行是为了取得一些秘密档案，这些档案在珍藏室已保存将近十年。其中有包含语音记录的迷你光盘[6]，还有许多文本。波士顿学院的图书管理员本可以帮侦探们省却此行，直接将档案邮寄至贝尔法斯特。然而这些录音里藏着敏感而危险的秘密，获得这些资料后，两名侦探的处理十分小心谨慎。现在，这些录音正式成为了一起刑事诉讼案的证据。这两名侦探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

第一部　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

一　绑架

琼·麦康维尔失踪的时候38岁。[1]她人生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不断地怀孕和恢复生产中度过的。她生养了十四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夭折。剩下的十个孩子中，最大的安妮20岁，最小的是6岁的双胞胎比利和吉姆，他们有一双讨人喜爱的眼睛。[2]要担负十个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给予他们关爱——是一件看似无法承受的壮举。但这是1972年的贝尔法斯特，庞大而难以驾驭的家庭随处可见。所以琼·麦康维尔并非在寻求奖赏，而她也未曾获得分毫。

相反，丈夫亚瑟的离世令她的生活雪上加霜。在一场受尽折磨的疾病后，亚瑟突然撒手人寰，留下她孤身一人——一个领取微薄抚恤金的寡妇，没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还要照顾所有的孩子。巨大的困境令她感到气馁，情绪起伏不定。她多数时间待在家里，靠几个大孩子看管弟妹，自己则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仿佛为了不在迷茫中倒下。琼思考着她的不幸，并努力为未来做打算。然而，麦康维尔家族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一家人最近从亚瑟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公寓中搬离，住进了帝维斯公寓里一间稍大一点的寓所。帝维斯公寓阴冷而潮湿，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处庞大而笨拙的房屋建筑群。那是一个寒冷的12月，整个城市淹没在傍晚的黑暗中。新寓所的炉子还没通电[3]，于是琼让15岁的女儿海伦去当地一家外卖店买一袋炸鱼薯条回来。趁着一家人等海伦回来的空当，琼泡了一个热水澡。如果家里有年幼的孩子，有时你只能把自己关在浴室才能寻得片刻清静。琼身材娇小，苍白的肤色映衬着精致的面容，黑色的头发总是扎在脑后。她潜入水里就这么待着。正当她皮肤通红地从浴缸里出来的时候，有人敲响了前门。[4]当时大概7点钟，孩子们以为一定是海伦带着晚餐回来了。[5]

可他们刚把门打开，就有一群人闯了进来。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谁也无法断定到底有几个入侵者——大概有八个人，但也可能是十个或者十二个。[6]他们有男有女，一部分人戴着大绒帽遮住了脸，其他人头上套着尼龙长袜，这让他们的面孔扭曲得如同恐怖面具。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持枪。[7]

琼穿着衣服出来了，受惊的孩子们围了上去。其中一个男人低声说道：“把外套穿上。”这些闯入者试图把她拉出寓所，她剧烈地颤抖起来。“发生什么事了？”[8]她愈发恐慌地问。就在这时，孩子们变得歇斯底里。[9]11岁的迈克尔拼命抓着妈妈，比利和吉姆抱着她嚎啕大哭。一伙人试图安抚这些孩子，说他们会把琼带回来，他们只是要跟她谈谈，过几个小时就把她送回来。[10]

16岁的阿奇是当时家里最大的孩子。他问那伙人，是否能陪着妈妈

去他们要带她去的地方，团伙的成员同意了。琼·麦康维尔穿上了一件粗花呢大衣，戴了一块方头巾。小孩子们则被带到了其中一间卧室里。入侵者一边领开孩子们一边跟他们说话，向他们做出直率的保证——并且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有两个男人没有戴面具，迈克尔·麦康维尔惊恐地发现，要带走他妈妈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邻居。[11]

帝维斯公寓像是埃舍尔画中的一场噩梦——密集的混凝土楼梯和过道，以及过度拥挤的公寓大楼。电梯频繁出故障，琼·麦康维尔被那伙人粗暴地带出了公寓，穿过一条走廊后步下楼梯。通常，即便在冬天，晚上也会有人在周围活动——孩子们在过道里踢球，或者工人们下班回家。但阿奇注意到，那晚的公寓楼群里空旷异常，仿佛事先被清理过一般。没有人能够打招呼示意，也没有邻居能发出警报。[12]

他紧挨妈妈走着，她也紧紧挽着他的手臂不愿放开。[13]但在楼下，有人数更多的一伙人正等待着。他们多达20人，穿着随意，戴着蒙面的大绒帽。其中几人手里拿着枪，一辆蓝色大众货车停在路缘上。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男人突然推了阿奇一把。他举起手枪，枪上暗淡的微光划过黑夜。他将枪口抵住阿奇的脸颊，小声道："滚！"[14]阿奇僵住了，他能感觉到冰冷的金属嵌入皮肤。他极力想要保护妈妈，可又能怎么办？他只是个孩子，寡不敌众，手无寸铁。他不情愿地转身踏上了楼梯。[15]

二楼的一面墙上，有许多垂直板条打出的孔。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称其为"鸽子洞"。透过这些孔洞，阿奇注视着妈妈被捆上了车，接着那辆货车离开帝维斯公寓后消失了。后来他才猛然明白，那伙人根本无意让他陪着妈妈——他们不过是在利用他将琼带出公寓。他站在极度的寒冷与寂静中，试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现在又该怎么做。然后他开始返回寓所。妈妈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好孩子们，等我回来。"[16]

二　艾伯特家的女儿

当杜洛尔丝·普赖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最喜欢的圣徒是殉难者。杜洛尔丝有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姑妈[1]，她总是说："为了上帝和爱尔兰。"对于家里其他人而言，爱尔兰则排在前面。杜洛尔丝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贝尔法斯特，她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去教堂。但她留意到父母并未这么做。大概14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宣布："我再也不去做弥撒了。"[2]

"你必须去。"她的妈妈克丽茜说。

"不，我不去。"杜洛尔丝回应。

"你必须去。"克丽茜再次说道。

"听着，"杜洛尔丝说，"我会出门在那个角落里站半个小时，然后对你说：'我去做过弥撒了。'但那是骗你的。"

她很固执，小时候也一样，于是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普赖斯一家住在一间半独立式的小廉租房里，位于安德森斯顿一条名叫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的街上，倾斜的街道井井有条。[3]她的爸爸艾伯特是一名家具商，狭小的客厅里摆放的几张椅子都是他做的。[4]一般人家通常会把家庭假期里拍的喜庆照片放在壁炉上作为装饰，然而普赖斯一家摆放的却是监狱里拍的快照，并且他们对此引以为荣。[5]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都狂热地投身于爱尔兰共和主义事业。他们相信，数百年以来，英国人一直是爱尔兰岛上的一股入侵势力，而爱尔兰人有责任利用一切必要手段将他们驱逐出境。

杜洛尔丝小时候会坐在艾伯特身上[6]，他会给她讲故事，告诉她自己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以童子军的身份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他年少时如何前往英格兰实施了一场炸弹袭击。他没有钱修补破损的鞋底，于是在鞋里垫上硬纸板，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斗胆向大英帝国发起了挑战。[7]

艾伯特身材矮小，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指尖满是烟草熏染的黄渍。[8]他常常讲述那些故去已久的爱国者的英勇传说。杜洛尔丝有一个哥哥达米安和一个姐姐克莱尔，但和杜洛尔丝最亲的是妹妹玛丽安。为了让他们高兴，他们的爸爸会在睡觉前给他们讲述自己曾经在德里越狱的故事。他是和另外20名囚犯一起逃走的，他们事先挖了一条直通监狱外的地道。[9]为了掩盖他们逃跑的动静，有一名囚犯吹起了风笛。[10]

艾伯特会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诫杜洛尔丝和她的兄弟姐妹，调制简易炸药最安全的方式是用木碗和木质器皿。绝对不能用金属材料！因为"一丁点火星就会要了你的命！"[11]他喜欢追忆被英国人处以绞刑的挚

爱的战友。成长的过程中，杜洛尔丝以为这是世界上再平常不过的事，她以为每个孩子的父母都有被绞杀的朋友。[12]父亲讲的故事如此扣人心弦，有时她会听得不禁打起寒战，浑身鸡皮疙瘩。[13]

家里的每个人都或长或短地蹲过监狱。克丽茜的妈妈，也就是孩子们的外婆多兰，过去是爱尔兰共和妇女会（Cumann na mBan）的成员。她曾因企图夺取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一名警员的执勤武器而在阿马监狱服刑三个月。[14]克丽茜也曾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并和三个姐妹一起被关进阿马监狱。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她们身上戴着“被禁的徽章”，即复活节百合——一些橙色、白色和绿色的小纸花。[15]

普赖斯一家人谈论起过去很久以前发生的苦难的时候，总仿佛那就是上个星期的事，这在北爱尔兰很普遍，因此你很难确定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最初究竟因何而起。对于普赖斯一家简单提到的“起因”，确实让人很难想象在那之前的爱尔兰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几乎并不重要，因为它一直在那儿。它早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它先于新教的创立。事实上，你可以回溯到将近一千年前，12世纪的诺曼入侵者为了寻找可攻占的新土地而驾船越过爱尔兰海[16]；或者至16世纪的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宣称英格兰彻底征服了爱尔兰；抑或追溯至17世纪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移民至此的新教徒，他们建立了一套庄园制度，将说盖尔语的当地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佃户和仆人。

但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这户人家，这个长篇故事里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篇章，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起义中，一群爱尔兰革命者占领了都柏林的邮局，并宣布一个自由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成立。杜洛尔丝是听着起义中那些充满魄力的英雄们的传说长大的，其中包括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帕特里克·皮尔斯，他是一位敏感的诗人。“爱尔兰人民世世代代维护着他们民族自由的权利。”[17]皮尔斯在邮局的台阶上如是宣称。

皮尔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被血祭的理想深深吸引，甚至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幻想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18]他开始相信流血是一件有着“净化”作用的事。[19]皮尔斯赞扬过去如耶稣般死去的爱尔兰殉道者[20]，并在起义的几年前写道：“地球衰老的心脏，要用战场的红酒来温热。”[21]

他终于如愿以偿。在短暂的荣耀之后，都柏林的暴动遭到英国政府无情镇压。皮尔斯被送至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最终和14名战友一起被枪决。[22]爱尔兰独立战争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后来这座岛屿在1921年被一分为二：南部的26个郡作为爱尔兰自由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北部剩余的6个郡则继续由大不列颠统治。正如其他忠诚的共和派一样，提到他们恰巧居住的地方时，普赖斯一家并不称其为“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而是称之为“爱尔兰北部”（the North of Ireland）。当地人的言谈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话题，就连专有名

词也可能带有政治色彩。

对殉难的崇拜有其危险性。根据《旗帜和徽章法案》，北爱尔兰的纪念仪式有着严格的规定。[23]北爱政府对于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十分担忧，就连民众展示爱尔兰共和国三色国旗的举动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小时候，杜洛尔丝会在复活节穿上最好的白色连衣裙，在胸前别一朵复活节百合，手挎一篮鸡蛋，以此纪念失败的叛乱。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仪式，如同加入一个秘密逃犯的联盟。看到有警察过来时，她知道要用手把百合遮住。[24]

但是，她对于献身共和事业可能付出的个人代价丝毫不抱幻想。艾伯特·普赖斯从未见过自己的第一个孩子。[25]那是他的大女儿，在他坐牢时于襁褓中夭折。杜洛尔丝的姨妈布蕾迪是克丽茜的三个姐妹之一，她年轻时参加过共和斗争。在1938年的一次事件中，当布蕾迪正帮忙转移一处隐藏炸药时，炸药突然爆炸[26]，布蕾迪双手手腕以下全部炸碎，同时她面部毁容，并且永久失明。事情发生的时候，她27岁。

虽然医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布蕾迪姨妈挺了过来。然而由于伤残十分严重，她余生都将需要别人的照顾。[27]如果没有人帮忙，在没有双手和双眼的情况下，她既不能换衣服也不能擤鼻涕，也做不了多少其他事情。布蕾迪经常待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中一连好几天不出门。如果说普赖斯一家怜悯她的遭遇，那也比不上他们对她的钦佩之情，因为她为了理想不惜付出一切。[28]布蕾迪出院后住进了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厕所在屋外。没有社工照顾她，也没有抚恤金能领，只有漆黑一片的生活。[29]然而，为了统一爱尔兰做出如此牺牲，她却从未表达过任何后悔之情。[30]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小的时候，克丽茜会吩咐她们到楼上去“陪布蕾迪姨妈聊天”。[31]这个女人总是独自待在昏暗的卧室里。杜洛尔丝喜欢踮着脚尖偷偷上楼，可布蕾迪的耳朵格外灵敏，所以她总能听到有人上楼的动静。布蕾迪是个老烟枪，杜洛尔丝从八九岁开始就被安排给她点烟[32]，接着轻轻把烟插到她的嘴里。杜洛尔丝讨厌这个差事，这让她觉得恶心。[33]她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姨妈，以非同一般的近距离仔细观察她的脸[34]，最大程度地感受她所经历的噩梦。杜洛尔丝是个话多的孩子，有着小孩特有的心直口快。有时她会问布蕾迪：“难道你不希望自己被炸死算了？”[35]

杜洛尔丝用自己的小手握住姨妈粗短的手腕，抚摸其如蜡一般光滑的皮肤。她常说，它们让她想起了“猫爪”。布蕾迪戴着一副墨镜。有一次，杜洛尔丝看到墨镜后落下了一滴泪，眼泪顺着她憔悴的脸颊滑落。杜洛尔丝心想，没有眼睛的人怎么会流泪呢？[36]

1969年1月1日，早晨晴朗而寒冷。一群学生抗议者聚集在市政厅外的登戈尔广场上，那是贝尔法斯特的中心地带。他们计划从贝尔法斯特步行至城墙围绕的德里市，两地间的距离大约70英里。[37]这场游行将

耗费他们数天时间，目的是抗议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全面性的歧视。爱尔兰岛的分裂造成了反常的局面，使得数世纪来矛盾不断的两个宗教团体都感觉自身沦为了处境艰难的少数群体。新教徒占北爱尔兰人口的大多数，但在整个爱尔兰岛占比较少，他们害怕被并入流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整个岛屿占比较多，但人口在北爱尔兰居于次位，他们则感觉在六个郡中遭到歧视。

北爱尔兰拥有100万新教徒和50万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的确遭受了非同寻常的排挤[38]：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好的工作和房子，并且被拒绝参与能改善其处境的政权。北爱尔兰有自己的委任政治体系，其官邸位于贝尔法斯特郊区的斯托蒙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天主教徒在行政部门任过职。[39]

由于被造船业及其他有吸引力的行业拒之门外，天主教徒常常会直接离开，移民至英格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去寻找他们在故土无法找到的工作。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出生率大约是新教徒的两倍。然而在挺进德里的游行示威发生之前，天主教徒的人口数量几乎30年保持不变，因为许多人除了离开别无选择。[40]

这些年轻的游行示威者认为，北爱尔兰的社会等级制度类似于美国的种族歧视，于是明确地选择效仿美国民权运动。[41]他们研究了1965年由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领袖领导的从塞尔玛行进至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当他们裹着粗厚起绒呢料大衣，手臂挽着手臂，步履艰难地走出贝尔法斯特时，他们举着“民权游行”的标语，并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42]

杜洛尔丝·普赖斯就在游行之列，她和妹妹玛丽安一起参加了这次抗议。18岁[43]的杜洛尔丝比大多数游行者小，他们许多人都在上大学。杜洛尔丝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女性，她有着深红色的头发，浅淡的睫毛下闪烁着蓝绿色的双眼。玛丽安虽然略小几岁，但姐妹俩形影不离。在安德森斯顿一带，谁都知道她们是“艾伯特家的女儿”。[44]她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形影不离，看上去就像一对双胞胎。她们用“杜可”和“玛尔”来称呼彼此[45]，从小到大不仅睡一个房间，更睡在同一张床上。[46]杜洛尔丝的性格十分强势，还有些桀骜不驯。在艰难的行进中，两姐妹一直活跃地聊着天，她们棱角分明的贝尔法斯特口音在圣多米尼克学校教育的熏陶下略有改变[47]，那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女子高中。两人妙趣横生的交谈中不时传出阵阵笑声。[48]

在她后来的描述中，杜洛尔丝称自己的童年是一场“思想灌输”。[49]但她一直保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也从不擅长隐藏自己的观点。早在青少年时期，她就开始质疑从小被灌输的某些教条。那是20世纪60年代，圣多米尼克的修女们再怎么努力也难以隔绝席卷世界的浪潮。杜洛尔丝喜欢摇滚。和贝尔法斯特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切·格瓦拉的鼓舞。[50]这位上镜的阿根廷革命家曾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切·格

瓦拉最终被玻利维亚军方枪决，且被砍断双手以作为死亡证据，就像布蕾迪姨妈。这一事实只令她更迫切地将其加入自己心目中的革命英雄之列。

然而，虽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杜洛尔丝却逐渐认为父辈所捍卫的武装斗争可能已经成了过时的解决办法，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迹。艾伯特·普赖斯是一个坚定的健谈者。[51]他讲话的时候一只手揽着你的肩，另一只手永远夹着一根烟，以其个人魅力充满活力地向你讲述历史和趣闻轶事，直到你认同他的观点方才罢休。可杜洛尔丝争论起来时毫不怯懦，她会对自己的父亲说：“嘿，瞧瞧共和军吧。你们用的这个办法失败了！”[52]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

共和军的历史从某些角度而言确实是一段失败的历史。正如帕特里克·皮尔斯所言，每一代人都发动过这样或那样的叛乱。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共和军基本沉寂了。老一辈人依然会在爱尔兰共和国的南部边境集会，举办周末训练营，用过往战役中遗留的老旧枪支进行射击练习。但谁也没有真正将他们视作一支武装力量。爱尔兰岛依旧分裂，天

主教徒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你们失败了，”杜洛尔丝告诉父亲，并补充道，“其他办法是有的。”[53]

杜洛尔丝开始在皇后大学校园内的一个礼堂参加集会[54]，那是一个叫作“人民民主”的新政治团体。和切·格瓦拉以及许多一起游行示威的人一样，杜洛尔丝认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整个教派分裂问题令人厌恶[55]，她开始相信：劳动阶级的新教徒也许享受了一些优待，但他们也常常面临失业的困境。那些住在贝尔法斯特尚基尔路上的简陋房屋里的新教徒也没有室内厕所可用。只要他们明白，爱尔兰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化能带来更好的生活，那么困扰了两个群体数世纪的纷争也许会最终消失。

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是来自德里的埃蒙·麦卡恩，这是一位放荡不羁、伶牙俐齿的年轻社会主义者。杜洛尔丝和他在游行中认识后，两人成了可靠的朋友。[56]麦卡恩敦促同行的抗议者不要将劳动阶层的新教徒妖魔化。“他们绝不是我们的敌人，”麦卡恩坚称，“他们不是穿着昂贵西装的剥削者，而是被体制愚弄的人，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工厂主式的统一派所蒙骗。他们是普通人。”[57]这些人其实和我们站在一边，麦卡恩说，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爱尔兰是一座小岛，整座岛上最远的两端的距离也不超过200英里，只要一下午就能驱车从一个海岸开到对面的另一个海岸。然而，自从游行示威的队伍离开登戈尔广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断遭到反示威人群的骚扰。这股反示威力量来自新教的统一派，他们热切地忠诚于英国王室，其领导人是44岁的罗纳德·邦廷。他体格健壮，长着一对招风耳，曾做过高中数学老师，也曾在英国陆军任军官。虽然邦廷过去持有比较进步的观点，但他后来受到了伊恩·佩斯利的影响。[58]佩斯利是一名极其反天主教的牧师，曾在邦廷的母亲临终前照顾她。邦廷是奥兰治党的一员，这个新教的兄弟组织长久以来将反对的矛头对准了天主教徒。他和他的拥护者不断地推搡和嘲弄游行队伍，企图夺下对方的抗议标语，同时举起他们自己的旗帜——英国国旗。有一次，一名记者问邦廷，就让这些人示威游行，不去管他们，不是更好吗？

“你不可能对魔鬼视而不见，伙计。”[59]邦廷回答。

邦廷也许过于偏执，但他的部分焦虑在新教徒中普遍存在。时任英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泰伦斯·奥尼尔当年表示道：“在北爱尔兰，新教徒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因为通婚而受到罗马天主教徒的压制。”[60]倘若这种情况最后真的发生，谁也无法肯定伦敦会来拯救他们。对于英国“大陆”的许多人而言，这个苏格兰海岸附近躁动不安的省份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其他人则很乐意放弃北爱尔兰。毕竟，英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摆脱殖民地。借用当时一位英国记者的话，北爱尔兰的统一派“比英国人还要拥护英国，但英国人却对他们漠不关心”。[61]对“保皇派”，即支持统一的狂热分子来说，这让他们更加视自己为终极的捍卫者，守护其岌岌可危的国家身份。1912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他的诗歌

《阿尔斯特》中写道："我们明白，当千言万语道尽，/一旦屈服，我们将不复存在。"[62]

但邦廷少校因为这场游行感到备受威胁，可能还有一层更私人的原因。这些穿着邋遢的示威者[63]唱着嬉皮士的歌，手里举着正义凛然的标语，而其中就有邦廷的儿子罗尼·邦廷。这位皇后大学的学生留着浓密的连鬓胡子，他在1968年夏天融入了激进政治活动的行列。[64]他绝不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新教徒。事实上，新教徒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传统由来已久。爱尔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之一沃尔夫·托恩就是新教徒，他曾在1798年领导过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力叛乱。然而罗尼无疑是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个其父亲如此公然反示威的人。邦廷一手策划了这场恼人的反抗议活动，领导自己的保皇派队伍骚扰示威者，并用扩音器进行反天主教的谩骂。"我爸在那里丢人现眼。"[65]罗尼羞愧地对朋友们抱怨。但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似乎只让父子双方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66]

和普赖斯姐妹一样，罗尼·邦廷加入了人民民主组织。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游行至德里的计划最好不要进行，因为他觉得会有"不好的事"发生。[67]警方已经对之前的几次抗议实施了暴力镇压，北爱尔兰绝非言论自由之地。由于担心天主教发动起义，爱尔兰早在分裂时期便通过了一项严苛的《特殊权力法案》，该法案制定了一种近乎永久性的紧急状态[68]：政府可以禁止集会和某些类型的言论，也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人们实施搜查和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无限期关押。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中新教徒占有压倒性比例，它还有一个名为"特殊分队"的兼职副业，通常由极其反天主教的统一派武装人员组成。在概括特殊分队如何招募新人时，一名曾经的老队员说道："我需要人手，越年轻越野蛮的越好。"[69]

随着游行队伍在乡村前进，他们不断遭遇统一派新教徒的要塞村庄。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总会出现一伙手持棍棒的当地人挡住学生们的去路，在外围陪同游行队伍的警察便会强令他们改变路线，绕道而行。[70]邦廷少校的部分人员一直跟着游行队伍，不断耻笑他们。其中一人背着一个兰贝格鼓[71]，也就是所谓的大力锤。不祥的锤击声在绿色的山丘和小村庄间回响，召唤着其他身强力健的人来加入反游行的队伍。

假如真的会有一场暴力冲突，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他们有些人很乐意接受这个想法。[72]美国的塞尔玛游行激起了警方的残暴镇压，而电视上转播的令人震撼的暴力场面，也许就是催生真正改变的导火索。[73]这些学生认为，最为棘手的不公现象可以通过和平抗议来解决。这是1969年，似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站在思想的前端。也许北爱尔兰的战线即将重新划分，再也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共和派与保皇派之间的较量，而是在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一场未来势力和过去势力的对抗。

游行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在距德里十英里的一处十字路口，一位抗议者手持扩音器说道："很可能会有人朝我们扔石头。"前方

看上去会有麻烦。从贝尔法斯特出发后，几天时间里，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进来，现在路上站满了数百位游行示威者。拿扩音器的人大声问道：“你们做好可能受伤的准备了吗？”[74]

游行队伍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

前一晚，当游行者们在克劳迪村庄的一间礼堂席地而睡时，邦廷少校已经将他的追随者召集至德里，也就是他所谓的伦敦德里。[75]集会地点是位于福伊尔河岸的市政厅，那是一幢宏伟的石料建筑，镶嵌着彩色的玻璃。数百名亢奋的保皇派成员假借“祈祷会”之名聚集于此。在那里等待这些信众的，正是伊恩·佩斯利。

佩斯利是一位浸信会传教士之子，他有着激进的思想，其追随者狂热而偏激。在威尔士的一所边缘福音派大学受训后，他创建了自己立场强硬的教派。一米九的身高令佩斯利看上去十分高大，他双眼斜视，一口牙齿错乱无章。他会俯身在布道台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方，颤动着颚骨慷慨激昂地抨击“魔鬼的罗马天主教”。[76]梵蒂冈和爱尔兰共和国正在秘密结盟，策划一场推翻北爱尔兰政府的邪恶阴谋，他如是争论。随着天主教徒稳定地积累实力和信众，他们会变成“一只随时准备撕碎猎物的老虎”。

佩斯利是一个有感染力的煽动者，他喜欢带领信徒游走于天主教的大街小巷，随时随地制造骚乱。他会用低沉的声音细说天主教徒为何是人渣，他们如何“像兔子一样交配，像害虫一样繁殖”。[77]他摇唇鼓舌，制造分裂，可谓煽动人心的好手。事实上，他如此的冷漠无情和赤裸裸的偏激，逐渐让有些共和派权衡之后认为，他或许对他们的运动有好处。“我们为什么要除掉佩斯利？”人们常听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妈妈克丽茜这样说，“他可是我们手上的王牌。”[78]

尽管德里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但在保皇派标志性的想象中，这个城市依然是一座象征着新教徒抗争精神的鲜活丰碑。1689年，一支忠于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军队将德里包围，效忠于新国王奥兰治亲王威廉的新教势力抵挡住了这次围攻。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人们或许会为这种年代久远的事件制作一块教育性的牌匾。然而在德里，当地的新教组织每年都会以游行示威的方式纪念这次冲突。现在，佩斯利和邦廷提出，这些预备第二天早上进入德里的学生抗议队伍很可能会再次将德里包围。[79]

佩斯利告诉信徒，这些拥护民权的人或许假装自己是和平的抗议者，但他们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共和军”。[80]他提醒信徒，伦敦德里是一座抵抗天主教入侵的堡垒。他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为保卫这座城市再次挺身而出[81]，人群高呼着：“哈利路亚！”这就是佩斯利的一贯作风，他将人们怂恿至群情激奋时便退居幕后，绝不等真刀真枪落到自己身上。但作为他指定的副手，邦廷少校吩咐信众，任何想要展现“男子气概”的人应当“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保护措施”来武装自己。[82]

那晚的夜幕下，在通往德里的道路上方，当地人开始在田里储备大量石头。[83]一位支持这项计划的当地农民提供了一辆拖拉机来帮忙收集石块。这些不是小卵石，而是刚从采石场挖出来的可观的大岩石，它们被一堆堆存放在精心安排的间距点，为一场伏击做准备。

“我们一开始说过，要进行一场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埃蒙·麦卡恩在最后一天的早上提醒杜洛尔丝和其他抗议者，“今天，考验我们真心的时候到了。”[84]游行队伍再次出发，他们缓慢地前进着，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树篱。前方是一个瓶颈路段，老旧的伯恩托莱特石桥横跨在法汉河上。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以及其他年轻的抗议者继续朝石桥艰难地行进。接着，在地面陡然升起的上方，一个男人在越过树篱的田里出现了。他戴着一个白色袖标，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做出一系列复杂的手势，就像斗牛士召唤一头看不见的公牛。[85]很快其他人开始冒出来[86]，强壮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田埂上，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俯视游行示威的队伍。现在路上挤满了数百人，他们被困在树篱中间，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上方的田地里，他们手臂上戴着白色袖标。接着有人投下了第一批石头。


伯恩托莱特桥伏击事件

贝尔纳黛特·德夫林是杜洛尔丝的朋友，也是这次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之一。她觉得那些投掷物仿佛形成了一块幕布。[87]路两边的小道上不断有或老或少的男人出现，他们人数众多，不断向下猛扔石头、砖块和牛奶瓶。攻击者有的站在越过路面的高地上，有的藏在路边的树篱后，还有的在桥上蜂拥着来回奔跑，阻挡游行者的去路。[88]走在队伍前列的人朝石桥冲去，后方的人为了躲避密集的投掷物开始撤退。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被困在了人群中。[89]

她们翻过树篱，可石头还在不断砸下来。[90]现在那些人开始往下跑，对游行者进行身体攻击。杜洛尔丝觉得，那场面就像好莱坞的某些

西部影片里印第安人冲向大草原的情景。[91]有些攻击者头戴摩托车头盔[92]，他们从高地上下来[93]，手中挥舞着粗短棍、铁撬棍、铅管和板条。有些人手持布满铁钉的厚木板，朝抗议者发起攻击，刺伤他们的皮肤。人们用外套蒙住头，在盲目与混乱中踉跄地抓住彼此寻求保护。[94]

游行者逃往田里后，被猛推在地踢至昏迷。[95]有人拎起一把铁锹朝一个年轻女孩的头部砸去。[96]两名报社摄影师遭到一顿痛打，身上还被砸了石头。[97]那伙人没收了他们的胶卷，并警告说如果再来就要了他们的命。就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大元帅[98]邦廷少校像指挥官一样挥舞着手臂，其外套的袖子上溅满了鲜血。[99]他从抗议者手中抢下一条横幅，接着有人点火将它焚毁。

游行者没有抵抗，他们已经事先答应遵守非暴力的诺言。[100]杜洛尔丝·普赖斯发现，周围的许多年轻人脸上被划了深深的伤口，鲜血流入了他们的眼睛。[101]她“哗”地一声落入河里，周身溅起了冰冷的水花。[102]在远处，游行者正从桥上被推下河。[103]当杜洛尔丝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她和一名攻击者的眼神相遇了。那个人手持棍棒，目光因仇恨而变得呆滞[104]，她常在后来的人生中回想起那一刻。她注视着那双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105]

最后，一名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涉水进入河里准备结束这场喧闹。杜洛尔丝抓住他的外套不肯放手。[106]然而正当这名强壮的警察领她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那天有几十个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在场，但大多数人却袖手旁观。后来有消息宣称，那些进攻者之所以佩戴白色袖标，是为了让他们在警队的朋友能从游行者中将他们辨别出来。[107]事实上，邦廷少校的许多追随者，也就是那些实施暴行的人，都是警队的附属组织“特殊分队”的成员。[108]

随后，在去往德里奥特那盖尔文医院的路上，杜洛尔丝哭了[109]，她被一种奇怪的复杂情绪所掌控，既感到如释重负，又觉得沮丧和失望。当她和玛丽安终于回到贝尔法斯特，鼻青脸肿、衣衫破损地出现在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小屋门口时，克丽茜·普赖斯倾听了女儿们备受磨难的故事。等她们讲完后，克丽茜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反抗？”[110]

三　撤离



琼·麦康维尔及其丈夫亚瑟与罗伯特、海伦、阿奇

琼·麦康维尔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她失踪的时候时局正乱，而她身后的孩子们年纪尚幼，未能形成丰富的记忆。但琼有一张照片被保存了下来，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他们位于东贝尔法斯特的家门前拍的一张快照。[1]琼和三个孩子站在一起，她的丈夫亚瑟蹲在前面。她盯着镜头，手臂交叉在胸前，嘴角露出微笑，眼睛在阳光下眯了起来。有几个孩子记得琼·麦康维尔的一个细节——一枚蓝色的安全别针。她会把这枚别针别在衣服上，因为常常不是这个孩子掉了扣子就是那个孩子有东西需要缝补。这是她最典型的配件。[2]

琼出生于1934年，她出生时的姓氏为默里。她的父母托马斯和梅·默里是东贝尔法斯特的一对新教夫妇。贝尔法斯特随处可见高大的烟囱和教堂的尖塔，煤烟的覆盖让整座城看上去灰蒙蒙的。其一侧有一座平坦的绿色山脉，另一侧的贝尔法斯特海湾是北海峡的一处小海湾。城内有几家亚麻布制造厂和卷烟厂，还有一处造船的深水港，以及一排排千篇一律的砖房，那是工人们的住宅区。默里一家住在阿沃尼尔路上，离制造泰坦尼克号邮轮的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不远。[3]琼的父亲就在这座造船厂工作。[4]琼小的时候，每天早上有数千人拖着沉重的步子从她家门口经过，父亲托马斯会加入其中往造船厂走去，然后每晚随着人流慢慢地朝着反方向回家。[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贝尔法斯特的亚麻布

制造厂生产了数百万套制服，造船厂也加班加点地造出了大量海军舰艇。然而，1941年的一天夜里，就在琼7岁生日前不久，空袭的警报拉响了。一支空军轰炸机编队在海滨飞驰而过，向下空投地雷和燃烧弹，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在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6]

在那个年代，贝尔法斯特的劳动阶层并不重视对女孩的教育，因此琼到了14岁便辍学开始找工作。最后她在附近的霍利伍德路上找到了活计，给一位天主教寡妇当佣人。[7]这位寡妇的名字叫玛丽·麦康维尔，她有一个成年的儿子叫亚瑟。亚瑟是家中独子，在英国陆军服役。亚瑟身材高大，比琼年长12岁。他在琼面前就像巨人[8]，毕竟琼穿着鞋子才勉强有一米五的身高。亚瑟的祖辈一直有从军的传统，他对她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往缅甸和日本人作战的故事。[9]

琼和亚瑟相爱后，他们的家人并未忽略两人来自分裂的教派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期间，教派矛盾并不像过去以及后来那样显著。但即便如此，“通婚”的现象仍旧十分罕见。[10]这不仅是由于部族内部的团结一致，也缘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居住的区域常常十分局限[11]：他们住在不同的街区，上不同的学校，做不同的工作，去不同的酒吧。以家佣的身份来到亚瑟母亲的家里后，琼跨越了这些界限。[12]当她和亚瑟开始交往时，亚瑟的母亲对此十分不悦。（虽然琼的母亲可能也不太高兴，但她接受了这桩婚事。不过琼有一位舅舅是奥兰治会的成员，他因为琼的这一越轨之举痛打了她一顿。）[13]

1952年，这对年轻的夫妇私奔到了英格兰，他们住在亚瑟派驻的军营里。[14]但他们最终于1957年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并和琼的母亲住在一起。琼的第一个孩子安妮患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这使得她人生大半的时间都需要住院治疗。在安妮之后，琼陆续生下了罗伯特、亚瑟（也就是阿奇）、海伦、阿格尼丝、迈克尔（大家都叫他米奇）、托马斯（昵称塔克）、苏珊，以及最小的双胞胎比利和吉姆。算上琼、琼的母亲、丈夫和孩子，阿沃尼尔路上的这栋小房子里挤下了大约12个人。[15]楼下有一个小前厅，厨房在屋后，还有一个室外厕所、一个用来做饭的柴火堆，以及一个接冷水的洗碗槽。

1964年，亚瑟拿着退伍金从部队退役[16]，并做起了房屋修缮的小生意。然而他的业务难以为继，于是在希罗克工程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但最后由于老板发现了他的天主教徒身份而被解雇。他还在一个制绳厂工作过一阵。[17]后来回忆起这段时期，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张照片也是这个时候照的。虽然家境的确很艰难，但在战后的贝尔法斯特，这对劳动阶层的孩子而言再寻常不过。他们的父母都活着，生存似乎有保障，人生是完整的。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期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相互猜疑逐渐升级。当地的奥兰治党成员在夏天举行胜利游行的时候，会把起点不偏不倚地定在麦康维尔的家门外。[18]多年来，伊恩·佩斯利不断告诫其教众，要将住在他们中间的天主教徒赶出去。“你们这些住在尚基尔路的人

都怎么了？”[19]他会大吼道，“尚基尔路425号，你们知道住在那儿的是谁吗？是罗马教皇的人，就是他们！”这是一种精准的种族清洗。佩斯利会快速将地址罗列出来：亚丁街56号、克里米街38号、当地冰淇淋店的业主。他们是“教皇的信徒”、罗马的代表，一定要赶走他们。住在阿沃尼尔路的麦康维尔一家没有电视[20]，但随着民权运动逐渐展开、北爱尔兰不断卷入暴乱，琼和亚瑟会到邻居家看晚间新闻，他们的惊惶之情与日俱增。

1969年迈克尔·麦康维尔8岁的时候，时局陷入混乱。每年夏天，德里的保皇派组织“学徒男孩”都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纪念在1688年为抵挡国王詹姆斯的天主教势力而关上城门的年轻的新教徒们。依照传统，游行者会在庆典的最后站上城墙，朝下方博格赛德天主教徒聚居区的人行道和房屋扔硬币。然而那年新教徒的挑衅遇到了阻碍，暴乱随之爆发，德里陷入了后来被称为博格赛德战役的纷争之中。[21]

随着德里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贝尔法斯特，骚乱如同空气中的病毒一般迅速蔓延。年轻的新教徒成群结队横穿天主教街区，砸窗放火地制造破坏。天主教徒做出了反抗，他们扔石头，扔瓶子，扔燃烧瓶。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和特殊分队对这场动乱做出了反应，但天主教徒感受到了他们权威的冲击，后者抱怨警察只会在保皇派的罪行面前袖手旁观。天主教街区的路障迅速在四处设立起来，人们劫持校车和面包车后将它们侧翻，以封堵街道并建立防御工事。年轻的天主教徒撬开铺路石用以垒高路障，或者将其当作袭警用的投掷物。[22]迫于这种猛攻带来的震慑，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调遣了绰号为“巨猪”的矮胖装甲车。它们迟缓地行驶于狭窄的街道，炮塔朝着四周旋转。石头如雨一般在它们经过时砸落，扔向钢阀盖的汽油弹爆开后，蓝色火焰仿佛撞碎的鸡蛋般倾泻而出。[23]

有时甚至会上演诗歌中才会出现的无法无天的情景：几个孩子启动了一辆停在建筑工地的推土机。[24]他们坐在这个庞然大物的顶端，得意洋洋地行驶在西贝尔法斯特的街道上，周围起哄的孩子朝着他们大声欢呼。就在某个时刻，驾车的孩子对他们笨重的坐骑失去了控制，撞上了一根电线杆。此时，有人立刻将一枚汽油弹抛向推土机，它瞬间燃烧了起来。

保皇派团伙开始有组织地在孟买街、沃特维尔街、克什米尔路以及其他天主教飞地展开行动。[25]成百上千的房屋内部被摧毁，居民被迫流落街头。随着暴乱的蔓延，全贝尔法斯特的普通家庭都用木板将门窗封堵起来，仿佛为了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飓风。[26]他们将客厅里的老旧家具搬离以减少可燃物，以防随时可能破窗而入的燃烧弹。接着他们会挤进屋后的厨房，祖父母们手中紧握着念珠，等待混乱的平息。[27]

那年夏天，将近有2000个家庭逃离了他们贝尔法斯特的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28]贝尔法斯特大约有35万居民。[29]在随后的数年中，预计有多达百分之十的人口从这里迁移。[30]有时，上百人的团伙

会在某户人家集合，强迫里面的住户离开。[31]其他时候，有人会往某家的信箱里塞一张纸条，勒令户主在一小时内搬走。[32]人们挤上车，穿过城市朝安全地带驶去。八口之家挤进一辆小轿车的情景并不少见。[33]最终，数以千计的天主教徒在火车站排起了长队。他们是难民，等待着登上向南开往爱尔兰共和国的列车。[34]

不久，这伙人就来到了麦康维尔家，那是一群当地人，他们找到亚瑟，告诉他必须离开。亚瑟趁着夜幕溜了出去，在他母亲的家里寻求避难。[35]起初琼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家里，心想冲突可能会平息。但最后他们也被迫逃离，把能带上的家当全部塞进了出租车。[36]

他们穿越的城市已不同以往。来来去去的卡车装着人们搬走前能收集的所有家具。男人们背着陈旧的沙发和大衣柜在街上艰难前行[37]，十字路口的汽车正着着火，被燃烧弹击中的校车还在闷烧，大量烟雾笼罩在上空。所有的交通灯都已被破坏，因此在有些十字路口，你能看到年轻人站在街上指挥交通。[38]天主教徒征用了60辆公共汽车，并将它们沿街安置作为路障。这是一条有形的新战线，标志着族群的势力据点。碎石和碎玻璃随处可见，有位诗人将之形象地描述为“贝尔法斯特的五彩纸屑”。[39]

然而在这场残杀中，镇定的贝尔法斯特市民简单地选择了适应并继续他们的生活。如果枪战中出现片刻间歇，常常能看到某户人家的前门试探性地打开一条缝，接着一位戴角质边框眼镜的贝尔法斯特主妇会探出头来，以确认四下无人。然后她会穿着雨衣起身出门，卷发夹上围着头巾，仪态端庄地穿过战区走向商店。[40]

由于对时局的混乱过于担心，出租车司机把琼·麦康维尔和她的孩子们送到福尔斯路后便拒绝再向前行驶。因此他们不得不拖着行李走完剩下的路程，最后在亚瑟母亲的家里和亚瑟团聚了。[41]但玛丽·麦康维尔只有一间卧室。她的眼睛已半盲，同时由于一直不喜欢嫁给自己儿子的这位前家庭雇佣，她和琼的相处并不融洽。[42]除此之外，那片地区经常发生枪战，琼和亚瑟担心屋后的一个木料场会被人纵火，而火势可能蔓延。[43]于是一家人再次搬家，搬到了由一所天主教学校改建的临时避难所。他们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

贝尔法斯特的住房管理局正在为成千上万人搭建临时住处，这些都是忽然间在自己的城市沦落为难民的人。最后管理局给麦康维尔家提供了一间新建的小屋。可当他们到达小屋准备入住时，却发现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比他们抢先了一步。许多无家可归的家庭都在擅自占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地方。[44]有天主教徒住进新教徒遗弃的房子里，也有新教徒搬入天主教徒空出的家中。到达第二间房屋后，麦康维尔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另一个家庭已经住了进去，并且拒绝离开。帝维斯街上正在建造新的房屋，这次亚瑟·麦康维尔坚持在施工完成之前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好让别人没有机会捷足先登。[45]

房屋的构造很简单：四个房间外加一个室外厕所。但这是他们名正言顺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琼高兴得马上买来布料做窗帘。[46]一家人在这间小屋住到了1970年2月，当时他们在一个名为帝维斯公寓的建筑群分配到了一处永久的住所。[47]帝维斯公寓建设了几年时间，如今终于落成，它在周围的街区中赫然矗立。

帝维斯公寓原本是对未来的一种设想，于1966年至1972年作为“扶贫”计划的一部分建造而成。[48]其原址名为庞德·洛尼，曾是一片过度拥挤的19世纪老居民区。帝维斯公寓由12栋相互连接的住宅大楼组成，包含850个单元。受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启发，公寓被构思为一座“天空之城”[49]，在缓解住房短缺的同时，为像麦康维尔家这样的普通贝尔法斯特家庭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度奢侈的舒适感。帝维斯公寓的居民将会有淋浴间和室内厕所，以及一个热水槽。楼房的每一层都有一个宽阔的露天混凝土平台，连接着两端的公寓。此举意在模拟过去庞德·洛尼联排住宅外面的小街道，那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地方。每扇门都漆成了糖果色，相比于贝尔法斯特的诸多灰暗，那些红黄蓝带来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色彩。

麦康维尔一家搬进了公寓群的法塞特之路区，房屋里有四间卧室。[50]但他们对新住所的兴奋之情很快消失殆尽，因为它的构造完全没有考虑人们的实际生活。帝维斯公寓没有生活服务设施，没有绿地，也没有任何景观美化。除了两块光秃秃的足球场和一片围着墙的沥青地上装的两架秋千，没有任何游戏场所[51]——而这些楼房里住着一千多个孩子。

迈克尔·麦康维尔搬进帝维斯公寓后，这里对他而言就像一座老鼠的迷宫。[52]到处遍布着走廊、楼梯井和斜坡。房屋内墙由廉价的石膏板筑成，因此你能听见邻居吃晚饭时说的每句话。[53]此外，因为外墙由无孔隙的混凝土所建，所以产生了冷凝现象。有害的黑霉菌开始爬上墙顶和公寓的天花板。[54]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建筑工程，帝维斯公寓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效果，它变成了后来一位作家所描述的“天空之窟”。[55]

麦康维尔一家从他们东贝尔法斯特的家里被赶出来的那个夏天，英国军队被派往北爱尔兰，以回应博格赛德战役和正在发生的暴乱。数千名身着绿夹克的年轻士兵乘船抵达，涌入贝尔法斯特和德里。起初士兵们受到了天主教徒的热烈欢迎，仿佛他们是解放了巴黎的盟军部队一般。天主教群体对阿尔斯特皇家警队和特殊分队早已愤怒至极，认为它们是教派当局，而军队的立场相比之下显得较为中立，因此士兵的到来似乎有望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安危。在西贝尔法斯特，天主教的母亲们冒着风险到部队用沙袋垒成的哨岗给士兵们送茶水。[56]

迈克尔的父亲则更加慎重。[57]作为一名退伍士兵，亚瑟·麦康维尔不喜欢士兵巡逻时态度随意地对他讲话，仿佛部队的指挥系统中已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帝维斯公寓楼群的一端建起了一栋20层的高楼，它成了

贝尔法斯特除教堂外最高的建筑。下面的18层楼由单元房组成，但英军借用了楼顶的两层作为观察哨。当下面的紧张局势升温时，部队的瞭望员可以用望远镜监视整座城。

部队抵达后没多久，天主教群体便开始失去对他们的好感。年轻的士兵们并不了解贝尔法斯特复杂的族群地理势力。[58]他们原本被看作这场冲突的中立调解方，但现在却被视为入侵者——一支与特殊分队和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联盟的全副武装力量。

天主教徒开始武装自己，他们射杀保皇派的敌手，射杀警察，最后将目标扩大至军队。枪战不断爆发，一些天主教狙击手晚上爬到楼顶，平躺在烟囱之间挑选地面的目标。[59]被这些攻击惹恼后，军队和警方会以更猛的火力实施反击。[60]M1卡宾枪的噼啪声和斯特林冲锋枪刺耳的咔嗒声随之在周围的街区回响。为了让狙击手难以发现自己，特殊分队用左轮手枪射坏了街灯，使整座城陷入一片黑暗。[61]英军乘坐半吨重的路虎车在空荡荡的街道巡逻时会将前灯熄灭，以防自己成为目标。[62]尽管时局如此混乱，但在北爱尔兰问题的初期，实际死亡人数却非常少[63]：1969年的死亡人数仅19人，到1970年也只有29人。但在1971年，随着暴乱的升级，将近200人丧命。到了1972年，死亡人数已接近500人。

帝维斯公寓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这使它成为了武装抵抗的要塞。[64]麦康维尔一家搬进公寓后，很快有人向他们介绍了当地居民所说的“链条行动”。[65]当警方或者军队到某户人家搜查武器时，有人会探出公寓的后窗把枪递给隔壁公寓中从后窗探身出来的邻居。邻居再将枪支递给另一边的隔壁邻居，如是一个接一个传递下去，直到武器被送至楼层的尽头。

北爱尔兰问题时期死去的第一个孩子就丧命于帝维斯公寓。这件事发生在麦康维尔一家入住之前。1969年8月的一个夜晚，两名警察在楼群附近被狙击手射伤。由于形势带来的恐慌，以及疏于在这种情况下对枪支的使用训练，警方从一辆装甲车内不分青红皂白地朝帝维斯公寓猛力开火。随后，在射击的间隙，他们听到楼房内有人喊道：“有个孩子中弹了！”[66]

9岁的帕特里克·鲁尼正和家人一起躲在公寓的里屋，结果却被警方的一发子弹穿过石膏板墙击中了头部。[67]由于一阵阵射击仍在持续，警方拒绝让救护车穿过福尔斯路。于是最后有个男人从公寓里跑出来，疯狂地挥动一件白色衬衫。[68]另外两个人抱着头部被击碎的孩子出现在他身旁。他们设法将帕特里克·鲁尼送上了救护车，但他不久就死去了。

迈克尔·麦康维尔明白，帝维斯公寓是个危险之地。帕特里克·鲁尼和他年纪相仿。夜晚枪战爆发的时候，亚瑟会大喊：“趴到地上！”[69]于是孩子们会把褥子拖到公寓中央，挤在房间的正中间睡。有时他们感觉睡

在地上的日子比睡在床上的还多。迈克尔清醒地躺在地上，一边盯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子弹从混凝土外墙崩弹的声音。那是一种疯狂的生活。然而随着混乱日复一日地持续，这成了他唯一熟悉的生活。[70]

1970年7月的一天下午，一个连的英国士兵下行来到福尔斯路附近的巴尔干街，进入拥挤的巷内寻找藏匿的武器。[71]他们在一间房子里搜出了15支手枪和一把步枪，以及一架施迈瑟式冲锋枪。然而正当他们爬回装甲车准备撤离时，出现了一群当地人和他们对峙，并开始朝他们扔石头。惊慌失措之下，其中一辆“巨猪”的驾驶员在倒退时冲入了人群，导致一人丧命于车轮之下，这更加激怒了本就愤慨的人群。随着冲突的升级，第二支连队被派去接替第一支连队，这些士兵朝人群发射了催泪弹。

很快便有3000名士兵聚集在下福尔斯路。[72]他们用斧头砸开居民的门，冲进狭小的屋子。[73]他们的官方辞令是搜查武器，但其行动所夹杂的过度破坏力体现了报复之意。[74]他们掏空了沙发的内部，并将床掀翻。他们剥去地上铺的油地毡，撬起地板，还把煤气管和水管扯了下来。随着夜幕的降临，一架军用直升机盘旋在福尔斯路上空，有人通过扬声器用造作的伊顿腔宣布实施戒严：所有人必须待在家里，否则将面临逮捕。[75]士兵们用步枪的尖端挑开了大捆铁丝网，并拽着它横跨街道，封锁了下福尔斯路。[76]士兵们身着防弹衣在街上巡逻，他们手持防暴盾牌，脸用木炭涂成了黑色。透过那些小房屋的窗户，居民们毫不掩饰地向他们投去蔑视的目光。[77]

在西贝尔法斯特对军方形成一致强烈反对态度的过程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催泪弹可能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士兵会发出一枚弹药筒飞蹿过人行道，沿着轨迹拖出大量云状物，驱散朝他们扔石头的少年。[78]就在那个周末，军方于所在街区发射了1600枚催泪弹。迸射而出的气体弥漫于狭窄的巷道，顺着透风的缝隙渗入老旧的房子里。[79]它钻进人们的眼睛和喉咙，引起恐慌。[80]年轻人拿醋水浸泡过的抹布洗一把脸，便又跑回去继续扔石头。[81]一位报道此次封锁的记者将催泪弹形容为一种黏合剂，称它能“将一群人凝聚在同一立场，并仇视向他们扔催泪弹的人”。[82]

迈克尔·麦康维尔尽可能利用了这段动荡的童年。成长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对权威的理性怀疑。在他看来，英国军队和警察没什么两样。他见过军方把人们按在墙上，将他们的双腿呈一字踢开。[83]他目睹过士兵将做父亲和做兄弟的男人拖出家门带走，不经审讯便将他们拘留。亚瑟·麦康维尔没有工作[84]，但这在帝维斯公寓并不少见，楼群中一半的居民完全依赖于福利援助来养活家人。[85]

当孩子们离开帝维斯公寓时，琼会叮嘱他们不要跑太远。[86]“别到处乱跑，”她会说，“就在附近玩。”确切而言，正在进行中的并不是一场战争，政府坚称这不过是一次内部动乱，但它无疑给人一种战争的感觉。迈克尔会跟朋友和兄弟姐妹一起到陌生而不可预知的地方探险。即

使在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有些孩子似乎仍旧无所畏惧。等到枪战停止并且周围的火势逐渐熄灭，孩子们会连忙跑出去。[87]他们在烧毁的货车残骸里爬来爬去，把生锈的弹簧床垫当作蹦床，或者在瓦砾中被遗弃的浴缸里捉迷藏。

大多数时候，迈克尔都在想关于鸽子的事。自19世纪开始，鸽子在爱尔兰便被视为“穷人的赛马”。[88]是迈克尔的父亲和哥哥们让他了解了鸽子。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一直在养鸟。迈克尔会步入交战区域寻找栖息的鸽子。发现它们后，他会脱下夹克衫当作网把鸽子蒙起来，接着将这些温暖又紧张的动物偷偷带回自己的卧室。[89]

出门冒险的时候，迈克尔有时会小心地经过一些废弃的房屋。他不清楚里面潜藏着怎样的危险，里面也许有擅自入住的人，也许藏着准军事组织，也可能暗藏炸弹（他所知的只有这些），然而他毫不畏惧。有一次，他碰到了一间老磨坊，磨坊的门面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迈克尔和一个朋友从前面爬了上去，想看看有没有鸽子在里面栖息。当他们爬到上面一层楼时，突然发现面前有一队英国士兵在那里安营扎寨。“不准动，否则我们开枪了！”士兵们一边大喊一边将步枪瞄准迈克尔和他的朋友，直到他们爬回安全的地方。

大约在福尔斯路戒严一年后，迈克尔的父亲开始体重骤减。最终亚瑟变得极度虚弱，并伴有严重的颤抖，这令他连一杯茶都端不起来。[90]后来他终于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得了肺癌。[91]客厅成了他的卧室，晚上迈克尔能听到他痛苦地呻吟。[92]亚瑟于1972年1月3日去世。当迈克尔看着父亲的棺材落入冰冷的地下时，他心想不可能再有更糟的事情发生了。

四　地下军队

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母亲克丽茜走在贝尔法斯特的街上。她们经过一处拐角时发现了英军的一个检查站，许多行人在那里接受盘问和搜查。克丽茜放慢脚步低声问道：“你带什么东西了吗？”[1]

“没有。”杜洛尔丝回答。

“你身上带东西了没有？”克丽茜语气更加强烈地再次问道。杜洛尔丝能看见远处有年轻人被按在装甲车上，在士兵的命令下脱掉夹克衫。

“给我。”克丽茜说。

杜洛尔丝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小心地将它递给母亲。克丽茜把它藏在了自己的外套里。她们到达检查站后，杜洛尔丝被要求脱下夹克衫，而年长的克丽茜则顺利放行。回到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后，克丽茜细心地给枪支做了清洁，为每一块金属部件涂上油。接着她用袜子把枪套起来，埋在了花园里。随后，共和军的一名军需官顺道来挖掘武器。

“你老妈愿意加入吗？”他半开玩笑地问杜洛尔丝，“她藏家伙的本事可是一绝啊。”

福尔斯路和尚基尔路大致平行地通往贝尔法斯特中心，虽然越靠越近却从不相交。[2]福尔斯路是天主教徒的要塞，尚基尔路则是新教徒的据点。这两条要道之间连接着一些与其垂直交叉的狭小街道，以及一排排有着相同特色的连栋房屋。在每一条起着连接作用的街道上，新教和天主教都会在某处划分地界。

在1969年的暴乱中，社区周围到处设起了路障，正式划分两个教派的地理势力。最后这些路障被所谓的和平墙取代，也就是将两个社区分开的高大屏障。[3]两派的飞地由其准军事组织各自管辖，十几岁的哨兵在边界线上站岗。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时候，共和军实际上已近消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共和军沿边境进行了一场失败的运动，其行动几乎没有得到天主教群体的任何支持。到了60年代末，都柏林共和军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开始质疑武力在爱尔兰政治中所起的效用，并采取了一种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提倡以和平抵抗的方式推进政治改变。共和军组织日渐式微，等到1969年夏天暴乱发生时，贝尔法斯特只剩下大约100名共和军成员。[4]其中许多是像杜洛尔丝的父亲艾伯特·普赖斯一样在过去的行动中积累下丰富经验的老手，但他们都年事已高。

作为一支军队而言，他们明显缺乏武装。[5]共和军在1968年做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决定，他们将剩余的部分武器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组织内仍有人懂得如何制造粗制炸药，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于袭击

他们的目标，共和军的炸弹手似乎更擅长将自己炸飞。[6]

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北爱尔兰天主教群体都会在教派斗争期间寻求共和军的保护。然而当1969年冲突爆发时，共和军却无力阻止仗势欺人的保皇派放火将天主教徒赶出家门。遭到驱逐后，有些人开始提出，共和军的简称“IRA”实际上代表“I Ran Away”，即“逃跑军”。[7]

贝尔法斯特有一个派系想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重燃共和军的身份，推动暴力变革。[8]1969年9月，共和军指挥官利亚姆·麦克米伦在塞浦路斯街召开了一次领导层会议。麦克米伦因组织在暴乱期间未能保护社群而广受责难。21名武装人员闯入了会场，领头人是传奇的共和军街头霸王比利·麦基。麦基出生于1921年爱尔兰分裂的数月后，他在15岁时便加入了共和军青年团。自那以后的每个十年里，他都蹲过监狱。[9]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基每天都会参加弥撒，并且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枪。[10]他有着淡蓝色的双眼，以及狂热分子的坚定信念。“你这个都柏林的共产党，我们决定让你滚蛋！”他朝麦克米伦吼道，“你不再是我们的领袖了。”[11]

艾伯特·普赖斯的老友——作家布伦丹·贝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爱尔兰共和派的所有会议上，第一项议程永远是分裂问题。[12]在杜洛尔丝看来，共和军的分裂已无可避免。[13]到了1970年初，一个独立组织成立了。他们被称为临时共和军，明确以武装斗争为宗旨。老共和军则更名为正式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人们通常能从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正式派会将纪念性的复活节百合用黏合剂粘在衬衫的胸部，而临时派则会更加地道地用别针将纸百合别在胸前。1971年，有44名英国士兵被准军事组织杀害。[14]然而即便共和军的两个派系加强了和保皇派团伙、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以及英军的战斗，他们如今也开始彼此兵戈相向，互相残杀。

安德森斯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长大的地方，它位于福尔斯路的上方，处在遥望整座城的平顶的黑山脚下。1969年，随着时局的冲突愈演愈烈，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止。孩子们去学校的路上已不再安全，于是许多人不再上学。杜洛尔丝有两个姨妈住在其他地区，后来被放火赶出了家门，搬到了她所在的社区。[15]英军频繁突袭安德森斯顿，搜查共和军嫌疑犯或者他们的武器。[16]当地的一栋房子兼具炸弹学校的作用，临时共和军的新兵可以在这个秘密炸药厂里学习如何操纵装置和处理引燃材料。[17]当地居民厌恶军方的突然袭击。那些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代表着英国政府，他们的出现只是让贝尔法斯特人更确信自己的城市遭到了侵占。[18]

这种战时的围困状态使得整个社区为了反抗而变得团结协作。“当地人突然变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后来回忆道，“他们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19]军方来人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和小孩会从家里冲出来，扯下垃圾桶上的金属盖。[20]接着他们跪在人行道上，像敲铙钹一样用金属盖不断撞击铺路石，随之产生的巨大而激烈的喧嚣震彻后方的大街小

巷，警告反叛者一场突袭即将来临。好斗的学龄孩子会懒洋洋地坐在碎石满地的街角，并在发现风吹草动的第一时间用手指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21]

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团结。随着暴力不断升级，宏伟的葬礼变成了常事。人们在坟墓旁慷慨陈词，将爱尔兰的三色国旗覆盖在棺材上。有人开始开玩笑，说贝尔法斯特的社交活动只剩下为逝者守夜了。[22]这些围绕死亡和民族主义的隆重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事件结束后，她回到了高中。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到艺术学校深造，但申请后的落选却令她失望至极。[23]她转而在位于福尔斯路尽头的圣玛丽学院获得了入学资格，准备求取教育专业的学士学位。[24]

艾伯特·普赖斯这几年一直行踪不定，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新的斗争。如果共和军需要枪支，艾伯特便出去寻找武器。[25]有时在晚上，杜洛尔丝会发现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们正低声和她的父亲计划着什么。风声紧时，艾伯特就得出去避风头，越过边境到爱尔兰共和国躲起来。[26]1970年，杜洛尔丝开始了在圣玛丽学院的课程。她天生聪明好问，并对学业全力以赴。然而，经历过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后，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这一经历而产生了变化，这是她们的父亲后来的评价。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她们完全变了”。[27]

1971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找到当地的一名共和军指挥官说道：“我想加入。”[28]正式加入组织的仪式是在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屋客厅里举行的。有人随意地说了一句：“嘿，进来一下。”杜洛尔丝随之进门，并举起右手进行忠诚的宣誓：“我，杜洛尔丝·普赖斯承诺，我将竭尽全力推动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29]她誓言将服从“上级军官”对她下达的一切命令。[30]即使杜洛尔丝正在参与如此重大的仪式，她的母亲却仍坐在隔壁房间里喝着茶，仿佛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31]

在伯恩托莱特桥上和那个殴打她的保皇派对视之后，杜洛尔丝断定和平抵抗不过是她无知的幻想。[32]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些人，她心想。再怎么游行示威也无法带来爱尔兰所需的变革。[33]年少时她背离了家族传统的信念基石，后来她将自己加入共和军的那一刻视为“回归”，有点浪子回头的意味。[34]

玛丽安也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姐妹俩白天继续上学，但晚上她们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深夜才回家。[35]在这种情况下，西贝尔法斯特的父母常常什么也不问。年轻人可能一连消失一个星期，等他们回到家后，谁也不会追问他们的行踪。[36]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是被禁组织，就连承认是共和军的成员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这个组织对保密非常狂热，加入共和军的青年倾向于对父母守口如瓶。有时做父母的也许会不同意：贝尔法斯特已经够危险了，加入准军事组织简直是玩命。偶尔会有年轻的共和军枪手出去执行狙击任务，结果却在街角拐弯的时

候撞见自己的妈妈。于是她会揪着儿子的耳朵把他拽回家，丝毫不怕他手里的枪。[37]

而即便你的父母是共和军的热心支持者，你加入后也有理由不告诉他们。一旦警方或者军队冲进家门对他们进行盘问，那么他们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杜洛尔丝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是一个方下巴的大个儿青年。和普赖斯家族一样，麦圭根一家是忠实的共和派家庭。因为两人的父母是世交，所以杜洛尔丝和弗朗西从小就认识。弗朗西加入共和军后，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但他们从未讨论过此事。由于两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有时让情况变得很滑稽。[38]弗朗西的父亲是一名军需官，掌管武器和弹药。可当弗朗西需要子弹时，他不会向父亲开口，而是转问他的朋友凯文："凯文，我爸有子弹吗？"凯文会去问弗朗西的父亲，后者将子弹交给凯文，再由凯文转交给弗朗西。这或许不是办事效率最高的方法，但却意味着有些事不必明说。

临时共和军的总参谋长名叫西恩·马克·斯蒂奥芬，40岁出头的他是个禁酒主义者[39]，斯蒂奥芬脸圆圆的，说话带着伦敦东区口音，下巴上有一个酒窝。他出生于伦敦东区，原名约翰·斯蒂芬森。其母亲从小便向他讲述自己作为爱尔兰人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故事。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后，他学会了爱尔兰语，娶了一位爱尔兰妻子，更换了一个爱尔兰名字，并且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人们后来才知道，马克·斯蒂奥芬根本不是爱尔兰人：他那擅长讲故事的母亲并非出生于贝尔法斯特，而是出生在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但有时我们最热衷于相信的，恰恰是这些虚假的故事。（马克·斯蒂奥芬的一些共和军同僚想招惹他的时候，便会"忘记"用他的爱尔兰名字，而叫他约翰·斯蒂芬森。[40]）

尽管马克·斯蒂奥芬以新教徒的身份出生，但他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53年，他因参与共和军突袭兵工厂的行动而在英格兰蹲过监狱。他是个"暴力型"共和党人，坚决主张以武装斗争作为唯一手段来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他曾用三个词总结自己的军事战略："升级，升级，再升级。"[41]马克·斯蒂奥芬对暴力有着极端的信仰，以至于有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称其为"锋刀马克"。[42]

在他1975年出版的自传中，马克·斯蒂奥芬用其中一段回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来找他的经过。[43]"她打算做一名老师，"他写道，"尽管她来自共和党家庭，但在此之前她一直坚信非暴力抗议能成功解决北爱尔兰的社会不公问题。"他明确指出，是伯恩托莱特桥的埋伏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最开始，马克·斯蒂奥芬建议杜洛尔丝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即由女性组成的共和军辅助组织。[44]克丽西·普赖斯和布蕾迪姨妈以及外婆多兰都参加过这个团体。妇女会的女性担负着重要的职责[45]：她们会照料受伤的男人，或者将一把刚刚用过的发烫的枪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

然而马克·斯蒂奥芬的提议却冒犯了普赖斯。她的女权意识，或许再加之其显著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些许特权，让她无意屈当配

角。“我想参加作战，不是来泡茶或者照顾伤员的，”后来她如是回忆道，“要么战斗，要么什么也不做。”[46]普赖斯坚称自己不输给任何人，她想承担和男人完全一样的任务。[47]她告诉马克·斯蒂奥芬，她想要做一名“战士”。[48]

临时共和军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并决定有史以来女性首次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共和军。[49]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雄心（及其不容置疑的共和党血统）所带来的结果。但普赖斯本人却推测另一个因素可能也起了作用：由于组织的许多男性被当局关了起来，临时共和军或许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开始接受女性。[50]

假如普赖斯以为作为女性——或者其过硬的共和党家庭背景，或者她在共和军看来算得上高级的教育水平——能为自己赢得一点机会，那她就大错特错了。在宣誓加入组织后，她被指挥官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栋房子里。有几名共和军成员正在那里集合，她面前放着一堆天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又脏又锈还不匹配的子弹。然后有人递给她一团钢丝绒，说道：“把子弹擦干净。”[51]

普赖斯嗤之以鼻，断定这是她能想象的最低贱的工作。随便哪个毛头小子都能做到。这真的有必要吗？仔细想想，这些子弹究竟能不能用都成问题。真的会有人拿这些子弹开枪吗？她想象那几个男人正坐在厨房里，哈哈大笑地议论她被贬低的样子。她想走进去告诉他们：“知道该拿这些子弹怎么办吗？”但她忍住了。她已经宣誓要服从命令，服从一切命令。这也许是一出恶作剧，但也是一种考验。于是普赖斯拿起钢丝绒开始擦起来。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告诉你这是一种光荣的人生。”[52]普赖斯回忆道。但即便她熟知自己的新使命所带有的传奇色彩，她也认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共和军刚刚和英军开战。不论其他新兵说他们有多少胜算，打赢的可能性看起来仍是寥寥无几。任何一次行动，或者放眼整场战役，对方的能力或武装都可能在你之上。有鉴于此，你能预料自己将落得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以及复活节起义中那些英雄一样的下场：英国人会要了你的命，从此你的故事将在爱尔兰永远流传。临时共和军会告诉新兵两种必然的结果：“要么你会进监狱，要么你会死。”[53]

克丽茜·普赖斯也了解这些风险。尽管她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无比的献身精神，但她仍然担心自己的女儿。“你不准备完成学业吗？”她恳求道。

“难道革命会等我上完学再开始吗？”[54]杜洛尔丝回应道。

大多数晚上，当杜洛尔丝完成行动回到家后，克丽茜会默默地接过她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什么也不问。[55]然而有一次，杜洛尔丝深夜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在哭。[56]因为克丽茜听说有个地方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恐惧将她紧紧包围，她害怕女儿已经在爆炸中丧命。

加入临时共和军不久，普赖斯姐妹便被送往边境另一边的爱尔兰共和国参加共和军的训练营。[57]参加这种训练营是一件仪式化的事。新兵会乘坐轿车或者小型巴士沿曲折的乡间小路去往远处的某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农场。可能会有一个当地向导，比如穿着围裙的家庭主妇，或者支持共和军的教区牧师。向导会领着他们到一间农舍。训练营可能持续几天到一个多星期，其中包括对左轮手枪、步枪和炸药的强化训练。临时共和军的军火库仍然十分有限，都是些陈旧的武器，其中许多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新兵学会了如何拆卸步枪并为其上油，以及如何设定炸药量并填装炸药。他们练习队列行进，正如正规军队在基础训练中所做的那样。[58]他们甚至有制服，只不过有些特别。平时，这些年轻的叛军和百姓的穿着没什么两样，都是毛衣配牛仔裤的打扮。然而在葬礼期间，他们身穿黑色套装，戴一副墨镜，外加一顶黑色贝雷帽。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形成一条警戒线，就像果敢而纪律严明的守街部队。[59]当局可以在这种场合拍照，而且经常这么做。但他们对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新阵容所收集的情报仍十分有限，常常无法将这些新兵的面孔和名字或其他识别信息对号入座。

倘若有20世纪60年代参加过共和军的贝尔法斯特人如今成天泡在酒吧里，连路都走不稳，却不断吹嘘往日的种种，临时共和军便会出手教训那个满嘴胡话的醉汉。他们志在打造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思想的干净的队伍，而且要做到冷酷无情。[60]他们自称“志愿军”，这个名称让人回想起复活节起义中那些注定难逃一死的英雄，同时让人感觉爱国主义是爱国者必须准备好支付的昂贵交易。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爱尔兰的独立事业，你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这一契约的反复灌输，常常能在革命者中形成一种令人陶醉的同志情谊和使命感，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纽带。

普赖斯姐妹也许想做冲锋陷阵的士兵，但最初她们担任的是通讯员。[61]这是一项重要的职责，因为经常有资金弹药或者志愿军需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而地点的转移暗藏着许多风险。杜洛尔丝的朋友休·菲尼有一辆车，她有时会用这辆车执行任务。[62]菲尼戴着眼镜，他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吧。[63]和杜洛尔丝一样，他曾是人民民主组织的成员。正当他为教师生涯做准备时，却跟共和军一拍即合。

即便成为活跃的志愿军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仍在继续上学，这起到了绝好的掩护作用。她们会在下课后回到家里，放下书本出门执行任务。[64]作为女性，普赖斯姐妹不像组织里的男性成员那样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杜洛尔丝经常在一天之内数次穿越边境，出示一张名字为罗茜的假驾照。[65]她的通行十分频繁，边防检查站的士兵开始认出她来。他们从来没有产生怀疑，反而以为她肯定在边境附近做着一份乏味的工作，让她不得不来回跑。杜洛尔丝十分健谈，她不仅会讨好人，而且不乏卖弄风情的一面。她很招人喜欢。“罗茜！”士兵们看她过来时会说，“你今天怎么样？”[66]

通常，普赖斯姐妹运输的是引燃材料。她们逐渐熟悉了硝基苯的气味，那是一种简易炸药的原料，闻起来像杏仁蛋白糖。[67]制造炸弹的材料在爱尔兰共和国被准备好，然后穿过边境被偷运回北爱尔兰。有一次，玛丽安在开着装有炸药的车时发现了一个军方的检查站。[68]尚未成年的她当时正无证驾驶。炸药藏在驾驶员旁边的车门嵌板里。这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伸出手准备开门对车子进行检查。玛丽安明白，一旦他打开车门便会立刻注意到里面的重量不对劲。

“我来吧！”她一边说一边连忙把门打开，下车后伸了伸腿。贝尔法斯特当时正流行超短裙，玛丽安恰好穿着一条。那个士兵看到了。“我想比起检查我的车，他更有兴趣看我的腿。”玛丽安后来说。士兵将她放行了。

在共和军的有些行动中，女人会拿自己的性魅力当作武器。对于爱尔兰共和妇女会中一些更加传统而保守的女性而言，承担这种任务的女人是可怕的，甚至有些可耻。妇女会的一些老兵把这些前线的共和军女性称为“军妞儿”，并暗讽她们淫乱。[69]作为战斗策略，共和军的女性有时会设所谓的美人计。她们在城内的酒吧搜寻毫无戒备的英国士兵，然后将他们引入埋伏。1971年的一天下午，三名未执勤的苏格兰士兵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喝酒，有几个女孩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派对。[70]三名士兵的尸体后来在郊外一条偏僻的路旁被发现。[71]他们似乎在去派对的路上停车小便时被人朝头部开了枪。普赖斯姐妹鄙视这种行动。[72]杜洛尔丝特别要求组织不向她指派美人计的任务。战争有战争的规矩，她坚持道：“士兵应该死在战场上。”

女性化身为激进暴力的场景或许让人觉得十分新奇，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人物已经在革命进程中找到一席之地。[73]1969年，当贝尔法斯特激战正酣时，一个名叫莱拉·哈立德的25岁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一架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这次行为举世瞩目。哈立德更改航向飞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劫持飞机的女性。她几乎成了新交战状态的代言人。其照片被刊登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她双眼黝黑，阿拉伯头巾下露出高高的颧骨，手中紧握一把冲锋枪。[74]几年后，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中，美国赫斯特媒体帝国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头戴贝雷帽挥舞着一把锯短的卡宾枪。[75]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一位好友表示，那几年的“叛军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她。[76]

有关普赖斯姐妹的故事开始在驻扎于贝尔法斯特的英国士兵中流传，到访的战地记者也开始对她们进行报道。[77]外界将她们夸张地喻为“夺命美人”，说她们把突击步枪“藏在喇叭裤的裤腿里”，冒险进入贝尔法斯特的穷街陋巷。[78]人们传说玛丽安是一名专业狙击手，英国士兵给她冠上了“寡妇制造者”的名号。[79]杜洛尔丝则被媒体形容为“阿尔斯特最危险的年轻女性之一”。[80]

你很难判断这些民间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其中有些是大动乱时期人

们为了寻求刺激偶尔散布的性谣言。[81]一个长久以来处于守旧和压抑状态的社会突然以最极端的方式产生了分裂。性解放所潜藏的威胁和准军事组织造成的混乱都集中在了两个虚构的携带武器的长腿女人身上。

但倘若这种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战场的一种幻想，那么投射这种幻想的关键人物之一便是杜洛尔丝·普赖斯本人。“你想参观一下我们的炸弹工厂吗？”1972年她对一位造访的记者问道，并说，“《巴黎竞赛画报》杂志上周来这里拍过照片。”[82]来自德里的埃蒙·麦卡恩，也就是在伯恩托莱特游行中和普赖斯成为朋友的那位积极分子，仍会不时和她见面。[83]她从未向他明说自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但麦卡恩心知肚明。这让他感到沮丧。他迫切希望爱尔兰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但他确信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他告诉那些已经参与武装斗争的朋友：“你们的努力将无法收获对等的结果。”

麦卡恩和普赖斯见面时总会被她纯粹的魅力所震撼。他自幼认识的大多数共和党女性都是一副严厉而虔诚的样子——不说跟圣母玛利亚一样，但跟端起枪的圣母形象就差不多了。普赖斯姐妹却截然不同。杜洛尔丝一向打扮得十分优雅，头发和妆容无可挑剔。“她们都是时髦的女生，”麦卡恩回忆道，“并不是目光冷淡的辩论能手或者狂热分子。她们脸上总带着笑。”那时，贝尔法斯特有一家名为“疯狂价格”（Crazy Prices）的折扣商店，于是朋友们自然而然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姐妹称为“疯狂普赖斯”（Crazy Prices）。[84]

有一次，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清晨6点闯入了普赖斯一家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房子里，并宣称因怀疑杜洛尔丝加入非法组织而要将其逮捕。[85]“让她先吃早饭，否则休想带她走。”克丽茜说道。警方被这个身材虽小但气场强大的女人震慑住了，于是同意等她。克丽茜吩咐女儿去化好妆。这是在为杜洛尔丝争取时间，好让她能急中生智。杜洛尔丝准备好出发后，克丽茜穿上了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穿的毛皮大衣。“我跟她一起去。”她说道。

有那么一会儿，杜洛尔丝觉得很尴尬。她心想，我都参加共和军了，我妈竟然要陪我一起被捕。但她们还是去了。杜洛尔丝在卡斯尔雷警察局接受审问。不过她知道规则，而且没有向警方透露任何信息，只是不断重复道：“我无话可说。”最终她被无罪释放。要指控杜洛尔丝并非易事：毕竟她还在上学，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考勤记录良好。在她们离开警局之前，克丽茜驻足对警察给她女儿拍的入案照片欣赏起来。

“这张我能要了吗？”她面无表情地问，“拍得不错。”

作为筹措资金的新方案，临时共和军开始抢劫银行。许多银行因此遭殃。1972年的一个夏天，三个面带稚气的修女走进了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联合银行。正当这个分行准备歇业时，三名修女从长袍下拔出枪，接着持枪抢劫了银行。[86]这三名劫匪分别是普赖斯姐妹和另一名女志愿军。[87]初次盗窃的一个月后，有三名女性步入同一家银行再次进行

抢劫。（这些盗贼的身份从未被查明，可你禁不住猜想普赖斯姐妹是否故地重游了一回。）[88]还有一次，杜洛尔丝劫持了一辆邮局货车，因为共和军得到的情报称里面运送有大量现金。[89]

尽管杜洛尔丝和同伴们不断出生入死，但这对她们而言却有一种冒险的刺激。她们觉得自己是全然失序的社会里逍遥法外的逃犯。詹姆斯·布朗和杜洛尔丝是亲近的共和军战友，当监狱里的詹姆斯因为阑尾破裂被送往安特里姆的一家医院时，普赖斯姐妹实施了一场大胆的营救任务。她们突袭医院后迫使警方缴械，并协助布朗成功逃走。[90]姐妹俩设法逃脱了军方和警察的逮捕，这称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无论什么时候接受审问，她们都能表现出一副文静的天主教女学生的模样。或许这种能力足以让她们蒙混过关。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严重暴乱本就让当局难以招架。

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不乏有趣的人。[91]杜洛尔丝和比她年长的乔·林斯基相处融洽。林斯基在福尔斯路附近的卡文迪什街长大，并且在将近40岁的年纪仍和父母与妹妹住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期间，林斯基在波特格兰侬的一座修道院接受修道士培训，他立誓保持沉默，并在黎明之前起床祷告。[92]然而他最终离开修会加入了共和军。[93]在修道院度过青春期的经历让他有点像个孩子。年轻的志愿军认为他像个怪人[94]，他们都叫他“疯狂修士”。[95]然而他目光柔和、温文尔雅，杜洛尔丝变得非常喜欢他。[96]



格里·亚当斯

普赖斯结交的另一个人名叫格里·亚当斯。亚当斯又高又瘦，来自巴利墨菲，曾在一家名为约克公爵的酒吧做酒保。[97]约克公爵位于市中心，酒吧内的天花板很低，最受工党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与普赖斯一样，亚当斯的家庭也有着卓越的共和党背景[98]：他的一位叔叔曾和普赖斯的父亲一起逃出德里的监狱。最初，亚当斯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该委员会曾反对建造帝维斯公寓。[99]他从未上过大学，但却极其能言善辩。他头脑机敏，善于分析，就像杜洛尔丝一样。他比她早几年加入共和军，并且已经在贝尔法斯特的领导层快速晋升。[100]

普赖斯小时候就和亚当斯见过面。那时他们都还小，她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家人坐同一辆车去参加伊登塔贝尔或波登斯顿的共和党庆典。但如今他再次出现时已然扮起了煽动叛乱的角色。普赖斯第一次认出他的时候，他正站在一辆卡车的后面对着一群人演讲。她惊呼道："格里以为自己是谁啊？居然对着众人演讲。"[101]普赖斯觉得亚当斯非常有趣，还有些可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她这样回忆道，他是个沉默而警惕的人。[102]普赖斯热情奔放，但她发现很难跟亚当斯展开交谈。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神态，并亲切地称呼她"小孩"，可他只不过比她大两岁。普赖斯协助詹姆斯·布朗逃出医院的次日，亚当斯表达了对其行动安全的担忧："报纸上说闯入医院的女性没有进行伪装。"他低声抱怨，并责备道："希望这不是真的。"

普赖斯向他保证报纸上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她们姐妹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鲜艳的口红，还围了花哨的头巾，"就跟冰球比赛上的两个荡妇一样"。亚当斯很拿自己当回事啊，普赖斯心想。不过她可以嘲笑任何人。为了安全起见，亚当斯从不在自己家过夜，而是睡在共和军不同的临时营舍里，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住宅，而是当地的一些商家。他最近开始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殡仪馆过夜。[103]这让普赖斯觉得很滑稽，她开玩笑说他睡在棺材里。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日子，"她后来说，"我应该感到惭愧，竟然觉得这很好玩。"[104]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刚满21岁。放在别的人家，父母或许会不赞同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所作所为，然而对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来说，他们认为两个女儿不过是在继承家族的传统。与此同时，尽管你可以对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你不能责怪那个出手反击的人。"临时共和军是由最初为了抵挡那群保皇派而设置路障的人建立的，"艾伯特当时解释说，"我们最开始用石头攻击他们，可他们有枪。所以我们的人不得不到处找枪。要是就这样任人宰割，我们岂不成了十足的蠢货？我们先找来了一些猎枪，接着弄到了更好的武器。结果英国人又来了，他们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却闯进我们的家里为所欲为。你能怎么办？你只能用炸弹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没有牵涉进来，今天的临时共和军或许不会存在。"[105]

如果有英军遭到杀害，艾伯特会坦陈每个士兵同样都是人。"可他穿着军装，"他会指出，"那他就是敌人。爱尔兰人相信这是一场战争。"[106]他坚称自己反对死亡，但从根本而言这是手段和目的的问

题。“如果我们能让爱尔兰变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艾伯特·普赖斯总结道，“那么也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07]

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108]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109]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110]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111]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112]

同月，杜洛尔丝·普赖斯抵达意大利米兰进行演说，协助宣传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压迫。[113]她控诉了“集中居住制度”以及民权的缺失问题。[114]“如果说是我的政治信仰引导我参与谋杀，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115]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她所采用的这种在句法上精心构思的托词，成了北爱尔兰问题时期人们描述自己参与行动的常见说辞。“如果我接到命令要除掉人民的敌人，我将毫无畏惧地服从。”杜洛尔丝在意大利露面期间有一张照片，她摆出一副逃犯的样子，用围巾将脸遮了起来。[116]



杜洛尔丝·普赖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拍摄

五　圣犹大之路公寓

麦康维尔家养了两条狗，一条是代表临时共和军的普罗沃，另一条是代表正式共和军的斯蒂奇。[1]亚瑟去世后，大儿子罗伯特原本可以担起家里顶梁柱的责任。可是在1972年3月，17岁的罗伯特因被怀疑加入正式共和军而遭到拘留。[2]琼·麦康维尔原本就性情柔弱，丈夫的离世更令她陷入了重度抑郁。“她好像放弃了。”[3]女儿海伦后来回忆道。琼不愿起床，似乎只靠着抽烟和吃药度日。[4]贝尔法斯特的医生已经开始给病人开“神经性药片”，也就是止痛药和镇定剂，其中很多病人要么会紧张性地身体麻木，要么会不由自主地大哭，无法应对自己的情绪。镇定剂在北爱尔兰的使用率高于英国的其他任何地方。[5]随着年代的推进，这种症状后来可能被描述为创伤后压力症。但当时有一本书称之为“贝尔法斯特综合征”[6]，据说这种疾病的起因源于“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不仅不易辨别敌人，而且暴力具有随意性，谁都可能无辜遭殃”。矛盾的是，医生们发现最易产生这类焦虑的并非那些活跃在街头容易成为目标的战斗者，而是躲在屋内不敢出门的妇女和孩子。[7]晚上，透过帝维斯公寓薄薄的墙，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会听到妈妈哭泣的声音。[8]

琼渐渐变得足不出户。[9]有时她只在要买食物或者去监狱探望罗伯特时才会出门。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冒险外出很不安全。贝尔法斯特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因为没有地方让你感觉真正安全[10]：你可能为了躲避枪战而冲进屋子里，却又因为害怕炸弹而再次跑出来。军方时常在帝维斯公寓巡查，到处搜索准军事组织的成员。1972年标志着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暴乱高潮——在这所谓最血腥的一年里，将近有500人丧命。[11]琼的孩子们说，她数次用过度服药的方式尝试自杀。[12]最终她被送进了当地的珀迪斯伯恩精神病院。[13]

夜晚的帝维斯公寓尤其恐怖。[14]人们会熄灭所有灯光，整座庞大的建筑笼罩在一片漆黑里。对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而言，有一个特殊的夜晚将永远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时琼刚刚出院回家不久，门外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枪战。枪声停止后他们听见了一个声音。“救救我！”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而且不是当地人。

“求求你了，上帝啊，我不想死！”[15]呼救的是一名士兵，一名英国士兵。“救救我吧！”他哭喊道。

琼·麦康维尔在孩子们的注视下从地板上爬起来走到门边。[16]她探向门外看到了那个士兵。他受伤了，躺在外面的走廊上。孩子们记得她返回公寓拿了一个枕头，并带着它爬到士兵身边。接着她开始安慰他，一边低声祈祷，一边轻轻抱着他的头，直到最后爬回屋内。[17]阿奇，也就是罗伯特入狱后家里最年长的孩子，为妈妈的介入而责备她。“你这样做只会惹麻烦。”他说。

“他也是父母养大的。”[18]她回应道。

麦康维尔一家再也没见过那个士兵，直到今天，孩子们也不清楚他后来发生了什么。然而第二天离开公寓时，他们发现门上有新的涂鸦文字：英国情妇。[19]

这是一项恶毒的指控。在贝尔法斯特战争时期的狂热氛围下，如果当地女性被发现和英国士兵鬼混，这将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用一种古老的方式羞辱那些被怀疑犯下这种越轨行为的女人：涂沥青和粘羽毛。[20]会有一伙人贸然找这些女人谈话，强行给她们剃头，用温热黏手的沥青涂在她们身上，然后拿枕头里装的脏羽毛倒在她们头上，接着像狗一样套住她们的脖子将她们锁在路灯柱上，让整个社区看到她们出丑的样子。[21]“英军的情妇！”人群会高喊，“英军的妞儿！”[22]

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有家室的男人被长期关在监狱里，留下妻子独守空房，再加上自以为是的年轻英国士兵经常在社区巡逻，这造成了人们对不忠行为的深切担忧。这种担忧不仅关乎婚姻，同时也和意识形态有关。涂沥青和粘羽毛的做法成了临时共和军的官方政策，其领导层公开为之辩护，称这是社会控制的必要程序。[23]当最初几个案例出现在当地医院时，困惑的医疗人员不得不向医院的建筑维修工人请教去除黑色沥青的最佳方案。[24]

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自己和家人是一片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25]他们因为太像天主教徒而被赶出东贝尔法斯特，却又因为太像新教徒而在西贝尔法斯特格格不入。被人在门上留下那些涂鸦后，他们本就寥寥无几的朋友再也不愿和他们有任何来往。[26]不论走到哪里，他们发现自己总会遭到敌视。阿奇因拒绝加入临时共和军的青年团而被他们打折手臂。[27]海伦和朋友遭到了一大群士兵的骚扰。[28]海伦后来表示，母亲拒绝参与“链条行动”——警方搜查公寓时人们将枪支手手相传的藏武器方法——的事可能导致一家人和邻居之间更加疏远[29]；琼担心一旦警方发现屋内有枪，家里就会有更多孩子被关进监狱。某一天，家里的两条狗普罗沃和斯蒂奇不见了。有人将两只狗推下垃圾滑槽，它们死在了那里。[30]

迈克尔患有哮喘，琼担心屋内的煤气供暖正在加重他的病情。[31]她要求换公寓，一家人获准住进了一间新的寓所，位于帝维斯公寓另一个名叫圣犹大之路的区域。[32]他们收拾好行李搬到了不远处的新房子里。住处比原先那个稍大一点，但除此之外没什么不同。

圣诞节即将来临，然而整座城市没有任何节日氛围。[33]许多商店因为遭到炸弹袭击而封上木板关了门。那些日子，琼·麦康维尔唯一的嗜好就是经常去当地一家社交俱乐部玩宾戈游戏。只要赢了一点钱，她就会给每个孩子20便士。[34]偶尔赢钱多的时候，她会给其中一个孩子买一双新鞋。搬进新寓所后的一天晚上，琼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玩宾戈。[35]但那个特殊的夜里，她没有回家。

凌晨2点刚过，屋外传来了敲门声。[36]来者是一名英国士兵，他告诉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正在附近的一个兵营里。海伦跑到兵营找到了浑身湿透的琼，她脚上没有穿鞋，头发凌乱不堪。琼说她正在玩宾戈的时候，有人进来告诉她家里有孩子出了车祸，外面有人等着送她去医院。[37]琼慌了神，她离开宾戈游戏室上了车。然而这是个陷阱：车门打开后琼被一把推倒在地，有人在她头上套了一个面罩。她说她被带到一个废弃的楼房里绑在一张椅子上，有人对她进行了殴打和审问。她被释放后，几名军官发现她神情痛苦地在街上游荡，于是将她带回了兵营。

琼无法——又或是不愿——说出是谁绑架了她。当海伦想知道绑匪问了她什么问题时，琼的表现不屑一顾。“全是些废话，”她说，“都是我不清楚的事。”[38]那晚的琼无法入眠。她坐起身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39]她告诉海伦她想念亚瑟。[40]

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后来回忆，就是在第二天晚上琼让海伦出去买鱼和土豆条当晚餐。[41]她放水泡了个澡，试图缓解前一天晚上挨打留下的疼痛。[42]当海伦准备出门时，她说道：“别在路上偷着抽烟。”[43]

海伦穿过帝维斯公寓迷宫一般的走廊去了当地一家店铺，她点好晚餐等了一会儿。食物做好后她付了钱，拿起食品袋开始往回走。正当海伦走进公寓时，她发现有些异样。[44]许多人都在自家公寓的阳台上闲站着。这是当地居民在夏天才会做的事。帝维斯公寓几乎没有娱乐消遣的场所，所以孩子们会在阳台踢球，父母们则趁着凉爽的夜晚靠在门口抽烟闲聊。但寒冷的12月不会这样。随着海伦走近新搬的公寓，她看见门外聚集了很多人，她立刻跑了起来。

六　敢死队

利森街上有一栋空房子，就在不长的瓦尔纳·盖普街区对面。[1]这种废弃的房子散布在整个贝尔法斯特——它们不是被火焚烧，就是屋内的陈设全部被毁，又或是遭到舍弃，门窗用夹板封了起来。曾经的户主就这样逃走再也没有回来。在空房子的街对面，布伦丹·休斯正和D连的几位同伴站在一起。那是1972年9月2日，星期六。[2]

休斯抬头看见远处出现了一辆绿色货车，它开始沿利森路开过来。[3]休斯密切注视着这辆车，他感到有些不对劲。他通常随身携带一把手枪，但那天早上有个同伴为了偷车把枪借走了，所以休斯发现自己没有武器。货车从他面前开了过去，距离足以让休斯瞥了那名司机一眼。司机是一名他不认识的男性，看上去有点紧张。但货车没有停下来，继续穿过麦克唐奈街向格罗夫纳路驶去。休斯目送它消失在视野里。为了有备无患，他吩咐手下去取一把枪。[4]

休斯24岁，个头虽小却强壮而敏捷。[5]他有着浓密的黑色眉毛和一头蓬乱的黑发。他是临时共和军D连的指挥官，掌管西贝尔法斯特的这片区域。[6]这使他成了许多人想除掉的眼中钉，不仅包括保皇派军事组织、警方和英军，还包括正式共和军。18个月前，休斯的表哥查理，也就是D连的前任指挥官，遭到正式共和军枪杀。于是休斯开始“避风头”，这是共和军的用语。作为多个武装组织的刺杀目标，他必须隐藏起来。在乡村地区，你可以持续躲避数年[7]，然而在贝尔法斯特这个所有人都彼此熟知的地方，能躲上半年就算是万幸。最后总会有人找到你。

休斯于1970年初加入临时共和军。[8]他最初是通过表哥查理参与进来的，但他很快以精明而顽强的表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休斯居无定所，很少一连数晚睡在同一张床上。[9]D连的地盘覆盖了格罗夫纳路、老庞德·洛尼街区和福尔斯路，也就是冲突最激烈的领域。[10]最开始，这个连只有12名成员，他们被称为D连，或者敢死队。[1][11]休斯坚持一个信条，那是小时候父亲灌输给他的——如果你希望别人为你效力，你就要和他们一起干。[12]所以他并非一味吩咐手下执行任务，而是会亲自参与行动。杜洛尔丝第一次见到休斯是在她加入共和军后，而且她十分赞赏他。“他好像会分身术一样无处不在，”她回忆道，“我觉得他根本不睡觉。”[13]尽管休斯身材矮小，但杜洛尔丝却认为他是“人中豪杰”。[14]他从不要求任何志愿军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对杜洛尔丝和其他人而言意义深重。

D连实施的行动令人眼花缭乱，常常一天有四五项任务。[15]你会在早上抢银行，中午来一次“漂流”——开车在街上游荡，像城市猎人般寻找英军作为射杀目标——晚餐前在诡雷里装炸弹，夜晚继续参与一两场枪战。那是一段惊险而刺激的日子。[16]休斯马不停蹄地实施行动，他抢银行、抢邮局、劫火车、安炸弹、射杀士兵。对休斯而言，这似乎是

一场大冒险。在他眼里，出门加入枪战就跟其他人看待起床上班一样稀松平常。[17]他喜欢行动中的势头，一种永不停歇的节奏。正是这种势头令武装斗争得以持续和加强，因为每一次成功的行动都能吸引新的追随者参与斗争事业。借用休斯同时代的一名共和军的话："漂亮的行动是最好的招募官。"[18]

随着布伦丹·休斯这位年轻游击指挥官的传说在贝尔法斯特流传，英国人下定决心要抓住他。然而眼前有一道难题：他们不清楚他的长相。[19]休斯的父亲已经把家里有他出现的所有照片全部销毁，因为他知道当局会利用这些照片来辨认他的儿子。士兵们根据休斯的肤色以及因不知晓其姓名而把他称作"黑鬼"或"暗影"，作为战场上的外号。但英国人不知道他的长相，有许多次休斯从英军沙袋垒成的哨所径直走了过去，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蓬头乱发的贝尔法斯特青年，并没有多看他一眼。

军方会到其父亲家里把他从床上叫醒，追问休斯的去向。[20]有一次，他们把休斯的父亲拉去审问两天后强迫老头子光脚走回家，休斯得知后愤怒不已。军方告诉布伦丹的父亲，他们找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逮捕他，而是要把他干掉。[21]

这一威胁并非虚张声势。去年（1971年）4月的一天，正式共和军领袖"大乔"麦卡恩走在街上时被英军拦了下来。[22]他没有带武器，并在试图逃跑时被枪击中。麦卡恩染了头发作为伪装，但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开始只是被射伤，并踉跄着逃走。但士兵们没有叫救护车，反而继续开枪了结了他的性命。他们搜他的口袋时没有发现任何称得上武器的东西，只有几枚硬币和一把梳子。[23]

货车再次出现时，休斯的手下还没有把枪拿过来。[24]五分钟过去了，它竟然再次出现。同一辆货车，同一位司机。休斯紧张起来，但货车再次直接从他面前开了过去。它继续行驶了20米左右，接着刹车灯亮了起来。正在休斯注视的时候，货车的后门突然打开，有几个人冲了出来。他们看上去像平民百姓，运动装配运动鞋。但其中一人两手各拿着一把点四五口径手枪，还有两人手里拿着步枪。休斯转身逃跑的时候，三人同时朝他开火。子弹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击中周围被遗弃的房子。休斯在追逐下竭力奔跑。他跑上塞浦路斯街，身后的人穷追不舍，并继续朝他开枪。但休斯现在开始像壁虎一样曲折前进，不断钻入狭窄拥挤的街巷。

他熟悉这些街道，知道哪里有隐秘的巷子，哪些栅栏是他能翻过去的。每个空房子和每条晾衣绳他都一清二楚。休斯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意思是游击战士要像鱼一样在群众的大海中遨游。[25]西贝尔法斯特就是他的大海：当时有一种非正式制度，当地老百姓会协助休斯这样年轻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允许他们在自己家抄近路或者藏身。[26]当休斯从一间屋子后的栅栏翻过来时，有人会突然打开后门，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冲进屋里，接着又迅速把门关上。有些居民出于对临时共和军

的害怕而被迫选择合作，其他人提供帮助则是出于自发的团结意识。如果行动造成了财产损失，休斯会对受损家庭进行补偿。[27]他懂得培养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深知一旦失去大海，鱼将无法存活。[28]塞浦路斯街上住着一名当地的残疾人，人们叫他“先生”马圭尔。在混战最疯狂的时期，纵火事件频发，警方突袭不断，街上暴动肆虐。然而当地居民不时会看到布伦丹·休斯背着马圭尔到不远处的酒吧，好让他能喝上一杯。过一会儿再尽职尽责地返回酒吧把他背回去。有一次，一名英国士兵在下福尔斯路附近发现了休斯，他手里端着一把步枪。正当他准备扣动扳机时，一位老妇人不知从哪扇门后走了出来。她挡在士兵的枪口前，告诉他当晚不准在她的街上射杀任何人。等士兵抬起头时，休斯早已不见踪影。[29]

身后的追击者还在朝休斯疯狂开火，他转而跑上了苏丹路。休斯的脑海中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那是苏丹路上的一间联络站。联络站通常是寻常家庭居住的普通房子，但它们的另一个身份是临时共和军的秘密场所。[30]街上可能尽是外观相同的砖房，但在那些相同的木门之后，其中的某一间便是一个秘密避难所。它可以作为藏身处，或者等候室，又或是情报秘密传送点。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家庭避开了当局的所有怀疑。你可以午夜过后来敲门，一天的奔波劳累令你精疲力尽，于是他们会把睡意正浓的孩子从床上叫起来，让你能好好歇上一晚。

在苏丹路的拐角，一辆烘焙师的货车正在送面包。当休斯跑过那辆车时，三人在他身后进行了一轮射击。子弹射中货车并击碎了车窗。休斯继续在苏丹路上狂奔，不顾一切地想在中弹之前抵达联络站。除了其他用途，联络站有时还被当作军械库。英军逐渐了解到，休斯喜欢带着他那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在街头和他们的先进武器对垒。后来有人描述道，士兵们“不情愿地对这个用手枪对抗一支精英部队的身材矮小的家伙产生了钦佩之情”。[31]但休斯后来认识到，他需要更重型的武器才能跟敌人抗衡。有一天，他认识的一名水手从美国返航，带回了一份阿玛莱特步枪的目录[32]，这是一种质轻、精准、强大的半自动步枪，不仅容易清洁和使用，还便于隐藏。休斯对这款步枪十分中意。他说服临时共和军进口阿玛莱特步枪，并预备采用一项大胆的计划。丘纳德航运公司最近推出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号豪华游轮，这艘游轮将搭载富有的乘客穿越大西洋，往返于南安普顿和纽约。船上有1000名员工，其中许多是爱尔兰人，而这些爱尔兰人有的正好为布伦丹·休斯效力。就这样，休斯利用以英国女王命名的轮船为共和军走私武器。枪支抵达后，西贝尔法斯特的城墙上出现了新的涂鸦，宣布变革的到来：是上帝创造了天主教徒，但阿玛莱特令他们平等。[33]

休斯的速度极快，他差点跑过了联络站。[34]当他急停下来迅速转身开门时，强大的惯性导致他直接从前面的窗户冲了进去。他连滚带爬地进入客厅，定了定神——接着取出一把阿玛莱特步枪。然后他走到屋外，看到追击者正朝房子飞奔过来，他将阿玛莱特步枪对准他们并开始射击。追击者慌忙寻找掩护并以火力回击。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两辆快速行驶的萨拉森装甲车。它们突然停下来，追击者随之瞬间消失不

见。休斯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分析着他刚刚目睹的一切。枪手们打扮得像平民，但却跳上英军的装甲车逃跑。[35]他们不是老百姓——他们是英国军队。这时休斯低下头发现自己正在流血。

休斯是在新教徒中间长大的，他住的地方是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块飞地，其中绝大多数居民是新教徒。[36]20世纪50年代，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都是新教家庭的孩子。街上住着一位老妇人，每次休斯从她家经过，她都会吐一口痰，然后问他早上有没有用教皇的尿来为自己祈祷。但大多数情况下，他能够跟身边的新教徒和平共处。休斯还未满10岁时，他的母亲因为癌症撒手人寰，留下父亲凯文独自抚养六个孩子。凯文是一名瓦工，他没有再娶。布伦丹有两个哥哥为了找工作而移民澳大利亚，于是他承担起帮父亲照顾弟妹的责任。凯文出门干活时，布伦丹会留在家里看管弟妹们。父亲形容他是个“靠得住的伙计”。[37]这句话虽然朴实，却仍然称得上对一个人的最高赞赏。

1967年，休斯加入了英国商船队并开始在海上航行。[38]他远航至中东和南非，亲眼见证了种族隔离的恐怖。等到两年之后回来时，贝尔法斯特已经发生了暴乱。尽管他从未提起，但布伦丹的父亲曾在年轻时加入过共和军。凯文在那个年代结交的朋友之一就是比利·麦基，那个有名的强硬派准军事组织成员，他协助建立了临时共和军，布伦丹从小被教导要尊敬麦基这位传奇的爱国者和枪手。一家人星期天早上去教堂参加弥撒的时候，会路过麦基在麦克唐奈街的房子[39]，布伦丹出于对他的尊敬，觉得仿佛应该向他行跪拜礼。有一次，一个葬礼的洗碗间里有人在泡茶，休斯看见麦基正在和几个成年人交谈。布伦丹故意在他身上蹭了一下，并感觉到藏在其腰间冰凉而坚硬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布伦丹请求麦基让他看一眼那把枪，麦基满足了他的心愿。

布伦丹·休斯准备离家加入商船队时，父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绝对不要文身。”[40]水手文身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来休斯发现自己经常在欧洲和远东的各种文身店里等待其他正在文身的伙伴。不过他遵循了父亲的要求。凯文从未对这一告诫给出任何具体的理由，只不过含糊地表示文身是一个“可辨识的标志”。但多年后布伦丹回想起那一刻时，他猜想父亲也许已经预感到他将来可能会走的路。

在苏丹街的联络站里，休斯正在迅速失血，但不是因为枪伤。当他撞碎前屋的窗户冲进来时，碎玻璃切断了他手腕上的一条动脉。[41]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不能再待下去了。因此几名同伴协助休斯沿着人行道快速转移至不远处的另一间房子里。他急需医药治疗，但不可能去医院[42]：军方已经派人来要将他处决，也没有任何庇护政策能在就医期间保护他。另一个办法就是找医生来为休斯治疗，但这会造成其他的挑战。那些企图杀害他的人已经消失，但萨拉森装甲车还在街区巡逻，无疑是在找他。休斯被困在房子里，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鲜血随着每一次心跳从他的手臂涌出来。



格里·亚当斯和布伦丹·休斯后来的一张照片

半个小时过去，情况看起来不妙。接着格里·亚当斯出现了，他带来了一名医生。[43]亚当斯也许称得上布伦丹·休斯最好的朋友。他们相识于两年前。那是1970年的暴乱时期，当时亚当斯正在指挥暴动。休斯不记得亚当斯自己拿起过石头或者燃烧弹，不过他指挥别人的时候的确非常有效。在休斯看来，这就是亚当斯的角色——他是临时共和军的“首席战略家”，而休斯更像一个谋士。休斯大胆而灵巧，能操纵任何行动。亚当斯则能觉察宏观政治背景，以及冲突中的构造变化。就像留在战线后方的将军，亚当斯以不亲自参与暴力而闻名。假如一列满载阿玛莱特步枪的车队抵达街区，亚当斯会坐在“侦察”车里[44]——也就是没有任何武器的那一辆——休斯则喜欢跟着枪走。杜洛尔丝·普赖斯常常开玩笑说，她从没见过休斯不拿枪，也从没见过亚当斯拿枪。[45]在亚当斯眼里，休斯似乎永远在冲锋陷阵。他后来评论道，休斯在街头的伙计中有着“数量庞大的追随者”[46]，并且他“凭直觉做出的正确行动能弥补其无法用政治语言发表长篇大论的任何不足”。

或许这一评论让亚当斯显得有些清高，但却基本符合休斯认为自己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他把自己看作一名士兵，而不是政客。[47]他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自认是天主教徒，然而在亚当斯引用《玫瑰经》的内容并在每晚读《圣经》的时候，休斯却连弥撒都很少参加。有时休斯评论说，他对亚当斯抱有无比的崇敬，以至

于就算他知道明天是星期一，但如果亚当斯告诉他明天是星期天，这也足够令他停下来再想一想。布伦丹的弟弟特里评论道，共和军才是布伦丹真正的家——而他的兄弟是格里·亚当斯。[48]

亚当斯叫来的是当地一名心脏外科医生。[49]但由于来得十分仓促，他什么设备也没带。于是有人找来了针线和一把镊子，医生把镊子插入休斯手臂的伤口，摸索着抓取切断后嵌入肉里的血管末端。[50]最终医生用镊子的尖端夹住血管的断面后，把血管拉下来以便能仔细缝合。这个粗暴的过程是在医生近距离的注视下操作的，没有麻药可用，但休斯不能大声叫喊，因为军队还在外面的街上巡逻，试图找到他。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一辆萨拉森装甲车开过来正好停在了屋外，强大的引擎隆隆作响。屋里的人全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端着步枪破门而入。

亚当斯的亲自到来对休斯而言意义深重，因为他是冒着风险这样做的。根据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所言，亚当斯原本是临时共和军巴利墨菲分部的指挥官，后来晋升为贝尔法斯特旅的总指挥，也就是整座城中最高的共和军领袖。[51]他已经被当局盯上，后者对他的通缉比休斯更甚。

然而亚当斯对休斯怀有深切的忠诚。除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对亚当斯而言，重要的是当休斯开始“避风头”的时候，他仍留在贝尔法斯特街头，而不是逃离城市躲进乡村，或者跨越边境到共和国去。他本可以逃至边境另一边不远的邓多克，这个地方几乎成了共和党人藏匿的避难城，他们会坐在酒吧里喝酒打牌。[52]但休斯留在了城内，没有离开D连忠诚的战士们，并且他从未放缓疯狂的行动节奏。“当地人知道他在那儿，”亚当斯说道，“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动力。”[53]

那天亚当斯救了休斯一命，这让休斯没齿难忘。[54]他原本可以派其他人来，但他没有这么做。等医生缝合好休斯的伤口离开后，亚当斯命令他的朋友离开贝尔法斯特出去潜伏一段时间。这显然是一次针对他的定点暗杀，对方无疑会再次对他下手。休斯不愿离开，但亚当斯很坚持。于是休斯去了邓多克，订了一间提供免费早餐的旅馆房间。可他并不安于休养恢复，他蠢蠢欲动，等不及要返回贝尔法斯特。最后他只待了一个星期——而鉴于当时事态发展的速度，这一个星期让休斯感觉度日如年。

休斯站在空房子对面时，几名持枪者从绿色货车里跳了出来。就在那间空房子里，有人发现了什么。昨天夜里，一队英国士兵就是在屋前半遮的砖墙后度过了一晚。准军事组织并不是唯一为了服务其战术目标而将当地房屋占为己用的组织。这间位于D连腹地的废弃房屋，被军方用作秘密观察哨。

在英国军方秘密的内部记录中，一份有关此次失败任务的简短报告被留存了下来。[55]为了官方记录的体面，这篇由军方撰写并已解密公

开的文章承认士兵们装扮成平民参与了一场“抓捕行动”，而非定点暗杀。英军在D连自己的地盘上从那个隐藏的观察哨对布伦丹·休斯和他的同伴进行了监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刺杀或俘虏休斯，但现在他们知道了他的长相。

七　小个子准将

跟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格里·亚当斯一样，弗兰克·基特森出生于有着家族传统的家庭。他的父亲过去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将[1]，他的兄长也曾在海军服役，他的祖父加入过印度陆军。[2]基特森服役于英国陆军步枪旅，后来娶了一位上校的女儿。[3]不过当他在18岁成为一名士兵时，他的起点似乎有些太晚了[4]：那是1945年，基特森被派往德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收尾工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尚无爆发的可能，所以基特森过起了绅士般的军官生活——看看歌剧、赛赛马、钓钓鱼——并努力压制心中不断冒出的怀疑，怀疑他也许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好时机。

1953年，他被派至当时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协助镇压一场起义。[5]发动起义的叛军是神出鬼没的茅茅组织。当基特森为此次任务打包行李时，他最大的恐惧是当他抵达肯尼亚后，这场“殖民地紧急事件”可能已经结束。那么他将又一次在没有参与战斗的情况下被迫打道回府。

他多虑了。[6]抵达肯尼亚后，基特森立刻投入他所谓的“游戏”中。他是个有条理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为安全部队提供他们摧毁茅茅所需的信息。”他把纸片塞进了床边的《圣经》里。[7]

基特森矮小而健壮，下巴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总是身体笔挺，仿佛在阅兵，走路的时候肩膀摇晃，让人感觉他的身材变得更高大了些。他戴着一顶流苏装饰的军帽，帽子下的脱发现象日益严重。[8]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照片里鲜有摘掉帽子的样子。他说话稍带鼻音，而且喜欢用跟体育相关的词汇，比如用“下网”来形容别人，以及其他交际性的表达方式。[9]人们知道他不爱闲聊。[10]军队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基特森的故事（几乎肯定属杜撰，但能说明他的特点），说的是一次晚宴上，基特森一位同事的妻子坐在他旁边，对方称她跟朋友打赌能让他“至少说六个字”。

“你已经输了。”基特森回应道，接着整个晚上没有再跟她说一句话。

在肯尼亚，他发现自己身处全新的森林环境中。执行夜间任务之前，他会在手和脸上涂上黑色颜料，并戴上一种古老的非洲丛林帽来完善伪装。他认为这种“涂黑”的办法能让他在距离远光线差的情况下被错认为当地人。[11]基特森就像英国作家吉普林作品中的人物，会钻入荆棘丛里寻找神秘的茅茅。当他在茂密的矮树丛里艰难前进时，他意识到人竟然可以如此迅速地适应最为陌生的环境。他有一本书记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经历，其中写道：“最初的片刻一切都很陌生，但过了一会儿正

常生活反倒变得陌生起来。”[12]

有一天，基特森碰到一群从头到脚用白袍裹起来的肯尼亚人。他们的脸完全看不清，白袍只在其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部位留出了缝隙。当基特森询问这些陌生人的身份时，他得知这些人是茅茅，他们受到引诱背叛了自己的叛军伙伴，转而跟英国陆军合作。在白袍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对一群犯人进行观察，然后告诉主事的英国人谁是谁。[13]

基特森恍然大悟，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让他初次了解到“策反”的概念。[14]他很快意识到这一理念可以被拿来用作高效的武器。基特森明白，高质量的情报对镇压叛乱至关重要。而获取情报的方法之一，就是诱使部分叛军转变立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如何能最有效地说服叛军出卖自己的同胞。显然，信任是关键因素，同意帮助敌人无疑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到敌人手上。但信任的纽带可以培养。当基特森想争取某个新成员作为自己的特务时，他会带上他一起巡逻。深入丛林之后，基特森会把他的手枪交给对方，自己只留一把大砍刀。这是个冒险的举动，但基特森相信把武器托付给特务能向他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他“他绝对属于这个队伍”。[15]

英国人最终镇压了叛乱，但却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16]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肯尼亚人遭到屠杀，但人数可能达到几十万。大约有150万人被扣押，其中许多关在拘留营里。[17]审问期间，茅茅嫌疑犯被施以电击、烟烫，以及各种骇人听闻的性虐待。[18]这场残酷的战役过后，英国人还是于1963年从肯尼亚撤离。然而在英国国内，打击茅茅的行动被盛赞为一场巨大的胜利。1955年，基特森以其“在肯尼亚杰出的英勇表现”被授予十字勋章。[19]“我猜想自己的部分好运是不是因为，比起有些指挥官，我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恐怖分子一点。”他事后沉思道，“我好奇自己吸收了多少非洲人的心态。我是不是变得残酷无情、不可信赖了？这还只是他们不讨人喜欢的一部分特征。”[20]



基特森找到了自己的使命。[21]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有，但殖民地的叛乱层出不穷。1957年，他冒险抵达英属马来亚，在柔佛的丛林里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并第二次被授予十字勋章。接着他被派遣至苏丹统治下的马斯喀特和阿曼，在沙漠里打击叛乱。[22]随后他两次效力于塞浦路斯，平定塞浦路斯人中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并被赋予权力亲自指挥营队。[23]

1969年，基特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随后远离战场度过了平静的一年。在哥特式建筑和修剪整齐的方庭之间，他开始着手一项新计划：努力将他对反暴动的思考系统化。[24]在学习了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著作，并吸取自己的战斗经验后，他创作了一份手稿并为之取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低强度行动”。基特森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一论点成为人们后来思考反暴动的基础：重要的不仅仅是镇压叛乱，更要赢得当地群众的心。[25]书中还着重讲述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他提出了一个明显到几乎不言而喻的观点：如果你想挫败一场叛乱，就要清楚叛乱者的身份。等到1970年基特森完成这本书时，他成了英国陆军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型战士。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后，他晋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派往英国最近一场小型战争的发生地：北爱尔兰。

位于利斯本的军队总部距贝尔法斯特8英里，包围在防爆墙筑起的防御工事内，墙外是垒起的沙袋和带刺的铁丝网。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在短时间内人数激增，从1969年夏天的2700人增加到1972年夏天的逾30000人。[26]这些士兵往往跟他们所对抗的准军事组织成员一样年轻和缺乏经验：刚刚成年的他们身材瘦长，满脸粉刺，遇事容易胆怯。他们分布于北爱尔兰的各个基地和兵营，有的被安排在临时营舍。[27]两个黑哨连的兵营设在了一处巨大的停机坪上，另一个连则住在汽车站里，士兵们睡在空车上。这些士兵被部署到北爱尔兰驻守四个月，然后再次轮换回到英国本岛。

但这可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众多武装派别集中在紧密结合的社区里。你随时可能死于狙击手的枪口之下，或者被简易爆炸装置炸得身首异处。有鉴于此，一些更懂得反省的士兵不得不思考：胜利会是什么样的？你该怎么定义胜利？他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平定1969年夏天的动乱，可他们的到来只不过加重了人员的伤亡。他们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才能让所有士兵全部回家？[28]因北爱尔兰问题被调遣的军队不同于昔日跟纳粹作战的部队。它是一个针对殖民地骚乱而进行小规模作战的老练组织。但北爱尔兰算什么？它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吗，还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殖民地？[29]

当弗兰克·基特森于1970年抵达北爱尔兰时，他并不是英军的总指挥。[30]但他是陆军第39旅的负责人，掌管整个贝尔法斯特，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他的职位。基特森的一位下属后来说道：“在他负责的区域，他就是行星围绕其旋转的太阳，他的话就相当于圣旨。”[31]

缺乏确凿的情报是基特森到达时英军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论在共和党还是保皇派中，那些加入准军事组织的男女看上去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那么该如何识别他们呢？过去几十年里，共和军的成员相对稳定，年复一年都是些老面孔。但如今每周有大量新兵加入武装斗争，使得警方的旧档案亟待更新。然而军方惯用的草率手段只能令这一难题雪上加霜。“我刚到的时候，队伍常用的策略是让士兵站成一排，然后用催泪弹把目标地点搞得乌烟瘴气，惹得人们不断朝你扔砖头，扔到不想再扔为止。”基特森后来回忆道。“这个办法不太明智，因为催泪弹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伤害，令他们怀恨在心。”[32]

基特森在《低强度行动》一书中写道，反暴动的目标应该是“将叛乱行动斩草除根”。[33]但你很难摧毁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基特森开始痴迷于情报。他常说，第一个挑战永远是“搜集正确的信息”。[34]

基特森尤其对贝尔法斯特旅的D连感兴趣，即由布伦丹·休斯操纵的破坏力最强的共和军分队。[35]英国士兵将休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行动地盘称为“保留地”——就像印第安人的领地。[36]也就是说，如果士兵要踏足其中，就务必小心谨慎。士兵们会彼此之间谴责对手缺乏人性（有时也会向媒体指责）：“这些人简直是禽兽。”[37]休斯和他的同伴躲在暗处，混迹于人群中难以辨别。许多士兵驻扎在郊外的派力斯兵营，晚上你能在贝尔法斯特听见炸弹在兵营爆炸的声音，窗玻璃也随之剧烈震动。[38]

当市中心的购物区发生爆炸时，你也许认为军方能顺利找到受惊或愤愤不平的百姓愿意帮忙提供信息。但士兵们却抱怨，西贝尔法斯特有一堵“沉默的墙”保护着共和军。[39]告密者被称为“叛徒”，数百年来爱尔兰文化将这类人贬低为最卑鄙的背叛者。因此跟英国人合作将被烙上深深的社交污点。

布伦丹·休斯并非唯一喜欢引用毛泽东那句有关鱼和大海的比喻的人。基特森也一样，不过他对这个观点做了自己的加工。你可以“直接用鱼竿或渔网来捕鱼，”他提出，“但如果依靠鱼竿和渔网还达不到效果，或许就有必要对水做点什么。”[40]

1971年8月的一天，3000名英国士兵趁天还未亮突袭了整个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聚居区。[41]士兵们破门而入，把男人们从床上拽起来关进拘留所。根据《特殊权利法案》，当局可以不经审判对一个人进行无限期关押。这种手段在北爱尔兰被周期性地使用，但这样的规模前所未有。尽管当时有不少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参与恐怖行动，但那天逮捕的将近350名嫌疑犯中，却连一个保皇派也没有。这种悬殊的待遇更让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军队不过是宗教压迫的又一工具。在计划此次扫荡的过程中，军方依赖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提供的情报。一名英军指挥官后来承认，以新教徒为主的警方成员“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其中许多人到了十分极端的地步”。[42]

然而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列出的嫌犯名单不仅把苗头对准了天主教徒（而且还过时了），名单上还包括许多根本没有参与过武装斗争的人。由于爱尔兰有着以父亲之名为儿子取名的传统，结果有些年长的男性被错当成自己的儿子带走，身为儿子的又因为当局误以为他是父亲而遭到逮捕。[43]（当军方偶尔发现父子俩都在家但不确定应该抓谁时，他们索性将两人一起带走。）[44]在当天早上被抓的嫌犯中，将近三分之一于两天后被释放。[45]英军逮捕了一群自己无意拘留的人，而他们意图抓捕的大部分人却成了漏网之鱼。这使得原本就心怀怨愤的天主教徒更加愤怒。后来由英国国防部做出的一项官方调查承认，这场拘捕行动是“一次重大失误”。[46]一名参与此次扫荡的英国军官形容道：“这是一次愚蠢的行为。”[47]

作为北爱尔兰最重要的反叛乱知识分子，弗兰克·基特森和拘捕行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48]然而他后来坚称自己并不赞同此次决定——相反，他提醒过上级这种手段会带来反作用。他并非不赞同在广义上实行这一做法，而是反对这次事件中的具体运用。[49]基特森对于在肯尼亚和其他地方实施的拘捕行动表示认可。他承认，“对于生长在自由国家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做法”。[50]但他辩论道，不管怎样，“将那些不关起来就会参与战斗的人逮捕入狱”，可以缩短冲突的进程。据说，他曾就不经审判把人们关起来的做法嘲讽道：“这好过要了他们的命。”[51]回头看这个观点也许让人觉得冷酷，但当时的英国媒体附和了这一看法。[52]《电讯报》表示，有些未经审判就被关押起来的天主教徒“承认宁愿待在监狱也不愿冒着被射杀的风险留在外面”。

对基特森而言，北爱尔兰拘捕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做到出其不意。[53]对情报工作略知一二的布伦丹·休斯没有在突袭中被捕，因为他事先知道会有这一出。军方在7月底来了一次搜查抓捕的演习，这在休斯看来像是一场搜集情报的行动。[54]他猜对了。军方设计这个准备阶段是为了确保名单上都是最新的地址。[55]有关军方意图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贝尔法斯特郊外12英里的地方[56]：前空军基地的土地上正在新建一座宽敞的监狱，这是一个能关押大量囚犯的场所。假如你留心的话，会发现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实行大规模拘留，而是什么时候实行。布伦丹·休斯在突袭前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转入了地下。扫荡结束后，共和军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自鸣得意地宣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几乎没有抓住任何临时共和军。[57]

杜洛尔丝·普赖斯不在被逮捕的人之列。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出城去了伦敦。[58]军方冲着她的父亲来搜查过，但他也不在家。他清楚他们会来，所以已经逃走。然而杜洛尔丝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被拘捕了。不仅弗朗西和他的父亲约翰参与了武装斗争，他所有的家人都是。弗朗西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这七个孩子后来都蹲过监狱。他的母亲玛丽·麦圭根是个强壮的女人。[59]那年夏天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已经因为参加和平抗议而被关进阿马监狱服刑大约一年。凌晨4点左右，当弗朗西正在床上熟睡时，许多士兵突然破门而入。[60]他们把只穿着内裤的弗朗西从屋子里拽了出去，同时另一名士兵把他的父亲拖到了街

上。约翰·麦圭根倒在了人行道上，可弗朗西无法过去扶他起来，他被扔进了一辆卡车的后面。[61]车开动的时候，弗朗西透过后车窗瞥见父亲还倒在地上。

约翰·麦圭根随后被警方关押了几天，出来之后他找不到自己的儿子。[62]弗朗西没有回家，所以约翰以为他一定还被关着。然而当他给克朗姆林路监狱——许多被逮捕的人都关在那里——打电话时，他们说没有弗朗西斯·麦圭根这个人。接着约翰给军方打电话，但对方说突袭中拘捕的所有人后来都移交给了警方。当时有许多人在街头丧命，约翰开始担心弗朗西可能死了。他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个当地人，对方确认了他最可怕的怀疑。“停尸间有个男孩，”那个人说，“我想他是你家的弗朗西。”约翰悲痛欲绝地走到停尸间，并要求看一眼尸体。

那是另一个男孩，不是弗朗西。约翰感到如释重负。可如果弗朗西既没有死，也不在军方或警察手里——那他在哪儿呢？

约翰·麦圭根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连同另外11个人被一种特殊的命运选中。[63]弗朗西的头上套了一个厚厚的面罩，感官被捂住。[64]面罩有一股脏衣服散发的陈腐气味。弗朗西和另外几名囚犯被押上了一架威塞克斯直升机。他们飞行了一段时间，很难判断有多久。没有人愿意告诉弗朗西他们要去哪儿。然后，在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中，他听见了一个吞吸声，轰鸣随之变得更响。他意识到，尽管他们还在飞行，但有人刚刚滑开了直升机的舱门。现在弗朗西感到有手将他抓住，推着他移动。有人解开了他的手铐，他设法用双臂抱住膝盖，紧紧地裹住身体，把自己缩成一个紧凑的球。[65]头上的面罩仍然令他无法看见任何东西，他十分恐慌。现在他感到有手将他推出直升机的舱门，他开始下落。[66]

但此刻又有手控制了他，而且他能感觉身体之下的地面。因为看不见，他以为自己掉下直升机后必死无疑，结果却发现只有几英尺高。直升机盘旋的时候离地面很近。那些控制他的人又推着他进入了一个神秘场所。[67]那是一个偏远的兵营，位于德里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旧飞机场。但当时的弗朗西·麦圭根头上仍带着面罩，他不知道这些。而且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由军方挑选的保密之地，因为它位置偏僻，不惹人注意，同时远离任何问责机制。[68]麦圭根和其他遭到拘留的人被脱光衣服由医生进行检查，接着他们经受了一系列程序，军方的官僚用语委婉地将之归类为“深度审问”。

一连数天，囚犯们被迫不吃不喝不睡，并以压迫性的姿势长时间站立。[69]他们被头上的面罩遮住了视线，同时要承受尖锐刺耳的噪音。纳粹战争期间，许多士兵沦为纳粹的战俘。英国人研究了这些战俘的经历，并从中学到了上述手段。一个月前刚刚卸任北爱尔兰陆军司令的安东尼·法勒霍克利[70]评论道：“共和军自称士兵，说他们在进行战争。所以一旦遭到俘虏和审讯，他们就要做好受恐吓的准备。”[71]

最初，英军向士兵教授这些方法是为了抵抗残酷的审讯和折磨。[72]但最后这些手段从课程中有关防守的部分转移到了涉及进攻的部分。将近20年来，它们被用于对付英属殖民地的叛乱者——巴勒斯坦、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但它们从未以书面语言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是由审讯者代代相传，一种对人类残暴行径的口头继承。[73]

“你的职位是什么？”审讯者问麦圭根，“贝尔法斯特旅的参谋人员都有谁？”[74]他们想要名字，想要格里·亚当斯和布伦丹·休斯这样的名字，还有麦圭根的指挥官和跟他一样的志愿军的名字。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睡眠的缺乏、饥饿和持续的噪音令麦圭根的精神变得扭曲。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开始失去理智。当审讯者让他拼出自己的名字时，他会把名字拼错。当他们命令他从一数到十时，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把他拴在铸铁散热器上，手腕的皮肤因为手铐的摩擦变得红肿而疼痛。被关押的许多人开始出现幻觉。有一天，由于坚信自己无法活着出去，麦圭根将头撞向散热器，直到鲜血从脸上渗出来。

一个星期后拷问结束时，有些人身心俱损到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他们的眼神忧愁而空洞，其中一名受刑者将之比喻为“雪地里的两个尿坑”。[75]另一名被拘留者在开始审问时有着乌黑发亮的头发，拷问结束后却变成了满头白发。[76]（他在被释放后不久于45岁的年纪因心脏病突发去世。）[77]当弗朗西·麦圭根最终返回克朗姆林路监狱时，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个年长的男人忍不住失声痛哭。[78]

至少在公共领域，没有记录表明弗兰克·基特森对“深度审问”的看法。但他很可能不会对此有负罪感。[79]粗暴的策略是他所主导的殖民地战役中的鲜明特色。在其有关反暴动的专著出版后，有一条评论指出：“书中没有提及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由英国签署的这几条公约中许多内容都和本书息息相关。”英国政府随后做出的一项调查发现，对所谓的“蒙面人”使用的部分审讯手段构成了暴力殴打。[80]然而在1978年的一项争议性决定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些手段尽管“残忍并有辱人格”，但不构成酷刑。[81]（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过后，当乔治·W.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实行自己的“强化审讯”技术时，官方正是依赖这项决定为酷刑的使用作辩护。）[82]

不过在北爱尔兰问题的背景下，弗兰克·基特森的殖民地哲学最为具体的应用或许体现在MRF身上。[83]这是一支隐秘的精英部队，隐秘到人们连MRF三个首字母缩写词代表什么含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各执一词。[84]它可能代表“移动侦察部队”（Mobile Reconnaissance Force），或者“军事侦察部队”（Military Reconnaissance Force），也可能指代“军事反应部队”（Military Reaction Force）。MRF由大约30名男女混合的特种兵组成，从整个英国部队精选而来。[85]他们打扮成平民的模样，身穿喇叭裤和牛仔上衣，并且留长了头发。[86]军方内部称他们为防爆小组，因为他们的任务之一是侦察，他们要监视准军事组织可能安放炸弹的地方。[87]军方特意招募了爱尔兰出身的士兵，以便融入当地居民中间。[88]

MRF的成员驾车行驶在共和党人的飞地暗中进行监视。但他们也会离开车的掩护在保留地中心活动。他们有时乔装成扫街的清洁工，有时和流浪汉一起挤在路边喝变质的烈酒。[89]他们还爬进在骚乱中被破坏或烧毁的商店和住宅，开始建立秘密观察哨。[90]屋前的墙上有一块砖被取下来，让藏在里面的MRF成员能观察附近的情况。一名加入过MRF的女性曾挨家挨户卖化妆品，并借机搜集情报。[91]1971年12月，基特森写下了一篇名为“贝尔法斯特未来进展”的备忘录。[92]其中他阐明，向共和军发起战斗的一个关键手段是“建立并壮大MRF”。

然而这支队伍的行动并不仅限于搜集情报，他们还会进行暗杀。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开着一辆不起眼的福特科蒂纳，但车座下却藏着一把斯特林冲锋枪。[93]他们必须不让武器露馅，一名MRF成员后来解释道，因为他们伪装得太好，假如经过军方前哨时被发现携带枪支，那么他们自己的英国同事“会开枪将我们击毙”。[94]那天在西贝尔法斯特从绿色货车里冲下来企图谋杀布伦丹·休斯的就是一支MRF分队。这些暗杀小组故意携带准军事组织使用的特定型号的武器[95]，如此一来，当有人遭到谋杀时，弹道会表明凶手是共和军或保皇派的人，跟军方无关。

“我们想制造混乱。”[96]一名MRF成员回忆道。假如人们相信事件由准军事组织负责，这将削弱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同时维持军方中立守法的裁判形象。这尤其适用于MRF在暗杀目标的过程中无意将无党派平民杀害的案例。1972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格兰路公交终点站停着一辆小汽车，24岁的琼·史密斯坎贝尔坐在小汽车的副驾驶座上。[97]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射穿车窗击中了她的头部。当时，警方宣称“没有任何安全部队涉及”她的死亡，并暗示也许当地的“政治团体”（准军事组织的简称）跟此事有关。史密斯坎贝尔的家人逐渐相信是共和军射杀了她。事实上，40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她其实死于MRF的枪口下。[98]

弗兰克·基特森堪称操控媒体的大师。在一阵突发暴力事件过后，他会召来当地《卫报》的记者——一位名叫西蒙·温切斯特的年轻作家，到他所在的军队总部听取详情。[99]基特森继而会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详细说明相关事件的情况，引述军方关于受害者的机密情报档案。获得内幕消息的温切斯特倍感幸运，于是顺从地报道称，身份不明的死者原来是临时共和军的军需官或武器专家，又或是一名临时共和军的高级神枪手。温切斯特喜欢基特森，认为他是“小个子准将”，而且两人成了朋友。这名年轻记者会到基特森位于部队基地的家里拜访他的家人，并和他的女儿一起打牌。直至后来温切斯特才意识到，那个时期英方有关共和军的情报是多么粗劣，并开始怀疑自己照搬的许多信息完全是错误的。他最终断定并公开承认，他被基特森当作军方的“喉舌”利用了。

基特森制造麻烦的特质令他成了共和军痴迷于弄清的对象。[100]临时共和军研究《低强度行动》后做了以基特森为主的宣传。在准军事组织驰骋的想象力中，他成了被夸大的对手——经常谈论却极少见到的“贝尔法斯特屠夫基特森”。[101]已经受到战时迷信影响的临时共和军开始把所有他们无法解释的怪事归咎于这位诡诈的英国军事家的头脑游戏，仿

佛他是喜欢捣乱的促狭鬼。[102]绑架基特森的计划不止一次，但最终都一无所获。[103]据说临时共和军有一份“死亡名单”，上面写着重点暗杀目标的名字，首当其冲就是弗兰克·基特森。[104]

不过拥有死亡名单的并非只有临时共和军。随着MRF进行监视并搜集情报，部队有了自己的目标目录，情报人员已经获准在发现目标后将其当场击毙。在MRF位于派力斯兵营中心的秘密简报室内，墙上贴满了情报人员监视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这些是临时共和军的最大“玩家”——也就是他们的目标。[105]据一名前MRF成员所言，墙上的关键人物包括布伦丹·休斯、格里·亚当斯，以及杜洛尔丝·普赖斯和玛丽安·普赖斯。

八　裂杯子酒吧

贝尔法斯特湖上漂着一座监狱。[1]这是一艘长约150米的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轮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用来为皇家海军的潜艇服务。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后，这艘轮船作为抵达贝尔法斯特的2000名英国士兵的应急住所被再次投入使用，接着又被改造为皇家监狱“梅德斯通”号——女王陛下的监狱。[2]轮船距离陆地六米远，在一个码头的海港上没精打采地漂着。监狱牢房由甲板下的两个简易宿舍构成。[3]犯人被囚禁在过于拥挤的闭塞空间里，睡的是三层床铺。昏暗的光线经由为数不多的几扇小舷窗透进来。一名囚犯直言，那地方“连猪圈都不如”。[4]

1972年3月的一天，武装警卫押送一名备受瞩目的犯人登上了“梅德斯通”号。他就是格里·亚当斯。在潜伏数月之后，亚当斯在英军的一场黎明突袭中于贝尔法斯特的一所住宅被捕，此刻他被粗暴地领进了船舱。他受到了关押在此的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5]，但他很快开始厌恶这个地方，并将之形容为“冷酷而令人窒息的沙丁鱼罐头”。[6]亚当斯或许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但这并不代表他对生活的品质漠不关心。他喜欢享受美食，而船上的食物却让人难以下咽。[7]

亚当斯还忍受着疼痛。他在被捕的时候拒绝承认自己是格里·亚当斯。相反，他捏造了一个假名字——乔·麦圭根——并坚称这是他的名字。他被带到警方的营地进行审问，最后，一名认识亚当斯长相的皇家阿尔斯特警官走了进来。他看了亚当斯一眼说道：“这就是格里·亚当斯。”可他满不在乎，继续负隅顽抗地表示他们抓错人了。亚当斯最近一直在深思对抗审问的技巧，“我的策略是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利用这种手段来对抗审问，”他后来回忆道，“我推断我能用不断声称自己是乔·麦圭根这种死缠烂打的办法来阻碍审讯的进行。”[8]

审讯员痛打了亚当斯，但他就是不松口。他们试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人歇斯底里地掏枪扬言要毙了亚当斯，结果被另一个人拦下来——可亚当斯依然不为所动。直到感觉审问终于快结束时，亚当斯才承认大家早已知道的事实：他就是格里·亚当斯。[9]此时，审讯员和亚当斯就最基本的名字问题已经纠缠得太久，他设法避开了任何实质性话题。[10]“当然，这次我被迫用了装傻的策略，但我认为这帮我抵挡住了他们的盘问，”他后来评论道，“沉默是最好的策略。所以尽管他们知道我是谁，但这无关紧要。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

被拽上“梅德斯通”号后，亚当斯去看了监狱的医生，说他的肋骨在挨打之后一碰就痛。

“痛吗？”医生问。

“呼吸的时候痛。”亚当斯回答。

“那就别呼吸。”[11]医生面无表情地说。

也许“梅德斯通”号上的员工看上去苦大仇深，并且安保极其严密，但这并非平白无故。两个月前一个寒冷的夜晚，七名共和党囚犯把衣服脱到只剩内裤，在全身涂上了厚厚的黄油和黑色鞋油以抵抗严寒。[12]他们锯断了一根铁条，从舷窗挤了出去，然后一个接一个跳进马斯格雷夫航道冰冷的水中，游到了数百米外的对岸。这些囚犯逃跑的灵感来自一只海豹，他们看到那只海豹设法越过了设置在轮船周围水域的带刺铁丝网。[13]

七个人全部游到远处的岸边从水里爬了出来。他们浑身湿透，只穿着内裤，满身的鞋油脏乱不堪。带着仿佛刚从恐怖电影中的黑湖里爬出来的怪物模样，他们继续抢劫了一辆公共汽车。[14]巧合的是，其中一个逃犯在加入共和军之前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他开着这辆不适合逃跑的车驶入了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他们在许多共和党支持者居住的街区停车后，当地孩子立刻像一群蝗虫般蜂拥而上，开始拆卸汽车零件。[15]囚犯们匆忙走进最近的酒吧，仍然光着身子。站在吧台旁边的一些老顾客突然抬起头，被眼前意外而离奇的景象惊呆了。接着，客人们无需多问便毫不犹豫地开始脱下自己的衣服递给这些逃犯。[16]其中一位客人拿出自己的车钥匙扔给他们说：“快走吧。”等到军方出动600人的队伍追捕逃犯时，这些人已经不见了。[17]偷渡出境以后，他们在都柏林举行了一场胜利的新闻发布会，当地报纸将他们誉为“七壮士”。[18]

亚当斯登上“梅德斯通”号后不久，英国当局决定关闭轮船。贝尔法斯特郊外的机场上那座建造了有一段时间的新监狱现已完工。[19]它被称作朗·凯什。[20]有一天，亚当斯和另一名囚犯被铐在一起登上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往这座新监狱。朗·凯什是个怪异的地方。被囚禁在那里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坚称自己不是罪犯，而是政治犯，他们认为那是一个集中营。它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集中营：建在荒无人烟四面迎风的平地上，囚犯被关在一连串波纹状的钢制棚屋里，四周竖立着倒刺铁丝围栏、探照灯和哨兵塔。

朗·凯什给爱尔兰共和党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但亚当斯不会在这里久留。[21]1972年6月，也就是他抵达两个月后的一天，有人喊道：“亚当斯——出狱！”开始他认为这肯定是一出恶作剧，或者是更加可怕的陷阱。[22]不过等亚当斯收拾好行李走出监狱时，他看见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等候在外准备开车带他回家。她们载着他来到安德森斯顿，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就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召开会议。

亚当斯被关押期间，临时共和军和英国政府暗中建立了一个秘密渠道。[23]在几次初步往来之后，双方似乎有望进行停火谈判。艾弗·贝尔是亚当斯的共和军同谋之一，他是一个强硬派。贝尔坚持认为，和英国人进行任何协商的必要前提是释放被关押的格里·亚当斯。虽然亚当斯只

有23岁，但他已经成了共和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就不可能进行和平谈判。“除非释放格里，否则去他妈的停火！”[24]贝尔说道。

6月26日，共和军开始停火，英国军方同意响应。[25]就在停火前夕，爆炸和枪击事件不断升级。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共和军故意为之的策略，意在凸显停火前后的差异。但宣布休战后，共和军领导人承诺遵循停战协定。他们誓言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人都将被枪毙，这无意中造成了一种滑稽的夸张。[26]临时共和军宣布他们制定了一项“和平计划”，并将在“适当的时机”公开。[27]

许多北爱尔兰人原则上反对这种对话，他们坚持认为不应该和共和军恐怖分子进行任何谈判。[28]然而那年7月，亚当斯和其几位共和军代表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登上了一架英国军用飞机。[29]除了亚当斯以外，随行人员还包括西恩·马克·斯蒂奥芬、艾弗·贝尔、合群的卷发青年马丁·麦吉尼斯（他是德里的共和军指挥官），以及另外两名共和军领袖戴西·康奈尔和谢默斯·图米。他们降落在牛津郡的一处空军基地，两辆大型豪华轿车正等在那里。

这种交通工具看起来或许奢华阔绰，但也让他们心生怀疑。亚当斯过去在酒吧当酒保，艾弗·贝尔以机械修理工为业，麦吉尼斯则是屠夫的助手。这些反叛者对英国人任何浮夸的暗示都高度敏感，他们不允许自己屈尊俯就或感到胆怯。[30]贝尔在此次出行之前表示，尽管他们是作为正式代表团参加一场和平峰会，但他个人不会打扮得西装革履。贝尔讲道，如果说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英国人最喜欢让爱尔兰人感到不自在。要是东道主表现得一本正经，他将用极其随意的方式进行回应。让他们也尝尝不安的滋味。格里·亚当斯对着装问题持同样的看法，他为这个场合挑选了一件破洞的套衫。[31]

豪华轿车载着一行人驶入伦敦，送他们来到了切尔西一幢面向泰晤士河的宏伟老房子前。[32]他们走了进去，不由自主地充满敬畏。同时，亚当斯注意到屋外的一块牌匾上写着，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曾住在这里。

爱尔兰人经由陪同走上楼梯，来到了一间摆满书的客厅。[33]随后，女王陛下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怀特劳走进来友好地问候了他们。[34]怀特劳世故老练，他装模作样地把西恩·马克·斯蒂奥芬的名字念对了——这个细节不禁让马克·斯蒂奥芬心怀感激。不过当他们一一握手时，亚当斯发现怀特劳的手心在冒汗。[35]

怀特劳开门见山地表示，鉴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长久以来的历史，他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客人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国人，但他希望“在我这里，你们能看到一个值得信赖的英国部长”。[36]这是会议的高潮。马克·斯蒂奥芬准备了一份声明，并把它大声读了出来。声明中包括一系列要求：临时共和军希望英国政府公开承认包括南北部在内的所有爱尔兰人民的自决权[37]；他们还希望英方表态将在1975年1月1日前从爱尔

兰领土全面撤军。[38]

英方的与会者之一是一位名叫弗兰克·斯蒂尔的情报官员。[39]他心情沮丧地默默看着对方的表现。马克·斯蒂奥芬提出这些要求的架势，就仿佛共和军已经在战斗中把英国人拖入胶着状态。当斯蒂尔最初被派往北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所秉持的观点是他们不想和共和军对话——他们要打败共和军。[40]血色星期天的大屠杀事件过后，许多英国官员被迫意识到，仅仅通过军事力量恐怕无法赢得战争。[41]在这次会议之前，斯蒂尔一直在秘密地跟共和军代表协商。他以一种轻蔑的消遣心态看待这些人，对于他们坚持采用正规军事组织的术语和服饰的做法尤其感到不屑。“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好，真的，”斯蒂尔后来评论道，“他们竟然想把自己塑造成一支军队的形象，而不是一群恐怖分子。”[42]

当共和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会议室对怀特劳亮出自己的强硬立场后，斯蒂尔认为他们的态度无知到近乎不可救药。[43]他们坚持让英方从北爱尔兰撤军，这无异于要求政府背离不舍弃北部新教徒的承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妥协。[44]随着会议的进行，怀特劳变得沮丧起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道，共和军发出了“荒谬的最后通牒”，会议因这一蓄意破坏而遭遇“流产”。[45]

格里·亚当斯在会上几乎没有发言，但斯蒂尔一直在观察这个又高又瘦、若有所思的年轻叛军，并对他印象深刻。他听说亚当斯是北部共和军的代表，而且是贝尔法斯特旅的高级军官。斯蒂尔原本以为会见到一个傲慢无礼的街头混混。可当他在这次行程前的预备会议上和亚当斯初次见面时，却发现对方不仅风度翩翩、能言善辩，而且非常自律。这些是一个对话者身上有吸引力的品质，斯蒂尔心想，但这些也让亚当斯成了他们不容小觑的对手。[46]在一次预备会议上，正当亚当斯准备离开时，斯蒂尔把他拉到了一边。“你肯定不想接下来一辈子都躲着我们英国人，”他说，“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上大学拿文凭。”亚当斯回答。

“我们不拦着你，”斯蒂尔指出，“放弃武力你就可以上大学了。”

亚当斯咧嘴笑道：“我要先帮忙除掉你们英国人才行。”[47]

那年6月首次宣布停火时，布伦丹·休斯以为战争似乎就快结束了。[48]对于那些潜伏的人而言，敌对状态的戛然而止意味着他们可以冒险离开藏身之处回到家里和亲人重聚。普通民众试探性地从路障后走了出来。[49]自三年前暴动发生后，这将是人们度过的第一个平静的夏天。许多商店重新开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跃跃欲试的乐观情绪。

对休斯而言，停火意味着他能陪在新婚妻子身边。1972年初，就在他24岁生日之前，他娶了19岁的当地女孩莉莉。等到休战开始时，莉莉有了身孕。布伦丹的父亲并不赞同两人的婚事，因为布伦丹不可能在传统意义上为莉莉尽到丈夫的责任。对一个逃亡的男人来说，组建家庭是

一件危险的事。[50]亚当斯那段时间也当了新郎，而且正因为他结了婚，才使得当局有机会逮捕他并把他关进“梅德斯通”号：他们盯上了他的新娘科莉特住的房子，并在亚当斯偷偷溜进去探望她的一天晚上进行了突袭。[51]布伦丹的妻子莉莉逐渐习惯了英军突然闯进家里搜查他的逃犯丈夫。[52]这令她焦虑到晚上不敢睡觉，生怕有人随时破门而入。[53]

休战意味着布伦丹能放慢节奏和莉莉见面，他们可以暂时像正常夫妻一样相处。但平静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两个星期。[54]经过伦敦没有结果的对话之后，双方同意再次会面，但会面最终未能进行。7月9日，由于军方拒绝让天主教难民占用新教徒遗弃的房屋，战斗在利纳杜恩大道再次爆发。西恩·马克·斯蒂奥芬宣布休战结束，并表示他已吩咐手下用“最凶猛的手段”继续暴力行动。[55]布伦丹·休斯通过指挥链接到了上级传达的命令：回来干活。[56]

休斯开始着手策划共和军最为野心勃勃的行动之一。[57]在北爱尔兰的商业区安置炸弹是共和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因为大部分生意由亲英的统一派或英国公司操控，同时基础设施由政府掌管，所以攻击商业财产被认为是对敌人的直接打击。这些行动也许发生在平民地区，但休斯和他的叛军同党坚称他们并未将矛头直接对准老百姓。他们的意图是摧毁财产，而不是夺人性命。他们在爆炸之前向警方和媒体发出了警告，（理论上）能让老百姓撤离爆炸区。毫无疑问，这种警告能提升宣传价值：新闻恐慌地警告购物者城内即将发生爆炸，这愈发放大了每颗炸弹的威力。[58]

那年7月的一个星期五，一组共和军成员在整个贝尔法斯特的汽车站、火车站和购物区安放了将近24枚炸弹，这是前所未有的数量。[59]下午2点刚过，当城市挤满了享受盛夏午后的购物者时，这些装置开始引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枚炸弹爆炸。人们在尖叫声中争相逃走。[60]然而很多人逃离一个爆炸区后，却又跑到了附近另一个即将引爆炸弹的地方。有几辆汽车被炸成了碎片。[61]爆炸导致9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14岁男孩，另外有130人受伤。[62]整座城市对这场屠杀毫无准备，一层烟雾笼罩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一个女人在碎石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她看到地上有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她觉得它看起来像是从运肉的卡车上掉下来的，随后她才意识到那是人的躯干。[63]警察在碎石中间仔细寻找，他们捡起散落的人体残肢，小心翼翼地放入塑料袋中。[64]

“1941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后，这座城市从未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毁灭。”[65]《贝尔法斯特电讯报》如是称，并表示“这符合临时共和军一贯的麻木不仁和毫无悔意”。《爱尔兰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袭击的主要受害者不是英国军队，甚至不是大企业主，而是“贝尔法斯特和爱尔兰的平民百姓”。文章继续追问道：“真的有人认为这种手段能实现任何有价值的事吗？认为这个国家还能承受更多这样的记忆吗？”[66]

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布伦丹·休斯原本希望这会是一次“战绩辉煌”的大事件。然而当炸弹开始引爆时，他正在利森街上端着一把阿玛莱特步枪，他能听到爆炸发生的速度——轰，轰，轰。“太密集了。”他心里想。下福尔斯路区域的一些志愿军听到爆炸声都在欢呼雀跃，但休斯大声呵斥让他们离开街道。[67]他们安置了太多炸弹，高估了当局及时应对如此大规模灾难的能力。多年以来，休斯坚持表示他的目标不是杀人，只是要破坏财产。[68]不论他的真实意图为何，这段经历都令他充满愧疚。不过当时他没有多少机会深思此事，因为他被卷入了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中。

即将停火前的一天晚上，休斯在贝尔法斯特。有个手下告诉他，一个叫乔·拉塞尔的共和军中了枪。休斯立刻前去看望拉塞尔，发现他用手紧紧按着伤口。[69]拉塞尔担心风险太大没有去医院，所以子弹还留在他的肚子里。休斯安排人送拉塞尔出境去了邓多克的一家医院。众所周知，这家医院愿意为受伤的共和党人提供治疗，并且“不问任何问题”。

但疑团仍未解开：那个枪手是谁？[70]当时拉塞尔在家里，一个男人叩响了他家的前门，拉塞尔开门后，那个人朝他开了枪便逃跑了。拉塞尔告诉休斯，他认为袭击他的是正式共和军的人。[71]这个推测得到了乔·林斯基的赞同[72]，林斯基就是那位温和的共和军情报官，人们叫他“疯狂修士”。

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无营业执照的酒吧在整个贝尔法斯特遍地开花，人们把这些地方称作“地下酒吧”。许多传统酒吧都已被烧毁或炸毁，在这座众所周知嗜酒如命的城市里，这些非正规酒吧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离开安全的族群飞地到外面去已经变得十分危险，因此居民区的这些地下酒吧开门后，它们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方便的选择。[73]这些酒馆通常建在被遗弃的住宅里。到1972年末，整个贝尔法斯特大约经营着200间地下酒吧。它们每天都开门，营业时间不定。地下酒吧的酒多半是抢劫货车后偷来的，收入通常交给掌管所属街区的准军事组织。

部分地下酒吧由正式共和军经营，他们的成员也喜欢聚在那里。其中一间酒吧叫作“燃烧的灰烬”。[74]（布伦丹·休斯曾对它纵火，他喜欢开玩笑说他把“燃烧的灰烬”烧了。）另一间正式共和军的地下酒吧是利森街上的“裂杯子”。[75]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酒吧的前身是一家卖二手陶器的商店。这地方并不起眼，屋内的地板正在腐烂，光线也很昏暗。[76]客人们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挤在一起喝酒。墙上贴着圣母玛利亚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画像。

为了找出对乔·拉塞尔开枪的人，休斯派了一队枪手前往裂杯子酒吧。[77]他们大步跨了进去，掏出武器守住门口。那晚有一位客人名叫德斯蒙德·麦金。[78]为了庆祝父亲节，他带着妻子玛格丽特和70岁的母亲出了门。麦金不是正式共和军的成员。巧合的是，他有一个儿子最近加入了临时共和军。然而当休斯的枪手命令所有人跪在地上并推搡麦金

的妻子和母亲时，麦金错误地作出了抵抗。火花随着枪响喷射而出划过昏暗的酒吧，一颗子弹刺穿了麦金的大腿。[79]

开枪的是一名年轻的临时共和军，才十几岁。[80]后来发现，当晚那些枪手闯入裂杯子酒吧时，他们可能都已经喝醉了。[81]麦金的妻子扑倒在他身上尖叫起来。但临时共和军不允许任何人叫救护车，他们害怕引起当局的注意。在漫长的15分钟里，他们全部待在裂杯子酒吧，眼睁睁看着德斯蒙德·麦金躺在地上失血而死。[82]

媒体将当晚的枪击事件形容为正式派和临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83]乍看上去，情况无疑是这样。有一家报纸认为，此次事件或许会触发双方“全面开战”。[84]可事实上，德斯蒙德·麦金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一场糟糕行动中的附带损失。随着休斯深入调查是谁向乔·拉塞尔开的抢，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85]枪手根本不是正式共和军。相反，是他自己的人干的。

在北爱尔兰问题时期颠覆的所有社会习俗中，情爱关系极少被谈论。在天主教和苏格兰长老会结合的文化背景下，贝尔法斯特可能是一个过分拘谨的社会。但随着日常生活在暴乱中变得扭曲，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传统开始松动。无处不在的致命危险驱使有些人以一种新发现的——乃至不计后果的——高强度方式生活。

“疯狂修士”乔·林斯基年仅16岁时就进入了修道院。当他在20多岁离开牧师的职位返回贝尔法斯特后，他在科罗纳德区的一家纺丝厂找到了工作，并开始重拾他在祈祷和虔诚冥思的岁月中失去的青春。[86]用他一位亲人的话来说，他“沉迷于对女人的追求，做着正常年轻人会做的那些事”。[87]林斯基在修道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习了历史，特别是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劳动阶层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历史。他并非来自共和党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怯懦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这类行为。[88]他的哥哥在皇家海军服役，但林斯基最终决定加入共和军。他和杜洛尔丝·普赖斯走得很近，普赖斯喜欢他笨拙却温和的举止。“他是个成熟的人，但在人情世故上却很幼稚。”[89]她这样评价道。在布伦丹·休斯眼里，林斯基一直是个“怪伙计”，是上一辈的奇怪产物。[90]他聪明博学[91]，是个老烟枪，口袋里装着一本关于他心目中的英雄爱尔兰革命家迈克尔·科林斯的书。[92]但他也会有些冷漠。[93]休斯不知道的是，乔·林斯基正和乔·拉塞尔的妻子有染。[94]

裂杯子酒吧的枪击事件过后，临时共和军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发现是林斯基命令一个年轻的共和军枪手谋杀他的志愿军伙伴——他情人的丈夫——乔·拉塞尔。[95]因为林斯基告诉枪手，拉塞尔成了当局的线人，枪手便信以为真地承担了这项任务。[96]然而当拉塞尔开门后，枪手一时间慌了神，朝他的肚子开了一枪便逃跑了。[97]休斯和手下最初开始四处打听寻找枪手的时候，他们询问了贝尔法斯特旅的情报官乔·林斯基。林斯基没有坦白自己试图谋杀情敌的事实，而是把罪责推给了正式共和军。[98]

共和军意外杀人的概率虽然惊人，但却有一套复杂的内部机制来决定有些人是否该死。林斯基企图谋杀自己的志愿军伙伴，并为了掩盖罪行而导致另一个无辜的人丧命，他将因此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99]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程序，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内部问责机制，比起草率地对某人执行枪决，这种方式相对不那么主观臆断。尽管如此，共和军的军事法庭上很少有被判无罪的案例，而且鉴于林斯基罪行的严重性，他的命运看起来凶多吉少。

临时共和军内部最近成立了一支新队伍。类似某些黑暗行动的政府计划，这是一个表面上并不存在的单位——一个被称作“无名氏”的微型精英小组。[100]“无名氏”的指挥官是一个认真的小个子行动者，名叫帕特·麦克卢尔。布伦丹·休斯叫他“小帕特”。麦克卢尔30多岁，这在当时的共和军中算得上很老了。[101]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前，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拥有实际的军事经验（以及对敌人非同一般的密切了解）。[102]麦克卢尔的作风谨慎而低调，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名能力出众、尽忠职守的士兵。[103]

“无名氏”并未被列入临时共和军严格的组织结构中，而是直接听命于格里·亚当斯。[104]布伦丹·休斯开始将他们视为“猎头者”——一个精挑细选的团队，执行危险而隐秘以及有时令人讨厌的任务。[105]麦克卢尔言谈温和，有些神秘莫测。[106]他和手下的士兵并无交往。他有自己的家庭，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不过他也关心自己团队的成员。一个冬天的晚上，巴利墨菲地区发生了大型枪战，他手下的几名年轻志愿军拿起武器声称要加入战斗。“不，不许去。”麦克卢尔告诉他们。他指出，英国士兵接受过夜晚射击的训练，但志愿军没有。“你们一看到街上有东西在动就会乱开枪，”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脱下手套，然后开枪把你们干掉。”[107]“无名氏”的成员被带到乡下进行特殊训练。[108]他们住在一个偏远的农舍进行操练，有时要在指导员朝他们周围的水里发射实弹的情况下爬过一条河。

运送乔·林斯基出境上军事法庭——以及很可能送他上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尤其落到了队伍中的杜洛尔丝·普赖斯身上。[109]她和朋友休·菲尼一起加入了“无名氏”，菲尼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吧。玛丽安·普赖斯也加入了其中。虽然那年夏天的停火只持续了两个星期，但杜洛尔丝很高兴能从暴乱中暂时抽身。那段日子有一种让人忘乎所以的喜庆感：士兵们脱下防弹衣走在大街上，当地的孩子坐着他们的吉普车兜风。[110]和士兵们调情让杜洛尔丝有一种顽皮的满足感。[111]有一次，士兵们戴着贝雷帽邀请她跟他们一起合影，她答应了。[112]一位名叫伊恩·科登劳埃德的英国军官会到她位于安德森斯顿的家里拜访，和她聊天。[113]他肯定知道，或者至少怀疑过，她是共和军的成员。但他们会亲切而友好地探讨政治，仿佛他们是两个研究生，而不是一场血腥游击战中的敌手。有一次，科登劳埃德对她说，他愿意十年后再次来看望她，“到时候我们能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彼此”。

传统上，共和军杀人是为了以儆效尤：公开杀死叛徒是加强社会规范的一种手段。不过在乔·林斯基的案例上，临时共和军将打破这种传统。有一天，林斯基就这么不见了。没有军事法庭对他进行裁决的任何公告，也没有人被陈尸街头。事实上，临时共和军的普通士兵没有收到过任何解释，他们不知道对乔·拉塞尔开枪的真正凶手是谁，也不知道裂杯子酒吧枪击事件背后的丑恶故事。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解释。

由于林斯基的任务经常令他长时间离家，所以当他在1972年8月最初失踪的时候，他的家人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对劲。[114]有传言说乔在美国——说他去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就跟当时许多人的选择一样。这是有人在故意误传信息。有一天，林斯基身在纽约的外甥遇见了一个当地的爱尔兰共和党人，对方告诉他："你刚好跟乔错过了，他上个星期还在这儿。"[115]三年后，当林斯基的母亲去世时，她以为自己的儿子一定还在美国活得好好的。[116]

那个时候，他早已经死了。共和军做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安排，它或许代表了微小的善意，又或许是出于可怕的残忍——当乔·林斯基的死期到来时，送他上路的竟然是他的朋友。[117]杜洛尔丝·普赖斯来到林斯基姐姐的家里，准备带他出境。她没有告诉林斯基他是被召去行刑的。她说爱尔兰共和国那边有一个会议需要他参加。

林斯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刚刚洗了澡，刮了胡子，手上紧握着一个旅行袋，仿佛他要去乡下度周末一样。他们上了车，向南朝爱尔兰共和国开去。林斯基没有多说什么，但普赖斯意识到他很清楚他们要去哪儿。[118]车上只有他们两人，他比她强壮，他本来可以将她制服。可是他就这么温顺地坐在那儿，腿上放着他的小包。有一会儿，他试图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但她说："我不想知道，乔。我不想听。我现在有件很难的事要做。"[119]

他坐在车后座上，她在后视镜里看着他。我要把他带去码头，她心想。[120]我要把他带去码头，让他逃跑。他可以逃到英格兰，再也不回来。可她还是继续向前开。他为什么不跳车？她疑惑地想。他为什么不把我打晕然后逃跑？他为什么不想办法逃命？[121]但随着她越开越远，她明白了他之所以不能自救，正和她不能实施行动来救他一样。他们对独立运动的奉献不容许他们这样。[122]她曾立誓服从所有命令，而林斯基似乎选择了接受自己的命运。

他们到达了莫纳亨郡，就在刚过边境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路灯下等他们。[123]林斯基感谢她开车送他，并告诉她不要担心。他主动和她握了握手。[124]

"我们会再见的，乔。"[125]普赖斯说。但她知道这不可能，然后一路哭着回了家。

九　孤儿

1973年1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工作人员来到了圣犹大之路公寓。[1]他们在寻找麦康维尔家的孩子。琼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通过北爱尔兰民权协会最初发表的一篇相关通讯文章，当地媒体开始了解这一事件。[2]这篇标题为“琼·麦康维尔在哪里”的文章写道，“在被人粗暴地从家里带走之后”，这个独自抚养十个孩子的寡妇从12月7日开始便一直下落不明。根据这条原始消息，《贝尔法斯特电讯报》于1月16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母亲遭绑架失踪一月”的短文。文中特别提到，没有孩子向警方报告母亲被绑架的事。[3]第二天，报纸呼吁社会协助破解这起“神秘的失踪案”。[4]

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海伦和弟弟妹妹们独自住在公寓里。摄影机准备好后，孩子们挤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在黄色条纹的墙纸背景下，他们讲述了经历的磨难。“四个年轻的女孩来到了客厅，她们要求所有的孩子到楼上去。然后她们直接进来把妈妈带走了，”阿格尼丝小声说道，“妈妈走到过道，穿上外套就离开了。”[5]

“你妈妈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采访者问。

“她尖叫得很厉害。”阿格尼丝回答。

“你们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把妈妈带走吗？”

他们不知道。十几岁的海伦长得很漂亮，她和妈妈一样有着白皙而狭长的脸，深色的头发披在两边。她把比利抱在身上，紧张地将目光避开了摄像机。几个小男孩中，有的皮肤白皙，有的面色泛黄。塔克坐在阿格尼丝身上，虽然是寒冷的冬天，他却只穿着一件蓝色高领毛衣和短裤，膝盖露在外面。孩子们焦躁不安，眼神四处游离。迈克尔坐在海伦旁边，勉强能被镜头拍到。他盯着摄影机眨了眨眼睛。

“海伦，我想是你在照顾一家人吧，”记者说，“你能应付得来吗？”

“还行吧。”

“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妈妈？”

“不知道。”

“没有任何人跟你们联系吗？”

阿格尼丝提到他们去找过奶奶。

“她现在肯定年纪很大了吧？”记者说。

“她眼睛瞎了。”阿格尼丝回应道。阿格尼丝13岁。她怀着希望指出，妈妈被带走的时候穿着一双红色拖鞋。这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场景，仿佛这能提供一个线索。阿格尼丝说，他们兄弟姐妹会“很努力地祈祷，祈求她早点回来”。

孩子们之所以没有向警方报告琼的失踪，可能跟他们的奶奶有一定关系。[6]她告诉人们她不敢这么做，但并没有说明确切原因。孩子们热切地相信妈妈很快就会回家，然而情况开始变得不容乐观。他们可以依靠琼的抚恤金，但仅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以为贝尔法斯特关系紧密的社区会团结起来对这样一个家庭表示关心，带着热饭热菜来看他们，或者帮海伦照顾弟弟妹妹，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相反，帝维斯公寓的整个社区仿佛直接选择忽视圣犹大之路公寓里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或许只是因为这是贝尔法斯特的危难时期，人们都有自己的担忧，又或许其中藏着更阴暗的原因。可不管怎样，几乎社区的所有人都选择对他们视而不见。



迈克尔、海伦、比利、吉姆、阿格尼丝和塔克·麦康维尔

琼被带走后不久，确实有一位社会工作者来看望了这群孩子。[7]当局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户人家的孩子无人照料。于是官僚人员例行公事般地新建了一个档案，指出这些孩子的母亲似乎遭到了“一个组织”——准军事组织的简称——的绑架。那名社会工作者和孩子们的奶奶谈过，她好像并不怎么在意。根据会面的记录，琼的婆婆一本正经地断言，海伦是个“非常能干的姑娘”，似乎能照顾好弟弟妹妹。[8]海伦和奶奶的相处并不比琼和她婆婆的相处融洽多少。[9]“一点喜欢的感觉也没有。”社会工作者写道。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健康的成长环境。社会工作者建议对他们进行“安置”，也就是将他们交给政府，由儿童之家抚养。但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10]他们的妈妈现在随时可能回来，他们解释道。[11]他们必须留在家里等她。

他们被困在公寓里彼此依靠。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水槽里的碗碟越堆越高。[12]邻居们非但没有帮忙，反而开始向官方抱怨这些没人管的孩子晚上吵得他们睡不着，隔着墙都能听到喧闹的声音。[13]就连天主教会也拒绝介入。离圣诞节只剩一周的时候，那名社会工作者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当地的教区牧师了解这些孩子的困境，但却“无动于衷”。[14]在当地的其他孩子列出圣诞节礼物清单时，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却连肚子都填不饱。[15]他们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只有阿奇以学徒的身份干着屋顶铺瓦工的活儿。[16]这些孩子开始惹麻烦。[17]迈克尔会在外面待到很晚，去商店里偷食物。最后，他在城里一家商店偷巧克力饼干时被逮到，同时被抓住的还有他的弟弟。[18]当警察问迈克尔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他和家里的兄弟姐妹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非常饥饿。[19]那个时候迈克尔11岁。[20]当被问到父母的情况时，吉姆告诉对方：“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被共和军带走了。”[21]

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档案中没有任何对琼·麦康维尔失踪一案的调查记录。[22]她被绑架时正值冲突最激烈的那年年末。这类事件虽然恐怖，可也许并不足以引起警方的关注。1月17日，一名来自斯普林菲尔德路警察局的警探的确去过麦康维尔家，但警方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线索，而且似乎没有对案件进行追踪。[23]两名当地的国会成员了解此事后，谴责这是一起“冷酷无情”的绑架案，并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琼。[24]然而没有人主动提供任何信息。

有时，贝尔法斯特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小镇，而不是一座城市。即使在北爱尔兰问题之前，这里的市民文化都充斥着捕风捉影的八卦。差不多琼·麦康维尔刚失踪，就有人开始谣传她其实根本没有遭遇绑架——相反，是她自己主动抛下孩子跟一个英国士兵跑了。[25]本就担心不已的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这些传言。他们去商店或者上街时，会听到邻居们窃窃私语，感受到对方投来的评头论足的火辣目光。回到公寓，有些孩子会把心中的疑问大声说出来。她真的抛下他们了吗？这似乎不可能。但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她还不回来？阿奇·麦康维尔后来表示，所有这些闲言碎语不仅仅是在往他们的伤口撒盐。他认为它们更像一种毒药：“企图摧毁我们的精神。”[26]

北爱尔兰问题的副产品之一是一种沉默的文化。在街头的武装派别经常斗争的情况下，连打听失踪亲人的下落这种无辜的举动都可能变得危险。那年2月的一天，共和军青年团的几个男孩抓住了迈克尔·麦康维尔。[27]他们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绑了起来，并用小折刀刺伤了他的腿。他们放他走的时候警告他：“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妈妈的事。”[28]

暂时的自由并未持续多久。[29]到了2月，社会福利部门开始着手将这些孩子重新安置到孤儿院。一天，有三个女人来到公寓，声称她们已经获得房子的租用权，并且准备搬进来。[30]这是一种战争时期残酷的权宜之计，在贝尔法斯特不断上演，就像可怕的“抢椅子”游戏：还没等一个被迫离开的家庭搬离住处，另一个处境相似的家庭就要占用他们的房子。孩子们拒绝离开，但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最终，这些孩子成

了“法院的监护对象”。[31]

让某人消失的行为最终被国际刑事法庭界定为反人类罪行，说其性质恶劣，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将受害者的亲人抛入了不可知的炼狱中。[32]孩子们仍然抱有希望，也许他们没有变成孤儿，也许妈妈突然又回来了。说不定她得了健忘症，正住在另一个国家，忘了她所有的孩子还留在贝尔法斯特。

但即便那个时候，他们仍有理由相信琼·麦康维尔可能遭遇了不测。在她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孩子们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公寓前，把他们妈妈的钱包和她离开时手上戴的三枚戒指交给了他们：她的订婚戒指、结婚戒指和亚瑟送给她的永恒戒指。[33]渴望了解消息的孩子们询问了琼的下落。“我对你们的妈妈一无所知，”那个人说，“只不过有人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34]

多年以后，迈克尔·麦康维尔会在回首往事时忆起此事，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的妈妈肯定已经死了。[35]

十　弗雷德们

1972年秋的一天，一辆洗衣店货车开进了贝尔法斯特市郊的双溪住宅区。[1]萨拉·简·瓦尔克下车后向一栋房子走去。这辆货车定期在附近出现。[2]这一带没有多少商店，所以经常可以看见商人挨家挨户地兜售商品。[3]这是一家名叫“四方洗衣”的公司。萨拉每周来一次，带走一堆脏衣服，过几天再把叠好的干净衣服带回来。人们对这个服务很满意，价格也低廉。而且人们喜欢萨拉，她是个漂亮又善于逢迎的年轻女性。[4]司机泰德·斯图尔特是一个来自蒂龙郡的年轻人，主要负责开车。[5]不过他性格随和，也很招当地顾客喜欢。[6]住宅区的孩子们都叫他泰迪。[7]双溪的居民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但就当时贝尔法斯特的环境而言相对安宁。[8]

萨拉向一栋住宅走去。一个家庭主妇开了门，她和萨拉正说着话，突然间两人被巨大的爆破声打断。[9]萨拉转身看到有两个人出现，其中一人拿着一挺机关枪，另一个拿着一把步枪。他们正背对着萨拉俯身站在一团烟雾里，朝洗衣店货车的驾驶室进行近距离射击。[10]那是泰德坐的地方。萨拉僵立在门口，无助地目睹泰德遇害。接着其中一名枪手转向了她的方向。[11]

经过上次拘捕突袭行动的巨大失败之后，英国军方和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继续集中加大马力，在保皇派和共和党的准军事组织内部获取信息。1972年，布伦丹·休斯开始怀疑D连可能存在告密者。[12]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一个名叫谢默斯·赖特的年轻志愿军年初时遭到逮捕——自从被捕以后，他总会时不时消失一阵。

25岁的赖特刚结婚不久。休斯去见了他的妻子凯瑟琳。[13]她说谢默斯2月被捕，落在了英国人手里。不过随后他给她家附近的一个商店打电话留了信息，说他“溜号”了——也就是逃走了。谢默斯现在在英格兰，凯瑟琳继续道。他住在伯明翰，她有他的地址。[14]休斯提出，或许凯瑟琳应该去那里看望谢默斯。休斯这是在争取让嫌疑间谍的年轻新娘也充当间谍：她会去看望谢默斯，并努力说服他和她一起回来。然后她会向布伦丹·休斯报告。

凯瑟琳飞往了英格兰。可是当她到达那里后，谢默斯却拒绝回家。于是她独自返回，并在利森街上的一间房子里和休斯见了面。在这次任务报告中，凯瑟琳确认了他最坏的担心。谢默斯已经被英国人转变了立场，她说。当她见到丈夫时，他身边有一个英国人陪同——有点像他的上线。不过有一点，她继续道：谢默斯想要抽身。他打算逃跑，逃离他的上线。[15]但他希望得到保证，如果他回到贝尔法斯特，共和军不会枪毙他。对于一个亏负临时共和军的信任并和敌方勾搭上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大胆的要求，毕竟犯下这种罪行后基本会被判处死罪。不过休斯感觉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了解英军招募双重间谍的内幕，于是他同意做

出这一担保。

不久之后，谢默斯·赖特回到了西贝尔法斯特，他在一栋房子里接受了两天的审问。[16]他解释道，最开始被英军逮捕时，他们说可以把他和一桩导致安全部队人员死亡的爆炸案联系起来。他们坚定不移地表示抓住了他的罪证，以致他开始怀疑自己被人告发了——被希望求得宽大处理的罪犯出卖了。他的上线取得他的合作后，他们向他询问了有关武器和炸药的情况。不过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敢死队。他们告诉谢默斯，只要他能给出D连中所有人的名字，他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17]

休斯沮丧地发现自己的连队竟然出现了叛徒——而且还暴露了敢死队成员的身份。[18]讽刺的是，在临时共和军自诩为一支正规军队的初期，他们的构造和英军十分相似，包括营连等级和一条清晰可辨的指挥链。这事实上意味着，一旦敌方成功让某人转变立场，即使是让像谢默斯·赖特这种相对低级别的小兵转变立场，他们就能大致了解共和军的组织架构。

赖特说，在同意充当线人后，他被安排飞往英格兰接受双重间谍的训练。接着他按吩咐飞回北爱尔兰，开始搜集临时共和军的情报。就在休斯专注聆听的时候，赖特描述了派力斯兵营里一处竖有围栏的秘密场地，军方在那里安置着最有价值的线人。[19]英军内部有一支秘密部队，赖特说——他们称之为MRF，共和党和保皇派的线人都由这支队伍掌控。赖特解释道，军方控制了一批人，这些人在诱导下转变阵营，现在为英国人做卧底。[20]MRF的成员会向他们展示葬礼的新闻短片和嫌疑人的监控画面，然后让他们指出认识的人。有时赖特的上线会让他坐上装甲运兵车，然后开到福尔斯路区域。当上线潜行在狭窄的街道时，赖特会透过车上的枪缝向外窥视，辨认他们经过的行人。

MRF为这个秘密的叛徒群体取了一个名字，称他们为“弗雷德们”。临时共和军的成员谁也没有弄清这一绰号的出处。然而只要读过弗兰克·基特森准将的著作，就不难意识到“弗雷德们”是一个被策反的团体。过去基特森手下那些在肯尼亚的茅茅线人所戴的白色面罩上有能够透视的眼缝，如今则换成了萨拉森装甲车上的枪缝。赖特说，“弗雷德们”居住的秘密场地是隔离的，所以其他大部分线人他都无法辨认。不过有一个人的名字他知道。“我在那里看见过一个人，”赖特说，“他是我们的人。”[21]

赖特所说的是一位名叫凯文·麦基的年轻临时共和军，事实上他只是个孩子，来自巴利墨菲连队。[22]麦基尚未成年[23]，这个帅气的十几岁少年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和蓬乱的黑发。[24]他稍微有些龅牙，大家都叫他“鹰钩嘴”。[25]他在西贝尔法斯特长大，喜欢坐在家里的客厅听老式收音机里播放的唱片。[26]他加入了共和军青年团，朝英军和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扔过石头。[27]如果保皇派把英国国旗挂在电线杆上，凯文会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摇一摆地爬上去把旗子扯下来。他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被卷入了北爱尔兰问题的传奇和阴谋中。他有些天真，但也

会执行“狙击”（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狙击行动）和安置炸弹的任务。[28]跟他同时期的一名巴利墨菲共和军这样评价他：“这小子有种。”

一天晚上，凯文·麦基遭到逮捕，并被带往斯普林菲尔德路的军营。[29]他的两位姨妈冒险去军营打听他的情况。[30]然而等她们到达时，却被告知他已经逃跑了。最后家人收到了凯文从英格兰寄回的信，认为他一定是为了躲避军方和警察才搬到那里的。[31]

但事实上，他成了告密者。英军在凯文被捕当晚的正式记录中指出，他在被拘留以后“提供了”关于一处特殊财产的信息。[32]记录中接着列出了从该地址的共和军武器库里找到的一系列武器。根据记录，麦基在当晚将近11点时被捕，而那栋房子刚过午夜就遭到了搜查。所以他肯定在被抓以后马上转变了立场。谢默斯·赖特告诉休斯，麦基“很喜欢”参与“弗雷德们”的行动。[33]MRF的军方成员也看中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少年，他们喜欢他逞能的性格。[34]

当弗兰克·基特森在肯尼亚招募被俘的茅茅参与策反团体时，他发现他们需要被“驯化”，并将这个过程比作驯马。他不会选择拥有狂热信仰的人，他们的立场太难以转变，而是专注于招募那些主要出于社交原因参与武装运动的人：因为他们的朋友在这么做。基特森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最合适的招募对象是那些拥有“冒险精神”的人，那些“认为拿着枪当土匪很好玩”的人。[35]他们“最容易对付，因为他们最容易满足”。在肯尼亚，这类新招募的卧底就是基特森愿意把自己的枪交托出去的人，让他们在巡逻的时候拿枪，满足他们的冒险欲，也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团队中可靠的一分子。在贝尔法斯特，MRF给了凯文·麦基一把手枪和一个肩背的枪套。[36]他把枪套背在身上四处炫耀，就像芝加哥的黑帮一样。作为一名“弗雷德”，他有权携带武器并在英军的基地靶场进行射击。

临时共和军追捕到麦基的时候，他身上正背着那个枪套。[37]跟谢默斯·赖特一样，他在审问中供认了自己对组织的背叛。[38]然而现在，临时共和军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确认了两个叛逃者，他们背叛组织并同意跟敌人合作。通常而言，他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被判有罪，然后被枪毙后抛尸街头。不过英方似乎不知道休斯发现了共和军的这个安全漏洞——而赖特和麦基现在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为自己赎命。如果他们的供词可信，说明英军针对临时共和军精心密谋了一场间谍行动，但这场行动的具体规模及行动细节尚不明了。因此眼前休斯得到了一个机会：与其处决赖特和麦基，他可以利用两人作为三重间谍，为他们搜集英军的情报。[39]

对赖特和麦基来说，这么做也许有风险，但总好过被立刻处决。事实上，赖特回去继续为“弗雷德们”工作。按照指示，这次他只为英军上线提供低级信息，或者最好是错误信息。[40]如果英军让赖特指认街角的临时共和军，他可以说对方是正式共和军的人。这是个危险的游戏。一旦军方发现这个骗局，赖特可能被送进监狱。他也可能被MRF枪毙，

毕竟后者在偶尔执行的非法刺杀行动中从不手软。虽然休斯要求赖特和麦基为他提供情报，但他也借此给了两人免于一死的机会：休斯对两人许诺，如果他们能为共和军传递消息，那么他们之前的罪行将能得到“赦免”。[41]

两人同意了。他们向休斯描述的，是英军在整个贝尔法斯特发展的一张巨大的情报搜集网。这个行动的核心项目是洗衣服务，在市中心有一个营业处。[42]四方洗衣以上门服务的方式进行操作，他们取回衣服和亚麻织物，然后转包给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洗化公司清洗。但在衣服送走之前，英国当局会对它们进行分析。通过查看衣服上的炸药痕迹，能判断某个地点是否在制造炸弹。化验员还可以拿特定住宅取回的衣物跟表面上住在那里的人进行人数、年龄以及性别的对比。如果发现不匹配之处，或许表明那里是一个武器库或者联络站。那辆洗衣店货车安置了一个特殊的空心车顶，里面可以藏一个工程兵，他可以透过隐藏的空间对外面的人和房屋进行拍照。

得知洗衣店的行动后，休斯想立刻将其一举摧毁。但格里·亚当斯提醒他稍安勿躁。“别急，”亚当斯说，“继续搜集情报。”[43]休斯和他的手下了解到，除了洗衣服务和市中心的营业处，MRF还在安特里姆路的一栋房子上面开了一间按摩室。[44]有时那里的顾客感觉舒服极了，不知不觉就向话多的按摩师透露了信息。到了10月初，休斯和他的队伍认为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情报，行动的时机到了。他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袭击这些地点，一旦他们进行第一次攻击，MRF就会明白整个行动已经暴露。所以临时共和军会对三个地点同时发动进攻——洗衣店货车、营业处和按摩室。[45]他们的目标是在一个小时内彻底摧毁整个情报搜集系统。

四方洗衣的货车司机泰德·斯图尔特是英方的卧底工兵，来自皇家工程师。[46]他自幼就想成为一名士兵，20岁的他6月份刚开始在北爱尔兰服役。临时共和军的袭击小组朝货车射击后，他几乎当场毙命。

当枪手转向斯图尔特的搭档萨拉·简·沃尔克时，她冲进了刚才和她聊天的当地女人家里。沃尔克也是一名卧底士兵，来自皇家女子军团。她把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一起拉进了屋里，快速思考后她告诉他们，这肯定是保皇派设的埋伏。[47]那个女人帮沃尔克从后门逃走了。[48]

枪手得到指示，不仅要杀死进行洗衣服务的这对年轻搭档，还要用枪扫射货车顶部，干掉里面的工兵。然而，他们在情急或恐慌之下没有这么做。假如货车里还藏着一个士兵，他就此逃过了一劫。[49]在贝尔法斯特的其他地方，另一组枪手摧毁了按摩室，第三组枪手摧毁了营业处。[50]不过他们未能消灭更多MRF的成员。

四方洗衣行动标志着临时共和军的重大胜利。[51]休斯对行动成果感到非常骄傲。几十年后，格里·亚当斯在一本自传中称，这是一场对英军的“毁灭性打击”。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处置赖特和麦基？

四方行动的当天，赖特回到家里告诉妻子凯瑟琳他必须小心行事。[52]因为英军释放他之前，他签署了一些关于官方秘密行动的文件。就在那天晚上，他失踪了。一辆车开到了他位于孟买街的家门口。赖特和司机交谈了几句，接着他坐上车离开了。[53]后来见他没回来，凯瑟琳便到利森街向临时共和军询问他的下落。他们告诉她，谢默斯不是被共和军带走的。[54]听到这里，凯瑟琳相信丈夫应该是被军方抓去了。[55]然而军方也否认跟他丈夫遭绑架一事有任何关系。英军对媒体表示，赖特也许自己逃到苏格兰藏了起来。[56]

大约在同一时间，麦基也失踪了。[57]他的一位姨妈告诉他："共和军一直在找你。"

"我没做错什么。"麦基带着一如既往的自信回应道。

他失踪后，家人没有选择报警。当局很可能无法提供帮助，反而会造成伤害。然而流言开始散布：有人说麦基进了一所艺术学校，有人说在英格兰见过他。

事实上，这两个人都被共和军带走了。[58]他们交代了MRF和四方洗衣的信息之后，已经打出了手里的最后一张牌。当三个地点同时发动的袭击完成的那一刻，赖特和麦基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布伦丹·休斯或许担保过他们将得到赦免，但其实他并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保证。在最初背叛临时共和军后，他们已经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行——而这一罪行是他们后续作为三重间谍执行任务所不能抵消的。"无名氏"收到了命令，杜洛尔丝·普赖斯开车将两人送往边境另一边的爱尔兰共和国。

运送他们两人的只有普赖斯。[59]普赖斯对告密者深恶痛绝，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不过就算她鄙视赖特和麦基，她也并未表现出来。在向南行驶的路上，他们很放松。四方洗衣行动成功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赎回了性命。有人告诉赖特和麦基，他们要到境外休整一周。"你们只是去稍作休息，恢复一下精力。"普赖斯对他们说。虽然据她所知的确如此，但她有相反的推测。不管怎样，她要服从上级的命令。她把两人送到莫纳亨，交给了当地的共和军。

麦基最后被关在莫纳亨郡的一栋房子里。[60]这栋房子的主人是已故共和军费加尔·奥汉隆的家人。费加尔于20世纪50年代被害，后来他被写进了著名的民谣《爱国者游戏》中。麦基必须等待一段时间，等一些高级领袖过境对他进行军事审判。照看他的几个人越来越喜欢他。[61]他有一手好厨艺，是个风趣而有魅力的人。有一天，麦基从附近一位牧师的家里给他的妈妈打了电话，让她送一些换洗的衣服过来。[62]她和他的几个姨妈开车前往，可当她们到达那栋房子时，凯文已经不见了。有一个男人在那儿。"把衣服带走吧，"他说，"他不会回来了。"[63]

等到该处决凯文·麦基的时候，负责扣押他的当地志愿军发现自己对他下不了手。[64]他们太喜欢他了。事情传到休斯这里，他感觉这就像

颠倒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劫持者逐渐对人质产生了好感。共和军决定替换人选，他们从贝尔法斯特指派了两名冷静的枪手。[65]行刑之前，他们找来了一位牧师。[66]这并不少见：在那个年代，有些牧师逐渐习惯了深夜打来的电话。几个准备执行死刑的人粗鲁地将他们叫到外面，让他们为死刑犯举行最后的仪式。杀人的举动本身具有仪式的特质，就像一种常规的程序。[67]假如麦基不死，他原本会熟悉这套程序。有人会在你的头上套一个袋子，将你的双手绑在身后，接着你跪在柔软的草地上，最后头部中弹身体前倾。

处死赖特和麦基的决定让布伦丹·休斯感觉自己被出卖了。[68]他向他们承诺过他们不会被枪毙。他将为此抱愧终生。

四方洗衣行动或许很成功，但休斯和格里·亚当斯并不能抵挡英军多久。1973年7月，也就是次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亚当斯正前往福尔斯路的联络站开会。[69]作为贝尔法斯特的总指挥，他每天都要和休斯以及一个叫汤姆·卡希尔的人碰面。[70]休斯是共和军的行动指挥官，卡希尔则掌管财务。在7月的贝尔法斯特潜伏并非易事：因为此时是保皇派游行示威的高峰期，大部分有条件出城一两周的天主教徒会选择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离开。[71]在天主教街区行人减少的情况下，四处走动变得更加容易引起注意。距离联络站大约四五十米的时候，亚当斯犹豫起来，他环顾四周，观察任何可疑的活动迹象。他靠在一辆车的车篷上徘徊了一会儿。接着他发现车里有人，一个生意人正在前面的车座上查阅文件。[72]亚当斯招了招手，对方也挥手致意。

确认四周没有危险后，亚当斯穿过马路走进了对面的联络站。他在屋内跟休斯和卡希尔碰了面。然而几个人还没谈多久，屋外就传来了敲门声。这本身并不值得警惕。英军经常在共和党街区巡逻，敲门要求进屋看看或者聊一聊也是例行做法。也许他们不知道碰巧发现的这间房子有多么重要。三人匆忙做了一个决定：卡希尔去开门，同时休斯和亚当斯从后门逃走。[73]可是当他们走到院子里，墙外的景象却让休斯大吃一惊，他看到了一大群英国士兵。[74]当士兵们蜂拥而入时，亚当斯随手掏出火柴点燃了他的烟斗。[75]

亚当斯倚靠的那辆车里的生意人并不是一个生意人。[76]当亚当斯监视联络站的时候，方向盘后的那个人也在监视他。英军策划了一场雄心勃勃的行动，他们暗中在周围部署了大量士兵，但要等到亚当斯和休斯都进屋后才能发动突袭。亚当斯打开门的那一刻，他便触发了此次行动。

几名临时共和军被带往斯普林菲尔德路的警察局，他们在那里遭受了数小时的殴打和拷问。[77]亚当斯被打得不省人事，抓捕者朝他泼了一桶水让他苏醒，接着又开始继续打他。[78]在几名审讯者中，有一个穿条纹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他掏出手枪对准休斯的头，扣上了扳机。他说他要枪毙休斯，把他的尸体扔到黑山上，然后说是保皇派干的。[79]

英军大喜过望：他们一举抓获了几个最受关注的目标，包括之前从来没有被俘获的休斯。[80]威廉·怀特劳去年夏天和亚当斯在伦敦见过面，这次他亲自到场对实施抓捕行动的人表示祝贺，而且还带来了许多香槟酒。士兵们把两个俘虏当成“战利品”，轮流摆姿势和他们拍照。[81]遭到毒打的两人已经连路都走不稳。尽管如此，休斯仍是目中无人。[82]“我会逃出去的。”他告诉他们。

他和亚当斯被押上一辆萨拉森装甲车前去乘坐直升机，接着他们被送往不远处的朗·凯什。直升机降落后，他们被铐上手铐押进了监狱。当他们走进去时，整个监狱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对朗·凯什的共和党囚犯而言，亚当斯和休斯无异于偶像般的人物，声名显赫。当他们进入这座戒备森严的设施时，人们像对待凯旋的英雄般向他们致敬。虽然他们带着鼻青脸肿、枷锁缠身的形象被关进监狱，但却受到了囚犯们的热烈欢迎。后来，休斯形容那是他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83]

第二部　人类的牺牲

十一　封锁英格兰！

番红花已经在伦敦的各处公园和历史遗迹盛开。[1]那天是1973年3月8日，星期四，初春的早晨清新怡人。潮湿的冬天终于过去，英国人在阳光的召唤下走出家门。女王离开白金汉宫到她的花园里欣赏最早盛开的鲜花。那天的交通系统遭遇了罢工，在火车停运的情况下，上班的人们不得不驱车进城，这导致伦敦市中心车辆泛滥。[2]为了给激增的车辆提供空间，伦敦取消了当天的停车限制。汽车随处可见——它们停在装载区和其他通常禁止入内的地方，还有的停在早已停用的计时器旁。

下午2点，午饭时间刚过，伦敦《泰晤士报》总部响起了电话铃声。[3]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柯蒂斯的年轻女性刚开始在新闻桌前工作，她拿起了电话。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方说话的速度非常快，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起初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接着她意识到他正在快速地描述几辆车的特征和地点。他只讲了一分钟，尽管她仍然很困惑，但还是尽可能多地记下了他的话。那个男人在挂电话之前说道："炸弹会在一小时后爆炸。"

马丁·哈克比是一名记者，那天他在新闻编辑室值班。[4]他听到了柯蒂斯向同事口述有关炸弹的具体信息。她提到的最近的地点是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老贝利，离《泰晤士报》总部不远。哈克比冲出办公室，他要寻找一辆绿色科蒂娜旅行轿车。[5]假设柯蒂斯的转述没错，那么它的车牌号应该是YNS　649K。哈克比下午2点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到达了那座重要的石筑法院。建于世纪之交的老贝利审理过许多著名的案件。这座厚重的石造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上面立着一尊正义女神的铜像。她伸展双臂，手持一把剑和一架天平。

法院周围停有几十辆车，哈克比开始查看他是否能找到那辆科蒂娜。没过多久，他认出了停在法院正前方的一辆车。[6]那是一辆绿色科蒂娜旅行轿车，车牌号YFN　469K。足够接近的特征使他确信这就是他在找的那一辆。他透过车窗望向车内，发现地上有一副黑色手套和一个喷雾罐。哈克比等待着警察的到来。在一段似乎无比漫长的时间过后，终于有两名警察在2点33分抵达，并查看了那辆科蒂娜。他们开始疏散附近的人，在路上拉起了警戒线。[7]哈克比躲到距科蒂娜二十多米的一个门口继续等待。[8]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炸弹行动带到英格兰的计划是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主意。共和军在整个爱尔兰的商业中心引爆了数百枚炸弹。如果其目的是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那么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它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附带性破坏。对北爱尔兰的平民而言，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日常的爆炸事件令生活变得难以继续：就连上街买鸡蛋这种琐碎之事都能突然之间变成生离死别。共和军或许并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但平民的伤亡确实存在，而且不在少数。这些死伤的人中既有天主教徒也

有新教徒。“血色星期五”就是一场极其重大的灾难，但却一点也不特别——在无数小规模的炸弹行动中，人们失去了四肢甚至生命。秉持爱尔兰民族独立主义的温和派也因此逐步放弃了对暴力运动的支持。最糟糕的是，由于爆炸造成的毁坏及死伤基本局限于北爱尔兰，它似乎并未引起其预定目标——英国人——的强烈关注。对于笼罩北爱尔兰的这场灾难，远在爱尔兰海另一边的英国公众仿佛只有模糊的了解。[9]这是一次用荒唐的战略进行的个案研究：爱尔兰人企图错误地利用炸死自己人的方法来伤害英国人，而英国人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让普赖斯感到恼火。“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她会在行动的间隙坐在联络站里对“无名氏”的首领小帕特·麦克卢尔抱怨，“我们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属于他们，所以也要在他们的领土上作战。”[10]她确信，“一次短促而猛烈的打击——直插英国的心脏——要比在爱尔兰北部的任何地方实施20次汽车炸弹行动来得更有效”。[11]

西恩·马克·斯蒂奥芬听取情况后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普赖斯和麦克卢尔以及格里·亚当斯开始计划用燃烧弹进攻伦敦。[12]制好燃烧弹后，共和军将它们偷运到了伦敦。他们的想法是让一组女孩乘飞机去，把燃烧弹放置在牛津街的多个百货商店。然而还未等炸弹安放就位，他们就发现装置里的酸性物质泄漏，导致炸弹报废。[13]因此，已经身在伦敦的普赖斯放弃了此次任务。她走到泰晤士河岸边，轻轻地将失效的炸弹逐个滑入河里。

燃烧弹计划搁浅后，他们转而决定安置汽车炸弹。[14]贝尔法斯特旅敲定了这个主意。等到要为此次任务招募行动小组时，各个分队的志愿军在下福尔斯路的一间联络站集合了。[15]格里·亚当斯解释说，他们在计划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所有决定参与的志愿军将要离家一段时间。[16]亚当斯发言的时候，普赖斯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坐着。为了确保行动安全，亚当斯面对大群体只是含糊地讲述了此次任务，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信息。不过他强调，参与的每个人必须准备好面对严峻的形势。[17]“这可能是一次惊险的任务，”他说，“如果有谁不想去，现在就该起身离开。”[18]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让他们每隔十分钟依次从后门出去。[19]

普赖斯觉得亚当斯太夸张了。她怀疑隔十分钟的桥段是他从一本有关迈克尔·科林斯的书中学到的。[20]不过毫无疑问，大家开始起身往外走。“慢点儿，伙计们。别把我撞到了。”[21]普赖斯讽刺道。

这批人离开后，大约有十个人留了下来。[22]其中包括普赖斯的朋友兼“无名氏”战友休·菲尼。他很有学问，戴着眼镜，才20岁出头。菲尼将作为军需官负责行动中的所有支出，组织交给了他一卷厚厚的5英镑纸币。还有格里·凯利，一个来自下福尔斯路的英俊青年，这是普赖斯第一次和他见面。[23]他原本因抢劫银行被判入狱，后来从监狱逃了出来，一直处于潜伏状态。[24]普赖斯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25]当然，还有玛丽安。玛丽安永远不会缺席。

他们都非常年轻，可以说还是孩子。[26]小组中年龄最大的是29岁的威廉·阿姆斯特朗。他是一名玻璃清洁工，总是把头发光滑地梳向背后。最小的成员是罗辛·麦克尼尔尼，这个18岁的女孩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半年前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在此之前是一名打字员。[27]她还跟父母住在一起。[28]

作为“无名氏”的首领，小帕特希望由聪明人来带领行动[29]，所以他挑选了杜洛尔丝带队。[30]用杜洛尔丝自己的话来说，她被任命为“整个行动的指挥官”。向她汇报的有两位副官——休·菲尼和玛丽安·普赖斯。这些成员谁都没有任何在敌方阵线作战的经历。[31]于是，小帕特安排他们过境，接受有关炸药和定时器的强化训练。[32]

布蕾迪姨妈已经以身试法，共和军制造炸弹的技术危险而不精确。布伦丹·休斯讲过其曾祖父的故事：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正当他朝一辆装甲车投掷手榴弹时，它突然引爆并炸断了他的手臂。[33]最近几年，由于临时共和军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练习，他们制造炸弹的技术得到了极大改进。这并不是说共和军的志愿军不再被自己的炸弹炸飞，这种情况仍然会发生；而是像一位作家评论的那样，这些不幸事件起到了残酷的“优胜劣汰”之用，将不合格的造弹匠剔除。[34]躲过劫难的都是更加小心谨慎的人。最终，临时共和军造就了一批传奇的炸弹制造者。他们逐渐创作了一份55页的详细说明，供未来的炸药专家学习，里面教授了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家用器具制作饵雷——蜡油和晾衣夹，以及啤酒罐做的钉子炸弹，由一根吸管充当引线。[35]

汽车炸弹于1972年初首次在北爱尔兰问题中被采用，它代表了一次可怕的尝试。因为在此之前，大多数炸弹的规模因其绝对的重量而受到限制，只有少数准军事组织成员能搬动它。把炸弹藏在车里，意味着你能装载大量炸药，然后只要把车开到目标地点就可以离开。在繁忙的商店放置手提箱或者塑料袋则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汽车是绝佳的伪装，因为它们随处可见。[36]“汽车炸弹提供了高效的容器和高效的运载系统，”西恩·马克·斯蒂奥芬于1975年写道，“不论是行政、工业，或是经济方面，它在任何行动中制造的破坏都要严重得多。而且只需要更少的志愿军，就能把它放置到目标地点。”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一辆无人照看的空车，无论里面究竟是否藏有炸弹，都可能导致人们因恐慌而逃走，并引来当局进行查看。[37]

2月，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持枪抢劫了六辆车，然后将它们开往爱尔兰共和国。[38]等到这些车于3月在都柏林街头重现时，它们已经被重新喷漆并装上了假牌照。[39]最终，只有其中四辆车会抵达英格兰：一辆福特海盗船、一辆希尔曼猎人、一辆沃克斯豪尔·维瓦——以及那辆绿色福特科蒂娜。[40]每辆车上都小心地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燃烧装置，包括藏在塑料袋里的一百多磅粉状炸药，以及一份条状硝铵炸药。[41]所有炸弹都藏在后排的车座下，一条长长的导爆索连接着炸药和副驾驶座下的盒子，里面装着由家用闹钟改装而成的定时器。

大约在行动的一个月前，杜洛尔丝·普赖斯前往伦敦执行了一次考察任务。[42]同行的还有她的小组成员马丁·布雷迪，他身材魁梧，眉毛浓密。布雷迪曾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餐厅工作，对这座城市很熟悉。“无名氏”自己选择了目标，随后递交贝尔法斯特领导层请求批准。[43]格里·凯利后来解释道，这些目标经过精挑细选，目的在于“引起特别的政治问题”。[44]英国公众或许已经对来自北爱尔兰的悲惨头条新闻见怪不怪，但发生在伦敦市中心的一系列爆炸案将改变这一切。共和军的行动时机同样别有用心。他们挑选了北爱尔兰的公投日，人们在当天就北爱尔兰是否应该继续属于英国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凯利认为，这次任务的目的，在于让英国人认清“殖民主义的现实”。[45]

3月5日，小组成员兵分两路。休·菲尼领导第一组成员，驾驶科蒂娜和维瓦登上都柏林开往利物浦的渡轮，穿越爱尔兰海。第二天，由玛丽安·普赖斯带队的第二小组驾驶的是海盗船和希尔曼猎人。然而当渡轮抵达利物浦后，猎人车在经过海关时被拦了下来。[46]检查人员发现，这辆车的牌照似乎有些不对劲。[47]开车的是马丁·布雷迪，年轻的罗辛·麦克尼尔尼坐在后面。[48]检查人员怀疑，他们可能想逃过进口关税将这辆车从爱尔兰共和国偷运到英国。[49]双方交谈的时候，麦克尼尔尼在车后座上忐忑不安，越来越紧张。[50]她借口说要上厕所便下了车。

过了几分钟她回来的时候，对布雷迪进行盘问的检查员被叫去处理一辆阻碍交通的卡车。[51]两名年轻的共和军在原地等待，不确定检查员回来后会怎么做。不过现在他们也妨碍了交通，于是另一名海关官员不耐烦地将他们放行了。依据原计划，剩余两辆劫持来的车本该随后登上另一艘渡轮，这样一共将有六辆车进入伦敦。但在经历了海关的惊心动魄后，小组成员生怕当局已经得到风声，他们向爱尔兰发回消息，告诉同事不要运送最后两辆车。[52]

作为小组的领队，杜洛尔丝·普赖斯没有乘坐渡轮。她用假名字巫娜·德夫林坐飞机从都柏林出发。[53]到了3月7日星期三，所有小组成员已全部潜入伦敦。[54]他们把载有危险货物的汽车停在了公用车库，接着入住了不同的旅馆。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第二天一大早，小组成员将把车开到市区的四个地点就位：白厅的英国陆军征募中心、迪恩·斯坦利街道的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新苏格兰场，以及老贝利。他们会事先发出电话警告。[55]有了死伤惨重的“血色星期五”作为前车之鉴，高层命令小组成员避免平民伤亡。[56]他们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前发出警告，闹钟定时器将在整整一小时后触发爆炸。那个时候，普赖斯和其他人都已经回到了爱尔兰——他们将于早上晚些时候从希思罗机场乘飞机返回都柏林。

星期三，等小组成员全部入住各自的旅馆后，他们对目标地点进行了侦察。“你们要装作互相不认识，”普赖斯告诉他们，“如果在街上碰到，你们要假装从来没有见过对方。”[57]她着重补充道：“不许沾酒。”日落之前，普赖斯让所有人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在英国国家美术馆

的柱廊集合。[58]他们要对计划进行最后的确认，并分发第二天的机票。

接着，他们晚上自由安排。你也许认为，在多人协作对一座重要城市进行恐怖袭击的前一天晚上，参与者会利用最后的时间进行焦急的准备。但或许是出于年轻，又或许是因为他们近乎幻觉般狂热的正义感，普赖斯和她的同胞们对于即将执行的任务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后果仿佛漠不关心。况且，他们在伦敦，这座城市比他们的家乡更大更无拘无束。它是英帝国的心脏，没错，但伦敦无疑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于是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决定去观光。[59]罗辛·麦克尼尔尼去了一趟白金汉宫。有些男组员无视普赖斯的警告跑去喝酒，其中一人喝到烂醉如泥，最后被同伴背出了酒吧。[60]

普赖斯的品位更高一点，她和玛丽安去了剧院。休·菲尼后来也跟去了，不过他迟到了，因为他想对汽车炸弹进行最后一次检查。他们谁都不觉得，在实施炸弹行动的前一晚上剧院有任何不妥。相反，菲尼认为，如果明早出现任何差错，他们要等很久才有机会看一场好戏了。[61]巧合的是，他们的伦敦之行恰好赶上皇家宫廷剧院的作品《自由之城》，这是由爱尔兰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创作的新剧。[62]这部戏由艾伯特·芬尼导演，它讲述了一个虚构但时下备受关注的故事，并和杜洛尔丝·普赖斯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三位民权抗议者在德里的市政厅躲避催泪弹和橡胶子弹——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遭遇伏击的前一晚，伊恩·佩斯利和邦廷少校就是在那里煽动追随者的。剧情随着一个误会急转直下。和平的抗议者躲在市政厅内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外面的媒体和英军却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持枪侵占市政厅的恐怖分子。这部戏的部分灵感来源于“血色星期天”，布赖恩·弗里尔亲眼见证了那场屠杀。戏剧讲述了北爱尔兰的和平民权运动是如何在疯狂、虚假和误会中被扭曲为暴力冲突的故事。[63]剧中的三名示威者最后死在了英军的枪口下。为了呼应“血色星期天”之后的包庇事件，剧中成立了特别法庭进行调查，并判定军方开枪属正当行为。

对于伦敦的观众而言，这是一个微妙的题材。剧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而且显得很不自在。[64]剧中有三位主演，包括一名年轻演员斯蒂芬·雷。他后来评价称，伦敦观众对于这部戏的反应“冰冷而无知”。[65]虽然雷是皇家宫廷剧院的一颗新星，但却是土生土长的贝尔法斯特人。他拥有迷人的外表，温和的面容衬托着探询的目光，蓬乱的黑发总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一样。说来也巧，他和杜洛尔丝·普赖斯彼此认识：雷曾在皇后大学求学，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在民权运动期间相识。[66]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普赖斯加入了临时共和军，而他成了一位著名的明星，在都柏林和爱丁堡参演戏剧，后来加入了皇家宫廷剧院公司。然而此刻，就在杜洛尔丝·普赖斯准备用炸弹袭击伦敦的前一晚，她竟然看着这个风度翩翩、聪明而迷人的年轻人扮演被误认为是共和军的民权示威者。

炸弹手们安排了黎明之前的叫醒服务。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办理了

退房手续。接着，趁着还有好的停车位，他们将车开到了既定地点。[67]当天的交通罢工为汽车炸弹创造了理想条件：因为停车规则暂时取消，警察没有理会那些通常会被拖走的车子。四辆车全部开到了各自的目的地：希尔曼停在陆军征募办公室，海盗船停在新苏格兰场，沃克斯豪尔停在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科蒂娜停在老贝利。[68]到了7点30分，所有炸弹就位，定时器设置在当天下午2点50分引爆。[69]刚过上午10点，大部分组员登上了一辆从克伦威尔路前往希思罗机场的巴士，准备搭乘11点20分的飞机返回都柏林。[70]（普赖斯姐妹和休·菲尼将按计划乘坐稍晚一点的飞机。）

伦敦警察厅的警察那天也起得很早。[71]上午7点，当炸弹手们驱车前往目标地点时，特殊巡逻队在威斯敏斯特的加农路警察局收到了有关共和军即将发动袭击的情况介绍。[72]警察接到指示要出去寻找可疑车辆。上级特别吩咐他们在可能性较大的目标附近查看，比如政府大楼。[73]交通罢工增加了这项挑战的难度：就在他们需要伦敦市中心的车辆越少越好时，反而有大量汽车涌入城内。[74]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两名巡警在苏格兰场巡逻时，发现一辆绿色海盗船没有纳税证。经过一番检查，他们发现这是一款1968年的车，但却装着1971年的牌照。他们留意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车牌照通常只有两个钻孔，而这辆车有四个。[75]透过车窗，警察看见一根弯弯曲曲的白色细绳从前排座位延伸到车后座，有一部分掩盖在车内的地毯下。[76]

警方召集了一组拆弹专家，他们发现车后座下装有将近200磅炸药。[77]根据一名调查者评估，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十分骇人”。[78]海盗船内散发着强烈的炸药味，盒子里的定时器正滴答作响。[79]其中一名炸弹专家抬起头，看到周围楼房的窗户边站满了观看他们作业的人。“让那些窗户边的蠢蛋赶快滚开！”[80]他吼道。拆弹小组的一名成员拿着连接定时装置的导爆索，与此同时他的搭档小心翼翼地将其切断。[81]

炸弹没有爆炸，他们拆除了引信。[82]在查看定时器的时针位置后，调查者推断其引爆时间原本在下午3点左右。[83]但由于时钟的分针被去掉了，所以具体时间很难确定。[84]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两件事。其一，假如城内还藏有其他炸弹，就必须在下午3点前找到它们。其二，定时器上长长的引信表明，炸弹手可能试图在爆炸之前逃出境外。所有港口和机场的特殊部门官员都收到了一份公告：封锁英格兰。[85]关闭所有出口点，对每一个准备离境的爱尔兰人进行盘问。

后来，在解释警方如何做到比炸弹手先行如此多步时，英国当局的说辞听起来仿佛这纯粹是因为他们撞了大运。[86]不过也有媒体认为，伦敦警方可能提前接到了城内即将遇袭的消息，而且涉及不止一枚炸弹。[87]对普赖斯姐妹而言，她们一直认为有告密者泄露了这次行动。[88]休·菲尼也有这样的怀疑，他后来表示：“我们被陷害了。”[89]

他们是对的：炸弹任务过去几十年后，特殊部门的一名退休官员透

露，炸弹引爆的14小时前他就得到了消息，他的信息来自临时共和军的一名高级成员。[90]这位官员提前了解到会有四枚炸弹，而不是六枚。他还知道炸弹小组包括一名年轻的临时共和军格里·凯利，以及“两个姓普赖斯的姐妹”。

尽管如此，当警方在伦敦市中心搜寻剩余的三枚炸弹时，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一座巨大的停车场，被静止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疯狂地搜寻可疑车辆，然而在对大致地点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定位剩余的任何一辆车。[91]炸弹完全可能在任何地方。临近下午2点，《泰晤士报》总部接到了警告电话，对方交代了汽车的地点和特征。然而即便如此，警局内部却发生了沟通上的失误，导致警方未能及时赶到剩余三枚炸弹的现场。《泰晤士报》的记者马丁·哈克比先于警察20多分钟找到老贝利外的科蒂娜。[92]在拆弹专家还未赶到，并且警察开始跑进周围楼房疏散人群的时候，宝贵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流失。

老贝利大楼内正在审理几桩刑事案件：一间法庭里，毒品阴谋案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另一间法庭里，法官正在向陪审团陈述一桩谋杀案的判决。[93]突然间，有人冲进法庭让所有人离开——有炸弹即将爆炸，就在大楼外面。[94]法院对面有一家叫乔治的酒吧，里面坐满了下午来喝酒的客人。就在此时，有人跑进来大声说街上有炸弹。一些顾客直接往酒吧深处走，挤在酒吧的后面。[95]而其他人望着平静晴朗的午后，认为这绝对是一出恶作剧，并打算就这么待着。[96]自30年前的闪电战后，伦敦还未经历过严重的爆炸。这似乎是一件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有些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伸长脖子观看拆弹小组作业。[97]技术人员试图拆除炸弹的引信，但未能成功，前排座位下的定时器仍在滴答作响。临近3点，当警察还在努力疏散周围的人群时，一辆校车开了过来，距离科蒂娜不到50米。[98]车上有49名小学生，他们此行是为了实地参观圣保罗大教堂。[99]随着定时器的时针走向3点，孩子们开始下车。[100]

当大部分炸弹小组成员坐上巴士前往希思罗机场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有关警方发现第一枚炸弹并拆除引信的新闻。炸弹手们没有听到这个公告，所以他们抵达机场时，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当局追捕的目标。[101]据他们所知，任务正在按计划进行，他们即将顺利返回爱尔兰。他们来到1号航站楼的4号门，出示了英国欧洲航空飞往都柏林的机票，这趟班机的起飞时间是11点20分。[102]事实上，有些炸弹手已经登上飞机坐了下来。但就在这时，有官员进来命令所有人下飞机。[103]

杜洛尔丝、玛丽安和休·菲尼计划在12点30分搭乘爱尔兰航空公司的一趟班机。[104]等他们到达希思罗机场时，其余组员应该都已在返航的途中。然而当他们走进航站楼时，特殊部门的官员正等着他们。[105]“你们要飞往都柏林吗？”其中一名官员问，“请跟我来一下。”[106]

他们遭到了拘留，并被带往等候区接受盘问。但由于共和军计划让小组成员在所有炸弹还未爆炸之前离境，这些志愿军谁也没能编造出任何有丝毫说服力的借口。[107]有的说他们来伦敦是为了找工作[108]，还

有的说他们住在贝尔格雷夫路，去当地一家酒吧喝醉了（这还算得上属实）。[109]他们给出的全是假名字——杜洛尔丝坚称自己叫巫娜·德夫林——同时否认彼此认识。[110]被问到炸弹的问题时，他们都面带愠色沉默以对。（有件事当时官方并不了解，他们后来才知道，炸弹小组有一名成员——也就是第十一个炸弹手——不见了。[111]其他人在机场被捕之前，他就溜走并潜入了伦敦地下。他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当局也未能将他俘获。）

“我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你，”玛丽安·普赖斯对审问她的高级警官说，“你无权把我关在这里。”[112]她继续拖延，不愿开口。已经过了下午2点，警探们知道时间所剩无几。他们向玛丽安追问其他炸弹的下落，可她就是不说。玛丽安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盒式挂坠，她不断把它放进嘴里焦虑地咀嚼。跟她面谈的总督查突然意识到，那个挂坠可能含有某种类似氰化物的毒药。[113]他从她身上把它抢了过来，却发现那只是一个耶稣受难像。总督查越来越沮丧，骂她是个“邪恶的小疯子”，还说她要过很久才能重见天日。[114]

但玛丽安·普赖斯什么也没说。她的举止有种机器人的感觉，就像出神了一样，其余的炸弹手也是如此。[115]警探们开始好奇，或许他们接受过一些有关如何对抗审问的指导。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件东西，就像被催眠一样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说。[116]然而，快到下午3点时，玛丽安特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117]

总督查压住心中的怒火说道：“我是不是该认为其他炸弹的定时器刚刚到点？”

玛丽安·普赖斯笑而不语。

白厅街上，吃完午饭的人们正在怡人的天气里慢慢往回走。这时，警方终于发现了停在陆军征募中心的希尔曼猎人。[118]警察冲进周围的大楼让所有人撤离。距爆炸还剩五分钟时，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的一名炸弹专家砸碎车窗爬了进去，他试图解除引爆装置。[119]但现在没时间了，他又爬了出来。他用系在一根长绳上的挂钩抓住连接定时器和炸药的引信，然后躲到一栋大楼的拐角开始拉引信。他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于是请身边的一位警察队长帮忙。两人刚开始再次拉动引信，定时器的时针便走到了终点。[120]

一簇火焰冲上了十几米的高空，希尔曼猎人被炸得支离破碎。[121]伴随一声沉闷的轰响，巨大的震颤将附近区域的人们从路面弹起。[122]方圆400米内，办公楼和商店的窗户全部被震碎。[123]爆炸的冲击波掀掉了警察头上的头盔，细小的玻璃和金属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去。[124]


伦敦爆炸的现场之一

街道上方升起了一团乌黑的蘑菇云，刺鼻的烟雾如巨浪般在建筑之间翻腾。[125]一根煤气主管道的破裂造成了更多烟雾喷涌而出，以至于消防员赶到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们开始在灾难现场拉出水龙带。[126]人们的皮肤被碎玻璃划伤，在一片茫然中跌跌撞撞。[127]几十辆车被爆炸掏空，像纸片般拧作一团。[128]

爆炸的砰然巨响在整个伦敦市中心回荡。迪恩·斯坦利街上，当局刚刚找到并解除了第三枚炸弹，即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前的沃克斯豪尔·维瓦。[129]但等警方确认停在老贝利的那辆车时，已经为时太晚。一名警察跑向校车朝刚下车的孩子们大喊，让他们赶快逃命。[130]孩子们照做了，一边尖叫呼喊，一边朝一处拐角跑去。[131]

一名警方摄影师正在给科蒂娜车拍照，突然间他被甩到了街对面。[132]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乔治酒吧的外观被毁，酒吧间如同玩具屋里的房间暴露无遗。[133]一名警官在老贝利大楼内撤离陪审员时，被冲击波甩到了六米开外。[134]另一名警察正骑着自行车路过，结果被甩到了一面墙上，强大的冲击波扯掉了他的制服。[135]《泰晤士报》记者马丁·哈克比的脸和双手被割伤，后被送往圣巴塞洛缪医院。[136]人们血流满面，在浓烟中艰难前行，有的试图逃离，有的试图帮助其他人。[137]然而爆炸附近的整个区域都笼罩在浓密热辣的烟尘里，让人无法看清。[138]小学生们总算逃到了安全地带，但有许多受伤的人躺在人行道上。[139]遍地都是厚厚的碎玻璃，如同海边的沙砾，在人们的脚下沙沙作响。[140]

这种场景在北爱尔兰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和伦敦格格不入。[141]对那些年纪足够大的目击者而言，这就像闪电战的昨日重现。两枚引爆的炸弹造成将近250人受伤，救护车匆忙赶来救治伤者。[142]偏偏不巧的是，那个星期不仅赶上了交通系统罢工，当地医院的非医疗人员也在罢工。尽管如此，当看到流血的患者被抬进急救室时，人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跑进医院提供帮助。[143]58岁的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是希尔盖特机构的看管者，就在老贝利隔壁。[144]他在爆炸中受伤，满身是血。但他拒绝了医护人员让他去医院的要求，坚持帮助其他受伤的幸存者。数小时后，米尔顿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医院去世。[145]

随后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心脏病事实上在爆炸前就发作了，因此医疗证据不支持谋杀的指控。[146]杜洛尔丝·普赖斯将爆炸的人员伤亡归咎于英国当局，责怪他们在接到警告电话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定位并拆除炸弹，也没有及时警告民众。[147]炸弹小组的其他成员秉持同样的观点。[148]这显然是方便的托词，从道德角度而言，其虚伪显而易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普赖斯并没有完全说错。[149]警方在袭击过后亲口承认，他们的控制室出现了“人为差错”，老贝利的炸弹信息没有被准确传达，导致行动反应严重滞后。

一名英国检察官后来推断，共和军此次任务的目的是杀人，而且他们在炸弹团伙于机场被捕后才打出警告电话的事实也并非巧合。他提出，这通警告电话不过是共和军在得知战友被捕后的自私举动，他们想在紧急关头努力争取从轻处罚。[150]但不论炸弹手们如何冷漠、如何无能，他们前往伦敦的目的似乎不太可能是制造屠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伦敦杀人，那这件事易如反掌，杀死平民太容易了。”布伦丹·休斯后来说。相比“血色星期五”，伦敦任务被设想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袭击，理想而言不会造成流血。然而强大的炸药不会给你任何铤而走险的机会，计划的展开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休斯并不是特别关注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令他追悔莫及的，是没有把炸弹手们“藏在”英格兰——让他们在伦敦市内或者周围合适的地方隐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让他们单独或成组潜回爱尔兰。[151]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共和军试图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一错误的决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炸弹小组的成员从希思罗机场被带往附近的警察局。他们被脱去衣服，好让炸药的残留物接受司法鉴定。[152]杜洛尔丝·普赖斯光着身体被拍了照。[153]警方给他们提供囚服时，有些组员穿上了，但普赖斯姐妹和其他几人拒不接受。[154]这是共和党的原则：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罪犯，而是来自正规军队的被俘士兵——也就是政治犯。有了这个区别，他们不愿接受普通罪犯穿的囚服。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用粗糙的监狱毛毯包裹身体。休·菲尼连毛毯也不要，他就这么明目张胆一丝不挂地站在牢房里。这些囚犯全部被分开。不过有一次，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讯问室里匆匆碰了一面。杜洛尔丝严厉地低声对妹妹道：“什么也别说。”[155]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托马斯·瓦利戴是朗·凯什的一名囚犯，他在里面当勤杂工。[1]这要求他开着垃圾车到监狱的各个角落把垃圾装上卡车。任何一座监狱的生活，基本都归结于每日常规的枯燥重复，瓦利戴的工作也一样：值班开车，捡起垃圾，扔上卡车。有时，除了普通垃圾，瓦利戴会发现由于弄脏或破损而被丢弃的床垫。囚犯们会把床垫和垃圾一起放在带刺铁丝网的外面，铁丝网包围着他们生活的半圆形牢房。19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卡车停在了一间牢房外，有一个卷起的床垫扔在那里。当瓦利戴走过去捡起床垫时，发现它比正常情况重得多。[2]不过他还是抱起床垫扔到了卡车的底层。如果说瓦利戴没有对这张重量抵得上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床垫表现出任何怀疑，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像香肠卷饼一样的垫子里，藏着布伦丹·休斯。[3]

休斯早在被抓的时候就告诉过警方他意图逃出监狱，他并没有开玩笑。去年夏天，到达朗·凯什还没到36小时，他就开始和同党们密谋出逃的最佳策略。[4]格里·亚当斯认为，鉴于行动在武装斗争现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休斯在这些行动中举足轻重的带头作用，应该让休斯先逃出去，连亚当斯都要排在后面。[5]但迄今只有两个人成功从朗·凯什越狱——这是一座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且重兵把守的监狱——而且从本质上说，这两个人都不是“越狱”出去的。第一个逃狱的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也就是那位曾在秘密军事场所遭受酷刑的“蒙面人”。1972年2月的一天，麦圭根穿上一套借来的黑色长袍，混在来访的一群牧师中间，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了出去。[6]18个月后，另一个叫约翰·弗朗西斯·格林的人利用完全相同的计策逃了出去。[7]（格林的哥哥确实是一位牧师，他来监狱探监时，两人交换了衣服。）

如果还有神职人员想离开朗·凯什，他们很可能要接受更加严格仔细的检查。所以假如休斯想逃出去，为了谨慎起见，他必须另辟蹊径。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藏在垃圾车的底部搭便车离开。[8]这个策略让人联想到荷马的《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紧抓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洞穴。[9]囚犯们为休斯制作了一个特殊的背带穿在身上，好让他能依附于卡车的底盘。他在牢房的一张双层床上进行了排练，抓住上铺的下方。不过，休斯在审问期间挨打受的伤还未恢复，他不确定自己的体力是否可以支撑他攀附在卡车下，直到车开出监狱的围墙。[10]所以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当时这可能令休斯感到失望，但结果却成了塞翁失马：几个月后，另一名囚犯马克·格雷厄姆试图用相似的途径出逃[11]，但卡车在跨过一道斜坡时折断了他的脊柱，导致他终身瘫痪。

10月底，临时共和军策划了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一次越狱。共和军领导人谢默斯·图米被关在都柏林的芒乔伊监狱，一架被劫持的直升机在监狱的院子里从天而降，它停留的时间不多不少，刚等图米

和他的几名同伴跳上去就开走了。[12]这种先例让休斯和他的伙伴们信心倍增，但也意味着监狱的安保措施更加严密。临时共和军知道，垃圾车每天会收集两次垃圾，然后才离开监狱开往垃圾场。[13]他们听说，卡车在获准离开之前，守卫会用一把长矛刺探所有的垃圾袋，以确保没有人藏在里面。不过，共和军在监狱里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14]这些线人表示，守卫们最近没有用长矛。

那天，休斯爬到一张旧床垫的中央，其他人帮忙把他卷了起来。[15]在托马斯·瓦利戴的协助下，他最后落到了卡车的后背上。车继续在监狱里行驶，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把垃圾扔到休斯身上。他要做的就是等待。可是廉价的监狱床垫里塞满了锯末，弄得到处都是。纤维状的锯末令人发痒，难以呼吸。休斯带了一个橘子，用来补充水分和血糖。他把橘子塞在嘴里，但锯末钻进了他的鼻子，令他呼吸困难。[16]卡车在监狱里不慌不忙地转悠，然后停了下来。[17]休斯听见瓦利戴小声告诉他，他们还不能离开监狱，卡车要等着收集更多垃圾。[18]他建议休斯起身溜回牢房。下午4点会清点人数。[19]要是休斯不见了，守卫会封锁监狱并拉响警报。

他没动。瓦利戴不见了，但休斯藏得很好，而且卡车迟早会离开。他躲在床垫里，看不见周围的情况。然而此刻，他清楚地听到了英国士兵的口音。垃圾车开到了英军的驻地，士兵们就住在那里。[20]卡车非但没有把他带出自由之门，反而直接将他送到了监狱最危险的地方。锯末渗入了他的双眼，他难受到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21]休斯安静地躺着，期望不会有人发现他。[22]

一段短暂而漫长的时间过后，卡车又开始移动起来，并朝出口开去。休斯非常清楚此刻会发生什么：卡车会跨过两道斜坡，接着右转离开朗·凯什。然而就在他们快到斜坡的时候，卡车又停了下来。休斯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间，一把巨大的长矛紧挨他的左侧猛地刺入了垃圾里。[23]

显然他接到的情报有误。休斯躺在那儿，不敢动弹。随后，长矛刺穿了他另一侧的垃圾袋。现在他决定直接站起来骂人，干脆投降算了，因为躺着不动无异于自杀。如果长矛再刺下来，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他想象了这幅画面：长矛直接刺穿他的身体。[24]这么死实在太荒唐了，在垃圾车的后面像鱼一样被叉死，全身都是锯末，嘴里还塞着一个橘子。休斯在贝尔法斯特老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25]这太疯狂了。正当他准备向上面的人亮出身份时，卡车伴随着隆隆声再次启动。[26]它经过了第一道安保斜坡，接着第二道。最后，休斯感觉卡车右转了一下。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离开了监狱。

当卡车沿着开阔的道路行驶时，休斯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折刀，试图划开床垫爬出去。但这把刀不听使唤，刀片直接弯向了后面。他又抓又踢地爬出了床垫，一些垃圾也随之被踢到路上。他担心司机也许会从后视镜里发现掉落的垃圾，不过卡车并没有停下来。

在希尔斯伯勒路的尽头，休斯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会向右急转弯，接着是一个左急转。这似乎是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从车后跳下去的最佳时机。于是当卡车转弯的时候，休斯跳下了车。他注视着卡车开走，担心司机可能已经看见了他。但车继续朝垃圾场的方向驶去。

休斯满身污秽地站在那里，一只眼睛肿胀得无法睁开。格里·亚当斯安排了一辆车在外面接应他。但由于卡车收集垃圾的时间远比预期要长，休斯显然已经错过了此次约会，那辆车不在那儿。不仅如此，这里也不是那种休斯能直接走进当地酒吧的地方，他不能像“七壮士”从“梅德斯通”号越狱后那样，指望里面的客人贡献自己的衣服和协助逃跑的车。相反，休斯发现自己此刻正在保皇派的地盘上。这里不但是敌人的区域，而且他和朗·凯什的距离也不够远。一旦他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他失踪了，士兵将涌向周围的整个地区。他必须到爱尔兰共和国去。他现在是北爱尔兰的头号通缉犯，而且他的时间所剩无几。

炸弹在外面引爆的时候，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正坐在老贝利顶楼的图书馆里。[27]巨大的轰隆声在楼下回响，他身上撒满了碎玻璃。[28]曼斯菲尔德32岁，是一名雄心壮志同时略显浮夸的英国律师，他有着蓬松的头发和浑厚的嗓音。[29]最近他打赢了自己接手的第一场重要官司，那是一起在老贝利进行的长达数月的诉讼。[30]被告方是所谓的“愤怒旅”，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保守派部长的家里安置炸弹，企图以这种方式引发全球革命。曼斯菲尔德在此次案件中的委托人叫作安吉拉·韦尔，这名年轻的女性最后被无罪释放。这起针对她的案件因为笔迹证据而翻案，曼斯菲尔德通过仔细检查彻底推翻了政府专家的证词。他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激进的政治思想，并发现那些引起棘手问题的案件吸引着他，促使他思考独裁权力和反抗的本质。[31]曼斯菲尔德用受理“愤怒旅”案件所赚的钱买了一辆车——一辆小型二手凯旋2000。[32]

由于交通系统罢工，曼斯菲尔德在爆炸当天开了车去上班。快迟到的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停车位，随后他发现停车限制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想，也许能在老贝利的正门找到车位。他很幸运，那里有一个空位，就在一辆绿色福特·科蒂娜不远的地方。[33]

曼斯菲尔德在爆炸中受的伤并不严重，但他的凯旋车被炸得体无完肤。[34]没过多久，曼斯菲尔德被问到是否愿意代表那些炸毁他车子的人接手案件，也就是年轻的爱尔兰炸弹手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法律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富于进取的诉讼律师喜欢为声名狼藉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尤其因为这种曝光往往能提升其业务的知名度。但共和军爆炸案被认为是对伦敦的严重侮辱，许多知名律师出于原则不愿接手这一案件。[35]

曼斯菲尔德愿意。他十分好奇地想见见姐妹俩。见面后，他立刻被两人的美丽和强烈的献身精神所打动。[36]她们蜷起双腿抱着膝盖坐在塑料椅上，向他讲述了天主教徒在爱尔兰北部所受的虐待，还有突袭拘

捕事件，以及“血色星期天”。她们回忆了在伯恩托莱特桥上遭遇保皇派团伙的围攻。[37]曼斯菲尔德比她们大不了多少。他为自己激进的政治立场感到自豪，但他选择通过算不上革命性的法律职业来追求这些政治诉求。他猛然意识到，普赖斯姐妹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在真正意义上“游走于刀尖”的生活。[38]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连同被捕的另外八人被指控共同谋划了“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爆炸案”。[39]通常而言，这种庭审会有一个公认的举行地点：老贝利。但经历爆炸后，老贝利大楼仍在维修中，同时政府希望加快诉讼的进程。[40]除此之外，在法庭上对故意毁坏该法庭的一群被告进行审判，或许会让人们觉得有失公允。因此，这桩于1973年秋开庭审理的案件，被重新迁至温彻斯特城堡大厅。那是一间壮观的13世纪会议厅，由中世纪石料、大理石圆柱以及彩色玻璃构成。1603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因密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判处叛国罪。[41]一面墙上挂着亚瑟王圆桌的巨大橡木复制品，一束都铎玫瑰上的绿色油漆散发着光芒。[42]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的入案照片

普赖斯姐妹和她们的共同被告在开往温彻斯特的巴士上唱起了反叛的歌。[43]审讯期间，每天早上都有摩托车和警车组成的车队护送这些被告出入。[44]爆炸事件引发了如此歇斯底里的情绪，以至于诉讼进程的安保投入极端到近乎戏剧化。[45]为了防止汽车炸弹袭击，整个周边地区都实施了全天停车禁令。警方的神枪手在附近的楼顶巡查。[46]（这可能并非全无道理：后来发现，共和党试图买下被告们被关押的监狱正对面的一栋房子，以期挖一条直通牢房的地下隧道，把他们救出来。[47]结果这栋房子的当地女主人由于感情原因重新考虑了出售房子

的打算，计划也随之流产。）当巴士在全副武装的警卫的护送下驶向大楼时，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对外面的观众亮出了胜利的手势。[48]

这次审判是一桩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电影《放大》中的角色而闻名的女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自愿为被告支付担保金，并贡献出她在西汉普斯特德的房子供他们歇脚。[49]（炸弹手们没有被释放，谁也未能接受她宽宏大量的提议。）英国公众和媒体尤其关注杜洛尔丝和玛丽安。[50]她们被冠以“恐怖姐妹”的绰号，并被刻画成了危险至极的人物。对《泰晤士报》而言，杜洛尔丝成了政治激进主义和反主流文化不稳定性的典型代表，称她“热衷于广义的暴力世界革命，并支持切·格瓦拉、黑豹党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多重目标”。[51]姐妹两人中她可能占主导地位，报纸继续评论道，但“在玛丽安的轻声细语和表面的单纯之下，藏着一个精通游击战艺术的19岁少年”，对步枪的娴熟使用为她赢得了“阿玛莱特寡妇”的绰号。[52]《每日镜报》在两姐妹身上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趋势，并陈述道：“一直以来，女性被认为是被动而热爱和平的造物，她们只想待在家里看孩子。这个传说最终在爆炸和枪击的巨响中灰飞烟灭。”通俗小报直接将普赖斯姐妹和巴勒斯坦劫机者莱拉·哈立德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女权主义的危险副产品——是一种“致命的解放”。[53]

9月开庭的时候，首席检察官彼得·罗林森爵士——一位温文尔雅有着悦耳嗓音的大律师，报纸将其誉为“司法界的劳伦斯·奥利维尔”——指出，汽车炸弹虽然在伦敦前所未有，但在北爱尔兰却司空见惯。[54]“那些安置汽车炸弹的人可以躲到安全的地方，”罗林森说，“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在数英里外安然无恙。这是一种十分懦夫的行为。”[55]当罗林森展示那天可怕的详细情况时，他专门指出杜洛尔丝·普赖斯是团伙的领头人，“这个女孩在此次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6]

姐妹两人表现得坚决而反叛。除了19岁的威廉·麦克拉尔农在开庭第一天服罪外，所有被告都坚称自己无罪。[57]杜洛尔丝说，她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飞往伦敦，是为了和妹妹以及她们的朋友休·菲尼一起度个短假。她用了巫娜·德夫林的假名字，是因为作为知名共和党人的女儿，她经常被当局找麻烦，提供假名字几乎已经成了第二天性。[58]两个女孩在法庭上出言不逊，无所顾忌，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当控方展示出迈克尔·曼斯菲尔德那辆被炸毁的凯旋车照片时，她们暗自发笑。[59]（曼斯菲尔德可高兴不起来，他告诉两人幸好他当时没在车里。）

在为期十周的庭审中，被告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太极”。然而有大量间接证据将他们和此次犯罪活动联系起来。在为期数天耗费12个小时的一项陈述中，罗林森详细陈述了爆炸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每一个被告的具体指控。[60]当杜洛尔丝在希思罗机场被官员拦下的时候，她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帆布购物袋。[61]里面除了布赖恩·弗里尔的戏剧节目以及所谓的“大量化妆品”外，警方还发现了两把螺丝刀和一本活页笔记本。[62]笔记本里有几页写满了闲散的笔记：其中一页记录了对圣母玛利亚的神学思考，另一页写着一份食物清单和对应的卡路里含

量。[63]不过，调查者还注意到有几页纸被撕掉了。一名专业法医证人检查了笔记本剩余的几页，并向陪审团揭示了所写内容若隐若现的印迹。那是一幅炸弹定时器的示意图。[64]

这对曼斯菲尔德的辩护是一个困难的转折。尽管他曾成功推翻笔迹鉴定专家的证据，但他无法辩驳笔记本提供的强大说服力。然而即使曼斯菲尔德据理力争，他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挑战：有一名被告已经决定跟警方合作。

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罗辛·麦克尼尔尼——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打字员——在爆炸发生后最初接受警方讯问时，和其他炸弹手一样不肯松口，坚称自己不是共和军的成员。“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她说，“我只是来这里度假的。”[65]

但随着审讯的继续，她开始招架不住了。“我信仰爱尔兰统一，”她告诉调查人员，“但我不相信暴力。”他们继续做她的工作，最后她突然说道：“我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否则我会被枪毙的。”

麦克尼尔尼说，她六个月前刚刚加入共和军。[66]一天晚上，她在酒吧里随着爱国歌曲唱歌时，有人走过来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为爱尔兰做出贡献。她对警方讲述了自己在炸弹行动中的角色，但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无用的次要人物，完全处于小组边缘。[67]虽然麦克尼尔尼对当局进行了坦白并同意合作，可她拒不认罪。尽管她在爆炸过后做了详细的供认，但其他人直到庭审开始才发现她背叛了他们。[68]

如果说普赖斯姐妹和她们的同伴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士气。庭审期间，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坐在被告席的尽头，她们会朝旁听席的支持者微笑挥手。当她们的老朋友埃蒙·麦卡恩，也就是在伯恩托莱特游行中和她们初次见面的德里活跃分子，来到法庭和她们的家人一起坐在旁听席的时候，他们会彼此使眼色并挥手致意。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已经飞往伦敦出席庭审，麦卡恩惊叹于普赖斯父母挺拔的姿态和骄傲的神情。[69]但他突然意识到，眼看着女儿面临终身监禁，他们强装镇定的外表下一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被告穿着自己的衣服出庭。杜洛尔丝挑选的着装引人注目——长衫、无袖女装和毛衣。[70]她一向习惯于表演，而法庭无疑已经变成了舞台。[71]随着诉讼的缓慢推进，她在爆炸发生时的一头红色精灵短发逐渐开始长长。

如果说杜洛尔丝有时看上去对待审判漫不经心，她偶尔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决心。当彼得·罗林森问她是否支持共和军的“目标和原则”时，杜洛尔丝回答说她可能会，“只要彼得爵士对‘目标和原则’的理解跟我一样”。当他要求她进一步阐明对这些目标的看法时，杜洛尔丝说，对她而言，共和军的“长期目标在于重新统一爱尔兰，让全体公民充分享有宗教自由”。[72]

塞巴格·肖法官插话问道，她是否认为推进这些目标应该诉诸暴力。“我没有这么说。”普赖斯回答道——她谈论的是目标，不是为了实现它们而可能采用的正当手段。她以这种方式和公诉人及法官进行辩论，没有因他们庄重的假发形象而局促不安，也没有因庄严的环境或密集的安保人员又或者她所面对的严重指控而胆怯。随着审判的推进，普赖斯和她的被告同伴们开始公然对肖法官起哄，驳斥法庭的道德权威，嘲弄目击证人，并共同表现出对整个诉讼的蔑视。[73]

11月宣布判决的当天，杜洛尔丝穿了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系了一条粉红丝带。[74]法庭上戒备森严，所有进入的人必须在门口接受搜身。[75]被告在15名狱警的陪同下坐上被告席，后者坐在了他们身后。[76]在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看来，所有的安全措施似乎都是为了营造“有罪的氛围”而设计的。[77]自案件开审以来，有一名保镖一直坐在肖法官身后看不见的地方，但今天他公开坐在肖法官的长凳旁边。[78]附近的百货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炸弹恐吓事件，临时法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吵闹的爱尔兰人，他们远道而来支持这些被告。[79]当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鱼贯而入宣读判决时，四排便衣警探进来坐在了他们身后。[80]就在审判即将开始时，警卫们采取了最后的安保措施，他们拴上了法庭的门。

在对普赖斯和其他被告进行判决之前，肖法官宣布陪审团裁决罗辛·麦克尼尔尼无罪。[81]麦克尼尔尼是个娇小的女孩，那天她画过眉毛，身穿一件粉色宽松上衣，肩搭一条白色披巾。肖法官对她说，希望她已经吸取教训，“不要再涉足残暴的事业”。提到她背叛同党的决定时，肖法官表示：“我不知道你离开法庭后还会面临怎样的危险。”[82]当麦克尼尔尼被领出法庭时，其余的被告开始哼起一首曲调，整齐的声音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83]他们唱的是亨德尔的《扫罗》中的《死亡进行曲》，那是葬礼的标准曲目之一。休·菲尼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枚硬币朝麦克尼尔尼扔了过去，并大喊道：“给你的赏钱！”[84]她哭着跑出了法庭。[85]

其余的被告全部被定罪。等到宣判的时候，肖法官宣布了最高刑罚，即所谓的无期徒刑。对其中五名炸弹手而言，这实际上代表20年监禁。对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以及休·菲尼，肖法官根据他们的领导角色宣布了更严厉的惩罚：30年。杜洛尔丝出声说道：“这等于是死刑。”[86]

肖法官似乎自觉这一处罚过于严厉，他宣布将对普赖斯姐妹和菲尼减刑至20年监禁。[87]然而被告们开始公然表达自己的不满。[88]慌乱的肖法官命令他们在法庭上保持肃静。“不要！”普赖斯姐妹俩回应道。

被告们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拒绝谈论他们的共和军身份，现在却全部开始直言不讳，他们尖锐的政治言论得到了公共旁听席上的亲朋好友的喝彩。“我以共和军志愿军的身份站在这里！”玛丽安·普赖斯宣称，“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战俘！”[89]

“临时共和军雄起！”观众大喊道，“绝不屈服！”[90]

“你们不能把被告席当成政治舞台，”肖法官大声疾呼，“这里是法庭！”[91]然而现在判决已经宣布，谁也没有理会他。

“爱尔兰民族的胜利就在眼前！”休·菲尼呼喊道，“她是不会屈服的！”[92]

罗辛·麦克尼尔尼在武装警卫的围绕下被迅速带走，当局已经为她安排了新的身份。[93]她得到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份新档案，并被告知永远不能返回北爱尔兰。[94]她的所有物从安德森斯顿的家里被带走并储存起来，等她开始了新的生活再运送给她。“别搞错了，”贝尔法斯特临时共和军的一名领导人告诉媒体，“她是逃不掉的。”[95]但临时共和军从未抓住麦克尼尔尼。她离开法庭后变成了另一个人，从此销声匿迹。

在被押离温彻斯特城堡之前，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宣布她们准备进行绝食抗议。[96]她们将拒绝进食，直到其政治犯的身份得到承认，并返回北爱尔兰服刑。[97]姐妹俩被送进了布里克斯顿监狱，里面关押的全部是男性囚犯。然而她们被视为极其危险的人物，以至于把她们关在那里成了无可厚非的例外。杜洛尔丝会在监狱给妈妈克丽茜写信，她在信中表示，要么英国政府同意她们的要求将她们送回北爱尔兰服刑，要么她们饿死以后遗体被送回贝尔法斯特埋葬：“不管以哪种方式，我们将在新年到来之前返回北爱尔兰。”[98]

十三　玩具推销员

亚瑟·麦卡利斯特是一名玩具推销员。他租住在墨托菲尔德庄园一栋优雅砖房的一楼，那是贝尔法斯特市郊的中产阶级街区。[1]即使在北爱尔兰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在这树木繁茂的郊区，宗派冲突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枪战有时似乎也只是发生在劳动阶层的现象，很少触动这片更为稳定富有的区域。麦卡利斯特的公寓前有一排常春藤缠绕的篱笆，周围环绕着古树和一片雅致的草坪。每天早上，他会提着一个装满玩具样品和目录的箱子出门，驱车在更广大的贝尔法斯特穿行，不时走进商店看是否有业主对他的商品感兴趣。他身材矮小，外表一丝不苟，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理得整整齐齐。[2]他的穿着对他选择的工作而言似乎有些过于正式：说到底，麦卡利斯特只是一个上门推销员。然而当他出门工作时，他西装革履的样子看起来像个银行家。[3]

197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这片市郊社区的安宁被一队警车和装甲车打破。[4]它们穿行在街道上，最后突然停在了墨托菲尔德庄园的那栋房子前。英国军队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子。事实上，一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前一晚在花园的杜鹃花丛里藏了一夜。[5]他在那里监视了很久，以至于他的战友担心他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他们试图稍微给他送点补给，结果出了岔子。有人拿着一份炸鱼薯条经过那里，却意外把食物扔进了别的树丛。

这次监视以及上午突袭的对象，是玩具推销员本人。随着车辆发出刺耳的急停声，士兵和警察冲进了房子里。他们发现了麦卡利斯特，并将他强行按在墙上。他极其愤慨地坚持自己的清白，并声称官方擅闯无辜平民的家是厚颜无耻的行为。然而警官们似乎对他玩具推销员的身份并不买账，甚至不相信他的名字叫麦卡利斯特。

“省省吧，黑鬼。”一名警官说道，“你逍遥的日子该到头了。”[6]

借着垃圾车逃出朗·凯什后，布伦丹·休斯最后成功搭上了一车吉卜赛人的便车，接着又让一个英国人顺路载了他一程。[7]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休斯突然想到，这个英国人说不定是休班的看守，就来自他刚刚出逃的监狱。不过即使这个人真的是朗·凯什的员工，他也没有认出搭他便车的人是谁。休斯一路来到了纽里，并在那里拿到了一些钱，这些钱是他专门为这种意外之事储备的。接着，他搭乘出租车穿越边境向邓多克驶去。

在到了爱尔兰共和国并处境安全以后，休斯立刻开始感觉到贝尔法斯特的强烈召唤。他已经在朗·凯什的铁丝网内浪费了几个月，现在渴望回去参与行动，不过他知道，他不能返回熟悉的西贝尔法斯特。那里局势过于紧张，而他太引人注目。如果说去年夏天他和亚当斯的落网标志着当局的重大胜利，那么他的出逃则更让官方颜面尽失。休斯若想安全

回到贝尔法斯特，只能隐姓埋名。于是，他决定伪造一个新的身份。他在墨托菲尔德庄园租下了那间房子，并开始构建另一个自我。[8]他采用了新名字亚瑟·麦卡利斯特，剃去了标志性的小胡子，将头发剪短并染色，努力呈现出和过去举止粗野的邋遢汉截然相反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他跟亚当斯在福尔斯路被捕后警方拍下的样子。亚瑟·麦卡利斯特这个人真实存在，或者说曾经是——他已于襁褓中夭折，但假如活下来，他将和布伦丹年纪相仿。[9]通过采用这个名字并为之构建一个人物，休斯创造了许多间谍所说的“传奇”——一个连贯的双重身份。（他后来表示，这种神秘间谍情报技术的灵感来自惊悚片《豺狼的日子》，这部电影于1973年上映。）[10]

变成来自墨托菲尔德庄园的亚瑟·麦卡利斯特，意味着休斯能以中产阶级玩具推销员的身份回到贝尔法斯特。更重要的是，这使得他在城内的行动变得畅通无阻：突然之间，他可以穿越宗教的界线，提着装满玩具的公文包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点进行秘密会议。有时他会在路上被英军拦下，但他们从未怀疑过他的说词——毕竟，他提着装满玩具的箱子，驾驶证上的名字也写着“亚瑟·麦卡利斯特”。[11]临时共和军明白，英国人要是知道休斯正在街头逍遥法外一定会恼怒不已。他们偶尔会在休斯乔装露面后公开自吹，向英方发起挑衅。有一次，在弥尔顿公墓举行的复活节庆典结束后——当局通常会密切监视这类活动——共和军宣称休斯出席了此次庆典，“就在英军的眼皮底下”。[12]

“我当时的任务就是将英国人拖入战争，”休斯后来说道，“我对自己的任务很拿手，也做到了。”[13]他假借亚瑟·麦卡利斯特的身份策划了许多野心勃勃的行动。但他在那段时期最大胆的计划是成功窃听了英军总部。[14]并非只有英国人喜欢实施间谍行动。休斯呼吁共和党的技术专家想办法渗透英军的通信。一名当地电话工程师进入位于利斯本西埔沃兵营的英军总部，安装了一台新的备用电话。这名工程师并不是共和军成员，而是一位支持者，他在英军情报室的电话线路上偷偷安装了一台声控录音机作为窃听器。因为军方的情报系统会定期和特殊分队进行联络，所以至少从理论而言，此举将为休斯提供这两个组织内部运作的宝贵信息。[15]

安装窃听器的技术员开始每隔几天到访墨托菲尔德庄园的那栋房子，留下一批新磁带。然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磁带含混不清，难以听懂。[16]休斯觉得它们听上去就像米老鼠。看来军方增加了预防措施，他们对通话进行了扰频。有一种设备能用来还原这种被扰频的通话，不过它并非那种你走进任何电子产品商店就能买到的东西。事实上，唯一能找到这种设备的地方，就在军方总部的大本营里。因此，休斯吩咐技术员返回利斯本，让他从军方偷一台解读通话的设备。[17]而他照做了。

休斯或许一直在暗中监视当局，但他没有意识到，从某个时候开始，当局也在侦查他的行踪。他们不知从哪儿获悉了他的藏身处，并确认这位屋外被常青藤围绕的衣冠楚楚的玩具商，实际上是在逃的共和军

指挥官布伦丹·休斯。[18]谁也不清楚警方和军队怎么会得到如此机密的消息，但对于当时的观察人士而言，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有一则报道在休斯被捕后指出："临时共和军无疑将展开深入调查，以确认他们中间是否存在重大告密者。"

警方突袭休斯的住所时，他们发现了四把步枪、一架冲锋枪和3000多发子弹，以及从军方总部窃取的六盒通话磁带。他们还找到了一些隐藏的资料，其中概述了后来被称作共和军"末日计划"的应急预案。[19]这些文件所设想的局势是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休斯和他的同党们将在这场战争中被迫捍卫天主教领地。其中包括显示撤离路线的地图，以及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受迫于紧急情势，我们共和军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人民。我们或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以确保军事上的胜利。"这些文件预期了一场大动乱，其中指出，将有共和军的电台广播有关食物供给的信息。[20]

休斯第一次被捕时，抓捕者不仅对他拳脚相向，而且把他当成战利品在他旁边摆造型拍照。这次却不同以往，他们现在想做的是对他进行招降，就像他们对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所做的那样。在休斯被拘留期间，特殊分队的警官们告诉他，作为贝尔法斯特的行动神经中枢，他是帮助他们的绝佳人选。他们只想试图终止这场冲突——而他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来结束这所有的杀戮。休斯告诉他们他不感兴趣。或许能用其他的方式诱惑他？[21]警方给了他满满一箱现金，但他拒绝了。"他们出了5万英镑收买我当线人，"休斯后来回忆道，"我告诉他们，5000万也没法让我动心。"[22]

十四　终极武器



玛丽安和杜洛尔丝在监狱

布里克斯顿监狱是一个阴森的庞然大物，周围环绕着高大的砖墙。

[1]在19世纪的一段时期，那里关押过女性罪犯，然而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在温彻斯特城堡被判刑后不久关进那里时，她们成了整座设施内唯一的女性，里面无孔不入的男性氛围令人难以忍受：监狱里拥挤不堪，男人们随处可见，他们有的在牢房内踱步，有的穿着背心和棕色囚服在娱乐区闲荡，还有的把毛巾搭在肩上往浴室走去。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被单独关在各自的牢房里。[2]不过当她们每天到院子里进行半小时的活动，或者在护送下走过布里克斯顿漫长的走廊时，她们总能引来其他囚犯一连串的评头论足。[3]有传言说，当两姐妹在活动时间出来的时候，监狱里的男人会叫卖窗户边能看到放风场地的位子。[4]对杜洛尔丝而言，布里克斯顿甚至闻起来都有男人的味道。[5]被囚禁的男人们散发的气味充满了监狱的每个角落，牢房里也挂满了色情拼贴画。[6]

“不管走到哪儿，你身边总有狱警寸步不离地跟着。”[7]杜洛尔丝后来回忆道。监狱为姐妹两人编了号——杜洛尔丝是286185号囚犯——这是一个新的体制性身份。[8]理论而言，她们将在未来20年中把这个编号戴在身上。只不过姐妹俩谁也不打算在监狱里待这么久。她们到达布里克斯顿时已经停止进食，除了喝水什么也不吃。炸弹小组被判刑的其他成员中，有几个人对绝食抗议浅尝辄止。不过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打算绝食到底，如果有必要，她们将以死明志。[9]休·菲尼和格里·凯利分别被关在不同的监狱，两人都决定加入她们。[10]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当局以政治犯的身份将他们遣返北爱尔兰的监狱服刑。

普赖斯姐妹选择这种特殊的抗议方式，实则激活了爱尔兰悠久的反抗传统。早在中世纪，爱尔兰人就开始利用绝食来表达异议或者控诉。[11]这是被动攻击的典型武器。1903年，W.B.叶芝的一部戏剧讲述了17世纪爱尔兰的一位诗人在皇家宫殿的大门前发起绝食抗议的故事。[12]叶芝描述道：

这是一个古老而愚蠢的习俗，假如一个人

负屈含冤，或自认如此

遂在他人的门槛上，绝食至死

那么，千秋万代的平民百姓

将在那个门槛，沉重地哭泣

1920年，爱尔兰共和党诗人兼政治家特伦斯·马克斯威尼因煽动叛乱罪被关进布里克斯顿监狱。他进行了长达74天的绝食抗议，要求当局将他释放。英国人不肯放他出狱，结果他绝食而死。[13]马克斯威尼的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身着共和军制服下葬之前，成千上万人列队经过他的灵柩向他致敬，还有更多人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举行了集会抗议。[14]他意味深长地表述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哲学，这一观点有助于阐释爱尔兰共和党人殉难的新兴传统。[15]马克斯威尼宣称：“终将取得胜利的，不是那些最强大的攻击者，而是最悲壮的受难者。”当一个人因

为绝食抗议而死，因果关系的道德演算可能会很棘手。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马克斯威尼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在宣布只要英方同意他的要求他便会再次进食之后，他似乎将自己的生死大权转交到了俘获他的人手中。他的棺木上用盖尔语刻着这样的铭文：被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外国人谋杀而死。[16]

普赖斯姐妹停止进食后，狱警会在牢房里留一盘食物来诱惑她们。但姐妹俩根本不碰，最后狱警停止了这一做法。[17]一位友善的波兰护士仍然会每天早上给她们带一罐橙汁。

“只要水，姐妹。”[18]杜洛尔丝会说。

“不管怎样，我还是把它放在这儿。”护士回答。

刚进监狱的时候，姐妹俩健康又结实。当她们的体重开始下降，杜洛尔丝表现得轻描淡写。“我的脸不胖了，”她在那年1月的家书中写道，“我一定是长大了，我的‘婴儿肥’不见了！”[19]她开玩笑说，玛丽安的棕色大眼睛现在占据了半张脸。不过，杜洛尔丝一直喜欢来点黑色幽默。而且，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绝食抗议最终是一场意志的较量——绝食者将绝食进行到底的意志，以及对手坚决拒绝其要求的意志。特伦斯·马克斯威尼或许失去了生命，但他赢得了与英国的对峙：他的死亡引发了媒体和国际社会对爱尔兰独立事业的空前关注和支持。“谁先眨眼，谁就输了，”杜洛尔丝后来评论道，“这是我很小就知道的事。”[20]

两名年轻的爱尔兰女性可能会在马克斯威尼丧命的监狱因绝食抗议而死，这个概念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姐妹俩早在庭审期间就已成为媒体广泛报道的主题，现在她们成了另一出戏剧性事件的主角，报纸和广播每天连续不断地更新她们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21]她们被称为“炸弹女孩”，但报道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她们连续绝食的坚韧毅力，而是聚焦于她们的年轻和性别，尤其是她们脆弱的女性特质。[22]（休·菲尼和格里·凯利也在继续绝食抗议，但他们受到的关注远不及普赖斯姐妹，而且媒体从未用“男孩”一词指代他们。）

“鲜汤、火鸡、火腿、土豆、圣诞布丁和白兰地酱，”临时共和军共和党运动的一则报纸广告在圣诞期间如是写道，“大家圣诞快乐。杜洛尔丝·普赖斯命在旦夕。”[23]外界对普赖斯姐妹和英方之间的边缘政策的描述不仅令人联想到马克斯威尼，而且回顾了19世纪的大饥荒。[24]这场饥荒导致100万爱尔兰人因疾病和饥饿而死亡，还有100多万人被迫移民他国。即使爱尔兰人正在饥荒中挨饿，却仍然有满载食物的轮船驶离爱尔兰港口——出口给英国人。[25]爱尔兰及其他地方的许多人认为，英国人对这场饥荒负有责任，它不仅仅是冷酷无情的忽视，看起来更像是蓄意谋杀。在有关此次饥荒的文章中，一篇最先广泛流传的短文将之形容为“对爱尔兰最后的征服”。[26]

如果说英国人在饥荒期间利用饥饿作为武器，那么现在他们反倒成

了这个武器所攻击的对象。[27]杜洛尔丝·普赖斯一直认为，监狱才是真正检验共和军志愿军对斗争事业忠心与否的地方。现在，她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宣布，她已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许多志愿军为了我们的事业牺牲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我们的死将和他们并无不同，”她在一封信中指出，“我想，我们将是第一批牺牲的女性，并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如果我们死在布里克斯顿，我们将为此感到光荣，因为50多年前，特伦斯·马克斯威尼就是在这个监狱中牺牲的。”[28]她认为，这个结果将证明英帝国从未吸取自己的教训。一直以来，英国的人数、资金和武器都超过爱尔兰。[29]但杜洛尔丝相信，“一个人的身体才是终极武器”。

面对这种特殊的反抗，英国政府的领导层不抱任何幻想：倘若任何一名抗议者绝食而死，将会带来一场灾难。如果发生这种事，官员们担心会发生“大规模报复性暴力事件”。[30]然而，政府并未屈从于普赖斯姐妹的要求，而是强行采取了一个替代方案。[31]12月3日，绝食抗议持续两个半星期之后，一群医生和护士迈入了杜洛尔丝的牢房。他们把她带到一个房间里，强迫她坐进固定在地面的一把椅子上，接着开始用床单把她绑起来，让她无法动弹。她试图反抗，但却有气无力；她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进食了。他们控制她以后，她惊恐地看着一双手将她的嘴掰开。有人粗暴地把一样东西塞进了她的嘴里，那是一个中间带孔的小木块。另一双手拿来了一根细长的橡胶管，接着把橡胶管的一端穿进木块的孔内，开始沿着她的喉咙往下移动。橡胶管贴着扁桃体蜿蜒滑过，这令她喘不过气来，并近乎窒息地不断作呕。[32]她试图将管子咬断，可那块木头挡在了中间。几名狱警按住了她的身体，然后她感觉液体顺着橡胶管流入了她的肚子里。

把液体灌进她的肚子只用了几分钟，但对杜洛尔丝而言却漫长无比。[33]还没等他们把橡胶管抽出来，她已经开始呕吐食物。她开始将这种强制执行的饮食称为“饲料”，它由多种食物放在搅拌机里混合打碎而成——包括生鸡蛋、橙汁和一种由牛奶、矿物质和维生素混合制成的浓缩液体。[34]强制进食之后，杜洛尔丝被松绑到活动场地放风，她在那里见到了还未遭此磨难的玛丽安。杜洛尔丝对妹妹讲述了这次痛苦的经历，并表示她认为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煎熬。你不必忍受，玛丽安说，你可以放弃绝食。

不，杜洛尔丝回答。要么我们一起放弃，要么谁都不放弃。[35]

两天后，监狱的医生也开始对玛丽安执行强制进食。[36]这成了一种可怕的惯例。[37]每天早上10点，一群医生和护士会来到牢房把她们绑起来，然后往她们的喉咙里灌食物。“我们正学着在插着管子的时候呼吸得更自如一点。”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

强制进食是一种具有争议的做法，曾用在另一群难以驾驭的女性身上，即英国的妇女参政权论者。1913年在霍洛韦监狱经历强制进食的一名妇女参政权论者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称之为酷刑，并指出“它带来的屈辱感远远超过任何身体上的痛苦”。[38]

“我不想让那东西强行插进我的喉咙，”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虽然我无力用身体进行反抗，但不代表我不能在精神上抗拒和排斥整个可怕的过程。”[39]有时，姐妹俩其中一人会在喉咙里插着管子时几乎因呕吐窒息而死。[40]报纸刊登了她们的一些信件，引发了人们对强制进食的激烈抗议。英国内政部——至少最开始——声明称，实行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帮助绝食抗议者，英国监狱的官员没有让囚犯自杀的习惯。[41]

贝尔纳黛特·德夫林是人民民主组织的学生领袖，曾领导伯恩托莱特桥的游行，后来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她于1月探望了普赖斯姐妹。杜洛尔丝的模样让德夫林感到震惊，她原本浓重的深红色头发“已经褪成了浅淡色，发根居然变白了”[42]，德夫林说。由于杜洛尔丝在进食过程中不断挣扎，紧咬木块，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腐坏。[43]两姐妹的脸色变得蜡黄，走路只能拖着脚。[44]

执行强制进食的人员中，有些人表现得冷酷无情。一位医生在进食时嘲讽两姐妹的信念，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尔兰的独立事业”。[45]一名女性护理人员评价道，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还要依赖英国人过活。[46]

“你们的马路是我们建的！”杜洛尔丝迅速回击，她还没虚弱到畏避争论的地步。“我们本来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直到你们英国人把它夺走……爱尔兰人走到这一步都是因为你们！”

其他官员更友善一些。姐妹俩和监狱的伊恩·布莱思医生关系融洽，他称她们是“我的姑娘们”。随着绝食抗议的继续，他会挑战两姐妹进行掰手腕比赛。她们勇敢地迎战，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动作是为了查看她们体力消失的速度。[47]内政部派了一名精神科医生为她们检查，他证实普赖斯姐妹非常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作为对这一诊断的总结，玛丽安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太理智了。”[48]这名精神科医生认识英国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49]玛丽安问他，詹金斯是否会亲自来见她们。医生告诉她，詹金斯绝不会和她们面对面，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么做，一定会立刻把她们送回家。

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场进退维谷的危机。尽管普赖斯姐妹的身体日渐衰弱枯萎，她们仍然承载着偶像般的形象。“她们可能被塑造为爱尔兰烈士：两个年轻女孩，骨瘦如柴，肤色暗淡，笃信并献身于恐怖主义。”詹金斯后来这样回忆道。他担心“这两个魅力超凡的爱尔兰女孩之死”会引发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50]詹金斯私下认为，她们被遣返的要求“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但他觉得，政府不能在如此胁迫之下表现出任何妥协之意。[51]詹金斯以为，恐怖主义就像“传染病”。[52]屈服于绝食抗议者的要求无异于助纣为虐，只会鼓励其他人效仿这种行为。

但如果以强制进食作为替代方法，那么它正在演变成公共关系的惨败。许多英国公众认为这种做法属于酷刑。根据医疗记录，普赖斯姐妹

有时会在进食过程中昏迷。[53]有一次，姐妹两人在抗拒进食时出现了极为明显的作呕反应。监狱的工作人员调大了收音机，以此来掩盖她们的叫喊。[54]在驻都柏林的英国大使的住宅外进行的一场抗议中，一位精神科医生发表了演说。他对强制进食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将之比作强奸。[55]“这里的医生告诉我们，他以为他们头两次对杜可强制进食的时候会让她崩溃，”玛丽安在家书中写道，“但要打垮我们家的孩子可没那么容易，她就像小强一样。”[56]

看到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打算饿死自己，有些父母可能会竭力说服她们放弃斗争。但普赖斯夫妇不是这样。“无数人来到这个世界，吃喝劳作一番就死了，从未给这个世界做出任何贡献，”艾伯特·普赖斯告诉记者，“如果她们死了，至少她们有所作为。”[57]

她们的母亲克丽茜也是这种口气。[58]“我抚养她们是为了让她们对国家尽忠，”她说，“看到她们受苦我很心痛，但我也为她们骄傲。我不会让她们放弃，我知道她们最终会赢。”

当克丽茜去监狱探望女儿时，她表现得很勇敢，兴致勃勃地无所不聊，直到最后才提起绝食抗议的事。然后，正当她准备离开时，她说：“你们现在吃些什么？”

“我们喝水，妈妈。我们只喝水。”杜洛尔丝说。

“好，”克丽茜强装镇定地说，“多喝点水。”[59]

观看绝食抗议的进展有一种病态但不可否认的乐趣。作为对人类耐力极限的考验，它对爱看热闹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场奇观，有点像环法自行车赛，只不过其赌注攸关生死。它也是绝食者和当局之间的胆量交锋。这一事件变得极为臭名昭著。诸如都柏林人这样的乐队举行了义演，以此支持普赖斯姐妹、休·菲尼和格里·凯利。[60]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围墙外经常有抗议活动。[61]60名女性出现在罗伊·詹金斯位于伦敦的家门口，高呼支持绝食者。[62]一位在伦敦爆炸案中严重受伤的年轻女孩的父亲要求当局将普赖斯姐妹送回爱尔兰。[63]甚至连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防卫协会也对政府提出要求，要么让两个女孩返回北爱尔兰，要么任她们绝食而死。[64]（这些支持令杜洛尔丝“受宠若惊”，她在家书中补充道：“这表明，到了关键时刻，我们都是爱尔兰人。”）[65]

姐妹俩密切关注着新闻报道，每天收听有关自身情况的广播。[66]这对杜洛尔丝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她仿佛置身事外般地跟进这两个爱尔兰女孩绝食抗议的报道，难以相信这些新闻谈论的是她自己。[67]不过，她也十分清楚这些报道的宣传价值，并且知道她所写的有关自身情况的家书会见诸媒体。一直以来被唤作“艾伯特的女儿”的杜洛尔丝如今收获了自己的坏名声，这让她感到高兴。她在家信中告诉克丽茜，让她打趣地问问艾伯特：“对别人叫他‘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父亲’作何感想？”[68]

爆炸案已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普赖斯姐妹仍然遭受着强制进食。就在这时，案件发生了离奇的转变。1974年2月，出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一幅17世纪的油画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博物馆被盗，画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弹一把窄小的吉他。[69]两封打印的匿名信寄到了伦敦《泰晤士报》报社，要求当局将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送回北爱尔兰，并威胁如果不照此行事，这幅画将“于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以绝对疯狂的方式在众人的狂欢中被烧毁”。为了证明威胁的真实性，其中一封信中装有维米尔油画的一小块碎片。[70]作为一种奇怪的巧合，杜洛尔丝在两年前的一次伦敦之行中参观了展出这幅画的肯伍德宅邸博物馆，并且在那幅油画前驻足欣赏。[71]克丽茜·普赖斯在一次声明中呼吁，请拿走这幅艺术作品的人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她特别指出，“作为一名艺术生”，杜洛尔丝专门为这幅油画提出了请求。[72]

5月的一天晚上，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附近的教堂墓地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73]它用报纸包裹着，并用绳子系了起来。一组官员来到了圣巴塞洛缪大教堂。在当时的高压氛围下，包裹里可能装有炸弹。但结果并不是，而是那幅画，正如杜洛尔丝要求的那样被物归原主。

同一时期，以普赖斯姐妹为名的艺术品盗窃案再次发生。一系列名画家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收藏作品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一户人家被盗。[74]这些失窃的画作分别出自委拉斯开兹、维米尔、鲁本斯、戈雅和梅特苏之手。一封威胁信再次出现，要求将绝食抗议者“立刻送返爱尔兰服刑”。这些画作后来同样完璧归赵。[75]

6月，一位年长的爱尔兰伯爵和其夫人在一场正式晚宴结束后回到位于蒂珀雷里的家中时，发现他们的车道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男人。[76]其中一人用手枪抽打了伯爵，接着一伙人拖着伯爵夫人经过铺满碎石的车道，他们把两人推进一辆车里蒙上眼睛，随后驾车离开。绑匪告诉夫妻俩，他们被扣为“普赖斯姐妹的人质”。他们在一个黑屋子里被持枪监禁了数天，但被囚禁的两人最后却喜欢上了关押他们的人，并开始将整个经历视作一次冒险。绑匪们“极为友善”，伯爵后来补充道，他每天都吃得很好，早上能享用丰盛的爱尔兰早餐，中午能吃到牛排和排骨。挟持人质者甚至提供了报纸的赛马版块供他翻阅。因为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伯爵和夫人最终被释放。

5月，英国政府决定对普赖斯姐妹停止强制进食。到那个时候为止，姐妹俩竭力以最大的尊严经受了整个过程。[77]她们不愿表现出丝毫畏惧之情。但到了某个时候，她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僵局：强制进食或许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创伤，但也让她们活了下来。因此，与其心怀敌意地屈从忍受强制进食的行为，姐妹俩选择改变策略。有一天，她们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反抗”，杜洛尔丝在一封信中写道：“不出意料，这包括一系列有失体面的场景——我们不停挣扎，他们极力控制，把钢夹插进我们的嘴里，以及——就我而言——声嘶力竭地叫喊，因为相信我，那钢夹实在让我的破牙龈痛得要命。”[78]这是一场战斗。姐妹俩的挣扎如此激烈，以至于医生很难将橡胶管安全地插进她们的胃里。普赖斯姐妹

告诉医生，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她们便给了他们“杀死我们的特权”。[79]在数次这样困难重重的遭遇后，医生们直接放弃了。他们拒绝继续执行这一程序，因为太过危险。结束强制进食是基于临床判断，而非政治决断。[80]

解释政策改变的工作照旧落到了罗伊·詹金斯身上。他宣布，在执行人为喂食167天后，布里克斯顿的医生们停止了这项令人不快的任务，因为“普赖斯姐妹拒绝提供这一过程所需的最低配合”。[81]詹金斯把部分责任归咎于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怪他们不仅没有阻止两个女儿进行“慢性自杀”，反而“敦促她们坚持下去”。

强制进食的停止令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喜出望外。[82]紧接着，她们的体重开始以每天一磅的速度递减。杜洛尔丝不时称量体重，计算失去的每一磅，她惊叹于自己对身体的控制。“现在我们更强大了，因为我们不再想吃或者渴求食物。”[83]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她开始用最为临床而机械的语言来看待自身的机体。“我现在成了自己的工具，”她开玩笑说，“我也是操纵这个工具的工匠，我正在自己锻造自己。”[84]

布里克斯顿流传着有关所谓临终病房的传言。杜洛尔丝总觉得这地方听起来不吉利，但等到她和玛丽安最终搬进去时，却感觉十分舒适。现在，姐妹俩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不是被关在各自的牢房里。房间隔壁甚至有一个独立厕所，所以当她们需要小便时（因为此时她们排出的只有尿液），她们不再依赖于尿壶。“离天堂越来越近啦！”[85]杜洛尔丝开玩笑说。牢房内有一面镜子，她会盯着镜中的影像，看着长长的睡衣搭在自己枯瘦如柴的骨架上，并想象她看上去就像某个前狱友，在牢房里阴魂不散。

这个时候，根据为她们治疗的一名医生的评估，普赖斯姐妹“完全依赖她们自己的身体存活”。[86]她们已经变得极度虚弱，就连穿过房间都可能令杜洛尔丝精疲力竭，心脏如同击鼓般在她的肋骨下跳动。[87]她们无法以任何一种姿势长期坐卧，否则会因为骨骼压迫皮肤而生褥疮。为了缓和这一症状，她们的床上安置了“波纹床垫”，其中包括一层能让空气流通的薄软垫。[88]

“每过一天，我们就消逝一点。”[89]杜洛尔丝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姐妹俩彼此挨着躺在床上，三名狱警持续看守。[90]杜洛尔丝为玛丽安感到担心——担心她更渴望死去，担心她更从容地接受死亡。有时杜洛尔丝会跟她聊天，回忆过去或者闲话家常，鼓起勇气就像过去一样热火朝天地喋喋不休。然后杜洛尔丝会转头望向极其苍白枯瘦的玛丽安，她闭着双眼，嘴唇微张，手指因为饥饿而变得细长。[91]妹妹的样子让杜洛尔丝感到恐惧，她会说：“玛丽安，快醒醒。”不要抛下我，她心想。不要抛下我。

“我们现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普赖斯姐妹可能命不久矣。”詹金斯在6月初发出警示。他考虑过去看望姐妹俩，希望或许能劝阻她们不要

走向死亡。然而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作为两人命运的决策者，他有责任“置身事外一点”，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92]

在临终病房探望两个女儿后，艾伯特·普赖斯现身媒体表示，她们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她们很高兴，”他说，“为死亡感到高兴。”[93]临时共和军则准备诉诸暴力，警告说一旦姐妹俩发生不测，“英国政府将面临毁灭性后果”。[94]

媒体报道称，一位牧师看望了姐妹俩，并主持了最后的仪式。[95]杜洛尔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好啦，请向我们的家人和所有朋友传达我们的爱。”她最后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发生的事。”[96]

然后英国眨眼了。6月3日，另一名爱尔兰绝食抗议者迈克尔·高根在怀特岛的帕克赫斯特监狱去世。[97]高根也是一名共和军志愿军，不过他和炸弹任务毫无关系。他因为抢劫伦敦的一家银行而入狱，当他开始绝食抗议时，杜洛尔丝为此感到恼火。她从11月就开始绝食，而他次年4月才开始，她觉得高根做得迟了，“真是后知后觉”。[98]她在看电视时得到了这个消息，当听到“一名绝食抗议的共和军囚犯去世”的话时，她胃里突然一紧，心想会不会是休·菲尼或者格里·凯利。[99]官方声称高根死于肺炎，但他的家人怀疑，他的死亡是由强制进食引起的并发症导致的，这种情况完全不难设想。[100]

罗伊·詹金斯后来描述道，他开始产生“威胁逼近的不祥预感”。[101]最近，他不断想起特伦斯·马克斯威尼和其死亡所引起的巨大反诉浪潮。如果普赖斯姐妹丧命，随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詹金斯不愿留下他会因为胁迫而做出任何决定的印象，但他私下开始担心，一旦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成功，他的余生都将可能遭到追杀。这不仅仅代表他将不能去南阿马度假。爱尔兰人无处不在，对他而言没有安全之地：如果那两个该死的女孩得偿所愿，他担心，“我可能永远无法再自由而安全地走在波士顿或者纽约或者芝加哥的大街上”。[102]詹金斯无奈决定，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6月8日，杜洛尔丝、玛丽安、格里·凯利和休·菲尼发表了一份声明。“为了支持我们获得政治犯身份以及遣返北爱尔兰监狱服刑的要求，我们进行了206天的绝食抗议。”[103]他们写道，并继续说，罗伊·詹金斯已经向他们保证，他们将被送回北爱尔兰。所以他们决定结束抗议。“我们的所作所为绝非自杀任务，”他们坚称，“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自我了结，而是为了获得正义并满足最低要求。”

移交程序并未立刻执行。[10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没有被送回爱尔兰，而是被重新安置在德拉姆监狱的女子营区。然而，1975年3月的一天，德拉姆的所有囚犯在午饭时间被命令返回各自的牢房。杜洛尔丝心中有个声音告诉她，也许就是这天了。她回到自己的牢房开始收拾行李。她穿上外套，收起为数不多的几件物品。接着监狱长走进来宣布，

她们要回家了。“不对——不是回家，你们要去阿马。”

“对我来说离家够近了。”[105]她说。

玛丽安跑进她的牢房，姐妹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几乎到了难以呼吸的地步。[106]她们把最后几件物品塞进包里，然后狱警带着她们迅速走进过道。杜洛尔丝喜不自禁，她甚至拥抱了监狱长。[107]

姐妹俩被带到了一个空军基地。[108]飞机起飞后，英格兰逐渐消失在远方。飞机上，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冲了咖啡。在海上飞行一段时间后，杜洛尔丝突然透过窗户瞥见了下方的绿色土地，她的泪水夺眶而出。[109]

“爱尔兰还没到，”玛丽安说，“这是马恩岛。”

她们继续向前飞。接着杜洛尔丝望向窗外，看见远处又出现了绿色。“到了吗，玛丽安？”她问。

“我想是的。”玛丽安说。

普赖斯姐妹下飞机时，英国陆军的摄影师为她们拍了照片，闪光灯照亮了夜幕初降的天空。[110]回到故土虽然令两人欣喜万分，但到达的时机却让她们痛苦不已。2月，她们的姨妈布蕾迪·多兰去世。[111]作为共和党不算十分重要的偶像，人们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当局派摄影师对送葬者进行了监视拍摄。葬礼的四天后，克丽茜·普赖斯因胰腺癌去世。[112]直到最近，这位母亲看起来似乎会比两个女儿长寿，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悲痛欲绝，她们请求监狱准予恩假[113][2]，让她们参加克丽茜的葬礼，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她们为葬礼寄了一个用复活节百合做的花圈。400人组成的送葬行列缓慢前进，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行至弥尔顿公墓。[114]艾伯特走在棺木旁边，低着头。整个庄严的队列由一个吹奏风笛的小女孩带领，她戴着共和军的黑色贝雷帽和墨镜。

十五　俘虏

母亲失踪后的数周里，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紧紧地相互依靠，试图保住他们的家。他们必须守在那儿，万一琼回来了呢？但最终社会福利机构进行了干涉，两辆车开到帝维斯公寓，准备将这些孩子送进教养院。[1]海伦·麦康维尔把弟弟妹妹们送上车，她向他们保证，他们只是离开一段时间，“等妈妈回来就好了”。[2]孩子们挤进车里坐下的时候，海伦抬头看见帝维斯公寓的邻居们聚集在混凝土阳台上，沉默地观望着。[3]“都去你妈的。”她小声嘀咕道，接着他们坐车离开了。

麦康维尔家的长女安妮还在住院，罗伯特仍处于拘留期。[4]阿奇已经长大，可以工作并照顾自己。阿格尼丝和奶奶住在一起。然而海伦、迈克尔、塔克、苏珊、比利和吉姆被带至南贝尔法斯特，汽车在漫长的蜿蜒盘旋后开到了一栋壮观的四层红砖建筑前，那是一座名叫拿撒勒屋舍的孤儿院。[5]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环境恶劣之地。住在那里的许多孩子自襁褓时期就开始由政府监护，似乎已经麻木地习惯了体制性的生活。[6]但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成长于正常的家庭，母亲的失踪以及此前父亲的离世令他们郁郁寡欢，他们已经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生活了数月。这家孤儿院由一群严厉的修女管理，她们是出了名的施虐狂。[7]一个曾经寄居于此的人形容，这个冷酷而压抑的地方仿佛“出自狄更斯笔下”，鞭笞和严惩是家常便饭。

就在这个时期，迈克尔·麦康维尔变成了逃跑能手。自从被带离帝维斯公寓起，他总会想方设法溜出去，跑回西贝尔法斯特。[8]他是个难以驾驭的街头浪子型的孩子——一个典型的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孩子——而且他很愤怒。有一次，他和福利机构的人打交道时，一位官员认为他的母亲“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你说谎！”[9]迈克尔咆哮道。

1973年3月，也就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对伦敦实施炸弹袭击的同一个月，迈克尔和塔克因入店行窃被传唤至贝尔法斯特的法庭。法庭决定让他们离开拿撒勒屋舍——事实上是彻底离开贝尔法斯特，迁至德拉萨尔男孩之家，那里位于35公里外的邓恩郡，在基尔库宾村附近。[10]坐车到新家的路并不远，但对迈克尔而言却感觉有千里之遥。[11]这个机构占用了一栋改建过的维多利亚式宅邸，它坐落于树木葱郁的乡村，还有一些后来修建的村舍供孩子们居住。男孩之家的房地产十分广阔，有大约100公顷——在贝尔法斯特那些砖块和混凝土筑成的牢笼里度过所有的时光后，这里有一种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感觉。男孩之家的场地包括一间学校、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和一个足球场。[12]他们甚至有一个台球桌。[13]

借用那些年在那里生活过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基尔库宾“纯粹是场噩梦”。[14]后来一项政府的调查显示，“体罚之风”在此盛行。不论修道士还是普通员工，他们会以最站不住脚的托词来使用暴力，对孩子们拳脚

相向、拿皮带抽、用细木条鞭打他们的指关节，其力度之大几乎要削断他们的指尖。[15]

迈克尔再勇敢机灵，他也只是个11岁的孩子。塔克9岁。对那里的大孩子而言，这种虐待之风已经根深蒂固。[16]他们毫不留情地欺负麦康维尔家的两个男孩。管理孤儿院的基督教修士用批发的方式给他们照看的对象买衣服，所以孩子们都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四处走动——衬衣袖子盖过手肘，宽大的成人长裤需要用腰带系紧，流浪儿般的衣着更让人感觉这里仿佛是故事书里的炼狱，惩戒着贝尔法斯特的拙劣孩童。[17]基尔库宾的成年人把孩子们当童工使唤。有时，员工会把他们租给附近的农场，让他们去摘土豆。[18]

夜里，当所有人在昏暗的电视机房看电视时，身着长袍的修道士会吩咐某些孩子坐在他们身上。[19]性侵行为在孤儿院十分猖獗。[20]迈克尔自己从未受到骚扰，但晚上他会躲在被子里看着大人们拿着手电筒的模糊身影进入寝室，把熟睡的男孩从床上拉起来。[21]

迈克尔和塔克经常逃跑。[22]他们觉得有责任回到贝尔法斯特，谁说母亲不会再次出现呢？但每次两个孩子跑掉，他们总会被逮回去，而每次他们回去，都会被痛打一顿。麦康维尔家的两个孩子隔三岔五地逃跑，以致最后基尔库宾的员工没收了他们的鞋。[23]他们认为，就算两个孩子设法跑到乡村公路，能在那里搭上回贝尔法斯特的便车，他们的速度也会因为光脚而减慢。

官方也许确实没有意识到当时发生在基尔库宾砖墙内的压榨行为，但即使他们对男孩之家的环境有所知晓，这也并未阻止他们把其他孩子送到那里。最终，双胞胎比利和吉姆从拿撒勒屋舍被重新分配至基尔库宾。[24]当汽车从贝尔法斯特沿着斯特兰福德湾向孤儿院的方向行驶时，两个孩子在车后座上忧心忡忡。7岁的他们成了基尔库宾最小的孩子，这就如同羊入虎口。他们受到了大孩子的身体攻击，比利更遭到了成年人的猥亵。两个孩子无法向任何大人求助，因为参与性侵的员工如此之多，这种行为被默默忍受。一个曾经住在那里的人表示，所有基督教修士“在这件事上狼狈为奸”。[25]在北爱尔兰天主教机构的遭遇给麦康维尔家的几个孩子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以致他们对牧师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即便成年以后，只要看到身着牧师服饰的人也会让他们充满焦虑。（德拉萨尔兄弟会后来承认，这段时期性侵行为在基尔库宾泛滥成灾。管理拿撒勒屋舍的拿撒勒修女会同样承认，她们的孤儿院存在体罚儿童的问题。）[26]

海伦·麦康维尔的年龄令当局无法违背她的意愿将她留在孤儿院，但还不足以使她成为弟弟妹妹的合法监护人。于是她自食其力，和阿奇或朋友们住在一起。[27]她在一家做寿衣的公司找到了工作，而且还做过服务员。[28]住在拿撒勒期间，她和一个名叫谢默斯·麦肯德里的同龄男孩有过短暂的交集，后者在孤儿院当木匠学徒。在最初的相遇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系。但过了两年，当海伦在餐厅做服务员时，他们再次重逢

——并坠入了爱河。他们在她18岁的时候结婚了。[29]

有时，似乎没有哪个地方能约束迈克尔·麦康维尔。最终，在屡次三番逃跑之后，他又一次被扫地出门，这回被送到了离纽敦纳兹镇不远的一所“训练”学校。[30]这所名叫利斯内文的学校在周围社区的抗议声中刚刚成立，作为提供给男孩的“安全”住宿设施。[31]称这个地方为学校实际上有些委婉：利斯内文是一个少年管教所，专门收容像基尔库宾这样的机构无法驾驭的孩子。[32]跟迈克尔同屋的包括和他一样的惯逃少年，以及因盗窃、人身攻击和准军事活动而被拘留的各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青少年。主楼是一座改建的公馆，曾是一些宏伟的乡村宅邸的中心建筑。如今“隔离室”成了它的特色——没有家具的牢房，窗户上装起了栏杆，误入歧途的孩子可以被关在里面单独监禁。管教所四周竖着高高的围栏，不仅通电，而且配有报警装置。[33]如果有人试图逃跑，警报器就会响起。

利斯内文看起来也许像集中营，但迈克尔喜欢这里。他后来揶揄道，利斯内文是他住过的最好的地方。[34]那里的员工常说，这些围栏是为了防止人们进来，而不是阻止人们出去。或许是因为利斯内文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北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和疯狂，从而为像迈克尔·麦康维尔这样的受害者创造了空间，让他终于能安定下来，开始疗愈伤痛。管教所没有按教派将收容的青少年隔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小型教派冲突时常发生。[35]但迈克尔避开了麻烦，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弗朗西丝的好心修女。[36]她很关照他，对他的兄弟姐妹也很友善。在后来的许多年里，甚至在她移民美国之后，她总会在圣诞节给他们寄贺卡，并在里面附上1美元。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举动，但对失去母亲的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整个世界。

迈克尔符合周末休假的条件，就像监狱的假释一样。这时他会回到贝尔法斯特，和阿奇或海伦住在一起。孩子们在一起时从不谈论母亲的遭遇，因为太令人痛苦。[37]然而他们作为一家人的观念已经开始削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各自独立，在艰难的领域自力更生。迈克尔刚满16岁就离开了利斯内文，出去寻找工作和栖身之处——寻找新的生活。他人生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住在不同的机构里。但现实就是这样：到了16岁，他们就会让你离开。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解放，他们不会为你做任何准备。没有人教你怎么租房，怎么找工作，也没人教你怎么做饭。他们直接让你走人。

布伦丹·休斯伪装成玩具推销员被逮捕并回到朗·凯什后，格里·亚当斯仍在那里服刑。亚当斯曾两次试图逃跑，但他不像休斯那样善用策略。[38]他出逃未遂，还因为越狱的企图被再次判刑。亚当斯已经适应了朗·凯什的生活。相比监狱外的生活——不断潜伏，每天居无定所，害怕来人搜查，永远不知道是否会在街头被人认出并当场击毙——他感觉监狱里可预见的日常生活令人放松。[39]囚犯居住的半圆形营房周围的铁丝围栏被叫作“囚房”（cages），每一个都有编号。休斯和亚当斯同住在11号囚房里。[40]这两个革命者在入狱之前关系本就密切，而如今同

在一个牢房的亲密相处使得两人的关系愈发紧密。[41]牢房简陋而透风，冷风会在营房里呼啸而过。冬天的时候，他们把袜子当作手套戴在手上用来保暖。[42]

他们在不断的交谈中滋养自己。亚当斯一直有学术气息，他鼓励身边的人坚定自己的思想。囚犯们组织演讲和讨论会，他们会在“铁丝网”集合，也就是隔离不同围场的围栏那里。[43]他们一起探讨政治、历史以及监狱外的最新战况。组织文化课的是一名倔强而年轻的共和军新面孔。他会写诗，后来成了共和军囚犯的官方发稿文宣。他叫博比·桑兹。亚当斯后来谈道，这地方感觉就像“我们铁网下的象牙塔”。[44]亚当斯有着敏锐的头脑，是一个机智迷人的谈话者。然而尽管他表现得十分合群，可他并未开诚布公地展现自己所有的人格。在休斯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反宗教的时候，亚当斯却默默沉浸在天主教的世界中。夜里，休斯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亚当斯则在背诵《玫瑰经》。[45]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亚当斯遭遇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自1969年临时共和军兴起并开始直接向统一派组织发起战斗的那一刻开始，人们一直感觉，只要发动一次最后的猛攻就能将英国人驱逐出境。正是这一战略主题导致了共和军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疯狂的行动节奏，亦是其营造的高昂士气促进了新军的招募并激励着志愿军。然而，随着冲突进入到第六个年头，形势似乎并非这么简单。[46]在多年的暴力活动后，承受冲击的往往正是共和军声称自己所代表的公民，公众对临时共和军的支持也逐渐减少。与此同时，英国人似乎准备应对一场无限期的冲突。当亚当斯和休斯在铁丝网后和手下进行会谈时，他们能看到监狱里正在修建一套新的设施——也就是所谓的H区。一旦建成，那里将能容纳更多准军事组织的被拘留者。

亚当斯的父亲老格里也曾是共和军的一员，他在20世纪40年代参与过一场运动，其结果同共和党漫长的历史一样一败涂地。在亚当斯的成长过程中，他常常看到经历过早期斗争的老兵在他父亲协助成立的法隆斯社交俱乐部消磨时光。和艾伯特·普赖斯一样的男人会在那里趁着酒兴讲述战争故事，事后诸葛亮般地指点江山。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似乎“失败比胜利更适合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而言，爱尔兰共和主义是在压迫和随之产生的孤立的排他性中蓬勃发展起来的”。[47]20世纪70年代早期，临时共和军已经习惯在每年的1月份宣布，就在当年他们将把英国人永久赶出爱尔兰领土。亚当斯这一代人见证了西贡的陷落，对于他们而言，一举推翻政权似乎唾手可得。[48]但经过几年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那些1月份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开始变成了妄想。毫无疑问，共和党的失败有一种命定的浪漫色彩，这种典型的徒劳蕴藏着一种诗意。但格里·亚当斯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告诉手下，这一次他们的斗争一定要有所成就。这一代爱尔兰共和党人不会简单地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推动变革。[49]然而，就在亚当斯提出这个观点的同时，他开始争论说，

不能天真地期望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相反，共和党运动应该做的是沉潜待发，为后续的“持久战”做好准备。[50]他不再告诉人们胜利指日可待，最好能结集资源，从长计议一场更为持久的斗争。

提出这个论点并非易事。一直以来，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承受着保皇派的殴打、军方的射杀和警方的酷刑。他们曾抛下家人出逃，现在又发现自己跟亚当斯和休斯一起被关在朗·凯什。如果有人说：“现在你们只要铆足了劲儿继续战斗，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们会欣然接受，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早点习惯这种局面吧，因为就算再来一次猛攻也结束不了战斗。这可能要耗费几年时间，甚至几十年。”他们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同时，亚当斯开始在谈论胜利的意义时略微调整自己的语言。[51]打持久战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结束冲突可能不仅需要依靠军事上的胜利，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仰赖政治解决方案。亚当斯会在铁丝网下告诉年轻的共和军士兵，武装斗争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你们都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告诉他们。

“我们实在没有啊，我们只会打仗。”他们回应道。

“不，你们必须开发这方面的意识，”亚当斯坚持道，“政治很重要。”

亚当斯在朗·凯什的狱墙内赢得了尊重和忠诚，但他想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作战的志愿军。于是，他开始在1975年为《共和党新闻》撰写系列文章，这是共和党运动的宣传报。[52]由于加入共和军是违法行为，用真名来为这种文章署名可能存在风险，所以亚当斯采用了“布朗尼”的笔名。每写好一篇新的专栏，他都会把文章偷送出监狱。这些秘密文件——或者说人们所谓的“通信”——经常在朗·凯什内外辗转传递。这些备忘录和信件被用细小的字体写在香烟盒上，然后藏在手中交给来访的朋友或配偶。[53]通过这种方式，共和军监狱内的指挥机构和外部同僚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

《共和党新闻》的编辑是一个娃娃脸的宣传员，名叫丹尼·莫里森。[54]布朗尼专栏的基调有时漫不经心，展示着亚当斯的冷幽默；有时又显得太过多情，而他的多愁善感总让人觉得造作甚于真诚。多数情况下，这些文章向外面的人展现了囚犯的生活环境。但亚当斯也会利用专栏来努力梳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新哲思。[55]他经常把草稿交给布伦丹·休斯寻求反馈，然后再送出去发表。不过休斯向来不善于分析，有时他要把一篇专栏读上三遍才能抓住亚当斯论述的重点。

1977年，亚当斯出狱。刑期的最后一天，他和休斯在院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谈论策略。[56]他认为新芬党，也就是跟共和军相关的政治实体，必须同共和军武装组织进一步“协力”合作。同时，他认为临时共和

军需要重组。一直以来，共和军模仿的是英军的等级制度结构。但亚当斯认为，临时共和军需要自我革新，采用拉丁美洲准军事组织典型的蜂窝式架构。[57]这种布局会让他们更加可靠：假如当局经过盘问设法让一名枪手转变立场，那么他知道的只是他所属的小组中的关系，而非整个指挥链。亚当斯提出的是一次雄心勃勃的重组计划，也是为了建立一支能打持久战的共和军而设计的蓝图。在朗·凯什的最后一天，亚当斯提着棕色纸袋装的行李，在走出监狱之前给了休斯一个拥抱。[58]他开玩笑说，在他们两人中，休斯的任务更令人羡慕，只需要待在后方维持朗·凯什的秩序。[59]亚当斯现在或许成了自由之身，但他担负的是更为艰巨的重组共和军的重任。

事实上，休斯的任务绝非易事。临近1975年年末，拘留令正式结束。[60]从现在开始，准军事嫌疑犯将不会作为政治犯被无限期关押，而是受到和普通罪犯一样的指控。[61]这看上去似乎只是语义的变化，属于简单的分类问题，但二者的区别却直指共和党人的身份核心。称共和军志愿军为罪犯，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最初发动武装斗争的合法根基。即使面对爆炸和流血，伦敦政府也许仍会固执地拒绝将北爱尔兰问题称作战争；但对共和军而言，休斯和他的同志们是战士，如果被捕，他们应该被当作战俘关押。拘捕令有其自身的问题——你可能未经起诉而遭到逮捕，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监禁多年。不过，被拘留的人基本上可以在监狱里穿自己的衣服，也可以自由地和他们的准军事同僚来往。结束拘捕令以后，现在所有参与准军事活动的囚犯都被单独关在朗·凯什新建的H区的牢房里。监狱分发了囚服，而共和军志愿军和普通小偷的身份并无差别——你拿到的囚服是一样的。[62]

1976年秋天，共和党囚犯发起了反抗。[63]他们拒穿监狱分发的囚服，并开始了所谓的毛毯抗议，囚犯们用毛毯裹住一丝不挂的身体，就像普赖斯姐妹在伦敦被捕后所做的那样。抗议者唱的一首小调描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休想逼我穿上囚服

休想让我逆来顺受

爱尔兰八百年的抗争

岂能在不列颠的淫威下

被污名丑化。[64]

抗议者想得到“特殊类别”的身份，这将有效地把他们归类为战俘。[65]然而当局拒绝准予这一要求。在朗·凯什的狱墙内，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开始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拉锯战。[66]抗议者拒绝穿衣服，不过起初他们愿意离开牢房去洗澡和上厕所。有时，守卫会因为对囚犯的反抗感到挫败而在途中对他们进行殴打，并限制他们用毛巾遮盖或擦干身体。因此，反抗者开始彻底拒绝离开牢房，这导致守卫必

须挨个牢房倒便壶。[67]然而，囚犯们又开始把便壶踢倒，让大量尿液从牢房的门下流入走廊。于是，最初的毛毯抗议发展成了“不洗澡抗议”，眼下又升级为“邋遢抗议”。[68]现在，守卫们不得不清理在监狱里横流的一大股尿潮。抗议者剩下的问题，是该拿他们的大便怎么办。当他们向休斯提出这个难题时，他给出的建议是：把它涂在墙上。[69]

休斯和他的手下光着身子，满身污秽，胡须凌乱，纠缠的长发很久未洗。[70]而现在，他们又开始用自己的排泄物在监狱的墙上画画，把它旋转成梵高的月亮和各种荒唐的图案。监狱呈现出一派疯人院的景象。随着蛆虫的侵袭，以及疾病的威胁开始出现，一群狱警会冲进粪便凝结的牢房，把瘦骨嶙峋的囚犯赶出去用水管给他们冲洗，同时另一组狱警用水和消毒剂对肮脏的牢房发起进攻。然而，即便把抗议的囚犯安置到新的牢房也无济于事。只需一次新陈代谢就能为他提供破坏牢房的工具。[71]一位来访的牧师在查看监狱之后，将这些囚犯比作“加尔各答贫民窟里住在阴沟下水道的人”。

假如从表面看来，这整个考验——疯人院里一次前卫的尝试——有什么可笑之处，它所隐藏的则是更为熟悉的一面：这又是一场边缘政策的博弈。囚犯的要求相对简单。他们希望获得不穿囚服的权利，能和其他狱友自由来往，并且可以接收信件。但随着他们每次行动的升级，对手的决心似乎变得更加坚定。谁会先屈服呢？

尽管亚当斯已经出狱，但他通过偷送信件和休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2]他成功重组了临时共和军，将重心从都柏林转移，建立了北方指挥部。[73]亚当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示，除非在斗争中融入政治维度，否则不可能赢得持久战。“我们不可能依靠共和军的军事胜利建立共和国，”他在1980年的一次事件中宣称，“我们一定要像帝制拥护者那样认识到，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取得胜利是痴心妄想。”[74]

虽然亚当斯主张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发起政治运动，但他并未提出任何放弃暴力手段的建议。1979年8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亲路易·蒙巴顿勋爵，这位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在斯莱戈郡海岸附近的多尼戈尔湾乘坐自己的渔船时，船只被无线电遥控的炸弹炸得粉碎，他自己也在爆炸中丧生。[75]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位家人，以及来自恩尼斯基林的一名当地男孩。

同年，有一位新首相入主伦敦唐宁街10号。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保守党领袖，她以其坚定的决心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她还是英格兰东米德兰兹郡的一个小姑娘时，她的家乡格兰瑟姆遭到了纳粹的轰炸。[76]她在北爱尔兰事务上最亲近的顾问是艾雷·尼夫，这是一个强硬派助理，担任过她的竞选负责人。[77]尼夫自己曾是一名战俘，从臭名昭著的科迪兹堡纳粹战俘营逃脱。和尼夫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撒切尔夫人，她上任时认为北爱尔兰类似于苏台德区——这些地区原属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数居民是德裔，后来在战争前夕被希特勒吞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或许和苏台德区的德裔居民一样，是地理的偶然因素所

导致的受害者。但在撒切尔夫人看来，这并没有给他们从英国分裂出去并加入邻邦的权利。当有人向撒切尔夫人介绍造成北爱尔兰问题升温并延长的微妙的人口因素时，她会低声抱怨道："所以，这就跟苏台德区差不多。"[78]

如果说撒切尔夫人对自己就爱尔兰问题的强硬路线表现得泰然自若，那么在她即将就任首相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她的立场。1979年3月30日，艾雷·尼夫驾车驶出下议院的停车场时，其驾驶座下的一枚炸弹发生爆炸，他在爆炸中身亡。[79]炸弹并非出自临时共和军之手，而是另一个共和党组织爱尔兰民族解放军所为，后者声称为此次袭击负责。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久，受挫的撒切尔夫人努力表现出一贯的镇定自若。[80]她说，尼夫一直是"一名自由战士，他勇敢、坚定、忠诚"。这起谋杀案发生在距她就任首相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为她对任何形式的爱尔兰共和主义的不妥协姿态奠定了基础。

当撒切尔夫人开始她的新职位时，朗·凯什已经有几百名囚犯加入了"邋遢抗议"。[81]示威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你彻底违背了社会要求的教养，"其中一名抗议者后来回忆道，"包括你了解的所有基本卫生知识和行为规范。"[82]仿佛和狱警之间的冲突还不够激烈，临时共和军开始将目标对准休班的监狱官员，对他们实施暗杀。[83]然而，英国政府仍不愿缓和立场。1976年，当时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罗伊·梅森结束拘留令和特殊类别身份时，他形容爱尔兰共和军是"土匪恶棍"。[84]撒切尔夫人也是这种口气。"没有像政治谋杀、政治轰炸或者政治暴力这样的说法，"她坚持道，"我们不会对此妥协，政治身份是不会得到准许的。"[85]她曾断言："犯罪就是犯罪就是犯罪。"（crime is crime is crime）[86]这一简短而干脆的表达很快家喻户晓。

1980年秋，作为对英方的回应，布伦丹·休斯将反抗行动再次升级。[87]他宣布了绝食抗议的计划，并招募自愿加入的抗议者。囚犯的士气十分高涨，有100多人报名参加。最后他们选定了七人组成的队伍，由决定加入绝食行列的休斯带领。[88]休斯从不要求下属做任何他自己不愿做的事，这一点他一直引以为傲。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七个人开始拒绝进食。一连数周，休斯坐在牢房里，他变得越来越无力，越来越瘦弱。他的脸颊凹陷，参差不齐的黑胡须和长长的头发令他看起来像一个年迈的占卜者。监狱的医生名叫戴维·罗斯，他对休斯很友善。[89]每天早上，罗斯会带来一瓶新鲜的泉水，告诉他这比监狱的自来水要好。他会坐在床边，跟休斯聊聊钓鱼，谈谈山川河流。



布伦丹·休斯进行绝食抗议

布伦丹·休斯以其出众的策略而著称，但绝食一开始，他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由于七个人全部在同一时间开始绝食，最后会有一人首先到达死亡的边缘，而其他六人将被迫做出抉择：是取消绝食救其性命[90]，还是继续绝食任其死去？有一个相对年轻的26岁小伙子参与了绝食，他叫肖恩·麦克纳，来自纽里。[91]休斯原本不想麦克纳参加，但他十分坚持。绝食开始后，他很快就病倒了。最后，他坐着轮椅被关进了监狱的医院区。随着绝食的进行，麦克纳的恐惧日益加深。[92]有一次，他对休斯说："黑鬼，我不想死。"休斯向麦克纳保证不会让他死去。

临近圣诞节，麦克纳开始断断续续陷入昏迷。[93]休斯看见护工抬着担架上的麦克纳急匆匆地穿过医院区，他还看见两名牧师站在罗斯医生旁边。[94]假如休斯不介入，这个孩子将会送命。这意味着他将违背自己的诺言，就像他违背了对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网开一面的承诺那样。但如果休斯介入，绝食抗议就会结束。抗议者便会成为先眨眼的一方，丧失他们的影响力。休斯能闻到医院区溃烂的身体散发的味道，他还能意识到他自己的身体自我侵蚀的气味。[95]最后，他大喊了一声："喂他吃！"[96]就这样，绝食抗议结束了。

医生吩咐护工准备一些炒鸡蛋。[97]断食53天后，休斯开始再次进食，他的健康逐渐恢复，体重也随之增加。但他为搞砸了绝食抗议而感到羞愧不已。[98]囚犯们几乎立刻决定安排第二次绝食。这一次，他们

准备把抗议者错开。[99]由一个人先开始，第二个人一个星期后跟进，接着第三个人再过一个星期后加入。如此一来，是否继续绝食将不取决于集体，而完全由每一个抗议者决定自己的生死。由于休斯还在恢复中，囚犯们为第二次绝食选择了一个新的领头人。他将第一个开始断食，很可能也将是第一个死去的人。他们推选了组织文化课的那名年轻志愿军——博比·桑兹。

十六　发条娃娃

阿马是一座拥有主教座堂的美丽城镇，距贝尔法斯特大约一小时车程。它和罗马一样，建在七座山上。两座大教堂的塔楼独绝天际，其附近矗立着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石筑女子监狱。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前，阿马监狱关押的人数从未超过十几人。[1]大多数囚犯都是因为醉酒、卖淫或者诈骗而被监禁。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到达那里时，监狱里关押了100多名女性，其中许多人参与过共和党的行动。[2]将姐妹俩迁至女子监狱的决定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人说她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位统一派政客把这一拘押安排比作“将蟒蛇装进纸袋子里”。[3]

当普赖斯姐妹步入高墙围绕的监狱时，一群共和军女囚犯已经等候多时，她们举着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回家。[4]往监狱深处走时，她们看见其他囚犯盯着她们，在牢房内外紧张地窜来窜去。“这是她们吗？”[5]有人小声问道。她们早已名声在外。“我们听说过太多关于这两个姑娘的消息，我以为会看到两个骷髅架子。”一名同监狱的囚犯后来回忆道。事实上，她心想：“她们就像两个电影明星。”[6]在她们到达之前，共和军的女囚犯强调要把牢房打扫一番。

有人把姐妹俩介绍给了艾琳·希基，她是监狱内部的共和军指挥官。不苟言笑的艾琳是出了名的令人敬畏，连狱警都听她的。[7]不过，阿马的看守比杜洛尔丝·普赖斯以前遇到过的任何看守都要放松。她们会待在一边，懒洋洋地站在窗台旁，给犯人们留出足够的空间。[8]有个女囚犯煎了一些土豆，杜洛尔丝津津有味地吃完了。她很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了。[9]

事实证明，这个现成的社区显然比布里克斯顿更加友好。但这同样是因为，在两年的监禁和绝食抗议的努力及此举被曝光之后，普赖斯姐妹准备从激进的政治态度中有所收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对前线革命的欲望已不似从前那般。此外，在竭力争取调回阿马，以及从最开始便表示对爆炸行动不抱任何歉意并将乐意服刑之后，她们觉得自己赢了。1975年3月，她们被准予了特殊类别身份，这意味着她们不必像其他犯人一样按要求做洗衣和缝纫的活。[10]她们有权穿自己的衣服，还住进了收容特殊类别犯人的新建区域。[11]这片区域被叫作C区，相对比较宽敞。里面的布置就像旅馆的套间，有一个看电视的房间和一个能进餐的厨房。[12]

狱警负责人是一个长着龅牙的女人，囚犯们叫她大苏西，她不像英格兰的看守那样冷漠。[13]这里的守卫要宽松许多，监狱并未强迫犯人长时间待在牢房里。[14]白天，杜洛尔丝会画画写信。[15]她和玛丽安还能上函授课程。[16]她们做过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能送到监狱外售卖，为共和军的事业筹钱。[17]杜洛尔丝做过皮革制品，不过她并不喜

欢。[18]芬纳·布罗克韦是英国上议院的一名议员，普赖斯姐妹在布里克斯顿服刑期间，他是姐妹俩的支持者。在写给芬纳的一封信中，杜洛尔丝描述了她为其92岁生日制作的一个钱包。她开玩笑说，钱包寄出以后，他可不要因为看到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小包裹”而感到恐惧——那不是炸弹。[19]夜里锁门后，囚犯们在各自的牢房里互相交谈。有人会用爱尔兰语带领大家念诵《玫瑰经》，偶尔会有人讲鬼故事。[20]对杜洛尔丝而言，阿马监狱就像没有老师的寄宿学校。[21]在这段时期的一张快照里，姐妹俩在一群微笑的狱友旁摆出姿势。虽然身在监狱，但她们却显得魅力四射。



玛丽安和杜洛尔丝（左）在阿马监狱

然而，即便眼前的新生活比之前的更好，但这仍然是监狱生活，很快就变得索然无味。日子一天天过去，杜洛尔丝开始凝视透过监狱窗户看到的天空——那一小块蓝色。[22]阿马的有些女性发起了自己的“邋遢抗议”，不过普赖斯姐妹没有参加。[23]她们开始在细微的方面从这场运动中抽身出来。“事情开始变得不太对劲，你也开始有了疑惑。”[24]杜洛尔丝后来说。1978年2月，共和军袭击了贝尔法斯特城外的拉蒙之家饭店，当时里面挤满了平民。[25]爆炸造成12人丧生，几十人重度烧伤。“发生这种事后你不得不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杜洛尔丝回忆道，“我这么做是因为想把人们烧死吗？我这么做是因为想让他们化成灰烬吗？”[26]当共和军命令杜洛尔丝远离其他那些选择回避“邋遢抗议”的共和党女性时，她因为无法服从命令而退出了组织。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因为她们做出的牺牲而在共和军中获得了传奇地位。不过，用杜洛尔丝的话来说，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个自由共和党人”。[27]

在给芬纳·布罗克韦的去信中，杜洛尔丝表示，她还开始重新思考暴力的功效。“杜洛尔丝和妹妹玛丽安一样，认定共和军的暴力行为大错特错。”[28]布罗克韦在给新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的信中如是写道，“我对杜洛尔丝和玛丽安都说过，如果她们在否定自己过去行为

的情况下出狱，她们很可能会遭到共和军枪杀，所以待在监狱里更安全。”但那个时候，普赖斯姐妹正在应对一个比政治更加直接而紧迫的难题。

“我们一直无法正常对待食物和吃这件事。”[29]杜洛尔丝后来说道。在英格兰经历了数月的绝食和强制进食之后，她们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复杂，无法逆转。杜洛尔丝指出，在绝食抗议期间，“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想吃东西。而你却告诉身体：‘不，你不能吃……要是我给你吃的，我们就没法赢得这次抗争。’所以你要建立一种非常艰难的思维模式，它必须绝对可靠，否则你就会忍不住吃东西。因为这是身体的本能，这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杜洛尔丝继续说道，在经历过这种自我克制以后，强制进食更是令这种痛苦雪上加霜，因为“它使我们对进食的过程，也就是把东西吃进肚子里的整个过程更加疏远”。她总结道，结果，“最后我们都对食物的功能产生了极度扭曲的认识，而且发现很难和吃这件事重新建立恰当的关系”。

在封闭的阿马监狱内，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社会因素在作祟。有几名女囚犯最近因为厌食症去世。[30]普赖斯姐妹虽然没有再进行绝食抗议，但她们现在也停止了进食。玛丽安的体重开始急剧下降，一项机密的政府评估最终得出结论，“把她关在监狱里无异于置她于死地（而其罪行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31]

1980年4月30日，玛丽安被释放出狱，她使用化名主动前往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就医。[32]政府发言人称，“过去三年她一直在接受强化治疗”，但她无法继续留在阿马治疗。[33]5月1日，她从医院出院。[34]这条消息引发了强烈抗议。英国小报暗示，这是她精心策划的一场越狱——厌食症不过是共和军的最新伎俩。[35]

看到妹妹重获自由，杜洛尔丝欢欣鼓舞。玛丽安一度危在旦夕，现在她可以活下去了。但在内心深处，杜洛尔丝充满矛盾。“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希望并且认为，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患难与共，那么这次也将会共进退。”她后来表示。两姐妹向来形影不离——不论是作为艾伯特的女儿，还是参加学生抗议，或者加入“无名氏”，又或是一起服刑并发起绝食抗议。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们分开了。对杜洛尔丝而言，这感觉“就像和我的连体双胞胎骨肉分离”。[36]

和布伦丹·休斯一样，信仰天主教的博比·桑兹在新教徒街区长大。但桑兹7岁时，他的邻居发现了他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结果他们从自己的家里被赶了出来。[37]最后，桑兹加入了共和军。1981年3月1日，他开始停止进食。[38]他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监狱定量分发的橘子，尝起来很苦。[39]“我正站在另一个世界的门槛，它震颤不已，”这是桑兹于绝食之初在一张厕纸上写下的话，“愿上帝怜悯我的灵魂。”[40]两周之后，第二名抗议者发起了绝食，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名抗议者加入。直到最后，朗·凯什一共有十名抗议者加入了绝食抗议的行列。谁也没有理由认为，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绝食的态度会比上一次更富同情心。“面对

他们名誉扫地的失败事业，暴力分子在最近数月选择打出可能是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张牌。”[41]撒切尔夫人说。

然而，桑兹发起绝食的四天后，一位名叫弗兰克·马圭尔的政客去世，并引发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42]马圭尔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作为弗马纳郡和南蒂龙郡的代表在英国下议院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突然离世使得下议院必须举行补选。最初，马圭尔的哥哥考虑参加竞选接替他的位置。但有几名共和党人找到了他，敦促他重新考虑。一个不太真实但也许很巧妙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博比·桑兹将以囚犯的身份参加此次竞选。这无疑是一种宣传噱头——但会引起共鸣。还有什么比让绝食抗议者参加竞选更能为抗议活动博取关注和支持呢？假如桑兹赢得选举，绝食抗议的权力格局将会被颠覆：英国政府也许不会在意某个不修边幅的毛毯抗议者死在监狱里，但如果将死的是议会议员呢？[43]

这一举措标志着临时共和军对自身原则的彻底背离。[44]历史上曾有过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的时刻，但共和党运动长期以来对议会进程持怀疑态度。几代人以来，许多共和党人一直坚持“弃权”的传统——完全和政治撇清关系。人们认为，一个人的革命热情极易被体制冲淡。这也是正式共和军与临时共和军在1969年分裂的部分原因——后者认为前者变得过于政治化，而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解。[45]

“至少在北部，共和党人不投票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格里·亚当斯会说。不过当他开始表明共和军和新芬党需要建立更大的政治组织时，他第一次看到了一种新型共和党政治的可能。他立誓：“总有一天，新芬党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一支政治力量。”[46]

亚当斯一直在想方设法使斗争更加政治化，对他而言，桑兹参选代表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许多北爱尔兰人或许不支持共和军的暴力行动，但会乐意投票让一名共和党绝食抗议者当选公职。亚当斯开始跟《共和党新闻》的编辑丹尼·莫里森合作，塑造一种表面看来有所矛盾的新哲学：一方面，新芬党会让候选人竞选公职；另一方面，共和军将继续向英国人发起血战。最后，莫里森用一句名言抓住了这一战略的精髓，他在新芬党的一次集会上问道：“如果我们用一手拿选票、一手拿枪的方式在爱尔兰获取政权，在座的有谁反对吗？”[47]

1981年4月10日，博比·桑兹当选议会议员。[48]他已经41天粒米未进了。但即便如此，他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桑兹的身体每况愈下，撒切尔夫人眼前面临着一场危机。4月25日，她和爱尔兰事务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进行了谈话。[49]“桑兹显然很坚决。”阿特金斯告诉她。

“他只剩几天时间了。”撒切尔夫人说。

“他们说可能两三天，”他说道，“但老实告诉你，玛格丽特，他们一点把握也没有。”

“是的，”撒切尔夫人用恼怒的语气尖锐地表示，“因为没有谁对这种情况有多少经验。”

阿特金斯指出，由于抗议者被错开，即便他们能在桑兹死后经受住公众的强烈反对和负面报道，几周之后很可能会有第二个绝食者丧命。“人们肯定非常希望我们能阻止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说，“我认为绝食队伍里肯定会有薄弱环节。”

撒切尔夫人推测，“假如绝食者一个接一个死去，而我们不做任何反应”，那么共和军领导层或许不会让绝食行动继续下去。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阿特金斯说。

“对，”撒切尔夫人认同道，“绝非好事。”

杜洛尔丝·普赖斯密切关注着绝食抗议的消息。但自从玛丽安离开阿马监狱，她的情绪开始逐渐崩溃。[50]“失去玛丽安以后，我变得失魂落魄。”她回忆道。她的体重开始迅速下降，性格也似乎越来越孤僻反常。1980年5月的一天，她吞下了十几片安眠药。[51]这是杜洛尔丝真的想自寻短见还是她发出的求救呼喊已不得而知，但她的确在监狱医院接受了洗胃。

“我的行动就像发条娃娃。”她在给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写道，在空虚麻木的日子里，睡觉是她唯一的庇护。随着30岁生日的临近，她回想起自己将近整个20岁的光阴都“荒废”在了监狱里。[52]她想过要一个孩子，并指出这种“天性”可能永远无法满足。“这令我难过不已，”她写道，“也将使我抱憾终身。”

出狱之后，玛丽安·普赖斯只去探望过杜洛尔丝几次。[53]每次当她在探视结束准备离开时，杜洛尔丝都会抓着她不愿放手。[54]多年以前她曾承诺，只要能回到北爱尔兰，她将毫无怨言地服刑，而如今她却感到愤愤不平。她在给布罗克韦的去信中写道：“这不公平，到3月份我的刑期就满八年了。就算杀人犯也不会蹲这么久的监狱，我却因为制造一场爆炸案被判了无期徒刑。”[55]作为“无名氏”的成员，普赖斯曾经参与过其他实实在在的致命行动。但她没有因此而遭到指控，现在她也没有提及这些行动。相反她指出，她甚至不再向共和军做出“空口承诺”，并且“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因为宣布退出组织而被当成了共和军事业的叛徒”。尽管如此，她誓言忠于朗·凯什的绝食抗议者。“我会（尽一个厌食症患者所能！）吃东西，但精神上我将在活着的每一天和他们一起挨饿。”她写道。

布罗克韦被这些信件深深打动，于是他直接向撒切尔夫人请愿，辩称普赖斯姐妹犯下伦敦爆炸案是因为“陷入了青春期的冲动”，而且她们向他保证，她们是在“不伤及任何人”的前提下加入此次行动的。布罗克韦自称“算得上她们的精神导师”，并表示两姐妹“已经坚信暴力是错误之举”。[56]他向撒切尔夫人保证，如果杜洛尔丝被释放，她将“不顾危

险”，致力于“敦促她的天主教同胞不要使用暴力”。

说服撒切尔夫人并非易事。“看得出来你相信杜洛尔丝已经摒弃了暴力。”她写道，并委婉地暗示，布罗克韦对于狡猾的普赖斯姐妹的话可能太过轻信。[57]撒切尔夫人说，她已经询问过杜洛尔丝目前的健康状况，“医生认为她比她的妹妹坚强得多”。有一件事令撒切尔夫人感到困惑，她在布罗克韦的一封来信边上草草写道：“玛丽安去看她的次数少得惊人，作为双胞胎之一，她肯定感到很不安。”[58]普赖斯姐妹的亲密程度让撒切尔夫人误以为她们是双胞胎。但即便如此，撒切尔夫人仍然指出，杜洛尔丝似乎对共和党怀有“同情”，就算她出狱了，“我怀疑她的老朋友们并不会让她清静”。

博比·桑兹竞选期间，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作家蒂姆·帕特·库根去阿马监狱的C区探望了她，并被她的智慧所打动。但他认为杜洛尔丝给人一种“狐猴般的感觉”。她“穿着优雅，精心打理头发和指甲，以此来抵消疾病带来的影响”。[59]库根如是指出，但她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了。

1981年4月3日，一位爱尔兰枢机主教托马斯·奥·菲奥赫致信撒切尔夫人。[60]他说自己去看望过普赖斯，过去一个月她一直被关在医务室里。“她无精打采，无人陪伴，几乎无法走路，而且需要有人帮忙才能上楼。”这位枢机主教曾在杜洛尔丝的情况恶化之前探望过她，他记得那时的她生气勃勃。他指出，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憔悴的幽灵，未老先衰，毫无求生的意志可言”。他要求撒切尔夫人认识到“这个姑娘危在旦夕的鲜明事实”。他还指出，一旦她死去，可能会立刻引爆一场相互指责的暴力冲突。枢机主教请求撒切尔夫人释放普赖斯，并表示“就算下周也可能为时已晚”。

尽管如此，撒切尔夫人仍不愿让步。她给奥·菲奥赫回信称，她明白普赖斯一家人的“忧虑”，但她无意释放杜洛尔丝。“普赖斯女士的情况会继续得到密切关注。”[61]她说。4月中旬，普赖斯从阿马被紧急送往贝尔法斯特马斯格雷夫公园医院的拘留病房。[62]入院的时候，她的体重是34公斤。

医院外，北爱尔兰再次陷入骚乱，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爆发了激烈的巷战。[63]医院的人每天都说，博比·桑兹很快会被送到那里。[64]有一段时间，普赖斯似乎有望和跟她如此类同的这位年轻绝食者在拘留区相遇。尽管她苍白憔悴，但这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她希望自己能向桑兹表达最后的敬意。

他一直没来。1981年5月5日，博比·桑兹去世。[65]那是他绝食的第66天，正如60年前特伦斯·马克斯威尼的死一样，桑兹的去世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格里·亚当斯后来回忆道，桑兹的死“比爱尔兰的其他任何事件所带来的国际影响都要巨大”。[66]数十万人涌上贝尔法斯特街头，目睹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67]爱尔兰南北双方对共和党事业的支

持出现了压倒性的激增。撒切尔夫人对采取强硬立场并不后悔。“桑兹先生是一名罪犯，”她在他死后宣称，“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的组织并未让许多其他受害者做出的选择。”[68]

但就在世界聚焦于她和博比·桑兹之间生死攸关的意志较量时，撒切尔夫人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了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仁慈。[69]桑兹去世的两周前，普赖斯“基于医疗原因”被释放出狱，其20年刑期的剩余徒刑得以免除。官方对于这一决定的解释是，她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突然晕倒，乃至去世”。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普赖斯想起博比·桑兹去世而自己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时，她都会落泪。[70]普赖斯姐妹两次傲视英国政府，并且在两次事件中，她们给自己的身体造成的伤害足以令她们获胜。桑兹的死或许让他显得不那么幸运。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殉难中获得了比他活着时更大的成就。并且汉弗莱·阿特金斯和撒切尔夫人推测错了，他们以为十个绝食者中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薄弱环节。然而桑兹去世后，另外九人紧随其后，他们在那个夏天一个接一个绝食而死。[71]

但杜洛尔丝·普赖斯感受到的和博比·桑兹之间的联系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被‘强制进食’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我们死不了，”她多年后写道，“在英国医疗委员会拒绝对囚犯实施‘强制进食’后，英国议会立刻通过了一项法案……令监狱无法用往囚犯喉咙里塞管子的方式让他们活下来！”[72]普赖斯姐妹结束绝食后不久，世界医学协会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称强制进食是不道德的行为。[73]在做出停止对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实施强制进食的决定后，英国的政策确实很快发生了改变。彼时罗伊·詹金斯宣布，英国监狱的绝食抗议者将不再遭受强制进食的措施。[74]当杜洛尔丝在1974年以这种特殊方式获胜时，她不知道自己所造成的环境将在七年之后使得十名抗议者绝食而死。[75]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常自问，难道这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整件事的帮凶吗？

十七　有为剧团

杜洛尔丝·普赖斯出狱的消息公开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伊恩·佩斯利，也就是那位狂热的保皇派教士兼政客，将其刑期的免除形容为“骇人的丑闻”。[1]他辩论称，普赖斯依然对社会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因为她“骨子里是个凶手”。有些观察人士提出，汉弗莱·阿特金斯受到了普赖斯姐妹的“蒙骗”——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是不思悔改的恐怖分子，她们为了确保自己出狱而蓄意发展了饮食失调的病症。[2]厌食症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熟知，人们将之形容为“减肥病”，仿佛引发痛苦的不是绝食或者强制进食，而是虚荣心。佩斯利和其他一些人阴暗地猜测，杜洛尔丝或许是在和博比·桑兹以及朗·凯什的其他绝食者的秘密协议中被释放的。

多年以后，杜洛尔丝描述道：“对于一个服刑多年的人而言，你出狱后进入的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重新开始学会生活。”[3]在监狱里被关了八年后，她回到家人身边开始恢复，体重也逐渐开始增加。严格说来，她是被“许可”释放的，这意味着她的自由有附加条件。[4]一旦违反了这些条件，她随时可能重返监狱。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她不能离开北爱尔兰。但在出狱几个月后，她请求政府的准许，到爱尔兰共和国度过一个月的暑假。[5]撒切尔夫人亲自审阅了这一请求，并最终给予批准。

然而，普赖斯想要的不只是到南部度假，而是彻底搬到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相比，都柏林的氛围一向更加自由，不那么紧张，从文化而言也更富活力。城里的咖啡馆和运河让人感觉北部的冲突那么遥远，这里似乎是普赖斯追求新抱负的理想之地：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报纸自由撰稿。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对她是一个很自然的职业。她一直有一种牛虻的特质，而这份工作能让她间接接触政治，同时远离准军事前线。1982年12月，出狱一年半以后，她在《爱尔兰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厌食症的报道。[6]她在其中指出，厌食症作为一种疾病其实完全在于控制，诸如戴安娜王妃和简·方达这样的著名女性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她错误地提出，厌食症通常发生在“高于平均智商”的人身上。

搬到爱尔兰共和国前后，普赖斯都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监视。这些监视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她仍在参与“任何非法组织或任何恐怖活动”。[7]事实上，一份监视报告指出，在她出狱后不久，曾经的共和军战友找过她，要求她参与一项任务，结果被她断然拒绝。[8]

普赖斯一直对人文感兴趣，而现在她正利用白天的时间写一本书，内容和她在布里克斯顿的经历有关。[9]她谈过有关出版的事。根据1982年《爱尔兰日报》的一则短消息，这本书将阐述“她从一名共和军成员到支持和平主义（并最终在阿马监狱退出共和军运动）的心路历程”。也许

普赖斯确实乐意将非暴力当作个人哲学，但她是否彻底摒弃了武装抵抗的共和党传统，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这种小心翼翼见诸报端的新闻，很可能是特意给那些英国官员看的，因为他们将决定普赖斯狱后生活的自由程度。杜洛尔丝把书的手稿给埃蒙·麦卡恩过目，他觉得有些枯燥——都是些她在监狱的流水账。不过她成功地在戈尔韦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节选，其中不乏抒情之笔。[10]文中描写道，夏日的阳光晒暖了临终病房的地板，她能感觉到“赤着的脚上太阳的余温”。

普赖斯和斯蒂芬·雷的重逢是她出狱之后的事。[11]雷是那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演员，她在学生时代初次和他相识，后来又于爆炸案前夕在伦敦看过他的舞台演出。雷比普赖斯大五岁，他体形消瘦，满脸皱纹，举止文雅。他有一种沉默寡言的气质，不过他和普赖斯一样，狡黠尖刻，才思敏捷。他会在漫不经心地酝酿笑话时移开视线，然后突然在抖出包袱时定定地看着你。[12]

雷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家里住着父母、祖母和三个姐姐。[13]不过虽然普赖斯成长于安德森斯顿的共和党家庭，雷却是一名新教徒。年纪稍长的他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贝尔法斯特，其所在的区域对他的文化影响更加兼容并蓄。“我是在一个混合地区长大的，有形形色色的邻居和形形色色的朋友。[14]和我父亲一起喝酒的——他经常喝酒——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因为我们那儿就是这种地方。”他曾经解释道。雷小时候扮演过儿童剧《小红帽》里的大灰狼，当时他就决定自己想当一名演员。[15]

首先他必须离开贝尔法斯特。他喜欢这座城市，但认为那里没有空间施展拳脚，无法闯出一片新天地。[16]虽然身为新教徒，但他对民族主义事业有所共鸣。他认为，在半个世纪的压迫后，天主教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发动某种形式的抗争。[17]雷后来在西贝尔法斯特住过一段时间，当他在当地社区的节日登台亮相时，他的新教同胞将之视为背叛之举。[18]



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

20世纪60年代期间，他进入皇后大学学习，并在学生抗议活动中和普赖斯初次相遇。但随着北爱尔兰问题的出现，杜洛尔丝卷入了革命活动，雷则在都柏林著名的艾比剧院出演戏剧。他对那里也不满意，认为“爱尔兰糟蹋人才”[19]，于是他再次搬家，这次来到了伦敦。当普赖斯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绝食抗议，接着在阿马监狱傲视撒切尔夫人时，雷正在成为伦敦的知名演员。[20]他曾在皇家剧院、老维克剧院和英国国家剧院扮演过一系列备受瞩目的角色，偶尔也会出现在英国的电视荧幕上。

那些年里，雷面临爱尔兰演员在英国舞台上常见的困境：他应该对自己棱角分明的阿尔斯特口音做多大程度的调整，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英国人呢？[21]作为一个有天赋的模仿者，他无疑能“假扮”英国人。[22]而为了演艺事业的发展，人们也是这么建议他的。不过，雷有着和

普赖斯一样的倔强。最后他决定，宁肯做一个失业的爱尔兰人，也不愿为了找工作而故意操一口英国口音。毕竟，爱尔兰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将英语改造一番，创造出新的音调。虽然爱尔兰人在跟英国人的政治冲突中经常败下阵来，但“他们在语言方面一直高奏凯歌”。[23]

1983年秋天的一个周六，普赖斯和雷结婚了。他们把婚礼地点选在了阿马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山下不远处就是杜洛尔丝过去在C区的住所。[24]婚礼由雷蒙德·穆雷神父主持，他是阿马监狱的牧师，曾为杜洛尔丝出狱一事多方游说。也许是考虑到老贝利大楼的袭击者和伦敦知名演员的结合会引来众多关注，他们决定秘密举行婚礼，现场只有两位见证人。[25]事后一家英国小报找到穆雷神父，但他不愿透露任何细节。[26]“两位新人让我不要谈论婚礼的事，”他说，“我发誓会保守秘密。”

在此期间，雷还与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再次建立联系。[27]雷曾经在伦敦爆炸案前夕表演过他的剧作。1980年，他们两人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有为”的新剧团。剧团用话剧《译名》的世界首演举行了成立仪式，这部话剧后来被认为是弗里尔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833年多尼戈尔郡的一所学校里，讲述的是英国军队做出的一项调查。他们首先确认了当地的爱尔兰地名，然后用英文译名或对应的音节替换原有的名称。这部剧在德里的市政厅开演。市政厅是联邦主义的象征，以至于它成了共和军频繁攻击的目标。首演当晚，大楼的部分区域仍有脚手架立在旁边，工人们正站在上面修复袭击造成的损伤。[28]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有点挑衅的意味——但也暗含了一种希望。

弗里尔和雷决定，新剧团每年创作一部话剧在爱尔兰巡演。[29]公司逐渐吸纳了一群杰出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其中包括诗人谢默斯·迪恩和谢默斯·希尼。[30]政治是有为剧团的敏感问题。弗里尔从小信奉天主教，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公司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一位批评家形容有为剧团是“临时共和军的文化部”。[31]不过，虽然他们表演的戏剧经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这些政治色彩往往很隐晦。雷也坚决拒绝被刻画进任何意识形态的角落里。有为剧团的作品是“最广义的政治行为”，他说。[32]据雷所言，公司的部分理念在于，如果全爱尔兰的所有人听到同一个故事，那么这对这个分裂国家的边境双方也许能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33]公司董事会包括三名天主教徒和三名新教徒。（“全是背教者”，其中一人指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统一派。[34]

实际上，这代表雷一年要花五个月的时间在路上巡演。嫁给雷意味着杜洛尔丝·普赖斯事实上加入了剧团，她经常陪他一起出行。[35]普赖斯协助管理公司的账簿和通信，记录旅行的路程和汽油的费用，并负责把车开到汽车修理厂（她称之为“汽车医院”）。[36]他们在岛上来回奔波于南北之间，到爱尔兰30年未曾见过专业剧团的地方巡演。[37]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们开着拖拉机前来，跳下车后漫步走到临时舞台前观看话剧。[38]

尽管如此，一份重要的事业正在伦敦召唤着雷。而这无疑给夫妻二

人抛出了一个难题：严格说来，普赖斯住在都柏林并随有为剧团在爱尔兰共和国巡演的举动已经违反了她的出狱条件。普赖斯和雷婚后不久，英格兰便有传言说，她将陪他去伦敦出席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39]英国小报发出了警告：这个臭名昭著的“炸弹女孩”会有胆量重访她曾用炸弹袭击过的城市吗？[40]最后普赖斯没有成行，但她私下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取消居住地的限制，或者至少批准她去英格兰看望自己的丈夫。[41]

她谨慎地从家乡贝尔法斯特的家里寄出了这些手写的请愿书。[42]但事实上，当局知道她大部分时间住在都柏林，已经违反了出狱条件。当请愿书送到撒切尔夫人手中时，一直认为普赖斯善于摆布他人的撒切尔夫人向下属写道：“我认为这完全是在玩弄我们，应予以坚决回绝。”[43]

普赖斯过去曾违抗撒切尔夫人并取得胜利，现在她再一次违抗了她。1985年5月，福克斯顿的一名警察拦下了一辆车。[44]福克斯顿位于英格兰东南部，与法国隔海相望。这辆车上坐着斯蒂芬·雷和杜洛尔丝·普赖斯。当被问到住在哪里时，他们提供了伦敦的住址。夫妻俩住在梅达·韦尔住宅区的一套公寓里，就在英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拐角处，离老贝利只有几英里。[45]

普赖斯公然违反出狱条件回到伦敦的事实，对撒切尔夫人而言是一种侮辱。福克斯顿事件过后，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建议政府修改普赖斯的出狱条件，以顺应她已经在英格兰的事实，并直接允许她留下。[46]但撒切尔夫人不同意。11月，一名助理写道，普赖斯“依然和丈夫住在梅达·韦尔住宅区”。[47]他指出，如果她再次被关起来，这将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引发“迫切而不利的反应”。此外，他谨慎地提出，如果他们真的又把普赖斯关进监狱，她很可能会立刻停止进食，那么他们将直接回到最初的原点。这名助理承认，虽然理论上夫妇两人可以在北爱尔兰生活，“但对一个著名演员来说，他很难在那里继续自己的事业”。似乎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就是修改普赖斯的出狱条件。特殊分队的一份报告指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认为她对大不列颠存在威胁。”[48]然而，撒切尔夫人不愿修改条件。事实上，她宁愿容忍普赖斯无视出狱的规定，并直接假装自己不知情，也不愿承认她已经被逼到必须改变立场的地步。[49]

有些公职人员担心，这对夫妻“非同寻常的地位很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并招致非难”。[50]但撒切尔夫人不愿让步。“我认为雷太太不应被允许住在这里，”她写道，“她是有条件被送回北爱尔兰的。如果她和她的丈夫希望在一起，他们可以在北爱尔兰生活。”她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如果她继续留在英格兰，那么她将被关进监狱。”[51]

英国报纸一向对普赖斯兴趣甚浓，很快便发现她在伦敦，过着嫁给著名演员后的时髦生活。一些评论绘声绘色地描写道，袭击老贝利的炸弹手“在国家剧院和明星们浅酌香槟”。[52]斯蒂芬·雷被选定在维多利亚

剧院参演音乐剧《上流社会》时出现了一些流言，当时王太后预计出席此次演出。那名共和军恐怖分子会到场吗？她会和王太后握手吗？“杜洛尔丝已经表明，她不会出席任何皇家庆典表演。”雷的经纪人告诉媒体，“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完全由她自己决定。但她已经表示会留在家里。”[53]为了表述得体，经纪人补充道，“家里”是指贝尔法斯特。

雷后来表示，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前共和军武装分子并未给他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54]“跟我共事的人对这一点都非常宽宏大量。”[55]他说。但他经常不可避免地被问及妻子的过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往往会被激怒。雷希望媒体只关注自己的表演，不要纠缠于他的私生活，更不要说其配偶的过去和政治观点。

尽管如此，他不得不为了每一部新作品的宣传而接受采访。[56]人们逐渐发现，只要话题涉及他娶的那个女人，他就会突然终止采访。在采访雷的记者中间，这成了一个笑话：绝对，绝对不要提他的另一半。[57]

但雷所选的角色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他最后演的角色往往是一名深情的枪手——而这名枪手又往往出自共和军。“我所呈现的是对正派普通人如何参与武装斗争的理解，”他说，“以及它为什么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58]在极少数情况下，他谈到过妻子用炸弹袭击伦敦的事件。[59]这时他会强调，当天死亡的唯一一个人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有一次，在1988年一部纪录片的采访中，雷被问到他自己为实现政治目标能做出的最大努力是什么。“我永远不可能当一名士兵，”雷说，“我做不到。我是说，我想你是在问我是否愿意诉诸暴力之类的。”他顿了顿。“就我自己来说，我做不到，”他继续说道，“但我认为暴力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现阶段它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选择。它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且当权派也有很多暴力之举。”[60]

采访者问他，政治变革能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吗？

“我不知道，”雷说，“历史上有这种先例吗？”

当局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她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她已经放弃使用暴力手段来争取爱尔兰的统一，至少这是她的个人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她摒弃了共和主义。她为新芬党候选人进入贝尔法斯特市议会拉过选票。[61]尽管有着坚定的共和党背景，但她适应了向选举政治的转变，以及一手拿枪一手投票的策略。1983年，她曾经的指挥官格里·亚当斯亲自步入政坛。距亚当斯派普赖斯袭击伦敦已经过去十年，如今他却代表西贝尔法斯特在威斯敏斯特争取一席之地。亚当斯修剪了头发，并逐渐把游击日子里穿的套头便装换成了满衣柜的灯芯绒和粗花呢衣服。[62]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敏捷的头脑一直给人一种教授的风范，而现在他的外表也变成了学者派头。他甚至抽起了烟斗。亚当斯之所以欣然决定采用选举策略，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博比·桑兹的成功当选，尽管

桑兹还未任职就已经去世。作为对共和军弃权传统的回应，亚当斯宣布，如果当选，他将抵制威斯敏斯特，不会现身议会。普赖斯支持他，而且喜欢上了竞选。“投给新芬党！”她喊道，“投给格里·亚当斯！”[63]在选举日，她开车把选民送到投票站。亚当斯最终获胜。

十八　血色信封

1988年的春天是贝尔法斯特的葬礼季。3月6日，梅雷亚德·法雷尔和两个同伴在直布罗陀街头被枪杀。[1]法雷尔是一名31岁的女性，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黑色的头发。她曾经跟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一起在阿马监狱服刑。但与普赖斯姐妹不同的是，她出狱后再次积极投入任务。法雷尔作为共和军的小组成员抵达了直布罗陀。他们从西班牙南端进入了这片英国领地，计划发动一次爆炸袭击任务。但在他们有机会实施行动之前，有一天他们正走在路上，没有携带武器。[2]这时，几名身着便衣的英国突击队员靠近并击毙了他们。有些人断言，这是军方对其保密的“格杀勿论”政策的一种表现。三名志愿军的遗体被声势浩大地运回了北爱尔兰，庞大的送葬队伍肩负他们的灵柩穿过贝尔法斯特，数千名哀悼者跟随其后。

亚力克·里德神父将在坟墓旁主持葬礼。里德56岁，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长脸，眼皮耷拉在细小的眼睛上。他成长于蒂珀雷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至圣救主会。[3]这是一个天主教牧师修会，他们致力于救助穷人和被遗弃者。20世纪60年代初，里德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前搬到了贝尔法斯特，并进入了克隆纳德修道院。[4]这是一座古老的大型哥特式建筑，建造于19世纪末，正好落在共和派的福尔斯路和保皇派的尚基尔路之间的界线上。修道院的创立者后来对这个选址后悔不已，据说他是这么讲的：“我怀疑没有哪个地方的麻烦和痛苦比这里更多了。”[5]但它为里德神父提供了一个优势，让他能近距离见证北爱尔兰问题。

他所做的不只是见证。里德注意到，有些神职人员喜欢躲在《圣经》后面。但他却常说，自己是个“街头”牧师，永远处在风口浪尖，作为贫民区的外交官默默地调解争端。[6]有时，他会将自己置身于准军事组织的夙怨中。这可能带来危险，但正如里德面对其他牧师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冒险地插足这些困境——时，他回答：“若莫做，做莫休。”[7]里德笃信对话的力量：只要你能让人们开始交流，他相信，再势不两立的仇人也能找到共同之处。[8]

20世纪70年代，里德神父定期造访朗·凯什，逐渐与布伦丹·休斯和格里·亚当建立了密切关系。亚当斯曾住在克隆纳德附近，小时候每周会去修道院接受一次宗教教导。[9]亚当斯出狱以后，里德会帮这位年轻领袖和他仍在监狱的同志，比如休斯，来回传递消息。里德似乎经常卷入这样或那样的密谋中，于是休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幕后推手”。[10]

虽然里德充当信使帮临时共和军传递消息，但这并不代表他纵容他们的行动。相反，对于导致社区四分五裂的暴力行为，他感到深深的不安。里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其他牧师经常看见他在修道院的花园里踱步，点着一根烟陷入沉思。[11]他认为，他的职责是替受害者发声——是代表下一个可能在冲突中丧命的人。他没有特别的党派，他只忠诚于

那些已经（和将要）倒下的人。[12]里德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机会发现恩典；在最可怕的境遇中，一个人依旧能效仿耶稣的榜样；战争能唤起人性中最恶劣的部分，但也能唤醒最美好的。“你会在北爱尔兰问题的旋涡中遇见上帝。”[13]他说。

在共和军的葬礼上，英国安全部队的出现一直是造成紧张的原因。在许多知名共和军成员出动的情况下，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和军方极少错过监视机会，在这些场合拍照并收集情报。但对送殡者而言，这种侵入会显得有失尊重、令人不安，甚至给人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尤其当下葬的人是死于英国人的枪口之下。然而，当梅雷亚德·法雷尔和两位同伴的灵柩穿过西贝尔法斯特的街道时，却看不到任何警察或士兵的身影。显然，当局接到了远离葬礼的指示。[14]在西贝尔法斯特的弥尔顿墓地，当第一具棺木在林立的凯尔特十字架中落入新挖好的墓穴时，格里·亚当斯和其他显要的共和党人聚集在侧，周围默立着数千名哀悼者。五年前，亚当斯入选威斯敏斯特议会，如今他是一名议会议员。[15]他经常主持共和党人的葬礼。

里德神父开始缓慢而庄重地念诵祈祷文。但就在这时，他抬头发现，静止的人群边缘有些动静——远处有一个人，他身材魁梧，穿着一件厚夹克。他正不怀好意地走向送葬的人群。他把手伸进夹克里，掏出了一个貌似黑色的鸡蛋的光滑物体。[16]里德立刻以为那肯定是一块石头——在贝尔法斯特，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扔石头。[17]现在看来，这个人胆敢冒犯神圣的葬礼，在这里也扔一块。果然，那人摆出架势，扔出了手上的东西。接着，里德听到了爆炸的巨响。[18]那不是石头，而是一枚手榴弹。

人群骤然恐慌，四散奔逃，有的躲到墓碑后面，有的滑入刚挖好的墓穴里。亚当斯感觉可能发生踩踏事件，于是抓过一个扩音器大吼道：“大家不要惊慌！”[19]轰！又一枚手榴弹爆炸了。有几名送葬者开始朝那个人冲过去，准备把他制服。然而，他们还没跑过去，那个人就掏出一把枪，开始射击。

枪手在子弹和手榴弹的掩护下撤出墓地，沿着一个下坡朝M1高速公路逃去。追捕他的送殡者有几十人，他们只得放慢速度，在墓碑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迂回前进。[20]等枪手跑到汽车飞驰而过的M1高速公路时，他的子弹已经耗完。追捕者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得不省人事。他被拘留起来，身份被确认为迈克尔·斯通，是东贝尔法斯特的保皇派，加入了阿尔斯特防卫协会。[21]那天他去葬礼，原本是想杀死格里·亚当斯和其他高层共和党人。斯通没有成功袭击亚当斯，但他造成另外三名送葬者遇难，60多人受伤。[22]

因此，为了安葬遭袭击的三名遇害者，人们又安排了一场大型的葬礼。[23]局势的紧张前所未有。公墓的谋杀事件发生后，亚当斯提出了一个阴险的推测，当局选择避开葬礼绝非出于偶然——他们可能对这名保皇派枪手的意图一清二楚，并跟他串通一气。[24]

随后的星期六，里德神父出席了在圣艾格尼丝教堂为其中一名死者凯文·布雷迪举行的葬礼弥撒。[25]当他走出教堂时，庞大的殡葬队伍正沿着安德森斯顿路往墓地行进。布雷迪生前是一名计程车司机。[26]因此，除了常见的送葬者，还有一小列黑色出租车作为仪仗队缓缓前进。三名遇难者将被安葬在他们几天前遇害的同一地点。[27]大批人群聚集在街头，他们怨愤不已。格里·亚当斯走在送葬行列里。里德神父步出教堂加入了队伍，他想找到布雷迪的家人，他们走在灵柩的后面。[28]

然而，正当里德靠近布雷迪的家人时，出现了一阵骚动。[29]一辆不起眼的银色大众汽车出现在人群边缘的路上。这辆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接着又突然停下，被引领送葬队伍的黑色计程车方阵拦住了去路。[30]人群中骤然涌起一阵焦虑。这又是一场袭击吗？突然，大众汽车急速后退掉头。然而，它还未来得及启动，便被人群迅速包围。车上坐着两个人。数百名送葬者朝小车蜂拥而上，这时车内有人亮出了一样东西。[31]“他有枪！”有人大喊。“他们是警察！”——又有人喊道。[32]其中一人确实挥舞过一把手枪，并在惊慌之下朝空中开了一枪。[33]然而，即使人群将车堵死，有几个人爬上车顶，还有人踢开了车窗，乃至送葬者开始把两人从车里拖出来，并对他们拳打脚踢，撕扯他们的衣服，他们也始终没有朝人群开枪。[34]

他们不是警察。他们是士兵[35]：两名英国下士，德里克·伍德和戴维·豪斯。当时他们正在那片区域开车，结果误将方向盘转向了死亡之路。在意识到自己开进了送殡的路线后，豪斯和伍德惊慌失措，并试图逃跑。但那时，他们已经被黑色计程车包围，被人群吞噬。[36]

有人拿来一个卡锁扳手砸碎了车窗。[37]里德神父看见两人从车里被拽了出来，接着连拖带推地被带到了附近的公园。[38]在那里，人群扯下了他们的衣服，两名下士身上最后只剩内裤和袜子，然后他们被强行摁在地上挨打。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疯狂——你能感觉得到——里德向施暴地点跑去，心里明白这两个人即将被枪毙。[39]他爬到两个士兵中间，分别用两只手臂搂住他们。[40]他趴在那儿，希望以这种方式阻止攻击者扣动扳机。“快叫救护车！”[41]他大喊。

但一个声音在上面咆哮道：“快起来！否则我他妈连你也毙了！”[42]随后，一双粗暴的手把里德从地上拉了起来。

两个士兵被扔进了一辆黑色计程车，接着被带至彭尼巷附近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将近200米远。[43]里德赶过去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枪响。[44]戴维·豪斯23岁，刚刚抵达北爱尔兰开始服役。[45]德里克·伍德24岁，原本计划不久就回家。[46]两个人被扔在那儿，四肢摊开躺在碎石之间，脸色苍白，像搁浅的鲸鱼。[47]头顶的天空上，一架直升机正在慢慢盘旋。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里德神父跑到了两人身边。其中一个显然已经死了，但另一个稍微有点动静。里德俯下身去时，能听到呼吸声。里德抬起头，发疯似地望

向周围站立的人群，问是否有人知道怎么让一个人复苏。谁也没有回答。他们就站在那儿，看着。里德蹲伏在那个士兵身上，用自己的嘴对准他的嘴，试图把生命重新注入他的体内。但是，呼吸最终停止了。有人说道：“神父，那个人死了。”[48]

里德抬起头，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名摄影师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记录的，或许是北爱尔兰问题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身着一袭黑衣的牧师跪在地上，料理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他双臂张开，就像耶稣一样，躺在牧师面前。里德的视线正对相机，镜头见证了这一惨状，他薄薄的嘴唇上沾着死者的血。[49]里德不清楚两名士兵是不是天主教徒，但正如他数天前为死于弥尔顿公墓的哀悼者所做的那样，他给他们都抹了圣油，并进行了最后的祈祷。



亚力克·里德神父为戴维·豪斯下士进行最后的仪式

20年前，自暴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来，所有的杀戮流血一直沉重地背负在里德身上。“人们已经受够了，”他在枪杀案的数小时后接受采访时说道，“人们必须互相倾听，但人们一直没有这么做。”[50]他补充道：“动用武力是不幸者绝望的表现。”[51]然而，尽管当天里德公然违背人群，料理被杀害的两名士兵，但他却仍在幕后忙于一件事。他在酝酿一个计划：一个秘密而大胆的计划，以结束这场冲突。

那天早上，里德神父在离开圣艾格尼丝教堂的追思弥撒之前，拿到了一份秘密文件。[52]多年来，他一直试图阻止教派分裂双方的准军事组织和普通民众诉诸暴力。[53]但他逐渐认为，结束冲突最可靠的办法，是说服共和军停止斗争。[54]里德开始跟格里·亚当斯谈论这个问

题，并发现他愿意考虑这一提议。或许亚当斯对未来有了不同的展望；或许他发现选票和子弹非但不能互补，反而南辕北辙；又或许他只是倦怠了。不管怎样，里德发现，当他最初向亚当斯发出呼吁时，他是在“推开一扇打开的门”。[55]后来，里德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因为他哄劝亚当斯走上了和平之路。但是，在跟两人私交甚密的布伦丹·休斯眼里，似乎从来不是亚当斯被神父操控。[56]相反，休斯回忆道：“我相信，自始至终，一直是格里在操控他。”

亚当斯认为，里德是无懈可击的召集人。“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机构就是教堂。”他告诉里德。只有教堂具备必要的地位、可靠性和跟相关党派的联络渠道来实现和平。[57]唯有一个共同的和平策略，将共和党人、社会民主工党（SDLP）的非暴力民族主义者，以及爱尔兰共和国政府联合起来，才能让共和军甘愿放下武器。[58]

这在理论上或许听起来很诱人，但在实践中会带来重大挑战。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是约翰·休姆，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很精明的德里政客，比亚当斯年长11岁。休姆是温和派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英雄，曾多次谴责共和军的暴行。“他们炸毁工厂，却又抱怨失业，”他在1985年说道，“他们在教室里枪杀老师，杀死校车司机，在校园里杀人，却又跟我们讲教育。他们将人们致死致伤致残，还对医院发动袭击，却又告诉我们要保护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他们抢劫邮局，导致人们无法领取救济金，却又跟我们宣扬要保护穷人。”[59]在休姆看来，共和党运动的伪善——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选票配子弹的骗局——是那么处心积虑。“他们真实的战略和目标一目了然，”他说，“那就是，让军事羽翼尽可能制造不满和损失，失业的人越多越好。然后，让政治羽翼迎合人们的不满。总有一天，新芬党会在自相矛盾中自取灭亡。”[60]

休姆做出这些评论的六个月后，里德神父坐下来给休姆写了一封长信。[61]他表示：“我唯一的目的，是在当前局势延续的情况下，帮助那些可能被杀害的人。”里德指出，由于他在共和党群体内默默服务多年，他享有共和军的信任。“我确信，只要目前的局势能得到恰当处理，就能说服共和军结束他们的运动。”他写道。

当里德寄出这封信的时候，休姆已经公开表态，只要共和军继续暴力运动，他绝不会接受与新芬党对话。[62]休姆一直表示，他向所有人敞开对话之门，只要目标指向和平。[63]但是，共和军的行为无法激发这种慷慨。1987年秋天，共和军在恩尼斯基林镇的荣军纪念日引爆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了十个平民和一名英国士兵，并造成60多人受伤。[64]事后共和军宣布，这次爆炸是一次失误：其原定目标实际上是附近英国士兵参加的一个仪式。亚当斯为袭击进行了道歉，并撇清了自己的责任。[65]然而，爆炸受到了广泛谴责，它凸显了临时共和军被社会遗弃的处境。休姆批判这是一次“惨无人道”的袭击。[66]用这种方式激怒临时共和军可能不无危险：几个月前，共和军用燃烧弹袭击了休姆的住宅。[67]他当时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在，最后她们死里逃生。

尽管如此，1988年1月11日，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在克隆纳德修道院会面。[68]他们此前曾多次交谈——不过都是暗中进行。[69]对休姆而言，如果被人发现他和亚当斯有来往，这将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危险。[70]但对亚当斯而言，倘若有人看见他和休姆这样的温和派对话，他将会面临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危险。一直以来，亚当斯都在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小心行事，他的角色是运筹帷幄，而非冲锋陷阵。倘若有人怀疑他在发起某种停火谈判，人们可能认为他背叛了武装斗争。在1988年，这种判定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

然而，里德神父对于对话的信心是正确的。两个对手相谈甚欢。休姆体验了英国谈判方在1972年感受到的认知落差：他们听过无数有关格里·亚当斯的骇人故事，可当他真实地走进房间后，却看起来完全不似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怪物。[71]他英俊潇洒，一副乡绅派头，言辞坦率，并不是个一意孤行的人。他具备一个政客应有的品质。最初，亚当斯和休姆同意交换文件，其中将列出各自组织的立场，为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设定参照范围。在幽闭恐怖的贝尔法斯特，需要一定程度的间谍活动来为此次交换行动保密。[72]在两名英国下士被杀的当天，里德神父得到通知，让他参加凯文·布雷迪的葬礼弥撒——有人会在那里悄悄塞给他一份文件。在追思弥撒上，他拿到了一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新芬党的意见书。里德怀揣这份意见书离开了教堂，当他料理两名被杀的士兵时，意见书正装在他的口袋里。里德为其中一人做人工呼吸时，双手沾染了鲜血，随后血迹弄脏了信封。[73]离开士兵的遗体后，里德回到了克隆纳德修道院。[74]他把文件装入一个干净的信封，然后带着这颗脆弱而珍贵的和平种子抵达德里，亲手把它交给了约翰·休姆。

1983年，亚当斯最初入选议会时，英国政府解除了禁止其踏足英国大陆的禁令，以便他能在威斯敏斯特任职。然而，亚当斯无意在任何情况下现身议会。[75]整个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都在玩一个微妙的游戏。他于1983年当选新芬党主席。不过，他开始相信，他们最终必须实现和平：爱尔兰的统一无法单靠武力完成。

他不能直接向共和军的普通士兵突然提出这个新论点，因为一旦志愿军知道了他的意图，他们可能将他从党内革职，或者直接将他灭口。与此同时，随着亚当斯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方面投入越来越多，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共和军仍然是一个非法组织。一直以来，当志愿军被问到他们是不是共和军成员时，他们会拒绝回答，因为承认加入共和军足以被关进监狱。然而，随着亚当斯将自己的角色从游击队领袖重新塑造为政治家，他把这个策略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开始告诉人们，他一直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一个积极的共和党人和新芬党领袖——但他不是志愿军，从未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过武装斗争。“我不是共和军成员，也从未加入过共和军。”[76]他会这样说。

当然，对任何关注共和军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荒谬的声明。亚当斯很早便被认为不仅是共和军的成员，更是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年轻时在葬礼上被拍过照片，头戴一顶共和军的黑色贝雷帽正立在侧。1972

年，他从朗·凯什出狱。随后他前往伦敦，作为共和军代表团的成员同英国政府谈判。（多年后，当西恩·马克·斯蒂奥芬被问到，代表团所代表的是新芬党还是共和军时，他回答他们是共和军。被追问到其中是否包括亚当斯时，马克·斯蒂奥芬咆哮道：“包括他们所有人！”[77]）早在20世纪70年代，媒体就将亚当斯定位为共和军成员。[78]英国安全与情报部门也早已将他视为共和军的重要人物。

1976年，复活节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在《共和党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笔名“布朗尼”叙述了一位牧师到监狱看望他的经历。亚当斯向牧师辩护了暴力涉及的道德问题，提出准军事主义并不是共和军成员主动寻求的角色，而是外界所强加的无奈之举。[79]“对也好，错也好，我是一名共和军志愿军，”亚当斯写道，“我采取的行动涉及武力的使用，但只有实现民族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我才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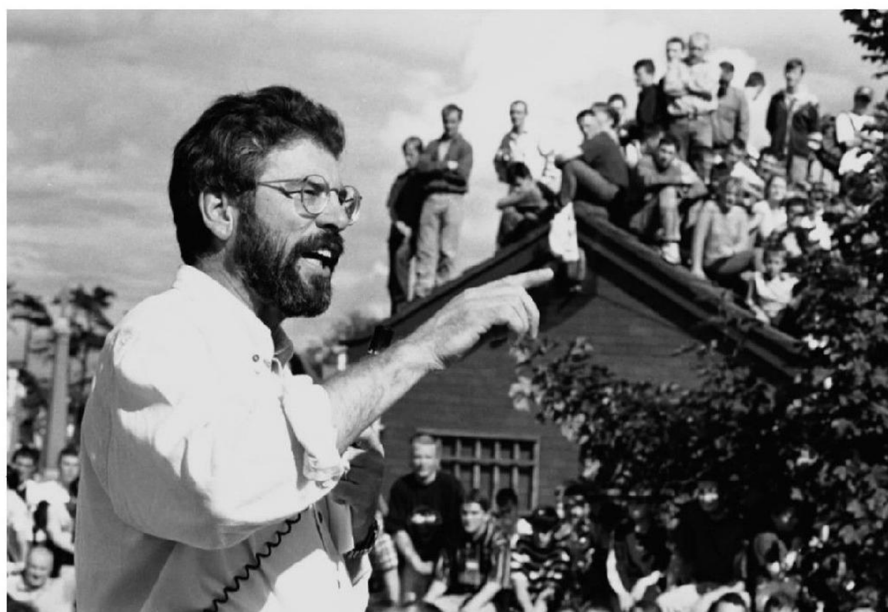
写下这些话的几年之后，亚当斯便开始声称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80]因此，即便当他在北爱尔兰武装斗争中占据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仍然否认自己参与过斗争。新芬党的总部位于福尔斯路一栋破败不堪的楼房里。这个地方发挥了政治办公室的效用，亚当斯可以在这里接受媒体采访，也可以会见选民。有反对者开玩笑说，这个自命不凡的新贵政党在全国每家银行都有账户，他们经常拿着枪到银行取钱。[81]面对这种指控，亚当斯抗议道，新芬党社区活动和竞选活动的资金并非来自准军事行动，而是源于抽彩、捐款和“蛋糕展销会”。然而，总部的外墙上，却是以举着冲锋枪的共和军枪手为主的彩色壁画。[82]这种矛盾将成为亚当斯新形象的标志：朴素的奇想混合武装叛乱，蛋糕展销会连带一抹杀戮。

这种矛盾或许只是权宜之计。[83]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认为，亚当斯是共和军暴行的发动者，并且对其的怨恨由来已久。如果亚当斯承认自己是共和军成员，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逮捕他。事实上，1978年，英国政府曾试图以所谓的成员罪名起诉亚当斯，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似乎承认了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但他对指控进行了反驳，最终案件被撤销。[84]“当今社会，像临时共和军这样的非法组织却有着合法的政治羽翼，这使得像格里·亚当斯这样的活跃分子扮演着神秘的角色。”[85]1982年《爱尔兰人》一篇以亚当斯为专题的文章如是评论道，这是纽约的共和党支持者发行的一份报刊。文章补充道，亚当斯“对其角色的把握十分老练”。在一张采访照片中，亚当斯穿着一件高领毛衣，他对媒体对待他的方式表现得极为愤慨。他说，媒体经常向他提出“陷阱问题”，问他是否会“继续”纵容暴力。他补充道：“我有点受够了。”当被《爱尔兰人》问到，他是否认为血色星期五——也就是由布伦丹·休斯监督，结果在贝尔法斯特多处平民区域发生爆炸的行动——是正当行为时，亚当斯回答：“我绝不会试图为任何导致平民死亡的行动正名。”不过他继续说道：“因为杀害平民并非共和军的政策，所以我同样不会因为意外致死而对他们进行谴责。”

这种精心设计的诡辩成了亚当斯的又一个标志，他总是那么言之凿凿，一口爱尔兰土腔从容不迫。许多亚当斯的批评者开始厌恶他对“遗憾”的谨慎表达。但是，亚当斯坚持认为，如果要对暴力进行道德评价，就应该将共和军和英国政府置于同一标准。“在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不幸受苦和死亡，”他指出，“爱尔兰政治中存在暴力，不只是爱尔兰单方的责任。是英国人首先用武力入侵了这个国家，并且为了继续留在爱尔兰，他们仍在使用武力。”[86]他补充道：“如果只靠投票，再多选票也无法把他们赶走。”

亚当斯一直深深扎根在社区中。作为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他对当地政治的日常琐事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他会沿着狭小的街道一路下行，身后跟着好奇的小学生和忠诚的助手，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当选民抱怨垃圾问题或者跟住房管理部门之间的争执时，他会共情地低声附和。“布赖恩明早会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过来查看情况。对不对，布赖恩？”[87]他会向他们做出保证，同时布赖恩或者其他助理会尽责地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信息。

讲究的夹克、精心修剪的胡须，以及永不离手的烟斗，这些让亚当斯表现出一种时髦中略带浮夸的公共知识分子派头。他出版了一本书，依稀回忆了他在福尔斯区域度过的童年时光。[88]他时不时捋捋胡须，还任命了一名媒体助理。[89]



政客格里·亚当斯

新芬党开始设立“建议中心”，就诸如福利金这样的一般问题为选民提供咨询。[90]这种从革命主力向零售型政治机构转型的刻意之举不免有些滑稽：有一天，新芬党大张旗鼓地决定，他们不再容忍“枪击膝盖

骨”作为惩罚年轻人危害社会的手段。1982年，前德里枪手马丁·麦吉尼斯通过选举成为了北爱尔兰议会的一员。他郑重宣布：“经过多次讨论，共和军决定，朝一个年轻人的腿部开枪，致使他终身残疾，这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惩罚。”麦吉尼斯继续说道：“相反，我们希望采用一种社会融入性更强、更有预防性的方式。”[91]对于新芬党突然将自己重塑为一群善意的社区积极分子的举动，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将之比作“给自己立贞节牌坊”。[92]

现在，亚当斯坚持表示，他从未亲自命令或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但他不会放弃暴力手段。在当选新芬党主席后的首次演讲中，他清楚地表示暴力应该继续——和政治活动相辅相成。[93]的确，即使亚当斯开始思考并实践结束冲突的计划，共和军却实施了更为致命的行动。1983年圣诞节之前，共和军在伦敦哈罗兹百货商店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5人死亡，90人受伤。[94]（亚当斯说，炸弹“出了问题”。）[95]次年10月，一名志愿军在布莱顿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96]撒切尔夫人和其内阁将在一次会议期间下榻该酒店。炸弹炸死了五人，但撒切尔夫人逃过一劫。共和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意味深长地阐明了恐怖主义的战略优势：“今天我们不走运。但是记住，我们只要一次好运就够了，而你必须每天祈求上帝保佑。”[97]

亚当斯辩解称，布莱顿爆炸案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他说，死亡“是英国人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悲哀症状”。这次爆炸并非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对民主的打击。事实上，它是“为了民主而实施的打击”。[98]虽然撒切尔夫人躲过了这次袭击，但她深受震动。私下里，她开始相信，临时共和军最终会成功。“我可能最终躲不过这一劫，”她会说，“但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99]

亚当斯和他的仇敌一样，认为自己会在冲突中毙命。1983年，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试图阻止新芬党车队展示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国旗时将亚当斯逮捕。[100]1984年春，亚当斯在贝尔法斯特接受审判。这位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面临扰乱治安和妨碍警察的指控。[101]一天，在庭审午休期间，他和几位同伴走出地方法院，坐上车准备开回西贝尔法斯特。在多年的潜伏生涯后，亚当斯养成了故意让行踪捉摸不定的习惯。[102]然而，对他的审判是一则重大新闻报道。众所周知，他当天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出席庭审。他变得极度担心自己的安全，甚至申请了持枪自卫许可。[103]但这一要求毫不意外地被皇家阿尔斯特警队驳回。亚当斯开始预言自己的死亡，他说：“我想，我遭到暗杀的几率有九成。”[104]

离开法院后不久，汽车在霍华德街的车流里放慢了速度。这时，一辆棕色汽车开到了它旁边。两名枪手朝亚当斯和他的几名同伴开了十几枪。[105]亚当斯的颈部、肩部和手臂中了三枪，但没有要他的命。（车上另外三人也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基督说，拿刀的人必死于刀下，”听到枪击案的消息后，伊恩·佩斯利牧师表示，“我参加过太多格里·亚当斯喜闻乐见的葬礼，这让我对今天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到悲痛。”[106]

枪手很快被逮捕，身份被确认为阿尔斯特自由战士的成员。不过，亚当斯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病床上断言，当局事先得知了袭击的计划，并希望它会成功。[107]亚当斯一直受到政治排挤的处境，从英国议会对枪击案的反应中可见一斑。没有任何议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也没有任何对于暗杀行动的谴责。他们用冰冷的沉默回应了枪击案的消息。[108]

十九　蓝丝带

1986年，在将近13年的监狱生活后，布伦丹·休斯终于从朗·凯什出狱。[1]最开始，他到西贝尔法斯特和亚当斯的一家人住在一起。休斯的婚姻在他服刑期间破裂。他从一个狱友那里得知，莉莉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我打电话让她到监狱来，告诉她没问题，”他后来回忆道，“她还年轻，值得幸福的生活。她总说在我眼里斗争最重要，她说的没错。我很自私，我忽视了家庭。”[2]出狱之后，休斯到莉莉家和她的新伴侣握了手。

在监狱关了那么多年，休斯对他重新回归的城市感到困惑。一切似乎都变了。有时休斯会出门散步，却发现记忆中的老街道仿佛梦境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新街道。[3]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街区迷路了，只能找陌生人为他指引回家的路。监狱生活虽然单调，却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相比之下，贝尔法斯特则让人感觉喧嚣刺耳，危机四伏。休斯发现，人多的地方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只挑下午的时间出门去酒吧，因为那时候安静。

休斯能意识到亚当斯在操纵政治，不过他对正在萌芽的和平进程毫无察觉。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战士，而一直具有政治倾向的亚当斯，如今则真的成了政客。在贝尔法斯特，有些地方是硬汉的聚集地，休斯可以去那里坐下，被那些人所接受[4]，但亚当斯不行，因为即便在他生硬地否认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之前，他也从未被人们视作真正的士兵。尽管如此，休斯和亚当斯一直是一个团队，休斯对他的同志保持着深切的忠诚。如果缺乏战斗诚意给亚当斯带来了不利影响，那么休斯希望用自己的声誉来支持他的朋友。他可以作为“独立运动的武力部门”来为亚当斯效力。如果亚当斯是绘图员，休斯就是他的工具。休斯或许并未完全领会，当他陪着亚当斯走访全国各地，帮新芬党稳固选举基础时，他们一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对亚当斯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如此一来，亚当斯便可以不断重申他不是共和军成员。[5]但对任何有眼睛的人来说，亚当斯身边凶残的大胡子布伦丹·休斯，总会让这一陈词滥调听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

休斯敏锐地意识到，他作为共和党偶像的角色——黑鬼休斯、绝食抗议者——可能会被作为一种政治商品。出狱以后，他同意去一趟美国，为武装运动鼓舞士气，同时增加资金支持。爱尔兰裔美国人远远多于爱尔兰本土人口。这种人口的反常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贫穷、饥荒和歧视所造成的人口迁移的证明。身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独立事业有着坚定的支持。的确，武装斗争在波士顿或芝加哥收获的支持，有时比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德里还要热烈。革命运动的浪漫情怀之所以容易维持，是因为支持者自己的家人不用面临在去杂货店的路上被炸成碎片的危险。对于那些远在美国高枕无忧，却竭力主张在阿尔斯特发动血战的“大移居后代”，一些本土爱尔兰人对他们投以鄙夷的目光。不

过，共和军长久以来依靠美国作为支持的来源。的确，多年以前，布伦丹·休斯最初就是从美国获得了阿玛莱特步枪。

休斯抵达了纽约市，并和爱尔兰北部援助委员会的代表见面，这是一个筹集资金的团体。[6]在一次会见中，一个固执己见的爱尔兰裔美籍捐助人告诉休斯，临时共和军的战斗完全打错了。那个人告诉他，你们真正该做的，是扩大目标范围，开始朝任何跟英国政权有关的人——任何制服上有王冠的人——开枪。

“邮递员吗？”休斯打断他，问道，“朝邮递员开枪？”[7]

当然应该朝邮递员开枪，那个人回答。

“那好，”休斯说，“我过两个星期回贝尔法斯特……我们给你也买一张机票，你跟我一起回去，你去把该死的邮递员毙了。”

那个人给休斯提供了满满一手提箱的钱，用来支持独立事业。但他们越交谈，休斯越发觉他的政治观点令人反感。休斯仍然把自己看作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但他逐渐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派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社会主义并不流行。最后，休斯一怒之下脱口道：“我他妈不想要你的钱！”[8]于是那个人带着手提箱离开了。

出狱以后，休斯立刻回到共和军执行任务。他辗转于边境两边计划行动。然而，随着他在这些任务中和前线志愿军相处，他被一些地区的不安所触动，大家都暗暗感觉共和军可能变得过于政治化。有时，休斯不禁想，作为一名纯粹的战士，他是否已经被历史超越，变得过时了？在拜访都柏林的一次行程中，他去了位于帕内尔广场的新芬党总部，那里在光明正大地举行政治活动。但当休斯环顾四周时，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新的舞台上没有他扮演的角色——这里并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去看望了共和军前参谋长谢默斯·图米，1973年，他攀上一架直升机从芒乔伊监狱成功出逃。图米比休斯年长30岁。他受到了格里·亚当斯和其身边人的排挤，被迫退出了共和军的军事委员会。休斯发现，他独自住在都柏林的一间小公寓里。休斯指出，那个地方破败不堪。这个人将他成年后的全部人生献给了共和军。看着图米如此窘迫的晚年境况，休斯突然意识到，独立运动并没有什么养老计划。几年后图米去世，休斯将他的灵柩从都柏林载回了贝尔法斯特。[9]除了图米的妻子，没有任何人迎接灵柩抵达。

1989年元旦的几天后，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斯蒂芬·雷迎来了一个小生命——他们的长子芬坦·丹尼尔·苏格尔（出生公告上说，“小名‘丹尼’”）。[10]一年多以后，他们生下了次子奥斯卡，这个名字取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名。[11]“（我觉得）小家伙长得像我，不过他长大了可能会变样，”普赖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并继续问道，“你有认识的保姆吗？”[12]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痴迷。“她为他们疯狂。”[13]雷说。谢默斯·希尼为两个孩子创作了一首诗。[14]他把诗写在了一把日本扇子上，夫

妻俩把它挂在了家里的墙上。（这首诗从未发表。）在监狱服刑期间，普赖斯曾担心自己永远无法生孩子。不过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有了过正常生活的机会。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但仍在贝尔法斯特保留了一个家。“我希望他们拥有一个爱尔兰童年，在爱尔兰口音中长大，”斯蒂芬·雷在提到儿子时表示，“我觉得抚养两个英国小孩有点虚伪。”[15]

普赖斯依然忙于她的自传，并定期和不同的出版社谈论出版的事宜。然而，正如雷在一次采访中所言：“现在绝不是出版的好时机。”[16]普赖斯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她的丈夫却跟她曾经的指挥官格里·亚当斯维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当亚当斯登上国际舞台时，他已经是英格兰憎恶的对象。凭借令人不安的冷静和以男中音声调展现出的博学，他是一个极其两极分化且明显让人胆战心惊的人：一个看上去正直、有魅力、雄辩，却又为恐怖主义辩护的人。也许是出于对其意识形态诱惑力的担心，撒切尔政府采用了一项特殊的限制法规，“禁止”共和军和新芬党出现在无线电波里。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亚当斯在电视上出镜，英国的广播公司根据法律将不能播送他的声音。[17]他的画面可以显示，他说话的内容也可以传达，但他的声音不可以播放。于是，几家广播公司另辟蹊径，想出了可行却也有些荒谬的办法：当亚当斯出现在电视上时，会有一位演员给他配音。面孔是亚当斯的面孔，话也是亚当斯的话，但说这些话的声音却属于另一个人。

有几位爱尔兰演员给这位新芬党主席配过画外音。亚当斯现身媒体的频率足以让演员们忙起来，斯蒂芬·雷就是其中之一。“没什么能阻止我们雇用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演员。”[18]1990年，一个新闻制作人在被问到请雷配音的问题时如是回答。他补充道：“我们不在乎他结婚的对象是谁。总之，我想他是新教徒。”雷自己则解释说，决定为亚当斯配音，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亚当斯，他们至少应该听听他想说什么，雷争论道：“除非我们能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否则永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

随着雷的演艺事业继续风生水起，他依然在回避有关普赖斯和她的过去的问题。不过在工作上，他并不避讳北爱尔兰问题的题材。1992年，雷凭借出演电影《哭泣的游戏》在国际上获得了更高的声誉。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他的密切合作者尼尔·乔丹。雷在影片中饰演一名共和军枪手——弗格斯。他奉命看守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一名英国士兵，由福里斯特·惠特克饰演。在几天的相处中，守卫和俘虏之间产生了情谊，以至于到了弗格斯要向对方扣动扳机时，他发现自己下不了手。这个场景怪诞地让人联想到杜洛尔丝·普赖斯在20年前为“无名氏”干的卑鄙勾当：她哭着开车将朋友乔·林斯基送上了刑场；把凯文·麦基载到了莫纳亨郡，那里的俘虏者对他越来越喜欢，到了不忍将他枪决的地步，结果不得不从贝尔法斯特召集另一组枪手来完成任务。

影片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一名红发女共和军，由米兰达·理查德森出演。[20]“我在贝尔法斯特待了几天，沉浸在那种氛围里，”多年后，理查德森在被问到这个角色时说，“斯蒂芬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杜洛尔丝·

普赖斯，她曾经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还发起过绝食抗议，她是那里真正的女英雄。我们去了酒吧，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她受到的待遇就像电影明星。”

雷坚持表示，弗格斯这个角色的雏形和他的配偶毫无关联。但他承认，普赖斯可能对他的演绎产生了影响。“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参与这场冲突的人本质上是邪恶的，而这是我们被灌输的观念，”他说，“部分场景可能跟杜洛尔丝的经历有所共鸣，但是……我从未下意识这样想过。”在谈到电影的主题时，雷用一句也许能作为普赖斯家族信条的话补充道：“在苦难中实现救赎，这是我的追求。”[21]

谈到自己的思想意识，雷却含糊其辞：“绝不要以为我的政治观点跟我太太一样，也绝不要以为她现在的政治观点跟20年前一样。”[22]他在1993年对伦敦《泰晤士报》说道。这是一个有准备的回答，为巡回宣传事先排练好的。雷多数时候也坚持这种说法。不过偶尔他会说漏嘴。在对《娱乐周刊》的采访重复相同的模糊观点后，他补充道：“我对我太太的政治背景并不感到羞愧，我认为她也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过去20年里治理爱尔兰北部的人才应该感到羞耻。”意识到自己脱离了剧本后，他尖酸地补充道：“这就是你们想听的，这是政治表态。”[23]

1992年12月，雷和普赖斯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纽约，准备在雷于百老汇登台表演期间住两个月。[24]这座城市很适合普赖斯。如果能从头再来，她完全可以当一名话剧演员。凭借她的伶牙俐齿、火焰般的红头发和她高傲的性格，她也许能扮演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女郎。“她可以完美地充当某个人的疯狂姨妈，搬到纽约后进了剧院，戴着围巾四处乱窜，”她的一个朋友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北爱尔兰问题，这可能就是她的人生。”[25]

在《哭泣的游戏》中，弗格斯最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对雷而言，这是一个人“重生”的故事。[26]“他有过一些骇人的经历，但因此而得到了提升和充实。”有些正派的普通人卷入了共和党运动，最后却发现这场冲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7]雷指出，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听到自己说：“我受够了。”[28]

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29]亚力克·里德神父出面安排的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其他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

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30]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31]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32]：“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33]

次年夏天，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的莱能大厅图书馆举行。[34]图书馆位于多尼戈尔广场上一栋美观的老建筑里。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来处理“失踪者”的命运问题——这些人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遭到绑架或谋杀，尸体从未被找到。参与者互相交谈，他们在衣服的翻领上佩戴了天蓝色的丝带。琼·麦康维尔的女儿海伦是发言人之一。“1972年，四个女人和八个男人闯进我们家里带走了我的母亲，”她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现在我要说，尤其是对那几个女人，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难道她们不为自己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吗？”[35]

海伦37岁，差不多和琼失踪的时候一般年纪。[36]她和谢默斯·麦肯德里有着稳定的婚姻，还育有自己的孩子。然而，自从母亲被绑架后，麦康维尔一家一直不能像正常的家庭一样维系。曾经，海伦有机会和谢默斯带着孩子们一起移民澳大利亚。[37]但她觉得自己不能走，因为，借用谢默斯的话来说：“她一直抱有一种微小的希望，觉得母亲会回来。”

如果说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度过了艰难的童年，那么成年后的生活也并不容易。[38]他们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困于酒精和毒品成瘾。吉姆·麦康维尔和他的双胞胎弟弟比利是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20世纪80年代，他曾被关进少年犯中心，还因为武装抢劫在英格兰蹲过监狱。[39]从许多方面而言，迈克尔是他们中最稳定的孩子之一。在16岁离开戒备森严的利斯内文教养院后，他和阿奇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和海伦住在一起。但迈克尔和海伦发生了矛盾，后来迈克尔一度流落街头。[40]他会去朋友家借宿——这里住一夜，那里睡一晚。不过最后他找到了工作。17岁的一天晚上，他在跳舞时认识了一个叫安吉拉的女孩。他们成了恋人，并最终结为连理。迈克尔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贝尔法斯特的德罗宁工厂干活，那里的装配线生产鸥翼型车门的未来汽车。

1992年，琼·麦康维尔的长女——一生卧病在床的安妮，在39岁的

年纪去世了。[41]海伦凝视着棺材里的姐姐，被她酷似琼的容貌所触动。[42]她誓言要竭尽所能查明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谢默斯开始在贝尔法斯特四处打听消息。有一次，他冒险去了福尔斯路的一家酒吧，那里是共和军众所周知的聚集地。然而当他提到他岳母的名字时，酒吧里瞬间安静下来。一个老头悄悄塞给他一个赌注条，让他去隔壁赌一把。那人在赌注条上写道：快走。[43]

贝尔法斯特还有其他的家庭发生了亲人失踪的事。有一个叫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女人很令人敬畏，她的儿子布赖恩在1978年遭到绑架。“我走了，妈妈。”他告诉她，然后便坐进姐姐的车里开走了。他22岁，她从此再也没见过他。[44]过去的许多年里，有传言说布赖恩移居到了英格兰或者墨西哥。[45]麦金尼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她将之比作一种隐隐约约始终存在的牙痛。[46]最终，她召集了一群同样因为亲人失踪而遭受困扰的家庭。在多年担惊受怕的沉默后，能够敞开心扉向其他人倾诉这种长期以来失去亲人的创痛，就算谈不上宣泄，也能得到一些宽慰。[47]这些家庭多半已经不期望亲人能够活着回来，但他们仍然想寻回他们的遗体。“我现在能接受布赖恩不在人世的事实，”麦金尼说，“我无法接受不能去坟墓悼念他。”[48]多年来，她不愿更换儿子小时候所睡的床上的床单。[49]“我以前常常到他的床上，用他的衣服把我包裹起来，看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睡着后梦见他。”她回忆道。但每次醒来她都会发现，他依然不在。

当失踪者的家人找到彼此时，他们发现他们一直被一系列同样挥之不去、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亲人是什么时候被害的？他死前遭受过痛苦吗？[50]她有没有被折磨？他们埋葬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吗？偶尔有人提供信息。亚力克·里德神父有时会听到一些消息，然后把有用的信息告诉失踪者家属。[51]一度有传言说，部分失踪者的遗体被埋在了俯视这座城的黑山上。[52]但一番搜寻后却一无所获。停火以后，这些家庭终于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众。为了赢得更多关注，他们佩戴了蓝丝带，以象征对失踪者的纪念，并将丝带寄给了诸如比尔·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重要人物。[53]

当麦康维尔一家和其他家庭最终披露这些真相时，媒体的反应十分震惊。他们没想到，在智利或阿根廷等地发生的可怕的国内冲突中才会听说的手段，竟然已经被用来对付英国公民。这是这些家庭非常乐意强调的一个相似之处：是那些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失踪者的母亲鼓舞了他们成立这个组织。[54]北爱尔兰问题期间的失踪人数不到20人。但由于这个国家非常小，每一起失踪都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科伦巴·麦克维，这个少年于1975年被共和军绑架，从此杳无音信；还包括罗伯特·奈哈克——一位风度翩翩的英国军官，他于1977年在南阿马从事卧底工作时失踪；还包括谢默斯·拉迪——一个32岁的纽里人，他于1985年在巴黎当老师期间失踪。

这些家庭选择在和平进程和共和军停战期间努力寻求答案，这对格里·亚当斯而言着实难堪。就在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将

目光超越冲突的地平线时，这些失踪者的家人直接点名向他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响亮而愤慨的质问。“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息传达给格里·亚当斯和共和军：我们的家人已经遭受了太多痛苦。请你们结束这场噩梦。”[55]谢默斯·麦肯德里在1995年说道。他继续尖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新芬党期望全面获得民主政党地位的态度是很虚伪的。”

麦肯德里拜访过新芬党的领导层，要求他们安排内部调查，查明琼到底发生了什么。[56]有一天，他在超市撞见了亚当斯，并面对他脱口道：“格里，你以为我妻子是傻瓜吗？”[57]1995年夏末，亚当斯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承诺协助查找失踪者的遗体。[58]“我呼吁，如果有任何人知道这些失踪者的下落，请联系他们的家人。”他说。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二十　秘密档案

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1]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克林顿登上市政厅外的讲台，圣诞节的灯光在上方闪烁。[2]他身着一件黑色大衣，看起来年轻、坚定、乐观。德里狭窄的街道上观者如堵，古老城墙的拱形门下也被挤得水泄不通。"对像我这样的访客而言，这座城市和一年半以前截然不同，那时这里还没有停战，"克林顿说，"如今，士兵不再上街巡逻，城墙也已向民众开放。"他提到了"握手言和"，并引用了希尼诗歌中的一段话[3]：

历史说，别对坟墓的

这一边寄以希望，

可一生中有那么一次

渴求已久的公正的海啸

会升腾起来，

于是希望和历史押韵。[3]

寒冷的空气中洋溢着乐观的可能性。这次停火最终将于1996年结束，那年共和军在伦敦码头区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100多人受伤。[4]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英国政府拒绝在共和军解除武装之前与新芬党进行谈判。有些媒体猜测，亚当斯也许事先对这次爆炸并不知情——在他致力于和平进程的过程中，他可能逐渐遭到了共和军武装派别的疏远。不过，第二次停火于1997年发起，并得以维持。1998年4月，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贝尔法斯特郊外一座乔治王时期风格的官邸，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5]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他以三明治和巧克力棒为食，三天才出一次门。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6]他寡言少语，有着极大的耐心。但是，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7]

各路谈判代表就枯燥的官僚问题虚张声势、争论不休，其中涉及北

爱尔兰新国民议会的结构、准军事组织的武装解除、囚犯的地位，以及北部六郡和爱尔兰政府及英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会议之外，阵阵雨夹雪敲击着城堡，新教和天主教的小学生们聚集在大门外，用歌声请求和平。[8]格里·亚当斯端了一盘饮料出来送给他们。

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我们将结束英国对我们国家的统治。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和平协议的几个月后，亚当斯在沃尔夫·托恩的坟墓边如是说道。亚当斯为确保达成和平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许正是他塑造的模棱两可的个人形象，使得各路谈判者都能和他打交道。即便在和平协议之后，比尔·克林顿仍对亚当斯琢磨不透。“我不明白他跟共和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9]克林顿在1999年和托尼·布莱尔的通话中沉思道。但是，亚当斯从未加入准军事组织的谎言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使得那些不愿被人发现和恐怖分子谈判的对话者可以跟他进行交涉。[10]

在演讲中，亚当斯不能确切地宣布胜利。但他十分乐观，他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斗争阶段的开始。”他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爱尔兰”，他说：“一个永远听不见枪声的爱尔兰；一个岛上的所有人都能相互之间和平共处，并跟我们的英国邻居和平共处的爱尔兰；一个通过疗愈和民族和解的进程而实现和平的爱尔兰。”[11]

两年后，保罗·比尤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学院享受客座学者的时光。[12]比尤通常在皇后大学任教，是一名爱尔兰史教授。[13]他还担任过戴维·特林布尔的顾问，特林布尔是北爱尔兰统一党领袖，在耶稣受难日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任北爱尔兰首席大臣。作为研究爱尔兰历史和文学的堡垒，波士顿学院有着珍贵的遗产。2000年春，学院的行政部门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纪念北爱尔兰30年冲突的结束。比尤向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的负责人鲍勃·奥尼尔提出，学院可以考虑用记录的方式纪念北爱尔兰问题。比尤建议，或许学院能从参与过北爱尔兰问题的人那里收集某种证据，来为这场冲突建立一个历史记录。“这将为下一代研究生所用。”比尤说。奥尼尔喜欢这个主意。不过，这个新项目需要一位负责人。比尤推荐了长期在贝尔法斯特从事记者工作的埃德·莫洛尼，他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莫洛尼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他是北爱尔兰问题敏锐而精明的记录者。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皇后大学求学，直接见证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北爱尔兰问题的开端。他亲自参加过示威游行，并认识了杜洛尔丝·普赖斯、埃蒙·麦卡恩、贝尔纳黛特·德夫林和当年其他的激进分子。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莫洛尼对爱尔兰的冲突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对重大新闻的报道总是十分迅速。从外表看来，他并不占优：他在襁褓时期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因此双腿安装了金属支架，终生只能用僵硬的姿势行走。但他无所畏惧和不服输的精神众所周知。身体的缺陷使得他一生都对弱势群体怀有同情。当他的头发变白时，他的眉毛仍然浓密而黝黑，这令他看起来像一只顽强的獾。1999年，政府曾企图利用法院指令强迫莫洛尼交出他和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会面的采访记录。[14]他冒着入狱的风险拒绝了。随后他将政府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

莫洛尼写过一本伊恩·佩斯利的评论性传记，并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15]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2001年，莫洛尼离开贝尔法斯特搬到了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以便更靠近他妻子的家人，但也因为他开始在北爱尔兰感到有些不自在。此外他认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报道北爱尔兰问题，这是当年欧洲最大的新闻，而如今这个新闻结束了。

莫洛尼接受了比尤所说的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记录的大致想法，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波士顿学院应该进行一项口述历史研究，让前线的参战者能在其中坦诚地讲述他们的经历。[16]然而，有一个挑战。由于传统上禁止谈论准军事活动，北爱尔兰问题中许多主要事件的细节都笼罩在沉默的迷雾里。虽然和平进程使得新芬党作为政治党派的地位正常化，但共和军依然属于非法组织。只要承认曾加入过共和军，就可能招致刑事诉讼。如果说准军事组织的成员畏惧当局，那么他们更加畏惧彼此。任何违背沉默信条的人都可能被冠上“叛徒”的恶名，也就是所谓的告密者。[17]而叛徒只有死路一条。武装分子通常具有排他性，而且极不信任局外人。不过莫洛尼认为，现在或许可以想办法对人们进行采访，承诺受访者他们的证词到他们死后才会公开。如此一来，你可以找到处在冲突最前沿的参与者，趁他们尚在人世且记忆鲜活，随后采访者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秘密将受到保护，因为档案会像时空胶囊一样被封存起来，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既不会受到政府的起诉，也不会遭到

同辈人的责罚。保罗·比尤对这个主意满怀热情。他提到“把磁带放下”，仿佛它们是一瓶瓶陈年干红葡萄酒。[18]

波士顿学院的学者们或许愿意承诺这种采访只会被后世所用，但谁又会相信他们呢？事实上，任何手持笔记本的博士生团队都不太可能说服久经沙场的枪手敞开心扉。于是，莫洛尼提出了一个明显非正统，但可能十分巧妙的解决办法：假如前准军事组织成员不愿对博士生吐露秘密，或许他们愿意对另一个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开口。

2000年的一个夏夜，莫洛尼和波士顿学院的图书馆馆长鲍勃·奥尼尔前去迪恩斯餐厅就餐。这是位于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一个高档优美的海鲜餐厅，由当地的一位主厨创办。他曾在伦敦的凯莱奇酒店担任厨师，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回到家乡。迪恩斯餐厅有着浓厚的新贝尔法斯特气息，给人一丝和平可能带来的世界性未来的印象。几个人将在这里和安东尼·麦金太尔见面。麦金太尔高大魁梧，一把山羊胡子凌乱不堪，前臂满是浓密的文身，以绰号“麦克斯”而为人熟知。他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16岁时谎报年龄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后因杀害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而入狱17年。[19]麦克斯在入狱之前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在监狱里厌倦了读《圣经》，而对教育产生了兴趣。他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他的母亲，她一直对他放弃学业感到失望。不过，这也是度过夜晚的好方法。麦克斯渐渐喜欢上了深夜里安静的时光，那时其他囚犯都已睡去，只剩下他独自看书。

1992年出狱后，麦克斯在皇后大学获得了荣誉本科学位，然后报名参加了博士生课程，他的导师就是保罗·比尤。在写完一篇有关共和党运动的论文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20]但这个学位并没有给他带来稳定的工作。在出狱之初，他一度沦落到入店行窃的地步。2000年，他认识了一个叫卡丽·图米的年轻的美国姑娘。[21]卡丽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上满是雀斑，她在贝尔法斯特上学。他们坠入爱河，结了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埃德·莫洛尼初次认识麦克斯是在1993年共和党的一次葬礼上，这位前共和军成员随后成了他的一个消息来源。麦克斯既懂得学者的语言也熟悉街头的话语，莫洛尼认为他将是波士顿学院项目的理想采访者。比尤赞同让他以前的学生参与进来，想到学校也许会给麦克斯一些钱，他感到很欣慰。[22]2001年，波士顿学院收到了一个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商人资助的20万美元经费，以支持这个新方案。[23]他们计划对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进行采访。（起初，莫洛尼想把警方的证词也囊括进来，但这个想法最终被舍弃。）[24]至于保皇派的采访，莫洛尼招募了来自东贝尔法斯特的威尔逊·麦克阿瑟，他在保皇派的圈子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在皇后大学获得了学位。[25]在结束迪恩斯的晚餐之前，莫洛尼、奥尼尔和麦克斯一致认同，由于题材内容高度敏感，维持整个计划的保密性至关重要。[26]

这个后来被称作“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方案，似乎解决了《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一个明显缺点。在努力实现和平的过程中，谈判代表们将

焦点放在了未来，而非过去。该协议规定将释放准军事组织囚犯，其中许多人曾犯下残暴的行径。但却没有条款来建立任何调查真相并寻求和解的机制，让北爱尔兰人民处理过去30年中发生在他们国家的那些时而黑暗时而痛苦的历史。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就有这样的过程，让人们能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27]这个案例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交换政策：如果你道出真相，就能获得法律豁免权。南非的范例有其缺陷：评论家认为这些讲述并不完整，而且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但至少他们为此做出了努力。

这个过程在南非可行，部分原因也许在于，种族隔离之后有明显的胜负之分。相比之下，北爱尔兰问题则是以和棋告终。《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展望了一个“权力共享”的协定，但让人感觉谁也没有真正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协议带来了一些表面的变化：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更名为北爱尔兰警察局；民权抗议活动所质疑的结构性歧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北爱尔兰一直致力于历史纪念活动，却没有正式的程序来试图弄清如何纪念，甚至理解北爱尔兰问题。

格里·亚当斯拒绝承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一员，这使得本就令人不安的犹豫不决的情绪更加复杂。如果北爱尔兰人想知道，现在澄清他们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安全，那么亚当斯不断的自我否认表明，现在绝不是时候。“啊，暗号之地，握手、眨眼和点头。”[4]这是谢默斯·希尼就北爱尔兰问题创作的一首诗，《无论说什么，什么也别说》（Whatever You Say, Say Nothing）。即使人们怀着巨大的热情迎接新生活，过去的邪恶阴谋似乎将继续徘徊。

2001年，马丁·麦吉尼斯打破了共和军沉默的规则，承认自己曾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并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德里的副指挥官。[28]但麦吉尼斯是在调查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前提是他将免于遭到起诉。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势头正劲，日益强大。表面看来，共和军已经被和平进程边缘化，甚至同意解除武装。但即便如此，共和军长期以来已经给爱尔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个准军事部队很可能不会就此消失。1995年夏天，有一次，亚当斯在贝尔法斯特的集会上演讲。他身着一套清爽的夏装，俨然一副政客的模样，不时查看手中的提示卡。但在他准备好的发言停顿的空档，人群中有人喊道：“让共和军回来！”

亚当斯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笑了起来，接着他俯身靠近话筒说道：“要知道，他们没有离开。”[29]

对于知道“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一小群人而言，仍然笼罩在北爱尔兰上空的沉默和影射的半暗带，使得他们更加迫切地想为人们创造一个能坦诚谈论自己经历的空间。汤姆·哈奇是波士顿学院爱尔兰研究的教授，他也参与到了项目当中。他说，这个档案的目标并不在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而是致力于创建可供后世思考的文献素材。借用他堂而皇之的话来说，这是对“宗派暴力现象学”的研究。[30]

然而，为了将这一努力付诸实践，必须实现绝对保密的条件。同意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会收到一份合同，其中规定，他们的证词不会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公之于众，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不仅这些采访将秘而不宣，甚至整个项目的存在都要严格保密。受访者会讲述他们参与的犯罪行为。如果当局知道有这种供词，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得到它。埃德·莫洛尼认为，这也是波士顿学院作为此次口述历史贮藏室如此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在大西洋彼岸，不论从空间上还是法律上，它和英国与爱尔兰警方之间的距离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美国是一个中立之地。即使当局通过某种方式获悉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波士顿学院的机构影响力的保护下，任何获取采访资料的企图都将毫无胜算。[31]

2001年春，麦克斯开始进行采访。他在共和党的圈子内有许多朋友。但即便如此，他也需要小心行事。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共和军是出了名的爱说闲话。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开口。每个人都开口了，只是他们倾向于在自己人中间这么做。要是有人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他可能在西贝尔法斯特无人不知，但如果你向记者或英国人这样的局外人透露一个字，那么你就是叛徒。[32]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往，波士顿学院的采访者都是局外人。一旦有消息传出，说曾经的枪手向携带录音机的人吐露了心声，人们就可能遭到灭口。

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言，麦克斯也是局外人。和许多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一样，他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大失所望。帕特里克·皮尔斯曾经写道："如果有人以爱尔兰的名义，接受任何分毫少于脱离英格兰的'最终协议'，那么他对爱尔兰民族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之罪大恶极，如此之不可饶恕……以至于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33]这种绝对主义形成了共和党观念的精髓：接受任何立场的改变无异于背叛。[34]在麦克斯看来，新芬党同意英国继续主宰爱尔兰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克斯认为，亚当斯出卖了武装斗争。

新芬党领导层非常清楚这类观点，并开始诋毁像麦克斯这样的批评者，称其为"异议分子"共和党人，或者"和平进程的反对者"。共和党向来有着严明的内部纪律，而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新芬党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对北爱尔兰问题与和平进程的特定叙述。新芬党的所有官员似乎从未偏离剧本。[35]如此一来，该党派保持了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共和党武装斗争记忆的垄断"。[36]

鉴于麦克斯对新芬党的批判立场，这实际上意味着，格里·亚当斯或任何与他结盟的人都不太可能同意坐下来录制口述历史。事实上，麦克斯甚至不情愿问他们，因为一旦新芬党领导层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有丝毫的觉察，他们几乎肯定会将之扼杀。他们会放出消息说，任何参与者都将受到惩罚。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麦克斯找到了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再亲近亚当斯的共和党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竭力避免被人发现。他利用加密

的邮件和莫洛尼沟通，同时尽量减少任何跟这一项目有关的纸质痕迹。[37]他会在背包里塞一个微型数码录音机，然后冒险到贝尔法斯特和其他地方进行采访。他和受访者多次见面，在数次采访中和每个人总共交谈十个小时甚至更久。当麦克斯完成对特定个体的采访后，他会把它们交给可靠的打字员进行转录。然后，他会把录音带和采访文本全部邮寄往波士顿学院，鲍勃·奥尼尔将在那里把它们收藏在伯恩斯图书馆最安全的地方——珍藏室。奥尼尔是“档案安全”专家，他出版过一本相关主题的书。[38]“要想成为负责的保管人，照看托付于你的宝物，所有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必须打起精神，毫不含糊地对待安全工作。”他坚持道。

作为附加预防措施，当麦克斯将采访资料寄往波士顿学院时，他会隐藏实际提供口述历史的人员姓名，用一个字母取而代之。只有在另一组文件中——由各个受访者签署的合同，其中他们得到保证，他们的证词将被保密——代表每个参与者的字母代号才会和真实姓名联系起来。[39]

有一天，麦克斯去见了一位他认识多年的前共和军成员，他们于1974年在监狱里初次见面。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错，因此采访会在随意而亲近的氛围中进行。和麦克斯一样，此人也对和平进程失望至极，并且已和格里·亚当斯与新芬党割席断交。现在他有话要说。在麦克斯最终寄到波士顿学院的资料中，这个人的身份只用了代号“C”来表示。他的真实姓名是布伦丹·休斯。

二十一　在边缘

2001年，当安东尼·麦金太尔开始采访布伦丹·休斯时，他住在帝维斯公寓仅剩的楼房里。1993年，在一群积极分子对帝维斯建筑群恶劣的住宿条件发出强烈抗议后，琼·麦康维尔遭到绑架的公寓楼和其他所有低楼层建筑全部被拆除。[1]20世纪80年代期间，一群煽动者成立了所谓的拆建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帝维斯公寓变得无法居住。[2]每次有公寓空出来，这些自封的拆建队便会赶在第一时间拿着大锤冲进去，捣毁浴缸、水槽、马桶和电器装配，砸碎窗户，并把完好无损的门从铰链上扯下来。最后，政府推倒了整个建筑群，为新的住宅小区让路，取而代之的是井井有条的红砖住房，屋前有水泥建的小花园。帝维斯公寓建筑群仅剩的，是那栋二十层的高楼。英国军队继续占用着楼顶和最上面的两层公寓。[3]在他们下面的第十层楼里，住着布伦丹·休斯。

这个住所适合休斯，它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西贝尔法斯特的街道，而他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即使爆炸袭击已经停止，《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在贝尔法斯特各种建筑的墙上，依然满是描绘武装斗争英雄的彩色壁画。年轻的布伦丹·休斯就在其中，他双眼漆黑，满面笑容。然而最近几年，休斯的情绪变得日渐阴郁。“欢迎来探监。”[4]他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有时，他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待在家里，独自喝酒抽烟。如今他到了知命之年，标志性的黑发已经变白脱落。他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他曾在建筑工地做过各种卑微的工作，但除了年轻时在商船队的经历，他从未做过真正的平民工作，而且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你无法真正从监狱走出来。”[5]他会说。

公寓里装点着许多切·格瓦拉（休斯的英雄）的照片：照片里的切·格瓦拉有的在笑，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咖啡。[6]休斯对偶像的这些形象感到亲切，但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奚落。切·格瓦拉是在还算年轻时为政治信仰殉难的，这或许算得上一种幸运。1967年，他被玻利维亚军方处决时还不到40岁，他的皮肤依然光滑，胡子没有变白的迹象。但令休斯困扰的是，虽然切·格瓦拉在古巴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休斯和格里·亚当斯在北爱尔兰进行的革命却以失败告终。

在休斯眼里，《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象征着最终的妥协：共和党运动正式接受了英国人将继续留在爱尔兰的事实。休斯曾经杀过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但如今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党运动的领导层可能早已准备好接受低于绝对胜利的结果，并事先决定不告诉像他这样的士兵，休斯认为这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做法。对休斯而言，这是一种极其有针对性的战略手段：他直接把责任归咎到他最亲近的同志格里·亚当斯身上。在他公寓的一面墙上，一个带相框的照片和切·格瓦拉的纪念照挂在一起。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朗·凯什监狱拍的一张老照片，休斯和亚当斯用手臂搭在彼此肩上。亚当斯身穿一件宽松的八字领短袖，蓬松的头发落在肩头。休斯穿着一件紧身

T恤，上面写着“墨尔本爱尔兰俱乐部”的字样。两人都在铁丝网的背景下咧嘴而笑。休斯对亚当斯已经再无好感，但他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以提醒自己过去的时光。[7]几十年来，他和亚当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最近，他开始悲观地开玩笑说，他就像共和军的武器，先是被利用，然后被丢弃——一如“解除武装”。[8]



休斯在帝维斯高楼的公寓里

休斯的焦虑日益严重。这个一手策划了血色星期五事件的人，如今刻意回避贝尔法斯特中心的拥挤地带。他喜欢这座帝维斯高楼，因为他能在公寓的建筑设计中找到慰藉：它就像监狱的牢房一样，与世隔绝的空间是他所能掌控的。[9]他能在酒精中寻得暂时的解脱。医生让他戒酒，可他做不到。[10]

麦克斯还记得他最初认识休斯的情景。[11]那时，麦克斯只有16岁。休斯入狱时早已名声在外，他比麦克斯年长10岁。不过他喜欢这个年轻人，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麦克斯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对于前准军事组织成员而言，在几十年的沉默之后开始吐露心声，这种经历往往能起到极大的宣泄作用。有时他很难让受访者开口，然而一旦他们开口，却又常常很难让他们停下来。[12]多年的战争故事、恐怖经历、歇斯底里的笑话和内心的不满统统倾泻而出。麦克斯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他会轻声说些鼓励的话，对受访者的幽默报以真诚的开怀大笑，并不时主动分享自己的轶事。他会在强调提问时说：“你能就这个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吗？让波士顿学院未来的学生有更深的了解。”

正如埃德·莫洛尼预测的那样，麦克斯认识这么多参与者的事实——他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一起执行过任务，一起蹲过监狱——赋予了他特有的可信度。在一系列采访中，休斯和麦克斯会坐在公寓里，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有一次，休斯开玩笑道，他想让波士顿学院为他余生的香烟买单。[13]然后，等他患了癌症，他会反过来控告校方。他们谈了很多，关于休斯的童年，关于他父亲如何在他母亲去世后撑起整个家，关于他和商船队的旅行，关于他如何觉醒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关于他策划的数百次行动，以及在监狱里的漫长岁月。他们还谈到了血色星期五。“那天的行动没有杀人的意图，”休斯坚持道，并补充说，“我对这件事后悔不已。”

但最重要的是，休斯谈到了格里·亚当斯。[14]麦克斯曾和亚当斯同时在朗·凯什服刑，他了解亚当斯和休斯之间曾拥有的亲密关系。然而现在，休斯对这位昔日的同胞充满了愤怒。休斯憎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他开玩笑说，这个协议的首字母缩写GFA实际上代表“糟践所有人”（Got Fuck All）。[15]“这一切他妈都是为了什么？”他会问。那些他夺走的生命，那些被他送上死路的年轻志愿军：一直以来，他认为这些牺牲最终会因为爱尔兰的统一而得以正名。相反，亚当斯已经成了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一个和平使者。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北爱尔兰后冲突时代的重要角色。对亚当斯的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但在休斯看来，格里·亚当斯可能已经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更有甚者，他可能遭到了英国人的摆布。当临时共和军在监狱里就战略问题组织教育学习班时，其中一门基本课程讲到，英国镇压叛乱的核心方法就是“对他们能应付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16]休斯认为，在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指挥的责任之一，就是高级军官必须做出可能让下属送命的选择。在休斯下达的命令中，有些曾导致年轻志愿军乃至无辜百姓丧命，他的精神因此受到重创。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演。他告诉麦克斯，血色星期五事发当天，他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但发号施令的，是亚当斯。“格里才是做决定的人。”他说。

借由否认自己在冲突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亚当斯事实上推脱了自己对诸如血色星期五这种灾难的任何道德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否认了他和昔日下属的关系，例如布伦丹·休斯。[17]“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恶心，”休斯说，“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为所有人的死承担责任。”如果这所有的杀戮至少成功将英国人逐出了爱尔兰，那么休斯或许可以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情理。但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当休斯和这些心魔斗争时，他惊诧地发现，亚当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反省。相反，他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这令休斯愤怒不已。他当然是共和军成员！“所有人都知道，”他告诉麦克斯，“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

的狗都知道！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

作为武装斗争的老兵，休斯似乎拥有无懈可击的资历让他在共和党的圈子内立足。然而，在他拒绝支持和平进程并疏远亚当斯后，不容异议的新芬党继而将他打入冷宫。依靠政府补助作为生活来源的境况让休斯感到难堪，而且他不得不眼看着其他人——那些“从未动过真刀真枪，从未真正参与革命，却又跟志愿军的死紧密相关的人”——在战后的贝尔法斯特成为权力掮客。他抱怨说，亚当斯和他的同伙似乎正在享受一种跟革命社会主义者所宣称的政治信仰相左的奢侈生活。他把他们称作“阿玛尼西装旅”。[18]

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19]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20]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21]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最初的几次采访平淡无奇，奥拉韦谈到了他的家庭背景，谈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父亲为共和军效力，谈到他是唱着反抗歌曲长大的，谈到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奥拉韦讲述了他是如何与格里·亚当斯一起被关进了“梅德斯通”号。他还提到，他曾经为了弄点酒钱“擅自”抢劫。他的共和军上司用枪击双腿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惩罚——他认为总的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处罚。[22]有一次，麦克斯和奥拉韦正在进行采访，结果传来了两架飞机撞进纽约世贸中心的消息。两人对此惊骇不已。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发现，爱尔兰传统的政治暴力和“基地”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并未深思这一点。

“我不想谈论绝食抗议的事。”奥拉韦多次告诉麦克斯。在前八次采访中，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但在最后一次采访的当晚，这个话题被提了出来，奥拉韦发现自己说出了这个他承诺绝不开口的故事。

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23]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24]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25]

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26]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27]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28]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29]

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

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30]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31]

对于绝食抗议，布伦丹·休斯作为幸存者同样滋生了负罪感，并在接受麦克斯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点。休斯经常回想第一次失败的绝食行动。那一次，在年轻的抗议者肖恩·麦克纳陷入昏迷后，他叫停了抗议活动。跟许多“如果……那么……”的事后假设一样，休斯会想，要是他当年任凭麦克纳死去，事情会怎么样？第二次绝食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那十个人是不是不会送命？他在脑海中做着算数，那是一种让人不知所措的感受。在绝食抗议很久之后，有一次，休斯在邓多克碰见了麦克纳。麦克纳有脑部损伤，而且视力因为绝食而受到了永久性影响。[32]“黑鬼，你他妈混蛋！”麦克纳对休斯说，“你应该让我死的。”

有时，休斯会想到自杀。和麦克纳一样，他的身体也留下了绝食的创伤。[33]最终，他的视力会逐渐消失。他开始戴独眼眼罩，这令他看上去像冬日里逍遥法外的海盗。他会坐在公寓里，一连数小时盯着窗外，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凝视着城市里参差不齐的街道、学校操场和教堂的塔尖，还有远处的造船厂。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在麦克斯的妻子卡丽·图米看来，休斯被困在了那里。“我一直感觉，他大部分的生活都禁锢在那个窗台边，”她回忆道，“他无法抉择，到底是跳出去结束这一切，还是跳回来开始真正的生活。”[34]

“我对监狱的医院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次休斯告诉麦克斯，“我依然能闻到——人死的时候有一种气味，一种死亡气息——整个绝食抗议期间它都笼罩在医院里。到现在我还会想起这些，我甚至有时能闻到它，那种陈腐的死亡气息。这么多年来，我是说，几年前我还无法谈这些事。我做不到，我真的没办法。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它。”

休斯回忆了罗斯医生，那位在绝食抗议期间照顾过他，给他带过新鲜山泉水的好心医生。[35]博比·桑兹一直不信任罗斯，说他是“思维操纵者”。但这位医生的好意对休斯而言意义重大。后来他听说，在目睹十位绝食抗议者相继死去后，罗斯医生于1986年举枪自尽。[36]

休斯对麦克斯承认，他能在这些对话中有所坦白，因为他知道这些采访会封存起来，直到他去世。他告诉麦克斯，格里·亚当斯批准了1973年对伦敦实施的炸弹袭击，那次任务最终将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她的同行炸弹手送进了监狱。“我的意思是，有些事你能说，有些事不能说，”他思索道，“我不会昭告天下，说我和某个士兵被枪杀的案件有关，或者参与策划了在英格兰的行动。但我肯定不会站出来否认。而听到我愿意为之豁出性命（有几次几乎真的送命了）的人站出来否认他参与过的历史，否认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否认他在战争中指挥的行动，实在让人深恶痛绝，也是所有死去的人的耻辱。”[37]

休斯记得帕特·麦克卢尔，也就是“小帕特”，还有他的秘密小组——

杜洛尔丝·普赖斯效力过的“无名氏”。麦克卢尔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隐没了。他在某个时候退出了共和军，去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回去，打持久战。但麦克卢尔拒绝了。他不干了。休斯听说他移居去了加拿大，最后死在了那里。麦克斯问，如果指挥“无名氏”日常行动的是麦克卢尔，那么谁拥有这个小队的最高权力呢？[38]是谁在发号施令？

“他们一直是格里的部下。”休斯说。

当麦克斯问到琼·麦康维尔的失踪时，休斯告诉他，格里·亚当斯了解并批准了这次行动。在休斯看来，这桩谋杀案无可厚非。

“她是告密者。”他说。

二十二　叛徒

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在1925年出版的爱尔兰小说《线人》中，作者利亚姆·奥弗莱厄蒂讲述了一个警方的线人基普·诺兰的故事。基普指认了警方想除掉的一个都柏林共和党人，此人后来被警方杀害。[1]从基普向当局提供线索的那一刻起，他强烈地意识到，在这座紧密相连的城市里，他已经成了“弃儿”。他有一种疑神疑鬼、大难临头的感觉，十分害怕抛头露面：“平常的脚步声仿佛注入了邪恶的魔法，变得让人胆战心惊。”叛徒占据了爱尔兰人大量的想象空间——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典范，在民间被视为恶魔。[2]格里·亚当斯曾说，告密者“是这个岛上各个社会层面所唾弃的对象”。[3]然而事实上，数百年来，英国人一直在爱尔兰雇用间谍并培养双重间谍。[4]弗兰克·基特森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开端的洞见不断发展，从最初的MRF“策反小组”演变为由英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及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投入的极其广泛而复杂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渗透准军事组织的圈子。

特雷弗·坎贝尔是一个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贝尔法斯特警察，效力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在德里（对坎贝尔来说永远只有“伦敦德里”）工作两年后，他于1975年被调职至贝尔法斯特，并在接下来的27年中卷入了北爱尔兰冲突。坎贝尔的专长是应对线人。[5]

“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规则，无章可循，只能找到一个是一个。”他回忆道。当局并没有系统的规定，告诉他们以哪些人为目标，或者怎样管理他们的线人。不过，这一领域的科学逐渐进步。在北爱尔兰管理叛徒的最大挑战，是当地培养皿般的地域规模。你不能在贝尔法斯特和一个贝尔法斯特线人见面，这座城市实在太小。因此，你必须让对方去郊区或者乡村。但这些线人往往是偏于孤陋寡闻，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一角长大，从未走向外面的世界。多乘几趟汽车和火车，就可能让他们迷路。坎贝尔会把线人带到一个海滨村庄见面，他们会一脸惊叹地站在那里，仿佛一趟汽车之旅就把他们载到了世界的尽头。坎贝尔喜欢和他的联络人在乡村见面，但不会进入乡村深处。在有些农村地区，比如南阿马，当地人认识每一辆车。只要有一辆陌生的车出现，便足以引起邻里的警觉。

寻找安全地点见面的挑战，往往比不上首先要传达见面信息的挑战。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许多北爱尔兰家庭没有自己的电话。就算他们有，基本上也是一条共用的电话线，爱打听闲事的邻居可能会趁机偷听——这显然不是联系秘密线人的好办法。理论上，叛徒可以使用付费电话。但在战时的贝尔法斯特，几乎所有付费电话都被故意破坏公共财产的人所捣毁。即便叛徒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话，也可能会有爱管闲事的熟人路过，发现他在电话亭里，继而打听他在跟谁通话。

因此，坎贝尔想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方法，在需要见面时通知线人。

起初，他采用了冷战时期间谍活动的一些粗略技巧，比如用粉笔在砖墙上留下记号。但他很快开发了其他更新颖的技巧。有时，坎贝尔会对贝尔法斯特的一户人家进行突然袭击，制造很大的动静——不是线人的房子，而是某个不幸住在街对面的毫无防备的百姓住宅。这对遭到袭击的无辜家庭来说很倒霉，坎贝尔承认。但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无误地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该见面了。

贝尔法斯特不是柏林——甚至比不上东柏林——在如此狭小而守旧的城镇玩这种间谍游戏，可能会导致离奇的事情发生。有一次，坎贝尔在卡斯尔雷盘问一位老练的共和军成员，那里是戒备森严的东贝尔法斯特审讯中心，以粗暴的审讯和酷刑而著称。[6]那个人曾多次被捕，但坎贝尔一直未能成功将他收买。现在，警方可以将他依法扣留三天，然后要么起诉他，要么放他走。三天时间里，坎贝尔和他面对面坐在一个空气浑浊、密不透风的审讯室里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和军犯人会保持冰冷的沉默，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坎贝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还有些人则侃侃而谈，试图对他下手，打探消息：他在哪里长大？他支持哪个橄榄球俱乐部？他成家了吗？他们住在哪里？坎贝尔希望跟审讯对象建立融洽的关系，但他明白，任何无意中透露的信息都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尽力维持这种戏谑的对话，同时避免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实质信息。这一次，受审的共和军是个话多的人，但他完全和坎贝尔一样训练有素：他不会透露任何能为坎贝尔所用的信息，他也绝不会让自己被收买。他不过是用随意而打趣的威胁口吻胡诌乱扯，消耗时间，对此坎贝尔不得不心生敬意。三天之后，时间到。坎贝尔别无选择，只能放他走。

坎贝尔已经72小时没有陪妻子了，她抱怨他一个晚上都没休息。所以，那个人被释放后，坎贝尔回到家里换洗一番，然后带妻子出去约会。他们开车来到了海边一家不错的海鲜餐厅。这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很受游客欢迎，坎贝尔和妻子在一个海景餐桌旁坐下点了餐。正当他们吃完第一道菜时，坎贝尔抬起头，看见有个人站在吧台旁边。他背对着坎贝尔，不过吧台后方有一面大镜子。就在这时，他们两人在酒瓶上方的映像里目光相遇。那是坎贝尔在过去三天审问的对象。

“我们可能不会留下来吃主菜。”坎贝尔对妻子说道，视线没有从那个人身上移开。他通常在开车的路上很小心，他认为他们并没有被跟踪到餐厅。相反，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巧合，但让人感觉暗藏危机。坎贝尔没有向妻子解释眼前微妙的处境，他对妻子知会了一声便朝吧台走去。他用若无其事的生硬态度跟那个共和军打了招呼，仿佛对方是他每天见面的人。

那个人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漫不经心地问：“那是你老婆吗？”

“是某个人的老婆。”坎贝尔回答。

“既然是你，那八成是别人的老婆了。”那个人坏笑着说。

坎贝尔对这个玩笑微微一笑。接着，他字斟句酌地问道：“你是准备在这里喝一整晚的酒，还是准备打电话叫人过来？”

那人小心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道：“回去吧，跟那个女人共进晚餐，然后滚蛋。”

“那个人是谁？”坎贝尔回到餐桌时妻子问道。

“一个相识，工作上的。”坎贝尔回答，并没有再解释什么。

坎贝尔有一个信条：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有时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点。你可能对一个人审问15次却一无所获；然而，等到第16次，事情就会出现转机。情况会改变，也许对方突然发现他跟自己的队伍不合，或者他身陷窘境急需用钱。教派贫民区是贝尔法斯特孕育准军事组织的地方，来自那里的线人往往没有工作，依靠政府补助勉强度日。如果你抓住时机，就能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紧急支援，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倘若你有非常想争取的目标，而对方的情况没有改变，你不如主动为他改变环境。“你可以安排让他失业，”坎贝尔回忆道，“或者让他失去房子。”对于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或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无家可归的前景更让人担忧。如果潜在的收买对象必须开车上班，坎贝尔会安排车出现需要高价维修的大故障。“当你知道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是你收买他的时候。”坎贝尔会说。

虽然金钱是引诱线人的有效工具，但也可能引起危险。有些人是所谓的“廉价叛徒”：他们是当地的“小鱼”，偶尔能提供低级别的信息，换点微薄的打赏。但如果你处理的对象涉入得更深——他传递了重要情报，且以英国政府特务的身份在行事——你很难在不让他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犒赏他。大多数这样的人住在破败的飞地里，那里的人一向很穷。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可能付给一个人数百甚至数千英镑而指望不被别人发现呢？你或许可以谎称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是赌马赢来的。但这种借口只能用一次。下次拿到钱的时候，你又该作何解释？

最难得的是为当局连续效力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线人。维持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件危险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叛徒所受的惩罚是死刑，而且他们的家人将一生蒙羞。同时，这也是一件孤独的事。坎贝尔的线人往往在情绪上依赖于他。虽然他一直在利用他们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虽然他最初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他们跟他合作，或者在他们想洗手不干时胁迫他们继续充当线人，但他往往也是唯一知道他们秘密的人。正因如此，他扮演起了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牧师的角色。叛徒的困难变成了他的困难，比如修缮房屋，比如给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传统观点认为，每个上线都想拥有身居高位的信息源。但坎贝尔发现，最佳线人往往是“贴身特务”——不是情报目标本人，而是那个在他

身边的人。收买格里·亚当斯的司机也许能为你带来比收买亚当斯本人更有价值的情报。（罗伊·麦克沙恩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亚当斯的私人司机，2008年他被揭露是英方的线人。）[7]

共和军对英方的渗透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20世纪70年代，当布伦丹·休斯和他的手下最初审问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他们获悉了有关“弗雷德们”的信息，以及基特森准备从内部破坏共和军运动的计划。70年代后期，临时共和军专门组建了一支内部安全队伍，他们可以审查新兵，并审问可疑的叛徒。这支以审讯为职责的骨干队伍后来被称作“爆头小组”——因为当叛徒认罪后，他们会让他“脑袋开花”，也就是一枪打爆他的头。[8]

几十年来，爆头小组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间谍猎手，是阿尔弗雷多·“弗雷迪”·斯卡帕蒂奇。[9]他是一个砌砖工，胸脯宽大，留着八字胡。斯卡帕蒂奇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他的父亲有一辆很受欢迎的冰淇淋车，以家族的姓氏命名。人们称弗雷迪为“意大利佬”，不过更多人直接叫他“斯卡帕”。他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初期加入了共和党运动，并且被关进过朗·凯什监狱。

斯卡帕会和一个叫约翰·乔·马吉的人一起，审讯任何可能与英方合作的可疑共和军成员。[10]他的手段千篇一律：他会把嫌疑人带到一个安全的房子里，蒙住他的眼睛，让他面对一堵墙坐在椅子上。[11]然后，斯卡帕会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他进行盘问，威胁他、贬低他，最后对他进行殴打甚至严刑逼供，直到他同意认罪。“所有军队都会吸引精神变态的人。”[12]布伦丹·休斯常说。但斯卡帕是个特例。通常，他会向嫌疑人保证，只要他认罪，斯卡帕就会饶他一命。当受审对象哭着承认自己越轨的事实——或者被酷刑屈打成招——斯卡帕会对他的供述进行录音。然而，不论他对倒霉的受害者施加酷刑时做出了怎样的承诺，背叛共和军的惩罚永远是死罪。斯卡帕的杰作会突然出现在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或者泥泞的乡村小路旁：那些尸体的手脚被捆绑着，身上满是殴打和火烫留下的伤痕，眼睛被残忍地用几截胶带蒙住。[13]

这些尸体被发现后，斯卡帕喜欢到死者家登门，大声播放他录下的供词，并向家属说明他们的亲人究竟为何遭到处决。[14]有时，他会详细讲述死者被害的经过。特雷弗·坎贝尔了解斯卡帕蒂奇的情况。他十分清楚那些被爆头小组传唤的人将面临怎样的下场。曾经，一个名叫弗兰克·赫加蒂的临时共和军军需官，向其英国情报部门的上线提供了共和军从利比亚所购武器的藏匿点。赫加蒂随后逃往英格兰，在军情五处的安全屋里躲了起来。假如他永远不回去，或许能活下来。然而他开始想家，并给住在德里的母亲打了电话。她告诉他，马丁·麦吉尼斯不断来找她，并亲口担保，如果赫加蒂回到德里，向共和军说明一切，他将免于一死。[15]赫加蒂回去后，遭到了爆头小组的审问。最后，他的尸体在边境附近的路边被发现。（2011年，麦吉尼斯坚称，他和赫加蒂的死“没有丝毫关系”。[16]但在1988年，也就是赫加蒂被害的两年后，麦吉尼斯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清楚“转变立场”的后果。

当被要求澄清可能会有怎样的后果时，麦吉尼斯说：“死刑，毫无疑问的。”）[17]当特雷弗·坎贝尔跟自己的线人合作时，他会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定不要认罪。一旦认罪，你必死无疑。”[18]

在波士顿学院和安东尼·麦金太尔做口述历史时，布伦丹·休斯坚定地表示，琼·麦康维尔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她是叛徒。据休斯所言，麦康维尔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机，很可能是英方提供的。休斯说，麦康维尔“让她的孩子为她收集信息，观察共和军志愿军在帝维斯公寓附近的活动”。

休斯告诉麦克斯，麦康维尔最初引起临时共和军的注意，是一个步兵遇到了她的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儿提到，他“妈妈”在家里放了一个东西。休斯回忆道：“我派了一个小队，一个小组，去她家里查看情况。”休斯说，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发现了那个无线电。休斯继续说道，共和军逮捕了麦康维尔，把她带走进行审问。据休斯所言，她承认她一直在用无线电给英军传递消息。休斯提醒麦克斯，他自己“当时不在现场”，所以他的回忆都是基于下属告诉他的二手信息。但他说，麦康维尔坦白以后，他的手下没收了那个发射机，并对琼发出警告，然后让她回到了她的孩子身边。

休斯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在麦康维尔家发现了另一个发射机。“我已经警告过她一次，”他回忆道，但现在，“我知道她必须死。”即使有人认同休斯对麦康维尔线人身份的描述，但也很难想象，除了低级别的花边消息，她还能提供什么重要信息？这对休斯和他的同志而言无关紧要。不论所谓的背叛造成的实际影响多么轻微，对共和军来说，叛徒就是叛徒，而对叛徒的惩罚就是死刑。

休斯强调，他个人并不知道麦康维尔会被秘密地埋葬，“或者说‘失踪’，这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他一直自认是左翼的自由斗士，然而这种手段似乎与暴政并无二致。在麦克斯看来：“不论在智利还是柬埔寨，让一个人失踪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战犯。”[19]即使在1972年的混乱时期，临时共和军也不会轻易在杀害某人后让他消失，休斯坚持道。回顾过往，尽管将一位十个孩子的妈妈埋葬在无名坟墓的行为十分残暴，但这个决定却是在一番郑重的讨论后做出的。

根据休斯的讲述，当地共和军领袖艾弗·贝尔尤其认为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埋葬。贝尔是个强硬派，他是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运动的老兵，曾于1972年夏天和格里·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伦敦失败的和平谈判。[20]休斯表示，伦敦会议的五个多月后，贝尔和贝尔法斯特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就如何处理琼·麦康维尔一事进行了辩论。“如果你们要杀了她，就他妈的把她扔到街上，”休斯记得贝尔说，“杀了她又把她埋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处死，这有什么用呢？”最好给当地其他人一点教训，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考虑当叛徒。贝尔提出，如果你们不让尸体被发现，那么这桩命案就“纯属报复”。

但贝尔的提议被否决了，休斯说，否决人是格里·亚当斯。

“亚当斯不接受这个逻辑吗？”麦克斯问道。

“他不接受。”休斯说。

“他下令让她失踪？”

“下令把她埋了。”休斯说。休斯猜测，他们可能担心，因为麦康维尔是女性，是一个丧偶的母亲，她的死可能损害共和军的声誉。但临时共和军确认了她的线人身份，必须对她实行终极处罚。因此，他们决定秘密杀害麦康维尔，并直接让她失踪。休斯表示，在等级制度的共和军，最终批准这个决定的不会有第二人选。“只有一个人下令处决那个女人，”休斯告诉麦克斯，“那个该死的家伙就是现在新芬党的领导人。”[21]

1972年，爆头小组尚不存在。因此，休斯说，亚当斯将运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的敏感任务交给了由小帕特·麦克卢尔管理的秘密小队。押送麦康维尔赴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而这个具体人选，就是杜洛尔丝·普赖斯。

巧合的是，普赖斯是麦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们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找到了对方，并发现他们都滋生出了极度的不满。[22]她生活在都柏林，他们一家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了那里。[23]她喜欢这座城市，但她希望两个儿子不会忘掉他们的贝尔法斯特口音。[24]最近几年，她和斯蒂芬·雷的婚姻逐渐变得紧张，最后他们于2003年离婚。[25]普赖斯继续住在一家人位于马拉海德的大房子里，那是都柏林北部一个繁荣的海滨郊区。她在家里摆设了许多她盛名时期的纪念品：装裱的简报、褪色的照片，以及挂在墙上的爱国横幅。[26]她和食物的关系一直未能恢复正常。她会邀请客人来喝茶，端上新鲜出炉的咖啡蛋糕，然后看着客人享用，自己却不愿吃一口。[27]“我不太喜欢吃东西。”她会说。

普赖斯的写作抱负并没有真正实现，她一直未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不过有一段时间，她重返校园，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注册了法律课程。[28]对该课程的年轻学生而言，普赖斯有着不同寻常的形象。她年纪偏大，举止古怪，常常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总把头疑惑地歪向一边。她插话之前从不举手，还喜欢亲切友好地诘问讲师。

有一天，普赖斯走进女厕所时发现，学生们正排着长队等待。洗手间正在维修，有几个厕所没有门。“为什么你们都等在这儿？”普赖斯问。

“那几个厕所没有门。”一个排队的女生解释说。

“一看就知道你们没进过监狱！”[29]普赖斯大声说道，接着大步走向没有门的厕所，自顾自地解决内急。

普赖斯保持着她的尖刻和风趣，有时她似乎沉浸在其中。但也有迹象表明，她无法摆脱过去的困扰。她感觉自己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脑海中搜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30]她为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感到不安——那些她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31]她的许多老战友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时几十年前的可怕遭遇在脑海中闪现，有时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32]偶尔，当普赖斯开车载着后座上的两个儿子，抬头瞥向后视镜时，她会发现镜子里的不是丹尼或奥斯卡，而是他死去的战友乔·林斯基在盯着他。[33]有一天，在圣三一学院一堂有关政治犯的讲座上，普赖斯拍案而起，并开始喊出一连串共和党绝食抗议者的名字，然后冲出了课堂。她再也没有回去。[34]

对杜洛尔丝而言，《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尤其令她有一种被出卖的个人感受。“这个协议背叛了她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的信念，”她的朋友埃蒙·麦卡恩回忆道，“和其他许多人相比，它对杜洛尔丝造成了更强烈、更深刻的影响。”[35]她实施过炸弹袭击、抢劫过银行，还目睹过朋友们死去，并且自己几乎也断送性命。但她期望，这些暴力之举最终能实现家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对于新芬党今天的成就，我连一次美味的早餐都不该错过。”[36]她在爱尔兰电台接受采访时说。“志愿军不仅会送命，”她指出，“志愿军还要杀人，明白吗？”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作“道德创伤”。[37]有别于“精神创伤”，道德创伤涉及士兵如何理解他们在战争时期做出的违背社会的行为。普赖斯感到了极大的道德创伤：她认为她已经完全被剥夺了为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权利。而那个将共和主义推向和平之路的人正是她昔日的朋友和指挥官——格里·亚当斯。这一事实更加重了她的道德创伤。亚当斯给她下达过命令，她忠诚服从的命令。而如今，他似乎完全否认了武装斗争，尤其否认了杜洛尔丝。这令她出离愤怒。

2001年，在梅奥县举行的共和党纪念会上，她起身宣布，她“受够了”人们说他们从未加入过共和军。[38]“格里是我的指挥官。”她表示。这种直言不讳并不受新芬党的欢迎，不止一次有人严厉警告她闭嘴。[39]然而，即便新芬党明目张胆地进行信息管控，这也只会加剧普赖斯的愤怒。20世纪90年代，共和军在迈向和平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个小型武装派别，其中有些派别采取了进一步暴力行动。普赖斯偶尔会出席这些组织的会议[40]，但她并不是参与者。[41]“你们重新发动战争能带来什么？”[42]她会问他们。

尽管如此，她仍然无法放下过去。她的两个孩子丹尼和奥斯卡并不关心政治。[43]普赖斯开玩笑说，当她谈论自己年轻时的动荡岁月时，对他们而言就像“石器时代”那么遥远。1998年，在一系列教派谋杀案发生后，斯蒂芬·雷表示：“每个人变得如此习惯战争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可能。”[44]现在，普赖斯很难让自己平静下来。麦克斯

创办了一本名为《毛毯》的杂志，以愤愤不平的共和党人的写作为特色。普赖斯成了定期投稿者，她常常在专栏直接致信批判亚当斯。“格里·亚当斯用一种为了不让基层士兵恐慌的温和语气，说的是，‘要知道，他们会离开的’。”她在2004年写道。“共和军会解散……武器会封藏在混凝土下……有些人会获得政治职位，其他人会得到满意的工作（社区工作等等），还有些人会开商店、开出租车，这里设个骗局，那里挖个陷阱。世事就是如此。”[45]

和布伦丹·休斯一样，普赖斯敏锐地意识到共和党殉道者被商品化的现象。她一眼看穿了亚当斯的一个暗示，即如果博比·桑兹还活着，他会欣然接受共和党运动向政治的转变。“他告诉我们，博比会全力支持和平进程，”普赖斯写道，“我常常会想，假如我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处境走向了预期的结局，谁会来代表我发言？我会为《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唱怎样的赞歌呢？”[46]（巧合的是，桑兹的家人对新芬党以博比的名义和形象来筹措资金的行为感到憎恶，并要求他们停止这么做。）[47]普赖斯愤怒地指出，当亚当斯面对某些共和党观众演说时，他会提及她备受崇敬的布蕾迪姨妈的名字。[48]她经常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这就是我们杀人的目的吗？[49]她会自问。这就是我们牺牲的目的吗？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50]有时，她会梦见亚当斯。[51]

虽然如此，她仍然对自己那段莽撞的个人历史极为骄傲。当一个叫塔拉·基南的美国研究生在2003年拜访她时，普赖斯说：“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向世人表明，任何普通人都能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信念，而在身体和精神上逼自己突破极限。”她说出这些话，让人感觉她是某种耐力运动员，而不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一个普通人能做出超乎寻常的反应，”她继续说道，“就像一个女人能把压在孩子身上的车抬起来，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潜能。”[52]

当麦克斯告诉普赖斯关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计划时，她同意参与进来。他们会在她家见面，一聊就是几小时。麦克斯开着录音机，她则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关于她引以为豪的共和党家庭背景，关于她作为青少年在民权运动时期思想的激进化，关于对伦敦实施的爆炸袭击，以及在监狱里的岁月和绝食抗议。

有一次，采访开始之前，普赖斯说她想谈谈她在琼·麦康维尔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麦克斯之所以被选作此次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人，完全是因为他的非客观立场。他和他的受访者来自同一群体。普赖斯成了他的挚友，她参加了他和卡丽的婚礼，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金色礼服，手臂搭在布伦丹·休斯的肩上拍了一张照片。麦克斯的儿子出生后，普赖斯答应做他的教母。现在，当普赖斯宣布她准备揭开北爱尔兰问题最可怕的秘密之一时，麦克斯却在打开录音机之前犹豫起来。“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很想记录这件事，”他告诉普赖斯，“但作为朋友，普赖斯，我必须提醒你一句。你有孩子，如果你承认参与了麦康维尔的失踪案，你的孩子将背负该隐的烙印。”[53]

当麦克斯按下录音键时，普赖斯选择不谈这件事。当他把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录音和文本——上面标注着她姓名的字母代号“H”——寄往波士顿学院时，里面的内容对琼·麦康维尔只字未提。

“我很失望，”麦克斯后来表示，“她听从了我的建议。”

二十三　沼泽女王

杰夫·克努普费尔大步走在沼泽上。克努普费尔是一名退休英国侦探，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和修剪整齐的胡须。当他来到爱尔兰搜寻尸体时，他穿着一件醒目耀眼的橙色外套。在这片遍地石楠花和绿苔藓的景色中，他如同灯塔般跃入眼帘。30年来，克努普费尔一直在曼彻斯特担任侦探。[1]他处理过抢劫案和谋杀案，最后在侦查总警司的职位上退休。但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发展出了搜寻人体遗骸的怪异天赋。

曼彻斯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之一，是所谓的“沼泽谋杀案”。案犯是一对精神失常的情侣——迈拉·欣德利和伊恩·布雷迪。从1963年起，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内杀害了五名当地儿童，并将他们埋在了城外的乡村里。最开始，只有两具尸体被找到。但在1986年，即谋杀案发生的20多年后，杰夫·克努普费尔被介绍给了迈拉·欣德利。她被判终身监禁，但她同意帮他寻找另一位被害者的遗体，并被警方的直升机送往沼泽地。欣德利体重超重，健康欠佳，高低不平的地形让她无法平稳行走。但克努普费尔牵住她的手，引导她穿过狂风肆虐的泥沼。[2]最终，他的团队发现了保利娜·里德的无名之墓。保利娜遇害时16岁，当时她正在前往舞会的路上，结果被欣德利和布雷迪杀害。她的尸体在浓密的泥炭里困了几十年，却诡异地保存完好。然而一暴露在空气中，克努普费尔回忆道：“她就开始在我们眼前腐坏。”[3]

凭借这种令人生畏的资历，克努普费尔最后参与了爱尔兰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1999年4月，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实体——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追溯至《伊利亚特》、古埃及以及更遥远的时空，葬礼仪式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形成了重要功能。无论我们将所爱的人火化，或是埋葬她的遗骨，人类都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即用某种深思熟虑的仪式性方式来纪念死亡。或许，作为一种战争手段，被迫失踪最为残酷的特点在于，它剥夺了失去亲人的人们这种获得安慰的权利，使他们永远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你无法悼念一个没有死去的人。”[4]阿根廷籍智利作家阿列尔·多尔夫曼曾评论。在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期间，有3000多人被迫失踪。[5]在阿根廷，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万。在弹丸之地的北爱尔兰，这个数字要小得多。独立委员会最终确认，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有16人被迫失踪。[6]甚至这一点也能反映出这个省方寸之地的规模：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会争论被埋葬在无名之墓的总计人数，但在北爱尔兰，你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单列在一张信封的背面：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凯文·麦基、琼·麦康维尔、彼得·威尔逊、埃蒙·莫洛伊、科伦巴·麦克维、罗伯特·奈哈克、布伦丹·麦格罗、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麦金尼、尤金·西蒙斯、杰勒德·埃文斯、丹尼·麦凯洪、查理·阿姆斯特朗、谢默斯·拉迪。[7]然而，确认死者的身份是一回事，找到他们却是另一回事。

侦察员驾车行驶在乡村小道上，去和当地人见面，包括前枪手、酒吧服务员、农民和牧师。他们的请求很简单：告诉我们你听说了什么，告诉我们你记得什么，帮我们找到那些遗体。设立该委员会的立法明确规定，任何提供消息的人将获得一定的起诉豁免权。199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也就是委员会通过立法成立将近一个月后，两位天主教牧师陪同警方来到了邓多克郊外的一个中世纪墓地。在墓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警方在杜鹃花丛下发现了一口新棺材。[8]它是被匆忙放在地面上的，里面装着埃蒙·莫洛伊的遗骸。[9]1975年，莫洛伊在21岁时因为线人的身份被共和军杀害。莫洛伊的遗骸看上去是在一夜之间被挖出来装进棺材里，然后放在了地面上。

寻回遗体后，莫洛伊的家人举办了一场葬礼，重新将他埋葬。不久，一位牧师找到了他们，说他从新闻上得知了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的消息，而他有话要说。他的名字叫尤金·麦科伊。他记得，25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接着被一群人带到劳斯郡一处偏远地区的活动房屋里。[10]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年轻人被绑在床上，这个人就是埃蒙·莫洛伊。那些人要在当晚将他处决，但在他们下手之前，莫洛伊要求对牧师进行忏悔。麦科伊神父离开家时太过匆忙，他忘了带上自己的念珠。那个貌似负责行刑小组的人掏出自己的一串念珠，递给牧师说道："用我的。"

莫洛伊非常恐惧。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请求麦科伊神父向家人转告他的遗言：告诉他们我不是线人。这并不是事实。[11]后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莫洛伊确实是一名线人。然而，他的遗愿是让家人听到相反的事实。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神职人员常常被卷入有违道德的处境中，而他们未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晚，麦科伊神父离开后，他没有找到莫洛伊的家人转告他的遗言。他也从未向警方报告这一事件。[12]

莫洛伊的遗体被发现一个月后，独立委员会在莫纳亨郡的一处沼泽发掘了另外两具尸体：布赖恩·麦金尼和他的朋友约翰·麦克洛里，布赖恩是失踪人员家庭的支持者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儿子。他们因为从临时共和军的武器库盗取枪支抢劫酒吧而被杀害。[13]搜寻尸体的工作势头似乎越来越强。那年的一个夏日，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们聚集在劳斯郡库利半岛顶端的海滩上。那是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岩石嶙峋，微风掠过，距贝尔法斯特大约50英里远。共和军透露的消息表明，他们的母亲被埋在了这片海岸的某个地方。大型挖土机像史前怪兽般在发掘地点缓慢行动，长长的吊臂将土壤和沙砾铲起。[14]身穿荧光外套的警察手持风动钻机、尖嘴镐、铁铲和耙子工作，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则在一旁注视等待。

这次守候是麦康维尔家兄弟姐妹的重聚，但并不是一次和谐的重聚。小时候，他们拼命抵抗政府拆散一家人的任何努力，仿佛他们早就知道，一旦他们被分开，就再也无法回到一起。他们已经各奔东西，偶尔才会联系。如今，他们带着终于能找到母亲的希望相聚，有人却担心他们已经不懂得如何像兄弟姐妹那样相处。[15]他们的外貌依然惊人地

相似。琼的大多数孩子继承了她瘦长的脸颊、突出的颧骨和撅起的小嘴。然而，这群如今三四十岁的兄弟姐妹，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老。他们面容憔悴，几个兄弟的手背和前臂都文有深蓝色的文身。他们彼此间关系紧张，容易争吵。当他们谈到琼的时候，每个人都倾向于用单数而非复数代词——“我的妈妈”——仿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16]



麦康维尔一家站在沙滩上守候：阿奇、迈克尔、吉姆、苏珊、海伦、罗伯特、阿格尼丝和比利

吉姆·麦康维尔6岁的时候，母亲遭到了绑架，他一直在不断进出监狱。[17]阿奇和几个兄弟姐妹一样，被酗酒的问题所困扰，而且脾气暴躁。[18]“要是有谁说错话，你就会爆发，”他说，“要是谁的话触到点子上，你就完全忍不住。”这些孩子没有进行过心理咨询，他们的悲痛和愤怒尚未抚平。他们对共和军尤其愤怒——是共和军决定让他们的母亲失踪，但同时可能更令他们悲愤的是，共和军认为琼·麦康维尔是告密者。有关琼的闲言碎语在她死后不久就开始了，说她可能因为叛徒的身份而遭到了处决。仿佛年少时成为孤儿并被扔进严酷而弱肉强食的爱尔兰孤儿院的经历还不够不幸，这些孩子成年后还要背负这种煽动性的耻辱。

前一年，共和军代表已经向海伦承认，临时共和军对琼的失踪负有责任。[19]但该组织在1999年春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麦康维尔“承认自己是英军的线人”。[20]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感到高兴的是，共和军至少终于承认杀害了他们的母亲，而且现在愿意协助寻找她的遗骨。[21]但是，他们极力否认任何有关她是叛徒的消息。琼是被偏执的敌意害死的，他们据理力争道，当时正值教派冲突的高潮，而她是一个新教徒寡妇，恰好住在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社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琼于被害前不久在帝维斯公寓照顾那个受伤的英国士兵的故事，以及“英国情妇”几个字如同红字般用颜料潦草地涂在了他们的门上。“我跟那些说我母亲是叛徒的人争辩过许多次，”回顾被无情排挤的一生，吉姆说道，“人们不愿看我们一眼。我们走进酒吧的时候，他们会故意躲开。我们只能独自坐在那儿。”[22]

这些孩子现在想做的，是为琼洗刷清白。阿奇在想，母亲的被害会不会是一桩错案：也许共和军一直在寻找帝维斯公寓里可疑的女性双重间谍，结果却抓错了人。[23]迈克尔对任何关于母亲可能是某种间谍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她是个过度劳累、心情抑郁、精神脆弱的人。[24]她有十个孩子要养活，而且丈夫刚刚因为癌症去世。她整天困在家里，抽烟、照顾孩子，还要手洗衣服。她到底能提供什么信息？至于琼认罪的说法，海伦表示："他们对她严刑逼供的时候，她什么都可能承认。"[25]

每天，挖土机都会铲起更多土，但还是没有琼·麦康维尔的迹象。在某个时刻，侦察员挖出了一堆骨头，引得众人一阵激动，但结果却是狗的骨架。[26]大家不禁烦躁起来。富有同情心的当地人带着温热的食物来到挖掘现场送给麦康维尔一家，还有人送给了他们一大盒香烟。[27]

"我们该把她葬在哪里？"[28]有一天，迈克尔问兄弟姐妹。

"西贝尔法斯特，"海伦回答，"是他们杀害了她，是他们让我们失去了母亲。"海伦想把琼埋葬在弥尔顿公墓，就在共和党人的坟墓中间，还要在墓碑上写下：琼·麦康维尔，被共和军绑架并杀害。[29]

虽然兄弟姐妹们和她一样愤怒，但他们并不想激怒临时共和军："我们不是在讨论共和军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所有人都知道，"吉姆说，"我们都住在共和党地区，我们不想他们来找麻烦。"他继续说道："那些干这件事的人，他们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现在是时候原谅了。"[30]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绝不会原谅，"比利怒气冲冲地说，"我不会原谅那帮混蛋干的事！"

看着兄弟姐妹们争吵，甚至自己也参与争吵，这让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难过。"本来希望这件事能让我们走近一点，"他说，"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疏远。"[31]

在共和军内部，这个后来被称为"失踪者"的群体被视为一种政治累赘——同时也是一种耻辱。[32]1995年，比尔·克林顿就此事对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进行了施压："有些家庭仍然没有机会平静地哀悼，无法探望亲人的坟墓，无法在分离多年后重聚。"克林顿说："现在是时候让这些家庭再次团圆了。"[33]博比·斯托里是共和军的资深成员，也是格里·亚当斯的亲信。1998年，他开始对前临时共和军成员进行登门拜访，询问他们是否记得琼·麦康维尔发生了什么事。[34]他找到了艾弗·贝尔，贝尔曾提出应该将麦康维尔杀害后陈尸街头。他还找到了杜洛尔丝·普赖斯，这让她感到惊愕，她没想到亚当斯竟然会派人来问她关于琼·麦康维尔的遭遇。她向斯托里建议，如果他想查出真相，或许他应该"去见格里"。[35]

巧合的是，亚当斯在这段时期和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见了面。1995年，他首先拜访了海伦和她的丈夫谢默斯。他是在保镖的陪同下去她家的，"就好像他是个名人"，海伦心想。和麦康维尔家一样，亚当斯从小

家里有十个孩子，他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但海伦注意到，他不敢看她的眼睛。[36]有一次，和迈克尔·麦康维尔见面时，亚当斯说："不管怎么说，我很遗憾共和党运动对你母亲的所作所为。"[37]亚当斯十分擅长这种掩饰，他不会承担任何个人的责任。毕竟，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共和军。"这些谋杀案发生在25年前，当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亚当斯对一家报纸表示，"战争期间免不了发生可怕的事。"[38]

在和麦康维尔一家最初的一次会面中，亚当斯表明，他实际上有不在场的证据。"谢天谢地，她失踪的时候我在监狱里。"[39]他说。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6月，为了飞往伦敦参加和平谈判，他从朗·凯什出狱。琼于12月被绑架，而亚当斯直至次年7月才被再次关进监狱。（"不应该断章取义，"亚当斯后来表示，"我把日期搞混了。"）[40]

在布伦丹·休斯看来，亚当斯的表现令人震惊——他竟然会找到琼·麦康维尔的孩子，向他们保证会将他们母亲的遭遇追查到底，仿佛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他找到这户人家，承诺要对那个女人的失踪进行调查，"休斯在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的一次采访中告诉麦克斯，"就是他下达了该死的命令处决那个女人！你告诉我天理何在？！"[41]只有"不择手段的恶魔"才能干出这种事，休斯断定。

搜寻遗体所需的时间似乎比预期更久。"共和军能在星期五用棺材交出一具遗体，"海伦的丈夫谢默斯在埃蒙·莫洛伊被发现后表示，"他们应该来这里为我们做同样的事。"[42]然而，尽管有些坟墓容易定位，其他坟墓却难以找到。这些坟墓之所以没有标记，就是为了让它们能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人们已经逐渐变老，记忆随之褪色。与此同时，地貌也发生了改变。[43]有人可能记得一个谷仓附近的特定位置，但那个谷仓几十年前就已被拆毁。20世纪70年代一排纤弱的小树苗，如今可能长成了粗壮的大树。"共和军领导层怀着好意在解决这个问题。"临时共和军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语气中透出些许戒备。他们表示，因为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努力遇到了阻碍。

麦康维尔一家在其他有亲人失踪的家庭里找到了些许慰藉。有几个家庭会在名为海浪的"跨社区"精神创伤中心相聚，它成了失踪人员家属的一种支持。有些人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凯文·麦基失踪后，他的母亲玛利亚变得有些精神失常。她有时会在夜里把家里的其他孩子从床上叫醒，给他们穿上外套，坚持让他们出门进行徒劳的寻找。[44]她会贸然找上邻居，用力敲他们的门大声喊道："我儿子在哪儿？你们对凯文做了什么？"[45]还有的时候，她会在晚上准备一盘食物，然后告诉孩子们："把它放进热压机里给凯文保温。"[46]仿佛他刚刚出门办事去了。

有一次，警方在突袭麦基家时发现了一把枪。玛利亚因此被捕，并在阿马监狱待了几个月，她碰巧在那里遇见了普赖斯姐妹。她让杜洛尔丝·普赖斯给她做头发，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开车送她的儿子穿过边境奔赴刑场的人。[47]当埃蒙·莫洛伊的尸体被寻回后，玛利亚·麦基参加了他的葬礼。[48]她体验了一种幸福的错觉，以为她埋葬的是自己的儿子。然

而，当她去世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凯文。玛利亚的大家庭给孩子们起名凯文，以此来纪念他。不论是儿子、表兄弟、侄子或外甥，似乎只要有男婴出生，他们都会叫他凯文。[49]

爱尔兰的地形以泥炭沼泽为主，密实的土壤具有酸性厌氧的特质，这意味着爱尔兰恐怖的过往偶尔会在这里重见天日。泥炭切割机有时会掘出古人的上颌骨、锁骨，或者已经保存数千年的完整尸体。[50]这些尸骨往往显示出祭祀仪式和暴力死亡的迹象，其中有些能追溯到青铜时代。这些受害者遭到了他们所在群体的驱逐和埋葬，被后世发现时，他们从头发到粗糙的皮肤依然栩栩如生，完好无损。在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问题的高潮时期，谢默斯·希尼因为一本书开始关注“沼泽人”。[51]这本书出版于1969年，讲述了关于在日德兰半岛的沼泽里发现的保存完好的男性和女性的尸体。在书中所附的照片中，那些扭曲的尸体赤身裸体，有些人的喉咙被割开，这让希尼联想到爱尔兰过去和现在的某些“残暴仪式”。[52]希尼以这些人物为题写下了一系列诗作，包括《沼泽女王》。他在诗中采用了一个女人的口吻，这个女人在长久的埋葬后被重新发掘：“我被一个草泥割切者的铲子/修剪/和剥光”[53][5]

小时候，希尼在自己家的农场采集泥炭。[54]他曾经形容，爱尔兰的沼泽“记得这里发生和经历的一切”。尽管让人们失踪的行为令人痛恨，但爱尔兰对此却并不陌生。[55]事实上，老共和军早在20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就有这种劣迹。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秘密埋葬，但有时仍然会有尸体意外出现。[56]它们的骨头被泥炭染成了深棕色，以至于看上去像树根，而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挖土机在库利半岛的沙滩上连续挖掘了50天，最后掘出了一个规模接近奥运会游泳池的大坑。麦康维尔一家每天都会聚在岸边，希望土壤里能出现某些线索：一颗纽扣、一根骨头、一个拖鞋，或者他们的母亲一直别在身上的别针。有的夜晚，琼的孩子们会坐在温暖的车里，凝视夜幕下的爱尔兰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拍打在岸边。[57]但是，这次搜寻最终被放弃。虽然共和军提供了坟墓的坐标，但他们的信息似乎出了差错。琼被绑架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变成了笑柄，”阿格尼丝说道，泪水使她的睫毛膏晕染开来，“现在他们又让我们成了笑柄。”[58]

几个兄弟姐妹离开海滩，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然而，母亲的影子无处不在。他们也许不知道是谁下令杀害了琼，或者是谁执行了处决的命令。但他们仍然记得，在那个12月的夜晚，那些闯进家里带走母亲的年轻邻居。绑架团伙的成员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这是一个残酷的转变：除了琼留下的那张唯一的照片，有几个孩子已经记不清他们母亲的模样，但他们仍然能认出那些绑匪的脸。[59]有一次，海伦带着她的孩子们去麦当劳，结果在那里看到了绑架母亲的其中一个女人。[60]那个女人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她朝海伦大吼，让她不要找她的麻烦。

还有一次，迈克尔在福尔斯路坐上了一辆黑色计程车的后座，结果抬头发现司机是绑架琼的人之一。计程车驶离路缘，两个人一路上沉默

不语。[61]迈克尔一句话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坐着，一言不发，直到车开到了目的地。然后他把车费递给了那个人。

二十四　交织的谎言

窃贼们穿着西装，一副公事在身的样子。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刚过10点，窃贼们一行三人开车来到了卡斯尔雷楼群的大门外。那天是2002年的圣帕特里克节，东贝尔法斯特一片寂静。整个戒备森严的警署大楼大约只有20人在值班。[1]特雷弗·坎贝尔当晚不在那里。经过几十年对准军事组织成员的审问和收买，他正准备退休。[2]事实上，四个月前，依照《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更名为听上去更加中立的北爱尔兰警察局。[3]它的新使命是在人员雇用方面更加包容，减少和新教社区的联系。

即便如此，卡斯尔雷看起来仍然像战区的前线作战基地，周围环绕着装有带刺铁丝网的高墙。[4]这里据说是整个欧洲最安全的建筑之一。几个窃贼在门口漫不经心地亮出了他们的证件——似乎是军队识别徽章——一个警卫放他们进入大楼。[5]除了警方之外，卡斯尔雷内部还有英国军队，以及某些为情报部门工作的匿名个体。这是个繁忙的机构，不是什么地方警区，警卫不可能认识进出的每一张面孔。除此之外，即便是最大胆的罪犯，也不会愚蠢到闯入重兵把守的设施，毕竟里面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被关进卡斯尔雷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那是准军事组织成员幻想逃出而不是闯入的地方。来到前台，几个人再次出示他们的证件，心不在焉的夜班警卫让他们进入了大楼。

几个窃贼走过一连串走廊，他们的意图表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探险。他们正在前往一个特定的房间，一个办公室。巧合的是，这个办公室平常所在的房间正在装修，所以整个办公室的运行暂时迁至机构的另一个地方。不过，这几个人事先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继续走向大楼深处的那个临时地点，即所谓的220——那个秘密的、昼夜不停运转的贝尔法斯特安全部队间谍网络神经中枢。在这里，全城的数百名线人可以拨通一条特殊热线，跟他们在警方、军方和军情五处的上线联系。

当晚只有一名特殊分队的警察在办公室值班，接听电话。他没有理由怀疑敲门的人会来者不善，于是他开了门，结果下巴重重地吃了一拳，他应声倒地。几个窃贼话不多说，行动迅速，他们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用面罩盖住他的头，把他捆在了一张办公椅上。然后，他们给他戴上耳机，用随身听在他的耳边放起了嘈杂的音乐。[6]一串钥匙毫无掩饰地放在办公桌上，几个人拿起钥匙打开抽屉和档案柜，取出里面的文件。偶尔，其中一个窃贼会跑到被捆的警察身边，查看他的脉搏，确保他呼吸正常。但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再查看。在看不见也听不到的情况下，这名警察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房间里。最后，他开始试图扭动身体给自己松绑，谁也没有停下来阻止他。等他取下面罩的时候，窃贼早已逃之夭夭，档案柜也被洗劫一空。那些人带走了高度机密的珍贵情报——笔记本和文件，其中包含共和军和其他准军事组织内部线人的详细信息和代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大楼。他们只留下了

一个线索——其中一个人戴的领针。[7]这要么是一种令人信服的伪装，要么是窃贼自鸣得意的玩笑，领针上写着：拯救皇家阿尔斯特警队。

这是一次胆大妄为的盗窃：三个人赤手空拳、明目张胆地走进了贝尔法斯特反恐行动的内部密室，而且偷走了大量敏感情报。警方立刻陷入一片恐慌，并通知线人他们可能会遭遇危险，最终重新安置了300多人。[8]共和军成了可疑对象。一位安全人士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桩入室行窃案有意违反了和平进程——毫无疑问，它构成了“战争行为”。[9]共和军回应称，恰恰相反，这是当局的内鬼所为。大多数观察人士最终推断，这起案件的确是临时共和军的杰作，但窃贼似乎得到了大楼内部人员的协助。卡斯尔雷的一名厨师被传去问话，结果发现他和前共和军领袖丹尼斯·唐纳森有来往。[10]唐纳森如今是一名新芬党官员，在斯托蒙特任职。一篇媒体报道推测，这起盗窃的目的在于揭开“一名特殊告密者的身份”，这个人获得了“神秘的地位，是临时共和军内部为警方效力的级别最高的线人”。[11]据这篇文章所言，这名所谓的间谍代号是“牛排之刀”（Steak Knife）。

多年来一直有传言称，共和党运动的最高层活跃着一名线人。这个线人的代号一度被泄露出来：这个代号有时被写成“赌注刀”（Stake Knife），有时被写成“牛排之刀”或者“赌注之刀”（Stake Knife）。但其中的视觉含义一直没变：这是一把直插共和军心脏的致命匕首。[12]在1999年的一篇报道中，“赌注刀”被形容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阿尔斯特的“王冠上的宝石”。[13]

杜洛尔丝·普赖斯听说过这些传闻。“你知道人们说的‘赌注刀’吗？那个终极告密者，”2003年3月她在都柏林的家中对一位访客说道，“据说他在共和军统治阶层身居高位，我真的想不出他是谁。”[14]普赖斯承认，她有时会在生气的时候开玩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格里·亚当斯本人。“不过我认为他不是‘赌注刀’。”她说。

“赌注刀”的概念令共和党人极度不安，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英国人专门为了打击共和军的士气而捏造的谣言。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逐渐确信，他的情报机构遭到了一名苏联间谍的破坏。[15]他让该机构瘫痪了几年，试图找到这个双重间谍。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他在捕风捉影。间谍抓捕行动可能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疯狂，一种疑神疑鬼的状态。安格尔顿本人把这种反情报秘密行动简练地形容为“荒野镜影”。多年来，弗雷迪·斯卡帕蒂奇和他的爆头小组不断审问并杀害可疑告密者。在1980年到1994年之间，有不下40人因为被怀疑是叛徒而遭到共和军处决，他们的尸体被粗暴地丢弃。[16]在那些被杀的人中间，许多人确实以某种方式在跟当局合作，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17]共和军后来承认，爆头小组的部分受害者从未当过线人。而且，尽管共和军在边境的乡村小路上丢弃了那么多尸体，但他们似乎一直无法将问题根除。武器库仍然不断被发现，任务不断遭到挫败。不论斯卡帕蒂奇和他的同僚杀害多少人，似乎永远至少还有一个叛徒潜伏在共和军的队伍里。

布伦丹·休斯出狱的时候，一个叫乔·芬顿的共和军同伙给他提供了一套公寓。[18]芬顿在福尔斯路做房地产经纪人，同时他也在秘密为英国人工作。[19]他把实际上装有窃听器的房子当作“安全屋”提供给共和军。芬顿常常告诉他的共和军朋友，他认识一些能弄到也许是偷来的全新彩色电视机的人。这些电视机也装有窃听设备。[20]最终，芬顿的背叛之举被发现。他在斯卡帕蒂奇的审问下坦白了自己的行为。在被处决之前，他挣脱束缚准备逃跑，但爆头小组从背后朝他开枪，接着又枪击了他的脸部，最后把他扔在了贝尔法斯特市郊的一条巷子里。[21]

休斯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22]“我感觉这里有些深不可测、不可告人的东西，”他告诉麦克斯，“我不信任贝尔法斯特。”[23]间谍似乎无处不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格里·亚当斯，但亚当斯让他不要担心，说他想多了。休斯的担心是对的。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的怀疑或许是空穴来风，但共和军的确遭到了双重间谍的严重渗透。在后来提交给都柏林法庭的一份呈阅件中，效力于英国军方情报部门的一名上线估计，截至北爱尔兰问题末期，共和军每四个成员中就有一人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局工作。他表示，在共和军的最高领导层，这个数字可能接近二分之一。当然，这种消息也可能是编造的，是为了削弱共和军领导层的信心而打出的间谍牌。对于这种来自英方的统计数据，亚当斯和其他新芬党官员都会否认其可靠性。

然而，卡斯尔雷盗窃案刚刚过去一年，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几家报纸便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24]“赌注刀”并不是某个人头脑发热的臆想，而是一个真实的间谍。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英国军方情报部门的有偿线人。由于他提供的情报极为珍贵，英国大臣会定期听取情报的简报，他也成就了一代间谍头目的事业。“赌注刀”是“我们最重要的秘密”，北爱尔兰的一名英国军队指挥官称。他是“一枚金蛋”。[25]“赌注刀”不是格里·亚当斯，而是弗雷迪·斯卡帕蒂奇。[26]

“这些是子虚乌有的指控。”[27]斯卡帕蒂奇说。被媒体曝光后，他出现在了贝尔法斯特的律师办公室里。斯卡帕蒂奇身材矮小，有双下巴，双眼浮肿，对于一个惹下杀身之祸的人而言，他表现得异常镇定。不过，斯卡帕蒂奇略微知道，被人指控为间谍时该怎么做。绝对不要认罪，特雷弗·坎贝尔常常告诉他的线人。一旦认罪，你必死无疑。在遭到爆头之前，斯卡帕蒂奇从贝尔法斯特消失，躲了起来。想必他得到了上线的帮助。自从最初于1978年向当局提供情报服务开始，他充当了25年的双重间谍。[28]事实上，据传言说，是斯卡帕蒂奇主动投靠了当局。[29]有人提出，他当年的动机是为了报复，因为他不久前遭到了其他共和军成员的殴打。然而，究竟是什么驱使他成为北爱尔兰问题最重要的双重间谍，这个谜团也许永远无法解开。

对共和军而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矛盾：该组织托付铲除内奸的人竟然本身就是内奸。对英国人来说，在共和军内部安全部门的核心安置一名线人，则是出奇制胜的妙招。为了阻止间谍的渗透，临时共和军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组为蜂窝式结构，其中每个操作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活

动（甚至存在）所知有限。但作为全军的内部事务单位，似乎永远肩负紧急任务的爆头小组却了解所有信息：军队成员、武器供应、袭击计划。正如一名前临时共和军成员所说，安全部门如同整个组织的接线盒，在北爱尔兰问题的大部分时期，英国人竟然在里面安置了一个线人。[30]如果说共和军进入卡斯尔雷行窃是为了揭开“赌注刀”的身份，那么他们失败了。大概是因为斯卡帕蒂奇的名字太过敏感，它并没有被保存在那些文件里。事实上，斯卡帕蒂奇被媒体揭露后，共和党圈内受到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新芬党领导人怀疑斯卡帕是否真的是“赌注刀”。[31]他们提醒人们，要对这些“未经证实的指控”持怀疑态度。

“我还是不敢相信。”[32]斯卡帕被曝光后，新芬党官员丹尼斯·唐纳森对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说。唐纳森是格里·亚当斯最信任的党政官员之一。“我的天哪！”他摇头感叹道。

然而，唐纳森自己也是间谍。[33]2005年12月，亚当斯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唐纳森承认，过去20年他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有偿线人。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将近八年后，部分军事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拒绝接受“英国在爱尔兰的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似乎是为了对将来可能背叛共和党运动的人发出警告，亚当斯指出，那些成为英国特务的人“在遭到威胁、恐吓、强迫、收买、打击、利用、虐待之后，就被扔到了一边”。[34]

唐纳森躲了起来，他住在多尼戈尔一间建于19世纪大饥荒之前的与世隔绝的小屋里。这个地方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仿佛进入了爱尔兰昔日悲惨的农业时代。[35]不过，一个象征好运的马蹄铁挂在门的上方。[36]唐纳森留起了代表悔罪的络腮胡子，劈柴给屋子生火取暖。[37]后来有一天，有人来到小屋里杀害了他。[38]（唐纳森究竟死于谁的枪口之下，以及是谁下达的枪决命令，这些疑点一直未能查明。[39]格里·亚当斯和临时共和军都否认跟此事有任何关联。）

如此身居高位的线人怎么可能潜伏这么久而不被发现？在斯卡帕蒂奇的案例中，有一个明显的解释：他是杀手。在这场肮脏的未宣之战中，任何共和军成员对于政府采用卑劣战术的意愿不抱丝毫幻想。但即便如此，至少从理论而言，像斯卡帕这样显而易见的残暴之举，似乎能打消人们对其特务身份的怀疑。“共和军有一种先入之见。[40]他们认为，如果你不干净——也就是说，如果你杀过人——你就不可能是间谍。”英国军情局上线伊恩·赫斯特曾经表示。对斯卡帕蒂奇来说，他补充道，最好的保护也许就是“继续杀人”。

如果一个间谍是杀人犯，而他的上线知道他在杀人，难道这没有让他的上线——依此类推，以及政府本身——成为共犯吗？英国军方后来发布消息称，斯卡帕蒂奇的行动挽救了180条人命。但他们承认，这是一个“猜估”的数据。[41]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快会转变为一种用目的衡量手段的推测性计算。最终，斯卡帕蒂奇被证实牵涉多达50桩命案。[42]如果一名间谍夺取了50条人命，但挽救了更多人，这是否能为他的行为正

名？这种逻辑很诱人，但也很危险。你开始在脑海中对比数字，然而很快你就站在了允许大规模谋杀的立场。

多年来，每当临时共和军宣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或军方勾结了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的时候，这些言论都会被驳斥为不实的宣传。毕竟，英国政府几十年来小心翼翼塑造的，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中立调解人的形象。他们介入谁都不愿插手的斗争中，解决两个战斗部族之间的矛盾。然而事实上，当局从最开始便将临时共和军视为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的主要敌人，而把保皇派恐怖团伙看作次要对手——如果称不上非官方政府附属机构的话。

早在1975年，一名就职于贝尔法斯特的军官便向其上司写了一封信，提醒他注意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和英国情报部门以及特殊分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似乎形成了“某种伪团伙，试图挑起两派准军事组织互相残杀，以此来打一场消耗战”。[43]在次月的另一封信中，这名军官表示，北爱尔兰问题爆发性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英国情报人员“故意挑起矛盾”的行为。[44]

保皇派团伙的行动通常会得到英国政府的默许，或者在组织上获得英国政府的帮助。[45]他们在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中杀害了数百位平民，这些受害者都是英国国民。然而冲突导致了英国政府丧失人性的举动，甚至部分政府机构往往是这些谋杀的共犯，而安全部门并没有进行任何公开调查或者内部反抗。官僚和法学家们为了限制政府对合法使用权力的垄断而制定的所有金科玉律，那些意在防止命令变成暴行的界线，全部遭到了践踏。“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发挥军队的作用，”一名曾效力于MRF的前英国军官后来坦陈，“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扮演恐怖团伙的角色。”[46]

雷蒙德·怀特是特殊分队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负责监督对线人的管理。[47]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雷蒙德和撒切尔夫人会面，他明确提出了和准军事组织勾结的危险。“我现在坐在这里，而我手下的间谍和上线在外面活跃，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怀特告诉首相，“因为严格说来，我让他们做的事算得上犯罪行为。”怀特的职责是在准军事组织内部招募线人。但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会偷东西，会制造炸弹，会杀人。“加入准军事组织本身就是犯罪。”怀特说。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他希望得到一套明确的法律准则，详细说明线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认为继续在灰色地带行事会有危险。撒切尔夫人考虑了这个请求。然而，她最终并没有给他划出任何界线。在怀特看来，他得到的指示很清楚：“继续你的行动，但不要告诉我们细节。”[48]

“赌注刀”绝不是有偿双重间谍中唯一的杀人犯。布赖恩·纳尔逊是保皇派最高级别的英国线人之一。他曾是一名英国军官，后来成了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防卫协会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纳尔逊绑架一名残疾天主教平民并用赶牛的鞭子折磨对方，他因此入狱，之后纳尔逊成了武装调查小组（FRU）的线人。[49]FRU是继承MRF的一个隐秘军事情报机

构。（雇用斯卡帕蒂奇的就是FRU。）

作为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纳尔逊的日常职责是收集情报，尤其是搜集值得列入暗杀名单的共和党人的档案。丧命于纳尔逊之手的人绝不少于丧命于斯卡帕蒂奇之手的人。[50]最后，他也被证实涉及大约50桩命案。1984年，当格里·亚当斯遭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枪击受伤后，他表示当局肯定事先得到了袭击的消息。彼时，这一指控听起来不免荒唐——如果政府提前获悉议会议员将于午餐时间在繁忙的贝尔法斯特市中心遭到飞车枪击的暗杀阴谋，他们必定会阻止袭击的发生——但事实上，政府确实知道这个阴谋，因为纳尔逊已经向他的上线通风报信。[51]而政府决定袖手旁观。

1989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北贝尔法斯特一个繁荣的街区里，39岁的诉状律师帕特·菲纽肯正在家中和妻子杰拉尔丁与他们的三个孩子享用晚餐。[52]这时，几个枪手抡着长柄大锤闯入正门将菲纽肯杀害，他们朝他开了十几枪。他的妻子被一颗反弹的子弹击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作为一名律师，菲纽肯为许多共和党人提供过咨询，但他自己并不是共和军成员。尽管如此，当局认为他和共和军的关系太过密切。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抱怨，有些律师“实际上跟恐怖分子是一丘之貉”。[53]枪击案发生之前，是纳尔逊搜集了有关菲纽肯的情报，并提供给了执行小组。[54]袭击中所用的武器由另一个人提供，此人也是警方的线人。随后的调查并未断定“政府参与了整个谋杀帕特里克·菲纽肯的阴谋”，但其中确实提出，如果没有“政府因素的参与”，他不会被杀害。[55]（菲纽肯的家人坚信，其中必定有一个重大阴谋。[56]他们拒绝接受调查结果，认为它掩盖了事实真相，是一场“骗局”。）

在1987年的一次事件中，布赖恩·纳尔逊救了弗雷迪·斯卡帕蒂奇一命。一名保皇派高层交给了纳尔逊一份临时共和军成员的名单，上面都是潜在的暗杀目标。纳尔逊尽职地把名单交给了他的FRU上线，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弗雷迪·斯卡帕蒂奇。那时，“赌注刀”已经充当了十年的重要线人，并且随时准备在将来提供大量情报。作为一项投资，他仍然大有可为。因此，保皇派将他列入暗杀名单的事实，令他的英国上线恐慌不已。纳尔逊自己并不知道斯卡帕蒂奇也是线人。任何一个间谍对其他间谍都知之甚少。于是，FRU设计了一个方案，试图转移纳尔逊保皇派同伙的谋杀意图。[57]借用当时一名FRU成员的话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英军上线给布赖恩·纳尔逊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目标的姓名：弗朗西斯科·诺塔兰托尼奥。诺塔兰托尼奥是意大利人，住在贝尔法斯特。[58]和斯卡帕蒂奇一样，他以前是计程车司机。诺塔兰托尼奥66岁，领着养老金，膝下11个孩子，也已经有了孙辈。他所没有的，是共和军的身份。但纳尔逊的上线将他刻画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如同临时共和军的教父——一个跟斯卡帕蒂奇旗鼓相当的角色。一天早晨，诺塔兰托尼奥正在家里和相守了39年的妻子躺在床上。[59]就在这时，几名枪手爬上楼梯

将他枪毙在床。当他几天之后下葬时，成群结队的哀悼者加入了送殡的行列。其中一个人就是弗雷迪·斯卡帕蒂奇，他丝毫不知道，棺材里这个无辜的人是为了让他活下来而死的。[60]

“我当了将近30年的警察，从来没卷入过这么错综复杂的谎言和背叛中。”[61]英国高级警官约翰·史蒂文斯说。史蒂文斯被任命对FRU和保皇派军事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勾结行为进行调查，但他的努力一路受阻。1990年，史蒂文斯及其团队工作的办公室发生了火灾。[62]随后警方的调查断定，此次火灾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史蒂文斯仍然坚信，这是有人蓄意破坏——一场旨在销毁政府勾结的证据而进行的蓄意纵火。

2012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承认存在“骇人听闻的政府勾结行为”。[63]《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包含有关刑事司法的几项具体条款，其中一项条款规定，释放协议期间被关押的准军事组织囚犯。[64]在这一原则下，对于未来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罪行的任何审判不得超过两年刑期。但除此之外，和平协议中并未提及如何处理过去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机制表明，提供证词能够换取豁免权。而诸如斯卡帕蒂奇和纳尔逊牵涉的——同时得到政府协助和纵容的——谋杀案，也不会以战争罪遭到起诉。因为不论摆在面前的事实如何，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没有被承认是一场战争。这意味着，北爱尔兰问题许多尚未解决的谋杀案将继续作为公开的刑事案件，而涉案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和前士兵仍然可能遭到起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例外：依据1999年旨在协助寻找失踪者遗体而制定的法规，如果了解这些失踪案详情的人们主动向当局提供信息，他们将获得一定的赦免。[65]

2003年夏末的一个傍晚，也就是卡斯尔雷盗窃案的18个月后，一个名叫约翰·加兰的人走在爱尔兰共和国卡灵福德附近的雪灵山海滩上。加兰刚刚带着两个子女去附近的公墓给母亲扫墓。潮水正在退去，孩子们想抓螃蟹。当他们在潮湿的岸边嬉戏雀跃时，加兰的目光落在了一样东西上，他看见沙地里伸出了一块布料。加兰走过去，用捡起的浮木试图把布料从沙里拽出来，但它没有动。[66]好奇的加兰使出更大的力气，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当布料被扯出沙地时，他看见了人的骨头。

“这些是一个成年人脱节的遗骸，”随后的病理学家报告得出结论，“这些骨头上没有附着的软组织，而且非常易碎。骨头上有植物生长的痕迹。”这是一具女性的尸骨。在清点肋骨并列出其他完整的骨头后，该报告指出：“受害者的后脑勺有一处足以令她致命的枪伤。”[67]一颗扁平的铅弹在离头骨不远的地方被发现。[68]

1999年夏天那场漫长的守候已经过去四年，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再次聚集在这片海滩上，他们离上次搜寻时被全面挖掘的区域只有数百米远。[69]最近的几场暴风雨严重侵蚀了这片地区。因此，在几十年的隐藏之后，这个坟墓逐渐在风雨的冲刷下暴露出来。这具骨架剩余的股骨被送去跟阿奇和阿格尼丝·麦康维尔的DNA样本进行基因比对。[70]但与此同时，还有那块布料，以及几件在无名之墓中将尸骨包裹了几十年的

缠结的衣物。在附近的停尸房，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被领进房间，让他们查看摆在桌子上的衣物：连裤袜、内衣、残存的裙子、粉色羊毛上衣、一只鞋的鞋底。[71]阿奇最先进去，但他不忍心看。

相反，他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安全别针？"[72]

一名警官检查了衣物后说没有，接着他翻开布料的一角，看到了那个别针。琼·麦康维尔失踪31年后，她的遗骸终于被找到。"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阿奇在随后的死因调查中表示，"失去她以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变成了地狱。"[73]

那年11月，琼被重新安葬。她的灵柩上装饰着一簇花，她的孩子们护送灵柩穿过西贝尔法斯特的街区，在经过帝维斯公寓高楼时沉默地停顿了一会儿。布伦丹·休斯还住在那里。在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力克·里德神父出席了葬礼。[74]然而，有些陪伴灵柩的人感觉，那天的西贝尔法斯特出奇地安静，仿佛当地人被告知不要靠近，仿佛他们又一次在回避麦康维尔一家。[75]



琼·麦康维尔的灵柩经过帝维斯公寓高楼

当其他失踪者的遗体被发现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寻回尸骨，并将他们安葬在神圣之地。[76]但是，麦康维尔案件的验尸官裁定，琼的尸体不属于管理失踪案的有限赦免协议范围之内，因为她不是在共和军的帮助下被找到的，而是一个平民在海滩散步时被偶然发现的。这包含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暗示，验尸官宣布："这起刑事案件尚待结案。"[77]

二十五　最后一把枪

里德神父在留意那个枪手。他同意见证共和军解除武装的过程，循道宗牧师哈罗德·古德也在现场。整个流程按部就班进行，共和军用来让武器“失去功效”的准确技术被严格保密，但据说其中包括用混凝土封藏武器的步骤。[1]现在是2005年，两名神职人员前来对最后一批武器的销毁进行监督。当他们关注整个过程的时候，附近一名手持AK-47冲锋枪的临时共和军官员分散了里德的注意。“我们走到哪儿，这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跟到哪儿，我看得出来它已经上了膛。”里德后来说。他推断，临时共和军之所以亮出这把枪，不是因为怕神职人员图谋不轨，而是他们需要提防持不同政见的准军事组织发动伏击，后者可能因为并不准备放弃斗争而试图收回武器。[2]

不过，销毁的过程波澜不惊。[3]当突击步枪、喷火器、迫击炮和肩扛式导弹被哐当作响地混合处理之后，剩下的唯一武器就是那名枪手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里德神父看着那个人郑重地交出了枪，并发现他情绪变得激动起来。里德心想，那个人似乎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把枪”了。[4]

当共和军解除武装的时候，布伦丹·休斯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他在弟弟特里的陪同下飞往了古巴。[5]这两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参观了圣克拉拉的切·格瓦拉纪念馆，并去陵墓表达了他们的敬意。他们遇到了一些参加过古巴革命的老兵，并和他们建立了情谊。他们在切·格瓦拉曾经战斗的地方拍照留念，布伦丹感到欣喜不已。

回到贝尔法斯特后，休斯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经受的一系列疾病可以追溯到25年前的绝食抗议。[6]2008年的一天，他陷入了昏迷。他的家人在医院守在他身边，D连的老兵也开始出现。他们知道他们的前指挥官将不久于世，所以前来表达敬意。一天晚上，格里·亚当斯悄悄来到医院。这让布伦丹的兄弟姐妹感到不安，他们知道，如果休斯醒着，他很可能不会欢迎亚当斯。休斯已经开始告诉人们：“曾经，我愿意为格里·亚当斯挡枪。现在，我会亲手给他一枪。”但是，休斯的家人选择不干涉。[7]亚当斯独自走进了医院病房，沉默地坐在休斯的床前。休斯于次日去世，享年59岁。

休斯的葬礼在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隆重举行。杜洛尔丝·普赖斯出席了葬礼，还有麦克斯和他的妻子卡丽。普赖斯在某个时刻探头望去，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人群。那是亚当斯。对这位新芬党领袖而言，现身葬礼是一件尴尬的事。[8]亚当斯如今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欢迎。他是政府部长，是和平使者。人们为了跟他握手而排起长队，甚至碰一下他的衣袖也是好的。但这里不一样。周围的男人和女人都曾服从过他的命令，葬礼的主人曾是他最亲近的朋友，然而亚当斯却是这里的局外人。布伦丹的弟弟特里·休斯认为，亚当斯现身是迫不得已。布伦丹是共和党

人的偶像。在共和军精于算计的标志性权术下，每一场葬礼都是表现的舞台，亚当斯能在休斯活着时跟他撇清关系，但却不能在他死后这么做。[9]

普赖斯看着亚当斯，心里意外地升起了一阵同情。他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不安，她心想。他看起来很孤独，但非常坚决。[10]亚当斯钻进送殡行列，艰难地穿过人群，挤进了肩扛灵柩的队伍。[11]“我们去是为了哀悼，不是为了拍照。”[12]普赖斯后来抱怨。然而，指责亚当斯一心痴迷于政治已经为时已晚。葬礼过后，亚当斯告诉新芬党《共和国报》，尽管休斯“不认同最近几年的发展方向”，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是我的朋友。”[13]亚当斯表示，最后他用盖尔语说了一句格言，翻译过来的大意是，“他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亚当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观点不久就会变成铁一般的事实。

休斯去世的时候，“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存在依然是被严格保守的秘密。但已经有迹象表明，新芬党开始失去对北爱尔兰问题时期共和军历史叙述的绝对控制。当里奇·奥拉韦和麦克斯做口述历史时，他等到最后一次采访才吐露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亚当斯领导层回绝了英国政府的提议，而这个提议可能结束1981年的绝食抗议，避免最后六名绝食者的死亡。然而，奥拉韦感到倾吐心声的体验如此令人振奋，以至于结束采访后，他立刻决定不等到自己死后再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14]奥拉韦性格开朗，长着一张大圆脸，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他仍然比较年轻，身体也很健康，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此外，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故事只讲给波士顿学院未来的学生听。他希望告诉全世界。

奥拉韦想做的是写一本书。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奇怪，而且有潜在的危险。当“贝尔法斯特项目”的负责人埃德·莫洛尼听说了奥拉韦的计划后，他试图劝告他。奥拉韦打算公开的指控——格里·亚当斯为了提升新芬党的竞选前景而有意牺牲了六位绝食者的性命——太具爆炸性。“一旦公开这件事，你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15]莫洛尼说。

但奥拉韦不为所动。“如果这件事没公开我就死了，那这些老家伙就会逃脱责任。”[16]他说。2005年，他出版了这本名为《毛毯人》的书。书中把亚当斯描写成了一个头脑冷静、远见卓识的人，但也将他刻画成了一个狡猾的投机取巧者。“不论历史选择如何评价亚当斯”在绝食抗议中扮演的角色，奥拉韦写道，“如果没有他和那些绝食抗议者，就不会有爱尔兰今天表面的和平”。[17]

这种细微之处并不能安抚某些人，他们认为《毛毯人》的出版被当成了武器，是专门用来针对格里·亚当斯的一段个人历史。这位新芬党主席没有直接回应奥拉韦，而是表现得无动于衷。但是，用奥拉韦的话来说，他“放出了自己的看门狗”：一群亚当斯的代理人和盟友在媒体上围攻这本书。曾和奥拉韦在绝食抗议期间密切合作的比克·麦克法兰嘲讽此书“完全弄虚作假”，并声称英国人没有提出过任何协议，所以亚当斯不可能发送消息命令囚犯们不予接受。[18]（几年之后，麦克法兰更改口

径，承认英方确实提出过秘密协议。[19]但他强调，是抗议者自己认为协议不能接受并选择继续绝食，而不是领导层做出的决定。）

如果说对《毛毯人》的抨击意在让奥拉韦闭嘴，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他从不错过任何在公众场合跟任何对他的故事细节提出质疑的人进行辩论的机会，而且他决定现在要就那场绝食抗议和其后果再写一本书。[20]他还发现，愿意讲述跟共和党的正统说法相悖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支持者。杜洛尔丝·普赖斯在评论《毛毯人》时称赞了奥拉韦，感谢他揭开了“这个谜团极其重要的部分”。[21]

布伦丹·休斯也对《毛毯人》推崇备至，并且在他死前为这本书作了辩护。“我曾经是一名囚犯。奥拉韦多次跟我谈论过他所担心的事，而他最终将这些事写进了书里。”[22]休斯在给《爱尔兰新闻报》的信中写道。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休斯偶尔会和奥拉韦聚首，交流他们在监狱的回忆。“黑鬼，你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奥拉韦会告诉他。

“别担心，”休斯说，“我有录音。”[23]

2009年的一天，杜洛尔丝·普赖斯被捕，并被指控试图从塞恩斯伯里超市偷窃一瓶伏特加。普赖斯坚称自己并未打算偷酒。超市有配备电子扫描仪的自动收银台，她只是没弄清它的使用原理。普赖斯进一步表示，她的“品性和教养都不会让我做出买东西不付钱的事”。[24]她随后被免除入店行窃罪。但事实上，普赖斯陷入酒精及药物成瘾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正在经受创伤后应激障碍。[25]2001年，她因偷窃药品处方被捕，并被判盗窃罪。[26]几年后，她去马加伯里监狱探望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囚犯时被赶了出来。[27]监狱官员说她喝醉了酒，但她否认了这一点。朋友们为她感到担忧。普赖斯仍然每周和她的德里老友埃蒙·麦卡恩联系一次。她常常想谈过去的事，但麦卡恩会努力把她引向其他话题。“别说了，”他会说，“我不想知道。”[28]和里奇·奥拉韦一样，普赖斯想写一本书，记录她在共和军的岁月。但麦卡恩告诫她不要这么做。“写你童年的经历，”他说，“不要写共和军的事。”

直言不讳仍然会招致激烈的非难。2009年，另一位共和军老兵格里·布拉德利写了一本回忆录。和普赖斯一样，布拉德利鄙视新芬党成员。他认为，许多新芬党人“对共和军的成就坐享其成”。[29]布赖恩·菲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北爱尔兰问题的学者，他和布拉德利合著了这本书。布拉德利对他说：“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不是线人。”[30]然而，这本书出版后，布拉德利所在的北贝尔法斯特街区立刻被涂鸦标记，指明他是叛徒。“我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他抗议道，强调他只想“将在共和军的真实经历记录下来”。[31]最后，布拉德利被迫逃离贝尔法斯特，流亡都柏林。[32]在背井离乡、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有一天，他开车来到贝尔法斯特海湾一座诺曼式城堡附近的停车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3]

“只有他们有写书的权利吗？”里奇·奥拉韦在布拉德利死后愤慨地发问，“难道历史永远无法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吗？”[34]

巧合的是，布伦丹·休斯去世之前已经有所安排。他让麦克斯和埃德·莫洛尼向他承诺，他的回忆将以书的形式发表。时机成熟以后，莫洛尼主动执笔撰书。戴维·欧文是保皇派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成员，他参加了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并同样于最近去世。莫洛尼利用休斯和欧文的录音文稿完成了写作，这本《来自坟墓的声音》于2010年出版。[35]在前言中，波士顿学院的鲍勃·奥尼尔和汤姆·哈奇对这本书的描述是，“取自波士顿学院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口述历史档案的一系列计划出版物中的第一卷”。

档案的秘密正式公开。[36]这本书将点名引用休斯的话，其中不仅断言格里·亚当斯曾是共和军指挥官，而且描述亚当斯亲自下达了杀人的命令。如今，休斯亲口表示，是亚当斯派他去美国购买阿玛莱特步枪，是亚当斯派杜洛尔丝·普赖斯去轰炸伦敦，是亚当斯下令杀害琼·麦康维尔。费伯出版社预言，《来自坟墓的声音》将“使某些否定历史的言行无法在公众视线里继续存在”。[37]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立刻遭到了强烈的抨击。“我很了解布伦丹·休斯，”亚当斯在被问到这本书时说，“他的状态不好，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他在接受这些采访期间。布伦丹还反对共和军停战以及和平进程。”[38]亚当斯即将入选爱尔兰共和国下议院，即该国的立法机关。他“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有关他涉及琼·麦康维尔失踪案的任何说法，“或者埃德·莫洛尼提出的任何其他指控”。新芬党在一份总括性声明中称，任何参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人都“居心叵测”。[39]

人们的视线很快转移到了安东尼·麦金太尔身上，书中表明是他对休斯进行了采访。麦克斯早已跟亚当斯身边的人闹翻，但他现在开始遭到威胁。一天晚上，有人将粪便涂在了附近一个邻居的房子上——显然弄错了地址——这种恶意的拙劣之举是共和军标志性的特点。[40]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和党人表示，麦克斯将“步埃蒙·科林斯的后尘”。科林斯是纽里人，在出版了自己的共和军生涯回忆录后，不久便于1999年被刺身亡。

但是，《来自坟墓的声音》收获了强烈的反馈，而且埃德·莫洛尼进行了巡回宣传。他计划在爱尔兰电视台推出一部包含休斯口述历史录音的纪录片。然而，2010年的一个夏日，亚当斯多年的好友兼盟友丹尼·莫里森联系了波士顿学院，要求查看休斯的录音带。

北爱尔兰问题期间，莫里森一直是共和军的首席宣传员，“一手拿枪、一手投票”的竞选口号就是出自他之手。如果休斯进行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的前提，是这些内容只能等他死后再公开，而休斯现在已经去世，那么除了埃德·莫洛尼的书以外，莫里森想必也能获取录音原件？当学院将这个要求转告莫洛尼和麦克斯时，他们变得恐慌起来。[41]无论如何不能准许莫里森拿到磁带，莫洛尼说。“莫里森在共和军的间谍搜捕队伍里扮演了关键角色，”麦克斯在邮件中告诉波士顿学院的汤姆·哈

奇，“丹尼·莫里森对这些录音带没有任何学术兴趣。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调查作家，而是一个宣传员。”[42]

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构想“贝尔法斯特项目”也许只是几位策划者最初的心血来潮，但他们谁也没想过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事实上，他们对这个项目最初的设想有一些十分重要却模棱两可的地方。举例而言，和安东尼·麦金太尔角色相当的威尔逊·麦克阿瑟完成了保皇派群体的所有采访。他在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一直以为，除非所有参与者都离开人世，否则任何采访内容都不得公之于众。当他听说莫洛尼打算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时，他感到猝不及防，当时距最后一批采访结束只过去了几年时间。[43]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等到几十年后最后一批参与者去世再揭示档案的存在，而是第一批参与者刚刚离世就公开了这个秘密。

几位策划者也从未决定到底谁能查阅这些采访。一直以来，他们都说要提供给“波士顿学院未来的学生”。但是，在莫洛尼的书问世之前，该学院的历史系根本不知道有“贝尔法斯特项目”一事。实际上，这个档案是如此保密，以至于除了哈奇和奥尼尔之外，波士顿学院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一位历史教授听说了这个项目后，让自己督导的一位研究生去伯恩斯图书馆为她的论文查阅休斯和欧文的采访。[44]但是，埃德·莫洛尼在获悉这个安排后提出反对。“我强烈建议你现在封锁这些档案，禁止任何进一步的查阅。”[45]莫洛尼对哈奇写道。他提议制定一份严格的协议，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查阅这些采访，但申请人的名单应该交给莫洛尼“审查”。[46]

哈奇在写给麦克斯的邮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指出，如果最开始的认知是这个项目将“长期封存”，那么波士顿学院恐怕不会予以支持。“你们甚至没有暗示我们，这件事可能会有任何后果。”他抱怨道。你们不可能指望学校“对除了埃德·莫洛尼以外的整个学术界和/或新闻界”封锁档案。[47]

从一开始，这两个爱尔兰人和两个美国人——莫洛尼、麦金太尔、哈奇和奥尼尔——将“贝尔法斯特项目”掩盖得密不透风，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高度敏感且暗藏危险的项目。出于操作安全的考虑，他们将了解这个项目的人员范围保持得极度狭小。并且，直到莫洛尼的书问世之前，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了这种守口如瓶的意识。但是，这种极度狭小的人员范围可能导致他们将一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妨碍了他们提出重要的问题：如果整个计划开始瓦解，而他们最恐惧、最糟糕的担心成了现实，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2010年2月，就在《来自坟墓的声音》出版之前，格里·亚当斯接受了《爱尔兰新闻报》的长篇采访。其中他被问及共和军的“疯狂修士”乔·林斯基，后者是北爱尔兰问题中第一个被失踪的人。林斯基派人袭击了他的情敌，因而导致裂杯子酒吧的枪击案，最后遭到了军法审判。1999年，共和军承认他们造成了一群人的失踪，并公布了受害者名单，包括

两名线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以及琼·麦康维尔，但林斯基不在名单之列。[48]事实上，是埃德·莫洛尼最先向林斯基的家人告知了这个消息。在出版《来自坟墓的声音》的故事之前，莫洛尼告诉他们，乔的失踪是共和军干的。当《爱尔兰新闻报》的采访人向亚当斯问及林斯基时，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是我的邻居。"被问到他和林斯基是不是朋友时，亚当斯说："哦，是的。我认识他，他失踪了。"[49]他还说，他鼓励任何了解林斯基失踪案的人现在站出来。

杜洛尔丝·普赖斯在都柏林郊外的家中看到了这篇采访，她感到怒不可遏。[50]虽然已经和亚当斯断交多年，但她通过《毛毯》杂志的文章跟他保持着某种对话。"我认识你很久了。"她在一篇专栏中提醒他。是那个"多管闲事的牧师"让亚当斯偏离了共和党事业吗？她心想，矛头对准的可能是亚力克·里德神父。还是因为"美国人的阿谀奉承"？[51]这些让你"忘乎所以"了吗？她问他："你的自负是不是开始膨胀？到最后，你是不是看到了功成名就的机会？"她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个人和政治层面的背叛。"你肯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这么做的，对不对？"她问，"我真的很好奇。"

亚当斯从未回应这些挑衅，一再被拒绝的普赖斯有时会变得危险。"我期待能自由地说出我的经历，"她在2005年写道，并表示，"这是我仅剩的自由了。"[52]

最近，普赖斯开始在想找人说话的时候打电话给记者。她会坐在家里，有时手里拿着一杯酒，陷入对过去悲哀的沉思中。这不仅是因为她感到孤独，而且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她被一股纠偏匡正的挑衅的冲动所占据。她要作证。"杜洛尔丝，你他妈这是在干什么？"埃蒙·麦卡恩会表示反对，并指出打电话给记者谈论她的过去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但在麦卡恩看来，普赖斯似乎充满了她难以控制的"盛怒"。[53]2010年2月，当她看到亚当斯关于林斯基的采访后，她拿起了电话。[54]

第二天上午，一位名叫艾莉森·莫里斯的贝尔法斯特记者到《爱尔兰新闻报》上班，发现有一堆电话留言在等着她。[55]普赖斯似乎整晚都在给夜班编辑部打电话。巧合的是，莫里斯和普赖斯一样，也在安德森斯顿长大。她是一位金发记者，富有进取心，说话直截了当，拥有准确无误的共和党消息来源。她去都柏林和等待她的普赖斯见了面。莫里斯采访过不少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她熟悉相关的危险：这些男人和女人因为精神创伤而变得反常，往往依靠酒精和处方药艰难度日。她曾在布伦丹·休斯去世之前对他进行多次采访，有时，她因为他喝醉了而不得不中断采访。但是，当普赖斯开门迎接莫里斯和摄影师时，她看起来头脑清醒，思维连贯。她有一头染成铂金色的短发，身上穿着一件羊毛衫，脖子上戴着一条红色围巾。莫里斯被她的优雅和美丽所打动。[56]她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普赖斯像个戏剧家，像个波希米亚人。[57]

普赖斯想谈论那些失踪的人。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亚当斯谈到她的老朋友乔·林斯基失踪一事时满嘴胡言的态度。仿佛乔的失踪是上帝

的旨意，而不是亚当斯下令实施的暴行。林斯基是“一个绅士”，普赖斯告诉莫里斯。[58]她本不该让他走上死亡之路，她应该帮他逃出境外。“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悲痛不已，”她说，“我不该就那样由他去送死。”

“你知道这样说会让你跟这个案子扯上关系吧？”莫里斯说。

“我不在乎了，”普赖斯说，“那个人是个骗子。”[59]

两个女人交谈了一段时间后，莫里森抬起头吓了一跳，她看见一个男孩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他面容白皙，一头黑发乱蓬蓬的。莫里斯心想，他和斯蒂芬·雷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是杜洛尔丝的儿子丹尼，他手里拿着电话。“我的小姨玛丽安想让你接电话。”[60]他对莫里斯说。

莫里斯接过电话后，玛丽安·普赖斯表示对她的采访感到十分愤怒。她解释说，杜洛尔丝一直在圣帕特里克接受治疗，那是都柏林的一家精神卫生机构。“她的状况不好，”玛丽安说，“她不应该接受采访。”[61]

“你姐姐是成年人。”[62]莫里斯抗议道。但玛丽安很坚持。

离开普赖斯的住所后，莫里斯找到上司商议，试图挽救这次采访。最后她想出的解决方案，是写一篇关于这个故事不痛不痒的版本，说杜洛尔丝·普赖斯打算向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坦白——因为从理论而言，任何向该委员会提供信息的人都将获得起诉豁免权。这篇文章在几天之后发表，标题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对共和军失踪者的创痛”。文中表示，关于乔·林斯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的失踪案，普赖斯有“至关重要的信息”提供[63]，但并没有展开详细叙述。莫里斯还指出，普赖斯知道“十个孩子的母亲琼·麦康维尔最后的日子”。[64]在文章发表之前，莫里斯打电话给普赖斯，问她是否联系了独立委员会。[65]普赖斯撒谎说是的。[66]

莫里斯的文章发表三天后，贝尔法斯特小报《周日生活报》也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题为“格里·亚当斯和失踪者”的报道正好道出了莫里斯的文章所遗漏的详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归功于“嫁给电影明星的恐怖分子”杜洛尔丝·普赖斯。据《周日生活报》所言，普赖斯直接告发了亚当斯，说他“在受害者的失踪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7]当普赖斯在林斯基死前去接他的时候，她是“遵照格里·亚当斯的命令”这么做的。普赖斯表示，她还开车送琼·麦康维尔穿过边境奔赴刑场。有些共和军成员“想把琼的尸体扔在艾伯特街正中央”。但是，普赖斯强调，格里·亚当斯“反对这么做”，他说这种做法会损害临时共和军的形象。

这些指控具体到令人震惊，而且跟布伦丹·休斯的叙述相当吻合。但《周日生活报》的文章有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文章作者塞伦·巴尔内斯本人似乎并未跟杜洛尔丝·普赖斯有过交谈。相反，他援引了普赖斯的“录音供词”，并表示“《周日生活报》听过这些录音”。然而这些是什么供词呢？塞伦在报道的其他地方指出，普赖斯“在录音的情况下向波士

顿大学的学者供认了自己在绑架案中扮演的角色”。[68]除了名字的差错——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和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是两所不同的机构——这里的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塞伦·巴尔内斯，贝尔法斯特一家小报的记者，似乎通过某种方式听过波士顿学院的杜洛尔丝·普赖斯录音，而且是在她尚在人世的情况下做到的。

当埃德·莫洛尼获悉《周日生活报》的报道时，他惊慌起来。这篇文章明确表示，巴尔内斯获取过波士顿学院的档案。但莫洛尼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些录音一直锁在伯恩斯图书馆的珍藏室里。更重要的是，莫洛尼能指出巴尔内斯并未获取这些录音的另一个理由：在接受麦克斯采访时，杜洛尔丝·普赖斯从未提到过琼·麦康维尔——因为麦克斯告诫她不要这样做。“杜洛尔丝一次也没有提及‘琼·麦康维尔’的名字。”莫洛尼在后来的宣誓书中写道。

如果巴尔内斯没有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那么他所指的是什么供词呢？当莫洛尼和麦克斯试图弄清事情的真相时，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艾莉森·莫里斯和塞伦·巴尔内斯是朋友，而且过去是在《安德森斯顿新闻报》一起工作的同事。莫洛尼和麦克斯知道《爱尔兰新闻报》的那篇采访因为玛丽安·普赖斯的阻止而流产。他们推断，在发表那篇关于普赖斯的残缺不全的报道后，莫里斯肯定把采访录音分享给了她的朋友巴尔内斯。[69]巴尔内斯在文章中写道，他听过一份“录音供词”，还说杜洛尔丝·普赖斯为“贝尔法斯特项目”贡献了“录音供词”。文中暗示录音供词只有一份，但实际上有两份。

艾莉森·莫里斯否认和巴尔内斯分享了她的采访。巴尔内斯只是说，如果他谈论消息来源就是“玩忽职守”。与此同时，格里·亚当斯愤怒地反驳了普赖斯的声明，说她“长期以来反对新芬党与和平进程”。[70]亚当斯指出，普赖斯正在经历“精神创伤”，并补充道：“她显然有一些必须自己想办法释怀的事。”[71]这些指责跟亚当斯针对休斯做出的评判如出一辙，他形容休斯有“他的问题和他的困境”。[72]

假如亚当斯确实曾是普赖斯和休斯的指挥官，那么他的说法可谓极其冷酷无情：普赖斯和休斯都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亚当斯曾命令他们执行残忍的任务，结果却跟他们断绝关系，声称道德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因为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当两人终于和盘托出时，亚当斯却坚称他们在说谎——而且，为了质疑两人的话，他指出他们显然正在承受的精神创伤。亚当斯本人似乎明显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困扰。北爱尔兰问题的经历令其他许多人备受煎熬，但他看上去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布伦丹说了他说的话，”他告诉一位采访者，“现在布伦丹已经死了，那就到此为止吧。”[73]

二十六　神秘无线电

埃德·莫洛尼关于布伦丹·休斯的书几乎和报道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新闻同时披露了有关琼的信息，这令麦康维尔一家人感到痛心。休斯和普赖斯都坚持认为琼是告密者，并且休斯详细描述了她被发现拥有一台无线电的经过。这个新的信息似乎再次揭开了麦康维尔一家人认为已经盖棺定论的事。2006年，北爱尔兰警方巡查员努阿拉·奥罗恩就琼·麦康维尔之死发表了一篇报告。[1]奥罗恩发现，当局从未对这起绑架案进行任何像样的调查。但她找到了一些情报档案，这些档案出自有传言称“麦康维尔因为线人的身份被临时共和军绑架”的时期。[2]不过，当奥罗恩查找军方和警方的旧档案时，她找不到麦康维尔失踪前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可能是帝维斯公寓的特务。[3]奥罗恩在报告中指出，英国有一个政策，他们既不会确认也不会否认任何特定个体是否充当过政府的秘密间谍。尽管如此，她写道，这个情况比较独特。“这家人由于母亲被指控为线人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她指出，而且因为琼早已离世，她现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没有记录表明她曾在任何时候当过线人，”奥罗恩写道，最后她更加有力地断定，“她是一个被绑架并被谋杀的无辜女人。”

这番有力的声明感觉是在维护琼的孩子们。几十年来，他们坚称母亲是因为帮助一名受伤的英国士兵而遭到了不公正的毁谤。“我很高兴母亲洗脱了冤屈，”迈克尔·麦康维尔在这篇报告发表后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知道，那是谎言。”[4]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将奥罗恩的报告作为最终定论。即使在她的调查被公布之后，临时共和军在一份新的声明中依然坚持最初的立场。他们表示，共和军就麦康维尔谋杀案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且确认她“是英军的线人”。声明中指名道姓地提及了迈克尔·麦康维尔，并承认他可能会对临时共和军的陈述提出异议，然后尖刻地补充道：“共和军同意他拒绝这一结论。”[5]

同样，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依然认为麦康维尔是线人。他们对休斯的口述历史深信不疑。在莫洛尼看来，努阿拉·奥罗恩对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抱有明显的同情，受此影响，她直接选择得出最能安抚他们的明确结论。作为一名铁面无私的记者，莫洛尼有着更为冷静客观、毫不留情的态度。他认为，奥罗恩找不到表明麦康维尔是间谍的事实难以让这件事定案。奥罗恩查阅了哪些英国军方记录的秘密档案？她拒绝详细说明。[6]也许还有她没发现的记录呢？她真的一点遗漏也没有吗？麦克斯认为，军方或警方可能故意掩盖了琼的参与。倘若她的确是叛徒，并且得到了共和军的警告，那么在很可能让她送命的情况下再给她一台无线电让她回去工作，将会使当局陷入不义之地。[7]

同时，围绕无线电本身还有一个疑点。[8]包括特雷弗·坎贝尔在内的

部分前警官坚持表示，军方和警方那个时候都没有用手持无线电交流，遑论用这种方式跟线人联系。然而，莫洛尼和一名曾在英国军队服役的调查员携手合作，在翻遍英方的旧档案后发现了证据，那是一台1972年军方在贝尔法斯特使用过的小型无线电。[9]他们甚至设法找到了一张照片，一名身着全副战斗装备的英国士兵手持这种类型的无线电靠墙蹲着——就在帝维斯公寓里。[10]


帝维斯公寓里拿着手持无线电的英国士兵

但是，即使真的存在这种无线电，把它交给一个住在共和党支持率极高的地区并且带着一群孩子的低级别线人，这实在是愚蠢之举。怎么不想想帝维斯公寓那些不隔音的墙？你甚至无法一边喝茶一边随心所欲地聊天，因为隔壁邻居可能会听到。所以用秘密无线电进行秘密传输会带来极大风险。当迈克尔·麦康维尔仔细察看布伦丹·休斯的回忆录时，令他感到很震惊的是，休斯从未说过他亲眼看见过那台无线电。或许这只是在贝尔法斯特流传已久的谣言，经年累月便成了人们接受的事实。或许这是杀害琼的凶手告诉彼此（或者告诉自己）的一个故事，好让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受一点。同样令迈克尔感到荒唐而无礼的是，休斯认为麦康维尔家的兄弟姐妹可能用某种方式协助母亲对邻居进行了监视。[11]

然而，布伦丹·休斯口述历史的出版还引出了另一个疑点。它涉及琼·麦康维尔失踪的时间线。努阿拉·奥罗恩在调查中未能从官方文件中找出琼·麦康维尔失踪当晚的确切日期。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一直坚持表示，12月初的一天晚上，琼出门玩宾戈游戏，结果被人抓走并遭到审问和殴打，最后军方发现她茫然地在街上游荡，于是将她送回了帝维斯公寓的家中。据孩子们回忆，她是在第二天晚上被带走的：她还在调养殴打造

成的瘀伤。尽管孩子们对日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们认为琼是在1972年12月7日被绑架的。

这个时间线似乎与布伦丹·休斯的说法相矛盾。据休斯回忆，麦康维尔遭到审问并被没收了无线电，接着又回去充当线人，一段时间后，她被发现有第二台无线电。休斯所讲的故事得到了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支持，并且共和军也在声明中正式强调过，琼·麦康维尔不仅是线人，而且是累犯：她被警告停止协助英方，后来遭到杀害完全是因为她违抗警告。但是，如果麦康维尔在12月6日晚遭到审问和警告，随后于次日晚在家中被绑架，那么休斯主张的时间线便说不通。假设麦康维尔真的是英方线人，且她的上线冷漠到让她在收到警告后继续回去工作，他们也难以在24小时之内做到这一点——遑论给她提供一台新的无线电。

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将奥罗恩的报告视作对母亲蒙受冤屈的彻底洗刷，是对他们多年来辩护的一切迟到几十年的肯定。然而事实上，这份报告在几个重要细节上和麦康维尔家的叙述版本相左。[12]在查阅历史文档的过程中，努阿拉·奥罗恩发现了一份官方记录，其中似乎描述了琼被共和军从宾戈游戏室带去审问的那晚。据一篇旧警方日志的记载，某晚11点，一个女人被发现在西贝尔法斯特的街上游荡。她遭到过殴打。这篇日志指出，该女子名叫玛丽·麦康维尔，但这显然是琼——她的地址写的是帝维斯公寓圣犹大之路区。该日志陈述道，这名女子遭到“一群男人贸然接近，并被警告不许再向军方提供情报”。

暂且不论共和军认为琼是告密者的判断正确与否，这份文档似乎证实了麦康维尔接到过警告的说法。不过，警方日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根据日志记载，麦康维尔遭到殴打和警告后被发现在街上游荡，当晚的日期并非琼的孩子们所说的12月6日，而是七天前的11月29日。[13]

在1972年，迈克尔·麦康维尔和他的兄弟姐妹年龄尚小。他们住在战区，母亲被人绑架，还不得不用偷窃和翻垃圾箱的方式来获取食物。在骚乱和不幸中，谁也无心留意日期。而且，回忆是件奇怪的事。海伦记得，琼被人从宾戈游戏室带走的第二天，家里的弟妹都去了学校。[14]但迈克尔记得他们都待在了家里。也许，麦康维尔家的兄弟姐妹只是在回顾往事时弄混了日期，可能琼实际上是在11月29日遭到审问，并在11月30日被绑架。但是，自从1973年1月开始，在他们接受的媒体采访以及对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叙述中，这些孩子都明确表示他们的母亲是在12月初被绑架的，不是11月底。如果这个绑架日期准确无误，同时奥罗恩发现的警方日志真实可信，那么从最初的审问和警告到琼·麦康维尔被绑架期间，似乎过去了不止一天。如果这是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那么它和布伦丹·休斯提供的时间线要吻合得多。

奥罗恩的报告中还有最后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几十年来，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经常谈到母亲在帝维斯公寓帮助受伤英国士兵的那个夜晚。不止一个孩子能生动地回忆当晚的具体情况：一家人挤在昏暗的公

寓里；混凝土走廊传来阵阵枪声；那名士兵在门外痛苦地呻吟。然而，当奥罗恩查阅那个时期的军方记录时，她找不到有英国士兵在帝维斯公寓附近受伤的证据。[15]或许是记录不完整，或许是士兵的伤势记载有误，又或许麦康维尔一家人并不是在这段时期经历的这件事？但你禁不住想，琼的孩子们是否和绑架她的人一样，围绕这个失踪的女人编织了一个他们能接受的故事？[16]

虽然布伦丹·休斯揭开麦康维尔失踪案内幕的消息在他死后才公开，但杜洛尔丝·普赖斯尚在人世。2010年，《周日生活报》的报道发表后，麦康维尔一家人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没想到，普赖斯会对自己参与的行动如此直言不讳，毕竟这是一个严格保守多年的秘密。由于渴望了解更多信息，迈克尔通过中间人传达了和普赖斯见面的意愿。[17]但他从未得到她的回复。海伦对这个报道感到愤怒，并向当局提出质疑。“把亚当斯和普赖斯抓起来，”她说，“参与杀害我母亲的人还在逍遥法外，这实在令人发指！”新芬党主席和他直言不讳的对手或许没有“扣动扳机”，海伦说，但他们“和开枪的人一样罪不可赦”。[18]

第二年春天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埃德·莫洛尼正在纽约布朗克斯里弗代尔区的家里，这时他接到了一个令他惊慌失措的电话。波士顿学院刚刚收到了一张传票。根据与英国的法律互助条约，美国司法部转交了北爱尔兰警察局的正式请求。传票声明，提出这项请求是为了协助当局“处理涉嫌违反英国法律的行为，即谋杀”。[19]确切而言，传票要求获得“对布伦丹·休斯和杜洛尔丝·普赖斯所有采访的原始录音”。

二十七　波士顿录音带

“我一直在询问有关合法性和保密性的问题，可能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麦克斯恼火地说，“要做到绝对保密和绝对保险，这就是把它们存放在一所美国大学的全部原因！”[1]“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召开了一次紧急电话会议，商议如何应对传票问题。住在都柏林郊外的麦克斯和妻子卡丽参加了会议，还有埃德·莫洛尼（在纽约）、进行保皇派采访的威尔逊·麦克阿瑟（在贝尔法斯特），以及波士顿学院的汤姆·哈奇和鲍勃·奥尼尔。哈奇宣称，他和波士顿学院的校长威廉·莱希交谈过，莱希向他保证：“我们不会让我们的采访者或采访陷入危险。”[2]

麦克斯和莫洛尼惶恐不安。在他们编制口述历史档案的那些年里，他们从不认为英国当局真的会试图获取这些录音。这个想法似乎有些荒唐：就在几个月前，英国政府连同爱尔兰政府把大量涉及后北爱尔兰问题时期裁军进程的文件记载交托至波士顿学院，条件是这些记录将封存长达30年。[3]现在，来自同一政府的官员真的要在他们托付的同一所大学违背相似的禁令吗？

波士顿学院的管理人员一直在咨询律师，学校会如何回应尚不得而知。会议中，哈奇和奥尼尔从容不迫，不断安抚大家。但麦克斯表示担心，波士顿学院最终可能会遵照要求交出录音带——如此一来，采访者和那些道出他们秘密过往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将只能“坐以待毙”。[4]

这也是莫洛尼担心的问题。并且，为了防止神不知鬼不觉地私下移交，他已经把事情公开。[5]他联系了《纽约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头版文章，标题为“阿尔斯特问题秘密档案面临传票”。他还在《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中提出，波士顿学院或许将别无选择，只能“销毁”录音带，而不会把它们交给当局。[6]在莫洛尼和麦克斯看来，似乎只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才能平衡局面，这个案件得到的关注越多，波士顿学院就越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7]但是，哈奇斥责了莫洛尼未同校方管理人员商议便直接诉诸媒体的行为，并埋怨销毁档案的威胁“太过分”。[8]

这群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当局突然要求获得这些采访，但莫洛尼有一种猜测。北爱尔兰警察局虽然书面承诺要力争转型，但尽管警队换了名称，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9]几十年来，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视格里·亚当斯为主要敌手，一个在北爱尔兰问题过程中杀害将近300名警察的准军事组织傀儡。[10]北爱尔兰警察局的许多老手都失去过他们所爱的人——同事、童年伙伴、父亲——都是共和军一手造成的。如今他们意识到，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学院存有格里·亚当斯的前属下提供的证词档案。而这些秘密采访可能提供英国当局几十年来未能获得的证据：这些能让亚当斯锒铛入狱的证据不仅涉及他的共和军身份，更涉及谋杀案。

“他们准备报仇雪恨。”[11]汤姆·哈奇在电话会议上对莫洛尼的猜测表示同意。“他们是想找到证据对格里这样的人定罪，”他补充道，“我绝不会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档案来起诉他，因为这不是我们进行这项事业的目的。”哈奇的口吻很坚定。然而，当他和鲍勃·奥尼尔就项目的细节询问其他人时，莫洛尼认为，他从问题的字里行间觉察到，波士顿学院的态度或许并不像哈奇所说的那样坚决。[12]他们非常好奇麦金太尔和威尔逊·麦克阿瑟在进行采访时究竟做了哪些保证。关于采访的保密性，受访对象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承诺？在对保皇派进行采访时，麦克阿瑟说，他担保会有“坚不可摧”的机密性。在他们去世之前，他们的证词将不向任何人公开，甚至不承认他们参与过这个项目。麦克阿瑟提醒哈奇和奥尼尔，十年前首次讨论这个档案时，是他们自己用了“坚不可摧”这个词。当他遇到担惊受怕的参与者时，麦克阿瑟会告诉他们，“波士顿学院的法律顾问”已经对整个安排进行了审查。[13]

结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当埃德·莫洛尼起草参与者要签署的契约时，他用邮件将拟定的内容发给了鲍勃·奥尼尔，写道：“建议先把这个交给你们的法律人员过目一下我们再用。”[14]第二天，奥尼尔回邮表示，他正在修改契约的措辞，然后向学校的律师征求意见。[15]但最后，他似乎并没有这样做。[16]律师很可能会建议他在契约中具体说明，其中包含的任何有关机密性的担保未必能使档案免于法院指令的影响。每位参与者签署的契约都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波士顿学院的任何律师都没看过那些协议。[17]

哈奇用乐观的语气结束了电话会议，仿佛他们在比赛中冲破了阻碍，并将作为团队齐心协力地步入这场战斗。然而，尽管他们又来回发送了几封邮件，但那却是哈奇和奥尼尔最后一次跟他们“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搭档对话。[18]在5月底之前，波士顿学院移交了布伦丹·休斯的采访，依据是休斯现在已经离世，而且其口述历史的许多内容已经在莫洛尼的书中发表。[19]但是，虽然《来自坟墓的声音》出于法律和安全原因而模糊了某些人的身份，但休斯的采访文本和录音却没有经过这种处理。[20]得知北爱尔兰警察局获得了这份资料后，莫洛尼感到愤怒至极。“现在当局掌握了采取行动的信息，”他在邮件中告诉哈奇，“我以身家打赌，此时此刻，英国政府内部有大量律师团队正在想方设法逼波士顿学院交出其他潜在的受访者名单。”[21]

莫洛尼提议，为了避免一场“大灾难”，哈奇和奥尼尔应该将所有档案装进联邦快递的信封，并连夜寄给身在爱尔兰的麦克斯。波士顿学院或许没有胆量打一场冗长的法律战，但麦克斯有。莫洛尼说，麦克斯绝不会把录音和文本交出去，他更“乐于入狱”。[22]学者们在这个时候把材料寄至境外，可能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但麦克斯认同莫洛尼的观点，波士顿学院有道德义务来履行保密的承诺，而且这比严守法律更重要。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故事托付给了“贝尔法斯特项目”，波士顿学院至少能采取一些非暴力违抗之举来保护他们。[23]既然当局拿到了布伦丹·休斯的材料，莫洛尼预测，他们“极有可能”会根据休斯提供的信息再次发送传票，以获取其他采访。[24]

哈奇在邮件中简洁而不客气地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波士顿学院决不会将档案邮寄出境。他用一句事后来看十分讽刺的话指出，他们探讨过并向参与者保证过，波士顿学院是储存参与者的回忆最安全的地方。[25]校方同意为涉及普赖斯的传票据理力争，他们在上呈联邦法院的议案中提出，公开这份材料将违反与参与者定下的协议，损害学术自由，危害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同时将该项目相关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26]“共和军强加了一种跟黑手党‘拒绝作证’的概念相似的沉默法则。”[27]辩护状中指出。正因如此，像杜洛尔丝·普赖斯这样的人只有在得到“采访将被封存起来”的保证后才愿意参与口述历史项目。莫洛尼在宣誓书中指出，共和军成员向局外人揭露准军事组织生涯的详细情况“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28]

但是，针对普赖斯的采访为何应该移交的问题，美国政府用自己的论据进行了咄咄逼人的回击。他们指出，莫洛尼、麦金太尔和波士顿学院“做出了他们无法履行的承诺——他们将隐藏谋杀和其他罪行的证据，直到犯罪者离世。”“贝尔法斯特项目”不是新闻工作，并且，作为法律问题，没有“学术特权”能保护采访不受法院命令的影响。[29]至于莫洛尼表示公开文档会带来危险的论点，政府辩称，莫洛尼自己对项目进行了广泛宣传。他还出版了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书！麦克斯为这个项目采访布伦丹·休斯和其他人的消息公开后，他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暗杀。[30]所以这到底能有多危险呢？

政府还错误地提出，普赖斯的采访已经被记者塞伦·巴尔内斯在《周日生活报》的报道中解封并公开。[31]波士顿学院的律师在递交法院的档案中指出，这并不是事实——美国官方显然被巴尔内斯的把戏蒙骗了，巴尔内斯只是暗示，却没有明确表示他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32]然而到了8月，莫洛尼可怕的预测成了现实。[33]第二张传票到达了波士顿学院，要求获得关于“琼·麦康维尔女士的绑架案和谋杀案”的所有录音。12月，联邦法官做出了不利于校方的裁决，命令波士顿学院将录音和文本上交法院审阅。校方选择对这一裁决不予申诉，莫洛尼和麦克斯对此感到愤怒。因此，这两个爱尔兰人亲自雇用律师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

不幸的是，对这两个爱尔兰人而言，这桩案件已成定局：他们几乎没有可以援引的法律或宪法保护。不过，在法庭上进行努力的同时，莫洛尼和麦克斯以及卡丽·图米还在贯彻一个政治策略，向尽可能多的人寻求支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波士顿学院（他在这里获得了法律学位）以及爱尔兰关系密切。克里致信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敦促她就该问题同英国当局交涉，因为这些传票可能危害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34]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马萨诸塞州分部提交了一份反对这些传票的法庭之友案情摘要。[35]

为了证明这一争议代表着学术自由的危机，莫洛尼和麦克斯以及校方本身可能向波士顿学院的全体教员寻求过支持。然而，当传票送达的时候，大多数教职人员对“贝尔法斯特项目”已经心生不满。[36]由于档案

之事一直密不透风，在莫洛尼的书出版之前，学校几乎没有人了解此事。在最初的构想中，这个项目本应有校方的监察委员会监督其学术的严谨性。[37]但是，就像校方律师从未看过那些契约一样，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落实。当项目的具体情况被披露后，部分教职人员对他们了解的信息提出了异议[38]：安东尼·麦金太尔虽然有博士学位，但他并不是经验丰富的口述历史实践者，威尔逊·麦克阿瑟也不是。此二人似乎都是他们的受访对象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路人——在某些案例中，双方还是亲密的朋友。这绝不是学术客观的典范。除此之外，麦克斯还因为谋杀罪在监狱蹲了将近20年。

汤姆·哈奇的资历受到了教职人员的怀疑。他是校长莱希的老朋友，似乎享受着一份没有多少实际部门责任的闲职。[39]负责伯恩斯图书馆的鲍勃·奥尼尔也一样。两人在学校都没有能够寻求到强大的学术支持。哈奇在给莫洛尼的邮件中表示，“愤慨的学者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40]在这个问题上，莫洛尼设法阻止研究生查阅档案的举动也没有给项目带来任何好处。[41]2014年，波士顿学院历史系最终发布了一份关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声明。此举并不是为了捍卫学术自由，而是为了澄清这个项目“自始至终”一直与该系没有任何关系。[42]“谁也不信任这个项目的可靠性。”[43]一位教职人员解释道。该系的讲师信仰学术自由，“但这个糟糕的案例实在不适用这个原则”。

莫洛尼和麦克斯向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结果败诉。[44]他们获得了暂缓令，禁止校方在他们向最高法院上诉之前交出这些采访。但在2013年春天，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45]为了确定哪些采访将作为对第二张传票的回应，即提交与琼·麦康维尔的绑架案和谋杀案相关的所有材料，法官威廉·扬向麦克斯请求帮助。[46]为了安全起见，波士顿学院的每一个采访都没有标注受访者的姓名，而是采用字母代号。但麦克斯知道他采访过的所有人的身份，而且可能记得其中有谁谈论过琼·麦康维尔。然而他拒绝提供帮助，并表示协助法庭会“使我逾越学术研究和警方调查之间的界线”。[47]扬法官继而向鲍勃·奥尼尔寻求帮助，但他也不同意，声称他没有看过那些采访。[48]于是在一个圣诞节，扬法官用几天时间亲自审阅完了共和派采访的所有文本。[49]他发现有六位参与者提到过琼·麦康维尔，但其中一人只是蜻蜓点水。[50]结果，扬批准移交涉及其中五名参与者的所有录音。

其中一名参与者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麦克斯和莫洛尼两人一直坚定不移地表示，普赖斯从未在口述历史中谈及麦康维尔。“在‘贝尔法斯特项目’中，杜洛尔丝·普赖斯既没有提到琼·麦康维尔，也没有谈论她遭遇了什么。”[51]莫洛尼在2012年9月的一篇新闻稿中说。“有关那个不幸女人失踪的话题从未被提及，一次也没有。”[52]他在当月的一份宣誓书中写道。正如莫洛尼解释的那样，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法律含意。“事实上，安东尼·麦金太尔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明显缺乏任何能证明传票合理性的材料。”[53]

严格来说，这是事实。杜洛尔丝·普赖斯和麦克斯进行了大约15小时

的录音对话，而且她在那些录音里一次都未提及麦康维尔。然而，档案中还有一组普赖斯确实谈论过琼·麦康维尔失踪案的录音，并且十分详尽。[54]不过，采访者并不是安东尼·麦金太尔，而是埃德·莫洛尼。

2010年2月，当《爱尔兰新闻报》记者艾莉森·莫里斯前往马拉海德到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里采访她时，“贝尔法斯特项目”早已结束。麦克斯和威尔逊·麦克阿瑟于2006年完成了他们最后的采访，而那些档案似乎完整无缺地躺在伯恩斯图书馆的珍藏室里。但在普赖斯和莫里斯交谈后不久，莫洛尼去都柏林拜访了她，目的是进行他自己的采访。他并非计划以她的故事为题发表自己的版本，而是以超越她和麦克斯对话的详细程度来询问她的过去，然后采用“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同等条件来保护这次采访：直到她去世之后他才会公开她的叙述。[55]

普赖斯同意了。彼时，她正在圣帕特里克医院住院，接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一天早上，莫洛尼去那里探望了她，两人在她的房间里交谈了几个小时。莫洛尼用数码录音机记录了这次对话。几天后，他们在医院外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再次见面。这一次，莫洛尼召集了一个小型摄制组来拍摄这次采访。两次对话中，杜洛尔丝表现得清醒而有条理，散乱的头发呈铂金色，眼睛涂上了睫毛膏。她向莫洛尼谈及了姨妈布蕾迪，她说共和军的武器库发生意外后，布蕾迪带着失明和残疾的身体回到家中，外婆多兰让全家人进行哀悼。布蕾迪的姐妹都不准外出跳舞，普赖斯说。“就像为活人守灵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布蕾迪的苦难迫使她加入了斗争，她说，因为这“维护了她所做的牺牲”。[56]她还谈到在伯恩托莱特桥被打和加入共和军的经历，以及在“无名氏”的生涯。[57]

当莫洛尼问到让人们失踪的做法时，普赖斯说她一直不认同这么做。“帕特·麦克卢尔和我还有其他志愿军会相互讨论这件事，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多么好的主意，”她说，“但我们被告知，‘按命令行事’。”

“你认为这属于战争罪吗？”莫洛尼问她。

“我认为是的，没错。我认为这是战争罪，”她说，“我绝对主张并说过……应该把他们陈尸街头，让任何想要选择那种可耻人生的人感受对上帝和共和运动的敬畏。”

在接到送麦康维尔过境的命令之前，她参与让人们失踪的行动已经有一段时间，她说。在此之前，她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也没有听说过她。但麦康维尔已经承认自己是线人，普赖斯坚持道。她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普赖斯说，有共和军志愿军看到琼·麦康维尔出现在黑斯廷斯街的军营里。“她藏在一个有缝隙的毛毯后面，能透过缝隙往外看。”普赖斯说。

就像那些茅茅套着有缝隙的长袍为弗兰克·基特森指认他们的同胞一样，根据普赖斯所言，琼·麦康维尔也躲在毛毯后从人群中识别共和军成

员。[58]只是，那个毛毯没有拖到地面，普赖斯继续道，而其中一名共和军“认出了她脚上的拖鞋”。

当麦康维尔被带走进行审问时，普赖斯补充道，她“招供了”。她说她当了线人。“为了钱。”

普赖斯注视着莫洛尼说：“我们认为，告密者是最低等的生命。他们不配做人，死刑太便宜他们了。”

普赖斯和小帕特·麦克卢尔以及另一名志愿军到西贝尔法斯特关押琼·麦康维尔的房子里去接她，然后向边境驶去。[59]普赖斯的朋友乔·林斯基随她上车的时候或许清楚自己将被送往刑场，但琼·麦康维尔对此毫无察觉。普赖斯告诉她，他们会把她交给天主教慈善团体圣母军，后者将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们会把我的孩子们送去吗？”麦康维尔问。

直到那时普赖斯才知道她有孩子。

“是的，他们肯定会的。”她撒谎说。

“他们会不会给我钱？”麦康维尔问，“他们会不会给我房子住？”

据普赖斯说，麦康维尔丝毫不感到害怕，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向共和军坦白了一切。他们在路上停了一会儿，普赖斯给麦康维尔买了炸鱼薯条和烟。[60]普赖斯告诉莫洛尼，她不喜欢麦康维尔。“某个时候她说：‘我就知道那些临时共和军王八蛋没种枪毙我。’而开车送她的‘临时共和军王八蛋们’心想：噢，是吗？”普赖斯冷漠地补充道，“她的话太多了，结果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这是真的吗？这些回忆是如此具体，而且与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对母亲的回忆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的记忆中，母亲不是什么出言不逊的煽动者，而是个胆小怕事、不爱出门的人。她和普赖斯的相处充满如此显而易见的危险，麦康维尔真的会在这种情况下以如此毁灭性的鲁莽态度痛斥共和军吗，还是说普赖斯在有意编造关于这个女人的谎言，又或者她在用将琼·麦康维尔贬低为不配做人的记忆来应对自己良心的不安？在和莫洛尼对话的过程中，她大多数时候表现得坚如磐石，但偶尔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仿佛那是一种盔甲。有时她也会支吾其词。

“我不清楚她具体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普赖斯在指责麦康维尔后立刻说。她对麦康维尔被指控的罪名并没有亲眼见闻。她只知道，共和军得出了一个不太可能的结论，即那位十个孩子的母亲是告密者。即便这一指控属实——而普赖斯相信的确如此——她仍然在内心深处怀疑，这个惩罚是否合理。“什么值得死刑？”她对莫洛尼说，“我不得不问自己，什么值得死刑？”她继续说道：“我真的不知道她有孩子，或者有几个孩子。我对这些一无所知。要是我能参与讨论所发生的事，我可能

会支持从轻处罚。”或许可以将麦康维尔驱逐出境，而不是处以死刑，她提出。

但事实是另一回事，普赖斯说，他们穿过边境把琼交给了邓多克的当地共和军部队。

“然后发生了什么？”莫洛尼问。

“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普赖斯说，她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再往下说我就会有危险。”

如果普赖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缓和持续不断的愧疚感而继续中伤麦康维尔，那么或许是因为她所做的不仅仅是把那个失去丈夫的女人送过了边境。

“我需要知道真相。”莫洛尼说。

“好吧，呃，我们被叫了回去，”普赖斯说，“她在那里待了大概四五天，然后我们接到了返回邓多克的命令。”当地部队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他们要做的是把麦康维尔带到旷野另一边刚挖好的墓穴枪毙她。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不想这么做。”普赖斯说，她觉得这是因为麦康维尔是女人。

“所以必须由你们来做。”莫洛尼说。

普赖斯没有说话，只是小声嘟囔了一下。

“是这样吗？”他追问道。

她又嘟囔了一声，然后说道：“是的。”

“你想谈这件事吗，还是不想？”莫洛尼问。

普赖斯说，麦康维尔死的时候，有三名“无名氏”的成员在场：小帕特·麦克卢尔、另一名志愿军，以及普赖斯本人。他们只有一把枪，由于害怕良心不安，他们决定每人开一枪，这样就永远无法确定是谁扣下了致命一击。这是行刑队的惯用伎俩——其中一个枪手的步枪会上空膛，如此一来，每个枪手事后都可以告诉自己，杀人的也许不是他。这可以作为一种令人安慰的谎言，但在这个事例中，因为只有一把枪，所以是谁射出的致命一击将一目了然。“我们每个人轮流开了一枪。”普赖斯说。当普赖斯开枪时，她故意打偏了。[61]接着另外一人扣动扳机，麦康维尔应声倒地。

“我们把她留在了坑里。”普赖斯说，邓多克的当地部队随后填埋了墓穴。

“然后你们回到了贝尔法斯特？”莫洛尼问。

“然后我们回到了贝尔法斯特。”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呃，”普赖斯说，“我们都心烦意乱，帕特去汇报了这件事。”

“向格里汇报吗？”莫洛尼问。

“是的。”普赖斯说。

突然之间，莫洛尼的语气从耐心的倾听转变成了严厉的诘问：“你百分之百确定，在参与整个任务的过程中，在共和军的指挥系统下，最初由格里·亚当斯下达的命令……”

“是的。”普赖斯说。

“汇报的对象也是格里·亚当斯，你确定是这样吗？”

“我确定。”她说。然后，她加快语速说道：“而他却试图假装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在朗·凯什。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不在朗·凯什。他不在。而且，呃，这太让人气愤了，真的很让人气愤。”她很生气。“那些经历，我是说……”她的声音变小了。“这些人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会想到他们。”[62]她说。林斯基、赖特、麦基、麦康维尔。“我会想到他们，而且……”她继续道，“我不想撒谎：我不是经常祷告的人，但有时我会在半夜这么做。我偶尔会说：‘呃，愿主保佑他们，希望他们不再受苦。’”

作为共和军志愿军，普赖斯说，“我被要求做的事往往有违我的本性。”有时她不得不服从难以服从的命令。那个时候，她一直对上级言听计从。但后来，她有机会问自己“所有那些在冲动的时候不会问的复杂问题”。她补充道：“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许多医生谈论这些。”

几个小时之后，莫洛尼和普赖斯结束了谈话。他们就此告别，他向她担保，他会为她所说的话保守秘密。他会把录制的采访带回美国，并将它们存放在他所知道的最安全的地方——波士顿学院珍藏室的“贝尔法斯特项目”档案库。

三年后的2013年7月，当北爱尔兰警察局的两名侦探飞往洛根国际机场，并前往栗树山获取扬法官批准的材料时，莫洛尼对普赖斯的采访还在那里。[63]严格来说，它根本不属于“贝尔法斯特项目”。但是，为了确保它的安全，莫洛尼实际上将它置于了危险境地。莫洛尼恳求鲍勃·奥尼尔不要把这份材料包含在校方移交的内容之列。[64]但是，传票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原本就没有做出多少反抗的校方，选择将莫洛尼的采访连同其他所有材料一并上交。次年的一个春日，在琼·麦康维尔遭到绑架并被谋杀的41年后，格里·亚当斯因为涉案而被北爱尔兰警察局逮捕。

二十八　意外死亡

马赛林军营的年轻英国士兵喜欢在周六晚上点披萨，困在军事基地的他们会给附近的多米诺餐厅打电话。[1]任何一个星期六晚上，多米诺餐厅都可能给军营派送20份不同的订单。这些士兵是不错的顾客。2009年3月7日，临近晚上10点，两名年轻士兵来到了基地入口的警卫砖房。他们身着沙漠迷彩，准备按计划于数小时后在深夜乘坐运输机飞往阿富汗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任务。[2]不过，他们要先吃披萨饱餐一顿。一辆送餐车开了过来，接着又来了一辆——都是来自多米诺餐厅的订餐，两位派送员从不同的袋子里拿出热气腾腾的方形披萨盒。接着第三辆车开了过来，那是一辆绿色轿车，然后突然爆发出自动射击的枪声。[3]枪手有两人，他们穿着深色衣服，脸被面罩遮住。在最初的连续射击后，他们走近躺在地上的两名士兵，站在他们上方近距离反复射击。[4]在半分钟内射出60多发子弹后，两名枪手爬回车内逃离现场。[5]两名士兵被害身亡。帕特里克·阿金卡尔21岁，来自伦敦北部。马克·昆西23岁，来自伯明翰。另外两名士兵以及多米诺餐厅的两名派送员在袭击中受伤。[6]其中一名派送员是当地的一个小孩，另一名是来自波兰的侨民。

距离最后一名英国士兵在北爱尔兰丧生已经过去12年。[7]在给都柏林一家报纸的致电中，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团体“正牌共和军”宣布为该事件负责。该团体的发言人声称，就连两名派送员也是正当目标，因为他们“用提供服务的方式勾结英国人”。[8]北爱尔兰警察局局长休·奥德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小群越来越绝望的人做出的举动，他们决心将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拽回他们不想去的地方。”[9]

警方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并逮捕了几人。然后，枪击案过去八个月后，一支全副武装的警察队伍闯入了安德森斯顿的一间住宅。[10]当局追踪了正牌共和军宣称为袭击负责时所用的电话。那是一部付费使用电话，在枪击案的第二天购于纽敦阿比的乐购超市。警方查看了超市的监控视频，发现了一名身穿厚重大衣的中老年妇女。当这个女人站在收银台从钱包取钱买电话时，她游移的眼神望向上方，直到视线正对监控摄像头。[11]这个女人是玛丽安·普赖斯。[12]

杜洛尔丝尽管厌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但她无法投身任何致力于继续暴力行动的共和党分裂团体。她的妹妹则没有这样的愧疚。“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肯定有武装斗争的一席之地。”[13]玛丽安会说。她年近六旬，女儿们已经长大，且自己患有关节炎，但她并不准备放下武器。她因为军营枪击案接受了两天的审讯，随后被无罪释放。然而过了18个月，她再次遭到当局拘留，这一次他们没有放她走。玛丽安最终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财产”。[14]她还受到了另一项指控，她参加了德里的异见分子集会。[15]集会中，一位蒙面的正牌共和军宣读了一份威胁警方的声明。他说，作为一股侵略势力，警方“理应被处决”。当他读出声明的时候，玛丽安毫不掩饰地站在旁边帮他拿着文稿。[16]

接下来的两年里，玛丽安被关在监狱，包括几次长期的单独监禁。[17]她犯了银屑病，体重也开始下降。在她的脑海中，有时仿佛感觉又回到了英格兰的监狱体制内，仿佛过去30年并没有真正发生，仿佛她从未结婚生子，也从未享受过狱墙外的生活。杜洛尔丝为妹妹忧心如焚，她参加了监狱外“释放玛丽安·普赖斯！”的活动。[18]支持者们写过恳切的信件，也举行过小型集会。他们形容玛丽安是“心理折磨的受害者，而且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19]这一切显然让人们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初解救普赖斯姐妹的运动。

然而，这次活动没有获得普赖斯姐妹几十年前在爱尔兰共和党人中收获的广泛支持。玛丽安也许没有向前走，但世界在进步，它经历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改变。战争造成了损失，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妥协与和解的新精神。就在玛丽安被拘捕的同一个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爱尔兰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一个世纪前的1911年以来，英国君主首次到访爱尔兰，当时整座爱尔兰岛仍然属于英国。[20]杜洛尔丝的前校友玛丽·麦卡利斯如今已经成为爱尔兰总统。[21]她对王室访问的历史性时刻表示欢迎，称这是“爱尔兰迎接女王陛下的绝佳时机”。[22]次年，当玛丽安还在监狱的时候，前德里枪手马丁·麦吉尼斯就任北爱尔兰第一副部长，他会见了女王并同她握手。[23]麦吉尼斯和格里·亚当斯似乎能与任何人找到共同点。他们甚至跟尖酸刻薄的伊恩·佩斯利握手言和，麦吉尼斯后来在政府中与他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政治如同人生，谁也不可能绝对得偿所愿，”佩斯利和麦吉尼斯一同出现在斯托蒙特时表示，“当人们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足够的成就时，他们一定要做出决定。”[24]

但是，就因为其他所有人现在准备放弃斗争，并不代表玛丽安也一样。她欣然承认，她在这个问题上的顽抗从根本而言是反民主的——北爱尔兰只有极少数人支持以驱逐英国人的名义继续杀戮。“但是，做一个共和党人并不是要赢得人气，”她说，“从来不是这样。”[25]早在2001年她就宣称：“下一代必须接过共和主义的火炬继续斗争。”[26]然而，当玛丽安从父母手中接过火炬，正如他们从她的祖父母辈手中接过火炬那样，她自己的女儿连同姐姐的儿子，几乎丝毫没有表现出投身武装斗争的意愿。玛丽安养育了两个年轻的平民女性，她们不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产物，而是全球化的21世纪的产物。她有一个女儿是记者，为英国广播公司效力。

玛丽安的一些朋友担心她遭到了年轻异见同党的利用。他们担心这些自封革命者的人是为了普赖斯姐妹的身份而迎合她——因为在武装斗争最可怕的年代，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报女孩，她能间接赋予这些年轻的异见分子一定的可信度，尽管有些跟不上时代。[27]2013年，在被拘押两年后，玛丽安对两项指控供认不讳，并被判处入狱12个月。但是，由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加上她已经服刑的时间，法官延缓了判决。在听证会上，她看起来很虚弱，拄着拐杖走向了被告席。[28]

监狱里，玛丽安每天聊以自慰的活动令她看起来不像典型的激进煽动者，而更像不关心政治的平庸退休妇女。她会玩《每日邮报》的字谜

游戏，读斯蒂格·拉松的小说，而且花好几个小时看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充满英伦风情的怀旧庄园剧《唐顿庄园》。[29]

玛丽安·普赖斯被释放大约一年后，她的老同志格里·亚当斯被捕。凭借波士顿学院的采访，北爱尔兰警察局当时已经逮捕了一些人，并审问了他们有关琼·麦康维尔的绑架案和谋杀案。[30]其中部分人在琼被绑架时住在帝维斯公寓附近。但在1972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青少年，所以如果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过任何角色，那也很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他们当晚可能对带走麦康维尔的那群当地人提供过帮助。在接受警方的问话后，他们都被释放。实际上，只有一个人遭到指控：艾弗·贝尔。[31]根据休斯所言，这名共和党老兵提出，琼·麦康维尔不应该被失踪，而应该在处决后被抛尸街头。但休斯说，他的提议被格里·亚当斯否决。贝尔面临的指控包括协助和教唆谋杀，以及加入共和军——因为即使在北爱尔兰问题之后，你仍然可能因为曾经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身份而被起诉。

亚当斯非常清楚当局想要逮捕他。自2011年起，他一直是爱尔兰共和国的立法委员，因而享有一定的优待。警方通过律师提前联系了他，要求他去安特里姆的北爱尔兰警察局报到。亚当斯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前往，说他们可以在警局里面逮捕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对政治操控驾轻就熟，他不想给警方在警局外的停车场逮捕他的机会，因为那里会有一群事先得到风声的媒体摄影师等着拍下他戴手铐的画面。[32]4月30日星期三，刚过晚上8点，亚当斯悄悄走进了警察局。[33]他的皮带、手表和领带都被脱了下来，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接受一男一女两名警官的密集审问。

鉴于亚当斯经常被问及失踪者的命运，你可能认为他应该精心准备了无懈可击的辩词。然而，他在这些场合下给出的回答往往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当被问到布伦丹·休斯和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口述历史时，亚当斯总是不断声称，因为他们对和平进程表示愤怒和反对，所以必须全然否定他们的陈述。休斯和普赖斯心怀怨恨，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有一次，普赖斯亲口承认，她接受波士顿学院的采访“是因为想秋后算账”。[34]然而，亚当斯似乎一直未能解释，为什么休斯和普赖斯各自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在细节上如此一致。

是的，他们憎恶亚当斯；是的，他们被心魔所困；是的，他们愤愤不平；是的，这大概就是他们发出谴责的原因，埃蒙·麦卡恩在《爱尔兰时报》上写道。“但是，他认为这些感受导致他们编造恶毒的谎言来诋毁他，这显然站不住脚。至少同样可能的是，他们之所以打破共和军的沉默法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亚当斯和他的亲信采取的策略让这种法则变得毫无意义，”麦卡恩总结道，“他们被迫说出的不是谎言，而是真相。”[35]正如普赖斯自己所言：“我非常想让格里·亚当斯回到属于他的地方——那也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36]

针对失踪者的问题，亚当斯喜欢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这种无

知和他于北爱尔兰问题初期在贝尔法斯特扮演的角色十分不符。乔·林斯基是“我的邻居，他住在街对面”，亚当斯承认。但是，当林斯基突然失踪后，他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疑问。“过去40年有很多流言蜚语。”[37]亚当斯告诉《爱尔兰新闻报》，并指出有人说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澳大利亚看到过林斯基。亚当斯怎么会知道共和军杀害了他，还把他埋在了无名之墓呢？

当贝尔法斯特的调查记者达拉赫·麦金太尔向他问及四方洗衣行动后失踪的两名线人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时，亚当斯同样声称他对共和军杀害他们的决定一无所知。但麦金太尔指出，亚当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共和军发现四方洗衣一事大加赞赏。[38]他怎么可能了解这件事，却不知道临时共和军是在赖特和麦基供认他们的双重间谍身份后才发现四方行动的呢？亚当斯无法给出条理清晰的回答。麦金太尔追问道：“你一点也不好奇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吗？”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亚当斯回答，“只要你不问，你就不知道。”[39]

或许早在童年时期，亚当斯就十分擅长信口雌黄。2009年，亚当斯的侄女欧雅·蒂勒尔，也就是他的哥哥利亚姆的女儿，在一档新闻节目中透露，她小时候遭到了父亲的强暴，并且从4岁开始经历了父亲数十年的性骚扰。[40]在该节目的采访中，格里·亚当斯承认他了解欧雅的指控——也相信她的话——而且他22年前就知道了，但他从来没有报警。[41]事实上，利亚姆·亚当斯成了新芬党的活跃成员，专门与年轻人打交道。[42]他最后在格里自己的贝尔法斯特选区获得了一份为当地儿童提供咨询的工作。格里随后声称，他出面劝过利亚姆，这可能不是最适合他的环境。[43]但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利亚姆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一年多。[44]

在曝光他很早就知道哥哥的禽兽之举后，亚当斯自己也抖出了一件事：他们的父亲老格里也是施虐者，他“在感情、身体、性行为上”都摧残过家人。亚当斯表示，他自己没有受到虐待，也不会具体说出他的九个兄弟姐妹中有谁遭受过这种伤害。此外，他强调自己直到成年后才了解父亲的施虐行为。亚当斯承认，爱尔兰生活对于性侵问题有一种“隐瞒文化”。[45]但他说现在他要公开自己的秘密，来帮助“其他身陷相同困境的家庭”。

一方面，这是个令人震惊的转折，也是一扇窗户，让人们窥见亚当斯为何城府如此之深：这是一个在隐秘的半封闭世界中长大的人，他养成了生存主义者那种敏捷而冷静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有些观察人士在这一令人不快的声明中发现了公关的巧手。欧雅·蒂勒尔后来指称，她称之为“大胡子”的叔叔敦促她不要将秘密公开，并动用所有权力阻止有关利亚姆的内幕流出。[46]当亚当斯主动说出自己成长于一个施虐家庭的故事时，他姗姗来迟地打破了助纣为虐的沉默法则。但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在他哥哥的事情刚刚曝光的时候，披露他父亲的行径呢？正如贝

尔法斯特的一名政治记者所言："他一定是知道，并且得到了其媒体顾问的建议，这样可以把注意力从利亚姆的事情上移开。"亚当斯对新闻媒体的运转机制了如指掌。新故事"将提供一个后续，给事情带来新的转变"，也许还能"为亚当斯赢得同情"。[47]

当被问及那些失踪者时，亚当斯往往断然否认他知道这种有争议的手段背后的决策。但是，这肯定是一种决策：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段怪诞而血腥的时期，在临时共和军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批准的情况下对人们执行处决，更不用说让他们失踪。[48]把尸体抛在无名之墓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一种政策。杜洛尔丝·普赖斯告诉埃德·莫洛尼，让人们失踪的决定是由贝尔法斯特旅做出的。该旅的成员"必须坐下来当机立断"，她说。[49]而格里·亚当斯就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

在安特里姆警察局，警察向亚当斯问及波士顿学院的采访。[50]据推测，他们重述了普赖斯和休斯等人的声明，并详细说明了他们对贝尔法斯特旅的结构所了解的情况。但是，亚当斯对这一切有一个简单而无可更改的回答。他们的理论只有一个问题：1972年他不可能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因为首先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说到熬过审问的最佳办法，亚当斯曾回忆他年轻时被关进"梅德斯通"号之前遭到逮捕和审问的经历。在那次审问中，他固执地坚称自己的名字不是格里·亚当斯。后来他承认，整个伪装显然是一场骗局，但也是"用来抵挡盘问的一种支撑"。[51]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这是他年轻时就拿定的主意。"所以，尽管他们知道我是谁，这也无关紧要。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

换作其他地方的其他政党，如果从政者在涉及一桩臭名昭著的对有十个孩子的寡母进行谋杀和秘密埋葬的悬案调查中被捕，很可能会落得政治生涯迅速终结的下场。然而格里·亚当斯是特例。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不仅在北爱尔兰，而且在爱尔兰共和国蓬勃发展，并取得了远超其领导层最为雄心壮志的声望和影响。即便如此，该党派的命运似乎仍与其魅力超凡的主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新芬党不乏年轻世故的代表，他们是在北爱尔兰问题最糟糕的时期结束后长大的，没有准军事暴力有失体面的污点。这批新人并不缺乏抱负，但他们不愿，或者不能，将这些老共和军挤下政治舞台。当亚当斯有效阻止其恋童癖哥哥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他所在的政党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不支持的言论。[52]新芬党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能力来呈现统一战线的表象，而其领导层现在辩称，逮捕格里·亚当斯无异于攻击新芬党本身。

一夜之间，一群艺术家在福尔斯路描绘了一幅新的壁画，画中的亚当斯面带微笑，旁边写着"和平使者，远见卓识的领袖"几个字。在为这幅壁画揭幕的集会上，马丁·麦吉尼斯宣称，这次逮捕"具有政治偏见"。他提到了未来几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和欧盟选举，并表示警方在这个时候让亚当斯蒙羞，其目的在于损害新芬党的竞选前景。麦吉尼斯指责警察部门还存有"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愤怒的残余势力"，现在这些人准

备“不惜一切政治代价算旧账”。[53]帝维斯公寓高楼耸立在远方，数百名支持者举着写有“捍卫和平进程，释放格里·亚当斯”的标语转来转去，下面是一张亚当斯的照片，与纳尔逊·曼德拉并排。[54]

当麦吉尼斯发表讲话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他旁边。此人头发灰白且剪得很短，前额很高，眉头紧锁。他嚼着口香糖，手里为麦吉尼斯拿着演说稿。这个人就是博比·斯托里——共和军的资深执行者。[55]在共和党的圈子里，他被亲切地称呼为“大博比”。有鉴于那些声称格里·亚当斯因为和平使者的身份而招致对抗的天花乱坠的言论，大博比在这个场合的出现显得很不和谐。20世纪70年代，他在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共和军，最后蹲了20年监狱。[56]和平进程开始后，他成了贝尔法斯特的新芬党主席，但他经常被描述为共和军的头号间谍头目。事实上，据说他是2002年卡斯尔雷警察局盗窃案的策划者。[57]斯托里也被许多人认为参与了另一起抢劫案——北方银行抢劫案。[58]劫匪在这起案件中抢走了2600万英镑，这是当时英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银行抢劫案。[59]最重要的是劫案发生的时间：银行在2004年12月遭到抢劫，也就是《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几年之后。共和军已经不再需要钱来购买武器。事实上，劫案发生的时候，该组织正在放弃武器，由里德神父监督的解除武装的过程当时几乎已经完成。在新芬党的批评者看来，这起抢劫案巩固了共和军已经演变成黑手党组织的印象。“你可以说我陈腐，但以前是有规矩的，”杜洛尔丝·普赖斯在抢劫案发生后写道，“战争结束了，他们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要抢这些钱？”[60]

大博比是亚当斯的密友，但他有着一副恶棍的模样。[61]他站在壁画前拿起麦克风，对可能促使当局“敢动我们的政党领袖”的傲慢态度怒吼起来。[62]“我们有话要传达给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和那些阴谋集团，”然后他说，“要知道，我们没有离开。”[63]

对任何听到这些话的贝尔法斯特人而言，其中的暗示再清楚不过。斯托里十分有意地引用了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最著名的片段之一[64]：19年前，亚当斯在演讲的时候被一个起哄者打断，对方大喊：“让共和军回来！”接着亚当斯回应：“要知道，他们没有离开。”听到大博比的这番话，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一阵寒意袭来。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一直在努力获取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带，并且对格里·亚当斯被逮捕感到高兴。[65]然而现在却有人发出了明确的威胁。[66]

麦克斯也从这句话中听出了纯粹的恐吓。[67]“他的意思不是新芬党没有离开，”他说，“他的意思是共和军。”对参加“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人而言，其中的信息十分清楚。“我根本不关心新芬党和政治进程，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里奇·奥拉韦说，“我只在乎真相。”然而，斯托里却在告诉那些敢开口的人，他们不仅冒犯了格里·亚当斯，还冒犯了共和军。对奥拉韦而言，这座城市突然让他感到危险。共和军本身不必对他进行什么制裁。有了斯托里的这番说辞，一些渴望成功的毛头小子可能为了取悦领导层而响应战斗的号召。[68]

一个新的绰号“波士顿学院叛徒”开始以涂鸦的形式在贝尔法斯特各处的建筑上出现。[69]在一篇标题为“波士顿定时炸弹”的报道中，《周日世界报》描述了共和党圈子内对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恐慌状态”，并且曝光了另外一些据称接受过安东尼·麦金太尔采访的人员名单。“麦克斯做到了无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没有做到的事，他把好人变成了叛徒。”[70]一位前共和军成员对这家报纸说。麦克斯已经告诉他的孩子们不要在有人敲门的时候去开门，并且开始查看他的汽车底部有没有爆炸装置的迹象。[71]



贝尔法斯特的涂鸦

“有人不断对我进行恶意、虚假、阴险的指控，说我参与了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亚当斯在四天的审讯结束后被释放时宣称，“我没有参与对麦康维尔女士的绑架、谋杀和埋葬，我是清白的。”[72]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对他的指控是一场“骗局”，并强烈要求埃德·莫洛尼解释为什么他要在2010年对杜洛尔丝·普拉斯进行后续采访。“就是那次采访”，以及布伦丹·休斯和艾弗·贝尔的采访，“成了我被捕的主要原因”，亚当斯说。[73]现在重要的是专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他强调。“共和军不存在了，结束了。”[74]亚当斯坚持道，但斯托里的言论却让他的话不那么令人信服。

释放亚当斯后，北爱尔兰警察局向公诉机关提交了一份关于他的文件，后者现在将决定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对他进行谋杀指控。[75]看起来亚当斯可能真的陷入了危险境地——这可以说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喜闻乐见的事态发展。

但那个时候，普赖斯已经死了。她非常清楚美国对她的波士顿学院采访上演的法庭之争，但她表示漠不关心。“我已经把它抛在脑后了，”她在2012年夏天说，“我不会为此睡不着觉。”[76]但是，她酗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次年1月，她因为醉酒从楼梯跌落而住进了医院。不久她主动出院回到了马拉海德的家里，继续喝酒，

服用镇定药。她去世的那天，儿子丹尼早上出门之前看了看她，发现她在床上睡觉。[77]等他晚上回去的时候，她一点也没动。[78]“她没有呼吸，”他后来说，“我立刻明白她死了。”尸检发现，她的血液里有抗抑郁药物、镇静剂和抗精神病药物的有毒混合物。[79]（她死的时候体内没有酒精。）杜洛尔丝享年62岁。[80]

1975年，当普赖斯姐妹在监狱请求恩假为母亲送殡时，她们没有获得准许。[81]但在2013年，当局允许玛丽安离开监狱数小时，让她去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的老家为姐姐守灵。[82]第二天，安德森斯顿路沿街的灯柱挂起了黑旗，斯蒂芬·雷和两个儿子在冰冷的雨中抬着灵柩向圣阿格尼丝教堂走去，身后跟着长长的送殡队伍。[83]

一位头顶一圈白发、戴眼镜的牧师念诵了追思弥撒，他是雷蒙德·默里大主教。当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阿马监狱服刑时，他是那里的神父。1983年，杜洛尔丝和斯蒂芬在阿马教堂秘密结婚时，是他主持的仪式。“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活出了杜洛尔丝这个名字的含义，”默里说，“毫无疑问，她的洗礼名是为了纪念七苦圣母。”[84]他回忆了她早年在学生时代参加抗议的故事，以及她为绝食抗议付出的终身代价。[85]她的老朋友兼共同被告休·菲尼参加了弥撒。他指出，40年前，他和格里·凯利、杜洛尔丝以及玛丽安一同发起了绝食抗议。[86]如今，杜洛尔丝即将入土为安，菲尼在出席她的葬礼，玛丽安回到了监狱，格里·凯利则投身政治。凯利成了一名新芬党政客，并且早已和普赖斯断交，他没有参加葬礼。普赖斯的老指挥官格里·亚当斯也没有现身。

教堂外大雨倾盆。那是贝尔法斯特一个阴沉的冬日，寒风凛冽。随着送葬者走出教堂并开始缓慢地走向弥尔顿公墓，数百把黑伞陆续撑开。灵柩上包裹着一面鲜艳的爱尔兰三色国旗。有那么一会儿，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木筏，随着黑暗的浪潮在波涛起伏的海上飘荡。

“我们不能继续假装40年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失去、牺牲、牢狱之灾和残暴没有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灵魂和精神造成影响。”普赖斯的老朋友贝尔纳黛特·德夫林在送葬者到达墓地后说道，她于20世纪60年代领导过学生抗议活动。“它击碎了我们的内心，它击碎了我们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的观点，它让每一天都变得艰难。”[87]

埃蒙·麦卡恩也发表了墓旁致辞。他谈到了普赖斯的矛盾，说他爱了她40年。“如果说杜洛尔丝有什么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她过于迫切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是其他许多人想做却没能做到的，”麦卡恩说，“她是一个解放者，但却从未将自己从那些信念中解放出来。”[88]大雨不断冲刷着积水的地面，哀悼者们挤在雨伞下。“有时候，”麦卡恩说，“我们是理想的囚徒。”[89]

当验尸官问丹尼·雷他的母亲是否说过想自杀时，他回答她没有直接表达过这种意图，但说过“她的病症有自我毁灭的特性”。[90]验尸官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因为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在普赖斯人生最后几

年和她关系密切的卡丽·图米认为，实际上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伦丹也一样，”图米提到休斯时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杀。”[91]

“身体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机器。”休斯在波士顿学院的采访中告诉麦克斯，他讲述了绝食中令人精疲力尽的变化过程。“身体会先消耗所有的脂肪组织，然后开始以肌肉为食，以延续大脑的生存。”在休斯和普赖斯结束抗议并试图重新融入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依然心怀旧怨，并不断在脑海中回放战争中最令人憎恶的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从未停止自我毁灭。验尸官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官方声明是“意外死亡”。[92]

墓旁致辞结束后，送葬的人群安静下来，只剩下倾盆大雨和头顶灰暗的天空中一架盘旋的警方直升机遥远的轰鸣。[93]灵柩入土之前，有人把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旗取下，将这块被雨水浸透的鲜艳布料叠好，交给了普赖斯的两个儿子。

二十九　这是过去

2015年秋天，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特蕾莎·维利尔斯公布了一项由北爱尔兰警察局和英国情报部门完成的有关准军事活动的调查报告。“活跃于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所有主要准军事组织依然存在。”报告宣布，并具体指出其中包括临时共和军。尽管“规模大幅减小”，但临时共和军在持续运作，并仍然能获得武器。[1]大博比·斯托里说的没错：他们没有离开。

格里·亚当斯驳斥这个报告是“无稽之谈”，但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维利尔斯宣称，在临时共和军的普通士兵看来，共和军的军事委员会——也就是几十年来指挥武装斗争的七人领导集团——“以一种整体战略框架”在继续控制共和军，同时也掌控着新芬党。共和军仍然在幕后秘密地发号施令。报告小心地指出，该组织不再参与暴力行动，而且现在“完全专注于政治”。尽管如此，借用《爱尔兰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言，这似乎巩固了人们对“戴面具的恐怖分子操控政治表演的看法”。[3]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已过去将近20年，除了异见分子偶尔发动的袭击，如今的北爱尔兰太平无事。然而，整个社会依旧四分五裂。天主教和新教社区之间仍然有蛇腹型铁丝网划分界线，所谓的和平之墙如同大理石上的裂缝般贯穿城内。事实上，现在的和平之墙比北爱尔兰问题的高潮时期更多。这些高大的建筑将这座城市的居民如同动物园的动物般隔开，维持了一定的安宁。但城墙上仍然写有符文一样的污言秽语——城墙的一边写着代表“Kill all Taigs”的K.A.T.，意即灭绝天主教徒，另一边则写着代表“Kill all Huns”的K.A.H.，意即灭绝新教徒。

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显得热闹非凡，几乎给人一种国际性都市的印象。和其他任何繁荣的欧洲小城一样，这里由水石书店、尼路咖啡和科颜氏等连锁店主导。当地的电影制作基地泰坦尼克制作室因为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在此拍摄而闻名。这里甚至还有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北爱尔兰问题之旅，曾是参战者的计程车司机会带游客参观动乱年代的冲突之地，向他们解说随处可见的壁画，讲述其中描绘的著名战斗、殉道者和枪手的故事。北爱尔兰问题在这些游览和解说中似乎变成了遥远的历史。

但事实上，大多数居民仍然生活在以宗教划分的社区里，而且北爱尔兰九成以上的儿童继续在宗教隔离的学校上学。[4]贝尔法斯特的部分公交站被非正式地指定为天主教专用或新教专用，人们会为了避免麻烦而走到一两条街区以外的站点等车。新教社区仍然飘动着数百面英国国旗，而天主教区域则常常能看到爱尔兰的三色国旗，或者巴勒斯坦国旗——以表示对该国的支持，但同时也是一种信号，表明许多北部的共和党人直到现在依旧认为他们是被侵略的民族。有一段时间，美国外交官理查德·哈斯就和平进程中未解决的问题主持了一系列多边谈判。但这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国旗的问题而破裂。[5]部族主义和其标志在贝尔

法斯特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各方无法就如何管理王权的展示达成一致。2012年，当贝尔法斯特市议会投票表决限制在市政厅上方升起英国国旗的天数时，抗议者试图攻占市政厅大楼，整座城市爆发了骚乱，统一派示威者用扔砖头和汽油弹的方式表达不满。[6]

鉴于这种持续不断的纷争，维利尔斯的报告发表了一则引人思考的评论。“这些准军事组织自停战后的存在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他们从极端暴力行为朝政治进程成功过渡。”报告声称。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发现，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观点，以至于回应这一报告的新闻风暴忽略了这一点。共和党和保皇派组织的继续存在并没有损害和平进程——而是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持续存在的统治集团赋予的“权力”，使得这些组织能够“影响、限制和管理”他们的成员，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迹象表明异见分子的存在”，而且被“领导层”迅速解决。

对于布伦丹·休斯、杜洛尔丝·普赖斯、玛丽安·普赖斯或者安东尼·麦金太尔而言，不允许任何对立的存在是新芬党自私、狭隘、无情的表现。但是，也许正如维利尔斯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只有通过这种残酷的纪律——坚持爱尔兰共和主义的整齐划一，对离经叛道的零容忍——才使得亚当斯和他周围的人设法掌控险象环生的局面，避免战争再度触发。

大约在维利尔斯发布报告的时候，贝尔法斯特检方宣布，他们打算对艾弗·贝尔涉及琼·麦康维尔谋杀案一事进行审判。“现在已经决定起诉这名被告。”[7]一名政府律师说。贝尔年近八旬，弯腰驼背，穿着开襟毛衣，胡子雪白，纤细的眉毛让他看上去像一个老巫师。他必须费一番周折才能爬上法院的楼梯。[8]然而，事态的这个发展似乎对格里·亚当斯发出了一个危险的转折信号。他在被捕后释放，目前没有遭到指控。如果贝尔因为“协助和教唆”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而受到审判，那么法庭证词很可能会提及究竟是谁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以及谁是执行者。像博比·斯托里这样忠于新芬党的公职人员也许愿意为了保护领导而替他入狱，但贝尔对亚当斯毫无忠诚可言。

在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贝尔和亚当斯是盟友。他们在贝尔法斯特旅密切合作，而且在朗·凯什一起蹲过监狱。[9]1972年，是贝尔坚持表示，只有让亚当斯出狱才能进行和平谈判，也是贝尔和他一起前往伦敦。贝尔极力支持推行武力，曾作为共和军“大使”访问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时期的利比亚，并从这个被孤立的国家购买大量重型武器运回北爱尔兰。[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晋升为共和军参谋长。但是，在博比·桑兹进行绝食抗议期间，新芬党采取了竞选方针，并开始让其他候选人竞选公职。如此一来，贝尔担心武装斗争的资源和精力被转移到了职位竞选上。[11]投票太多，拿枪太少。最终，贝尔和一些盟友对这一战略变得十分怀疑，他们密谋推翻格里·亚当斯。但亚当斯很快得知了他们的背叛，并迅速展开行动，以变节的罪名对贝尔进行军事审判——这一指控可能导致死刑。贝尔被判有罪，但等到处罚的时候，或许是出于对老友的忠诚，又或许是考虑到这一行动的后果，亚当斯出面饶了他一

命。于是，贝尔带着可能依然悬在头顶的死刑退出共和运动，在西贝尔法斯特过起了平静的生活。[12]自此以后，他拒绝对记者谈论他在共和军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期间，当大博比·斯托里四处向前临时共和军打听关于琼·麦康维尔的案件时，贝尔不愿帮忙。“去问格里，”他给斯托里提出了和杜洛尔丝·普赖斯一样的建议，“他才是你该找的人。”[13]

事实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贝尔才愿意开诚布公地讲述他的共和军生涯：在贝尔法斯特口述历史项目中接受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法庭上，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一个参与该项目的人在波士顿学院的录音中承认，他在麦康维尔的谋杀案中发挥了作用，但此人只有一个代号“Z”。[14]（对贝尔的指控最终由“协助和教唆”变成了“煽动”谋杀。）[15]

然而，贝尔杰出的贝尔法斯特律师彼得·科里根辩称，波士顿录音带“完全不可采纳”。[16]这一口述历史档案是“知识分子的学术项目，但充满了不准确性”，科里根声称。而且由于如此“不可靠和主观”，它并不符合刑事案件对证据要求的严格标准。[17]无论如何，科里根说，麦康维尔在1972年被绑架期间，他的当事人根本不在贝尔法斯特，而且他可以出示证据证明这一点。[18]

但是，这些争辩还算其次，贝尔有一个更为大胆的核心辩护：他不是Z。当麦克斯为“贝尔法斯特项目”进行采访时，他绝不会在录音和文稿上附加受访者的真实姓名，只用字母代号表示。每个人的真实身份都包含在独立的表格中。这些表格是将这些代号翻译为真实姓名的唯一文档。因为它们十分敏感，所以没有用电子设备发送过，而是当面交给伯恩斯图书馆的负责人鲍勃·奥尼尔。然而，现在看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波士顿学院遗失了部分表格——包括Z的表格。检察官们拿不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这位代号Z的受访者就是艾弗·贝尔。毫无疑问，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非常清楚Z是谁。[19]但他们明确表示丝毫没有配合法庭的意愿。这个案件“只有一个问题”，彼得·科里根说，“录音里的人是艾弗·贝尔吗？这一点谁也无法证实”。[20]

也许是惊讶于这一大胆的举措，检方宣布，他们打算传唤一名语音分析师。[21]“司法语音学”领域的专家有时会出庭作证，他们不仅对比声音的音调和音频，还会对词汇、语法，以及诸如“呃”和“啊”等典型的填充词进行比较。[22]不过，贝尔声称自己不是Z，有点像格里·亚当斯说自己不是共和军：这种伪装已经变成了一出闹剧。“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大部分参与者会跟麦克斯连续交谈数小时，以他热心的同僚态度，麦克斯往往会在称呼对方时省略姓氏直呼其名。因此，Z的录音中极有可能出现过麦克斯称呼Z为艾弗的现象。此外，贝尔剩余的采访语境令其Z的身份无可辩驳：有多少共和军成员在1972年陪同亚当斯一起参加和平谈判，后作为大使前往利比亚，而后晋升参谋长，最后因为变节而受到军事审判？[23]

语音分析师最后证明，Z“很可能”是艾弗·贝尔。但科里根说，即使政府能证实他的当事人是Z，贝尔的罪名仍然不成立。如果你听原始录

音，科里根提出："Z明确说明他没有参与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24]一名同样听过这段采访的北爱尔兰警察局警探提出异议，表示Z承认"在协助、教唆、建议、促成这桩谋杀案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5]

如果案件的焦点是教唆谋杀，那么问题在于：教唆谁？布伦丹·休斯和杜洛尔丝·普赖斯都坚定地声称，是亚当斯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但亚当斯现在似乎不会受到起诉。他于2014年接受北爱尔兰警察局的审讯后，档案被呈至检察机关。但是，公诉机关的负责人巴拉·麦格罗里不得不在这起案件中明哲保身，因为他同样身为律师的父亲曾做过亚当斯的代理人。[26]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北尔爱兰屡见不鲜。北爱尔兰警察局签发拘捕令逮捕亚当斯的警官名叫德鲁·哈里斯，他的父亲命丧于共和军之手。[27]然而，检方在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后得出结论，指控亚当斯的证据并未得到证实，不足以作为起诉的依据。[28]倘若亚当斯真的下达了处决琼·麦康维尔的命令，那么这一裁决使他正式逃脱了谋杀的罪名。如此看来，牵涉讲述者本人的口述历史可以用作起诉的证据，而牵涉他人的口述历史却不行。如果艾弗·贝尔遵从亚当斯自年轻时就死守的"绝不开口"的信条，他会做得更好。这也许能让他免于被起诉。

谁应该为共同参与的暴力历史负责呢？这是一个困扰所有北爱尔兰人的问题。"在法律面前，我的当事人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彼得·科里根就艾弗·贝尔如是说道。那些在血色星期天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英国士兵会受到同样的审判吗？[29]他问。"在和冲突相关的犯罪中，为什么所有人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从来没有建立任何处理历史问题的机制，对于几十年前的暴行，官方的解决方式完全是随机应变，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满。警方巡查员和政府特别调查都进行过审讯和调查。历史问题对刑事司法而言是一项大工程。每天，贝尔法斯特的报纸都会报道现在将要重新调查的悬案。北爱尔兰警察局有一个"遗产"部门，专门致力于调查和北爱尔兰问题相关的犯罪。[30]他们有将近1000桩积压待办的案件。

即使有人将警方的真诚和善意视作理所应当——而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待他们——从事这样的项目也不可能不被指责怀有偏见。当局所持的资源有限，预算被大幅削减，而且警方还要继续维持北爱尔兰目前的治安。对遗产部门的警探而言，有时他们似乎活在电影《阴阳魔界》的场景中：工作之外你生活在2018年，但投入工作的时候却永远是1973年、1989年，或者其他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血腥时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天主教警察马克·汉密尔顿，他的父亲是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中为数不多的天主教警察之一。当汉密尔顿于1994年加入警察局时，和平进程已经开始。他常说自己是"停火警察"，只想当一名普通的警员，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耗费在北爱尔兰问题接连不断的诉讼上。

有时，汉密尔顿会作为警方代表出席很久以前发生的大屠杀的听证会，尽责地扮演出气筒的角色。悲痛不已的受害者家属会表达心中的沮丧，他们承受了几十年的痛苦，却没有得到答案。他们不信任当局，而且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不予信任。有时他们会对他破口大骂，通常汉密尔

顿只是默默承受。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且他对那些被暴力夺走生命的受害者怀有巨大的同情。但偶尔他也会表示抗议。“这起犯罪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还穿着尿布，”他会说，“你们该恨的人不是我。”[31]

有时候，一些历史调查因为影响巨大或者高度敏感而完全交由其他机构处理。2016年，一项对“赌注刀”的新调查启动，由英格兰贝德福德郡的警察局长乔恩·鲍切尔主持，将有50名警探工作长达五年时间，预算可能超过3000万英镑。“由于时间的流逝和这些犯罪的性质，真相恐怕难以捉摸。”[32]

人们有理由相信，弗雷迪·斯卡帕蒂奇和他的英国上线都不会为他们密谋犯下的几十桩谋杀案负责。斯卡帕蒂奇还在躲藏，据说他已经隐姓埋名，受到了证人保护计划的庇护，而这个计划正是现在声称对他进行调查的政府实施的。[33]然而，2018年1月，他被英国警方逮捕。“一名72岁的男子被捕，”鲍切尔在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中表示，“他目前被关押在一个保密地点。”[34]斯卡帕蒂奇在接受几天的审问后被无罪释放。[35]英国当局很可能不会对“赌注刀”的阴谋追查到底，因为这么做会全面牵连英国政府。

斯卡帕蒂奇还是一个不容起诉的危险人物，因为他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对爆头小组的残杀提供了多少支持和帮助。如果政府将“赌注刀”置于任何他感觉必须开始揭露真相的境地，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就他的前共和军同志而言，斯卡帕蒂奇可能享有相似的豁免权。他对太多人掌握了太多的信息。说不定他隐藏了一批证据，把这份秘密档案锁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万一他遭遇不测，这些秘密将会被公开。[36]当他的父亲在2017年去世时，贝尔法斯特有传言说，弗雷迪偷偷返回城内准备出席葬礼。[37]送葬队伍由斯卡帕蒂奇家族的冰淇淋车引领。[38]对于任何对这位共和军的终极叛徒心怀怨恨的人来说，这是与他对峙的最佳时机。但就算他真的在那儿，谁也没有这么做。

如果斯卡帕蒂奇不会受到刑事起诉，或许能对他进行民事起诉。由于刑事司法系统留下的问责制空白，私人律师已经开始与客户签约并提起民事诉讼。[39]许多受害者家属对斯卡帕蒂奇提起了诉讼。[40]在拘捕令期间遭受酷刑的“蒙面人”也对曾经逮捕他们的人采取了法律行动。2015年，反叛乱权威弗兰克·基特森准将遭到起诉。年迈的他现在早已退休。他曾于2002年短暂地露过面，在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调查展开之前作证。他称赞枪杀13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伞兵是“极为出色”的队伍，并表扬他们“随时待命”的优秀素质。[41]但除此之外，他过着平静的生活。最近，他一直在帮妻子伊丽莎白·基特森夫人写一本励志书，讲的是她年轻时拥有的一匹用于表演的小马的故事。[42]

一个叫玛丽·希南的女人起诉了基特森。[43]1973年，她的丈夫被保皇派杀害。“没有人在乎，”她说，“我们就这样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希南在诉讼中表示，作为北爱尔兰问题初期英国反叛乱策略的策划

者，基特森“对于政府间谍是否会参与谋杀无所顾忌”。[44]当她被质问向一个老人提起这样的诉讼是否合适时，88岁的希南指出，基特森“比我小一岁”。[45]

这位小个子准将否认了这些指控，说他1973年已经离开了爱尔兰。他争辩道，他只是部队的指挥官，不是决定官方政策的人，英国对于北爱尔兰问题的宏观要旨不是他的责任。[46]他还强辩道：“我们从不教唆利用准军事团伙。”[47]

当警方和检方起诉前英国士兵时，有人指责他们是在对这些曾经的年轻人进行“猎巫”，因为这些士兵只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尽自己的职责而已。[48]面对这种带有偏见的指控，首席检察官巴拉·麦格罗里回应称，不存在“处理不公的现象”，而且对恐怖主义暴行的调查要远远超过对政府的调查案件。[49]但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偏见吗？有可能用共和党谋杀案的调查数量来恰如其分地标定保皇派的谋杀案吗？除了精确到一比一的比例，还有什么能让人们满意？北爱尔兰人会谈论“受害者层级”的危险。[50]影响愤怒情绪的并不是暴行的性质，而是受害者和行凶者之间的从属关系。从法律上讲，政府是否因为垄断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就应该被宽大处理？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应该对士兵和警察设定比准军事组织更高的标准？

根据一位学者所言，北爱尔兰问题中的“理想受害者”不是参战人员，而是被动的平民。[51]对许多人而言，琼·麦康维尔就是理想受害者：她是寡妇，是十个孩子的妈妈。在其他人看来，她根本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把自己引上绝路的间接参战者。当然，即使为了争论起见，有人认为麦康维尔是告密者，那也没有任何道德体系能为她的谋杀和失踪进行辩护。难道一个人对悲剧的认知一定要取决于他的立场吗？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说：“数万年来，对大多数人种而言，人类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总集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这个称呼止于每个部落或语言群体的边界，有时甚至止于一个村庄的尽头。”[52]就北爱尔兰问题而言，一种“互翻旧账彼此指责”的现象不断出现。如果有人说出琼·麦康维尔的名字，另一个人会说，那血色星期天呢？对此你可以说，那血色星期五呢？对此他们可以说，那帕特·菲纽肯呢？那拉蒙爆炸呢？那巴利墨菲大屠杀呢？那恩尼斯基林爆炸呢？那麦克格酒吧呢？那……那……那……

北爱尔兰警察局正在寻求有关琼·麦康维尔被害案的波士顿学院录音带的消息公布后，有人指责这一行动是偏见所致。这是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愤怒的残余势力最后一次试图歪曲正义，扳倒劲敌格里·亚当斯。如果警方对历史罪行感兴趣，为什么不要求获取保皇派的采访呢？保皇派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也犯下了许多谋杀案。波士顿学院在声明中亲口表示，警方“忽视阿尔斯特志愿军的录音”一事，支持了传票的下达是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53]英国政府对这一批评的反应，不是撤销获取共和党采访的要求，而是要求波士顿学院交出一份保皇派的采访，因为这几乎是校方自己发出的邀请。

警方获得了一张新传票，以获得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红手突击队成员温斯顿·丘吉尔·雷的录音。[54]雷有一个让人误以为无伤大雅的绰号“眨巴眼”，他和斯蒂芬·雷没有亲缘关系（更谈不上和温斯顿·丘吉尔沾亲带故）。为了阻止波士顿学院交出他的录音带，雷提起了诉讼。但他得到的结果和莫洛尼与麦克斯一样，录音带被交给了警方。最终，雷被指控数项罪名，其中包括在1991年谋害两名天主教男子。当他现身法庭否认指控时，他坐在轮椅里，弯腰驼背，白胡拉碴，双眼浑浊。[55]埃德·莫洛尼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北爱尔兰警察局罔顾他人利益，企图在获取波士顿学院录音带的做法中表现得一视同仁”。莫洛尼说，“眨巴眼”雷就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新教徒”。[56]

安东尼·麦金太尔也严厉批评了起诉雷的做法。他质问，如果当局对任何勇于谈论谋杀案的人提出指控，那么北爱尔兰问题的真相如何能水落石出呢？“我认为北爱尔兰警察局的态度是检举真相，而不是获得真相。”[57]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北爱尔兰警察局十分清楚麦克斯的批评，警局的人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公开评论。他是个话多的人，喜欢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们也乐于采访他。鉴于他有着对当权者讲真话的执着，那么当当局背信弃义的时候，他肯定不会保持沉默。但是，北爱尔兰警察局对他在201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的话尤其关注。在谈到波士顿档案的敏感性和机密性时，他说：“我不会透露任何细节，但我把自己暴露在了跟其他所有人完全一样的风险中。”[58]

麦克斯不仅作为采访者收集了共和党的口述历史，他还记录了一份自己的口述历史。[59]在给公诉机关的致信中，北爱尔兰警察局的警探提及了那次电视采访，并指出“他不仅谈论了自己的恐怖活动……而且反对北爱尔兰警察局获取采访的内容。言下之意，他担心在调查人员获取采访后，自己可能会遭到起诉。”

2016年4月的一天，麦克斯在德罗赫达的家中打开了一封波士顿律师发来的邮件。[60]“我写信是为了通知你，波士顿学院收到了一张随函所附的传票，要求获得你的‘贝尔法斯特项目’采访。”邮件说。当局声称，麦克斯被指牵涉多起罪行，从加入准军事组织，到1978年入狱期间持有仿造枪支，再到参与贝尔法斯特的爆破筒爆炸案行动。[61]麦克斯惊恐不已：整个口述历史记录了他在非法组织的生涯。他的叙述和其他前准军事组织成员一样，充满了他所犯下的违法行为。如果政府官员如他认为的那样想要抓他，如果这些罪行没有诉讼时效，那么政府可以欣然从他的口述历史中寻找线索，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莫须有的指控。[62]

在麦克斯看来，政府的奸诈最能体现在对他粗制滥造的指控中。如果警方真的查看过他们自己的记录，就会发现麦克斯不可能参与爆破筒爆炸案——因为事发时他正被警方拘留。[63]眼下看来，当局最终不会对他正式提起诉讼，但这并没有令他感到安慰。麦克斯和妻子卡丽都已

失业一段时间，而他们有孩子要抚养。事实上，他们到现在已经耗费将近十年时间专职处理“贝尔法斯特项目”造成的后果。他们依然担心共和军的报复，而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和政府对抗。麦克斯确信，政府对他的起诉纯粹出于报复——报复他对北爱尔兰警察局的公开批评，以及他拒绝配合当局确认Z的身份。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心里希望，要是他没有触碰历史，从一开始就拒绝承担“贝尔法斯特项目”，该有多好？

挖掘工作仍然在乡村继续进行。2010年，彼得·威尔逊的尸体被发现。[64]他是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死于共和军之手。他的遗骸是在安特里姆郡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滩被挖掘出来的。自他失踪后的几十年来，威尔逊的家人时常来到这片海滩，却对他的存在毫不知情。

波士顿录音带丑闻令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十分懊恼。[65]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公众担保，尽管波士顿学院一败涂地，但任何知道失踪者下落的人可以“用完全保密的方式”告诉委员会。[66]2014年秋天，他们得到的一则消息指出，乔·林斯基的遗体也许能在米斯郡一处特定的区域找到。曼彻斯特的退休警探杰夫·克努普费尔带领一组人马展开了工作。他们带上了一条寻尸犬和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并利用探地雷达寻找地下的反常现象。[67]到了12月，林斯基的侄女玛利亚抱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68]“我们希望并祈祷能找到乔的遗体，让他得到体面的安葬。”她说。但是，他们一连挖掘了数月也没有找到他。

然后，次年夏天的一天，有人在午餐时间大喊：“这里有东西！”[69]机械挖掘机停止工作，调查人员蹲在泥土里开始小心翼翼地用泥铲清理土壤。他们逐渐发现了一具骨架。尽管发现遗体的时刻难免有种苦乐参半的感觉，但沉默寡言、有条不紊的杰夫显得异常兴奋。有人通知了玛利亚·林斯基，她随后驱车前往现场。[70]

挖掘小组夜间还在工作，大约到了8点30分，墓穴旁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调查人员在墓穴的尸骨下面有了新的发现：第二具人体遗骸。[71]搜索者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这里有两具尸体埋在一起，其中一人压在另一人身上。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寻找乔·林斯基。但他们发现的却是被杜洛尔丝·普赖斯送往刑场的两个三重间谍——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72]玛利亚·林斯基悲痛不已，但也为赖特和麦基的家人感到高兴。在谢默斯·赖特的追思弥撒上，他的姐姐布蕾吉发出了一项特别的请求，希望知情者提供有关林斯基和其他尚未找到的受害者的信息。

2016年，都柏林的艾比剧院举行了新剧《塞浦路斯大道》的首场公演。这是由东贝尔法斯特剧作家戴维·爱尔兰创作的一部煽动性作品。这是一部粗俗的黑色戏剧，讲述了贝尔法斯特的保皇派埃里克·米勒的故事。他的女儿最近诞下了一个女婴，但埃里克却顿时起了疯狂的妄想：他觉得这个婴儿长得像格里·亚当斯。起初，这只是一个玩笑。埃里克问女儿，孩子的生父难道不是新芬党主席？有一次，当他和小婴儿单独在一起时，他拿起一支大记号笔在孩子的脸上画起了黑色的络腮胡子。“格里·亚当斯的大胡子是格里·亚当斯人格面具不可或缺的部分，”埃里克指

出，“它象征着他对革命的热情，对宪法改革的热情。如今随着胡须的变白，它巩固了其幕后掌权者的地位和老去哲人王的身份。”[73]

埃里克由斯蒂芬·雷扮演。自从前妻去世后，他一直在电影和戏剧中稳步发展，至今尚未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谈论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人生或遗产。然而现在，他扮演了一个仍然备受格里·亚当斯困扰的角色。埃里克的妄想越来越严重，对他而言，亚当斯似乎代表了他作为贝尔法斯特新教徒和保皇派面临的所有威胁。他开始相信，这个婴儿实际上就是格里·亚当斯。当亚力克在当地的公园遇到一个叫斯利姆的保皇派枪手时，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我认为格里·亚当斯把自己伪装成了新生儿，成功地渗透到了我的家里。”[74]

斯利姆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这正是他的做派！”

这部戏剧滑稽而荒诞，但却在可怕的暴力中结束。它审视了人们错乱的偏执，描绘了北爱尔兰这片土地被极度的反常所吞噬的情景，探究了人们深陷过去无法自拔的状态。

“这是过去。”埃里克在某个时刻对斯利姆说。

“不，这是现在。”[75]斯利姆纠正他。

“不，”埃里克说，“这是过去。”

2017年夏天，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在最小的弟弟比利因癌症去世后再次聚首。去世之前，比利和另外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为调查北爱尔兰社会福利机构中虐待儿童的现象出庭作证。“时间久了，我变得就像——怎么说来着？——就像机器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已经被高度体制化。”[76]他说。当比利因为癌症命在旦夕的时候，他向家人说出了自己的遗愿，他希望举行葬礼时让他遗体的脚先进入教堂，以此作为最后的反抗。[77]

“你是如此坚强和难以置信地勇敢，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勇敢。”[78]比利的女儿在葬礼上说。琼被带走的时候，他只有6岁。他去世时享年50岁。“整个世界都知道一位普通贝尔法斯特母亲的名字，她爱她的孩子。然而在1972年12月，她被残忍地绑架、杀害并秘密埋葬。”一位牧师说。她的失踪是“不可原谅的恶行，致使比利和他的兄弟姐妹骤然陷入了一生的噩梦”。[79]

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是否能如愿看到有人承担责任，这一点仍不清楚。迈克尔和他的兄弟姐妹出席了艾弗·贝尔案件的听证会，他们沉默地坐在旁听席上，作为一种道德见证。但在2016年12月的听证会上，贝尔的代理律师声称，他无法在这个案件中合理地接受审判——因为他患有血管性痴呆，不能“正确地遵从诉讼程序”。[80]政府宣称要检查贝尔的医疗记录，并亲自请专家诊断他的病情。[81]但是，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有人会因为这起谋杀案而受到审判。

在检方表示不会控告格里·亚当斯后，海伦咨询了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在控告参与1998年奥马汽车爆炸案的四名正牌共和军的案件中，该律师事务所赢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百万美元的和解。该事务所表示，海伦委托他们探索对亚当斯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82]“麦康维尔家族会坚持到底，”迈克尔说，“我们已经为正义斗争了40多年，我们不会就此罢休。”[83]

三十　未知

据官方统计，大约有3300万美国人——差不多占美国总人口的10%——拥有爱尔兰血统。我是其中之一，我父亲的祖辈于19世纪从科克郡和多尼戈尔郡移民至此。事实上，我的澳大利亚血统多于爱尔兰血统——我的母亲来自墨尔本——但我在波士顿长大，这里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虽然从未踏足故土，却仍然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我显而易见的爱尔兰名字，你或许认为我也一样。

但至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并非如此。如果说阿尔斯特的统一派“比英国人还英国人”，那么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有时似乎比爱尔兰人还要爱尔兰人。但我发现自己往往并不能领会诸如吉尼斯黑啤错用四叶草标志的老生常谈[6]以及部族团结的感性立场。我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波士顿，当时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共和军，即便当该组织犯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行径时也是如此。我依然记得父亲告诉我，就在我小时候所住街道的当地爱尔兰酒吧里，有人会拿着装满钱的罐子，请求客人为“那些伙计们”筹集资金。酒吧上方挂着黑色的花圈，以纪念死去的共和军。但我对北爱尔兰的冲突从未特别感兴趣。尽管我有这样的血统，但我读到北爱尔兰冲突时那种事不关己的感受，就像你看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时会产生的感觉一样。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从未写过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的报道，也没有特别渴望这么做。直到2013年1月杜洛尔丝·普赖斯去世，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她的讣告。文章叙述了她人生戏剧性的概况，但也提到了当时仍在发酵的波士顿学院秘密档案之争。作为记者，让我感到着迷的是集体否认的主题：各个群体的人们为了应对不幸或违法事件而告诉自己的谎言。我开始好奇，前参战人员的个人回忆档案竟然如此具有爆炸性：是什么让这些叙述在今天产生了如此大的威胁？在琼·麦康维尔、杜洛尔丝·普赖斯、布伦丹·休斯和格里·亚当斯交织的人生中，我看到了讲述一个故事的机会：人们是如何在毫不妥协地献身一项事业的过程中变得激进化的？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在历经磨练并终于有机会反思的时候理解政治暴力？

经过四年的研究和写作，当我即将完成这本书时，一些顽固的谜团仍未解开。而我知难而退地认定，这段黑暗传奇的整个真相也许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因为仍然知道真相的那一小群人准备将它带进坟墓。然而，就在我完成本书的手稿时，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当杜洛尔丝·普赖斯对埃德·莫洛尼讲述琼·麦康维尔人生最后的时刻时，她谈到她和“无名氏”的另外两名成员把麦康维尔送到了刚挖好的坟墓边。和她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同党是“无名氏”的负责人小帕特·麦克卢尔。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弄清在麦克卢尔身上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了。我采访了一个在臭名昭著的拉蒙饭店爆炸案刚刚发生后见过麦克卢尔的人。[1]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于1978年的贝尔法斯特，一个含有类似凝固汽油的爆炸装置导致12人死亡，30人严重烧伤。麦克卢尔在爆炸发生后被捕，并被警方拘留一周。这次经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而且他担心特殊分队似乎掌握了临时共和军的许多情报。“我不干了。”麦克卢尔告诉那个人。在贝尔法斯特，认识麦克卢尔的人告诉我，他离开北爱尔兰搬到了加拿大，并于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去世。

加拿大有许多姓麦克卢尔的人，当我试图追踪帕特·麦克卢尔的家人时，我找不到他们。后来有一天，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之所以在加拿大找不到小帕特的家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搬到那里。[2]相反，拉蒙爆炸案发生后，麦克卢尔带着妻儿逃离贝尔法斯特搬到了美国。事实上，他的家人一直住在康涅狄格州，离我在纽约的住址不远。

麦克卢尔卒于1986年。[3]去世之前的五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柴郡惩教机构当守卫，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4]我跟和普赖斯姐妹一起轰炸伦敦并进行绝食抗议的“无名氏”成员休·菲尼见过面，当得知自己曾经敬重的麦克卢尔后来竟然成了“狱警”时，他虽然沉默不语，却感到大为震惊。我联系了麦克卢尔的遗孀布蕾迪和他们的孩子，看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交流。毕竟，杜洛尔丝·普赖斯说他就在琼·麦康维尔的死亡现场，而且描述了他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参与的其他臭名昭著的事件。但他的家人没有兴趣和我对话，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未发现，他们心目中挚爱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战犯。麦克卢尔的一则讣告中指出，他是当地天主教会的教区信徒。[5]我想知道，他在去世之前是否进行过忏悔？

有几年，我会定期去布朗克斯和埃德·莫洛尼见面。最后，他把对杜洛尔丝·普赖斯进行的两次长篇采访的其中一篇未发表的手稿分享给了我。这份文档密密麻麻地写满了30页。在把它交给我之前，莫洛尼做了一项重要的修改——他删除了在麦康维尔坟墓边第三名执行者的某些识别信息。他的理由很简单：普赖斯和麦克卢尔都已离世，但这第三个人依然健在。这个时候，莫洛尼几十年来记录北爱尔兰问题真相的项目已经给许多人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法律困境，他可能不想再制造更多麻烦。

不过，我收集了有关这个神秘角色的一些信息。一段时间之前，我们在德罗赫达吃晚饭的时候，安东尼·麦金太尔告诉我，杜洛尔丝·普赖斯从未在波士顿学院的录音采访中谈及琼·麦康维尔的命运。但私下里，她告诉了他发生的事。她对麦克斯讲述了她告诉莫洛尼的有关三人行刑小组和无名之墓的故事。和莫洛尼一样，麦克斯告诉我，帕特·麦克卢尔和普赖斯都在现场。同样和莫洛尼一样，麦克斯拒绝透露这个第三者的身份。不过他告诉我，就是这第三个人扣下了杀死琼·麦康维尔的一枪。而且他还给了我一个线索：有一次，格里·亚当斯请这个枪手做他的私人司机。[6]

这似乎是个有希望的线索。我心想，把这些年给亚当斯当过司机的人全部找出来应该不难。但麦克斯接着告诉我，这个凶手从来没有接下这份工作，而是拒绝了亚当斯的提议。因此，在向我抛出这个诱人的信息后，他差不多让我回到了原点。最后，我断定自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杀手的真实身份，他/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氏”。

当莫洛尼把采访普赖斯的手稿给我时，我如饥似渴地快速读完了整个文档，然后不断针对本书涉及的事件一连数天仔细研读特定的章节。在完成手稿之前，我决定从头到尾把整个采访再读一遍，以防忽略了任何重要的细节。读到文档的第12页时，我意外发现了之前未觉察的信息，一下子坐了起来。

莫洛尼在手稿中问到了格里·亚当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共和军的各个编制单位中承担的职位。在某个时刻，普赖斯说：“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成了旅长——因为他想让我妹妹做他的司机。”[7]

她说得很随意，而且是附带的话，莫洛尼没有追问，也没有插话。

“你知道，他总是得有人给他开车，”普赖斯继续道，“不过她拒绝了，因为这个差事太无聊。”

玛丽安·普赖斯不愿为这本书接受我的采访，她的贝尔法斯特律师拒绝了我的各种提议。当我找到她的其中一个女儿时，她礼貌地要求我以后不再联系她。在公众的认知中，杜洛尔丝·普赖斯和琼·麦康维尔失踪案的关联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从未想过她的妹妹可能也参与了这起谋杀。

诚然，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我东拼西凑的信息并不能有效证明玛丽安·普赖斯有罪。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一定有其他人拒绝过给格里·亚当斯当司机的提议。不论是真是假，亚当斯的代表告诉我，任何表示亚当斯可能向杀死琼·麦康维尔的凶手提出这种提议的说法，“和许多其他跟这一案件有关的声明一样，绝对是假的”。[8]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莫洛尼在给我的采访手稿中隐去了枪手的名字，但北爱尔兰警察局从波士顿学院也获得了采访的原稿——而这个版本没有被修改。如果杜洛尔丝·普赖斯在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中牵涉了自己的妹妹，同时贝尔法斯特警方知道这一点，难道他们不会就这一罪行控告玛丽安·普赖斯吗？

未必如此。普赖斯也牵涉了格里·亚当斯，而且布伦丹·休斯的口述历史证实了她的话——但亚当斯并没有被起诉。艾弗·贝尔和安东尼·麦金太尔受到的法律制裁似乎表明，如果一个人在“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口述历史中牵涉了自己，这些内容便可以用来在法庭上指控他。但如果他牵涉了其他人，这就只是一种传闻，而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

玛丽安·普赖斯是琼·麦康维尔墓穴边的第三个“无名氏”成员，而且射

出了对麦康维尔的致命一枪，这个推测我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毕竟，普赖斯姐妹都是“无名氏”成员，并且都听命于帕特·麦克卢尔。正如杜洛尔丝常说的，她们总是一起行事。如果杜洛尔丝向埃德·莫洛尼用最为激烈的措辞对琼·麦康维尔进行指责，并不时强调她的死合情合理，那么这也许表达了她所感受到的压力，因为她不仅要努力用某种巧言令色的道德准则来辩护自己的行为，还要为妹妹犯下的更为严重的罪行进行辩护。

2018年春天，我最后一次飞往贝尔法斯特，然后乘火车前往德罗赫达。我告诉麦克斯和卡丽，我要跟他们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一天晚上，我们在博因河岸边的一家餐厅见了面。随着窗外的夕阳落下，我对他们列出了我认为玛丽安·普赖斯是杀害琼·麦康维尔的凶手的理由。麦克斯点了一杯威士忌，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盯着那杯酒。他承认他告诉了我格里·亚当斯提议玛丽安给他开车的事，但他表示他无论如何不会确认玛丽安是不是那个枪手。卡丽提醒我，她和麦克斯结婚的时候，玛丽安是她的伴娘。玛丽安身体不好，他们指出，而且这种指控的曝光可能会给她已经成年的孩子们间接造成负面影响。但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说我的推断是错的。

我还想跟另一个人对话，杜洛尔丝认识这个人，并且在去世之前对其倾吐过心中的秘密。我向对方说明了我的推论，并询问杜洛尔丝是否提到玛丽安在杀害麦康维尔的过程中扮演过任何角色。这个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杜洛尔丝说过，对琼·麦康维尔执行死刑是“姐妹俩共同所为”。[9]

最后，我致信玛丽安的贝尔法斯特律师，详述了我所掌握的信息，并表达了出版的意图。我问他，玛丽安是否会否认我的推断，但他一直没有回信。[10]

2017年末，格里·亚当斯宣布，他将从新芬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将权力移交给该党的资深代表玛丽·卢·麦克唐纳。48岁的麦克唐纳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步入政坛，因此她没有沾染准军事组织的历史。有些观察人士怀疑，亚当斯是否会在幕后继续掌权。[11]但他承诺自己无意玩“木偶游戏”，而是真的打算退休。

亚当斯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他仍然精力充沛，但行动稍显迟缓。作为他一直以来最强大的资产之一，他的声音不再那么铿锵有力，标志性的络腮胡子也已变得雪白。长期以来，不论战争还是和平，马丁·麦吉尼斯一直是亚当斯的同志。去年春天，他因为罕见的遗传病离世。“马丁·麦吉尼斯不是恐怖分子。”亚当斯在麦吉尼斯的墓旁致辞中庄重地说道，众人随之鼓掌。“马丁·麦吉尼斯是自由斗士。”[12]

当然，不论对他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来说，亚当斯都透露着一丝危险。根据民意调查，就连新芬党的选民都不相信他声称自己从未加入共和军的言论。而且北爱尔兰经常有人说，他仍然有“一股火药味”。[13]但

神秘莫测就是亚当斯的特质，随着他准备退出政坛，他又一次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公众形象。现在，他经常目光闪烁地扮演名人祖父的角色——一个拥有偶像地位却平易近人的老爷爷。推特见证了这一离奇发展的顶峰，亚当斯在推特上悉心打理他受欢迎的账号，不厌其烦地发送无聊的推文评论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同时附上一系列猫咪的照片。[14]他还不吝啬于表达对浴缸泡澡、橡皮鸭和泰迪熊的赞美之情。（“我喜欢泰迪熊，”他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收集了很多泰迪熊。”）[15]一位爱尔兰作家把这种夸耀比作“查尔斯·曼森向你展示他收集的茶壶保温罩”。[16]有时，这种自信地表达古怪念头的做法似乎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算计。来自西贝尔法斯特的记者马拉奇·奥多赫茨在亚当斯的传记中表示，这位新芬党领导人倾向于“为自己的人性做宣传”。[17]

然而日积月累下来，亚当斯的推特反映了一个长久以来多次绝处逢生的人那种忘乎所以的心态。他曾遭遇保皇派枪手的暗杀并险些丧命；他曾被英国政府关进监狱施以酷刑；他在冲突中幸存下来并协助结束了斗争，而且建立了一个极其成功的政党，不仅在北爱尔兰颇具影响，甚至在爱尔兰共和国也是如此。历史学家阿尔文·杰克逊写道，对亚当斯而言，民主行动“是将武装斗争积聚的政治资本变现的方式，否则这些资本将无法收回”。[18]

在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一次对话中，布伦丹·休斯用比喻的形式说过类似的话。把武装斗争看作一艘船的启动，休斯说：“让一百个人推着这艘船出海。这艘船困在了沙滩上，对吧，让他们把船推出去，然后这艘船出海航行，把那一百人留在身后。是的，这就是我的感受。船走了，在海上扬帆起航，带着所有的奢侈品，而把船推出去的那些可怜人却被遗弃，他们瘫坐在垃圾、淤泥、粪便和沙堆里，无人问津。”[19]

在感情上，你很难不对休斯报以同情。但在政治上，你又不可能不支持亚当斯。尽管他具有自我保护的反社会本能，而且在船上安然自得的他对休斯这样被遗忘的同志连看都不回头看一眼的表现确实令人胆寒，但实际上是历史遗弃了休斯。北爱尔兰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不论亚当斯的动机多么冷酷无情，也不论他采用了多么欺骗性的诡计，是他引导共和军走出血腥而棘手的冲突，步入脆弱但持久的和平。

即使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仍然不断强调，他从未放弃共和党人统一爱尔兰的基本抱负，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变了。从长远来看，这场战争可能会因为人口的变化而取得胜利。[20]据估计，北爱尔兰的天主教人口最快将将于2021年超过新教徒。这未必代表英国人很快会通过投票离开爱尔兰岛。在2008年的财政危机和都柏林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之后，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爱尔兰岛北部的大多数天主教徒更愿意留在联合王国。[21]“对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在人口上超过统一派也许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亚当斯曾说，“但这绝对算不上政治策略。”[22]

2016年夏天，英国民众以微弱的优势投票决定离开欧盟。这次公民

投票通过以后，英国公众才真正开始考虑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自《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以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有时似乎完全消失了。驻守的士兵和沙袋堆砌的检查站早已不见踪影，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无数满载货物的卡车往返于两国的国界。北爱尔兰能同时享受隶属于联合王国和作为欧洲的一分子所带来的利益，但英国脱欧不可避免地使得爱尔兰岛的分裂状态变得复杂。[23]而且，根据脱欧方案的执行情况，北爱尔兰最终也许不得不做出选择。

亚当斯对这些可能性表示接受。“我们这些希望爱尔兰统一的人必须非常谨慎，不能让别人指责我们利用脱欧为自己谋利，”他说，“但我认为，就公众讨论而言，爱尔兰统一的观点现在要普遍得多。”[24]他表示希望五年之内看到一次新的公投，来决定北爱尔兰是否该留在联合王国。[25]

如果英国脱欧公投无意中造成的一个长远结果是爱尔兰的统一，那么这至少是一件讽刺的事。毕竟30年骇人听闻的杀戮和大约3500条性命的牺牲都未能换来这样的结局。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笼罩在格里·亚当斯遗产之上的决定性问题。年轻的时候，他曾用一句重要的告诫来为政治暴力辩护，他写道：“只有实现民族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我才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之举。”[26]

亚当斯很可能活不到爱尔兰统一的那天，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不可避免。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共和军的暴力干预，爱尔兰的统一是否无论如何终将到来？就是这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令杜洛尔丝·普赖斯和布伦丹·休斯备受折磨。但在亚当斯的晚年，他看起来丝毫没有受到这种反省的困扰。2010年，当一位采访者问他，他身上是否负有血债时，他回答：“没有，我绝对问心无愧。毋庸置疑。”[27]

在贝尔法斯特郊外的乡下，迈克尔·麦康维尔为家人建了一栋宽敞现代的房子，房屋后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草坪，上面排列着一连串木制的屋舍。这些小木屋包含数百个狭小的空间，许多鸽子在里面咕咕鸣叫，跳来跳去。在战时的贝尔法斯特，年幼的迈克尔曾在废墟中寻觅野生鸽子的踪迹。长大以后，他养了数百只这样的鸟，并带它们参加赛鸽比赛。“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养鸽子的事没有出现过任何分歧。”[28]他边说边熟练地托起了一只鸽子。它转动脖子不安地盯着他，紫红和蓝绿相间的青灰色羽毛突然像孔雀一样变得色彩斑斓。

鸽子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29]它们对伴侣矢志不渝，对后代极尽保护。鸽子磨练耐力的方式就和运动员一样，循序渐进地增加飞行的距离。爱尔兰的赛鸽人会远行至英格兰或法国将鸽子放飞，然后它们会跨越海洋往回飞，顶着恶劣的天气，不远千里回到它们的栖身之处。有时，当它们经历漫长的比赛飞回家后，大量的体能消耗会导致它们体重减半。[30]但只要提供合适的食物和舒适的环境，它们就能在照料和滋养之下再次恢复竞飞的体力。

到了比赛的日子，迈克尔将鸽子放飞，很快它们便消失在视野中，但它们最终会飞回家。他一直很喜欢鸽子的这一点。它们会四处游荡，但它们的天性是飞回它们出生的地方。

附录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琼·麦康维尔的孩子们，他们其中几人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些对话并不容易，麦康维尔一家人以极大的尊严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我希望这本书真实而全面地讲述了他们家族的遭遇。

我要对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贝尔法斯特莱能大厅图书馆、都柏林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基尤英国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和罗伯特·F.瓦格纳档案馆，以及波士顿学院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和托马斯·P.奥尼尔图书馆。阿尔斯特大学互联网上的“冲突档案”（CAIN）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埃德·莫洛尼极其耐心地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他对北爱尔兰问题更广泛的见解。他还和我分享了几十年的调查研究所收集的关键材料，我十分感激他愿意这么做的同僚精神。安东尼·麦金太尔、卡丽·图米、里奇·奥拉韦和休·菲尼特别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回忆。海浪创伤中心的桑德拉·皮克、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的丹尼斯·戈弗雷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的利兹·扬都提供了帮助。在贝尔法斯特，我要感谢许多人的好客和情谊，以及他们对我的指导，其中包括格里·莫里亚蒂和希拉·莫里亚蒂，艾利森·米勒和保罗·霍华德（以及他们的儿子山姆），雷切尔·胡珀，达拉赫·麦金太尔和我的老朋友史蒂夫·沃比。我和乌拉赫·乔治在洛杉矶初次见面，后来在贝尔法斯特重新建立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她关于北爱尔兰问题分享的一些观察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放，并对这本书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在都柏林，我亲爱的朋友约翰·莱西、肖恩·奥尼尔和克洛达赫·邓恩给予了我照顾。我要特别感谢《纽约时报》的亚当·戈德曼，是他找到了帕特·麦克卢尔。塔拉·基南汤姆森好心地分享了她于2003年采访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手稿。詹姆斯·金钦怀特是一位坚忍不拔的档案研究员，对北爱尔兰问题尤其关注，他发现了本书中援引的部分政府文件。

写书可能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但我有幸和一些有才能的研究助理共事，有人协助调查一次性的项目，有人追踪的时间跨越数年，他们都让我感觉这本书更像是大家共同的结晶。诚挚感谢鲁比·梅林、琳达·金斯特勒、朱利亚·里科、凯蒂·怀布朗特、科尔森·林、杰克·麦考利和雷切尔·鲁班，尤其是维多利亚·比尔。埃米莉、果戈拉克和鲁思·马格利特对原始报道进行了事实核查，精益求精、不知疲倦的弗格斯·麦金托什对这本书进行了事实核查。毋庸讳言，书中若有任何差错则完全是我的责任。

2016年至2017年期间，我成为了新美国基金会中埃里克和温蒂·施密特基金为期一年的会员。感谢施密特家族对本项目的支持，感谢安妮玛丽·斯劳特、彼得·伯根、康斯坦丁·卡凯斯和阿维斯塔·阿尤布提供的机会。这本书初具雏形是在2016年4月，当时我在意大利科莫湖畔的洛克

菲勒基金贝拉焦中心度过了宝贵的几周，并利用那里的时间和空间开始写作。感谢克劳迪娅·尤赫、埃琳娜·翁加尼亚和皮拉尔·帕拉西亚提供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我在新美国基金会和贝拉焦中心以及纽约人文学院以本书的部分章节为题举行了数次研讨会，并对我在所有这些机构的研究伙伴们做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深怀感激。

我自年幼起便一直是《纽约客》杂志的忠实读者，如今我已成为该出版物的一分子，这仍然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感谢戴维·雷姆尼克、帕姆·麦卡锡、多萝西·威肯登和亨利·芬德为这本杂志付出的一切，感谢你们让我能从事这份工作。由衷感谢我忠诚的朋友丹尼尔·扎勒斯基，作为一名具有创新精神的编辑，他的努力让所有工作都更上一层楼。感谢我所有的同事，尤其是法维奥·伯托尼、安德鲁·马兰茨、泰勒·福格特、拉菲·卡察杜里安、雷切尔·阿维夫、戴维·古雷维奇、乔治·帕克、希拉·科哈特卡尔、乔纳森·布利策和西沃恩·博纳克。要不是布鲁斯·迪奥内斯，我也许仍在《纽约客》杂志的大门外。

双日出版社的比尔·托马斯从我们的初次谈话中便看到了将这个故事撰写成书的可能，并以其一贯的锐利眼光和沉稳风格编辑了本书的手稿。诚挚感谢比尔，以及马戈·希克曼特、迈克尔·戈德史密斯、托德·道蒂、丹尼尔·诺瓦克、利拉·戈登、威尔·帕尔默、玛丽亚·马西等双日出版社的所有朋友。同样感谢阿拉贝拉·派克为本书的手稿给予我的鼓励和指导，感谢她在伦敦威廉·柯林斯出版社的所有同事。一如既往，感谢我优秀的经纪人蒂纳·贝内特，以及WME公司的安娜·德罗伊、特雷西·费希尔和斯维特拉娜·卡茨。西娅·特拉夫以其无可挑剔的眼光帮我找到了书中的照片。感谢我的朋友兼同事菲利普·蒙哥马利，才华横溢的他为我拍摄了作者照片。感谢奥利弗·芒迪为本书设计了美丽的封面。

感谢迈克尔·施滕德尔奥尔巴赫、赛·斯里斯坎达拉杰、迈克尔·瓦希德·汉纳、莎拉·马贡、丹·库尔茨费兰、埃德·凯撒、林克·卡普兰、威廉·陈、亚历克斯·吉布尼、贾森·伯恩斯、戴维·帕克、安迪·高尔克、内特·拉维、琼·斯特劳斯、梅拉妮·雷哈克、埃里克·班克斯、马亚·亚桑诺夫、西蒙·卡斯韦尔、特雷弗·伯尼、努阿拉·康宁汉、基甸·刘易斯克劳斯和马修·蒂格，他们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我对父亲弗兰克·基夫和母亲詹妮弗·拉登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他们依然几乎是我所有写作的第一读者，当我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以及怎样的父母）时，他们仍然是我的榜样。特别感谢比阿特丽斯·拉登·基夫和格雷格·德·索札，以及特里斯特拉姆·拉登·基夫和卡洛塔·梅罗。我还要给E宝贝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十分幸运地拥有塔德乌什和埃娃这样的岳父母，没有他们在紧急关头伸出援手照看孩子，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

然而我最感谢的，是他们美丽而睿智的女儿尤斯蒂娜。虽然我们相识已经有20年，但我每天都为能和她共度人生而感到无比幸运。（她也

的确经常这样提醒我。）至于我们的儿子卢西恩和费利克斯，卢西恩刚刚对我说：“告诉大家这本书基本上都是我们写的。”准确而言，他们并没有为这个项目的完成推波助澜，但他们每天都给我的生活来带了欢乐与慰藉，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注释

关于本书资料的说明

《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是依据四年的调研、七趟北爱尔兰之旅以及对一百多人的采访完成的一本书。然而，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反应的内涵，有许多人拒绝和我对话，或者有人起初同意，后来却改变了心意。这似乎有些奇怪，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件竟然还能引发如此深刻的恐惧和痛苦。但正如我希望本书所阐明的那样，在贝尔法斯特，历史依然鲜活而危险。

回忆并不可靠，所以我竭尽所能为个体的回忆寻找确证的事实。对于不同的叙述之间出现矛盾之处，我在本书的主体内容中采用了最可信的版本，并在注解中对其他叙述或细微差别进行了拓展。

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纪实文学。所有的对话和信息都不是编造或想象得来的。我对人物有心理活动的描写，是因为他们对我或其他人讲述过那些想法，这些我都在注解中进行了说明。由于我选择讲述这个特定的故事，所以北爱尔兰问题有些重要的方面我没有涉及，比如本书很少提到保皇派的恐怖行动。如果你觉得有意犹未尽之处，我建议你阅读注解中列举的优秀书籍，其中有的对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描述，或者你可以选择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因为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错综复杂，且经常受到党派倾向的影响，所以书中描述的一些事件不免饱受争议，并且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为了避免在主体记叙中频繁地偏离主题，我选择在注解中处理这种争论。

除了采访，本书还依据了大量档案研究，包括许多同时代的新闻报道，以及未发表的信件和邮件、近期解密的政府文件、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回忆录、同时代的宣传、宣誓书、证人陈述、审讯报告、死因审理报告、验尸报告、证人证言、日记、档案视频和照片，以及电话录音。在叙述普赖斯家族的历史时，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杜洛尔丝·普赖斯进行的两次未经发表的内容广泛的采访，一次由塔拉·基南汤姆森在2003年完成，一次由埃德·莫洛尼在2010年完成。

尽管本书主要以我自己的原始报告为基础，但它吸收了一些北爱尔兰问题的资深记录者所著的开创性作品，其中的主要作者包括苏珊·麦凯、戴维·麦基特里克、埃德·莫洛尼、彼得·泰勒、马克·厄本、马丁·狄龙、理查德·英格利希、蒂姆·帕特·库根、马拉奇·奥多赫茨、苏珊娜·布林、艾莉森·莫里斯和亨利·麦克唐纳。在最初的几章中，我还采用了西蒙·温彻斯特和马克斯·黑斯廷斯发表的优秀新闻报道。我大量引用了许多杰出纪录片的内容，尤其是《失踪》（Disappeared，1999），《失踪》（The Disappeared，2013），以及由埃德·莫洛尼导演的《我，杜洛尔丝》（I, Dolours，2018）。

格里·亚当斯经常接受采访，但在得知我的调查主题后，他拒绝和我对话。他通过代表发送了一份声明，其中写道，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是漏洞百出、粗制滥造、自私自利之举”，而且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是新芬党领导层及其和平战略众所周知的反对者”。亚当斯一如既往地否认是他下达了杀害琼·麦康维尔的命令，也不承认他加入过共和军。但是，否认人尽皆知的事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你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贬值。在描述亚当斯的过程中，我依据了许多曾在共和军与他一起共事的人的回忆，以及亚当斯接受的其他采访和他自己的传记作品。

当我于2014年开始本书的项目时，埃德·莫洛尼将布伦丹·休斯完整的波士顿学院采访原封不动地给了我，它成了我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但除了这份口述历史，其他参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人谁也不愿和我分享任何采访。我一直未能获取杜洛尔丝·普赖斯、艾弗·贝尔或者本书中提及的任何其他参与者的口述历史，不过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让我能再现其中的部分对话。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带本该像酒窖里的酒瓶般不被打扰，直到未来的某一天，参与者们都已离世，学者们可以研究他们的证词来理解北爱尔兰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些录音带成了犯罪证据——以及政治武器，它们可能被用来控诉过去的罪行。但现在看来，它们将永远不会为研究人员所用。

几年前，波士顿学院开始通知口述历史项目的参与者取回自己的采访。面对如此容易引火烧身的材料，校方在处理的过程中由于麻痹大意而导致自己遍体鳞伤，如今他们想摆脱保管这些录音带的责任。许多参与者为此对校方提出质疑，其中包括里奇·奥拉韦。有一天，他收到了波士顿学院寄来的盒子，里面装有十多年前他和麦克斯对话的录音和文稿。一开始，奥拉韦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光盘和文稿拿到家里的书房，在壁炉里点上火。接着他打开一瓶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给自己斟了一杯。火光映照在墙上挂的带框照片上，他们是奥拉韦在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其中许多人已经离世。照片中有一份1916年的《复活节宣言》，帕特里克·皮尔斯在宣言中宣布爱尔兰独立。还有一张是布伦丹·休斯的照片。奥拉韦把证词扔进火焰里，然后他喝下葡萄酒，看着它燃烧。

缩写来源

采访

H-BC　布伦丹·休斯/安东尼·麦金太尔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文稿。

P-EM　2010年埃德·莫洛尼采访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未经发表的采访。

P-TKT　2003年塔拉·基南汤姆森采访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未经发表的采访。

法律诉讼

阿奇·麦康维尔证人陈述

亚瑟（阿奇）·麦康维尔的证人陈述，对琼·麦康维尔的尸体勘验，劳斯郡验尸官区，2004年4月5日。

波士顿学院撤销传票动议

波士顿学院董事会撤销传票的动议，2011年6月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M.B.D.No.11-MC-91078）。

政府反对撤销传票动议

政府反对撤销传票的动议并提议强制执行，2011年7月1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M.B.D.No.11-MC-91078）。

莫洛尼的贝尔法斯特宣誓书

埃德·莫洛尼就安东尼·麦金太尔申请司法审查一事的首次宣誓书（北爱尔兰高等法院，2012年9月12日）。

莫洛尼的马萨诸塞州宣誓书

埃德·莫洛尼的宣誓书，2011年6月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M.B.D.No.11-MC-91078）。

奥尼尔宣誓书

罗伯特·K.奥尼尔的宣誓书《关于：英国依据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就杜洛尔丝·普赖斯刑事案件达成的互相援助之协定所提出的要求》，2011年6月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M.B.D.No.11-MC-91078）。

普赖斯宣誓书

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宣誓书，Price&Price v.Home Office（高等法院，王座分庭），1974年4月23日。

其他报告和抄本

德·席尔瓦报告

《帕特里克·菲纽肯审查报告》，2012年12月12日。

HIA笔录

历史机构虐待行为调查，听证会笔录，2014年。

2011年5月16日，电话会议

埃德·莫洛尼、安东尼·麦金太尔、卡丽·图米、威尔逊·麦克阿瑟、鲍勃·奥尼尔和汤姆·哈奇之间的电话会议录音，2011年5月16日。

警方巡查员报告

《詹姆斯和迈克尔·麦康维尔就警方对他们的母亲琼·麦康维尔女士的绑架案和谋杀案的调查提出控告的报告》，北爱尔兰警方巡查员，2006年7月18日。

注释

序言　珍藏室

[1]Charles Donovan, Paul FitzGerald, and Paul Dunigan, History of Boston College：From the Beginnings to 1990（Chestnut Hill, Mass.：University Press of Boston Col-lege，1990），pp.2-3.

[2]“FBI Busts Librarian Accused of Stealing Books，”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8，1986.

[3]“Librarian Helps Foil the Theft of Irish Artifact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991.

[4]O'Neill affidavit.

[5]“U.S.Hands Over Bomber Dolours Price's Secret Interview Tapes to PSNI，”Bel-fast Telegraph, July 8，2013；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6]对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一　绑架

[1]“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2。关于琼的生日有一些矛盾的描述。她的女儿海伦说她出生于1935年，而琼墓碑上显示的死亡年龄为37岁，这也表明她出生于1935年。大多数新闻报道将她失踪的年龄描述为37岁。但根据我所获得的其出生证明，她实际上出生于1934年5月7日，也就意味着琼是在38岁时失踪的。

[2]除非另有注释，此部分的信息全部来自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数次采访。安妮·麦康维尔出生于1952年11月28日，去世于1992年9月29日，她患有结节性硬化症。关于琼生育14个孩子的信息源于Susan 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3]对阿奇和苏珊·麦康维尔的采访。

[4]出处同上。

[5]“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2；阿奇·麦康维尔的法庭证词。

[6]在大多数麦康维尔家孩子的记忆中，入侵者有八人。比如参看阿奇·麦康维尔的法庭证词。但在有些描述中，他们表示人数可能不止八个。海伦在接受苏珊·麦凯的采访时坚称那伙人有“四女八男”。但事实上绑架发生的时候海伦并不在家，她事后才回去。参看Susan 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迈克尔·麦康维尔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人数在10-12人之间。

[7]对迈克尔、阿奇和苏珊·麦康维尔的采访。

[8]“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Agnes McConville interview, Marian Finucane Show, RTÓRadio, November 23，2013.

[9]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0]阿奇·麦康维尔的法庭证词。

[11]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2]对阿奇·麦康维尔的采访；“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13]“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14]对阿奇·麦康维尔的采访；阿奇·麦康维尔的法庭证词。

[15]对阿奇·麦康维尔的采访。

[16]“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二　艾伯特家的女儿

[1]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该片由莫里斯·斯威尼执导，埃德·莫洛尼和努阿拉·坎宁安制作（New Decade Films，2018）。

[2]P-EM.

[3]P-TKT.

[4]“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5]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6]“Protest Now, Before It Is Too Late！”Irish People, January 12，1974；“‘Republi-canism Is Part of Our DNA，'Says IRA Bomber Dolours Price，”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7]P-EM.

[8]“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9]出处同上。关于这场越狱的详情可参阅UinseannÓ Rathaille Mac Eoin, The I.R.A.in the Twilight Years 1923-1948（Dublin：Argenta，1997），p.452。

[10]Tim Pat Coogan, The IRA（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2），p.185.

[11]P-EM.

[12]出处同上。

[13]出处同上，以及P-TKT。

[14]Dolours Price，“Gerry Kelly：He's Not the Boy I Loved，”Fortnight, September 2004.

[15]P-EM.

[16]在格里·亚当斯的其中一本回忆录中，开篇的“大事年表”始于1169年，这可能是一处无心而滑稽的夸大。Gerry Adams, A Farther Shore：Ireland’s Long Road to Peace（New York：Random House，2005），p.xi。

[17]Peter de Rosa, Rebels：The Irish Rising of 1916（New York：Random House，1990），p.268.

[18]Ruth Dudley Edwards, Patrick Pearse：The Triumph of Failure（Dublin：Poolbeg Press，1990），pp.7-8.

[19]Ruán O’Donnell，16 Lives：Patrick Pearse（Dublin：O’Brien Press，2016），pp.18，63.

[20]O'Donnell，16 Lives, pp.140-141.

[21]De Rosa, Rebels, p.89.

[22]O'Donnell，16 Lives, p.273.

[23]Flags and Emblems（Display）Act（Northern Ire land），1954.该法案于1987年被撤销。

[24]Price，“Gerry Kelly：He's Not the Boy I Loved.”

[25]出处同上。

[26]“Big Arms Haul in Belfast，”Irish Times, May 30，1938；“The Belfast Explosion，”Irish Times, May 31，1938.

[27]P-TKT.

[28]“Old Bailey Bomber Ashamed of Sinn Féin，”Village Magazine, December 7，2004.

[29]出处同上。

[30]Price，“Gerry Kelly：He's Not the Boy I Loved.”

[31]P-TKT.

[32]P-EM.

[33]出处同上。

[34]P-TKT.

[35]出处同上。

[36]出处同上；Dolours Price，“Gerry Kelly，”Fortnight, September 2004。

[37]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38]主要参看Michael Farrell, Northern Ireland：The Orange State（London：Pluto Press，1987）。

[39]Michael Farrell, Introduction, in Twenty Years On, ed.Michael Farrell（Dingle, Ireland：Brandon，1988），p.14.

[40]Marc Mulholland, Northern Ireland：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4.

[41]Daniel Finn，“The Point of No Return？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 Burntollet March，”Field Day Review no.9（2013），pp.4-21.

[42]档案镜头。

[43]常有报道称杜洛尔丝出生于1951年6月21日，依此判断她在这个时候应该是17岁。但根据我所获得的其出生证明，她实际上出生于1950年12月16日，因此1969年1月1日的时候她18岁。

[44]杜洛尔丝·普赖斯1974年1月28日写给家人的家书，收录于Irish Voices from English Jails：Writings of Irish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nglish Prisons（London：Prison-ers Aid Committee，1979），p.54。

[45]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致家人的信，两封信的落款日期都为1974年1月7日，重现于“The Price Sisters，”Spare Rib no.22（April 1974）。

[46]Dolours 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

[47]P-TKT.

[48]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49]Dolours Price，“Gerry Kelly，”Fortnight, September 2004.

[50]“Ulster's Price Sisters：Breaking the Long Fast，”Time, June 17，1974. 曾经的学生领袖迈克尔·法雷尔后来在其选编的作品序言中叙述了切·格瓦拉的死亡给他那个年代的爱尔兰人所带来的影响，参看Twenty Years On, p.11。

[51]这一描述源自普赖斯的档案视频，以及和了解他的人进行的交谈，其中包括汤米·戈尔曼。

[52]Tara Keenan-Thomson, 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1956-1973（Dublin：I-rish Academic Press，2010），p.146.

[53]出处同上，第146页。

[54]P-EM.

[55]P-TKT.

[56]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57]Bowes Egan and Vincent McCormack, Burntollet（London：LRS，1969），p.26.

[58]Max 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The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Taplinger，1970），p.71；Walter Ell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The Crippling Disadvantage of a Happy Irish Childhood（Edinburgh：Mainstream，2006），p.137；Ed Moloney and Andy Pollak, Paisley（Dublin：Poolbeg Press，1986），p.161.

[59]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84.

[60]Marc Mulholland, Northern Ireland at the Crossroads：Ulster Unionism in the O'Neill Years（London：Palgrave，2000），p.1.

[61]这句评论出自Max Hastings，“Why Britain is Committed in Northern Ire-land，”Irish Times, January 27，1972.

[62]Rudyard Kipling，“Ulster，”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Rudyard Kipling（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1994），p.243.

[63]P-EM；“Documents Shed More Light on Burntollet Attack，”Irish News, Oc-tober 15，2010.

[64]Ellis, Beginning of the End, pp.124，157.

[65]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66]Ellis, Beginning of the End, p.138.

[67]P-EM.罗尼·邦廷最终成为了爱尔兰国民解放军（INLA）的一名领袖。1980年，32岁的他被谋杀在床上。参看Martin Dillon, The Trigger Men（Edin-burgh：Mainstream，2003），pp.95-96。

[68]Laura K.Donohue，“Regulating Northern Ireland：The Special Powers Acts，1922-1972，”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1，no.4（1998）.

[69]Wallace Clark, Guns in Ulster（Belfast：Constabulary Gazette，1967），p.9.

[70]Bob Purdie, Politics in the Street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North-ern Ireland（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0），pp.213-214.

[71]Farrell, Northern Ireland, p.249；“End in Sight After Long March，”Guardian, October 27，2001.

[72]有些观察人士提出，民权抗议者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和共和军泾渭分明。理查德·英格利希写道，民权运动“是老共和军内部创立的一个新方案，就老共和军的共和派成员而言，此举的目的就是让北爱尔兰政府垮台”。Richard English, Armed Struggle：The History of the I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2.埃蒙·麦卡恩告诉我，在游行至德里的过程中，共和军曾在晚上以“保护”示威者的名义突然持枪出现。麦卡恩对他们的造访感到不满。

[73]Daniel Finn，“The Point of No Return？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 Burntollet March，”Field Day Review no.9（2013）.

[74]“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档案镜头。手持扩音器的人是迈克尔·法雷尔。

[75]Purdie, Politics in the Streets, pp.213-214；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22.

[76]Moloney and Pollak, Paisley, p.159.

[77]出处同上，第201页。

[78]Dolours Price，“Ideals Live On，”The Blanket, November 29，2006.

[79]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22.

[80]Ellis, Beginning of the End, p.137.

[81]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22.

[82]Moloney and Pollak, Paisley, p.168.

[83]Tommy 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From Insurrection to Parliament（London：Pluto Press，2011），p.42.

[84]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26.

[85]出处同上，第29-30页。

[86]“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Purdie, Politics in the Streets, p.214.

[87]Bernadette Devlin, The Price of My Soul（New York：Vintage，1970），pp.139-141；“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

[88]“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

[89]P-TKT.

[90]P-EM.

[91]P-TKT.

[92]“Attack on March—Bunting Fined，”Irish Times, March 11，1969；“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

[93]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p.31-32.

[94]出处同上，第33页。

[95]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86.

[96]“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

[97]出处同上。

[98]“Attack on March—Bunting Fined，”Irish Times, March 11，1969.

[99]出处同上。

[100]“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Riots Injure 120 on Belfast March，”Reuters, January 5，1969.

[101]“Battling Through to Derry，”Irish Times, January 6，1969.

[102]P-EM.

[103]Egan and McCormack, Burntollet, p.37.

[104]Dolours Price，“Gerry Kelly，”Fortnight, September 2004.

[105]Keenan-Thomson, 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 p.41.

[106]P-TKT.

[107]Purdie, Politics in the Streets, p.215；Michael Farrell，“Long March to Free-dom，”in Twenty Years On, p.58.

[108]鲍勃·珀迪写道：“许多攻击者佩戴有白色袖标，这便于将他们同游行者区分开来。伊根和麦科马克能从照片上识别出一些攻击者……许多是特殊分队的成员。这可以作为民权运动一个很好的宣传细节，但由于该地区的特殊分队成员大致跟健壮的成年男性新教徒重叠，这基本上表明进攻是由当地人发起的。”Purdie, Politics in the Streets, p.215.

[109]Dolours Price，“Gerry Kelly，”Fortnight, September 2004.

[110]出处同上。衣衫破损的信息取自“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三　撤离

[1]苏珊·麦凯基于对海伦的一次访谈写过一篇优秀的报道，报道称这张照片是在1965年拍的。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

2013.

[2]迈克尔、苏珊和阿奇·麦康维尔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都想起了那个安全别针。海伦告诉苏珊·麦凯她对此没有任何印象。这种情况在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中很常见，对于不幸的童年，他们往往有着矛盾的回忆。

[3]作者到访过阿沃尼尔路。

[4]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5]Séamus McKendry, Disappeared：The Search for Jean McConville（Dublin：Blackwater Press，2000），p.9.

[6]“Many Killed in Mass Air Attack on Belfast，”Irish Independent, April 17，1941；Ian S.Wood, Britain, Ireland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p.174-175.

[7]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8]McKendry, Disappeared, p.9.

[9]出处同上。以及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10]参看Edward Moxon-Browne，“National Identity in Northern Ireland，”in So-cial Attitudes in Northern Ireland：The First Report, ed.Peter Stringer and Gillian Robinson（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1）。

[11]CormacÓ Gráda and Brendan M.Walsh，“Intermarriage in a Divided Society：Ireland a Century Ago，”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56（2015）.

[12]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13]关于这一点，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有不同的描述。海伦的丈夫谢默斯·麦肯德里在其书中提到，外婆默里似乎并不在意这桩婚姻，而艾伯特和孩子们后来确实搬进了默里太太位于东贝尔法斯特的家中。但在琼·麦康维尔失踪后，她的几个孩子表示，默里太太事实上断绝了和女儿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和外孙们脱离了关系），因为琼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此举可能是因为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这种社交的越轨行为在50年代不那么引人注意。关于玛丽·麦康维尔对琼失踪一事不予关心，以及琼遭舅舅痛打的信息，参看McKendry, Disappeared, p.10。迈克尔·麦康维尔告诉我：“母亲的家人不愿和我们有任何瓜葛，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在代表詹姆斯·麦康维尔[7]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中也有相同的声明：“他们的母亲已经被其家人抛弃。”Application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in Relation to the Death of Jean McConville, filed by Joe Mulholland&Co.，Solicitors, on behalf of James Mc-Conville, May 23，2013.

[14]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9.

[15]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16]McKendry, Disappeared, p.10.

[17]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18]McKendry, Disappeared, p.10.

[19]Moloney and Pollak, Paisley, p.89.

[20]McKendry, Disappeared, p.10；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21]English, Armed Struggle, p.102.同时参看Russell Stetler, The Battle of Bogside：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Sheed and Ward，1970）。

[22]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p.142-143.

[23]档案镜头。

[24]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143.

[25]纪录片The Burning of Bombay Street（BBC One Northern Ireland，2011）中一位目击者的陈述。

[26]Seamus Brady，“Eye witness Account of Events in Belfast，”August 22，1969，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同时参看Burning of Bombay Street。

[27]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47.

[28]《爱尔兰时报》《卫报》以及其他媒体来源引用了相同的数据。这一数据似乎出自蒂姆·帕特·库根：据信，1969年7月至9月间，有1820个家庭从家中逃离。其中包括315名新教徒和1505名天主教徒。参看“Day the Troops Marched in to Nationalist Welcome，”Irish Times, August 14，1999；Tim Pat Coogan, The Troubles（New York：Palgrave，2002），p.91。

[29]1971年贝尔法斯特自治郡人口普查。

[30]Paul Doherty and Michael A.Poole，“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1971-1991，”Geographical Review, vol.87，no.4（October 1997）.

[31]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32]Seamus Brady，“Eye witness Account of Events in Belfast，”August 22，1969，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

[33]出处同上。

[34]“Army Under Crossfire，”Telegraph, July 16，1972.同时参看“Thousands of Northern Refugees Streamed over the Border in the 1970s—Some Were Called‘Ungrateful’”The Journal.ie, December 27，2014。

[35]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6]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10.

[37]参看Burning of Bombay Street。

[38]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p.146-147.

[39]Ciarán Carson, Belfast Confetti（Winston-Salem, N.C.：Wake Forest University Press，1989）。

[40]档案镜头里有这样的画面。1970年7月4日的星期六，福尔斯路戒严期间，女人们趁着枪战的间隙前往奥马尔街的一家商店。

[41]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10.

[4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访谈；1972年12月13日社会工作者就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所做的报告。

[43]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11.

[44]“Flight：A Report on Population Movement in Belfast During August，1971，”Northern Ireland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ssion Research Unit, Belfast，1971.

[45]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11.

[46]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4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2；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48]High Life, documentary（BBC，2011）；Megan Deirdre Roy，“Divis Flats：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Modern Housing Project in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1968-1998，”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

[49]High Life.

[50]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51]Roy，“Divis Flats，”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

[5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53]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54]Roy，“Divis Flats”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High Life.

[55]Lynsey Hanley, Estates：An Intimate History（London：Granta，2000），p.97.

[56]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147.

[57]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58]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147.

[59]出处同上，第144页。

[60]出处同上，第144页。

[61]出处同上，第145页。

[62]“Belfast's Night Patrol：An Uneasy Tour，”Newsday, September 17，1971.

[63]David McKittrick, Seamus Kelters, Brian Feeney, and Chris Thornton, Lost Lives：The Stories of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2nd ed.（Edinburgh：Mainstream，2004），table 1，p.1494.

[64]Roy，“Divis Flats，”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同时参看Jeffrey A luka, Hearts and Minds, Water and Fish：Support for the IRA and INLA in a Northern Ireland Ghetto（Greenwich, Conn.：JAI Press，1989）。

[65]McKendry, Disappeared, p.15.

[66]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144.

[67]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34.

[68]Hastings, Barricades in Belfast, p.144.

[69]McConville，“Disappearance of Jean McConville，”in The Disappeared of North-ern Ireland's Troubles（Belfast：Wave Trauma Centre，2012），p.16.

[70]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71]Simon 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London：Faber，1975），pp.68-69.

[72]出处同上，第70页。

[73]Patrick Bishop and Eamonn Mallie, The Provisional IRA（London：Heinemann，1987），p.123.

[74]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73.

[75]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p.71-72.

[76]档案镜头。

[77]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72；档案镜头。

[78]档案镜头。

[79]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80]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71.

[81]出处同上，第70页；“Falls Road Curfew，40th Anniversary，”Irish News, June 30，2010。

[82]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32.

[83]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84]McKendry, Disappeared, p.12.

[85]Roy，“Divis Flats，”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

[86]“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87]“How Belfast Feels Behind the Barricade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10，1969.

[88]Kevin C.Kearns, Dublin Street Life and Lore：An Oral History（Dublin：Glendale，1991），p.63.

[89]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90]McKendry, Disappeared, p.13.

[91]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McKendry, Disappeared, p.13.

[9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四　地下军队

[1]这一叙述是以塔拉·基南-汤姆森的书为依据：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 pp.213-214，以及P-TKT。

[2]此处的描写归功于汤米·麦卡尼的书：The Provisional IRA, p.47，以及Win-chester：In Holy Terror, p.164。

[3]H-BC；“IRA Provisionals Put Up Barriers in Belfast，”Telegraph, June 30，1972.

[4]利亚姆·麦克米伦称1969年共和军的人数为120人。Liam McMillen，“The Role of the I.R.A.1962-1967”（lecture, Dublin, June 1972），reproduced in“Liam McMillen：Separatist, Socialist, Republican，”Repsol Pamphlet no.21（1975）.另一修正主义的观点称，共和军日渐式微且趋于温和的描述过于夸张，参看Brian Hanley，“‘I Ran Away’？The IRA and 1969：The Evolution of a Myth，”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XXXVIII, no.152（November 2013）。他指出，英国情报机关判断1969年春天整个北爱尔兰可能有500名共和军，而爱尔兰共和国的共和军人数更是高出许多。

[5]English, Armed Struggle, p.84；H-BC.

[6]“Why Britain Is Committed in Northern Ireland，”Irish Times, January 27，1972.

[7]H-BC；“The I.R.A.，New York Brigade，”New York, March 13，1972.汉利指出，历史文献中广泛传播的关于贝尔法斯特城墙上涂写“逃跑军”字样的现象很可能是假的：城里有数百名记者，然而没有任何新闻照片显示这样的标语。但汉利承认“逃跑军”的说法在1970年开始出现。同时休斯在其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项目中回忆称城墙上有这样的话。

[8]对比利·麦基的采访；“IRA Founder，89，Has‘No Regrets，’”Belfast News Let-ter, May 17，2011。

[9]“Political Process Will Not Deliver a United Ireland，”Irish News, March 30，2016.

[10]H-BC.

[11]Martin Dillon, The Dirty War：Covert Strategies and Tactics Used in Political Conflicts（New York：Routledge，1999），p.11；同时参看English, Armed Struggle, p.105.

[12]John F.Morrison, The Origins and Rise of Dissident Irish Republicanism（London：Bloomsbury，2013），p.viii.

[13]出处同上，第54页。

[14]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table 1，p.1494.

[15]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P-EM。

[16]“Intelligence War by Army Cracks IRA Ranks，”Telegraph, November 5，1971.

[17]“IRA Bomb School Uncovered by Army Swoop，”Telegraph, January 8，1972；“One Escapes After Seven Are Arrested at Bomb Lecture，”Guardian, January 8，1972.

[18]“London Bomb Campaign Decision Taken by IRA in Dublin，”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19]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访谈。

[20]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164.

[21]“Soldiers Scurry in Sniper Country，”Baltimore Sun, November 26，1971.

[22]“Army Under Crossfire，”Telegraph, July 16，1972.

[23]对安妮·德夫林的采访。

[24]“London Bomb Campaign Decision Taken by IRA in Dublin，”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25]P-TKT.

[26]“Home Often Raided, Says Accused Girl，”Irish Times, October 24，1973；“London Bomb Campaign Decision Taken by IRA in Dublin，”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Dolours Price Won Rapid Promotion As Gunmen Died，”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

[27]“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28]P-EM.

[29]P-TKT.

[30]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31]P-TKT.

[32]P-EM.

[33]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34]Keenan-Thomson, 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1956-1973，p.149.

[35]“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P-TKT.

[36]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

[37]对休·菲尼的采访。

[38]对弗朗西斯·麦圭根和凯文·哈纳威的采访。

[39]“Seán Mac Stíofáin：Obituary，”Telegraph, May 19，2001.马克·斯蒂奥芬曾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就不到7岁的样子，妈妈告诉我：‘我是爱尔兰人，因此你也是爱尔兰人，至少是半个爱尔兰人。你要记得。’”这个谎言深入人心，以至于到马克去世时仍有几篇讣告误称其母亲来自贝尔法斯特。参看“Adams Leads Tributes As Mac Stíofáin Dies，”Irish Independent, May 19，2011；“Former Chief-of-Staff of the IRA Sean Mac Stíofáin Dies Aged 73，”Irish Times, May 19，2001。

[40]“IRA Threatens to Kill Ceasefire Breakers，”Guardian, June 24，1972.

[41]Brendan O'Brien, The Long War：The IRA and Sinn Féin（Syracuse, 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9），p.119.

[42]“Death of the Englishman Who Led the Provisionals，”Observer, May 19，2001.

[43]Seán 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Edinburgh：R&R Clark，1975），p.117.

[44]P-EM；P-TKT；“IRA Bomber Says Adams Ordered Terror Attacks on London Targets，”Irish Independent, September 23，2012.

[45]P-EM；“Irish Women Play a Growing Role in IRA Struggle against

British，”Washington Post, April 11，1972.

[46]“IRA Bomber Says Adams Ordered Terror Attacks on London Targets，”Irish Inde-pendent, September 23，2012.

[47]P-EM.

[48]“IRA Bomber Says Adams Ordered Terror Attacks on London Targets，”Irish Independent, September 23，2012.

[49]出处同上。

[50]Keenan-Thomson, 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 p.232.

[51]P-TKT.

[52]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53]H-BC.

[54]P-TKT.

[55]出处同上。

[56]出处同上。

[57]P-EM；P-TKT.

[58]这些细节取自H-BC。

[59]共和军葬礼的档案照片。

[60]H-BC.

[61]P-EM；P-TKT；“London Bomb Campaign Decision Taken by IRA in Dub-lin，”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62]“Two Sisters from Belfast Republican Family—and Their Allies in IRA Unit，”Guardian, November 15，1973；“Girl Out of Her Depth，”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

[63]对休·菲尼的采访。

[64]纪录片Car Bomb中对玛丽安·普赖斯的采访，由凯文·图利斯导演（Many Rivers Films，2008）.

[65]P-EM.

[66]P-TKT.

[67]“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IRA？”Time, March 28，2008.

[68]纪录片Car Bomb。

[69]参看Dieter Reinisch，“Cumann na mBan and the Acceptance of Women

in the Provisional IRA：An Oral History Study of Irish Republican Women in the Early 1970s，"in Socheolas：Limerick Student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no.1（Septem-ber 2013）。

[70]"Three British Soldiers Shot Dead in Ulster，"Guardian, March 11，1971；Dil-lon, The Dirty War, pp.214-215.

[71]"Memorial to Scottish Soldiers Attacked，"Belfast Telegraph, May 3，2015.

[72]P-EM；P-TKT.同时参看Andrew Sanders，"Dolours Price, Boston College, and the Myth of the'Price Sisters，'"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Northern Ireland blog, January 24，2013。

[73]"Woman Hijacker Feels'Engaged to the Revolution，'"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1970.

[74]"I Made the Ring from a Bullet and the Pin of a Hand Grenade，"Guardian, January A 5，2001.

[75]Jeffrey Toobin, American Heiress：The Wild Saga of the Kidnapping, Crimes, and Tri-al of Patty Hearst（New York：Doubleday，2016），p.157.

[76]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77]"Dolours Price Won Rapid Promotion As Gunmen Died，"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

[78]"The Sisters of Terror，"Observer, November 18，1973.

[79]"IRA Female Terrorists Work Havoc in Ireland，"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21，1976.

[80]"Dolours Price Won Rapid Promotion As Gunmen Died，"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

[81]同一时代的越南战场上也流传过类似的故事。参看chapter 9，"Sweetheart of the Song Tra Bong，"in Tim O'Brie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0）。

[82]"Dolours Price Won Rapid Promotion As Gunmen Died，"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

[83]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84]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85]P-TKT.

[86]当时报纸上报道了银行遭抢劫的新闻，但劫匪的身份并未查明。"Spate of Robberies Throughout North，"Irish Times, June 27，1972；"'Nuns'Hold Up Belfast Bank，"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une 27，1972；"IRA Ceasefire Preceded by More Killing，"Guardian, June 27，1972；"Cease-fire Off to

Uneas-y Start in Northern Ireland，”Associated Press, June 27，1972.

[87]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88]“A.I.B.Branch Robbed Again by Women，”Irish Times, July 18，1972.

[89]P-EM.

[90]“Hospital Gang Grab IRA Chief，”Telegraph, December 30，1972；“Two Sisters from Belfast Republican Family—and Their Allies in IRA Unit，”Guardian, November 15，1973；“IRA Leader Is Caught Year After Escape，”Times（Lon-don），February 2，1974.P-EM中确认了杜洛尔丝·普赖斯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事实。

[91]P-EM；“Disappeared IRA Victim and Provo‘Love Triangle，'”Irish Inde-pendent, July 12，2014.

[92]对乔·林斯基一位亲戚的采访，对方不愿透露具体身份。“Behind the Sto-ry：Allison Morris on How She Broke the Story of Joe Lynskey’s IRA Execu-tion，”Irish News, June 25，2015.

[93]对乔·林斯基一位亲戚的采访。

[94]对乔·克拉克的采访。

[95]“Searching for the Mysterious‘Mad Monk'Who Fought for—and Was Killed A y the IRA，”Washington Post, June 30，2015.

[96]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97]Gerry Adams, Before the Dawn：An Autobiography（Dingle, Ireland：Brandon，2001），pp.62-64.

[98]和普赖斯的父亲一起越狱的叔叔是帕迪·亚当斯。UinseannÓ Rathaille Mac Eoin, The I.R.A.in the Twilight Years 1923-1948（Dublin：Argenta，1997），p.453.

[99]Adams, Before the Dawn, pp.88-89.

[100]亚当斯坚称自己从未加入共和军，但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一声明。众多学术文献一致认同亚当斯是在青少年时期加入的共和军。参看English, Armed Struggle, p.110；Ed Moloney,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New York：Norton，2002），p.46；David Beresford, Ten Men Dead：The Story of the 1981 Irish Hunger Strike（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7），p.23；Malachi O’Doherty, Gerry Adams：An Unauthorised Life（London：Faber，2017），p.24。早在1972年，新闻界便确认亚当斯为贝尔法斯特的一名共和军领袖。同年12月，也就是琼·麦康维尔被绑架的那一年，伦敦《泰晤士报》报道：“25岁的前酒吧招待员格里·亚当斯如今指挥着（贝尔法斯特的）临时共和军。他想在新芬运动中扮演更具政治性的角色。但他无法付诸行动，因为他清楚自己会立刻遭到逮捕。”（“The High Stakes on Mr.Whitelaw’s Luck，”Times[London]，December 1，1972.）2010年，维基解密发布了一份2005年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报。电报中，当时任职于都柏林的美国大使詹姆斯·肯尼声称爱尔兰政府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格里·亚当斯和马丁·麦吉尼斯是共和军军事指挥部的成员”（“Peace

Process：GOI Shaken by Second IRA Statement，”U.S.diplomatic cable, February 4，2005）。

[101]P-EM.

[102]出处同上。

[103]出处同上。

[104]“‘Republicanism Is Part of Our DNA，'Says IRA Bomber Dolours Price，”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105]“Hunger Strikers Seek Only to Serve Sentences in North，”Irish Times, Januar-y 21，1974.

[106]“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107]出处同上。

[108]“Bloody Sunday in Derry，”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972；“‘Bloody Sunday，'Derry 30 January 1972—Names of the Dead and Injured，”CAIN.

[109]血色星期天过后仅仅11周，由约翰·威杰里领导的初次调查发布了结果。调查直接听取了英军的说法——“他们受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枪和扔炸弹的人进行了射击”，Lord Widgery, Report of the Tribunal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Events on Sunday，30 January 1972（April 1972）——并基本免除A士兵的罪责。这项调查广受谴责，被指文过饰非。直到1998年才在马克·萨维尔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第二次立案调查。在其2010年的报告中，萨维尔的调查得出结论：“尽管士兵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证词……他们谁都不是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开的枪。”Independent Report of the Bloody Sunday Inquiry（June 15，2010）.

[110]P-TKT.

[111]“Nation Mourns Derry's Dead，”Irish Times, February 1，1972.

[112]“British Take Direct Rule in N.Ireland：Heath Suspends Ulster Self-Rule, Names Aide to Run Province，”Washington Post, March 25，1972.

[113]对富尔沃·格里马尔迪的采访；“Misteriosa‘pasionaria’irlandese illustra l’attività rivoluzionaria dell’IRA，”Corriere della Sera, March 24，1972。

[114]“Evidence Given on Handwriting，”Irish Times, October 26，1973；“Vio-lence‘Not Included in IRA Principles，'”Guardian, October 26，1973.

[115]“Condannata all'ergastolo，”L'Europeo, November 29，1973.

[116]“Espulsi dall'Italia, i 2 irlandesi dell'IRA，”Corriere Milano, March 24，1972.

五 圣犹大之路公寓

[1]McKendry, Disappeared, p.14.

[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3；“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3。

[3]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4]出处同上。

[5]Eileen Fairweather, Roisín McDonough, and Melanie McFadyean, Only the Rivers Run Free：Northern Ireland；The Women’s War（London：Pluto Press，1984），p.35.

[6]Jeffrey Sluka，“Living on Their Nerves：Nervous Debility in Northern Ireland，”Health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vol.10（1989）.另见R.M.Fraser，“The Cost of Commotion：An Analysis of the Psychiatric Sequelae of the 1969 Belfast Riot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118（1971）；“Mental Illness in the Belfast Trouble Areas，”Irish Times, September 3，1971。

[7]“Mental Illness in the Belfast Trouble Areas，”Irish Times, September 3，1971.

[8]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9]McKendry, Disappeared, p.13.

[10]“Jean McConville's Daughter：‘If I Give Up Fighting, They've Won，'”Observer, July 6，2014.

[11]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table 1，p.1494；table NI-SEC04，“Deaths（Number）Due to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Only）1969-2002，”assembled by the Conflict Archive on the Internet（CAIN）.

[12]McKendry, Disappeared, p.13.另见McConville，“Disappearance of Jean Mc-Conville，”p.16。

[13]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4]“Helen McKendry：Some People Ignored Us……Others Didn't Give a Damn，”Belfast Telegraph, April 13，2015.

[15]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4。

[16]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4.

[1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4；“Helen McKendry：Some People Ignored Us……Others Didn’t Give a Damn，”Belfast Telegraph, April 13，2015。

[18]“Helen McKendry：Some People Ignored Us……Others Didn't Give a Damn，”Belfast Telegraph, April 13，2015；McKendry, Disappeared, p.14.

[19]McKendry, Disappeared, p.14；“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20]如果想大致了解涂沥青和粘羽毛的手段在贝尔法斯特社会控制的宏观背景下所起的作用，请参看Heather Hamill, Hoods：Crime and Punishment in Belfast（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76-77。

[21]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110；“3 IRA Men Jailed for Tarring Incident，”Hartford Courant, May 13，1972.

[22]“Ulster Women Tar 2 Girls for Dating British Soldiers，”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1971；“Ulster Girl Who Was Tarred Secretly Weds British Sol-dier，”Boston Globe, November 16，1971；“Irish Girl Who Was Tarred Weds Her British Soldier，”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1971.

[23]“Officers of IRA Group Give Account of Fights，”Irish Times, March 18，1971.

[24]“Belfast Confetti，”The New Yorker, April 25，1994.

[25]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6]“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27]对阿奇·麦康维尔和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8]McKendry, Disappeared, pp.13-14.

[29]出处同上，第15页。

[30]“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31]McKendry, Disappeared, p.15.

[3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5.

[33]“Shops Suffer in Bomb Attacks，”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20，1972.

[34]“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35]McKendry, Disappeared, p.15.关于琼那晚去玩宾戈的时间有些争议。不过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如今坚称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母亲遭绑架的前一晚。当年他们在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也是这么说的。1973年1月16日，《贝尔法斯特电讯报》发表了一则头版新闻。其中引用了海伦对玩宾戈那一夜的绑架事件所作的叙述：“第二天晚上她被人带走了。”（“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3.）

[36]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在1973年《贝A法斯特电讯报》发表的头版新闻中，海伦回忆道：“我妈妈的钱包、

手提袋、鞋子和大衣都被抢走了，而且还遭到了毒打。当时安置在艾伯特街大磨坊的几名士兵发现她在街上游荡。”（“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3.）

[37]McKendry, Disappeared, p.16.这部分描写似乎得到了官方记录的证实。警方的女调查官努阿拉·奥罗恩后来查阅过这些记录：“警方记录显示，1972年11月30日凌晨2点警方接到了一份部队的报告。报告称1972年11月29日晚11点他们发现一名女性在街上游荡。该女性自称被人殴打并被告知不许向军方透露任何信息。她十分苦恼。军方称她的名字是玛丽·麦康维尔，家住圣犹大之路公寓。琼·麦康维尔的婆婆名叫玛丽·麦康维尔。该名女性的家人认为，军方找到的女性可能是琼·麦康维尔，她当时希望找到自己的婆婆。”（Police Ombudsman of Northern Ireland，“Report into the Complaint by James and Michael McConville Regarding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bduction and Murder of Their Mother Mrs.Jean McCon-ville，”August 2006，p.4.）这份报告中的日期——11月29日——跟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所说——琼直到12月7日才遭绑架——的时间明显不一致。这一异常之处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探讨。

[38]McKendry, Disappeared, p.17.

[39]由艾莉森·米拉尔（Alison Millar）执导的纪录片The Disappeared（BBC North-ern Ireland，2013）中对阿格尼丝·麦康维尔的采访。

[40]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9，2013.

[41]对迈克尔、阿奇和苏珊·麦康维尔的采访。

[4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43]McKendry, Disappeared, p.18.

[44]出处同上，第18页。

六　敢死队

[1]H-BC.

[2]“British Troops May Have Exchanged Fire，”Irish Times, September 4，1972.

[3]H-BC.绿色货车的信息源于“British Troops May Have Exchanged Fire，”Irish Times, September 4，1972。

[4]H-BC.

[5]在波士顿学院的采访中，休斯说自己出生于1948年6月。他不记得这次事件发生的日期，但当时的报道和后续的调查表明那天是1972年9月2日。参看Ed Moloney and Bob Mitchell，“British‘War Diary’Suggests Possible MRF Role in Effort to Kill Brendan Hughes While London Buries Secret Military Files for 100 Years，”The Broken Elbow blog, February 23，2013。另见Margaret Urwin，“Counter-Gangs：A History of Undercover Military Units in Northern Ireland，1971-1976，”Spinwatch report（Public Interest Investigations, November 2012），p.15。

[6]H-BC；Brendan Hughes，“IRA Volunteer Charlie Hughes and the Courage of the Brave，”The Blanket, September 10，2002.

[7]“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8]H-BC.

[9]Brendan Hughes interview, Radio Free Éireann, WBAI, March 17，2000.

[10]H-BC.

[11]出处同上；Dolours Price，“Gerry, Come Clean, You’ll Feel Better，”The Blan-ket, February 26，2008。

[12]H-BC.

[13]P-EM.

[14]Dolours Price，“Brendan Hughes：Comrade and Friend，”The Blanket, February 17，2008.

[15]“Brendan Hughes：Obituary，”Guardian, February 18，2008.（讣告引用了休斯对记者彼得·泰勒说的话，此处我几乎一字不差地进行了转述。）

[16]H-BC.

[17]出处同上。

[18]Bishop and Mallie, The Provisional IRA, p.218.

[19]H-BC.

[20]“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21]出处同上。

[22]“Coffee？No Thanks, Said the Major—I Want a Tranquilizer，”Observer, April 23，1972.

[23]出处同上。

[24]H-BC.

[25]Mao Tsetung, On Guerrilla Warfare（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p.93.

[26]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名天主教徒厌恶临时共和军的存在，其对共和军的支持并非自愿。关于他的态度请参看Malachi O’Doherty, The Telling Year：Belfast 1972（Dublin：Gill&Macmillan，2007）。

[27]H-BC.

[28]“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29]Voices from the Grave,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Kate O'Callaghan（RTÓ，2010）.

[30]H-BC.

[31]Voices from the Grave.

[32]H-BC.有关这次偷运武器的行动详情，参看Taylor, Behind the Mask：The IRA and Sinn Fein（New York：TV Books，1999），p.131。

[33]Adams, Before the Dawn, p.186.

[34]这场追击成了一段传奇。除了休斯在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中做的叙述，TheIrish People也讲述了这一事件，其中写道：“窗户没有碎裂，只留下了一个洞——圆圆小小恰到好处——因为布伦丹身材并不高大。”参看“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35]H-BC.

[36]“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37]出处同上。

[38]H-BC.

[39]出处同上。

[40]出处同上。

[41]出处同上。

[42]出处同上。

[43]出处同上。

[44]Voices from the Grave中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

[45]P-EM.

[46]“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47]H-BC.

[48]特里·休斯，他的话引自Voices from the Grave，对特里·休斯的采访。

[49]前共和军志愿军帕蒂·乔·赖斯在Voices from the Grave中确认了亚当斯带来医生的事。

[50]H-BC.

[51]Mark Urban, Big Boys'Rules：The SAS and the Secret Struggle Against the IRA（Lon-don：Faber，1992），p.26.芬坦·奥图尔指出，戴维·贝雷斯福德在其Ten Men Dead一书中对亚当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称他是1972年7月至1973年7月间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Fintan O'Toole，“The End of the Troubl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9，1998.）

[52]“'Provos'Go into Hiding，”Observer, June 4，1972.

[53]“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54]H-BC.

[55]埃德·莫洛尼和一名研究者在英国军队档案中发现了确证的书面记录。刺杀休斯的行动被称为“汤姆时间”（TOM TIME）。参看Ed Moloney and Bob Mitchell，“British'War Diary'Suggests Possible MRF Role in Effort to Kill Brendan Hughes While London Buries Secret Military Files for 100 Years，”The Broken Elbow blog, February 23，2013。事件发生后不久也有一篇关于这场枪战的叙述，参看“British Troops May Have Exchanged Fire，”Irish Times, September 4，1972。

七　小个子准将

[1]Frank 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London：Barrie Books，1960），p.1.

[2]“The Guru of the New Model Army，”Times（London），May 14，1972.

[3]出处同上。

[4]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p.1.

[5]出处同上，第7页。

[6]“The Guru of the New Model Army，”Times（London），May 14，1972.

[7]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pp.28，90.

[8]War School, part 1：“Kitson's Class”（BBC documentary，1980）.

[9]出处同上。

[10]Mike Jackson, Soldier：The Autobiography（London：Bantam Press，2007），p.81.

[11]出处同上，第163页。“涂黑”也许有点倒霉，但这是一种地方性的标准做法。在Peter Taylor, Brits：The War Against the IRA（London：Bloomsbury，2001）一书的第127页，关于基特森任职肯尼亚期间特别提及了这一点。

[12]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pp.180-181.

[13]出处同上，第79页。

[14]出处同上，第79页。

[15]出处同上，第127页。

[16]Caroline Elkins, Imperial Reckoning：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New York：Henry Holt，2005），p.xvi.

[17]出处同上，第xiv页。

[18]出处同上，第54、66页。

[19]Seventh Supplement to London Gazette, December 31，1954.（奖章实际于1955年1月1日颁发。）

[20]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p.184.

[21]“The Guru of the New Model Army，”Times（London），May 14，1972.

[22]Frank Kitson, Bunch of Five（London：Faber，2010），pp.155-201.

[23]出处同上，第205-277页；Dillon, The Dirty War, pp.25-26。

[24]Frank Kitson,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Subversion, Insurgency, Peace-Keeping（Lon-don：Faber，1991），bibliography.

[25]Kitson,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pp.x—xi.

[26]Table NI-SEC03，“British Army Personnel（Number）in Northern Ireland，1969 to 2005，”CAIN.

[27]“Soldiers Scurry in Sniper Country，”Baltimore Sun, November 26，1971.

[28]出处同上。

[29]参看NiallÓ Dochartaigh, From Civil Rights to Armalites：Derry and the Birth of the Irish Troubles（Cork, Ireland：Cork University Press，1997），chapter 4。

[30]Taylor, Brits, p.53.

[31]Jackson, Soldier, p.82.

[32]“Paras Were‘Jolly Good'Says Bloody Sunday Brigadier，”Daily Mail, September 25，2002.

[33]Kitson,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p.50.

[34]War School：“Kitson's Class”.

[35]Dillon, The Dirty War, p.33.

[36]Taylor, Brits, p.138.

[37]“Soldiers Scurry in Sniper Country，”Baltimore Sun, November 26，1971.

[38]Jackson, Soldier, p.82.

[39]“Brigadier Denies T.D.'s Claims，”Irish Times, November 11，1971.

[40]Kitson,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p.49.

[41]Coogan, The Troubles, p.150.

[42]Taylor, Brits, p.67.

[43]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163.

[44]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中一个“蒙面人”和他的儿子身上，两人都叫西恩·麦克纳。

[45]Taylor, Brits, p.67.

[46]Ministry of Defence, Operation Banner：An Analysi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Northern Ireland，2006，pp.2-7.

[47]Taylor, Brits, p.67.

[48]Dillon, The Dirty War, p.26.

[49]Frank Kitson, Bunch of Five, pp.58-59.

[50]出处同上，第58页。

[51]“The Laws of Emotion，”Guardian, October 18，1973.

[52]“Intelligence War by Army Cracks IRA Ranks，”Telegraph, November 5，1971.

[53]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p.154-155.

[54]Taylor, Brits, p.66.

[55]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154.

[56]Ian Cobain, Cruel Britannia：A Secret History of Torture（London：Portobello，2013），p.139.

[57]“Joe Cahill，”Telegraph, July 26，2004.

[58]P-EM.

[59]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另见“The McGuigans：One Radical Irish Family，”New York Times, June 11，1972，以及“The Fighting Women of Ireland，”New York, March 13，1972。

[60]这一描述基于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以及麦圭根在Dennis Faul and Raymond Murray, The Hooded Men：British Torture in Ireland, August, October 1971（Dublin：Wordwell Books，2016）一书中给出的第一手信息。

[61]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

[62]出处同上。

[63]最开始有12名囚犯受刑，后来又有两人经受了同样的遭遇。John McGuffin, The Guinea Pigs（London：Penguin，1974），p.46.

[64]Faul and Murray, The Hooded Men, p.58.

[65]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Hooded Man：‘They Asked Me to Count to Ten；I Refused In Case I Couldn’t Do It，’”Journal.ie, March 24，2018.

[66]多年来麦圭根在不同场合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有所不同。在1972年《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他说自己撞到了地上。对福尔和穆雷讲述时，他说直升机落地后自己被架了出去。在我对他的采访，以及他接受的其他采访中，他形容自己被推出直升机后有人接住了他。

[67]“The Torture Centre：Northern Ireland's‘Hooded Men，'”Irish Times, July 25，2015.

[68]这一描述基于对弗朗西斯·麦圭根、凯文·汉纳威和乔·克拉克的采访；同时参看Winchester, In Holy Terror, pp.170-172；“The Torture Cen-tre：Northern Ireland’s‘Hooded Men，’”Irish Times, July 25，2015；还有麦圭根在The Guinea Pigs中的第一手信息，以及福尔和穆雷合著的The Hooded Men。

[69]Cobain, Cruel Britannia, pp.128-134；Taylor, Brits, p.65.

[70]“Gen Sir Anthony Farrar-Hockley，”Telegraph, March 14，2006.

[71]Taylor, Brits, p.69.

[72]Cobain, Cruel Britannia, p.131.

[73]出处同上，第130页。伊恩·科贝恩指出，1971年11月，在拘捕事件过后，英军情报部队的准将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布雷姆纳写下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概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审讯技术的进展。由于内容被视为过于敏感，军方最初决定将之“至少保密100年”。（结果在30年后解密。）

[74]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

[75]“The Torture Centre：Northern Ireland's‘Hooded Men，'”Irish Times, July 25，2015.

[76]这个人是西恩·麦克纳。John Conroy, Unspeakable Acts, Ordinary People：The Dynamics of Tor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23.

[77]出处同上，第188页。

[78]对弗朗西斯·麦圭根的采访。

[79]“The Book Answer to the Guerrilla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ruary 11，1972.

[80]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sello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Authorised Procedures for the Interrogation of Persons Suspected of Terrorism（the“Parker Report”），March 1972.

[81]Case of Ireland v.the United Kingdom（Application no.5310/71），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 January 18，1978.2018年，该法院在面临一项新挑战时解除了这一决定：Case of Ireland v.the United Kingdom（Application no.5310/71），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 March 20，2018。另见“Hooded Men Torture Ruling Is‘Very Disappointing，’”Amnesty International, March 20，2018。

[82]参看备忘录Jay Bybee, Office of Legal Counsel,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Alberto Gonzales,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RE：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Inter-rogation under 18 U.S.C.§§2340-2340A，”August 1，2002，p.28。

[83]军队内部至少有时候将其指代为移动反应部队（Mobile Reaction Force）。Ma-jor General W.G.H.Beach to Brigadier M.E.Tickell, February 17，1972（National Archives, Kew）.

[84]Taylor, Brits, pp.128-130.举例而言，一些机密的英国政府文件将这个组织称为移动反应部队。“Northern Ireland Visit，”Loose Minute prepared by Maj.P.H.Courtenay, February 10，1972（National Archives, Kew）.

[85]“Undercover Soldiers‘Killed Unarmed Civilians in Belfast，'”BBC, November 21，2013.

[86]出处同上。

[87]Urban, Big Boys'Rules, p.36.

[88]出处同上，第36页。

[89]“Undercover Soldiers‘Killed Unarmed Civilians in Belfast，'”BBC, November 21，2013.

[90]Dillon, The Dirty War, p.30.

[91]Urban, Big Boys'Rules, p 36.

[92]Frank Kitson，“Future Developments in Belfast by Commander 39 Airportable Bri-gade，”December 1971.（爱尔兰作家兼研究者Ciarán MacAirt在基尤的档案馆发现了这份原本机密的文件。）

[93]Dillon, The Dirty War, p.42.

[94]出处同上，第42页。

[95]一名前MRF士兵在1978年详细阐明：“我们按照指示使用俄国AK47突击步枪、阿玛莱特和汤普森冲锋枪。这些都是临时共和军常用的武器。我会留待你

们自己去想，为什么基特森准将认为有必要用这些不属于英国部队标准装备的武器。”参看Margaret Urwin，“Counter-Gangs：A History of Undercover Military Units in Northern Ireland，1971-1976，”Spinwatch report（Public Interest Investigations, November 2012），p.9。

[96]“Britain's Secret Terror Force，”Panorama（BBC，2013）.

[97]“Woman，24，Shot Dead，”Guardian, June 9，1972.

[98]“Undercover Army Unit Linked to Killing Previously Blamed on IRA，”Irish News, June 9，2015.

[99]对西蒙·温彻斯特的采访。另见“Journalist Believes Army Used Him to Feed Stories，”Irish Times, May 22，2001，and“My Tainted Days，”Guardian, May 22，2001。

[100]Dillon, The Dirty War, p.26.

[101]War School：“Kitson's Class.”

[102]Dillon, The Dirty War, p.26.

[103]“The Kidnap Target，”Daily Mail, August 11，1973.

[104]War School：“Kitson's Class.”

[105]“Exposed：The Army Black Ops Squad Ordered to Murder IRA's Top‘Play-ers，'”Daily Mail, November 16，2013.

八　裂杯子酒吧

[1]J.J.Colledg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Newbury, U.K.：Casemate，2010），p.244.

[2]“Seven IRA Suspects Swim to Freedom，”Guardian, January 18，1972.

[3]“Mac Stíofáin Tells Why Escapers Were Chosen，”Irish Times, January 25，1972.

[4]出处同上。

[5]Adams, Before the Dawn, p.192.

[6]Gerry Adams, Cage Eleven（New York：Sheridan Square Press，1993），p.2.

[7]Adams, Before the Dawn, p.192.

[8]出处同上，第189页。

[9]出处同上，第191-192页。

[10]出处同上，第191-192页。

[11]出处同上，第192页。

[12]这一描述源自对汤米·戈尔曼的采访，以及“7 At Large after Maidstone Swim，”Irish Times, January 18，1972；“Seven IRA Suspects Swim to Free-dom，”Guardian, January 18，1972；“7 Maidstone Escapers Cross Border to Freedom，”Irish Times, January 24，1972。

[13]对汤米·戈尔曼的采访；Coogan, The IRA, p.403；“7 IRA Guerrillas Tell of Prison Escape，”Globe and Mail, January 25，1972。

[14]“Thirty Years On—the Maidstone，”Andersonstown News, September 9，2000.

[15]对汤米·戈尔曼的采访。

[16]“Thirty Years On—the Maidstone，”Andersonstown News, September 9，2000.

[17]“7 At Large after Maidstone Swim，”Irish Times, January 18，1972.

[18]“Mac Stíofáin Tells Why Escapers Were Chosen，”Irish Times, January 25，1972.

[19]Adams, Before the Dawn, p.196.

[20]朗·凯什监狱后来被更名为梅兹监狱。但故事中的大多数共和党囚犯继续称其为朗·凯什，所以为了避免引起困惑，我在书中一直选用这个名字。

[21]出处同上，第197页。

[22]出处同上，第198页。

[23]H-BC.

[24]H-BC.

[25]“IRA Ceasefire Follows MP's Peace Moves，”Guardian, June 23，1972.

[26]“IRA Threatens to Kill Ceasefire Breakers，”Guardian, June 24，1972.

[27]“IRA Provisionals, British Agree to Indefinite Truce，”Boston Globe, June 23，1972.

[28]“Truce by Provisional IRA Opens Way to Peace，”Irish Times, June 23，1972.

[29]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 p.281；David McKittrick and David McVea,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Th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Chicago：New Amsterdam Books，2002），pp.84-85.

[30]Taylor, Behind the Mask, p.164.

[31]Adams, Before the Dawn, p.202.

[32]在1982年的一次采访中，亚当斯回忆那块牌匾上写着惠斯勒的母亲曾住在A里。事实上，惠斯勒本人曾在那里住过。“Sinn Féin Vice-President Gerry Adams，”Irish People, November 27，1982.

[33]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 p.281.

[34]出处同上，第281页。

[35]Adams, Before the Dawn, p.204.

[36]出处同上，第204页。

[37]Ed Moloney and Bob Mitchell，“British Cabinet Account of 1972 IRA Ceasefire Talks，”The Broken Elbow blog, January 21，2014.这里的内容源自此次会议结束后写下的一份“秘密而个人的”会议报告，由怀特劳和北爱尔兰事务办公室官员菲利普·伍德菲尔德递交给时任英国首相泰德·希思。

[38]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 p.281；Adams, Before the Dawn, p.204.

[39]Taylor, Behind the Mask, p.169.

[40]Taylor, Brits, p.80.

[41]Taylor, Brits, pp.107-108，116-117.

[42]Taylor, Behind the Mask, p.164.

[43]出处同上，第169-170页。

[44]“Adams and IRA's Secret Whitehall Talks，”BBC, January 1，2003.

[45]William Whitelaw, The Whitelaw Memoirs（London：Headline Books，1989），pp.128-129.

[46]Taylor, Behind the Mask, p.165.

[47]出处同上，第165页。

[48]出处同上，第166页。

[49]“IRA Ceasefire Follows MP's Peace Moves，”Guardian, June 23，1972.

[50]引自Voices from the Grave中特里·休斯的话。

[51]Adams, Before the Dawn, p.189.

[52]“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53]出处同上。

[54]“Ulster Truce Ends in Street Battle，”Guardian, July 10，1972.

[55]“IRA Truce Falls Apart，5 Die in Hour，”Boston Globe, July 10，1972. 另见Behind the Mask,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Frank Martin（BBC，1991）。

[56]布伦丹·休斯在Voices from the Grave中接受的采访。

[57]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p.112-113；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 p.243.

[58]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p.112-113.

[59]根据北爱尔兰办事处的信息，当天有19枚炸弹爆炸。有些媒体报道认为炸弹接近24枚。不过也许共和军安置了更多炸弹，最后只有19枚成功引爆。“Timetable of Terror，”brochure published by the Northern Ireland Of-fice, July 1972.

[60]“11 Die in Belfast Hour of Terror，”Guardian, July 22，1972.

[61]“Timetable of Terror.”

[62]有些初期的报道给出了更多的死亡人数，但北爱尔兰办事处的记载是九人丧生（七位平民和两名士兵）。“Timetable of Terror.”

[63]Car Bomb.

[64]“Bombing Wave Kills 13，Injures 130 in Belfast，”Boston Globe, July 22，1972.

[65]“Bomb-a-Minute Blitz in Belfast：Many Injured，”Belfast Telegraph, July 22，1972.

[66]“The Only Message，”Irish Times, July 22，1972.

[67]H-BC.

[68]出处同上。

[69]出处同上。

[70]根据埃德·莫洛尼所言，拉塞尔开门时正抱着一个孩子，这或许解释了枪手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Ed Moloney, Voices from the Grave：Two Men’s War in Ireland（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0），p.114.

[71]H-BC.

[72]对乔·克拉克的采访；“Trio Vanished Forever，”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73]“Thriving Shebeens Where Law and Order Has Ceased，”Irish Times, Decem-ber 29，1972.

[74]H-BC；“IRA Volunteer Charlie Hughes and the Courage of the Brave，”The Blanket, September 10，2002.

[75]“Disappeared IRA Victim and Provo‘Love Triangle，'”Irish Independent,

December 7，2014；Gerry Adams, Falls Memories：A Belfast Life（Niwot, Co-lo.：Roberts Rinehart，1994），pp.124-125.

[76]Kevin Myers, Watching the Door：Drinking Up, Getting Down, and Cheating Death in 1970s Belfast（Brooklyn, N.Y.：Soft Skull Press，2009），p.247.

[77]H-BC；“Man Gets Life for Murder at Club，”Irish Times, January 24，1973.

[78]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203.

[79]“Club Death in IRA Power Struggle，”Telegraph, June 20，1972；“Man Gets Life for Murder at Club，”Irish Times, January 24，1973.

[80]“Man Gets Life for Murder at Club，”Irish Times, January 24，1973.

[81]“Rejection of Provisional IRA Policy Urged，”Irish Times, July 1，1972.

[82]“Club Death in IRA Power Struggle，”Telegraph, June 20，1972；“Whitelaw Move Gives New Status to Belfast Prisoners，”Guardian, June 20，1972.

[83]“Club Death in IRA Power Struggle，”Telegraph, June 20，1972.

[84]“Whitelaw Move Gives New Status to Belfast Prisoners，”Guardian, June 20，1972.

[85]H-BC.

[86]对林斯基一位家人的采访。

[87]这些细节以及此处引用的这句话，都出自玛利亚·林斯基接受的口述历史采访。“The Disappearance of Joe Lynskey，”in The Disappeared of Northern Ireland’s Troubles, p.6.

[88]对乔·林斯基一位亲戚的采访。

[89]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90]H-BC.

[91]对乔·林斯基一位亲戚的采访。

[92]对乔·克拉克的采访。

[93]出处同上。

[94]H-BC；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Disappeared Victim Killed O-ver Affair with IRA Man’s Wife，”Irish News, February 8，2010。

[95]对乔·克拉克的采访；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Disappeared Victim Killed Over Affair with IRA Man’s Wife，”Irish News, February 8，

2010；“Disappeared IRA Victim and Provo‘Love Triangle，'”Irish Independent。

[96]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97]H-BC；Moloney, Voices from the Grave, p.114.

[98]“Disappeared IRA Victim and Provo‘Love Triangle，'”Irish Independent, Ju-ly 12，2014；“I Didn't Order Jean's Killing，”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99]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IRA Man：I Held Lynskey Captive Until His Murder，”Irish News, December 15，2009。

[100]对休·菲尼和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H-BC。

[101]“Patrick F.McClure，”obituary, Record-Journal（Meridien, Conn.），De-cember 5，1986.

[102]对休·菲尼的采访；H-BC。

[103]对休·菲尼和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104]H-BC；P-EM.

[105]H-BC.

[106]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107]对休·菲尼的采访。

[108]P-EM.

[109]对休·菲尼的采访；H-BC。

[110]对科林·史密斯的采访；“The Night the Truce Ended，”Observer, July 16，1972。

[111]P-TKT；“The Sisters of Terror，”Observer, November 18，1973.

[112]“Violence‘Not Included in IRA Principles，'”Guardian, October 26，1973.后来她在伦敦接受审判时，法庭展示了这样一张照片，媒体也把它刊登了出来。参看“IRA Planning to Kidnap 10 Hostages from an English Vil-lage in Reprisal for Sentences，”Times（London），November 16，1973。

[113]P-TKT.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在1978年的一次行动中，科登劳埃德乘坐的直升机因遭遇共和军攻击坠毁，他在坠机事件中身亡。

[114]对乔·林斯基一位亲戚的采访。

[115]出处同上。

[116]Maria Lynskey interview, Marian Finucane Show, RTÓRadio, April 4，2015；“Emigration Rumor Hid Lynskey Murder，”Irish News, December 8，

2009.

[117]P-EM.

[118]P-EM.

[119]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120]P-EM.

[121]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122]P-EM；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123]P-EM.

[124]P-EM；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125]P-EM.

九　孤儿

[1]对格雷厄姆·利奇的采访，他是当时拜访麦康维尔家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2]“Where Is Jean McConville，”Civil Rights, January 14，1973.

[3]“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3.

[4]“Help Trace Kidnapped Mother—MP's Appeal to Falls，”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7，1973.

[5]1973年1月17日的BBC档案镜头。

[6]“Snatched Mother Missing a Month，”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6，1973.

[7]社会工作者看望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后所作的报告，1972年12月13日。

[8]社会工作者拜访圣犹大之路公寓后的报告，1972年12月14日。

[9]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2年12月14日。

[10]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2年12月18日。

[11]对迈克尔和苏珊·麦康维尔的采访。

[12]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1月10日。

[13]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1月15日。

[14]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2年12月18日。

[15]“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

2003.

[16]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2月15日。

[18]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ichael McConville interview, Marian Finucane Show, RTÓRadio, November 23，2013；McConville，“Disappearance of Jean McConville，”p.19.

[19]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ichael McConville interview, Marian FinucaneShow, RTÓRadio, November 23，2013.

[20]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1月24日。

[21]这一细节取自2012年11月23日詹姆斯·麦康维尔写给其诉状律师的一封信，其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22]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Report into the Complaint by James and Michael McConville Regarding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bduction and Murder of Their Mother Mrs.Jean McConville，”August 2006.

[23]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1月17日。

[24]两名国会议员分别是帕迪·德夫林和格里·菲特。“Help Trace Kidnapped Mother—MPs Appeal to Falls，”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17，1973.

[25]对亚瑟、苏珊和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6]“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2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军方对这件事也有记录，时间是2月11日：“两名天主教儿童被三个身着战斗装备的蒙面人带上了一辆车。其中一名儿童已经回来，但迈克尔·麦康维尔仍下落不明。”British Army Situation Report，“0700 Hrs Sunday 11 February to 0700 Hrs Monday 12 February 1973，”Annex C to A/BR/30/8/M04，February 12，1973（National Archives, Kew）.

[28]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9]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2月15日。

[30]社会工作者的报告，1973年2月27日。

[31]McConville，“Disappearance of Jean McConville，”p.19.

[32]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1998），Article 7（1）（i）.

[33]McKendry, Disappeared, p.20.

[34]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5]出处同上。

十　弗雷德们

[1]“Shot Laundry Man Was British Agent，”Irish Times, October 3，1972.

[2]出处同上。

[3]出处同上。

[4]“Medal for Van WRAC，”Guardian, September 19，1973.

[5]“Shot Laundry Man Was British Agent，”Irish Times, October 3，1972.

[6]Dillon, The Dirty War, pp.26-27.这一描写出自泰德·斯图尔特的母亲在他被杀后接受的采访。参看“Provos Admit Killing Army Secret Agent，”Belfast Tele-graph, October 3，1972。

[7]“Shot Laundry Man Was British Agent，”Irish Times, October 3，1972.

[8]出处同上。

[9]出处同上。

[10]Dillon, The Dirty War, pp.26-27.

[11]出处同上，第26-27页。

[12]H-BC；Dillon, The Dirty War, pp.30-31；“IRA Never Got Spy's Secrets，”Guardian, May 14，1973.

[13]“More Double Agents at Work，”Irish Times, May 14，1973.

[14]Taylor, Brits, p.134.

[15]H-BC.

[16]出处同上。

[17]Dillon, The Dirty War, pp.31-32.

[18]Taylor, Brits, p.135.

[19]Dillon, The Dirty War, pp.32-34.

[20]出处同上，第32-34页。

[21]出处同上，第34页。

[22]H-BC；Dillon, The Dirty War, pp.32-34.

[23]“Kevin and the Pain That Has Never Disappeared，”Belfast Telegraph, August 30，2013.有些信息认为凯文当时有17岁。但在这篇文章中，菲洛梅娜·麦基写道，他的家人无从知晓凯文是否活到了17岁生日。言下之意，他失踪的时候

应该是16岁。

[24]“The IRA and the Disappeared：Tell Us Where Kevin Is Buried and I'll Shake Hands，”Irish Times, October 5，2013.

[25]H-BC.

[26]“The IRA and the Disappeared：Tell Us Where Kevin Is Buried and I'll Shake Hands，”Irish Times, October 5，2013；Phil McKee，“The Disappearance of Kevin McKee，”in The Disappeared of Northern Ireland's Troubles, p.10.

[27]The Disappeared中对玛丽·麦基的采访。

[28]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29]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McKee，“The Disappearance of Kevin McKee，”p.11。

[30]McKee，“The Disappearance of Kevin McKee，”p.11.

[31]出处同上，第11页。

[32]Watch Keeper's Diary, C Company，1 Battalion, 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 December 28，1971-April 24，1972（National Archives, Kew）.

[33]H-BC.

[34]Dillon, The Dirty War, pp.34-35.

[35]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p.126.

[36]H-BC.

[37]Dillon, The Dirty War, p.35.

[38]出处同上，第35页。

[39]H-BC.

[40]Dillon, The Dirty War, pp.33-34.

[41]H-BC.

[42]Adams, Before the Dawn, pp.212-213.

[43]H-BC.

[44]H-BC；Dillon, The Dirty War, pp.39-40.

[45]参看Taylor, Brits, p.135，泰勒在书中描述了亚当斯的职位，但没有点出他的名字。

[46]“Provos Admit Killing Army Secret Agent，”Belfast Telegraph, October

3，1972.

[47]Dillon, The Dirty War, pp.26-27.

[48]Brits第一部分中对布伦丹·休斯的采访：“The Secret War，”directed by Sam Collyns（BBC，2000）。

[49]Dillon, The Dirty War, p.39.

[50]出处同上，第28页，第37-39页。

[51]H-BC；Adams, Before the Dawn, p.213.

[52]“More Double Agents at Work，”Irish Times, May 14，1973.

[53]这个细节出自1973年Trench House的牧师布莱恩·布雷迪在安德森斯顿对赖特的妻子凯瑟琳所作的采访。参看“More Double Agents at Work，”Irish Times, May 14，1973；“IRA Never Got Spy’s Secrets，”Guardian, May 14，1973。

[54]“More Double Agents at Work，”Irish Times, May 14，1973.

[55]“More Double Agents at Work，”Irish Times, May 14，1973；“IRA Never Got Spy's Secrets，”Guardian, May 14，1973.

[56]“IRA Never Got Spy's Secrets，”Guardian, May 14，1973.

[57]The Disappeared.

[58]P-EM.

[59]出处同上。

[60]“Every Time We Met a Family We Found New Material, New Facts，”Irish Inde-pendent, November 10，2013.

[61]H-BC.

[62]McKee，“The Disappearance of Kevin McKee，”p.12.

[63]“The IRA and the Disappeared：Tell Us Where Kevin Is Buried and I'll Shake Hands，”Irish Times, October 5，2013；“Every Time We Met a Family We Found New Material, New Facts，”Irish Independent, November 10，2013.

[64]H-BC.

[65]出处同上。

[66]Dillon, The Dirty War, p.44.

[67]出处同上，第44页。记者马丁·狄龙确认两名行刑的枪手分别是吉姆·布赖森和汤米·“托德勒”·托兰（现都已离世）。Dillon, The Dirty War, p.44.

[68]H-BC.

[69]Adams, Before the Dawn, pp.217-218；H-BC；“IRA Chiefs Among 17 Held in Army Raids，”Guardian, July 20，1973.

[70]H-BC.

[71]Adams, Before the Dawn, p.217.

[72]Taylor, Brits, pp.154-155；英国士兵在Brits中接受的采访：“The Secret War”。

[73]Adams, Before the Dawn, pp.217-218.

[74]出处同上，第217-218页。

[75]出处同上，第218页。

[76]Taylor, Brits, pp.154-155.

[77]H-BC.

[78]H-BC.亚当斯和休斯当时对施暴的行为进行了指控。参看“Brutality Against Adams Alleged，”Irish Times, July 23，1973。

[79]H-BC.

[80]Taylor, Brits, p.156.

[81]H-BC；“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涉及此事的一名情报官员后来向记者彼得·泰勒承认，士兵们拍了“战利品”照片，并表示休斯和亚当斯“伤得不轻”。Peter Taylor, Provos：The IRA and Sinn Fein（London：Bloomsbury，1998），p.158.

[82]H-BC.

[83]出处同上。

十一　封锁英格兰！

[1]“Bombs in Placid Lond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0，1973.

[2]出处同上。

[3]“Police Admit‘Human Error'Which Garbled Bomb Warning，”Irish Times, March 10，1973；“Warnings on Phone Sent Reporters Rush ing to Find Named Cars，”Irish Times, September 21，1973.

[4]对马丁·哈克比的采访。

[5]“Warnings on Phone Sent Reporters Rushing to Find Named Cars，”Irish Times, September 21，1973.

[6]对马丁·哈克比的采访；“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7]“Warnings on Phone Sent Reporters Rushing to Find Named Cars，”Irish Times, September 21，1973；“Police Holding 10 in London Blasts，”New York Times, March 10，1973.

[8]“Warnings on Phone Sent Reporters Rushing to Find Named Cars，”Irish Times, September 21，1973.

[9]比利·麦基在Taylor, Provos, p.152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10]P-EM.

[11]“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12]“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P-EM.亚当斯否认自己跟袭击伦敦的计划有任何关系，但普赖斯和布伦丹·休斯都坚称他参与了其中。休·菲尼也是“无名氏”的成员，同时参加了这项任务。他向我确认，亚当斯密切参与了共和军在这段时期的诸多行动。

[13]P-EM.

[14]H-BC.休斯在采访中说：“最初的想法是在贝尔法斯特旅的会议上讨论的，包括我自己、格里·亚当斯、艾弗·贝尔、帕特·麦克卢尔，基本上是这群人。还有汤姆·卡希尔。我们是当时贝尔法斯特旅的主要成员。伦敦爆炸行动的讨论、想法和整个概念都是这群人的主意。”另见“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15]H-BC.

[16]“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17]H-BC.

[18]亚当斯否认说过这句话，甚至全盘否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成员，但有足够的证词证明他曾加入共和军，以及他所说过的话。亚当斯的这些原话来自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回忆。参看“‘Republicanism Is Part of Our DNA，’Says IRA Bomber Dolours Price，”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在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中，布伦丹·休斯对此次会议有相似的描述。

[19]P-EM.

[20]出处同上。

[21]出处同上。

[22]对休·菲尼的采访；“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23]P-EM.

[24]“Protest Now Before It Is Too Late！”Irish People, January 12，

1974；“Biography of an IRA Bomb Squad，”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Gerry Kelly, Words from a Cell（Dublin：Sinn Féin Publicity Department，1989），p.8.

[25]Dolours Price，“I Once Knew a Boy，”The Blanket, July 17，2004.

[26]“Biography of an IRA Bomb Squad，”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27]Bob Huntley, Bomb Squad：My War against the Terrorists（London：W.H.Allen，1977），pp.1-2；“Police Kept Watch on Group at London Airport，”Irish Times, September 18，1973.

[28]“Police Kept Watch on Group at London Airport，”Irish Times, September 18，1973；“Bomb Trial Court Told of Threat，”Irish Times, October 6，1973.

[29]对休·菲尼的采访。

[30]“'Republicanism Is Part of Our DNA，'Says IRA Bomber Dolours Price，”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31]对休·菲尼的采访；Taylor, Provos, p，153。

[32]P-EM；H-BC.

[33]H-BC.

[34]Urban, Big Boys'Rules, pp.32-33.

[35]“IRA Bomb Making Manual and Rocket Seized by Troops，”Telegraph, Januar-y 11，1972.

[36]Mac Stíofáin, Revolutionary in Ireland, p.243.

[37]“Empty Car Causes Panic，”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3，1973.

[38]对休·菲尼的采访。

[39]“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40]出处同上。

[41]Huntley, Bomb Squad, p.4；“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London Explosions Came from Bombs in Cars Hijacked at Gunpoint in Ulster, Crown Says，”Times（London），September 11，1973.

[42]Huntley, Bomb Squad, pp.2，7；Taylor, Provos, p.153；P-EM.

[43]玛丽安·普赖斯在Car Bomb中接受的采访。

[44]Kelly, Words from a Cell, p.9.

[45]出处同上，第9页。

[46]“Bombs Trial Jury Told Girl May Have Had Timing Circuit Sketch，”Times（London），September 12，1973.

[47]出处同上。

[48]Huntley, Bomb Squad, p.8.

[49]“Bombs Trial Jury Told Girl May Have Had Timing Circuit Sketch，”Times（London），September 12，1973.

[50]Huntley, Bomb Squad, p.8；“Bombs Trial Jury Told Girl May Have Had Tim-ing Circuit Sketch，”Times（London），September 12，1973.

[51]Huntley, Bomb Squad, p.8；“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52]对休·菲尼的采访；P-EM。

[53]“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54]出处同上。

[55]Taylor, Provos, p.153.

[56]对休·菲尼的采访。

[57]P-EM.

[58]“Puncture Gives Raid Disastrous Start，”Telegraph, November 15，1973；Huntley, Bomb Squad, p.10.

[59]Huntley, Bomb Squad, p.11.

[60]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The Day of the Terror，”Daily Mir-ror, November 15，1973。

[61]对休·菲尼的采访。

[62]“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63]Brian Friel, The Freedom of the City, in Brian Friel：Plays 1（London：Faber，1996）.

[64]“London Preview of Friel's New Play，”Irish Times, February 23，1973.这部剧事先在都柏林上演过。“Shows Abroad，”Variety, February 28，1973.

[65]“Stephen Rea's Tribute to Brian Friel：A Shy Man and a Showman，”Irish Times, October 2，2015.

[66]“Patriot Games，”People, February 8，1993.

[67]“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68]“London Explosions Came from Bombs in Cars Hijacked at Gunpoint in Ulster, Crown Says，”Times（London），September 11，1973.

[69]“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70]出处同上；Huntley, Bomb Squad, p.16。

[71]Peter Gurney, Braver Men Walk Away（London：HarperCollins，1993），p.140.

[72]Taylor, Provos, p.154.

[73]“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74]Gurney, Braver Men Walk Away, p.140.

[75]Taylor, Provos, p.154.

[76]“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77]“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78]Huntley, Bomb Squad, p.16.

[79]“Bombs Trial Jury Told Girl May Have Had Timing Circuit Sketch，”Times（London），September 12，1973.

[80]Gurney, Braver Men Walk Away, p.143.

[81]“Suspect Car Exploded As Expert Pulled on Line to Disconnect Fuse，”Irish Times, September 15，1973；“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82]“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83]Huntley, Bomb Squad, p.16.

[84]Gurney, Braver Men Walk Away, p.144.

[85]Huntley, Bomb Squad, p.16.

[86]“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87]“Police Admit‘Human Error'Which Garbled Bomb Warning，”Irish Times, March 10，1973.

[88]玛丽安·普赖斯对安德鲁·桑德斯说："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自己被告发了……他们在机场把我们拦下，但事实上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会去。"Andrew Sanders，"Dolours Price, Boston College, and the Myth of the'Price Sisters，'"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Northern Ireland blog, January 24，2013.另见P-EM。

[89]对休·菲尼的采访。

[90]George Clarke, Border Crossing：True Stories of the RUC Special Branch, the Garda Special Branch and the IRA Moles（Dublin：Gill&Macmillan，2009），p.7.

[91]"Police Admit'Human Error'Which Garbled Bomb Warning，"Irish Times, A arch10，1973.

[92]对马丁·哈克比的采访。

[93]"Bombings：'A Sickening Bang, a Pea-Soup Cloud of Dust，'"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73.

[94]出处同上。

[95]"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96]Huntley, Bomb Squad, p.21.

[97]彼得·格尼在Car Bomb中接受的采访。

[98]"Victims Remember，"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99]出处同上；"Police Admit'Human Error，'"Irish Times；Huntley, Bomb Squad, p.21.

[100]"Police Admit'Human Error'Which Garbled Bomb Warning，"Irish Times, March 10，1973；Huntley, Bomb Squad, p.21.

[101]Huntley, Bomb Squad, p.16.

[102]"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Huntley, Bomb Squad, p.17；"Suspect Car Exploded as Expert Pulled on Line to Disconnect Fuse，"Irish Times, September 15，1973.

[103]Huntley, Bomb Squad, p.17；"Thousands Checked in Heathrow Hunt，"I-rish Times, September 19，1973.

[104]Huntley, Bomb Squad, p.17.

[105]"Police Kept Watch on Group at London Airport，"Irish Times, September 18，1973.

[106]Car Bomb中对玛丽安·普赖斯的采访。

[107]Huntley, Bomb Squad, p.17.

[108]出处同上，第17页。

[109]“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110]Huntley, Bomb Squad, p.18.

[111]“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112]Huntley, Bomb Squad, p.18.

[113]“Jury Told Why Crucifix Was Taken Off Girl，”Times（London），October 10，1973.

[114]“Girl Branded‘Evil Maniac，'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10，1973.

[115]出处同上。

[116]“Car-bomb Defendant Smiled at Watch In Interview, 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9，1973.

[117]“Car-bomb Defendant Smiled at Watch in Inter-view, 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9，1973.

[118]“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19]“Whitehall Shaken by Blast，”Guardian, March 9，1973.

[120]“Suspect Car Exploded as Expert Pulled on Line to Disconnect Fuse，”Irish Times, September 15，1973.

[121]Huntley, Bomb Squad, p.20.

[122]“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23]出处同上。

[124]“Whitehall Shaken by Blast，”Guardian, March 9，1973.

[125]“Bombs in Placid Lond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0，1973.

[126]“Shattering Day that Brought the Ulster Troubles Home，”Guardian, March 6，1993.

[127]“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28]“Shattering Day that Brought the Ulster Troubles Home，”Guardian, March 6，1993.

[129]“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30]“Bombings：‘A Sickening Bang, a Pea-Soup Cloud of Dust，'”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73.

[131]Huntley, Bomb Squad, p.21.

[132]出处同上，第21页。

[133]“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34]出处同上。

[135]“Bombings：‘A Sickening Bang, a Pea-Soup Cloud of Dust，'”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73.

[136]对马丁·哈克比的采访；“Warnings on Phone Sent Reporters Rushing to Find Named Cars，”Irish Times, September 21，1973。

[137]“Bombings：‘A Sickening Bang, a Pea-Soup Cloud of Dust，'”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73.

[138]出处同上。

[139]“Bombs in Placid Lond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0，1973.

[140]“A Taste of Ulster's Violence，”Guardian, March 9，1973.

[141]“Car Bombs Wreak Terror and Havoc in London，”Irish Times, March 9，1973.

[142]“Bombings：‘A Sickening Bang, a Pea-Soup Cloud of Dust，'”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73；“London Is Shaken by Two Bombings，”New York Times, March 9，1973.

[143]“London Is Shaken by Two Bombings，”New York Times, March 9，1973.

[144]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p.1515-1516.

[145]Huntley, Bomb Squad, p.22；McKittrick et al.，pp.1515-1516.

[146]Huntley, Bomb Squad, p.22；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p.1515-1516.

[147]“Old Bailey Bomber Dolours Price Accused Gerry Adams of Being Behind Ab-ductions of‘The Disappeared，'”Telegraph, May 2，2014.

[148]其中一名炸弹手罗伊·沃尔什随后表示：“我们认为我们发出了充分的警A。我们觉得一小时绰绰有余。我们给出了所有汽车的特征，包括车牌号和地点。我认为是警方反应迟缓导致了许多人受伤。”Taylor, Pro-vos, p.155.

[149]“Police Admit‘Human Error'Which Garbled Bomb Warning，”Irish Times, March 10，1973；“Our Blunder Say Police，”Daily Express, March 10，1973.

[150]“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151]H-BC.

[152]Huntley, Bomb Squad, p.24.

[153]“Girl Branded‘Evil Maniac'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10，1973；“Jury Told Why Crucifix Was Taken Off Girl，”Times（London），October 10，1973；“Bomb Trial Court Told of Threat，”Irish Times, October 6，1973；“Photo with No Blanket Alleged，”Guardian, October 6，1973.

[154]Huntley, Bomb Squad, p.24；“Girl Branded‘Evil Maniac'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10，1973；“Car-bomb Defendant Smiles at Watch in In-terview, Court Told，”Irish Times, October 9，1973.

[155]Huntley, Bomb Squad, p.24.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1]H-BC.

[2]“IRA Leader Escapes from Maze Prison，”Irish Times, December 10，1973.

[3]H-BC.瓦利戴于1987年去世，似乎是由于服药过量导致呕吐而被呕吐物噎死。参看“Hooded Men Stalk Feud Opponents in Belfast，”Irish Times, February 20，1987。香肠卷饼的比喻不是我想出来的：参看Taylor, Provos, p.160。

[4]Adams, Before the Dawn, p.225.

[5]H-BC.

[6]“IRA Man Escapes from Long Kesh，”Irish Times, February 8，1972；“McGuigan Keeps Secret of Escape from Long Kesh，”Irish Times, February 14，1972.

[7]“More Violence As IRA Factions Agree，”Reuters, September 11，1973.

[8]Adams, Before the Dawn, p.225.

[9]Homer, The Odyssey, trans.Robert Fagles（New York：Penguin，1997），Book 9，p.225.

[10]H-BC.

[11]H-BC；Adams, Before the Dawn, p.225；“Provos Claim Chief Evaded Security Net，”Guardian, April 8，1974.

[12]“Helicopter Snatch from Dublin Gaol a Boost to Provos，”Guardian, November 1，1973.

[13]H-BC.

[14]出处同上。

[15]出处同上。

[16]Adams, Before the Dawn, p.227；对布伦丹·休斯的采访，Radio Free Éireann, WBAI, March 17，2000。

[17]在2000年3月17日Radio Free Éireann的采访中，休斯说有四五个小时。

[18]H-BC.

[19]H-BC.格里·亚当斯对整件事的回忆和休斯十分相近。他记得清点人数时他们进行了“掩护”，所以休斯逃狱的事当天没有被发现。参看Adams, Before the Dawn, pp.227-228。然而休斯回忆说，掩护让他完成了逃跑的第一步，但这一计策在下午清点人数时被发现。

[20]H-BC.

[21]出处同上。

[22]出处同上。

[23]出处同上；布伦丹·休斯的采访，Radio Free Éireann, WBAI, March 17，2000.

[24]H-BC.

[25]“Hunt on for Long Kesh Escapee，”Irish People, December 22，1973.

[26]这个细节和有关此事剩余的所有描述都来自H-BC。

[27]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

[28]Michael Mansfield, Memoirs of a Radical Lawyer（London：Bloomsbury，2009），p.146.

[29]“The Best Form of Attack，”Guardian, October 25，1997.

[30]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Mansfield, Memoirs, pp.33-34。

[31]“Meet Britain's Boldest Barrister，”Independent, May 7，2008.

[32]“The Best Form of Attack，”Guardian, October 25，1997.

[33]Mansfield, Memoirs, p.146.

[34]出处同上；第146页。

[35]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和戴维·沃尔什的采访。

[36]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Mansfield, Memoirs, p.147。

[37]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

[38]Mansfield, Memoirs, p.147.

[39]“Britain Charges Ten in London Bombings，”New York Times, March 13，1973.

[40]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

[41]Raleigh Trevalyan, Sir Walter Raleigh（New York：Henry Holt，2002），pp.376-377.

[42]Ruán O’Donnell, Special Category：The IRA in English Prisons, vol.1：1968-1978（Sallins, Ireland：Irish Academic Press，2012），p.115.

[43]Dolours Price，“The UnHung Hero，”The Blanket, August 3，2004.

[44]“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45]“Security Precautions at Winchester Courthouse，”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46]“Marksmen on Watch at Conspiracy Trial，”Times（London），September 10，1973.

[47]O'Donnell, Special Category, vol.1，p.117.

[48]“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49]“Actress, Novelist, and MP Offer Bail for 10‘Bomb Plot'Accused，”Guardian, March 28，1973.

[50]“The Sisters of Terror，”Observer, November 18，1973.

[51]“Biography of an IRA Bomb Squad，”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52]出处同上。

[53]“Deadlier Than the Male，”Daily Mirror, September 25，1975.

[54]“Lord Rawlinson of Ewell，”Telegraph, June 29，2006；“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83.

[55]“Central London Bombs Trial Opens，”Irish Times, September 11，1973.

[56]出处同上。

[57]“Bomb Trial Court Told of Threat，”Irish Times, October 6，1973.

[58]“Accused Girl Says She Would Back IRA Aims，”Times（London），October 25，1973.

[59]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Mansfield, Memoirs, p.148。

[60]Peter Rawlinson, A Price too High：An Autobiograph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9），p.229.

[61]“Bomb Trial Jury Told of Tools in Shopping Bag，”Times（London），Septem-ber 20，1973.

[62]“Police Say What Handbags Held，”Irish Times, September 20，1973.

[63]“Yard Man Describes Indentations in Notebook，”Times（London），Septem-ber 27，1973；“Ulster's Price Sisters：Breaking the Long Fast，”Time, June 17，1974.

[64]“London Bombs Trial Told About Handbag Secrets，”Irish Times, September 12，1973；“Bombs Trial Jury Told Girl May Have Had Timing Circuit Sketch，”Times（London），September 12，1973；“Court Moves to Darkened Room for Notebooks Demonstration，”Irish Times, October 3，1973.

[65]“Bomb Trial Court Told of Threat，”Irish Times, October 6，1973.

[66]Huntley, Bomb Squad, p.2；“Bomb Trial Court Told of Threat，”Irish Times, October 6，1973.

[67]Huntley, Bomb Squad, p.24.

[68]O'Donnell, Special Category, vol.1，p.116.

[69]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70]“The Sisters of Terror，”Observer, November 18，1973.

[71]出处同上。

[72]“Violence‘Not Included in IRA Principles，'”Guardian, October 26，1973；“Evidence Given on Handwriting，”Irish Times, October 26，1973.

[73]“Defiance from IRA Group Who Pledge Jail Protest，”Irish Times, November 16，A 973.

[74]“Defiant Right to the End，”Daily Express, November 16，1973.

[75]“Snipers on Rooftops in Huge Security Check，”Daily Mirror, September 11，1973.

[76]“Sentences Today As Eight Are Convicted on All Charges，”Irish Times, No-vember 15，1973.

[77]对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采访。

[78]“Sentences Today As Eight Are Convicted on All Charges，”Irish Times, No-vember 15，1973.

[79]“Marks in Notebook‘Showed Time Bomb Circuits，'”Guardian, September 12，1973.

[80]“Hostage Threat As IRA Eight Are Convicted in London Bombs Trial，”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81]“Sentences Today As Eight Are Convicted on All Charges，”Irish Times, No-vember 15，1973.

[82]出处同上。

[83]对休·菲尼的采访；“Sentences Today As Eight Are Convicted on All Char-ges，”Irish Times, November 15，1973；“Hostage Threat As IRA Eight Are Convicted in London Bombs Trial，”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84]“But for Roisin Freedom and a Secret Hide-Out，”Daily Express, November 15，1973.

[85]出处同上。

[86]“IRA Eight Start Hunger Strike after Being Jailed for Life，”Times（London），November 16，1973.

[87]“Life Sentences for Winchester Eight，”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88]“IRA Eight Start Hunger Strike after Being Jailed for Life，”Times（London），November 16，1973.

[89]出处同上。

[90]“Defiance from IRA Group Who Pledge Jail Protest，”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91]“Defiant Right to the End，”Daily Express, November 16，1973.

[92]“Defiance from IRA Group Who Pledge Jail Protest，”Irish Times, November 16，1973.

[93]“Hostage Threat As IRA Eight Are Convicted in London Bombs Trial，”Times（London），November 15，1973.

[94]“IRA Planning to Kidnap 10 Hostages from an English Village in Reprisal for Sentences，”Times（London），November 16，1973.

[95]“Deadliest Sentence of Them All，”Daily Mirror, November 17，1973.

[96]“IRA Eight Start Hunger Strike after Being Jailed for Life，”Times（London），November 16，1973.

[97]出处同上。

[98]“Sinn Féin Start Campaign over London Bombers，”Times（London），No-vember 24，1973.

十三　玩具推销员

[1]Dillon, The Dirty War, p.64.

[2]Taylor, Brits, p.157.

[3]“Two Top IRA Men Captured in Flat in Fashionable Belfast Suburb，”Times（Lon-don），May　11，1974；H-BC.当时的媒体报道经常描述他穿着“细条纹”西装，但休斯说是灰格子西装。

[4]“IRA Terror Den Smashed，”Daily Express, May 11，1974.

[5]Brits：“The Secret War.”

[6]出处同上。

[7]H-BC.

[8]出处同上。

[9]Taylor, Brits, p.157.

[10]Jonathan Stevenson, We Wrecked the Place：Contemplating an End to the Northern Irish Troubles（New York：Free Press，1996），p.32.

[11]布伦丹·休斯接受的采访，Radio Free Éireann, WBAI, March 17，2000；Dil-lon, The Dirty War, p.63。

[12]“Bridegroom Guise in Kesh Escape，”Irish People, April 27，1974.

[13]H-BC.

[14]Taylor, Brits, p.158；Dillon, The Dirty War, p.65.

[15]Taylor, Brits, p.158；Dillon, The Dirty War, p.65.

[16]Taylor, Brits, p.158；Dillon, The Dirty War, p.65.

[17]Brits：“The Secret War”；“Provisionals Breach British Security，”Irish Times, July 22，1974.这一行动曝光后，英军的发言人坚称休斯没有获取任何重要情报，并表示军官们非常谨慎，甚至不会在看似已经被扰频的通话中谈论任何敏感的问题。参见“Phone Tapping‘Unimportant，’”Irish People, August 3，1974。

[18]“Army Smashes the Provos'Life at the Top，”Guardian, May 11，1974.

[19]“Two Men Get 15 Years for Having Rifles，”Irish Times, February 4，1975；“British Army Aims to Press Charges after Disclosure About Lisburn Phone Tapping，”Irish Times, July 23，1974；Taylor, Brits, p.159.

[20]Dillon, The Dirty War, pp.65-66.

[21]Brits：“The Secret War.”

[22]“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 of History，”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十四 终极武器

[1]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7。其他细节源自作家罗南·本内特的回忆，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度过19个月：“Back to Brixton Prison，”Guardian, January 31，2001。

[2]杜洛尔丝·普赖斯对家人所言，January 8，1974，in Irish Voices, p.46。

[3]O'Donnell, Special Category, vol.1，p.96.

[4]“The Price Sisters，”Spare Rib no.22（April 1974）.

[5]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9.

[6]“Back to Brixton Prison，”Guardian, January 31，2001.

[7]杜洛尔丝·普赖斯接受的采访，The Chaplain’s Diary, radio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Lorelei Harris（RTÓRadio，2002）.

[8]这个囚犯编号出现在有关普赖斯于布里克斯顿服刑的许多文件中，这些文件现存于基尤国家档案馆。

[9]Chronology of Ev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Bomb Explosions of 8 March 1973 and Subsequent Events,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re-land（1973），National Archives of Ireland.

[10]对休·菲尼的采访。

[11]Beresford, Ten Men Dead, p.7.

[12]这部戏剧是《国王的门槛》。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B.Yeats, vol.II：The Plays（New York：Scribner，2001），p.122.

[13]“Mayor McSwiney Dies，”The Independent（U.S.），November 6，1920.

[14]“MacSwiney's Funeral，”The Independent（U.S.），November 13，1920；“Trib-ute Paid in Chicago by Great Throng，”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1920；“10000 in‘Cortege，'”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920；“Thousands March in MacSwiney's Funeral Cortege in London，”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8，1920.

[15]Padraig 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The Irish Hunger Strikes and the Politics of De-spair（Boston：Beacon Press，1990），pp.26-27.

[16]“Thousands March in MacSwiney's Funeral Cortege in London，”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8，1920.

[17]玛丽安·普赖斯对家人所言，February 3，1974，in Irish Voices, p.57。

[18]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9.

[19]杜洛尔丝·普赖斯对家人所言，January 10，1974，in Irish Voices, p.48。

[20]Dolours Price，“Once Again, the Big Transition，”The Blanket, January 28，2007.

[21]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0.

[22]Ian Miller, A History of Force Feeding：Hunger Strikes, Prisons and Medical Ethics，1909-1974（Basingstoke, U.K.：Palgrave Macmillan，2016），p.197.

[23]“Protest Now Before It Is Too Late！”Irish People, January 12，1974.

[24]许多文献对统计数字争论不休，但这两个估计数字得到了一致认同。参看R.F.Foster, Modern Ireland，1600-1972（New York：Penguin，1989），pp.323-324。

[25]“在爱尔兰人民因为饥饿而死亡的整个时期，有大量食物从爱尔兰出口至英国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长久而动荡的历史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以及两国间极度怨恨的关系。”Cecil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Ireland，1845-1849（New York：Penguin，1991），p.75.相较于宏观视角，这一事件的特殊性使得它更为复杂：在所提及的这段时期，即便爱尔兰在饥荒期间确实从始至终进行了食品的出口，它仍是食品的净进口国。爱尔兰的状况也并不能一刀切：国内的不同地区种植并消费不同的作物；不仅仅是英国人，爱尔兰的地主阶层也在本可以用于国内消费的食品上串通一气地出口国外；天主教商人和农民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投机食品。关于修正主义的探讨，参看Colm Tóibín and Diarmaid Ferriter, The Irish Famine：A Documenta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1），pp.6-16。若欲获得更广泛的了解，也可参看Foster, Modern Ireland, chap.14。关于英国人在实际意义上究竟应承担多少道德责任的辩论在这一背景下无关紧要：在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的世界里，英国人的罪责理所应当。

[26]John Mitchel, The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Perhaps）（Glasgow：R.&T.Wash-bourne，1861）.

[27]Dolours Price，“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28]杜洛尔丝·普赖斯于1974年5月23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刊登于The Irish People, June 22，1974。

[29]Dolours Price，“A Salute to Comrades，”The Blanket, May 18，2005.

[30]Roy Jenkins, A Life at the Centre（London：Macmillan，1991），p.382.

[31]普赖斯宣誓书；R.I.K.布莱思医生的治疗记录（基尤国家档案馆）。

[32]这一描述取自布里克斯顿首席医疗官R.I.K.布莱思医生于1974年5月13日写给财政部律师D.A.沃森的一封信中提供的叙述（基尤国家档案馆）。以及来自以下信息：普赖斯宣誓书；杜洛尔丝后来提供的有关进食经历的陈述，摘录于“English Government Tortures Irish Prisoners by Force Feed-ing，”Irish People, December 15，1973；连同2004年苏珊娜·布林对玛丽安·普赖斯就进食经历进行的采访，收录于“Old Bailey Bomber Ashamed of Sinn Féin，”Village, December 7，2004。

[33]普赖斯宣誓书。

[34]进食食物的详细信息来自：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书，1974年1月23日，刊登于in Irish Voices, p.53；“Concern Grows among Relatives of Four Hunger Strikers，”Times（London），January 16，1974；以及“Old Bailey Bomber Ashamed of Sinn Féin，”Village, December 7，2004。这份配方来自杜洛尔丝·普赖斯的治疗记录（基尤）。

[35]“Old Bailey Bomber Ashamed of Sinn Féin，”Village, December 7，

2004.

[36]玛丽安·普赖斯的治疗记录。

[37]杜洛尔丝·普赖斯1973年12月10日的信件，收信人不详。1973年12月22日由The Irish People引述。

[38]“Forcibly Fed：The Story of My Four Weeks in Holloway Gaol，”McClure's, August 1913.

[39]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书，摘录于“Concern Grows among Relatives of Four Hunger Strikers，”Times（London）January 16，1974。

[40]出处同上。

[41]出处同上。

[42]“Mrs.McAliskey Visits Price Girls，”Irish Times, January 11，1974；“Frighte-ning Appearance of Dolours Price Described，”Irish Times, February 7，1974.

[43]“Letters on Force Feeding Treatment Forbidden，”Irish People, February 2，1974.布里克斯顿的牙医证实了这一点。参看“Ulster’s Price Sisters：Breaking the Long Fast，”Time, June 17，1974。

[44]“Sister Tells of Visiting Price Girls，”Irish People, February 2，1974.

[45]“Letters on Force Feeding Treatment Forbidden，”Irish People, February 2，1974.

[46]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0.

[47]“Old Bailey Bomber Ashamed of Sinn Féin，”Village, December 7，2004.

[48]出处同上。

[49]出处同上。

[50]Jenkins, A Life at the Centre, p.378.

[51]出处同上，第377页。

[52]出处同上，第377页。

[53]玛丽安·普赖斯的治疗记录（基尤国家档案馆）。

[54]Miller, A History of Force Feeding, p.210.

[55]“Effect of Force Feeding Like Multiple Rape Says Psychiatrist，”Irish People, March 23，1974.

[56]玛丽安·普赖斯的家书，1974年1月7日，刊登于“The Price Sisters，”Spare Rib no.22（April 1974）。

[57]“Lest We Forget，”Daily Express, June 1，1974.

[58]“England, You Shall Pay Dearly，”Irish People, March 2，1974.

[59]P-TKT.

[60]“‘Let the Price Sisters Starve，'Send Them Back Says MP，”Irish People, February 16，1974.

[61]布里克斯顿监狱长B.D.威金顿1973年4月14日和5月20日的日记中的记录。可以在London’s Oldest Prison网站上查看，该网站由克里斯托弗·英庇维护。

[62]“Bomb Victim's Father Now Supports Prices，”Irish People, June 8，1974.

[63]出处同上。

[64]“UDA Back Price Girls，”Irish People, February 16，1974.

[65]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书，1974年2月4日，收录于Irish Voices, pp.58-59。

[66]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0.

[67]出处同上，第7页。

[68]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书，1974年1月28日，Irish Voices, p.54。

[69]“Letter to‘The Times'Says That Vermeer Will Be Burnt on Sunday，”Times（London），March 13，1974.

[70]出处同上。

[71]“Price Sisters Ask That Painting Be Returned，”Irish People, March 23，1974.

[72]“Threat to Destroy Stolen Vermeer，”Irish Times, March 13，1974.

[73]“Stolen Vermeer Found in a Churchyard，”Belfast Telegraph, May 7，1974.

[74]“Demand by Art Thieves，”Irish Times, May 4，1974；“Ransom Note Offers Five Paintings If Prisoners Are Moved to Ulster，”Times（London），May 4，1974.

[75]“Dr.Rose Faces Court Today，”Daily Express, May 6，1974.

[76]“Hostages Teach IRA Kidnappers All About Racing，”Irish Times, June 10，1974.另一个人质则没这么幸运。托马斯·尼德迈尔是一位45岁的德国实业家，在邓穆里经营一家工厂。1973年12月27日，他在自己的家中被绑架。根据两名参与劫持他的共谋犯所言，他们的目的是用尼德迈尔“交换”普赖斯姐妹。然而遭到绑架的数天后，他在一次和劫持者的打斗中丧命。尼德迈尔被秘密地埋在了一个浅坟里，直到1980年他的遗骸才被发现。如果没有找到这些遗骸，今天他的名字更可能被列入北爱尔兰问题时期遭遇强行失踪的人之列。参看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410。

[77]杜洛尔丝·普赖斯给朋友的一封信，1974年5月23日，刊登于The Irish People, June 22，1974。

[78]出处同上。

[79]出处同上。

[80]Jenkins, A Life at the Centre, p.377.

[81]“Jenkins Demands Ultimate：Death for Price Sisters，”Irish People, June 8，1974.

[82]“Price Sisters Losing 1lb Weight a Day，”Irish Times, May 27，1974.

[83]杜洛尔丝·普赖斯给朋友的一封信，1974年5月23日，刊登于The Irish People, June 22，1974。

[84]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0.

[85]出处同上，第10页。

[86]“Price Sisters Losing 1lb Weight a Day，”Irish Times, May 27，1974.

[87]杜洛尔丝·普赖斯写给克丽茜·普赖斯的信，摘录于“Price Sisters Threat，”Daily Mirror, May 31，1974。

[88]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9.

[89]Dolours Price to Chrissie Price, May 27，1974，in Irish Voices, p.61.

[90]“Price Sisters Threat，”Daily Mirror, May 31，1974.

[91]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p.11-12.

[92]“Jenkins Demands Ultimate：Death for Price Sisters，”Irish People, June 8，1974.

[93]“Fears Havoc in Ulster If Daughters Die In London，”Associated Press, June 1，A 974.

[94]“An IRA Warning If Sisters Die，”Belfast Telegraph, May 30，1974.

[95]“Price Sisters‘Last Rites，'”Daily Mirror, May 28，1974.

[96]杜洛尔丝·普赖斯写给朋友的信，1974年5月23日，刊登于a friend, May 23，1974，reproduced in The Irish People, June 22，1974。

[97]Coogan, The IRA, pp.415-417.

[98]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2.

[99]出处同上，第12页。

[100]“The Gaughan Funeral，”Irish Press, June 19，1974.

[101]Jenkins, A Life at the Centre, p.378.

[102]出处同上，第380页。

[103]“Statement from Dolours and Marian, Gerry Kelly and Hugh Feeney，”June 8，1974.

[104]“Price Girls in Durham，”Irish Independent, December 16，1974.

[105]杜洛尔丝·普赖斯在The Chaplain’s Diary, RTÓRadio接受的采访。

[106]Dolours Price，“Brixton, Durham and Armagh Gaol，1973，”in In the Foot-steps of Anne：Stories of Republican Women Ex-Prisoners, ed.Evelyn Brady, Eva Patterson, Kate McKinney, Rosie Hamill, and Pauline Jackson（Belfast：Shan-way Press，2011），p.134.

[107]出处同上，第134页。

[108]出处同上，第134页。

[109]杜洛尔丝·普赖斯在The Chaplain’s Diary, RTÓRadio接受的采访。

[110]Price，“Brixton, Durham and Armagh Gaol，1973，”in 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34.

[111]“Provisional Sinn Féin to Establish Its Own 24-Hour Centres to Monitor Ceasefire，”Irish Times, February 12，1975.

[112]“A Voice Uncompromised by Prison, Hunger Strike, Years，”Sunday Trib-une, March 9，2003.

[113]“IRA Leaders at Price Funeral，”Irish Press, February 19，1975；“Price Sisters Send Wreaths As Mother Is Buried in Belfast，”Irish Times, February 19，1975.

[114]“Price Sisters Send Wreaths As Mother Is Buried in Belfast，”Irish Times, Feb-ruary 19，1975.

十五　俘虏

[1]McKendry, Disappeared, p.23.

[2]出处同上，第24页。

[3]出处同上，第24页。

[4]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5]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 vol.3，chap.9，module 4：“Sisters of Nazareth, Belfast—Nazareth Lodge”（2017）.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被安置在拿撒勒屋舍之前，最初被迁至了另一个地方。为了叙事的简洁，我不得不对这段时期住房安排的描写有所拣择。

[6]出处同上。

[7]“The Nuns Poured Boiling Water on Our Heads，”Belfast News Letter, May 7，2016.

[8]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9]出处同上。

[10]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1]出处同上。

[12]HIA笔录；HIA证人陈述。

[13]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 vol.4，chap.11，module 3：“De La Salle Boys Home, Rubane House.”

[14]HIA笔录。

[15]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Rubane；HIA笔录；HIA证人陈述。

[16]HIA证人陈述。

[17]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Rubane.

[18]HIA证人陈述；Rubane House过去的一些员工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19]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Rubane.

[20]出处同上。

[21]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2]出处同上。

[23]HIA证人陈述；“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24]HIA笔录。

[25]HIA证人陈述。麦康维尔家有几个孩子向HIA提供了证词。该证词的文本已经公开发表，但为了不披露身份，其中使用的都是化名。虽然我在书中也做了类似的处理，但这些证词为了解男孩之家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利·麦康维尔现已不在人世，但在提供证词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匿名。参看“Son of Jean McConville Reveals Hell of Being Abused by Notorious Paedophile Priest Brendan Smyth，”Irish Mirror, November 6，2014；“I Was Victim of Abuse in Boys’Home, Jean McConville’s Son Tells Inquiry，”Belfast Telegraph, November 7，2014；“McConville Children Abused in Home Following Murder of Their Mother，”Irish News, January 21，2017。

[26]“Sisters of Nazareth Become Second Catholic Order to Admit to Child Abuse，”Guardian, January 14，2014.

[27]McKendry, Disappeared, p.29.

[28]出处同上，第29页。

[29]“Jean McConville's Daughter：‘If I Give Up Fighting, They've Won，'”Guardi-an, July 5，2014；McKendry, Disappeared, pp.2-6.

[30]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1]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 vol.5，chap.15，module 7：“Lisnevin.”

[32]出处同上。

[33]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Report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buse Inquiry：Lisnevin。

[34]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5]“Inquiry Told of‘Sectarian Abuse'at Co Down Training School，”Belfast Tele-graph, September 2，2015.

[36]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8]“Release of Long Kesh Men Cancelled After Car Bombings，”Times（London），July 27，1974；Adams, Before the Dawn, pp.230-232.

[39]Adams, Before the Dawn, p.222.

[40]H-BC.

[41]Adams, Before the Dawn, p.242.

[42]出处同上，第223页。

[43]H-BC.

[44]Adams, Cage Eleven, p.3.另见Lachlan Whalen，“‘Our Barbed Wire Ivory Tower’：The Prison Writings of Gerry Adams，”New Hibernia Review, vol.10，no.2（Summer 2006），pp.123-139。

[45]H-BC.

[46]“Portrait of a Hunger Striker：Brendan Hughes，”Irish People, December 6，1980.

[47]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97.

[48]出处同上，第150页。

[49]出处同上，第197页。

[50]出处同上，第149-151页。

[51]约翰·F.莫里森的一篇博士论文引用了乔·多尔蒂的这一回忆。“The Affir-mation of Behan？”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isation Process of the 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Movement through an Organisational Analysis of Splits from 1969 to 1997（University of St.Andrews，2010），pp.184-185.

[52]亚当斯承认“布朗尼”是他的笔名。参看Adams, Cage Eleven, p.3。

[53]Beresford, Ten Men Dead, p.19.

[54]Adams, Before the Dawn, p.247.

[55]H-BC.

[56]H-BC.

[57]Urban, Big Boys'Rules, pp.30-31.

[58]H-BC；Adams, Before the Dawn, p.251.

[59]H-BC.

[60]“Cautious Reactions As the Last N.I.Detainees Are Set Free，”Irish Times, De-cember 6，1975.

[61]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77.

[62]“One Man, One Cell，”Irish Times, February 26，1976.

[63]Tim Pat Coogan, On the Blanket：The Inside Story of the IRA Prisoners'“Dirty”Pro-test（New York：Palgrave，2002），pp.93-94.

[64]Francie Brolly，“The H-Block Song.”

[65]Coogan, On the Blanket, p.93.

[66]Beresford, Ten Men Dead, p.17.

[67]这个阶段被称为“不洗澡”抗议。English, Armed Struggle, p.191；Beresford, Ten Men Dead, p.27；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21.

[68]Beresford, Ten Men Dead, p.17；“Rebels Refuse to Use Toilets in Ulster Jail，”Reuters, April 25，1978.

[69]Taylor, Behind the Mask, p.257.

[70]出处同上，第258页。

[71]McKittrick and McVea,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p.140.

[72]H-BC.

[73]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p.159-160.

[74]“Ballybofey Republican Reunion，”Irish People, May 10，1980.

[75]“IRA Bombs Kill Mountbatten and 17 Soldiers，”Guardian, August 28，1979.

[76]Margaret 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New York：HarperCollins，1995），pp.31-32.

[77]“The Airey Neave File，”Independent, February 22，2002.

[78]这句话出自戴维·古多尔爵士和迈克尔·利利斯的叙述，记录于Thatcher and the IRA：Dealing with Terror, documentary（BBC，2014）。

[79]“Neave's Assassins Linked with North Political Killings，”Irish Times, April 2，1979.

[80]“Commons Car Bomber Assassinates Neave，”Guardian, March 31，1979.

[81]“A Look at Ulster's Maze and the‘Men on the Blanket，'”Associated Press, March 16，1979.

[82]Taylor, Behind the Mask, p.258.

[83]出处同上，第254页。

[84]出处同上，第253页。

[85]1981年3月5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贝尔法斯特发表的演讲。

[86]1981年4月21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利雅得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87]彼得·泰勒对休斯进行过大量采访，他说报名的有170人（Taylor, Behind the Mask, p.270）；休斯在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历史中表示，人数是“90多人”。

[88]“Hunger Strike Begins，”Irish People, November 1，1980.

[89]H-BC.

[90]Beresford, Ten Men Dead, p.28.

[91]“Don't Let Them Die！”Irish People, November 8，1980.

[92]“Hunger Striker Fights for Eyesight，”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0，2006.

[93]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206.

[94]H-BC.

[95]出处同上。

[96]出处同上。

[97]“Hunger Striker Fights for Eyesight，”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0，2006.

[98]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35.

[99]H-BC.

十六　发条娃娃

[1]Raymond Murray, Hard Time：Armagh Gaol 1971-1986（Dublin：Mercier Press，1998），p.7.

[2]Margaretta D'Arcy, Tell Them Everything（London：Pluto Press，1981），p.11.

[3]“Terror Sisters Flown Out，”Daily Express, March 19，1975.

[4]Price，“Brixton, Durham and Armagh Gaol，1973，”in 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34.

[5]出处同上，第135页。

[6]Recollection of Geraldine McCann, in 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48.

[7]Recollection of Kathleen McKinney, in 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42.

[8]Recollection of Dolours Price in 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35.

[9]出处同上，第135页。

[10]“Special Status for Sisters Expected，”Irish Times, March 20，1975.

[11]出处同上。

[12]Coogan, On the Blanket, pp.236-237.

[13]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35.

[14]出处同上，第135页。

[15]Coogan, On the Blanket, p.236.

[16]1977年9月29日，杜洛尔丝·普赖斯写给芬纳·布罗克韦的信（Brockway Papers, 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7]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44.有关这些工艺品的信息，参看Máirtín Ó Muilleoir，“The Art of War：A Troubles Archive Essay，”Arts Council of Northern Ireland，2009。

[18]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136.

[19]1977年10月29日，杜洛尔丝·普赖斯写给芬纳·布罗克韦的信（Brock-way

Papers）。

[20]Brady et al.，Footsteps of Anne, p.216.

[21]出处同上，第136页。

[22]出处同上，第136页。

[23]Murray, Hard Time, p.11.

[24]P-TKT.

[25]“La Mon Bomb Produced Ball of Fire 60 Feet in Diameter，”Irish Times, July 26，1978.

[26]P-TKT.

[27]Dolours Price，“Bun Fights&Good Salaries，”The Blanket, March 27，2007.

[28]芬纳·布罗克韦写给汉弗莱·阿特金斯的信，1980年6月27日（Brockway Papers）。

[29]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The Chaplain’s Diary, RTÓRadio。

[30]“Mystery of the Four Who Got Away，”Daily Express, April 24，1981.

[31]“The Release of Marian Price，”memorandum enclosed in a letter from R.A.Harrington,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Office, to Michael Alexander, of Downing Street, May 1980（no exact date specified）（National Archives, Kew）.

[32]出处同上。

[33]“Marian Price Set Free，”The Irish Times, May 1，1980.

[34]“The Release of Marian Price.”

[35]“Mystery of the Four Who Got Away，”Daily Express, April 24，1981.

[36]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The Chaplain’s Diary, RTÓRadio。

[37]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p.36-37，44-45；Beresford, Ten Men Dead, pp.41-42.

[38]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3.

[39]Beresford, Ten Men Dead, p.57.

[40]出处同上，第62-63页。

[41]McKittrick and McVea,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p.146.

[42]Beresford, Ten Men Dead, pp.69-72.

[43]出处同上，第72-73页。

[44]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p.149-150.

[45]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98.

[46]“Sinn Féin Vice-President Gerry Adams，”Irish People, November 27，1982.

[47]Coogan, The Troubles, p.282；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202.

[48]“Sands Election a Propaganda Win for Hunger Strike，”Irish Times, April 11，1981.

[49]“Prime Minister's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rth-ern Ireland on Saturday Evening，25 April 1981，”Prime Minister's Office Re-cords, National Archives（Kew）.

[50]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The Chaplain’s Diary, RTÓRadio。

[51]北爱尔兰办事处寄给芬纳·布罗克韦的未署名信件，1980年6月17日（Brockway Papers）。

[52]杜洛尔丝·普赖斯给芬纳·布罗克韦的去信，日期写着“1980年10月二十几日”（Brockway Papers）。

[53]M.W.霍普金斯（北爱尔兰办事处）给迈克尔·亚历山大（唐宁街10号）的A信，1980年11月2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54]杜洛尔丝·普赖斯给芬纳·布罗克韦的去信，日期写着“1980年10月二十几日”（Brockway Papers）。

[55]出处同上。

[56]芬纳·布罗克韦写给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信，1980年10月25日（Brock-way Papers）。

[57]玛格丽特·撒切尔写给芬纳·布罗克韦的信，1980年11月11日（Brock-way Papers）。

[58]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芬纳·布罗克韦来信上的笔迹，1980年10月25日（Brockway Papers）。

[59]Coogan, On the Blanket, pp.236-237.

[60]托马斯·奥·菲奥赫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信，1981年4月3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61]玛格丽特·撒切尔致托马斯·奥·菲奥赫的信，1981年4月13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62]M.W.霍普金斯给迈克尔·亚历山大的去信，1981年4月1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63]“Worst Violence in Eight Nights Hits Northern Ireland，”Associated Press, A-pril 23，1981.

[64]Dolours Price，“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65]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3.

[66]Adams, Before the Dawn, p.297.

[67]Beresford, Ten Men Dead, p.103.

[68]Taylor, Behind the Mask, p.283；McKittrick and McVea,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p.144.

[69]“Price Release Sparks Protest，”Irish Times, April 23，1981.

[70]Dolours Price，“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71]O'Malley, Biting at the Grave, p.64.

[72]Dolours Price，“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73]Steven H.Miles and Alfred M.Freedman，“Medical Ethics and Torture：Re-visiting the Declaration of Tokyo，”The Lancet, vol.373，no.9660（January 2009）.

[74]若想深入研究促使这一政策改变的动因，请参阅Miller, A History of Force Feeding, chap.7。另见“Why H-Block Hunger Strikers Were Not Force Fed，”Irish Times, July 5，2016。

[75]Dolours Price，“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十七　有为剧团

[1]“Fury As IRA Terror Girl Goes Free，”Daily Express, April 23，1981；“‘She Should Be Left to Rot，'”Daily Mail, April 23，1981.

[2]“Price Release Sparks Protest，”Irish Times, April 23，1981；“IRA‘Trick'Freed Bomb Girl，”Daily Star, April 23，1981.

[3]Dolours Price，“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The Blanket, June 29，2006.

[4]M.W.霍普金斯（北爱尔兰办事处）给迈克尔·亚历山大（唐宁街10号）的去信，1981年7月31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5]唐宁街首席私人秘书克莱夫·惠特莫尔致北爱尔兰办事处M.W.霍普金斯的信，1981年8月3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6]Dolours Price，“Mind Over Matter Can Lead to Death，”Irish Press, December 6，1982.

[7]北爱尔兰办事处德里克·希尔致唐宁街威廉·里基特的信，1983年2月2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8]“Dolours Price/Rea，”memo marked“Secret，”prepared by M.W.Hopkins, October 24，1984（基尤国家档案馆）。

[9]“The Saturday Column，”Irish Times, November 20，1982.

[10]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Price，“Afraid of the Dark，”Krino no.3（Spring 1987），p.10.

[11]“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12]“Wolf Wistful；Janet Watts Meets Stephen Rea，”Guardian, February 3，1977.

[13]“Fame, Family&Field Day，”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6，2006.

[14]“Stephen Rea：‘I Never Wanted to Be a Polite Actor，'”Telegraph, March 25，2016.

[15]“Wolf Wistful；Janet Watts Meets Stephen Rea，”Guardian, February 3，1977.

[16]出处同上。

[17]“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18]Ronan Bennett，“Don't Mention the War：Culture in Northern Ireland，”in Re-thinking Northern Ireland, ed.David Miller（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8），p.210.

[19]“Wolf Wistful；Janet Watts Meets Stephen Rea，”Guardian, February 3，1977.

[20]“Stephen Rea：‘I Never Wanted to Be a Polite Actor，'”Telegraph, March 25，2016.

[21]Bennett，“Don't Mention the War：Culture in Northern Ireland，”in Rethinking Northern Ireland, p.210.

[22]“Fame, Family&Field Day，”Belfast Telegraph, June 12，2006.

[23]“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24]对雷蒙德·穆雷的采访。

[25]“Dolours Price Marries Actor，”Irish Times, November 5，1983；“Dolours Price Weds in Secret，”Belfast Telegraph, November 4，1983.

[26]“Secret Wedding for Actor and Car Bomb Girl，”Daily Mail, November

5，1983.

[27]Carole Zucker, In the Company of Actors：Reflections on the Craft of Acting（New York：Routledge，2001），pp.110-111.

[28]Marilynn J.Richtarik, Acting between the Lines：The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and Irish Cultural Politics 1980-1984（Washington, 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1），p.23.

[29]Brian Friel, Brian Friel in Conversation, ed.Paul Delane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p.127；Zucker, In the Company of Actors, pp.110-111.

[30]Richtarik, Acting between the Lines, p.65.

[31]Bennett，“Don't Mention the War：Culture in Northern Ireland，”in Rethinking Northern Ireland, p.207.

[32]“Stephen Rea's Tribute to Brian Friel：A Shy Man and a Showman，”Irish Times, October 2，2015.

[33]“Working Both Ends of the Terrorist's Gun，”Newsweek, February 7，1993.

[34]Richtarik, Acting between the Lines, pp.66，74.

[35]“Two Vehicles Carry an Irish Actor to America，”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1992.

[36]杜洛尔丝·普赖斯致朱莉（没有指出姓氏），1986年5月16日（Papers of the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37]Zucker, In the Company of Actors, p.111.

[38]这是雷讲过的一件轶事，纪录于The Story of Field Day,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Johnny Muir（BBC Northern Ireland，2006）。

[39]“How Can They Let Back the Girl Bomber Who Ruined My Husband's Life？”Daily Express, December 2，1983.

[40]出处同上。

[41]乔纳森·杜克埃文斯（北爱尔兰办事处）致蒂姆·弗莱舍（唐宁街10号），1985年8月3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2]德里克·希尔（北爱尔兰办事处）致蒂姆·弗莱舍（唐宁街10号），1983年3月17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3]她在德里克·希尔于1983年3月17日写给蒂姆·弗莱舍的信上写下了这句话；弗莱舍在1983年3月21号给希尔的信中也总结了撒切尔夫人的态度（基尤国家档案馆）。

[44]乔纳森·杜克埃文斯（北爱尔兰办事处）致蒂姆·弗莱舍，1985年8月3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5]杜洛尔丝·普赖斯致朱莉（没有指出姓氏），1986年5月16日（Papers of the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46]乔纳森·杜克埃文斯致蒂姆·弗莱舍，1985年8月3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7]尼尔·沃德致玛格丽特·撒切尔，1985年11月5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8]乔纳森·杜克埃文斯致蒂姆·弗莱舍，1985年8月3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49]查尔斯·鲍威尔（唐宁街）致吉姆·丹尼尔（北爱尔兰办事处），1985年11月6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50]尼尔·沃德致查尔斯·鲍威尔，1985年12月16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51]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乔纳森·杜克埃文斯致蒂姆·弗莱舍1985年8月30日的信上的批语（基尤国家档案馆）。

[52]“High Life for IRA Bomber，”Times（London），August 28，1988.

[53]“IRA Bomber Avoids Royal Theater Date，”Telegraph, February 3，1987.

[54]“Price Husband's TV Role，”Evening Herald, March 18，1986.

[55]“Stephen Rea：‘I Never Wanted to Be a Polite Actor，'”Telegraph, March 25，2016.

[56]“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57]“Even Better Than the Rea Thing，”Irish Independent, February 18，2000.

[58]“Patriot Games，”People, February 8，1993.

[59]“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60]“History Boys on the Rampage，”Arena（BBC，1988）.

[61]乔纳森·杜克埃文斯致蒂姆·弗莱舍，1985年8月30日（基尤国家档案馆）。

[62]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88.

[63]Dolours Price，“Get On with It，”The Blanket, September 14，2004.

十八　血色信封

[1]1995年，欧洲人权法庭裁定，几名士兵不是在“格杀勿论”原则下实施的行动。但是，三名共和军成员并未构成迫切的威胁，没有必要将他们射杀，他们原本可以被逮捕。想了解更多法雷尔的生死，请参看“Death of a Terrorist，”Frontline（PBS，1989）；“Priest, Writing Eulogy, Recalls Woman in IRA，”New York Times, March 16，1988；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p.1112-1115。

[2]参见McCann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18984/91，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995）。

[3]Martin McKeever, One Man, One God：The Peace Ministry of Fr Alec Reid C.Ss.R.（Dublin：Redemptorist Communications，2017），p.1.

[4]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17.

[5]John Conroy, Belfast Diary：War As a Way of Life（Boston：Beacon Press，1995），pp.1-2.

[6]“Priest Tried to Revive Dying British Soldi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2，1988.

[7]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21.

[8]14 Days, documentary（BBC，2013）.

[9]Adams, Before the Dawn, p.33.

[10]H-BC.

[11]“14 Days.”

[12]出处同上。

[13]出处同上。

[14]葬礼的档案录像。

[15]“Belfast Candidate Wins Parliament Seat for IRA，”Reuters, June 11，1983.

[16]“3 Killed by Grenades at IRA Funeral，”New York Times, March 17，1988.

[17]“Gunfire, Grenades Kill 3 at IRA Funeral，”Chicago Tribune, March 17，1988.

[18]这一描述有多个出处，包括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p.1117-1120。

[19]档案录像。

[20]档案录像；“3 Killed by Grenades at IRA Funeral，”New York Times, March 17，1988；“Gunfire, Grenades Kill 3 at IRA Funeral，”Chicago Tribune, March 17，1988。

[21]Martin Dillon, Stone Cold：The True Story of Michael Stone and the Milltown Massacre（London：Random House，1992），p.151.

[22]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17.

[23]其中的许多描述出自“14 Days”。

[24]Dillon, Stone Cold, p.169.

[25]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3.（布雷迪的名字有时用的爱尔兰拼写方式：Caoimhín Mac Brádaigh。）

[26]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0.

[27]“14 Days.”

[28]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29]出处同上，第34页。

[30]档案录像；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1。

[31]有一张照片明显捕获了其中一名士兵手持枪支的画面。“14 Days.”

[32]“From Irish Pulpit, Sense of Revulsion，”New York Times, March 21，1988.

[33]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34]档案录像。朝空中开枪的是伍德。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1.

[35]“Murdered Soldiers‘Defied Orders，'”Guardian, March 21，1988.贝尔法斯特有传言坚称，两名士兵或许并非无意中误闯葬礼这么简单，而是参与了某种秘密监视行动。

[36]出处同上。

[37]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38]“14 Days”；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39]“14 Days.”

[40]“Father Alec Reid Reveals How He Tried to Save Two British Soldiers Killed in One of the Most Shocking Episodes of the Troubles，”Independent, March 10，2013.

[41]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42]“Father Alec Reid Reveals How He Tried to Save Two British Soldiers Killed inOne of the Most Shocking Episodes of the Troubles，”Independent, March 10，2013.

[43]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1.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4.

[44]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5.

[45]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4.

[46]McKittrick et al.，Lost Lives, p.1121；“Murdered Soldiers‘Defied Orders，'”Guardian, March 21，1988.

[47]“14 Days.”

[48]出处同上。

[49]摄影师是戴维·凯恩斯。“Father Alec Reid Reveals How He Tried to Save Two British Soldiers Killed in One of the Most Shocking Episodes of the Troubles，”Independent, March 10，2013.

[50]“Priest Tried to Revive Dying British Soldi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2，1988.

[51]出处同上。

[52]“Father Alec Reid Reveals How He Tried to Save Two British Soldiers Killed in One of the Most Shocking Episodes of the Troubles，”Independent, March 10，2013；“Fr Alec Reid Death，”Belfast Telegraph, November 23，2013.

[53]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p.21-23.

[54]“14 Days.”Also see 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p.232-233.

[55]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1.

[56]H-BC.

[57]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28.

[58]出处同上，第30页。

[59]Paul Routledge, John Hume（London：HarperCollins，1997），p.217.

[60]出处同上，第211页。

[61]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p.31-32.

[62]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3.此前他们也探讨过对话的可能性，但都失败了。参看Adams, A Farther Shore, pp.44-45。

[63]Routledge, John Hume, p.216.

[64]“Bombing in Ulster Kills 11 in Crowd；IRA Is Suspected，”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1987.

[65]“Making the Words Flow Like Blood，”Times（London），November 12，1987.

[66]Routledge, John Hume, p.216.

[67]“Firebomb Attack on Home of John Hume，”Irish Times, May 9，1987.

[68]George Drower, John Hume：Man of Peace（London：Victor Gollancz，1996），p.133.

[69]据亚当斯所言，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986年。Adams, A Farther Shore, p.45.

[70]Routledge, John Hume, p.214.

[71]John Hume, A New Ireland：Politic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Boulder, Colo.：Roberts A inehart，1996），p.115.

[72]McKeever, One Man, One God, p.33.

[73]出处同上，第35页。

[74]“14 Days.”

[75]“Belfast Candidate Wins Parliament Seat for IRA，”Reuters, June 11，1983.

[76]“Making the Words Flow Like Blood，”Times（London），November 12，1987.

[77]Behind the Mask.

[78]例如参看“Gerry Adams Is Held by Troops，”Belfast Telegraph, July 19，1973；“Sinn Féin Leader to See Minister，”Times（London），November 6，1982；“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Times（London），May 28，1983。

[79]“I Am an IRA Volunteer，”Republican News, May 1，1976.

[80]“Sinn Féin Boss Denies IRA Control，”Reuters, December 14，1982；“IRA Tries New Mix—Violence, Politics，”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8，1982.

[81]“Making the Words Flow Like Blood，”Times（London），November 12，1987.

[82]“IRA Politicians Shift Tactics for Election，”Associated Press, May 23，1983.

[83]“The Case Against Gerry Adams，”Irish People, September 23，1978.

[84]“Sinn Féin Not the Same As IRA, Says Court，”Guardian, September 7，1978.

[85]“Sinn Féin Vice-President Gerry Adams，”Irish People, November 27，1982.

[86]出处同上。

[87]“Junior Executive Types Canvass with Adams，”Irish Times, June 7，1983.

[88]Gerry Adams, Falls Memories：A Belfast Life.

[89]“IRA Politicians Shift Tactics for Election，”Associated Press, May 23，1983.

[90]“A Gunman Cleans Up His Act，”Observer, April 17，1983.

[91]出处同上。

[92]出处同上。

[93]“Terrorism Continues As Sinn Féin Heads for Wider Role in Politics，”Times（London），November 14，1983.

[94]“Thatcher Moves to Silence Men Behind the IRA，”Times（London），De-cember 23，1983.

[95]“Adams Denies Rift in Republican Ranks，”Times（London），December 20，1983.

[96]“Bomb Ours, Says IRA，”Guardian, October 13，1984.乔纳森·李用小说的方式对这一事件做了精彩的探究，参看High Dive（New York：Knopf，2016）。

[97]McKittrick and McVea,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p.162.

[98]“Sinn Féin‘Fears Murder Plot，’”Times（London），November 5，1984.

[99]“Thatcher and the IRA：Dealing with Terror.”

[100]“Adams Arrested，”Irish Times, June 9，1983.

[101]“Gunmen Wound Sinn Féin Leader，”Boston Globe, March 15，1984；“Adams Shot Three Times after Court Appearance，”Irish Times, March 15，1984.

[102]“Gerry Adams Is Shot 3 Times in Street Attack，”Times（London），March 15，1984.

[103]“Gunmen Wound Sinn Féin Leader，”Boston Globe, March 15，1984.

[104]“Gerry Adams Is Shot 3 Times in Street Attack，”Times（London），March 15，1984.

[105]“Gunmen Wound Sinn Féin Leader，”Boston Globe, March 15，1984；“Adams Shot Three Times after Court Appearance，”Irish Times, March 15，1984；“Public Statement by the Police Ombudsman Under Section 62 of the Police（Northern Ireland）Act 1998：Relating to the Complaints in Respect of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Mr.Gerry Adams on 14 March 1984，”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2014）.

[106]“Gunmen Wound Sinn Féin Leader，”Boston Globe, March 15，1984.

[107]“Adams Says Army Knew of‘Loyalist'Attack Plan，”Times（London），March 16，1984.

[108]“An Everyday Story of Ulster Folk，”Times（London），March 16，1984.

十九　蓝丝带

[1]H-BC.

[2]“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3]“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4]H-BC.

[5]“Hughes No Longer Toes the Provo Line，”Sunday Tribune, December 17，2000.

[6]对马丁·加尔温的采访。

[7]H-BC.

[8]出处同上。

[9]出处同上。

[10]芬坦·丹尼尔·苏格尔·雷的出生公告，出自有为剧院公司的文件，藏于爱尔兰国家图书馆。

[11]“‘Game'Player，”Entertainment Weekly, December 11，1992.

[12]1990年5月30日，杜洛尔丝·普赖斯给科莉特·涅利斯的去信，出自有为剧院公司的文件，藏于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奥斯卡·雷的出生公告，出自有为剧院公司的文件，藏于爱尔兰国家图书馆。

[13]“Patriot Games，”People, February 8，1993.

[14]“Seamus Heaney Loved Dirty Jokes？Tell Us Another One，”Irish Times, February 23，2017.

[15]“Two Vehicles Carry an Irish Actor to America，”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1992.

[16]“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17]有关禁播的大概情况，参看Ed Moloney，“Closing Down the Airwaves：The Story of the Broadcasting Ban，”in The Media and Northern Ireland：Covering the Troubles, ed.Jim Smith（London：Macmillan，1991）。

[18]“Fury Over TV Dirty Trick，”Daily Mail, April 10，1990.

[19]“Why I Spoke for Gerry Adams，”Independent, November 4，1993.

[20]“How We Made The Crying Game，”Guardian, February 21，2017.

[21]“Two Vehicles Carry an Irish Actor to America，”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1992.

[22]“The Trying Game，”Times（London），June 5，1993.

[23]“‘Game'Player，”Entertainment Weekly, December 11，1992.

[24]“Patriot Games，”People, February 8，1993.

[25]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26]“Patriot Games，”People, February 8，1993.

[27]出处同上。

[28]“A Man Who Laughs at His Demons，”Irish Times, February 20，1993.

[29]Dolours Price，“Rummaging，”The Blanket, July 9，2004.

[30]Padraic Pearse，“Why We Want Recruit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adraic H.Pearse：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Dublin：Óire-Gael Society，2013），p.66.

[31]出处同上，第173页。

[32]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179.

[33]出处同上，第176页。

[34]“IRA Victims Campaign Stepped Up，”Irish Times, June 27，1995.

[35]出处同上。

[36]1998年，40岁的海伦当了祖母。“Family’s Plea to IRA over Fate of Mother，”Guardian, May 13，1998.

[37]“IRA Embarrassed by Family's‘Secret Burial'Campaign，”Guardian, August 30，1995.

[38]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9]“Woman Beaten As She Intervened in Loy alist Attack on Belfast Home，”The Irish Times, June 19，1995.

[40]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41]安妮·麦康维尔的死亡证明。她出生于1952年11月28日，卒于1992年9月29日。

[42]“Jean McConville's Daughter：‘If I Give Up Fighting, They've Won，'”Observ-er, July 6，2014.

[43]“An IRA Death Squad Took Our Mother.There'll Be No Peace for Us until We Find Her Body，”Daily Express, July 23，1998.

[44]“Secret Graves of the Missing Ones，”Sunday Tribune, July 5，1998.

[45]出处同上。

[46]“IRA Victims Campaign Stepped Up，”Irish Times, June 27，1995.

[47]“Secret Graves of the Missing Ones，”Sunday Tribune, July 5，1998.

[48]“Five Men Quizzed on‘Disappeared，'”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24，1996.

[49]“Secret Graves of the Missing Ones，”Sunday Tribune, July 5，1998.

[50]“Kevin and the Pain That Has Never Disappeared，”Belfast Telegraph, August 30，2013.

[51]“Grim Reunion for Family As Dig for Body Begins，”Telegraph, May 31，1999.

[52]“Kin of Missing Appeal to IRA，”Boston Globe, August 28，1995.

[53]“Clinton and Mandela Get Grief Symbol，”Belfast Telegraph, June 26，1995.

[54]“Ireland Calling：The Disappeared Reappear，”Irish Voice, June 15，1999.

[55]“Families of Vanished Victims Open Campaign，”Belfast News Letter, June 26，1995.

[56]“IRA Embarrassed by Family's‘Secret Burial'Campaign，”Guardian, August 30，1995.

[57]出处同上。

[58]“Adams Called On to Pressurize IRA over Graves of‘Disappeared，'”Irish Times, August 16，1995.

二十　秘密档案

[1]“U.S.Shifts, Grants Visa to President of IRA's Political Wing，”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1994.

[2]这一描述来自演讲的视频。

[3]Seamus Heaney, The Cure at Troy：A Version of Sophocles'Philoctetes（New York：Farrar, Straus&Giroux，1991），p.77.

[4]“IRA Smash Ceasefire，”Guardian, February 10，1996.

[5]“The Long Good Friday，”Observer, April 11，1998.

[6]参阅George Mitchell, Making Pea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7]给出这一评论的是小说家科拉姆·麦卡恩。“Ireland’s Troubled Peace，”New York Times, May 15，2014.

[8]“The Long Good Friday，”Observer, April 11，1998.

[9]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之间的一次通话纪要，1999年6月10日，克林顿数字图书馆。

[10]英方的谈判代表之一乔纳森·鲍威尔指出：“共和军是被查禁的组织，我们不能跟它的领导人进行对话。我们当然知道，跟我们对话的新芬党领袖也是共和党的领导人。”Jonathan Powell, Great Hatred, Little Room：Making Peace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Vintage，2009），p.24.

[11]“Hope and History Rhyme Once More，”An Phoblacht, June 25，1998.

[12]对保罗·比尤的采访。在参与者开始离世之前记录北爱问题的想法似乎是保罗·比尤的主意。当比尤跟埃德·莫洛尼商量此事时，莫洛尼提出了编制口述历史的具体想法。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莫洛尼的马萨诸塞州宣誓书。

[13]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14]“Journalist Wins Right to Keep Notes from Police，”Independent, October 28，1999.

[15]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16]出处同上。

[17]“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

[18]对保罗·比尤的采访。

[19]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0]“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 of History，”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21]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2]对保罗·比尤的采访。

[23]“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

[24]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25]对威尔逊·麦克阿瑟的采访。

[26]“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

[27]有大量关于南非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文献，但我尤其推荐Antjie Krog, Country of My Skull：Guilt, Sorrow, and the Limits of Forgivenes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0）。

[28]“McGuinness Confirms IRA Role，”BBC, May 2，2001.

[29]“Adams Warns Ministers IRA Has Not Gone Away，”Independent, August 14，1995.

[30]“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

[31]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32]出处同上。

[33]Padraic Pearse，“Ghost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adraic H.Pearse, p.123.

[34]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35]McKearney, The Provisional IRA, p.185.

[36]Ian McBride，“The Truth About the Troubles，”in Remembering the Troubles：Con-testing the Recent Past in Northern Ireland, ed.Jim Smyth（Notre Dame, 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7），p.11.

[37]奥尼尔宣誓书。

[38]Robert K.O'Neill, ed.，Management of Library and Archival Security：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Binghamton, N.Y.：Haworth Press，1998），p.1.

[39]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二十一　在边缘

[1]Roy，“Divis Flats，”Iowa Historical Review, vol.1，no.1（2007）.

[2]“Wrecking Ball Brings Hope to Slum，”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31，1993.

[3]英国军队直到2005年才开始搬出这座楼，这是“去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

[4]“Hughes No Longer Toes the Provo Line，”Sunday Tribune, December 17，2000.

[5]“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 of History，”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6]出处同上。

[7]出处同上。

[8]出处同上。

[9]“Hunger Striker Fights for Eyesight，”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0，2006.

[10]“Decommissioned Provos Thrown on Scrap Heap of History，”Sunday Tribune, April 16，2006.

[11]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12]出处同上。

[13]H-BC.

[14]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15]Brendan Hughes，“The Real Meaning of G.F.A.，”The Blanket, October 8，2000.

[16]“Interview with Brendan Hughes，”Fourthwrite no.1，Spring 2000.

[17]H-BC.

[18]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19]“Hunger Striker Fights for Eyesight，”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0，2006.

[20]“Hughes No Longer Toes the Provo Line，”Sunday Tribune, December 17，2000.

[21]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2]对理查德·奥拉韦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3]Richard O'Rawe, Blanketme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Block Hunger Strike（Dub-lin：New Island，2005），pp.176-180.

[24]出处同上，第181页。

[25]出处同上，第184页。

[26]出处同上，序言。

[27]O'Rawe, Blanketmen, p.253.

[28]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29]出处同上。

[30]Ed Moloney, introduction to Afterlives：The Hunger Strike and the

Secret Offer That Changed Irish History, by Richard O'Rawe（Dublin：Lilliput Press，2010），p.xii.

[31]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有关奥拉韦所言的是非曲直，以及和那场绝食抗议相关的各路人士发表的正面或反面的言论，请参阅O'Doherty, Gerry Ad-ams, chapter 14。

[32]“Hughes No Longer Toes the Provo Line，”Sunday Tribune, December 17，2000；H-BC.

[33]“Hunger Striker Fights for Eyesight，”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0，2006.

[34]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35]H-BC.

[36]H-BC.埃德·莫洛尼根据休斯的口述历史写了一本书。罗斯医生的悲剧在书中首次被公布（参阅Moloney, Voices from the Grave, p.242），不过有关这一事件还有一些其他信息。英国医生戴维·尼科尔向我确认了基本事实，尼科尔同为医生的父亲曾和罗斯与埃尔南·雷耶斯医生一起在医学院求学。1986年，雷耶斯医生随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到访过朗·凯什，并和监狱的医疗人员谈论过绝食抗议的情况。

[37]H-BC.

[38]出处同上，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二十二　叛徒

[1]Liam O'Flaherty, The Informer（New York：Harcourt，1980），p.22.

[2]参看Ron Dudai，“Informers and the Transition in Northern Ireland，”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52，no.1（January 2012）。

[3]“Adams Offers‘Regret'As Digging Resumes，”BBC, May 31，1999.

[4]Ed Moloney and Anthony McIntyre，“The Security Department：IRA Defensive Counterintelligence in a 30-Year War Against the British”（unpublished paper, April 2006）.

[5]除非有其他标注，和特雷弗·坎贝尔有关的信息都来自对坎贝尔的两次采访。

[6]“Inside Castlereagh：‘We Got Confessions by Torture，'”Guardian, October 11，2010.

[7]“The Leader, His Driver, and the Driver's Handler：Chauffeur Revealed As MI5 Agent，”Guardian, February 9，2008.

[8]对杰勒德·霍金斯的采访；“The Hunter and His Prey，”Spotlight（BBC Northern Ireland，2015）.

[9]“How, and Why, Did Scappaticci Survive the IRA's Wrath？”Irish Times, April 15，2017.

[10]Eamon Collins, Killing Rage（London：Granta，1997），chapter 18.

[11]“Double Blind，”The Atlantic, April 2006.

[12]H-BC.

[13]“Accused IRA Man Denies Being Agent for Security Services，”Independent, May 14，2003.

[14]“The Hunter and his Prey，”Spotlight.

[15]“A Path Paved with Blood：The Family of IRA Victim Frank Hegarty Insist That Martin McGuinness Lured Him to His Death，”Daily Mail, September 25，2011.

[16]“McGuinness Denies Involvement in 1986 Killing，”Irish Times, September 30，2011.

[17]原采访出自“The Long War”，收录于the BBC series Panorama（1988）。后来，爱尔兰共和国解密的档案支持了麦吉尼斯涉案的推断。参见“Martin McGuinness Set Up Meeting Where Suspected IRA Informer Frank Hegarty Was Killed, Bishop Claimed, Irish News，”December 29，2017。

[18]对特雷弗·坎贝尔的采访。

[19]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0]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p.113-115.

[21]H-BC.

[22]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3]“Cast in the Middle of the Long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1998.

[24]雷蒙德·默里神父在杜洛尔丝·普赖斯葬礼上的致辞。

[25]“Stephen Rea Breaks Up with Bomber，”Irish Independent, July 13，2003.

[26]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普赖斯同时期的照片。

[27]对塔拉·基南汤姆森的采访。

[28]Dolours Price，“Don't Be Afraid, Do Not Be Fooled，”The Blanket, January 16，2007.

[29]“Woman in the Technicolor Coat Became the Talk of Our Class，”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25，2013.

[30]Dolours Price，“Rummaging，”The Blanket, July 9，2004.

[31]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32]对弗朗西·麦圭根的采访。

[33]对帕特里克·法雷利的采访。

[34]“Woman in the Technicolor Coat Became the Talk of Our Class，”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25，2013.

[35]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36]RTÓ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摘自I, Dolours。

[37]参阅Jonathan Shay, Achilles in Vietnam：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New York：Scribner，2003），p.20；Robert Emmet Meagher, Killing from the Inside Out：Moral Injury and Just War（Eugene, Ore.：Cascade Books，2014），pp.3-5；Brett T.Litz et al.，“Moral Injury and Moral Repair in War Veterans：A Preliminary Model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9（2009）。

[38]“Gerry Adams Was My Commander, Says IRA Bomber，”Telegraph, March 16，2001.

[39]“Jilted Lady，”Times（London），March 24，1999.

[40]“‘Misled'SF Members Urged to Join Former Colleagues，”Irish Times, Novem-ber 10，1997.

[41]Dolours Price，“Bun Fights&Good Salaries，”The Blanket, March 27，2007.

[42]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43]Dolours Price，“Money……Money……Money，”The Blanket, January 17，2005.

[44]“Cast in the Middle of the Long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1998.

[45]Dolours Price，“Get On with It，”The Blanket, September 14，2004.

[46]Dolours Price，“UnHung Hero，”The Blanket, August 3，2004.

[47]“Hunger Striker Bobby Sands Is Just a Money-Spinner for Sinn Féin，”Belfast Tele-graph, March 1，2016.

[48]P-TKT.

[49]Dolours Price，“Bun Fights&Good Salaries，”The Blanket, March 27，2007.

[50]Dolours Price，“I Once Knew a Boy，”The Blanket, July 17，2004.

[51]P-TKT.

[52]P-TKT.

[53]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二十三　沼泽女王

[1]对杰夫·克努普费尔的采访。

[2]“Fourth‘Moors Murders'Victim Found, Fifth Sought，”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uly 2，1987.

[3]对杰夫·克努普费尔的采访。

[4]“Speaking for the Dead，”Guardian, June 14，2003.

[5]“Chile Sentences 33 for Pinochet's Disappeared，”Financial Times, March 23，2017.

[6]“The Disappeared，”这是从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网站获取的一份名单。

[7]出处同上。

[8]“Police Recover Remains of‘Disappeared'IRA Victim，”Guardian, May 28，1999；“A Touch of Irony As IRA Delivers Victim's Remains，”Irish Independent, May 29，1999.

[9]进一步了解莫洛伊在共和军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传递情报的操作方式，参看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p.133-140。

[10]如果没有另外标注，这一事件的信息全部取自“A Prayer Before Dying：IRA Took Priest to Disappeared Victim before Murder，”BBC News, November 3，2013。

[11]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34.

[12]“A Prayer Before Dying：IRA Took Priest to Disappeared Victim before Murder，”BBC News, November 3，2013.这位牧师后来辞去了牧师的职务，并于十几年前去世。

[13]Margaret McKinney，“The Disappearance of Brian McKinney，”in The Disappeared of Northern Ireland's Troubles, p.52；“Their Sons Were Best Friends.In 1978 They Were Disappeared by the IRA，”Belfast Telegraph, February 4，2017.

[14]“Combing the Sands Where a Mother's Bones Are Said to Lie，”Independent, June 2，1999.

[15]“Ireland Calling：Digging for the Disappeared，”Irish Voice, June 15，1999.

[16]Disappeared,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Joanna Head（October Films，1999）.

[17]匿名信息源；“Woman Beaten As She Intervened in Loyalist Attack on Belfast House，”Irish Times, June 19，1995。

[18]“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19]“Woman Says IRA Confirms Murder of Mother，”Irish Times, December 5，1998；“IRA Admits Killing Widow Who‘Disappeared'26 Years Ago，”Guardi-an, December 5，1998.

[20]“Ahern and Blair Join Talks, But Trimble, Adams Hold to Positions，”Irish Times, March 30，1999.

[21]对迈克尔、苏珊和阿奇·麦康维尔的采访。

[22]“The Bitter Tears of Jean's Children，”Guardian, December 7，1999.

[23]“Sons Recall 30 Years of Painful Memories，”Irish News, October 24，2003.

[24]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5]“Disappeared.”

[26]“Combing the Sands Where a Mother's Bones Are Said to Lie，”Independent, June 2，1999.

[27]“Digging for the Disappeared，”Irish Voice, June 15，1999.

[28]这里的所有对话都截取自纪录片“Disappeared”。

[29]“Give Me My Mam，”Observer, May 30，1999.迈克尔·麦康维尔在一次采访中也重述了这一点。

[30]“Disappeared.”

[31]“The Bitter Tears of Jean's Children，”Guardian, December 7，1999.

[32]机密采访。

[33]“IRA Victims Campaign Stepped Up，”Irish Times, June 27，1995.

[34]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共和军当时宣布，他们的一名“最高层军官”正在努力寻找隐藏的墓穴，这名军官指的可能就是斯托里。（“‘Disappeared’Phone Bid，”Belfast Telegraph, September 7，1998.）也参阅“Police Forced to Free Ex-IRA Boss Bobby Storey after Learning of Immunity，”Sunday Life, December 1，2014。

[35]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36]“Jean McConville's Daughter：‘If I Give Up Fighting, They've

Won，'”Observ-er, July 6，2014.

[3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38]“Adams Is Accused of Justifying Deaths，”Irish News, June 1，1999.

[39]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125.

[40]“Gerry Adams：Unrepentant Irishman，”Independent, September 8，2009.

[41]H-BC.

[42]“The Agony Goes On，”Belfast Telegraph, May 31，1999.

[43]“IRA Panic Over Lost Bodies，”Guardian, June 1，1999.

[44]The Disappeared.

[45]“Kevin and the Pain That Has Never Disappeared，”Belfast Telegraph, August 30，2013.Also see McKee，“The Disappearance of Kevin McKee.”

[46]出处同上。

[47]匿名消息源。

[48]“The IRA and the Disappeared：Tell Us Where Kevin Is Buried and I'll Shake Hands，”Irish Times, October 5，2013.

[49]出处同上。

[50]“The Dark Secrets of the Bog Bodies，”Minerva, March/April 2015.

[51]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Selected Prose，1968-1978（London：Faber，1980），pp.57-58.

[52]出处同上，第57-58页。

[53]Seamus Heaney，“Bog Queen，”in North：Poems（London：Faber，1975），p.25.

[54]Anthony Bailey, Acts of Union：Reports on Ireland 1973-1979（New York：Ran-dom House，1980），p.128.

[55]英国军队也做出过让人们失踪的行为。参看PádraigÓg Ó Ruairc, Truce：Mur-der, Myth,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Cork, Ireland：Mercier Press，2016），pp.80-81。另见Lauren Dempster，“The Republican Move-ment，‘Disappearing’and Framing the Past in Northern Ire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10（2016）。

[56]举一个最近的例子：“Body Exhumed in Clare of British Soldier Killed and Se-cretly Buried in 1921，”Irish Examiner, May 14，2018。

[57]“Combing the Sands Where a Mother’s Bones Are Said to

Lie，”Independent, June 2，1999.

[58]“Disappeared.”

[59]出处同上。当被问到兄弟姐妹中谁跟母亲最像时，迈克尔·麦康维尔说：“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无法告诉你，因为我真的不记得母亲长什么样子了。”

[60]“Give Me My Mam，”Observer, May 30，1999.

[61]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二十四　交织的谎言

[1]“How Three Sharply Dressed Robbers Walked into Belfast's Intelligence Hub，”Guardian, March 22，2002.

[2]对特雷弗·坎贝尔的采访。

[3]“‘New Era'As NI Police Change Name，”BBC News, November 4，2001.

[4]“Who Stole the Secrets of Room 2/20？”Observer, March 23，2002.

[5]如果没有另外标注，这些信息全部摘自“How Three Sharply Dressed RobbersWalked into Belfast’s Intelligence Hub，”Guardian, March 22，2002。

[6]“Raid on Anti-Terror Hub Puts Informers at Risk，”Telegraph, March 20，2002.

[7]“Who Stole the Secrets of Room 2/20？”Observer, March 23，2002.

[8]“Police Helped IRA Steal Special Branch Secrets，”Telegraph, September 28，2002.

[9]“Analysis：Story Behind the Break-In，”BBC News, April 19，2002.

[10]“Castlereagh Break-In Row：Chef‘Relieved but Angry，'”Belfast Telegraph, July 4，2009.

[11]“Castlereagh Break-In：The Same Old（Bobby）Storey？”Irish Echo, April 16，2002.

[12]“The British Spy at Heart of IRA，”Times（London），August 8，1999；“Focus：Scappaticci's Past Is Secret No More，”Times（London），May 18，2003.

[13]“The British Spy at Heart of IRA，”Times（London），August 8，1999.

[14]P-TKT.

[15]参看David C.Martin, Wilderness of Mirrors：Intrigue, Deception, and the Secrets That Destroyed Two of the Cold War’s Most Important Agents（Guilford, Conn.：Lyons Press，2003）。

[16]“The Hunter and His Prey，”Spotlight.

[17]Martin Ingram and Greg Harkin, Stakeknife：Britain's Secret Agents in Irelan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4），p.33.例如参见“Anthony Braniff—IRA Statement，”An Phoblacht, September 25，1003。

[18]H-BC.

[19]出处同上。

[20]对乔·克拉克和格里·布兰尼根的采访。

[21]“Informant‘Killed by IRA Despite Warning from British Spy，'”Telegraph, April 11，2017；“Exposed：The Murky World of Spying During the Troubles，”Irish Times, April 11，2017.

[22]H-BC.

[23]At the most senior levels：“Half of All Top IRA Men‘Worked for Security Serv-ices，'”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21，2011.

[24]“How Stakeknife Was Unmasked，”Guardian, May 12，2003.

[25]“Freddie Scappaticci Was Our Most Valuable Spy in IRA During Troubles：British Army Chief，”Belfast Telegraph, April 20，2012.

[26]“How Stakeknife Was Unmasked，”Guardian, May 12，2003.

[27]“Wearing Short Sleeves and Tan, Scappaticci Steps from the Shadows to Say：I'm No Informer，”Independent, May 15，2003.

[28]Ingram and Harkin, Stakeknife, p.61.

[29]出处同上，第66页。

[30]这一评论来自汤米·麦卡尼在“The Hunter and His Prey，”Spotlight中所言。

[31]“Wearing Short Sleeves and Tan, Scappaticci Steps from the Shadows to Say：I'm No Informer，”Independent, May 15，2003.

[32]“Double Blind，”The Atlantic, April 2006.

[33]“Adams Says‘Securocrats'Out to Create New Crisis，”Irish Times, December 17，2005.

[34]“Donaldson Admits to Being British Agent Since 1980s，”Irish Times, December 16，2005.

[35]“Dennis Donaldson：Squalid Living after a Life of Lies，”Sunday Tribune, March 26，2006.

[36]“Dead Man Walking，”Times（London），April 9，2006.

[37]"'Spy'Donaldson Living in Donegal，"Derry Journal, March 21，2006.

[38]"Spy and Former SF Official Donaldson Shot Dead，"Irish Times, April 4，2006.

[39]"Denis Donaldson Murder：The Unanswered Questions That Bedevil Gerry Adams，"Belfast Telegraph, September 22，2016.

[40]"Double Blind，"The Atlantic, April 2006.

[41]"Exposed：The Murky World of Spying During the Troubles，"Irish Times, April 11，2017.关于推测性计算，我们来看看一位前特殊分队警官无懈可击的逻辑："北爱尔兰问题期间，非法共和党恐怖组织的间谍拯救了至少16500人。一名前（特殊分队）侦缉总负责人估算，任意时期都有15名安排适当的间谍活跃在共和军内部（以共和军为500人计算，则间谍比例为1:33）。每年，假设一个合适安置的间谍平均一年拯救37人，那么15人能救555人，30年就是16650条人命。"William Matchett, Secret Victory：The Intelligence War That Beat the IRA（Belfast：self-published，2016），pp.100-101.

[42]"Top Spy'Stakeknife'Allegedly Linked to 50 Killings'Unlikely to Ever Face Prosecution，'"Irish Independent, April 27，2016.

[43]科林·华莱士致信利斯本军情处首席情报官托尼·斯托顿，1975年8月，引自"Death Squad Dossier，"Irish Mail on Sunday, December 10，2006。进一步了解华莱士这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参看Interim Report on th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Dublin and Monaghan Bombings, Houses of the Oireach-tas（Ireland），December 2003，以及Paul Foot, Who Framed Colin Wallace？（London：Macmillan，1989）。

[44]科林·华莱士写的信，1975年9月30日，同样引自"Death Squad Dossier，"I-rish Mail on Sunday, December 10，2006。

[45]参看Anne Cadwallader, Lethal Allies：British Collusion in Ireland（Cork, Ireland：Mercier Press，2013）。

[46]"Britain's Secret Terror Force，"Panorama.

[47]对雷蒙德·怀特的采访。

[48]Ian Cobain, The History Thieves：Secrets, Lies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Nation（London：Portobello，2016），p.186.

[49]Ingram and Harkin, Stakeknife, p.25.

[50]"'Nelson Files'Link Authorities to UDA Death Squads，"Irish Independent, No-vember 14，2015.

[51]根据我获得的纳尔逊生前所写的一份未出版的自传描述，军方并不希望亚当斯遇害。这将"完全适得其反"，他的上线告诉他，因为甚至在1984年，亚当斯已经展现出可能引导共和运动远离暴力的潜能。纳尔逊强调，军方提前获悉了刺杀亚当斯的计划，并允许计划发生——但为了防止刺杀成功，他们事先对弹药动了手脚。2014年，北爱尔兰警方巡查员调查了这些声明，并断定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袭击一事，子弹也没有被动手脚。参看"Public Statement by the Police

Ombudsman Under Section 62 of the Police（Northern Ireland）Act 1998 Relating to the Complaints in Respect of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Mr.Gerry Ad-ams on 14 March 1984，”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2014）。但是，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拥有翔实的消息来源并且为人十分可靠的已故记者利亚姆·克拉克坚称，军方情报部门对射杀亚当斯的子弹动过手脚的报道事实上“得到了国防咨询委员会的确认”。参看“Half of All Top IRA Men‘Worked for Security Services，'”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21，2011。

[52]Kevin Toolis, Rebel Hearts：Journeys within the IRA's Soul（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84-85.

[53]德·席尔瓦报告，第15页。

[54]Ingram and Harkin, Stakeknife, p.197；Peter Cory, Cory Collusion Inquiry Report：Patrick Finucane（London：Stationery Office，2004），pp.53-54.

[55]德·席尔瓦报告，第23页。

[56]“Pat Finucane's Widow Calls de Silva Report‘a Whitewash，'”Guardian, De-cember 12，2012.

[57]“Was an IRA Informer So Valuable That Murder Was Committed to Protect Him？”Guardian, September 25，2000.

[58]诺塔兰托尼奥似乎年轻时加入过共和军，但后来退出。参看“Come Spy with Me，”Irish Times, May 17，2003。

[59]“Innocent Victim of Ulster's Dirty War，”Guardian, January 12，2001.

[60]Ingram and Harkin, Stakeknife, p.218.

[61]“Shadowy Group Linked to Collusion and Murder，”Times（London），September 13，2005.

[62]“Stevens Enquiry 3：Overview&Recommendations，”report by Sir John Stevens, April 17，2003，p.13；John Stevens,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My Life Fighting Crime（London：Orion，2006），p.185.

[63]“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Statement on Patrick Finucane，”December 12，2012.

[64]参看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第十项：“Prisoners.”The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was the Northern Ireland（Sentences）Act of 1998。

[65]参看Kieran McEvoy, Louise Mallinder, Gordon Anthony, and Luke Moffett，“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Northern Ireland：Amnesties, Prosecu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paper（2013），p.15。

[66]Deposition of John Garland, Inquest on the Body of Jean McConville, Coroner'sDistrict of County Louth, April 5，2004.约翰·加兰的证词，记录于琼·麦康维尔的尸体勘验记录，劳斯郡验尸官区，2004年4月5日。

[67]琼·麦康维尔的尸检报告，由病理学家M.卡茜迪撰写，2003年9月1日。

[68]Report of Postmortem Examination on Remains Believed to Be Jean McConville, by pathologist R.T.Shepherd, August 28，2003.

[69]“Beach Body‘Is Mother Killed by IRA 30 Years Ago，'”Telegraph, August 28，2003.

[70]尸检，2003年9月1日。

[71]尸检，2003年8月28日。

[72]对迈克尔·麦康维尔和阿奇·麦康维尔的采访。

[73]阿奇·麦康维尔的证词。

[74]“Waiting Comes to an End As Mother Is Laid to Rest，”Irish News, November 3，2003.

[75]对努阿拉·奥罗恩的采访。

[76]“Daughter Demands Justice for IRA Victim，”Irish News, April 7，2004.

[77]“Forensics May Trap McConville Killers，”Irish News, February 24，2004.

二十五　最后一把枪

[1]“IRA Destroys All Its Arm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2005.

[2]“Insults Fly at Decommissioning Priest's Meeting，”Irish Examiner, October 12，2005.

[3]这里的武器种类摘自“IRA Destroys All Its Arm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2005。

[4]“Insults Fly at Decommissioning Priest's Meeting，”Irish Examiner, October 12，2005.

[5]对安东尼·麦金太尔和特里·休斯的采访。

[6]对特里·休斯的采访。

[7]出处同上。

[8]对汤米·戈尔曼的采访。

[9]对特里·休斯的采访。

[10]Dolours Price，“Gerry, Come Clean, You'll Feel Better，”The Blanket, February 26，2009.

[11]很多人都说亚当斯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棺材旁边，安东尼·麦金太尔和汤

米·戈尔曼等目击者向我确认了这一信息。记者利亚姆·克拉克在一篇叙述中写道："为了和灵柩同框拍照，亚当斯不得不挤着穿过正牌共和军的支持者队伍，他们想操纵休斯留下的传奇。马丁·麦吉尼斯显得忸怩一些。""A Coffin Adams Had to Carry，"Times（London），February 24，2008.

[12]Dolours Price，"Irish News Report of the Funeral of Brendan Hughes，"The Blan-ket, February 24，2008.

[13]"Death of Brendan Hughes，"An Phoblacht, February 21，2008.

[14]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15]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16]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17]O'Rawe, Blanketmen, p.251.

[18]"Former Comrades'War of Words over Hunger Strike，"Irish News, March 11，2005.

[19]"British'Had No Intention of Resolving the Hunger Strike，'"Belfast Telegraph, June 4，2009.

[20]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这本书是Afterlives。

[21]Dolours Price，"A Salute to Comrades，"The Blanket, May 18，2005.

[22]"Brendan Hughes：O'Rawe Told Me His Concerns，"Irish News, May 19，2006.

[23]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24]"Former IRA Bomber Price Acquitted of Alcohol Theft，"Irish News, August 24，2010.

[25]出处同上。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信息：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26]"Her Name Is Dolours, the IRA Bomber Who Married a Hollywood Star.Now She Has Become an Alcoholic，"Daily Mirror, March 30，2001.

[27]"Murky Maghaberry，"Republican News, January 31，2006.

[28]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29]Gerry Bradley and Brian Feeney, Insider：Gerry Bradley's Life in the IRA（Dublin：O'Brien Press，2009），p.16.

[30]出处同上，第7页。

[31]"Death of'Whitey'Bradley，"Irish Republican News, October 28，2010.

[32]"IRA Chief Suicide Horror，"Daily Mirror, October 28，2010.

[33]“Former IRA Man Gerry‘Whitey'Bradley Found Dead in Car，”BBC News, October 28，2010.

[34]“IRA Gunman Turned Author Found Dead，”UTV, October 28，2010.

[35]Ed Moloney, Voices from the Grave, p.1.

[36]“Brendan Hughes Revelations—Book Tells IRA Secrets，”Irish News, March 29，2010.

[37]Faber&Faber catalog, January—June 2010.

[38]“Adams Linked to IRA Actions，”Irish Republican News, March 29，2010.

[39]出处同上。

[40]“SF Deny Journalist in Danger，”Sunday World, April 11，2010.On Collins, see Toby Harnden, Bandit Country：The IRA&South Armagh（London：Hodder&Stoughton，1999），pp.446-447.

[41]“A Preliminary Note on Embargoes，”Ed Moloney，提供给作者的背景文件。

[42]安东尼·麦金太尔写给汤姆·哈奇的电子邮件（日期不明，2010年6月底）。麦金太尔并不是唯一对莫里森持这种观点的人。据作家托比·哈恩登所言：“莫里森在共和军内部被认为是‘首席法官’，因为他握有线人的生杀大权。”Harnden, Bandit Country, p.284.

[43]对威尔逊·麦克阿瑟的采访。

[44]那个研究生是梅根·迈尔斯，她最终在论文里引用了档案的内容。Moving Ter-rorists from the Streets to a Diamond-Shaped Table：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1969-1999（Department of History, Boston College, De-cember 2011）.汤姆·哈奇写给埃德·莫洛尼的电子邮件，2010年6月4日。

[45]埃德·莫洛尼写给汤姆·哈奇的电子邮件，2010年6月4日。

[46]埃德·莫洛尼写给汤姆·哈奇的电子邮件，2010年6月7日。

[47]汤姆·哈奇写给安东尼·麦金太尔的电子邮件，2010年6月21日。

[48]对玛丽亚·林斯基的采访，Marian Finucane Show, RTÓRadio, April 4，2015。

[49]“Gerry Adams Interview：No Parade Unless the Residents Support One，”Irish News, February 11，2010.

[50]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

[51]Dolours Price，“An Open Letter to Gerry Adams，”The Blanket, July 31，2005.

[52]出处同上。

[53]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54]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

[55]出处同上。

[56]出处同上。

[57]“Death of Dolours Price，”Irish News, January 25，2013.

[58]出处同上。

[59]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

[60]出处同上。

[61]卡丽·图米写给埃德·莫洛尼的电子邮件，2011年10月14日。图米在邮件中提及了她和玛丽安·普赖斯的对话，其中玛丽安对一些事件进行了自己的讲述。

[62]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

[63]“Dolours Price's Trauma over IRA Disappeared，”Irish News, February 18，2010.

[64]出处同上。

[65]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

[66]丹尼斯·戈弗雷的采访。

[67]“Gerry Adams and the Disappeared，”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68]出处同上。

[69]对艾莉森·莫里斯的采访；塞伦·巴尔内斯，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70]“Dolours Price's Trauma over IRA Disappeared，”Irish News, February 18，2010.

[71]“I Didn't Order Jean's Killing，”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72]“Gerry Adams：‘I'm Happy with Who I Am……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a Sub-versive，”Guardian, January 24，2011.

[73]出处同上。

二十六　神秘无线电

[1]对努阿拉·奥罗恩的采访。

[2]警方巡查员报告。

[3]出处同上。

[4]“McConville Family Relieved Their Mother's Name Is Finally Cleared，”Irish News, July 8，2006.

[5]共和军有关琼·麦康维尔女士在1972年12月被绑架及杀害的声明（2006年7月8日），在CAIN网站上能找到。

[6]为Voices from the Grave对努阿拉·奥罗恩进行的采访文稿。

[7]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8]对特雷弗·坎贝尔的采访。

[9]这名调查员是詹姆斯·柯奇怀特。这台由一家挪威公司制造的无线电是一种名叫Stornophone的手持型发射机/接收机，詹姆斯·柯奇怀特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血色星期天调查报告中提到，1972年军方用过Stornophone无线电（“绰号Stornos”）。参看Report of the Bloody Sunday Inquiry,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2010），vol.IX, chapter 181。

[10]这张拍摄于1972年的照片收藏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士兵博物馆。

[11]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2]警方巡查员报告。

[13]出处同上。

[14]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McKendry, Disappeared, p.17。

[15]警方巡查员报告。

[16]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片段作为旁证：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回忆中，另一位曾经住在帝维斯公寓的居民玛丽·肯尼迪回忆了一次惊人相似的童年事件：“门外有一个受伤的英国人，他受的不是枪伤，而是一个小孩拿砖头砸中了他头的侧面。当时妈妈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是卡罗尔去叫她的。妈妈在阳台上找到了那个士兵，正式共和军正准备到阳台上枪毙他。但她说：‘不能当着我孩子的面，你们不能这么做。’然后她把他带进门厅，结果遭到了别人的咒骂。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之后，发现外面的墙上写着：叛徒；英国情妇；叛徒滚蛋。整件事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不愿让妈妈出门，因为我担心她回不来。我只准她单独去厕所，就算她要出去买东西，我也会说：‘我跟你一起去。’我害怕上学回来后却发现她不在家里。”这个独立的描述展现了社会对于安慰英国士兵的人所进行的处罚，不过玛丽·肯尼迪的母亲（也叫玛丽·肯尼迪）没有遭到绑架和枪杀。Bill Rolston,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Lives of Sons and Daughters of Activists in Northern Ireland（Derry, Ireland：Guildhall Press，2011），pp.139-140.

[17]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18]“Arrest Adams Now，”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19]BC Motion to Quash.

二十七　波士顿录音带

[1]2011年5月16日，电话会议。

[2]出处同上。

[3]“N.Ireland Papers on Disarmament Archived at BC，”Boston Globe, March 27，2011.

[4]2011年5月16日，电话会议。

[5]“Secret Archive of Ulster Troubles Faces Subpoena，”New York Times, May 13，2011.

[6]“BC Ordered to Give Up Oral History Tapes on IRA，”Boston Globe, May 14，2011.

[7]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8]汤姆·哈奇给埃德·莫洛尼的电子邮件，2011年5月15日。

[9]若欲了解对这一主题挑衅性的探究，参看Eamonn McCann，“Norman Baxter’s Long Crusade，”Counterpunch, February 13，2012。莫洛尼揪住了一件事——北爱尔兰警察局的警探于2011年1月前往马基利根监狱探视关押在那里的吉姆·麦康维尔，并提议他填写一份起诉状，表示他认为波士顿学院的采访也许能揭示其母亲死亡的情况。莫洛尼声称，这将赋予警方为获取档案而发送传票的权力。他认为，北爱尔兰警察局提议麦康维尔家族利用档案内容向那些对他们的母亲之死负有责任的人提起诉讼的行为构成了“行贿”。埃德·莫洛尼向北爱尔兰警方巡查员提出控告，2015年10月6日。参看Ed Moloney，“Boston College Case：PSNI Detectives Offered‘Bribe’to McConville Family Member to Enable Invasion of Archive，”The Broken Elbow blog, September 30，2015。

[10]“Mothers Angry at‘Betrayal'of RUC's Dead，”Guardian, September 10，1999.

[11]2011年5月16日，电话会议。

[12]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13]2011年5月16日，电话会议；对威尔逊·麦克阿瑟的采访。

[14]埃德·莫洛尼写给鲍勃·奥尼尔的电子邮件，2001年1月30日。

[15]鲍勃·奥尼尔写给埃德·莫洛尼的邮件，2001年1月31日。

[16]对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奥尼尔拒绝就本书接受采访。

[17]“BC Reflects on Missteps in Northern Ireland Project，”Boston Globe, May 18，2014.

[18]对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19]政府反对撤销传票动议。

[20]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21]埃德·莫洛尼写给汤姆·哈奇的电子邮件，2011年5月31日。

[22]出处同上。

[23]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24]埃德·莫洛尼写给汤姆·哈奇的电子邮件，2011年6月2日。

[25]汤姆·哈奇写给埃德·莫洛尼的电子邮件，2011年6月2日。

[26]波士顿学院撤销传票动议。

[27]出处同上。

[28]莫洛尼的马萨诸塞州宣誓书。

[29]若想了解有关此案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的全面探讨，参看Ted Palys and John Lowman，“Defending Research Confidentiality‘to the Extent the Law Allows’：Lessons from the Boston College Subpoenas，”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vol.10，no.4（2012）。

[30]政府反对撤销传票动议。

[31]出处同上。

[32]Memorandum of Trustees of Boston College in Reply to Government's Opposition to Motion to Quash Subpoenas and in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s Motion to Compel, July 15，2011（U.S.District Court of Massachusetts, M.B.D.no.11-MC-91078）.

[33]Motion of Trustees of Boston College to Quash New Subpoenas, August 17，2011（U.S.District Court of Massachusetts, M.B.D.no.11-MC-91078）.

[34]约翰·克里致希拉里·克林顿，2012年1月23日。

[35]“In Re：Request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Pursuant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Amicus Curiae Brief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Massachusetts in Support of Appellants, February 27，2012.

[36]对詹姆斯·克罗宁的采访。

[37]“Secrets from Belfast，”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6，2014.

[38]对波士顿学院历史系现在及过去教职人员的采访。

[39]出处同上。

[40]汤姆·哈奇写给埃德·莫洛尼的电子邮件，2011年5月15日。

[41]对詹姆斯·克罗宁的采访。

[42]"'Belfast Project'Is Not and Never Was a Boston College History Department Project，"statement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Boston College, May 5，2014.

[43]对詹姆斯·克罗宁的采访。

[44]"In Re：Request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Pursuant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in the Matter of Dolours Price，"Opinion, First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May 31，2013.

[45]Moloney v.United States Petition Denied,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der List：569 U.S.，April 15，2013.

[46]杰弗里·斯沃普写给安东尼·麦金太尔的电子邮件，2011年12月20日。

[47]安东尼·麦金太尔写给杰弗里·斯沃普的电子邮件，2011年12月20日。

[48]法官威廉·扬主持的司法会议的文字记录，2011年12月22日。

[49]出处同上。以及Findings and Order, Judge William Young,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January 20，2012。

[50]威廉·扬法官主持的听证会律师记录，2011年12月22日。

[51]"Adams Says Bombing Claims False，"Irish Times, September 27，2012.

[52]莫洛尼的贝尔法斯特宣誓书。

[53]出处同上。

[54]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55]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56]纪录片I, Dolours中对普赖斯的采访。

[57]除非有其他标注，这部分的材料源于纪录片I, Dolours和P-EM。

[58]据说在贝尔法斯特还有其他案例使用这种手法指认共和军嫌犯。在2000年的采访中，前共和军志愿军描述了1971年12月被捕的经历："地下室里有这种裁有观察孔的毛毯，我们能听到孔后面有声音说：'是的，这是他。'""Tommy Gorman：Recalling the Maidstone，"Andersonstown News, September 9，2000.

[59]P-EM.

[60]"Old Bailey Bomber Dolours Price Accused Gerry Adams of Being Behind the Ab-ductions of'The Disappeared，'"Telegraph, May 2，2014.

[61]莫洛尼不愿告诉我普赖斯是否告诉他她打偏了。而且他对这一对话进行了编辑，使读者无法确定她在这次采访中是否这么说过。但普赖斯向安东尼·麦金

太尔也透露过这次行刑的情况，并告诉他她故意打偏了子弹。

[62]P-EM.

[63]“Row Over Interviewee Identities，”UTV News, July 28，2013.

[64]对埃德·莫洛尼的采访。

二十八　意外死亡

[1]“Antrim Soldier Shooting：Dead Soldiers Just Minutes from Leaving for Afghanistan，”Telegraph, March 9，2009.

[2]出处同上。

[3]“Army Attack‘Brutal and Cowardly，'”BBC News, March 9，2009.

[4]“Chilling Video at Trial Opening，”Irish Echo, November 9，2011.

[5]“Terrorists Murder Ulster Policeman，”Scotsman, March 10，2009.

[6]“Tributes Paid to Murdered Northern Ireland Soldiers，”Guardian, March 9，2009.

[7]“Shootings Were Attempt at Mass Murder, Says PSNI，”BBC News, March 8，2009.

[8]“Real IRA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Antrim Barracks Murder，”Telegraph, March 8，2009.

[9]“Antrim Soldier Shooting：Dead Soldiers Just Minutes from Leaving for Afghani-stan，”Telegraph, March 9，2009.

[10]“Old Bailey Bomber Held over Murder of Soldiers，”Independent, November 18，2009.

[11]当局公开了监控视频，包括这个画面。参看“Marian Price Sentenced for Massereene Attack Phone Link，”Irish Times, January 7，2014。

[12]“Old Bailey Bomber‘Bought Phone Real IRA Used to Claim Murder of Soldiers，'”Guardian, November 19，2013.

[13]“Republicans'Defiant Dame Warns of War，”Observer, February 4，2001.

[14]“Old Bailey Bomber Marian Price on New Charge，”Guardian, July 22，2011.

[15]“Old Bailey Bomber Charged over Dissident Threats to Police，”Irish Times, May 16，2011.

[16]“Marian Price and the Lost Document，”Irish Times, February 18，2012.

[17]“Republican Marian Price Reveals Horror of Seven Months'Solitary Confinement in Prison，”Sunday World, December 18，2011.

[18]“Jailed Republican Price in Legal Limbo Despite Her Illness，”Irish Times, July 21，2012.

[19]出处同上。

[20]“Irish Eyes Are Smiling：Show of Respect Turns Queen into Runaway Favou-rite，”Guardian, May 19，2011.

[21]P-EM.

[22]“Major Terror Alert As Queen Visits Ireland，”Daily Express, May 17，2011.

[23]“'Historic Handshake'for Queen and Ex-IRA Leader Martin McGuinness，”In-dependent, June 26，2012.

[24]“Paisley and McGuinness Mark New Era，”Guardian, May 8，2007.

[25]“Republican Marian Price Reveals Horror of Seven Months'Solitary Confinement in Prison，”Sunday World, December 18，2011.

[26]“Republicans'Defiant Dame Warns of War，”Observer, February 4，2001.

[27]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

[28]“Marian Price Sentenced for Massereene Attack Phone Link，”Irish Times, January 7，2014.

[29]对埃蒙·麦卡恩的采访；“Republican Marian Price Reveals Horror of Seven Months’Solitary Confinement in Prison，”Sunday World, December 18，2011。

[30]“Corporals'Killer Arrested over McConville Murder，”Irish News, April 3，2014；“MLA's Sister Released in McConville Investigation，”Irish News, April 11，2014；“Sinn Féin Candidate Quizzed About Jean McConville Murder，”Irish News, A-pril 19，2014.

[31]“Republican Charged in Connection with 1972 McConville Murder，”Irish News, March 22，2014.

[32]“The Jean McConville Killing：I'm Completely Innocent.But What Are My Accusers'Motives？”Guardian, May 7，2014.

[33]出处同上。

[34]“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35]“Disillusioned Republicans Breached IRA's Code of Secrecy，”Irish Times, No-vember 7，2013.

[36]“IRA Bomber Says Gerry Adams Sanctioned Mainland Bombing Campaign，”Telegraph, September 23，2012.

[37]“Gerry Adams Interview：No Parade Unless the Residents Support One，”Irish News, February 11，2010.

[38]这段对话取自The Disappeared。

[39]出处同上。

[40]“Adams'Brother Sought over Alleged Abuse，”RTÓNews, December 19，2009.

[41]出处同上。

[42]“Adams Said RUC Should Not Be Used over Abuse，”Irish Times, December 22，2009.

[43]“Adams'Paedophile Brother Was Youth Worker in Dundalk，”Sunday Tribune, December 20，2009.

[44]“Adams Is a Liability with Much to Explain，”Times（London），December 27，2009.

[45]“Gerry Adams Reveals Family's Abuse by Father，”Guardian, December 20，2009.

[46]“Gerry Adams'Niece Reveals：‘The Beard Tried to Get Me to Gag Press over Abuse，'”Belfast Telegraph, October 7，2013.

[47]“Adams Is a Liability with Much to Explain，”Times（London），December 27，2009.

[48]机密采访。

[49]P-EM.

[50]“The Jean McConville Killing：I'm Completely Innocent.But What Are My Accusers'Motives？”Guardian, May 7，2014.

[51]Adams, Before the Dawn, p.191.

[52]“Adams'Family Values Strip Him of All Moral Authority，”Sunday Tribune, December 27，2009.

[53]“Gerry Adams Arrested：Martin McGuinness Speaks at Falls Road Rally Deman-ding Sinn Féin Leader’s Release，”Belfast Telegraph, May 3，2014.

[54]2014年5月3日《共和国报》（An Phoblacht）集会视频新闻片段。

[55]2014年5月3日天空新闻（Sky News）集会片段。关于他的执行者身份：“IRA Calls in Peace‘Fixer，'”Times（London），January 8，1995。

[56]“‘Big Bobby'：Arrests, Interrogations, Imprisonment, and Struggle—

the‘Storey'of His Life，”An Phoblacht, December 18，2008.

[57]“‘Key Spymaster'a Crucial Adams Ally，”Irish News, November 1，2007；“We Will Defend the Integrity of the Republican Struggle：Interview with Bobby Storey，”Hot Press, June 12，2009.Storey's home was raided after the break-in.参A“Bobby Storey：‘Enforcer’Is Key Ally of Gerry Adams，”The Belfast Tel-egraph, May 6，2014。

[58]“We Will Defend the Integrity of the Republican Struggle：Interview with Bob-by Storey，”Hot Press, June 12，2009；“Bobby Storey：‘Enforcer'Is Key Ally of Gerry Adams，”Belfast Telegraph, May 6，2014.

[59]“10 Facts About the IRA's ￡26.5m raid on Northern Bank，”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19，2014.

[60]Dolours Price，“Money … Money … Money，”The Blanket, January 17，2005.

[61]关于斯托里这一面性格的生动说明，参看Malachi O’Doherty, The Trouble with Guns：Republican Strategy and the Provisional IRA（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8），pp.1-3。

[62]BBC新闻，2014年5月3日集会片段。

[63]出处同上。

[64]“Sinn Féin Hints at Possible Renewal of IRA Violence，”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4，1995.

[65]Detective Inspector Peter Montgomery to Joe Mulholland&Co Solicitors, Octo-ber 21，2013.

[66]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67]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68]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69]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对理查德·奥拉韦的采访。

[70]“The Boston Time Bomb，”Sunday Life, May 11-13，2014.

[71]对安东尼·麦金太尔和卡丽·图米的采访；“Ex-Provo’s Life Is at Risk Over IRA Tapes Row, Court to Be Told，”Belfast Telegraph, July 5，2012。

[72]“The Jean McConville Killing：I'm Completely Innocent.But What Are My Accusers'Motives？”Guardian, May 7，2014.

[73]“Boston College Says It Will Return Interviews about the North，”Irish Times, May 7，2014.

[74]“Gerry Adams Freed in Jean McConville Murder Inquiry，”BBC News, May 4，2014.

[75]出处同上。

[76]“Jailed Republican Price in Legal Limbo Despite Her Illness，”Irish Times, July 21，2012.

[77]“Dolours Price-Rea Died from Prescription Drugs Mix，”Irish Times, April 15，2014.

[78]出处同上。

[79]出处同上。

[80]许多讣告根据错误的出生日期声称普赖斯去世时61岁。她实际上出生于1950年12月16日。

[81]“IRA Leaders at Price Funeral，”Irish Press, February 19，1975.

[82]“Marian Price Released to Attend Sister's Wake，”Irish Times, January 28，2013.为了争取玛丽安的释放，律师们以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姿态找来一位医生，证明一个人在失去所爱的人时如果被剥夺了适当表达悲痛的机会，可能会引起情感创伤。对达拉赫·麦金的采访。

[83]“Old Bailey Bomber Dolours Price Buried in Belfast，”Irish Times, January 29，2013.

[84]Angela Nelson，“L'Addio a Dolours Price，”The Five Demands blog, January 29，2013.

[85]“Dolours Price-Rea Died from Prescription Drugs Mix，”Irish Times, April 15，2014.

[86]Angela Nelson，“L'Addio a Dolours Price，”The Five Demands blog, January 29，2013.

[87]“Crying Pain for Stephen；Actor's Farewell to Dolours，”Daily Mirror, January 29，2013.

[88]“Old Bailey Bomber Price Buried，”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29，2013.

[89]“Crying Pain for Stephen；Actor's Farewell to Dolours，”Daily Mirror, January 29，2013.

[90]“Dolours Price-Rea Died from Prescription Drugs Mix，”Irish Times, April 15，2014.

[91]对卡丽·图米的采访。

[92]“Dolours Price-Rea Died from Prescription Drugs Mix，”Irish Times, April 15，2014.

[93]“Crying Pain for Stephen；Actor's Farewell to Dolours，”Daily Mirror, January 29，2013；“Hundreds of Mourners Crowd Church As Actor Stephen Rea and Sons Carry Coffin of Dolours Price，”Irish Independent, January 28，

2013.

二十九　这是过去

[1]“Paramilitary Groups in Northern Ireland，”assessment commission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rthern Ireland（October 19，2015）.

[2]“Gerry Adams Rejects Reports on IRA Existence，”Irish Examiner, October 22，2015.

[3]“Gerry Moriarty：Robinson Gambles That Adams and McGuinness Can Finally Make the IRA Go Away，”Irish Times, October 21，2015.

[4]Segregated Lives：Social Division, Sectarianism and Everyday Life in Northern Ireland, Insti-tute for Conflict Research，2008；“Liam Neeson in Call for More Integrated Schools，”BBC News, February 8，2017.

[5]对理查德·哈斯的采访。

[6]“Flag Protesters Storm Belfast City Hall，”Irish Examiner, December 3，2012；“Union Flag Dispute：Riot Breaks Out in East Belfast，”BBC News, January 15，2013.

[7]“Ivor Bell to Be Prosecut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Irish Times, June 4，2015.

[8]“Ivor Bell Remand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RTÓ，March 24，2014.

[9]Moloney,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p.242.

[10]出处同上，第14页。

[11]出处同上，第242-243页。

[12]出处同上，第244-245页。

[13]H-BC.

[14]“Forms to Identify Interview Tapes‘Lost，'”Irish News, May 8，2014.

[15]“Ex-IRA Chief Granted Extended Bail from Jean McConville Trial，”Guardian, October 14，2016.

[16]“Voice Analyst Enlisted in Jean McConville Murder Case，”Irish Times, October 30，2014.

[17]“Bell Lawyer Claims Boston Tapes Are Unreliable and Inaccurate，”Irish News, June 7，2014.

[18]出处同上。

[19]“Forms to Identify Interview Tapes‘Lost，'”Irish News, May 8，2014.

[20]“Ivor Bell to Be Prosecut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Irish Times, June 4，2015.

[21]“Voice Analyst Enlisted in Jean McConville Murder Case，”Irish Times, October 30，2014.

[22]这显然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参阅“Voice Analysis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in Court，”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5，2017。

[23]“Jean McConville Murder：Veteran Republican Ivor Bell to Stand Trial，”Belfast Telegraph, July 7，2016.

[24]“Ivor Bell Remand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RTÓ，March 24，2014.

[25]出处同上。

[26]“Revolutionary Appointment Reflects‘Transformation'in Northern Society，”I-rish Times, December 3，2011.

[27]“Profile：Drew Harris of the PSNI，”Belfast Telegraph, September 20，2014.2018年6月，哈里斯被任命为爱尔兰共和国警察机关的警察局长。

[28]“Adams Won't Be Charg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Irish News, July 10，2015.

[29]“McConville Accused Calls in Voice Analyst，”Irish News, October 31，2014.

[30]对马克·汉密尔顿的采访；“Figures Dismiss Army‘Witch Hunt’Allegations，”I-rish News, January 27，2017。

[31]对马克·汉密尔顿的采访。

[32]“‘No Stone to Be Left Unturned'in Stakeknife Probe，”RTÓ，June 11，2016.

[33]“Top Spy‘Stakeknife'Allegedly Linked to 50 Killings‘Unlikely to Ever Face Prosecution，'”Irish Independent, April 27，2016.

[34]“‘IRA Informer'Fred Scappaticci Arrested over Dozens of Murders，”Independ-ent, January 30，2018.

[35]“Man Believed to Have Been IRA Double Agent‘Stakeknife'Released on Bail，”Guardian, February 2，2018.

[36]“How, and Why, Did Scappaticci Survive the IRA's Wrath？”Irish Times, April 15，2017.

[37]对亨利·麦克唐纳的采访。

[38]“Freddie Scappaticci's Father Laid to Rest in Belfast，”Irish News, April 13，2017.

[39]对凯文·温特斯的采访。

[40]“Stakeknife：Alleged One-Time Top British Agent Inside IRA Facing At Least 9 Separate Lawsuits，”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13，2016.

[41]“Soldiers Who Shot 13 Dead‘Not Thugs，'”Guardian, September 24，2002.

[42]“Lady Elizabeth Kitson OBE of Yelverton Writes a Book About Her Famous Show Pony Legend，”Tavistock Times Gazette, August 22，2016.

[43]“Widow Seeks Damages Relating to Claims against British General Frank Kitson，”Irish Times, April 30，2015.

[44]Statement of Claim, Mary Heenan v.Ministry of Defence and Chief Constable of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General Sir Frank Edward Kitson, High Court of Justice in Northern Ireland, Queen's Bench Division（2015）.

[45]“Widow Seeks Damages Relating to Claims against British General Frank Kitson，”Irish Times, April 30，2015.

[46]Defence of Third Defendant, Mary Heenan v.Ministry of Defence and Chief Constable of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General Sir Frank Edward Kitson, High Court of Justice in Northern Ireland, Queen's Bench Division（December 24，2017）.

[47]“Army General Sued over 1973 Loyalist Murder，”Telegraph, April 27，2015.

[48]“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 Army Veterans Slam‘Witch Hunt，'”Belfast Tele-graph, December 12，2017.

[49]“Cases against Terrorist Suspects Far Outweigh Ones Involving Ex-Army and Po-lice, PPS Insists，”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31，2017.

[50]参看Susan McKay, Bear in Mind These Dead（London：Faber，2008），part II, chapter 3。

[51]Bill Rolston, Unfinished Business：State Killings and the Quest for Truth（Belfast：Be-yond the Pale，2000），p.xi.

[52]引自Alain Finkielkraut, In the Name of Humanity：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5-6。

[53]“Boston College Tapes Request‘Politically Motivated，'”BBC News, August 25，2011.

[54]“Winston‘Winkie'Rea to Be Charged over 1991 Murder of Two CatholicWorkmen，”Belfast Telegraph, November 28，2016.

[55]“Loyalist Winston Rea Denies Conspiracy to Murder Catholic Men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y，”Irish News, October 24，2017.

[56]“Ulster Loyalist's Murder Case‘a Cynical Attempt to Protect Police，”Guardian, June 6，2016.

[57]安东尼·麦金太尔接受播客Off the Record采访时所言，2015年2月27日。

[58]Detective Chief Inspector Peter Montgomery, PSNI, to the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February 9，2015.

[59]出处同上。

[60]杰弗里·斯沃普写给安东尼·麦金太尔的电子邮件，2016年4月23日。

[61]Detective Chief Inspector Peter Montgomery, PSNI, to the 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February 9，2015.

[62]对安东尼·麦金太尔的采访。

[63]Fourth Affidavit of Anthony McIntyre, in the Matter of an Application by Anthony McIntyre for Judicial Review, High Court of Northern Ireland, Queens Bench Di-vision, August 2016.

[64]Walking the Line, radio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Ciaran Cassidy（RTÓRadio，2014）；“Peter Wilson：‘Disappeared'by the IRA, Found at the Beach His Fam-ily Treasured，”Belfast Telegraph, November 3，2010.

[65]对杰夫·克努普费尔和丹尼斯·戈弗雷的采访。

[66]“Forms to Identify Interview Tapes‘Lost，'”Irish News, May 8，2014.

[67]“‘Preliminary Work'Begins to Recover Remains of Joe Lynskey，”Irish News, November 7，2014.

[68]“Disappeared Victim's Family‘Hopeful'As Dog Aids Search，”Irish News, De-cember 2，2014.

[69]对杰夫·克努普费尔的采访。

[70]“Emotional Scenes As Families of Two IRA‘Disappeared'Visit Site，”Irish Inde-pendent, June 26，2015.

[71]对杰夫·克努普费尔的采访。

[72]出处同上；“Courage and Resilience of Family Praised As Disappeared Man Finally Gets Proper Burial，”Irish News, September 16，2015.

[73]David Ireland, Cyprus Avenue（London：Bloomsbury，2016），p.16.

[74]出处同上，第16页。

[75]出处同上，第43页。

[76]HIA笔录。

[77]“Billy McConville Brought His Family Back Together, Mourners

Told，”Irish News, July 26，2017.

[78]“Son of Murdered Jean McConville Brought His Family Back Together, Funeral Told，”Irish Examiner, July 26，2017.

[79]“Billy McConville Brought His Family Back Together, Mourners Told，”IrishNews, July 26，2017.

[80]“Republican Charged over Jean McConville Murder‘Has Dementia，'”Irish Times, December 5，2006.

[81]出处同上。

[82]马修·朱里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McConville Daughter to Seek Civil Case，”Irish News, October 1，2015。

[83]“Jean McConville's Family Will‘Fight to the Bitter End for Justice，'”Independ-ent, May 4，2014.

三十　未知

[1]对乔·克拉克的采访。

[2]这个朋友是亚当·戈德曼，现在《纽约时报》工作。

[3]根据一则讣告，麦克卢尔死于“一场短暂的疾病”，享年46岁。“Patrick F.Mc-Clure, Obituary，”Record-Journal（Meriden, Conn.），December 5，1986.

[4]出处同上。

[5]“Patrick F.McClure—Obituary，”Observer（Southington, Conn.），December 11，1986.

[6]我联系了两位格里·亚当斯的代表，希望他们就这一说法进行回应，但谁也没有肯定或否认这一点。

[7]P-EM.

[8]理查德·麦考利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9]匿名信息源。

[10]这名律师是KRW律师事务所的彼得·科里根，我通过电子邮件和信件的方式多次联系他，他也是艾弗·贝尔的代理律师。

[11]“Gerry Adams：‘I Won't Be a Puppet Master，'”Belfast Telegraph, January 4，2018.

[12]“Gerry Adams：‘Martin McGuinness Was Not a Terrorist，'”BBC News, March 23，2017.

[13]“Adams‘Relaxed'over Poll Doubting His Denial of IRA Membership，”Irish Times, May 20，2014.而且许多选民相信亚当斯参与了琼·麦

康维尔的失踪案：“Half of Voters Believe Adams Was Involved in McConville Murder，”Irish In-dependent, May 17，2014。

[14]2016年，亚当斯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推特言论汇编：My Little Book of Tweets（Cork, Ireland：Mercier Press，2016）。

[15]“Gerry Adams Tweets：Ducks, Teddy Bears and a Dog Called Snowie，”BBC News, February 14，2014.

[16]达明·欧文斯（@Owens Damien）：“格里·亚当斯太想在推特上表现得可爱和异想天开，这就像查尔斯·曼森向你展示他收集的茶壶保温罩。”推特，2014年1月2日，下午1：11。

[17]O'Doherty, Gerry Adams, p.68.

[18]Alvin Jackson, Home Rule：An Irish History，1800-20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87.

[19]H-BC.

[20]“‘Catholic Majority Possible'in NI by 2021，”BBC News, April 19，2018.

[21]“Survey Deals Blow to Sinn Féin Hopes of United Ireland，”Guardian, June 17，2011.

[22]“The Survivor，”Guardian, April 30，2001.

[23]如果想了解对脱欧时代国界问题的思考，参看Susan McKay，“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rch 30，2017。

[24]“Gerry Adams Takes Parting Shot at UK—Brexit Has BOOSTED United Ireland Campaign，”Daily Express, February 9，2018.

[25]“Gerry Adams Tells Irish America of Party's Aim for a Unity Referendum Within Five Years，”Irish News, November 10，2017.

[26]Gerry Adams（as Brownie），“I Am an IRA Volunteer，”Republican News, May 1，1976.

[27]“I Don't Have Any Blood on My Hands，”Sunday Life, February 21，2010.

[28]对迈克尔·麦康维尔的采访。

[29]Andrew Blechman, Pigeons：The Fascinating Saga of the World's Most Revered and Reviled Bird（New York：Grove Press，2006），p.11.

[30]Kevin C.Kearns, Dublin Street Life&Lore：An Oral History（Dublin/Glendale, N.Y.：Glendale，1991），pp.195-198.

参考文献

Adams, Gerry.Before the Dawn：An Autobiography.Dingle, Ireland：Brandon，2001.——.Cage Eleven.New York：Sheridan Square Press，1993.

——.Falls Memories：A Belfast Life.Niwot, Colo.：Roberts Rinehart，1994.

——.A Farther Shore：Ireland's Long Road to Peace.New York：Random House，2005.

Alexander, Yonah, and Alan O'Day, eds.The Irish Terrorism Experience.Brookfield, Vt.：Dartmouth，1991.

Bailey, Anthony.Acts of Union：Reports on Ireland，1973-1979.New York：Random House，1980.

Bell, J.Boyer.The Secret Army：The IRA.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1997.

Beresford, David.Ten Men Dead：The Story of the 1981 Irish Hunger Strike.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7.

Bishop, Patrick, and Eamonn Mallie.The Provisional IRA.London：Heinemann，1987.

Blechman, Andrew.Pigeons：The Fascinating Saga of the World's Most Revered and Reviled Bird.New York：Grove Press，2006.

Bloom, Mia.Bombshell：Women and Terror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

Boulton, David.The UVF：An Anatomy of Loyalist Rebellion.Dublin：Torc Books，1973.

Boyd, Andrew.Holy War in Belfast.Belfast：Pretani Press，1987.

Bradley, Gerry, and Brian Feeney.Insider：Gerry Bradley's Life in the IRA.Dublin：O'Brien Press，2009.

Brady, Evelyn, Eva Patterson, Kate McKinney, Rosie Hamill, and Pauline Jackson.In the Footsteps of Anne：Stories of Republican Women Ex-Prisoners.Belfast：Shanway Press，2011.

Cadwallader, Anne.Lethal Allies：British Collusion in Ireland.Cork, Ireland：Mercier Press，2013.

Carson, Ciarán.Belfast Confetti.Winston-Salem, N.C.：Wake Forest University Press,1989.

Clark, Wallace.Guns in Ulster.Belfast：Constabulary Gazette，1967.

Clarke, George.Border Crossing：True Stories of the RUC Special Branch, the Garda Special Branch and the IRA Moles.Dublin：Gill&Macmillan，2009.

Cobain, Ian.Cruel Britannia：A Secret History of Torture.London：Portobello，2013.

——.The History Thieves：Secrets, Lies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Nation.London：Portobello，2016.

Collins, Eamon.Killing Rage.London：Granta，1997.

Conroy, John.Belfast Diary：War As a Way of Life.Boston：Beacon Press，1995.

——.Unspeakable Acts, Ordinary People：The Dynamics of Tor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Coogan, Tim Pat.The Famine Plot：England's Role in Ireland's Greatest Tragedy.New York：Palgrave，2012.

——.The IRA.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2.

——.On the Blanket：The Inside Story of the IRA Prisoners'“Dirty”Protest.New York：Palgrave，2002.

——.The Troubles.New York：Palgrave，2002.

Darby, John, ed.Northern Ireland：The Background to the Conflict.Syracuse, 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7.

D'Arcy, Margaretta.Tell Them Everything.London：Pluto Press，1981.

Deane, Seamus.Strange Country：Modernity and Nationhood in Irish Writing since 179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de Rosa, Peter.Rebels：The Irish Rising of 1916.New York：

Random House，1990.

Devlin, Bernadette.The Price of My Soul.New York：Vintage，1970.

Dillon, Martin.The Dirty War：Covert Strategies and Tactics Used in Political Conflicts.New York：Routledge，1999.

——.Stone Cold：The True Story of Michael Stone and the Milltown Massacre.London：Random House，1992.

——.The Trigger Men.Edinburgh：Mainstream，2003.

Drower, George.John Hume：Man of Peace.London：Victor Gollancz，1996.

Edwards, Ruth Dudley.Patrick Pearse：The Triumph of Failure.Dublin：Poolbeg Press，1990.

Egan, Bowes, and Vincent McCormack.Burntollet.London：LRS，1969.

Elkins, Caroline.Imperial Reckoning：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New York：Henry Holt，2005.

Ellis, Walter.The Beginning of the End：The Crippling Disadvantage of a Happy Irish Child-hood.Edinburgh：Mainstream，2006.

English, Richard.Armed Struggle：The History of the I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Fairweather, Eileen, Roisín McDonough, and Melanie McFadyean.Only the RiversRun Free：Northern Ireland；The Women’s War.London：Pluto Press，1984.

Farrell, Michael.Northern Ireland：The Orange State.London：Pluto Press，1987.

——，ed.Twenty Years On.Dingle, Ireland：Brandon，1988.

Faul, Dennis, and Raymond Murray.The Hooded Men：British Torture in Ireland, August, October 1971.Dublin：Wordwell Books，2016.

Feeney, Brian.Sinn Féin：A Hundred Turbulent Year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3.

Fiacc, Padraic.The Wearing of the Black：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Ulster Poetry.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74.

Fiske, Alan Page, and Tage Shakti Rai.Virtuous Violence：Hurting and Killing to Create, Sustain, End, and Honor Social Relationship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Foot, Paul.Who Framed Colin Wallace？London：Macmillan，1989.

Foster, R.F.Modern Ireland，1600-1972.New York：Penguin，1989.

Friel, Brian.Brian Friel：Plays 1.London：Faber，1996.

Friel, Brian, and Paul Delaney.Brian Friel in Convers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

Geraghty, Tony.The Irish War：The Military History of a Domestic Conflict.London：Harp-erCollins，2000.

Gurney, Peter.Braver Men Walk Away.London：HarperCollins，1993.

Hamill, Heather.The Hoods：Crime and Punishment in Belfast.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Hamill, Pete.Piecework：Writings on Men and Women, Fools and Heroes, Lost Cities, Van-ished Calamities and How the Weather Was.New York：Little, Brown，1996.

Harnden, Toby.Bandit Country：The IRA&South Armagh.London：Hodder&Stough-ton，1999.

Hastings, Max.Barricades in Belfast：The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Taplinger，1970.

Heaney, Seamus.The Cure at Troy：A Version of Sophocles'Philoctetes.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91.

——.North：Poems.London：Faber，1975.

——.Preoccupations：Selected Prose，1968-1978.London：Faber，1980.

Hume, John.A New Ireland：Politic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Boulder, Colo.：Roberts Rinehart，1996.

Huntley, Bob.Bomb Squad：My War against the Terrorists.London：W.H.Allen，1977.

Ingram, Martin, and Greg Harkin.Stakeknife：Britain's Secret Agents in Irelan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4.

Ireland, David.Cyprus Avenue.London：Bloomsbury，2016.

Jackson, Alvin.Home Rule：An Irish History，1800-20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Jackson, Mike.Soldier：The Autobiography.London：Bantam Press，2007.

Jenkins, Roy.A Life at the Centre.London：Macmillan，1991.

Kearns, Kevin.Dublin Street Life and Lore：An Oral History.Dublin：Glendale，1991.

Keenan-Thomson, Tara.Irish Women and Street Politics，1956-1973.Dublin：Irish Aca-demic Press，2010.

Kelly, Gerry.Words from a Cell.Dublin：Sinn Féin Publicity Department，1989.

Kiely, Benedict.Proxopera.Belfast：Turnpike Books，2015.

Kipling, Rudyard.Collected Poems of Rudyard Kipling.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1994.

Kitson, Frank.Bunch of Five.London：Faber，2010.

——.Gangs and Counter-Gangs.London：Barrie Books，1960.

——.Low Intensity Operations：Subversion, Insurgency, Peace-Keeping.London：Faber，1991.

Krog, Antjie.Country of My Skull：Guilt, Sorrow, and the Limits of Forgivenes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0.

Lee, Jonathan.High Dive.New York：Knopf，2016.

MacAirt, Ciarán.The McGurk’s Bar Bombing：Collusion, Cover-Up and a Campaign for Truth.Edinburgh：Frontline Noir，2012.

MacEoin, Uinseann Ó Rathaille.The IRA in the Twilight Years：

1923-1948.Dublin：Argenta，1997.

Mac Stíofáin, Seán.Revolutionary in Ireland.Edinburgh：R.&R.Clark，1975.

Mansfield, Michael.Memoirs of a Radical Lawyer.London：Bloomsbury，2009.

Martin, David C.Wilderness of Mirrors：Intrigue, Deception, and the Secrets That Destroyed Two of the Cold War's Most Important Agents.Guilford, Conn.：Lyons Press，2003.

Matchett, William.Secret Victory：The Intelligence War That Beat the IRA.Belfast：self-pub-lished，2016.

McCann, Colum.TransAtlantic.New York：Random House，2013.

McCann, Eamonn.War and an Irish Town.London：Pluto Press，1993.

McGuffin, John.The Guinea Pigs.London：Penguin，1974.

McIntyre, Anthony.Good Friday：The Death of Irish Republicanism.New York：Ausubo Press，2008.

McKay, Susan.Bear in Mind These Dead.London：Faber，2008.

McKearney, Tommy.The Provisional IRA：From Insurrection to Parliament.London：Pluto Press，2011.

McKeever, Martin.One Man, One God：The Peace Ministry of Fr Alec Reid C.Ss.R.Dublin：Redemptorist Communications，2017.

McKendry, Séamus.Disappeared：The Search for Jean McConville.Dublin：Blackwater Press，2000.

McKittrick, David, Seamus Kelters, Brian Feeney, and Chris Thornton.Lost Lives：TheStories of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 A 2nd ed.Edinburgh：Mainstream，2004.

McKittrick, David, and David McVea.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Th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Chicago：New Amsterdam Books，2002.

Meagher, Robert Emmet.Killing from the Inside Out：Moral Injury and Just War.Eugene, Ore.：Cascade Books，2014.

Miller, David, ed.Rethinking Northern Ireland.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8.

Miller, Ian.A History of Force Feeding：Hunger Strikes, Prisons and Medical Ethics，1909-1974.Basingstoke, U.K.：Palgrave Macmillan，2016.（PDF）.

Mitchel, John.The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Perhaps）.Glasgow：R.&T.Washbourne，1882.

Mitchell, George.Making Pea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Moloney, Ed.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New York：Norton，2002.

——.Voices from the Grave：Two Men's War in Ireland.New York：PublicAffairs，2010.

Moloney, Ed, and Andy Pollak.Paisley.Dublin：Poolbeg Press，1986.

Morrison, Danny.Rebel Columns.Belfast：Beyond the Pale，2004.

Morrison, John F.The Origins and Rise of Dissident Irish Republicanism.London：Blooms-bury，2013.

Mulholland, Marc.Northern Ireland at the Crossroads：Ulster Unionism in the O'Neill Years.London：Palgrave，2000.

——.Northern Ireland：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Murphy, Dervla.A Place Apart：Northern Ireland in the 1970s.London：Eland，2014.

Murray, Raymond.Hard Time：Armagh Gaol，1971-1986.Dublin：Mercier Press，1998.

Myers, Kevin.Watching the Door：Drinking Up, Getting Down, and Cheating Death in 1970s Belfast.Brooklyn, N.Y.：Soft Skull Press，2009.

O'Brien, Brendan.The Long War：The IRA and Sinn Féin.Syracuse, 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9.

Ó Dochartaigh, Niall.From Civil Rights to Armalites：Derry and

the Birth of the Irish Trou-bles.Cork, Ireland：Cork University Press，1997.

O'Doherty, Malachi.Gerry Adams：An Unauthorised Life.London：Faber，2017.

——.The Telling Year：Belfast 1972.Dublin：Gill&Macmillan，2007.

——.The Trouble with Guns：Republican Strategy and the Provisional IRA.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8.

O'Donnell, Ruán.16 Lives：Patrick Pearse.Dublin：O’Brien Press，2016.

——.Special Category：The IRA in English Prisons, vol.1：1968-1978.Sallins, Ire-land：Irish Academic Press，2012.

——.Special Category：The IRA in English Prisons, vol.2：1978-1985.Sallins, Ire-land：Irish Academic Press，2015.

O'Flaherty, Liam.The Informer.New York：Harcourt，1980.

O'Malley, Padraig.Biting at the Grave：The Irish Hunger Strikes and the Politics of Despair.Boston：Beacon Press，1990.

O'Neill, Robert K.，ed.Management of Library and Archival Security：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Binghamton, N.Y.：Haworth Press，1998.

O'Rawe, Richard.Afterlives：The Hunger Strike and the Secret Offer That Changed Irish His-tory.Dublin：Lilliput Press，2010.

——.Blanketme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Block Hunger Strike.Dublin：New Island，2005.

Ó Ruairc, Pádraig Óg.Truce：Murder, Myth,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Cork, Ireland：Mercier Press，2016.

Patterson, Henry.The Politics of Illus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IRA.London：Serif，1997.

Pearse, Padraic.The Collected Works of Padraic H.Pearse：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Dub-lin：Óire-Gael Society，2013.

Powell, Jonathan.Great Hatred, Little Room：Making Peace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Vintage，2009.

Prisoners Aid Committee.Irish Voices from English Jails：Writings of Irish Political Prisoners in English Prisons.London：Prisoners Aid Committee，1979.

Purdie, Bob.Politics in the Streets：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Northern Ire-land.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0.

Rawlinson, Peter.A Price too High：An Autobiograph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9.

Richtarik, Marilynn J.Acting between the Lines：The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and Irish Cultural Politics，1980-1984.Washington, 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1.

Rolston, Bill.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Lives of Sons and Daughters of Activists in North-ern Ireland.Derry, Ireland：Guildhall Press，2011.

——.Unfinished Business：State Killings and the Quest for Truth.Belfast：Beyond the Pale，2000.

Routledge, Paul.John Hume.London：HarperCollins，1997.

Sanders, Andrew.Inside the IRA：Dissident Republicans and the War for Legitimac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

Shannon, Elizabeth.I Am of Ireland：Women of the North Speak Out.Boston：Little, Brown，1989.

Shay, Jonathan.Achilles in Vietnam：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New York：Scribner，2003.

Sluka, Jeffrey.Hearts and Minds, Water and Fish：Support for the IRA and INLA in a North-ern Ireland Ghetto.Greenwich, Conn.：JAI Press，1989.

Smyth, Jim, ed.Remembering the Troubles：Contesting the Recent Past in Northern Ireland.Notre A ame, 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7.

Stetler, Russell.The Battle of Bogside：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London：Sheed and Ward，1970.

Stevens, John.Not for the Faint-Hearted：My Life Fighting Crime.London：Orion，2006.

Stevenson, Jonathan.We Wrecked the Place：Contemplating an

End to the Northern Irish Trou-bles.New York：Free Press，1996.

Stringer, Peter, and Gillian Robinson.Social Attitudes in Northern Ireland：The First Report.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1.

Taylor, Peter.Behind the Mask：The IRA and Sinn Fein.New York：TV Books，1999.

——.Brits：The War Against the IRA.London：Bloomsbury，2001.

——.Provos：The IRA and Sinn Fein.London：Bloomsbury，1998.

Thatcher, Margaret.The Path to Power.New York：HarperCollins，1995.

Tóibín, Colm.Bad Blood：A Walk along the Irish Border.London：Picador，2001.

Tóibín, Colm, and Diarmaid Ferriter.The Irish Famine：A Documenta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1.

Toolis, Kevin.Rebel Hearts：Journeys within the IRA's Soul.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

Urban, Mark.Big Boys'Rules：The SAS and the Secret Struggle Against the IRA.London：Faber，1992.

Wave Trauma Centre.The Disappeared of Northern Ireland's Troubles.Belfast：Wave Trau-ma Centre，2012.

Winchester, Simon.In Holy Terror.London：Faber，1975.

Wood, Ian S.Britain, Ireland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Woodham-Smith, Cecil.The Great Hunger：Ireland，1845-1849.New York：Penguin，1991.

Zucker, Carole.In the Company of Actors：Reflections on the Craft of Acting.New York：Routledge，2001.

译名对照表

《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

《低强度行动》，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放大》，Blow-Up

《共和党新闻》，Republican News

《共和军秘史》，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RA

《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

《来自坟墓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Grave

《毛毯》，The Blanket

《毛毯人》，Blanketmen

《玫瑰经》，the rosary

《旗帜和徽章法案》，Flags and Emblems Act

《塞浦路斯大道》，Cyprus Avenue

《上流社会》，High Society

《特殊权力法案》，Special Powers Act

《线人》，The Informer

《译名》，Translations

《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

《周日生活报》，Sunday Life

D连（敢死队），D Company, Dirty Dozen

阿尔弗雷多·“弗雷迪”·斯卡帕蒂奇（斯卡帕），Alfredo“Freddie”Scap-paticci, Scap

阿格尼丝，Agnes McConville

阿列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

阿马监狱，Armagh jail

阿玛莱特步枪，Armalite rifle

阿沃尼尔路，Avoniel Road

埃德·莫洛尼，Ed Moloney

埃蒙·科林斯，Eamon Collins

埃蒙·麦卡恩，Eamonn McCann

埃蒙·莫洛伊，Eamon Molloy

艾伯特·普赖斯，Albert Price

艾弗·贝尔，Ivor Bell

艾雷·尼夫，Airey Neave

艾莉森·莫里斯，Allison Morris

艾琳·希基，Eileen Hickey

爱尔兰共和妇女会，IRA Women’s Council, Cumann na mBan

安德森斯顿，Andersonstown

安东尼·法勒霍克利，Anthony Farrar-Hockley

安东尼·麦金太尔（麦克斯），Anthony McIntyre, Mackers

安吉拉·韦尔，Angela Weir

安妮，Anne McConville

奥兰治会，Orange Order

奥斯卡，Oscar

保利娜·里德，Pauline Reade

保罗·比尤，Paul Bew

鲍勃·奥尼尔，Bob O’Neill

爆头小组，Nutting Squad

贝尔法斯特项目，The Belfast Project

贝尔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

比克·麦克法兰，Bik McFarlane

比利，Billy McConville

比利·麦基，Billy McKee

彼得·罗林森，Peter Rawlinson

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

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伯恩托莱特桥，Burntollet Bridge

博比·桑兹，Bobby Sands

博比·斯托里（大博比），Bobby Storey, Big Bobby

博格赛德战役，Battle of the Bogside

布赖恩·弗里尔，Brian Friel

布赖恩·麦金尼，Brian McKinney

布赖恩·纳尔逊，Brian Nelson

布蕾迪，Bridie

布里克斯顿监狱，Brixton Prison

布伦丹·贝汉，Brendan Behan

布伦丹·麦格罗，Brendan Megraw

布伦丹·休斯（黑鬼），Brendan Hughes, Darkie

查理·阿姆斯特朗，Charlie Armstrong

戴维·豪斯，David Howes

戴维·罗斯，David Ross

戴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

黛西·康奈尔，Dáithí Ó Conaill

丹尼·麦凯洪，Danny McIlhone

丹尼斯·唐纳森，Denis Donaldson

德拉萨尔男孩之家孤儿院（基尔库宾），De La Salle Boys’Home（Kir-cubbin）

德里克·伍德，Derek Wood

德斯蒙德·麦金，Desmond Mackin

登戈尔广场，Donegall Square

帝维斯公寓，Divis Flats

蒂姆·帕特·库根，Tim Pat Coogan

杜洛尔丝·普赖斯，Dolours Price

多兰外婆，Granny Dolan

法赛特之路，Farset Walk

费加尔·奥汉隆，Fergal O’Hanlon

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

芬坦·丹尼尔·苏格尔，Fintan Daniel Sugar

愤怒旅，Angry Brigade

弗兰克·赫加蒂，Frank Hegarty

弗兰克·基特森，Frank Kitson

弗兰克·马圭尔，Frank Maguire

弗兰克·斯蒂尔，Frank Steele

弗朗西·麦圭根（弗朗西斯·麦圭根），Francie McGuigan

弗朗西斯科·诺塔兰托尼奥，Francisco Notarantonio

弗雷德里克·米尔顿，Frederick Milton

弗雷德们，The Freds

福尔斯路，Falls Road

格里·布拉德利，Gerry Bradley

格里·凯利，Gerry Kelly

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

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Wolff shipworks

哈罗德·古德，Harold Good

海伦，Helen McConville

汉弗莱·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

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皇家监狱），HMS Maidstone（HMP Maid-stone）

吉姆，Jim McConville

杰夫·克努普费尔，GeoffKnupfer

杰勒德·埃文斯，Gerard Evans

卡丽·图米，Carrie Twomey

卡斯尔雷，Castlereagh

凯瑟琳，Kathleen

凯文·布雷迪，Kevin Brady

凯文·麦基，Kevin McKee

科伦巴·麦克维，Columba McVeigh

克丽茜·普赖斯，Chrissie Price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

朗·凯什监狱，Long Kesh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雷蒙德·怀特，Raymond White

雷蒙德·穆雷神父，Father Raymond Murray

理奇·奥拉韦，Ricky O’Rawe

利斯内文管教所，Lisnevin

利亚姆·麦克米伦，Liam McMillen

利亚姆·亚当斯，Liam Adams

临时共和军，Provisional IRA, Provos

路易·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

罗伯特，Robert McConville

罗伯特·奈哈克，Robert Nairac

罗纳德·邦廷，Ronald Bunting

罗尼·邦廷，Ronnie Bunting

罗辛·麦克尼尔尼，Roisin McNearney

罗伊·麦克沙恩，Roy McShane

罗伊·梅森，Roy Mason

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

马丁·布雷迪，Martin Brady

马丁·哈克比，Martin Huckerby

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

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

马克·汉密尔顿，Mark Hamilton

马克·昆西，Mark Quinsey

玛格丽特·麦金尼，Margaret McKinney

玛丽·卢·麦克唐纳，Mary Lou Mc-Donald

玛丽·麦圭根，Mary McGuigan

玛丽·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

玛丽·麦康维尔，Mary McConville

玛丽安·普赖斯，Mrian Price

玛利亚·麦基，Maria McKee

迈克尔（米奇），Michael（Mickey）Mc-Conville

迈克尔·高根，Michael Gaughan

迈克尔·曼斯菲尔德，Michael Mans-field

迈克尔·斯通，Michael Stone

迈拉·欣德利，Myra Hindley

茅茅组织，Mau Mau

梅·默里，May Murray

梅雷亚德·法雷尔，Mairéad Farrell

米兰达·理查德森，Miranda Richard-son

拿撒勒屋舍孤儿院，Nazareth Lodge

努阿拉·奥罗恩，Nuala O’Loan

欧雅·蒂勒尔，Óine Tyrrell

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

帕特·菲纽肯，Pat Finucane

帕特·麦克卢尔，Pat McClure

帕特里克·阿金卡尔，Patrick Azimkar

帕特里克·鲁尼，Patrick Rooney

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

乔·芬顿，Joe Fenton

乔·拉塞尔，Joe Russell

乔·林斯基，Joe Lynskey

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

琼·麦康维尔，Jean McConville

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萨拉·简·瓦尔克，Sarah Jane Warke

萨拉森装甲车，Saracen armored vehicle

塞巴格·肖，Sebag Shaw

塞伦·巴尔内斯，Ciarán Barnes

尚基尔路，Shankill Road

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 SDLP

圣多米尼克学校，St.Dominic’s

圣玛丽学院，St.Mary’s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圣犹大之路，St.Jude’s Walk

斯蒂芬·雷，Stephen Rea

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Slievegallion Drive

斯托蒙特，Stormont

四方洗衣，Four Square Laundry

苏珊，Susan McConville

塔拉·基南，Tara Keenan

泰德·斯图尔特，Ted Stuart

汤姆·哈奇，Tom Hachey

汤姆·卡希尔，Tom Cahill

特雷弗·坎贝尔，Trevor Campbell

特蕾莎·维利尔斯，Theresa Villiers

特里·休斯，Terry Hughes

特伦斯·奥尼尔，Terence O’Neil

特伦斯·马克斯威尼，Terence Mac-Swiney

特殊分队，B-Specials

托马斯（塔克），Thomas（Tucker）McConville

托马斯·奥·菲奥赫，Tomás Ó Fiaich

托马斯·默里，Thomas Murray

托马斯·瓦利戴，Thomas Valliday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瓦妮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

威尔士自由军，Free Wales Army

威尔逊·麦克阿瑟，Wilson McArthur

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

威廉·怀特劳，William Whitelaw

威廉·麦克拉尔农，William McLarnon

威廉·扬，William Young

温斯顿·丘吉尔·雷（眨巴眼），Win-ston Churchill Rea, Winkie

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

无名氏小组，Unknowns

武装调查小组，Force Research Unit, FRU

西恩·马克·斯蒂奥芬（约翰·斯蒂芬森，锋刀马克），Seán Mac Stíofáin, John Stephenson, Mac the Knife

西尔维亚·潘克赫斯，Sylvia Pankhurst

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

肖恩·麦克纳，Sean McKenna

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

谢默斯·拉迪，Seamus Ruddy

谢默斯·赖特，Seamus Wright

谢默斯·麦肯德里，Seamus McKendry

谢默斯·图米，Seamus Twomey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新芬党，Sinn Féin

休·菲尼，Huge Feeney

学徒男孩，Apprentice Boys

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1972.1.30

血色星期五，Bloody Friday，1972.7.21

亚力克·里德神父，Father Alec Reid

亚瑟（阿奇），Arthur（Archie）McConville

亚瑟·麦卡利斯特，Arthur McAllister

亚瑟·麦康维尔，Arthur McConville

伊恩·布莱思，Ian Blyth

伊恩·布雷迪，Ian Brady

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

尤金·麦科伊神父，Eugene McCoy

尤金·西蒙斯，Eugene Simons

有为剧团，Field Day

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The John J.Burns Library

约翰·弗朗西斯·格林，John Francis Green

约翰·加兰，John Garland

约翰·麦圭根，John McGuigan

约翰·麦克洛里，John McClory

约翰·乔·马吉，John Joe Magee

约翰·史蒂文斯，Lord John Stevens

约翰·休姆，John Hume

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

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

正式共和军，Official IRA, Stickies

译后记

和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次一样，为了写这篇译后记，我打开了汤米·桑兹（Tommy Sands）的歌——《玫瑰遍地》（There were roses）。

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大学时期的“英美概况”课上。老师讲到北爱尔兰问题，课后播放了这首爱尔兰民谣，当时只觉得好听。没想到十年后我会翻译一本以北爱尔兰问题为题材的书，并再次温故这首歌。而今的心情，却不同于以往。

这是一本沉重的书。以一位十个孩子的母亲之死为线索，串连起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冲突。在这三十年中，又逝去了许多生命，破碎了许多家庭。共和派、保皇派、警方、军方、政府似乎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然而一桩又一桩的惨案不断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人类作为整体似乎并未能从一段段惨痛的战争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因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政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种，不断伤害压迫彼此。等到受压迫的一方忍无可忍时，终会有奋起反抗的一天，正如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受到长久的排挤之后开始拿起武器那样。

书中有一段记者采访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丈夫雷的内容，采访者问他，政治变革能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吗？

“我不知道，”雷说，“历史上有这种先例吗？”

回想这一段时，我忽然想到了圣雄甘地，他曾说：“你可以用温柔的方式撼动世界。”（In a gentle way, you can shake the world）用温柔的方式撼动世界，他做到了。

虽然基于各种因由，以柔克刚并非适用于所有宏观的矛盾冲突。但从个人角度而言，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出发，这却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正如甘地曾说过的另一句话：“期待世界如何改变，你便如何改变自己。”（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如果我们期待和平，便要以身作则。毕竟，社会和这个世界是由个体组成的，改变也需从个体开始，不是吗？

过去两年中，整个国际社会似乎走到了转折点。就北爱尔兰而言，似乎更是到了决定性的时刻。英国脱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导致北爱尔兰再次动荡不安。2020年，本书所提及的新芬党成员大博比·斯托里去世，他的葬礼引发了“共和派”和“保皇派”持续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北爱尔兰来之不易的和平，再次变得脆弱无比。

本书的翻译前后历时将近一年。在此感谢家人的支持；感谢挚友王

小沛给予的陪伴和提供的建议；感谢亲爱的小伙伴赵斌耐心地帮我查找资料，every single time！感谢本书的编辑贺俊逸，感谢你的信任、尊重和包容，以及为这本书付出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一如既往地感谢格致出版社的编辑王萌，虽然我在翻译方面没有任何建树，但你对我确有知遇之恩，自当铭记在心；最后感谢所有为了本书的出版贡献心力的朋友！

这本书中最打动我的人物，是里德神父。虽然我与他有着不同的信仰，但在作为佛教徒的我看来，神父就是一位人间的菩萨。他不为了明哲保身而躲在《圣经》的后面，而是甘愿冒着风险甚至不畏生死地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他毅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明知一定会被处决的两名英国士兵。正如文中所言：他认为，他的职责是替受害者发声，是代表下一个可能在冲突中丧命的人。他没有特别的党派；他只忠诚于那些已经（和将要）倒下的人。里德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机会发现恩典；在最可怕的境遇中，一个人依旧能效仿耶稣的榜样；战争能唤起人性中最恶劣的部分，但也能唤醒最美好的部分。

这本书的原著名为“Say Nothing”，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打破沉默，去“say something”，甚至像里德神父那样，去“do something”。只有我们多数人愿意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时候，才有希望真正带来改变。而我们，是可以去做那多数人中的其中之一的。

小熊

2021年5月30日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by Patrick Radden Keefe

Copyright © 2019 by Doubled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Truth ＆Wisdom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21-0409

[1]“敢死队”在原书中为the Dirty Dozen。1967年上映了一部名为“The Dirty Doz-en”的欧美电影，中文译名普遍为《十二金刚》。——译者注

[2]compassion leave，指因家人生病或去世而准许的休假，此处特指离狱。——译者注

[3]译文引自[爱尔兰]谢默斯·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1页。希尼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4]译文引自[爱]谢默斯·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译者注

[5]译文引自[爱]谢默斯·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页。——译者注

[6]吉尼斯黑啤在圣帕特里克节的广告中错用四叶草作为标志，但事实上该节日的象征是三叶草。四叶草代表幸运，但与圣帕特里克节无关。——译者注

[7]即双胞胎之一吉姆·麦康维尔。——译者注